沧桑

晓剑

代序：再说晓剑

田雁宁

我和晓剑兄颇有缘分，相处相交也颇为投缘，这点我心知肚明，也为这缘分带来的友情而欢慰。有时我还是觉得有些奇怪，似乎冥冥中有什么时常牵连着我们，不管这只北方之狼在北京在海口还是在广州，只要心里想着便会得到他的消息，他甚至会神奇地出现在我跟前，让我们都大喜过望。半个月前，我在完成新长篇《情空灿烂》之后，应云南文友、《滇池》主编李霁宇夫妇之邀去昆明度假，离开夏季潮热的成都到达凉爽宜人的春城，的确轻松愉快。晓剑兄曾在云南边地当知青，也是从云南走向全国的知青作家，到了昆明自然会想起他。昆明的夏雨晶莹清凉，我和霁宇兄坐在他的书房里，正谈《滇池》今年开辟的批评栏目的反响。霁宇兄刚从大连开完全国中年作家会议，并在北京接受了中央电视台“文化视点”记者的采访，情绪再平和也免不了兴奋。我说晓剑是从云南出来的作家，云南这个具有勇气的文学批评栏目应包括他。霁宇兄说他们先从云南本省作家开评，然后把批评矛头指向全国一批当红作家，晓剑自然跑不掉。话间我的手机响了，一接居然是那个熟悉的乐呵呵亮朗朗的声音：雁宁啊，我是晓剑。我心头一热：晓剑，在哪儿呢?他说：昆明。我先是一惊再是一喜，叫道：哈，我也在昆明啊！连霁宇兄也奇怪，说你到昆明晓剑也来了，是不是约了的哟?确实没有约，这便是缘分。晓剑兄是随一个拍摄中国知青纪实片摄制组到云南的，先去了德宏、瑞丽一带，马上又要去他当知青的中越边境，于是相聚畅谈，伴着雨声度过了一个美好的夏夜。晓剑兄告诉我，他们几天后去成都，要拍知青部落和几位著名的老知青，我当即表示要回去接待和协助他们，晓剑却说你一家子出来　度假昆明天气这么好，还是留下来好好玩不要管我们啦。常为朋友着想，这是晓剑这位文坛剑侠的秉性之一，我却在昆明呆不住了，在他们剧组飞成都的第二天，也赶回了家里，全因为晓剑兄来四川了呢。说到性格，有些晓剑兄倒跟我挺近的。比如对美国的看法，我们都认为那是个发达的不错的地方，可以去求学可以去旅游，并不认为美国绿卡怎么不得了。荷包里揣了大笔美金怎么不得了。晓剑兄倒不是因为他的前妻已成了美国人的妻子，这只是一个地道中国人本朴的观点。美国是个伟大富强的国家，美国人民勤劳智慧这些我们都懂，就是做不了拿美国绿卡的中国人，那样肯定会难受的。因为在中国的大地上，我们稍作努力就可以比多数美国人生活得好，何必去美国经过一番脱胎换骨的苦磨、委屈加苦斗，贴上那一张看似光彩其实悲酸的美国标签呢?有位从美国归来的知名画家到我家玩，挺认真地说雁宁你日子过得不错呢！好些美国人也不如你，为他这句话我高兴一阵又打电话告诉晓剑，他在几千里之外，哈哈大笑。晓剑兄和他的知青摄制组在成都忙乎一阵，又提着他那又重又大的行囊要回海口去了，分手之夜我们免不了要谈小说，因为我们的兄弟之谊也全因为小说。晓剑去年创作的长篇《土命》将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而且是‘中青方阵’丛书的首部。这部表现一个农民革命者命运的小说是厚重深刻之作，它问世会大受读者欢迎是肯定的。而我关心他回去的新作，晓剑兄挺自信地说要写一部题为《海南最后一个情种》的新小说，看他那兴奋得红光满面的样子，我笑了，这只北方独狼，也是一个海南情种，但质朴忠耿的汉子晓剑不是最后一个，绝不是。

1997 年 8 月 15 日记子成都巴人村

1997 年 10 月 3 重日夜事补记于书房

——谨献给中国的农民和他们不屈不挠改变着自己不公平命运的后代们!

(1)

陕北汉子霍达东死得很坦然，没有向医生苦苦哀求延长他的生命，也没有做出一副多么热爱生活的恋世神情，更没有遗憾地表示他还有多少工作需要完成。他在被打了一针之后，便平静地躺在带卫生间的单人病房内，望着被烟熏黄的天花板，感觉到有什么东西冷峻地、沉重地从不可知的地方压下来，缠绵地、无法推脱地拥抱住了他。

他听到窗外有些躁动，人们在歇斯底里地呐喊，似乎是有许多人在游行、欢庆着什么;也似乎是许多人在打仗，为了什么在殊死地拼杀。就在这一刻，他眼前凝滞的黑暗一下子消失了，比光明更为炫目的东西使他的视野中一片白晃晃的，他甜蜜地、轻飘飘地飞离了自己，从一座没有泉水和佛像的古城来到了风沙满天的黄土高原，躺在了有着驴粪香味的窑洞里，他的肉体失去了魂灵。

就是在这死亡来临的时候，他依然解不开他出生那一刻在他家乡所发生的那件事对他整个人生有什么象征意味，也许它纯粹只是一种巧合，是一种毫无意义的偶然。

从血水和粘液的洪流中挤出那撕裂的肉管后，他在人类世界活过了七十六个年头。本来他以为活不到这么大岁数，他死的机会太多了，小时候、少年时候、青年时候、中年时候，他都和死神相遇过，可死神却总是宽容地放过了他，使他在真正离开这个世界时没有理由抱怨什么。

他委实活得够长久的了，他看到过比满坡的山丹丹花还要多的年轻人变为了一堆堆白骨，化成了泥土。于是，黄土地上的山丹丹花才会那么艳丽，那么圣洁。也于是，他面对着那轻盈而至的死亡女神发出会心的微笑，示意她敞开她那黑色的大氅，露出她由白骨组合成的胸膛，熟悉地、依恋地把头枕向那里，在他最后的想象中，那里是母亲般丰饶的奶子，每当他那被人称有反骨的脑袋靠到了软绵绵、不很尖挺、不很有弹性的奶子上时，他就会很香甜、很安宁地睡去，否则，就会噩梦不断。

他睡去了，睡在冥冥之中的陕北窑洞里，睡在暖洋洋的土炕上，睡在女子的奶子中间，他再不会醒来。

霍达东出生的那个年头若按公历计算是一九 00 年，又一个世纪的开始。这个世纪很纷乱，发生过两次世界大战，诞生了社会主义国家，出现了恐怖组织，到处杀人、放火、劫飞机，人们不再抽大烟，而是改抽海洛因和可卡因，还有一种无法医治的艾滋病在流行……

假如世界要不纷乱的话，他可能永远只能是一个农民，中国几千年来无数的人从一生下来就注定一辈子都在土里刨食，本来他也不会奢望和他的祖先有什么不同的命运，何况不同的命运并不一定就是福。

凡是一个世纪开始时出生的人都会被称为幸运的世纪儿。但是，他的家乡没有任何人懂得世纪是什么东西，他们只知道六十年为一个甲子，只知道光绪二十六年，也就是庚子年间热辣辣的初夏时，一个虎头虎脑的男孩子欢快地叫唤着来到了世上。

那天早晨就热得烦人，公鸡只打了一声鸣之后就躲到那条年复一年被洪水越冲越深的沟沟里去歇凉，沟沟的两边是陡峭的黄土崖，崖壁上有一孔孔窑洞，那一扇扇木门窗有如远古时期的悬棺，里面装着不死的生灵。

没有人早早起床，一年四季难得洗一次澡的陕北汉子们带着浑身的烟气和汗味混合成一股男人不可剥夺的气味缠裹住自己白白胖胖的婆姨在酣睡。太阳晒不透的窑洞内所保持的清凉使祖祖辈辈生活在这条沟内的男女老少们不愿早早地走出门去。

然而，在离这座叫做马家沟的小山村十里路远的金城镇上，并没有乡下的祥和、安谧。有着妓院、商号、盐行、客栈、骡子店的金城镇在光绪年间繁华得几乎从没有宁静过，即使是在深更半夜，酒鬼的粗鲁的叫骂声，妓女的哼声哆气的打情骂俏声，赌场里骰子哗啦哗啦的投掷声，捞外快的衙役狐假虎威的吃喝声也是此起彼伏，几乎从不停歇。好不容易到启明星从潮湿的雾气中飘起来的时候，贩私盐和烟土的骡队又起程了，不情愿的牲口嘶叫着，一阵阵碎乱的蹄声渐渐远去，迎来的是镇子周围挑鸡、赶猪、背米、扛柴来卖的农民们。

初夏的这一天早晨，金城镇上更是有点躁动不安，连空气都在剧烈地波动。人们怀着一种难以诉说的情绪在期盼着什么，连从来都不会在日上三竿前起床的妓女和缥客都早早地告别了温柔乡。

金城镇在晌午时分要将一个江洋大盗开刀问斩!

自从光绪当政以后，金城镇已经有近二十年没有杀人示众了，尽管与这里相隔百里就是米脂县，那里就出过大匪李自成，后来也匪患不断，可金城镇属肤郡府管辖，很少有刁民闹事。二十年前被问斩的是一对奸夫淫妇，奸夫装鬼吓死了老婆，淫妇下药毒死了丈夫，结果东窗事发，双双被绑赴刑场。两个人给扎成一个肉粽子，骡子一样壮的刽子手一刀就割下两个脑袋。这一刀使这个刽子手名声大噪。不过后来因没有死囚可杀，他改行当了屠夫。

事隔二十年，金城镇又要杀人，这是件很刺激情绪的大事，当然没有人会放过去观看的机会。何况，那死囚还是近一年多来让方圆几十里的人们谈之色变的大匪黑狼。

关于黑狼的传说在肤郡府西部地区几乎家喻户晓，说他见到有钱人就抢，见到有姿色的女人就奸，拿小孩的心肝下酒吃。拿死人的脑袋当尿壶，也有人说他力大无比，一只手就可以降服发情的公牛，一脚可以踢死一只狼，三百多斤重的磨盘可以举过头顶，不用刀就可以抓出人的脑浆子。

当然，这都是传说。按官府的记载，说黑狼是从黄河东边流窜过来的，因其妻被当地一个县太爷的公子霸占并杀害，所以他放火烧了县太爷的宅邸，并奸杀了县太爷最喜欢的三姨太，然后只身逃过黄河，栖身于肤郡一带。一年多来，因报复捉拿他的官府，他确实做过几次大案:一次是杀了金城镇清兵的哨总，并把这名军官的女儿卖到了肤郡的窑子当妓女;一次是抢了官府办的盐行，把上千斤盐扔到了街道上，任凭居民捡拾，还把盐行老板的老婆、肤

郡县太爷的小女儿绑到深山沟里当了三个月的押寨夫人，然后又换回了一千两白花花的银子;第三次是拦劫了一支商队，把四名被雇佣的清兵切成肉酱，把骡子驮运的布匹、茶叶白糖等货物都分给了附近的农民。这几件事情经过人们的渲染、演义，就把他传说成一个凶神恶煞般的大盗，也就是当地人称为的土匪。

黑狼被抓获是坏事在一个女人的身上。这个女人就是给他当了三个月押寨夫人的盐行老板的老婆，名叫如玉。

将近一百天朝夕相处的生活，虽说并不能让一个县太爷的千金爱上一个粗鲁的、随时有生命之优的农民，但是这个粗壮汉子的野性和永远不知疲倦的旺盛精力对她还是产生了以往从没有发现过的魅力。当他唱起和黄河流水一样深沉和狂烈的黄水谣时，她会觉得大自然的勃勃生机在穿透她的心房，使她对以往龟缩于闺房的伤春岁月感到那么无聊和无趣;而当他在淌流着涓涓泉水的沟底里，在开满山丹丹花的山坡上，在沐浴着皎洁的月光和如泪眼般的点点星光的源顶，在顶着火辣辣的太阳的谷地里，不分时间和场所地撕扯去她的衣服，野兽一样地占有她时，最初的受辱感和痛苦感如同秋叶般轻而易举地就随风而逝了。

他没有什么技巧和温柔，也没有情意绵绵和怜香惜玉，他只是像一个猎人贪婪地享受自己的猎物，像是一个伐木者拼尽全力地砍伐一棵参天古木，像是一个打井人无休无止地钻汲泉水，像是一个采花者随心所欲地蹂礦着路边的野花。她的在身体岩层下面的滚热岩浆因岩层被撞裂而喷发出来，她被封闭于体内堤坝里的一池静水因堤坝被刺破而倾泻出来。假如不是她所受的教育使她无法接受土匪婆姨这一现实，她真愿意一生都跟着黑狼过着席天幕地的荒野生活。

三个月后，如玉以一千两白银的价格被盐行老板赎了回去，她向自己的丈夫坦然地承认了几乎每一天都被土匪黑狼占有的事实。盐行老板虽然恼怒得浑身乱颤，但又对于婆姨没有自杀而成为烈女节妇无可奈何。终究她是县太爷的千金，他则因着是县太爷的女婿才能在金城镇独霸盐业买卖，花一千两白银赎回自己的婆姨也是县太爷的意旨，他照办了。婆姨回到家中，他除了安抚之外，当然也别无他法。他唯一能发泄心中不满的就是再不与婆姨同房，而是去妓院包了一个新来的浙江妓女，以此来达到一种心理平衡。

如玉并不在乎丈夫对她的冷落。她从回来的那一天起，每到夜晚，就在床上辗转反复，渴念着黑狼那岩石一样结实的身体。终于，她按捺不住本能的欲望，以回娘家为借口，离开金城镇，去寻找黑狼。

女人死了心眼去办的事，往往都会成功。第三天黄昏，她听到了黑狼用尖厉的嗓音唱出的黄水谣:

小妹妹，我问你，
你的哥哥在哪里?
黄河九曲十八弯，
比不上我想你的肠子乱。
一想你的脸儿俏，
二想你的杏核眼，

如玉顺着这绕梁穿沟的歌声寻去，看见黑狼正站在一个源上，印在圆圆的太阳里，赤裸着半截青铜筑出来一样的粗壮身子，冲着沟对面一个放羊的女娃嘶嚎着。如玉欢快地叫了一声，不顾一切地冲了上去，一下子就扎进了他的怀中。随即，因着每一个细胞都在燃烧，因

着太阳落于黄土高坡之后天空骤然一暗，她瘫软了，从他身上滑落于地……

从这一天以后，盐行老板的婆姨如玉隔三差五就要以回娘家为借口，骑上一只小毛驴，到离金城镇并不太远的地方与土匪黑狼幽会。因而，当盐行老板发现自己的婆姨不但没有因守空房而枯萎下去，反而肤色越发滋润，眼睛越发明亮，奶子越发胀鼓，腰肢越发扭曲时，他坚定地相信她一定招了野汉子!

在光绪年间的陕北，对招野汉的荡妇的惩罚是极为严酷的，裸体游街是最轻的，还有骑木驴、活埋、在野汉子家门口吊死，用烧红的铁条穿阴等刑罚。使用这些刑罚中的任何一种都可以逼迫如玉说出她和黑狼的奸情，但盐行老板不敢，除非他不想在肤郡县呆了，否则他敢把县太爷千金怎么样。

盐行老板只得偷偷跟踪老婆。在如玉又一次提出回娘家的要求后，他痛快地答应了她。如玉前脚骑毛驴走，他后脚就跟了出去。走了几里地之后，盐行老板看见了他老婆和一个彪形大汉纠缠在一起，他顺着沟沟爬近一些，在一佗沙蓄子后面，他看得更清，盐行老板当即大吃一惊，那个男人怎么那么像县府的通缉土匪黑狼呀!

于是，金城镇的清兵轻而易举地抓获了土匪黑狼，草草审问之后，就决定处以极刑，斩首示众。而盐行老板则得到了肤郡县衙悬赏的一千两白银。做为一个商人，他没亏本。

这一天晌午时分，当金城镇的农民们等待得有点不耐烦之时，一声锣响，二十多个清兵在人群中开出一条道来，特意从肤郡县府赶来的县太爷的轿子出现了，紧接着，五花大绑的土匪黑狼被一根铁链子套在脖子上牵出了镇衙一侧的牢房，肥胖得像一口母猪一样的刽子手跟在了后面。又是一声锣响，一行人向城门外走去，几千围观者蜂拥于后。

金城镇并不大，只有一条不长的石板街和两座保存完好的城门楼，城墙是大青石砌成的，整座城为狭长形，一侧城墙倚山而立，蜿蜒起伏，一侧城墙倚水而建，两边都有天然屏障，使这座在金朝时开始繁荣起来的小城数百年来一直没有被歹徒侵袭过。　　刑场就在城门外的河滩上，夏天刚至，雨水还稀，因而河道中只有窄窄的、浅浅的浊水，它从山沟沟里淌出，女人身体曲线般扭转了几下，又流进山沟沟里去，这条河道的下游，就是马家沟。

行刑的程序没有变化，在宣布完土匪黑狼的一系列罪行后，县太爷将一个签子冷峻地向条案上一摔，锣声便再次响起，刽子手庄重地、威严地、执行神圣使命一样地晃上前去，端起一碗酒，递到黑狼嘴边，说:“兄弟，喝下这碗酒，到阴曹地府也别记仇。”

黑狼伸长了脖子，吸干净了碗中不算太烈的酒，仰天长笑了一阵，大声吼着:“好汉杀头不绝命，老子立马就投胎，看见北边冒烟的地方没有，那里二十年后准出一条好汉!老子土里边来，土里边去，在这世上晃了一溜榴，有钱人的婆姨玩过了，大把的银子也花过了，执刀的兄弟，你就给我来个痛快的吧，我的魂晚上保证不来咬你的毬!”

刽子手点点头，毫不含糊，反执砍刀，脚下狠狠一踢黑狼的膝盖，黑狼还没完全跪下去，就觉得脖根处一凉，一股热血喷了出来，随即，他的脑袋离开身子，那有一根长辫的头在河滩的沙石上滚了几下，最后收人他眼帘的是黑鸦鸦的人群和人群中一张俏生生的脸蛋，于是，他笑了，这笑凝固在他生命的最后一刻。

几乎在一袋烟工夫之后，离这河滩十里处的马家沟的一个窑洞内，传出了一个婴儿刚刚问世的嚎亮啼哭声，这个婴儿就是后来被称为“红匪”，再后来成为中国一省之长、最后又被削官为民的霍达东。当然，他从来也不会认为自己是光绪年间的土匪黑狼的转世投胎，尽管他绝不是一个纯粹的唯物主义者，在他死时，他所珍藏的遗物只有两样东西，一件是盛着一捧黄土的小荷包，一件是来自于五台山寺庙中的沉香木念珠。

(2)

陕北汉子霍达东来到这个世界上是以悲剧拉开序幕的，也许就是因此，他轰轰烈烈的一生中经常被人生的凄渗、悲凉和无奈等阴云所笼罩着，使他不苟言笑，脸上总是青石板一样冷峻的神情，这倒越发使他显示出一种真正男人的魅力。

他之所以能够积天地之灵，孕育成胎并钻出母腹应该说是极为偶然的，或者说是很幸运的。据算命先生给他父亲算命说，他父亲命中无子。而实际上，他父亲结婚多年，除了生有两女外，也确实一直无子。

他父亲名叫霍厚厚，这个老实巴交、像地鼠般勤快的农民已经说不出他家有多少代人在这个叫做马家沟的黄土高坡下生活过了，也说不出为什么这么多代人用一生的努力也没置下什么家业，使他依然只能在三孔破窑和十几亩贫瘠的旱地里度日。唯一可以令他自豪的是，他的祖先是古代名将霍去病。

一霍厚厚的婆姨是个不似农妇的干疼女人。从新婚那夜起，她就没有让有她两个份量重的丈夫偷快过。她缺少血色的肌肤，瘦骨如柴的胸脯上两个比野酸梨大不了多少的奶子，细得像锄头把一样无肉的四肢，拍一巴掌会略得手痛的屁股，都使霍厚厚觉得她根本不像一个十六岁的成熟女人，几乎惹不起他的强盛欲火。但是，终究他是一个男人，在用手对身旁这个已经主动脱光了衣服的女人粗鲁地摸摸捏捏之后，他还是一翻身压了下去，随着一阵碾子压碎玉米般的声响，他感受到他突破了一个障碍，进人到以往应在梦中才有的狭窄、干涩的空间中。

那个看上去单薄柔弱的女人在承受强烈而粗壮的冲击而使身体某一部分因扩张导致破裂开来时居然没有发出痛楚的尖叫，她紧紧咬住嘴唇，像是荒野中一棵孤独而无助的小树，任凭风雨的摧残，也像是一只挨宰的小羊，只会从哀怨的眼中流淌着伤心的泪水。于是，嘴唇上浸出的血珠滚落到硬邦邦的枕头上，两腿间冒出的血丝在特意铺在炕上的一块白毛巾上绘出了一朵红艳艳的灿烂花朵。

从这一天起，几乎每个晚上霍厚厚都会怀着一种急于制造后代的焦虑不安和对自己婆姨生理上毫无反应的不满而无休无止地搏杀着，冲击着，如同一个永远也胜利不了的将军一样不屈地进行一次又一次毫无喜悦结果的战斗。

终于，在第三个年头上婆姨的肚皮大了起来，这使得霍厚厚总是沉闷的脸上浮现出了那

个年月少有的笑容，因为他尽管对自己的婆姨的相貌和身体不满意，但她终于为他怀上了后代，就像在一块干旱贫清的土地上有一块属于自己的土地，不管怎样抱怨，一旦播撒下种子，经历辛苦的耕耘之后，稀稀拉拉的庄稼秆所结出的粮食还是会让他产生丰收的快感的。

娶婆姨而养育出后代来，于他是非常在意的。他和千千万万个农民一样，奉守着“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古训，何况，他绝不能让霍去病的正宗家族在他这一代断了香火。他认为，若是果真如此，祖先的在天之灵一定会惩罚他的。

十月怀胎，一朝分娩，霍厚厚的婆姨生下了一个和她同样面黄肌瘦，小得可怜的女婴。一直在窑洞外一口接一口抽着旱烟的霍厚厚得知消息后，连房门都没进，长长地喷了一口烟雾后，便沿着羊肠小路走向自己种着烟叶的地里，去拾掇那长得绿旺旺，含有大量尼古丁的植物去了。对于这些植物，他表现出比对自己亲生女儿更多的偏爱。

一个月以后，他重又开始在婆姨身上尽心尽力地耕云播雨，他虔诚地相信，只要不停地劳作，终会有收获的，上苍只会对那些偷奸耍滑的人进行惩罚，而对于勤快的人一定会给以相应的回报。

又是两个年头过去，上苍给他们的回报依然是一个女娃。他勃然大怒了，一脚踢开窑洞的门，冲到下身还在淌血的产妇身边，抡圆了胳膊就是一个大耳光，恶毒地骂着: ‘旧你妈!你算啥女人?咋就养不出个男娃来?告诉你，你要再给我养个女娃，我就休了你!我们姓霍的不能让你给绝了后!”

他婆姨一声不吭，只是默默地让辛酸的泪水从眼角流向肮脏的土炕，而老态龙钟、手指像枯枝一样的产婆低声嘟浓着:“种瓜得瓜，种豆得豆，你这汉子也不查查自己下了什么种?也不找算命先生看看自己有没有抱男娃的命?”

对于比自己母亲岁数还大的产婆，霍厚厚倒是不敢出口伤人，而且，他觉得产婆的指责不无道理。他委实应该找找算命先生为他算算是否命中无子，也该找医生摸摸脉，他是否精血不够强盛。于是，他哑口无言了，悻悻地走出门去，顺着不宽的河岸向金城镇走去，在那里，他能找到算命先生，也能找到医生。

金城镇南侧有座名为春香楼的妓院，妓院斜对面的药铺边上摆着个卦摊，来算命的和来拿药的人们平分秋色，有先算命而后求医的，同样也有吃了几服药不见效而又来算命的，摆卦摊和开药铺的则互不干涉，相安无事。有人说这两个于光绪初年就来到金城镇的外乡人本来就是表兄弟，互相在接生意的同时也把生意转给对方，于是两个人都大发其财。不过，这种说法一直没有得到确证。自古以来中国的游方术士都懂得医道，而切经摸脉的医生也都会看点面相，懂些八卦艾易。因而，算命的在看出来算命者身患疾病，说些危言耸听之词后，让病人拿几服药先去近忧，既行了善也扬了名;药铺坐堂大夫有时碰上疑难疾病，无法确诊或确诊后无法治疗时，便将病人推至卦摊，让算命的告诉患者有血光之灾，命不久矣云云，自己也就摆脱了治死人的责任。所以，摆卦摊的和开药铺的之间有一种相互利用的关系，并不一定是兄弟才能和平共处。

霍厚厚进了金城镇是先到了卦摊。卦摊的全部家当是一张油漆剥落的条案，两张木凳和一个因风吹日晒而早已看不出颜色的旗幅。条案上摆着纸砚笔墨，以供来算命者写出生辰八

字，木凳则是算命先生和来算命的人坐的，旗播上绣着几个龙飞凤舞的大字:神算天命。

算命先生并不老朽，但一身灰布长袍和一副圆形黑框眼镜使他显出老谋深算的样子。他问了霍厚厚的八字，又问了是算身前事还是身后事，很快就说出霍厚厚命中无子。在看到霍厚厚一副伤痛欲绝的样子后，他又微微一笑，告诉霍厚厚:天命虽不可相抗，但心诚则能水滴石穿。不过若是他这一代有子，会伤及下代，也就是将无子之命转至后辈。

霍厚厚不愿多想，只要他这一代能够继上霍家香火，不负祖先就可以了，作为一个颇为现实的农民，他确实想不了那么长远。因而，他交上了一吊麻钱的算命费，按照算命先生的指点，转身进了药铺，让坐堂大夫号了脉，又花了一吊麻钱拿了几服药。

大夫给他开方子时一再叮嘱他:“此药是养精之物，你虽看去身强力壮，但精气散乱，需以这几服药调整聚合，药后停房一百日，到精气最强之时，才能一矢中的，切记，否则仍将养女不养男。”

霍厚厚怀着莫大的希望回到马家沟，把几服药扔给了还躺在炕上的婆姨，告诉了她算命和求医的结果。那个将自己全部命运都拴在了丈夫身上的弱小女子，立刻用一块蓝罩帕包住脑袋，挣扎着爬起床来，赶开纠缠着要吃奶子的小女儿，到隔壁灶房内去点火熬药了。

几服药下去后，霍厚厚身体没有什么特别好的感觉，倒是一百天不能和婆姨干事使他经常感到欲火难熬，好几次他忍受不住，翻到婆姨身上，但都被婆姨坚定地、拼尽全身力气地推下来。因为这个女人知道，若一旦因丈夫没有遵照医生的话去做而使她再生下一个女娃的话，那么她一生都将生活在地狱里。因而，她宁肯让丈夫暂时陷人叫春的猫一样的无奈嘶嚎中，也不能让自己和霍家以后有永远也无法解脱的痛苦。

一百天的时间他不知是怎样熬过来的,有时他看到驴子交配的场面时都会像大家闺秀一样避之唯恐不及，而在他种的小米地边上被废弃的窑洞内，又常有一个名声不好的小寡妇勾引毛头小伙子来野合,那小寡妇偷悦之极时肆无忌惮的尖叫声和那些不谙人世的半大孩子初次享受男女之欢时的兴奋粗喘更是使他五脏如焚。到这时，他就要跑到沟底那条没不过脚腕的河水中横成一个大字躺于其中，然后等一切平息了再爬起来 C

当一百天日子一过，那天太阳才刚刚落山，他就急不可耐地把婆姨从灶房拖进有着土炕的窑洞，如同强奸一个陌不相识的女人一样不容分说地扯下婆姨身上的衣裤，将婆姨按倒在铺着烂席的大炕上。婆姨不再拒绝，好像新婚之夜那样紧咬住嘴唇，顺从地接受了他暴烈的进人。他积郁得太久了，一触即发，这使得他懊丧不已，有一种极其珍贵的东西被漫不经心地浪费了的感觉。他休息片刻，不顾躲在门外从门缝中偷窥的女儿的目光，重又振作起来，再次向婆姨冲击过去。这一次他有点心满意足了，他那瞬间的爆发使他全身轻松无比，有如释去了沉重的负担，也有如钻出了无底的深渊。令他惊奇的是，他的婆姨在这一次也有了以往从没有过的反应,她不再像从前那样木头人一样地任他摆布,而是用瘦弱的四肢缠紧了他，从嗓子眼深处发出了低低的似哭似笑的呜咽声,他终于用男人的野性和力量开发出了她女性的本能。

也就是这一次，霍厚厚真的改变了无子的命运，他婆姨为他怀上了一个儿子。马家沟的有着经验的中老年女人从他婆姨脸上雀斑的形状和笨重的体态,几乎一致断定霍厚厚将抱上

一个他梦寐以求的男娃。

在婆姨的整个孕期中，霍厚厚好像变了个人，他不再像使牲口一样使唤婆姨，除了地里的活计之外，挑水、打柴、碾米磨面，甚至拾掇院子的事他都揽了过来，有时还会烧水做饭，他说话的声音也柔和了，不再恶声恶气。这倒不是他对婆姨增加了爱，而仅仅是怕吓着胎儿，如同不让婆姨于太多的活是怕累掉胎儿一样。

初夏那个燥热的日子的一大早，霍厚厚的婆姨被肚子疼得爬不起床来，霍厚厚知道这是生产的前兆了。于是，他一骨碌爬起来，风风火火地把产婆叫了来，又赶紧煮剪刀、烧开水、化红糖，他焦虑万分，提心吊胆地等待着孩子的问世。

天气本来就热烘烘的，再加上他心急如焚，汗水便成串地流淌下来，他像在水中淋泡过一样湿滚流、亮晶晶的。按照以往两次生娃的经验，晌午前娃就应该出娘胎了，可是，太阳快当顶了，窑洞中还没有传出婴儿的啼哭声。他有点按捺不住了，想推门而人，看个究竟，可他又没有勇气坏了从古到今的习俗。人们都说，婆姨生娃时男人若闯进去，会冲了喜气，不伤产妇就得伤娃。

终于，产婆两手血淋淋地走了出来，愁眉苦脸地说:“娃他大，这娃有点怯世呢，不肯早早露头，兰英血淌得多，没气力了。我说个话你别着急，大人、娃娃只能保一个。”

“是不是男娃?”霍厚厚手中的烟锅杆儿被他握裂了，在他焦急的询问中发生一声脆响。

产婆点点头，忧中有喜地说:“是个男娃。他先伸出条腿，这以后一准是个大人物，先出腿，站得稳，不像先出脑袋的，以后总得见人先点头……”

“那、那就保娃!兰英她……”兰英是他婆姨的名字，他说不出口不保她，终究她跟他一个炕上睡了五年多呀。

产婆盯了霍厚厚一眼:“你这话当真?”

霍厚厚一咬牙，两膝一弯，跪了下去，猛力磕了三个响头，怀着一种负罪感说:“兰英啊，你给我霍家续上了香火，我霍家世世代代记着你的大恩，这男娃我不能丢，你一准也舍不得丢了他。只要娃平安，你有什么三长两短，我霍厚厚这辈子供着你的灵位，每年到你的坟上给你烧纸钱、丝英啊，你活着没过上好日子，到了阴间一准不再让你受苦!”’

产婆孤丹网什么，其买问一尹百个男人，有九十九个都会说保娃，她只不赶例行公事罢了。夙到窝洞里，产妇已经面色惨白，小腹依然胀得像面鼓，两腿中间的产道中伸出一条婴儿的小腿，如同产妇长出的一条粗硬的尾色。她的呼吸微弱之极，粘稠的血液染红了炕头和地下的细土。产婆有点内疚地说了句:“兰英，你早就是娃的娘了，我也是娃的娘，娃是咱身上一块肉，为了娃，咱当娘的死罪活罪都得受。”说罢，她俯下身子，残忍地将虽然干枯但却像铁叉一样有力的手伸进了产道，抓住了胎儿的身子，又把另一只手同样插进去，扩展开早已经撕裂了的产道，揪萝卜一样向外拽着胎儿。

霍厚厚的婆姨、产妇兰英感觉到身体正在从中间被强力分割成两半，但这完全和新婚之

夜那种刺破之后的撕裂感不一样，那是一种可以忍受，并且在少女梦想中有过期盼和想象的进人，而此时却是一种难以忍受，用什么也无法替代地向外拖出，在这种拖出中，她的五脏六腑似乎也跟着涌出体外。终于，她再也不能抑制自己，用生命所能迸发出的最后力量惨嚎了一声。

后来有人推测，这一声几乎震荡了整个马家沟的、不似人类的尖叫响起之时，正是十里地之外金城镇门外河滩上土匪黑狼人头落地的那一刻。

胎儿终于从母体中被生拉硬拽出来，随着胎盘的脱落，那人体上被撕裂的不可思议的巨大洞口中涌出了产妇身上最后一汪能够流出的已经缺少热气的鲜血，产妇紧握着的手正在慢慢伸展，她本来痛苦万分的脸上慢慢挤出一丝欣慰的笑容。

产婆没有去注意产妇，因为她手中这个猪娃一样嫩红、肥胖、有着可笑的小鸡鸡的男娃正被什么东西憋得嘴唇发紫，毫无声息。产婆手脚麻利地用煮过的剪刀剪断脐带，扎成一个结，然后提着婴儿一条小腿，让他倒竖在空中，挥手拍打着他的小屁股。婴儿的嘴中淌出了一些粘液，但还是不声不响。

产婆有些恐惧了，在她接生的绪.医物趁吞绷.加砚枷己录，而且她知道，若是这个男娃不能寺舀泉粗脚全吧邵咚蛇霍吮翻鼠，中，一定会像她撕裂了他婆姨的肉体.开 J 改李盈恤解坦圈巨裂!里

她坐到炕头上，放下手中的婴儿卜劲斑压如斌圈因阵再皿脚，辰的身体，一边考虑着还有什么办梢尽林即 p 砚粗两同卜今字改护 5 祖在那婴儿平躺在土炕上时，他的小庄贫川氏肖姗阮司色肠肠翻肠.面邵哭起来，产婆一下子从炕上滑落于地，她不是被吓的，而是精疲力尽之后的如释重负。

窑洞的门“吮”一下子被撞开了，霍厚厚冲进来，到了炕边，他看见了那手舞足蹈的婴儿，看见了婴儿两腿间那一堆小肉团和小肉柱，他情不自禁地热泪盈眶，更情不自禁地高声唱起陕北的信天游来:

我有一个得儿毛驴子儿，
快如得儿风，
忽啦啦来在了咱马家沟沟……
我睁开眼珠珠是一场梦，
没有得儿毛驴子儿，
抱了个男娃娃……

在霍厚厚摇头晃脑、得意之极的嘶嚎中，她的婆姨兰英慢慢地合上了双眼。她没有痛苦，在为自己的男人生下唯一、一个可以传宗接代的男娃娃后死去，可以说是她最完美的结局，她是在幸福之中离开这个世界的。

由于脚先伸出母体，今后注定不会向人点头哈腰的陕北汉子霍达东在刚刚出生之后就失去了亲生母亲，人生三大憾事中少年丧母这一件在他还是婴儿时就体验到了，尽管这时他尚没有意识。这对于他不仅仅是不堪回首的人生悲剧，而且在很长的时间对他的个人生活都产生着影响，这影响就是由于他没有母爱而滋生出的强烈的恋母情绪，他一生中所遇到的几个女性都或多或少地感受到他这种不太正常的心态。

(3)

陕北汉子霍达东最早的名字叫土生，这个名字是他大到金城镇西边龙岗上一座寺庙中求签之后给他取的。那座叫归元寺的庙不大，只有一座院落处于半山腰，占地一亩多，进了山门就是大雄宝殿，钟楼和鼓楼各踞一角，大殿两侧的厢房是小和尚和香客住的，大殿后面一座二层楼上面藏经，下面住着主持方丈。

这座庙虽不大，但历史却不短，根据肤郡府的记载，大唐盛年之时，就由一个叫做无方的和尚在这里建寺传经了，金朝屯兵建金城镇城墙之时，曾毁寺取砖，使原本占地十亩左右的寺庙变小，近千年来，寺庙再没有扩建，一直保持着一亩地大小的规模，而这里的香火也从没有逝过。时值光绪年间，龙岗上已是松柏苍翠，寺庙建筑几乎完全掩映于高大浓密的枝杈之间，一条青石板路蛇行而上，供香客和僧侣来往于金城镇和寺庙之间。

归元寺的香火虽未中断，但几乎也从没有特别兴旺过。每日只有十几个、甚至三五个求神拜佛者前来烧香磕头，具体人数从每天的撞钟声可以计算出来，归元寺的和尚绝不嫌贫爱富，凡是跪于大雄宝殿佛祖像前磕头者，一律撞响铜钟，因而，从稀稀落落的钟声中自然可以得知香客的不多。

这倒不是因为方圆几十里的人们对神灵有什么怀疑和排斥，而纯粹是农民们和准农民及小市民们功利主义所致。正所谓临时抱佛脚，有事相求才会提着供品，揣着香火钱到寺庙来，无事时从不会想起佛祖正坐在咫尺之处。幸好佛祖慈悲为怀，宽容大度，又将佛教分为大乘小乘，以能普渡众生。归元寺的和尚自己有庙产百亩，不一定非靠贡品和香火钱生存，所以尽管香火不旺，只要不断就可以维持下去。

霍厚厚自然属于无事不登三宝殿的大乘信徒，在儿子刚刚满月之时，没忙着办满月酒，而是先到了归元寺为儿子求签。这男娃是他霍家的单传独子，他当然忘不了算命先生为他算的命，说他的无子之命将会转至下代。在他无子之时，只要能得个男娃，他是顾及不了其他灾难的，而他一旦有子了，他就必须小心对待一切不吉之言，以免伤害他这八百里地一根独苗苗。

霍厚厚很虔诚地买了粗大的红烛和草香，小心翼翼地跨过山门，在大雄宝殿前的青铜香炉内满满的香灰中插上草香，点燃，连拜三下，又走上石阶，进入大殿，点上红烛，一一摆好，这才抱着儿子跪下来，硬邦邦地磕了三个响头，口中不停地叨念着:“求佛祖保佑我娃无灾无难无病无伤，求佛祖保佑我霍家香火不断，后继有人……”

一声燎亮清脆的钟响之后，清瘦老成的主持方丈走过来，双手合十:“施主，请抽上一签。”

霍厚厚先是手忙脚乱地把一堆铜钱丢进烛台一侧的随缘箱内，然后往手掌心上吹了一口气，紧张得有点颤抖地从竹筒中抽出一根细细的、因许多人抚摸而光滑滑的竹签，一眼都不敢看，哆哆嗦嗦地递给了老和尚。

老和肖看过之后，将竹签放在烛台上，把包在竹签上的一张黄纸铺展开来，用低沉但却洪亮得不像一个老人的声音说:“施主，看来你六根不净，晦气太重，此签乃下下也，解签诗云:‘大鹏终将折双翅，虎落平阳不如猫，叱咤半世云烟散，枯骨他乡望海潮。’你若是为自己求签，不解就罢了，若是为你怀中娃儿求签，我佛慈悲为怀，可以告诉你:此娃一生坎坷，大悲大喜，大起大落，且无子送终，客死他乡，虽有官居二品之命，但只是过眼烟云，终将沦为平民百姓，若想一生平安，需平淡度日，一生不离故乡之土。”他伸头看了看霍厚厚怀中的婴儿，摸了摸婴儿的头骨，又长叹一声:“此娃乃土命，且脑后又有反骨，相生相克，不为官则为匪，天命已定，施主好自为之吧。”

霍厚厚还想问什么，但老和尚双眼一闭，双手合十，嘴皮微微抖动，大概因那娃的凶相而触发了什么心事，在默念佛经以驱赶邪念，不可能再理会空荡荡的大殿中唯一一个施主了。霍厚厚只好心绪不安地慢慢退出大殿，怀着一种半信半疑之情颓丧地回到了马家沟。

从这一天起，霍厚厚就给自己的娃起了土生的名字，既然娃是土命，又终生不能离开故土，称为土生没有错的。他还找出了已经逝去的婆姨兰英活着时缝的一个小荷包，将自己家地里的一撮黄土装进去，封好口，挂在土生的脖子上，以驱邪避灾。这个绣着一只虎头的荷包一直陪伴着后来改名霍达东的陕北汉子，甚至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就没有离开过他的脖子，即使他成为了革命者之后依然如此。

(4)

陕北汉子霍达东能够回忆起的儿时最早的事情是他大娶了个后娘来，这件事让他颇为欢喜。尽管那年他才四岁多，对世事和人生还远没有理性的意识，但他绝对知道没有娘不是件好事，甚至是件让人伤心难过的事。他所居住的黄土沟沟里像他这么大的孩子都有娘，虽然这些孩子们在撒尿和泥、挖坑埋屎、、草窝窝里打滚、河沟沟里撒欢时和他一样无拘无束，野性十足，可一到晌午和黄昏，就有当娘的站在沟坎坎上叫唤:“狗剩，回家!”“菊菊，到娘这来!”“蛋蛋，你大要揍你哩!”“拴拴，饭熟了!”这些孩子听到这些似乎严厉但却亲近的呼唤，便会像小鸡听到老母鸡的“咯咯”声一样从源上往下跑，从沟里往上跳，最后只剩下土生一个人像只落了群的山雀雀，飞也不是，孤零零地呆着也不是。

猪娃的娘虽然是老母猪，可它也有娘哩，驴驹虽然总被孩子欺侮，可它也能往母驴肚皮下躲哩，而他土生只有一个整天阴沉着险，除了到地里干活就闷头不响抽旱烟的大，难道他土生是从石头缝缝里蹦出来的?可明明他有时淘气，抓了邻家的小鸡娃，从半山腰往沟里“放飞”时，邻家的婆姨就会训斥他:“有娘生，没娘养的!”看来他是娘生的，只是不知娘去了哪里。　　土生最羡慕的是别的娃娃可以往娘的怀里扎，高兴时往那应该比太阳还热烘烘的地方扎，不高兴时也往那应该比春天还温暖的地方扎，那里大概是孩子们认为最安全的地方了，可以避风，可以避雨，可以避鬼，可以避灾，可以避欺侮他的大孩子。土生没有地方可避，他大除了高兴时将他举起来兜圈圈外，绝不会将他揽于胸前。有一次他半夜醒来，撒了泡尿后，悄悄凑到他大的胸口窝，一点没觉得舒服，一股热烘烘的臭味从那里冲过来，他连忙滚到炕的另一头。

还有一次，他缩到一条刚生下狗娃的大黄狗肚皮下，那狗先是恶狠狠地盯住他，见他没什么动作就疲惫、惬意地闭上了眼，于是他凑得更紧，并不知不觉地用嘴含住了母狗一个硕大的乳头，好似含住了一颗青枣。他本能地一吸，一股有点腥味但却甜滋滋的液体流进了他的嗓子眼，他觉得这一定是天底下最好喝的东西了。然而，当几只狗娃因无奶可吃而老鼠般“吱吱”乱叫时，大黄狗愤怒地睁开了眼睛，狠狠地在他肩头咬了一口，给他那里留下了一个终身未消的疤痕。在以后无数次枪林弹雨之中，他再也没受过伤，而许多人都以为他肩头这块伤疤是他艰辛人生历程的光荣纪念。

在土生做梦都想有个娘时，他大终于为他娶来了这样一个女人。在办喜事之前，他大把他带到了源上冲着太阳的一片小树林前，那里有一个长满了和黄土地一样黄的秋草的土包，包前竖着一块石碑。这个地方他曾来过，是和娃娃们来捉知了，这片小树林中的知了个头又大，叫得又燎亮，而且很容易捉。

他大用锄头刨光了土包上的荒草，然后拉着他一块跪在石碑前，他大说:“这里埋着的就是你娘，你娘生下你来就死了。我知道你想有个娘，我找了一个，是你的后娘，你要在你娘面前磕个头，她生养你的恩情一生一世不能忘。再求求她，让她保佑你不受后娘欺负，叫你后娘把你顺顺当当喂养成霍家的一条汉子，你大只会种地，喂养不了娃哩。”

土生隐隐觉得以前曾来这里磕过头，但实在年岁太小，记不清了，他还搞不清亲娘和后娘的区别，觉着有个娘就是好事，大让他磕头就磕，让磕一个就磕一个，让磕一百个就磕一百个，大的话应该听。他俯下身磕起来，就像过年时他大让他给邻家的大人们磕头一样，那时每磕一个头就能得一个铜钱，这次磕完了就能得一个娘。

在亲娘坟上磕完头的第二天，他大就给他领了个娘来。这娘是骑毛驴儿来的，不是一个人，还带了两个十来岁的小姐姐。进院门时，有人放了一挂鞭炮，别的娃娃都去抢没有响的瞎炮，而他却眼巴巴地盯着这个娘。

这个娘比他想的还好看哩，胖嘟嘟的身子，一身红布衣裤使她像一朵成了精的山丹丹花，脸蛋蛋不像别的孩子的娘那样黄黄黑黑的，而是白白的像蒸馍，眼睛像个大枣核，有点斜斜的吊起，看上去凶凶的。她被他大扶着下了驴，谁也不看，径直走进了窑洞的门，自己把自己关在了里面。

他大在院子里摆了十桌酒席，很少露出笑容的脸上一直笑个不停，太阳落山之时，已经有点醉意的大还唱起了信天游……　　大人们哄笑着，说着些土生听不太懂的话，平日里因生存艰难而抹不去的愁眉苦脸在这一刻都变得舒舒展展，好像总蒙着云彩的月亮钻了出来。马家沟的欢笑在一年中是屈指可数的，过年、过端午、过中秋、娶亲、嫁女、生男娃。

终于，人们散去了，院门关上了，土生他大将土生、土生的两个姐姐和后娘带来的两个女娃带进了院落中的三孔窑洞正中间的那孔，他们站齐，冲那个一直不声不响、不出头不露面的白生生女人叫了一声“娘”，又让孩子们冲自己叫了一声“大”，然后把他们赶到了隔壁那孔窑中去睡，只留下土生一个跟大人们在一起，原因应该很简单，他还小，而且他是个必须得到呵护的男娃。

油灯被土生他大一口吹灭了，窑洞里顿时黑暗下来，但这只是一瞬间的事，因为月亮早

已越过源顶，越过院墙，越过挂满了红枣的枝杈，将它那水一样平滑，镜子一样明亮的光浸过木棱窗上糊着的白纸，洒进窑内，眼睛一旦适应了夜色，就可以清清楚楚看到周围的一切。

土生对周围的一切都很熟悉，紧靠窗子的是可以躺下一家五六口人的土炕，炕上铺着有破洞的草席，窑洞的尽头是一个条柜，炕的对面是一张枣木方桌和两张枣木椅子，据大说这是祖上留下来的。他所不熟悉的是新来的那个娘和他大吹熄油灯后的表情及动作。以往他大在吃喝娃们上炕熄灯后，都是再闷头抽上一袋烟，随即倒下头去，把被子给娃们盖好，自己裹上另一床被子，很快便奸声如雷，有如家里养的那头大牙猪。而今天他不是这样。

土生看见大凑到了新来的娘身边，讨好她似地给她解红衣服的纽扣。娘推开他，嘟哦了一句:“喝那么多酒，臭得醉死人。”大低三下四地说:“高兴，娶了你咱高兴。”他又伸出了手。娘打了他手一下，声音柔和了些:“笨手笨脚的，扯坏了衣服，我自己会脱。”娘站起身，不紧不慢地脱着衣裤，像拖延时间似的，慢慢把脱下的衣裤叠好，放在枣木椅子上，只戴着个花布兜兜，露着大半身的肥嘟嘟的肉，回到炕边躺了下去。

土生想滚到娘身边，想跟别的娃那样依偎到娘软绵绵、柔乎乎的胸怀里，他还从没有过这样的享受和经历，大给他找了娘来，大概就是为了让他能和别的娃一样被娘楼着睡。可是，他的身子才翻了一半，大就把他推到一边:“去，睡觉不老实，乖乖躺着，明天大给你买糖吃。”土生委屈得想哭，但他没有哭，以前他也有想哭的时候，可他流不出眼泪，他觉得还有比哭更好的方式去排解委屈。比如此时，他就用不睡觉、大大地睁着小星星般亮晶晶的眼睛来表示自己的不满。

他大没有再埋睬他，而是急急忙忙脱去自己那身粘了酒液和油汁的崭新马褂，将长辫子缠到脖子上，好像是要和谁打架，也像是要干什么活计一样摆出了恶虎扑食的样子。新来的娘欢快地叫了一声，像是被人抓了痒，又像是得了什么宝，原来是他大压到了她身上　　土生越发睡不着觉，他默默地等着，他确实太想到娘怀里去睡觉了。在他长大成人以后，在几个女人的怀中，他都想象着她们是他的娘，可除了一个女人之外，其他的女人都给不了他娘的感觉，他们只认为他的表现是一种男人的欲望。为此，他失望万分，他只能把对娘的酷爱，对娘的一切美好向往转移到被他称为人民的人们身上……

土生觉得娘在瘫软以后的时间都属于他了，他爬过大的身子，到了还没清醒过来的娘身边。在月光下，看着他向往已久的娘的胸脯，那是由比他脸还大的两堆白肉所组成的，像是两座弗梁，弗梁的中间是一条平缓的沟沟，将头枕在那沟沟里会刚好合适。土生伸出了怯怯的小手，去触摸那肉的赤梁和弗梁上乌紫的果实。

娘昏沉沉地翻身抱住了土生，把他使劲贴进怀中，土生顿时感到了从没有闻到过的一种好闻的气味涌进鼻孔，也顿时感到了从没有过的舒服笼罩了他全身，这滋味一定超过了冬日蹲在崖根晒太阳，超过了夏日里泡在溪水里浸清凉，超过了春日里钻进山丹丹花丛闻香香，超过了秋日里在谷子堆里打滚滚。他抱住了娘的脖劲，叼住了娘的奶头。

娘睁开了眼，看见了是男娃土生，狠狠地一把推开他，恶声恶气地训斥道:“你这个娃讨人嫌，不好好睡觉来烦老娘，这奶子是给你吃的吗?你大吃还要求我哩，我怀里是给你枕的吗?去枕你亲娘的坟头吧。哼，看你这样子，长大也不是个好东西，一心赖在女人身上熬日子哩!”

说完，娘不知廉耻地爬起来，抓了块白羊肚毛巾擦了擦身子，又倒在炕上睡在土生大粗壮的身旁，让土生一个人孤零零地睡在了炕的另一侧。

土生好久没有睡着，那白生生的月光惨淡地铺在他身上，以他儿童的想象力，在他脑海中闪现的应该是白花花的羊群，白灿灿的云彩，白绵绵的棉花，白雪、白霜、白纸、白墙，但他现在眼前浮动的却是白骨。从这白骨上他想到的是亲娘，他没有见过亲娘，他只见过马家沟大户人家马孝贤家移祖坟时挖出的白骨，人死了埋在地里就变成了白骨，他娘死了，被埋在地里，也一定是白骨。

归元寺的老和尚说得对，土生不是个普通娃，他有着与别的娃不同的脑袋瓜，他长大了一定会去干一番大事业，这事业他的大，他大的大，他的许多祖先想都不敢想，也许他也没有想，但他却去干了。这种事业他若不干，也会有别人干，他干了，是一种偶然，也是一种必然。这不是迷信，这是谁都无法摆脱的命，是一种冥冥之中的上苍为每一个已经来到这世上的生灵安排好了的归宿。

(5)

陕北汉子霍达东在自传中这样写道:作为一个出生于陕北偏僻山沟沟里的农民，反抗统治者的剥削和压迫是融于我血液中的一种本能，捍卫人民利益的意识早就潜藏于我的内心之中，这使得我在十一岁时就爆发出为当时社会所不能允许和坚决制止的行为……

霍达东的字写得很规整，有点近乎于柳体，看上去不像是个没有上过学堂的人，而实际上当年的霍达东，也就是土生只念过三年私塾，后来再没有机会上正规学堂。假如人生中有一些遗憾的话，没有好好读过书应该算是他一直耿耿于怀的一件。不过，这怨不着他的父亲霍厚厚，也怨不着那个从来没有喜欢过他的白胖胖后娘。

他大是力主让他上学识字的。这和他大又娶了婆姨，尽管每天晚上都不闲着，他后娘也不让他大闲着，但几年下来，播种无数，却颗粒无收，再也投能生出一男半女来有关系。他大知道只能有土生这么个单传独子，无论多少人说他后娶的婆姨多么有生男之相，可跟了他也不会再生出男娃来了。于是，他大必须要像调教牲口一样调教好霍家唯一的传宗接代之人，既不能逝了霍家的香火，更不能丢了霍家的人。而调教的最好办法就是知书达理，知书达理了才能规规矩矩做人，也才能在日后谋个一官半职，光宗耀祖。更关键的是，才不会为匪。他大是不会忘记老和尚解签时说过的话。

土生是七岁那年进的私塾。他大跟他后娘说:“女娃日后嫁人，过得好不好全看命，识字没用。土生这娃得念书，念了书才能稳住他的心，才能有出息，日后咱们老了才能有个依托，男娃不识字一辈子只能黄土里刨食，没个出头之日，总受欺侮哩。”

后娘不反对土生大的说法，她看出来土生这娃不安分，不像一般男娃一天到晚不是笑就是哭，无掩无遮，肠子和脸通着气。土生的小脸总是辈辈的，像块能刻狮子的青石块，硬邦邦、冷冰冰，玩倒也玩，闹倒也闹，可话少，而且总要当娃娃王，要是当不成就自己独自一

人去玩，去闹，玩得出奇，闹得出头，惹得别的娃又来追随他。大人吼他，他像没听见，最多是“嗯”一声了事，该干啥还干啥，自己心里藏着个小九九。后娘反正管不了他，又不是亲生的娃，也不想管，让教书先生去打他手板心吧，何况让他大高兴，她也能多点高兴的时候，男人难伺候哩。她点头应承着丈夫:“这娃出众，兴许能念出盼头来。”

就这样，土生被送进了私塾。

马家沟本来有家小学堂，就在村口处青石板桥的东头，那里本是马家沟大户马家的祠堂，是马家沟唯一一座盖在平地上的青砖建筑，有一年发大水冲了这祭祖用的殿堂，大水退了后砖砖瓦瓦散了一地，房基也埋在了泥沙中，可还剩下两间厢房没有倒塌，纹丝不动地立在那里，马家族长觉得这两间房的根基牢，有百年之固，十年树木，百年树人，在这里办个学堂一定能培养出百年之材，于是和族人们商量了一下，将祖祠另辟在半山腰本来当粮仓的五孔大窑中，这河滩地上的两间青砖瓦舍就改为了学堂。

说是学堂，但不是马家沟的娃们都能进得去，只是马家一族中有点身份的或地多的农户家的男娃才能有机会，而且还要交上一笔不菲的学费。他姓的娃只能瞪着小眼在学堂外面打转转。

马家沟之所以称为马家沟就因为在两道黄土梁夹住的沟壑中间倚坡而居的一百多户人家中不仅最富有、占地最多的大户人家姓马叫孝贤，而且占一半以上的人口都姓马，其他虽有李姓、张姓、王姓、霍姓，但都人丁稀少，不足以与马姓抗衡，只能与马姓的人家平安相处，苟且偷生，所以，其他姓的人进不了马族办的学堂也毫无怨言。何况，不少人家根本就穷得送不起娃读书，就是马家族长马孝贤开明起来，允许他们送娃进学堂，于他们也只是画饼充饥而已。

土生能够读书是因为他大和几家小姓人家凑钱请来了个私塾先生。这位自称中过秀才的老先生居金城镇，一生最大的心愿就是能教出一个举人来，因为他在几十年前连考了八次也未能中举，至今孤家寡人，没有妻小，在金城镇被称为半疯，不但没有人请他教娃识字，连生存都很困难，因写得一手好字，靠在金城镇摆摊替人写讼状家书以及在过年时卖些对子维持一年的吃穿。土生他大倒不觉得半疯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反正只要能教娃识字念书即可，而且这老秀才所要酬劳甚低，只要管吃，一个月再给五百文足矣。

五百文在光绪年间不算大数，也就是几十斤小米钱，连进最低档的妓院的夜度资都不够。当然，这对于只有十几亩薄地的农户人家来说，无疑是一笔巨大的开销，因为一年辛辛苦苦干下来，除了留下种子和口粮外，也就只能卖回几吊钱。幸好一个月五百文不是由土生他大一个人出，几家人一凑，还能勉强应付，无非平时吃饭时锅里少一点油和盐，再多养几只羊罢了。　　私塾办在一个叫李仲海的男娃家本来关羊的一孔窑洞内，李仲海比土生大三岁，个头显得比土生小许多，但黑黑壮壮，精力旺盛，像只永不知疲劳的黑毛羊。看起来，他似乎要比土生精灵得多，可没有一个大人敢说他的心眼就一定多得超过土生。在马家沟里，年岁相近的娃中，只有他和土生最合得来，但争执也最多。这种争执不是相互敌视，而仅仅是娃们之间的逞能。而最终，这种争执大都是以李仲海胜利而告终。李仲海能说会道，土生佩服他哩，因而，在别的娃儿前面他是头儿，而在李仲海面前，他倒像个兵。

上私垫的那孔窑被用白灰刷了一遍，但屋内的羊擅味和粪臭味即使在地上铺了厚厚一层

黄土也掩盖不住，好在七八个娃们是闻惯了的，只是苦了来教书的老秀才。不过老秀才皱了会儿眉头之后，便又摇头晃脑地说:“粪便之臭，乃五谷之香，群羊之擅，乃壮体之肉，你们自小勤四肢，识五谷，知平民之苦，若再识书达理，定会为国家栋梁之材。你们之中出个举子应不是黄粱之梦。”

老秀才不嫌弃这些农民的后代，自然会认真教化，背《百家娜、《三字经》，讲些汉赋、唐诗、宋词、元曲，再配以戒尺打手板心、罚跪之类的手段，娃们也绝没有痴到油盐不进的程度，一个个就都识得书，写得字了。而老先生最为赏识的弟子是土生和李仲海，他认定这两个娃必定能实现他用了一生努力也没有实现的理想，也就是中举。

不过，一场辛亥风云使老秀才的梦想最终完全破灭，满清政府被一个叫孙文的带人给推翻了，科举制度随之被废除，代之的是共和政府的新式学堂。老秀才不禁长叹:“新学堂里不出状元啊，求学者千百之众，废除科举，谁为之最?谁为之尊?谁为之贵?”他委实想不明白，后来他加人了保皇邪党，千里东进，到京城天安门前，于宣统皇帝被赶出皇城之时，一头撞死在华表之上，其最为绝望之事倒不是因为中国没有了皇帝，而仅仅是因为没有了科举制度令他难以承受。

老秀才倒没有在辛亥之年那个动荡之秋就离开马家沟，而是继续教书，希望把自己的知识全部传播给他认为最可教化的土生和李仲海。李仲海也许是年龄大几岁，颇为理解老秀才的一片苦心，也知道只有好好读书才能改变自己家祖祖辈辈都是农民的卑贱命运。而土生则觉得能认下《三字经》、《百家姓》上的字就足够了。他很大人气地问过李仲海:“老先生身为秀才，所知不可谓不多，所识不可谓不广，但在金城镇不还是混得像只没窝的野猫，饥无饱食，冻无暖衣?我看倒不如像李自成那样做更过瘾。”

李仲海没有回答，以他当时的思想也回答不了这样的问题，他除了惊愕土生的奇思怪想之外，只能相信大人们曾说过的土生是土匪黑狼的转世投胎的话，否则怎么会在十一岁上就有当李自成那样的流寇的想法?李仲海更愿意做一个斯斯文文的学生，能够考人国立师范学堂是他此时最大的愿望。没有多久，他的愿望也就果然实现了，人们都说这是李家积了阴德，在他这辈上得了善报。不过，若是有人能未卜先知，测出几十年后他的下场，说这话的人们就该打自己的耳光了。

土生是个想了才说，说了就做的娃，既然他觉得再读书也无益，他也就开始了逃学。这让老秀才倍感伤心，可又无可奈何，他实在不可能像老羊撵小羊一样终日里追着一个脚健得像狼一样的娃，逼着他来读书，他只能惋惜一棵好苗子将成为一枝荒藤野杈，马家沟的愚昧无知的农民群落中日后又多出一个只知种地赶驴、娶妻生子的人，最多也就是一个横行乡里的无赖。他的判断当然是错误的，不过土生后来也不得不承认自己童年时只读三年书是错误的，若是他能多有些学问，起码他在给一个叫作毛泽东的人上书之时，可以更准确地表达出自己的心愿，可以更为深刻地向那个七亿人的领袖揭示某些现实。

严格地说，霍达东字迹规整的自传中所谓十一岁就开始反抗社会是不够确切的，因为那不是有意识的行动，更无理论可言，充其量是一种本能的不满，最为合适的定义是还没有长大的娃的淘气。只不过这种淘气使得当时马家沟的统治者大为震怒罢了。

那应该是民国二年的春节前夕，马家沟跟以往一样家家户户杀猪宰羊，欢欢喜喜地准备

过大年，而这时村头河滩的学堂前贴出了一张告示，上面写道:

察告各位村民:

民国初建，百废待兴，
邪党人如山，共和执政，
交纳税赋，支援革命，
父老乡亲，以此为重，
杀猪宰羊，需贡银铜，
不得有误，县长之令，
男女老少，广为传送，
同心协力，世界大同。

附:杀猪一头，纳税五百钱，宰羊一只，纳税三百钱，猪头、羊头一律交至政府。

马家沟乡政府
乡长:马孝贤

马家沟的农民们对一切新鲜事均有好奇之感，学堂前面贴出的告示就足以让他们围观多时，并议论纷纷，愕然不解。他们不知道乡长是个什么东西，他们也不能接受杀猪宰羊还要让交纳税赋这个说法。于是，他们开始小声抱怨，而后又破口大骂，最后有人起哄，土生趁乱高扬起虽还细小但却比小时候长了不少的鸡鸡往告示上撒了一泡尿。

也就在这个时候，自称乡长的马家沟颇有威势的大户人家的老爷马孝贤来到了学堂前，大多数人一见他立刻不吭声了，终究不少人种着他的地，住着他的窑，受着他的庇护，得着他的恩惠，在大庭广众之下议论自己的东家是昧良心之事，而少部分愤愤不平者则是想听听这位为富不仁者有什么说法。

马孝贤从体态上看绝不是个养尊处优者，他一点都不肥胖，也不红光满面，更显不出饱食终日、无所用心的悠闲神态。他是个清瘦的中年人，脸膛黑黄，和其他人一样从肌肤上就能认定他长期蒙受着黄土高原的风尘，以至于这风尘的颜色深深染透他的躯体。要说他有什么与众不同的话，则是他穿的马褂是正宗杭州丝绸布料，他穿的鞋来自于古都西安的百年老店，他左手中指上戴的那枚沉甸甸、黄灿灿的足金戒指上镶着豌豆大小的印度红宝石，当然，还有他那双能够慑人心魄、总是不会露出惊慌失措神情的眼睛。这眼睛因着陕北的风沙而永远不会睁大，那又长又浓的眉毛常常喧宾夺主，比他那双细长的、微微下塌成八字的眼睛更引人注目，那黑过猪鬃的眉毛是他一贯引为自豪的。因为按无数相面先生的说法，那样的眉毛一般都标志着长寿和官运。几年之后，在他刚知天命便遭血光之灾时，他才想起算命先生常常对着他脖子右侧长着细毛的红痣叹惜着所说的那句“天机不可泄露”的话，原来这是足以克掉他福寿禄之运的凶相。

马孝贤从不认为自己为富不仁，他二十五岁上从疾病缠身而奄奄一息的父亲的手上接过记录着马家的全部财产的账簿而正式成为马家又一代家长时，那账簿上标明的是水田四十八亩，旱地二百亩，窑十六孔，马四匹，驴九匹，骡七头，羊一百零五只，银五百两，金七十两，钱六百二十七吊。经过他近二十年的操持，这些财产早已经翻了十倍有余，不仅马家沟

八成的土地都成为了马家的私产，在方圆十多里的地界内的十几个村子里，也都有着属于他的土地，在肤郡县和金城镇内他还办有商号和骡子行，经营日用杂货和贩运粮油、茶叶、布匹等物。他觉得这一切都是他的智慧和辛苦所致，他曾顶着烈日到田里查看收成如何，也曾为买别的村的土地而差点饮血刀口，还曾亲自带着骡子队风尘仆仆行走千里去西安贩货，他没有对不起谁，他的财富是挣来的，是省吃俭用攒下的，有一度，他的儿子都只能穿打补丁的衣服，他的婆姨不能添置新首饰。

他有钱了，于是盖马家祖祠，续上马家祖谱，将三国时有名的五虎上将之一马超拜为祖先，他还在马家沟建了座龙王庙，每年祭祀，祈拜风调雨顺，小学堂当然在他的名下，就是金城镇外的归元寺，每年也能定期收到他一笔香火钱，用来给大殿中的佛祖神像重塑金身。他自认为在整个肤郡府境内，他都是有口皆碑的德高望重的乡绅。

荣任民国政府的乡长对于马孝贤来说是顺理成章之事。当然，起因则是由他当了革命邪党人的大儿子马圆促成的。

马孝贤娶有一妻二妾，妻是他父亲在他尚小时与邻村一大户人家指腹为婚定下的，在他成年后娶过来才知道此女丑陋不堪，脸上坑坑洼洼，遍布天花后遗症，而且腿短身子长，怎么看都让他觉得这婆姨像是阴曹地府中的小鬼。但父命不可违，何况此女还带来了一百亩水田和不少金银首饰的嫁妆，他只好接受她，并和她一同养下了长子马圆。他的第一个妾则是他家伺候老太太的丫环，这丫环本是随母逃荒之女，落难于金城镇时，其母病亡于街头，她也奄奄一息。马孝贤的老太太刚好去归元寺烧香还愿，见这不到十岁的女娃长得清秀，便行了件善事，花钱请人掩埋其母，接女娃到了马家沟，成了她的贴身丫环。八年之后，这丫环竟然出落得像崖畔盛开的山丹丹花一样秀美清丽，马孝贤看上了这女子，利用每天给老太太请安的机会，软硬兼施，将这个无依无靠又没有心计的姑娘弄上了炕。老太太觉得这倒算不得败坏门风，也就允许儿子将这丫环纳为小妾。只是这位小妾肚皮不争气，虽然每晚都能让男人留在身边，并云雨不断，却一直未能养下一男半女，而品尝过白菜心的人无论如何不会再去吃白菜帮子，尽管明媒正娶的结发婆姨为他生下了儿子，马孝贤却怎么都不想再碰她一下，老太太闭上眼眼前想再抱上个孙子或孙女，于是托人又给儿子纳了一妾。

这妾来自于米脂县城，大是个赌徒，因要还赌债，情愿让女儿给大户人家做小，其实和卖女没什么区别。陕北素有“米脂的婆姨绥德的汉”之说，这第三房婆姨虽比不上二房漂亮，可圆圆的如满月般的脸盘，亮晶晶似晨露般的眼睛，高高的鼻梁，嫩红红的小嘴，再加上副凹凸有致的诱人身材，也还是挺惹人喜爱的。也许是在县城里长大的缘故，不像山野的女子那样见多了牲畜之交和男女野合的事，对男人总是羞答答、怯生生的，这更使马孝贤怜爱倍加，当然做起床上之事也就兴趣更足，一年之后，马家便又添了男娃，取名为马方。这马方与马圆相差十岁之多，虽同是马孝贤之子，但因不是同母，从形态到性格也各不相同，这多少导致了他们人生命运的极大差异，这是后话，暂且不提。

马孝贤的大儿子马圆本在西安读书，他小小年纪就已经乡试成为了秀才，然后拿着老太太一封信函，到西安借居老太太一位表姐家，准备功课，以进京赶考，开始尚有书信往来，后来便杳无音讯，有消息说他去了日本留学，也有消息说他去了两广，搞得马孝贤大为光火。按他的话说：‘旧本乃楼夷之国，大秦叛乱之后，依海为匪，骚扰我华夏之地，杀掠我炎黄子孙，何以会去那里留学?而两广地处南蛮，虽近来口岸开放，可尽聚些奸贾歹商，不是知书达理之人的好去处。”骂虽骂，但马圆终究是他的长子，再加上那麻脸婆姨终日哭哭啼啼，

搞得他心烦，他不得不常想办法去打探这娃的下落。

辛亥之后，举国共和，时隔不久，马圆突然回到了马家沟，马家大院中一片欢腾，上上下下，老老少少，有如过年。马孝贤因着一家之长的威严和对儿子有不孝不贤的愠怒，最后一个才走出正中窑洞的门。这孔窑是他的客厅，里面摆有全套枣木家具，上面都镶有大理石面。站在青石高台阶上，他常眯着的眼睛顿时瞪大了些，他几乎认不出自己的儿子了。因为他的儿子不但长高了，嘴上边留起日本式的牙刷胡须，而且穿的不再是长袍马褂，脑袋上不再留着满清时代的长辫子，这个已经多少有了男人气的年轻人穿的是有棱条的长裤和带有三个方兜，系着黄铜扣子的短上装，头上是理得齐齐的平头。

看着按老式传统有点不伦不类但却不能不说是威武的长子，对这娃许久以来的耿耿于怀的不满并没有在马孝贤身上爆发出来，当家人们有点提心吊胆地沉默下来，等待着已经自称老爷子的马孝贤对儿子施父威之时，他却大步走上前去，拍了拍马圆的肩膀，称赞地说:“敢走南闯北，是个有出息的娃，马家的大业还得靠你来承担!”于是，全院子的人都松了一口气。

是夜，马圆和大坐在客厅里进行了一场不长不短的谈话。马圆呷了口久违的家乡红枣茶，告诉马孝贤:“大，我参加了革命邪党，跟着孙逸仙领袖干了共和，推翻清朝政府也有咱一份功劳哩。”

马孝贤点点头:“我知道你是个能干大事的娃，这革命成功，封侯加爵，也得委你个二品之位吧?”

马圆笑了:“大，革命不是为了当官，而是天下为公，世界大同，人类进步，消灭不平等的落后的社会制度，实行三民主义。”

马孝贤问:“圆娃，听说你去了日本，到过两广，都是为了革命?”

“对，康有为的改良解决不了中国的根本问题，只有实行逸仙领袖的主张，中国才能真正强大。我现在是共和政府的地方视察员，我向逸仙领袖提出了要从民众入手，从社会最底层开始建立和完善共和政权的主张。我这次回到故里，就是帮助肤郡县长搞一个样板。”

“县长?”马孝贤有点不解。

马圆解释着:“就是以前的县令、县太爷，县长下面再设镇长，镇长下面设乡长，这样共和政权就能深人民心，像树木一样扎深根须，就定能成为参天大树。”

“那你日后有何打算?”马孝贤忽然改变了想留下儿子协助他管理偌大家业的想法，而是征询儿子自己的意见。

对这一点马圆倒早有深思熟虑，他脱口而出:“中国之所以落后，乃在于文化素质太低，共和政权一旦稳固，保皇邪党土崩瓦解，我还要去读书，回来后在肤郡办所师范堂，培养老师，让这些老师去教娃们读书。到时还要仰仗大在财力上给予支持，此乃善举，以大之为人不会一口拒绝。”

就是在这夜谈话之后，马孝贤在马圆内举不避亲的推荐下，经肤郡县长一纸委任令，成为了马家沟的乡长，管辖方圆十数里内的全部村落、几千人口。为维护政权，并可组成乡团，招募乡勇，自行购买快枪。这使得马孝贤在本来只可号令马姓男女的基础之上，更成为了中国陕北一方土地上有生杀大权的官吏。

马孝贤觉得这是自己身为富人和知名乡绅所义不容辞的责任，这不仅仅是光宗耀祖的机会，同时也是人生在世“雁过留声，人过留名”的机会。这应该说是他潜意识中盼望已久的日子，尽管在马家沟他早就是说一不二之人，可毕竟名不正言不顺，而今他虽远不是龙袍加身，但那纸盖有县长血红方印的委任状足以说明在金城镇东北一带再也不会有让他畏惧的东西了，他生命中最辉煌的岁月来到了。为此，他双手拥护推翻皇帝老子，坚决反对保皇派卷土重来，也格外敬重那个名叫孙逸仙的先生。

在儿子马圆陪同他在肤郡县拜会了新任县长之后，马孝贤算是正式走马上任了。其实，即使马圆不是共和政府的地方视察员，县长也会将马孝贤待为上宾，因为在县长的观念中，维持一个县的太平和繁荣，只能仰仗这些德高望重的大户人家，平民百姓永远只能是一群羊，由牧羊人用鞭子驱赶。

从肤郡县城回来，马孝贤送走了长子马圆，然后就草拟了那份告示，张贴出去。对于儿子不能与家人共度新春，他颇为理解，甚至以古训激励儿子:“自古忠孝不能两全，家乃毛，国乃皮，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娃，只望你能保重身体，好自为之。”马圆对父亲的态度颇为感动，因而在上呈共和政府的关于建立基层政权的调查书中对父亲特别加以表彰，并提出了打击恶霸、重用开明乡绅的主张。

对于村民们在告示张贴之后的态度，马孝贤是有充分的心理准备的，他之所以不兴师动众地搞乡长就任仪式，不像其他一些乡长那样隆重庆贺，除了不给人以小人得志的感觉外，还有不想劳民伤财、顺利完成县长交付下来的交纳税赋的任务的打算。因而，当他以往常惯有的沉稳步伐和威严神态走到人群前面时，他绝无惊慌，而是胸有成竹地间:“诸位父老乡亲，有谁还愿意认满族人为父为母?”周围民众无人吭声，这是必然的。

他冷眼回顾了一下，声音缓和了些:“逸仙领袖倡导三民主义，实行共和，是解救百姓于水火之中，推翻皇帝，是替天行道，谁敢不从，就是大逆天下。交纳税赋，是支持革命，有钱出钱，有力出力，乃我陕北人之美德，况且，这钱还将由县政府返还一些，购置快枪，设立乡勇，保护民众利益，取之于民，用之于民，诸位心中又有何不快呢?我马孝贤无才无德，但有一份拥护共和之热血心肠，被县长授命于共和初创之时，担此重任，虽心有余而力不足，但不能因私而废公，更不能护小利而损大义。以后凡是让父老乡亲做到之事，我必先做到。不过，丑话说到前面，有谁违抗新政条律，我也只能以革命为重，严惩于前，安抚在后，挥泪斩马谡的事我不能不做。今天，我是喜事、满月一块办，既宣布乡政府成立，本人走马上任一乡之长，也公布第一号告示，还望诸位给马某一个面子。”他话音一落，马家几个仆人点燃了中间掺着寐雷子的鞭炮，又举起铁铳，朝天轰了三铳铁砂，这铁砂向上飞了几十丈后下雨似地落下来，惊飞了远处的乌鸦和麻雀，也惊出荒草中的几只野兔子。

马孝贤的威严还是颇起作用的，起码当场没有人再公开表示对杀猪宰羊也要交纳税赋的抱怨，这倒不一定是农民的胆小怕事，而是马孝贤那番话中的一堆新名词使农民们多少感觉

到了一点隐隐约约的道义，因而他们也觉得没有什么理由去反对。当然，他们若是得知新县长将要从全县这一笔税赋中私抽一成留给自己，而且允许各乡长从中扣留三成，大概就不会这样朴实和温顺了，终究陕北在人文地理传统上是个出匪的地方，而且这里每隔百十年就要出大匪。

拥在人群中看热闹的土生并没有觉得马孝贤有什么令他信服和畏惧的地方，在整个马家沟中，能让他听上一点话的只有他大，而且只是一点，绝非全部。严格地说，他只听他自己的话。因而，他看到整个马家沟的人在马孝贤面前唯唯诺诺、畏畏缩缩，心中就颇为不服，他明明看出来不少大人对于杀猪宰羊还要交纳税赋是绝对不心甘情愿的,可他弄不懂他们为什么还要忍气吞声。因而，他要试试，在马家沟真的违反了马孝贤的意旨是否会天塌地陷，是否会人人遭殃?可能就是这种对一般人认可的权威的本能怀疑，构成了他晚年个人悲剧或者说个人辉煌的组成部分。

他当然没有能力去说服大人与马孝贤对抗，他也没想过去说服谁，他更愿意自己去干，只有自己亲自去干的事才能满足他的某种心理欲望。

他所干的就是在大年三十晚上，在呼啸的北风和漫天大雪中，将村民们交纳后集中到马家祖祠的所有猪头和羊头一个个扔到院后的一口废弃的深井中。这井不知是哪一代人开挖的，并没有挖出水来，却挖通了一个深不可测的大洞，据说挖井人全部落进地底，再也不见踪迹，有人曾试图填上此井，扔进去无数石块和黄土，但却不能使这口井浅上哪怕一寸，于是后人就用一块石板将井口盖住，以防孩子淘气，牲口撒欢，婆姨们有什么想不开之事而掉人井中。土生就是用扁担撬开了石板，从无人看护的马家祖祠中从容地、坦然地、怀着一种颇为开心的情绪，把几十个猪头和上百个羊头扔了下去，然后又用扁担撬回石板，盖住井口哼着信天游回到了自己家的窑中。他大和他后娘并没有格外注意他，因为娃们大都在外面放炮仗，而且他回来也没有什么不自在。

第二天马孝贤准备用那些猪头和羊头祭祖祭天，然后用毛驴送往肤郡县政府时，才发现东西不翼而飞。一夜大雪，使四周白茫茫、平展展，毫无踪迹，谁也无法判定是来了盗贼，还是来了群狼，令人疑惑的只是全村一夜间没有一条狗在狂吠。于是，人们私下议论是鬼神降临，采用娜移大法，搬走贡品，以使新政牢记不得鱼肉百姓，狗在鬼神面前，当然不敢出声。马孝贤也不知所以，只能自认倒霉，县长之令，他不敢不从，何况这些猪头羊头是要送到榆林府军营之中的，那些兵士都自恃是有功之臣，又镇守一方，无人敢于得罪，马孝贤只好自家出钱，以市价补足猪头羊头之款。当然，他日后会将这亏空从百姓身上再克扣回来。

土生的所谓反抗统治阶级就是如此，尽管在后人眼里这多少显得有点荒唐可笑，不值一提，但于他的人生却是丝毫不能忽视的。在几十年后当他成为一省之长时又回到过马家沟，他在自己家那三孔已经空荡荡但从没有人敢去居住的窑洞前站立了一会儿(人们之所以不敢居住是因为有一度他是匪，无人愿意和匪字沾边;后来他又官做得太大，大过了榆林府的历任专员，无人有勇气去占官产)，然后就到了那依然盖着青石板的并边，他让人搬开石板，俯身向里张望了许久，才恋恋不舍地离去。在肤郡县政府的宴会上，他感慨地说了一句:“马家沟那口枯井真是深不见底吗?那里边还有着几十个猪头和上百个羊头呢，是我自发走上革命道路的见证啊。”说者无心，听者有意，县政府马上组织人力物力，让人背着手电筒，系着绳子下井去寻找革命文物，但下到一百多丈深后，再没有一个人有胆量往下去，即使是用长一级工资和“火线人邪党”的方式也不行。因为再往下去人就会窒息，而当时又没有氧气

设备，县长只好懊恼地作罢，惋惜失去了一个向省长讨好的机会。但这个县长是聪明之人，后来他让人在这口井边立了一块石碑，上面刻着“霍达东同志革命历程的第一座里程碑”，然后请县文化馆的一位摄影艺术家为这个碑和这口井照了一张照片，把照片用挂号信寄给了霍达东。

(6)

陕北汉子霍达东在十五岁上就娶了婆姨，这与其说是一个被认为是成熟了的男娃的喜事，倒不如说是他大对他的惩罚更让他觉得符合事实。因为在娶亲的时候，他一点都没有对异性的生理欲望，也不想被一个婆姨缠住手脚。但让一个女子拴住他的心，却恰恰是他大最为迫切的愿望，他在马家沟的男娃中确实张狂得已经像匹无人能驯服的野马。

那时他还叫土生，私塾是早就不读了，他的同伴李仲海去了榆林府一个新学堂，但他一点不孤寂，除了帮大拾掇拾掇地里的庄稼和烟叶子，就是在村头河滩地上舞枪弄棍。他喜欢上了武术。

他大本来不知道每晚他吃过饭后就烟一样无声无息溜出去干啥，一个半大后生在家里是呆不住的，出去与男娃闲扯，与情窦初开的女娃驾俏，最正常不过的，即便拉了个女娃钻了玉米地，也算不上伤风败俗，只能被人认为是这男娃有本事，若把那女娃肚子弄大了，找个媒人上女娃家提个亲，娶过门来也不丢人。在马家沟，偷人家东西，搞人家婆姨，堵人家烟筒才是值得被诅咒的事，全村人都会指脊梁骂，是马姓的还会被绑到马家祠堂去受族规惩罚，有了新政后，乡长马孝贤对有这种劣行的人还可以施以法律，或罚款，或绑起来示众。

一天晚上，土生后娘肚子疼得厉害，土生大急忙忙跑金城镇去抓药，走出沟口，来到河滩上过青石桥时，亮堂堂的月光下见几个半大后生在翻跟头，竖蜻蜓，做鹰飞，学蛇舞，拳头对拳头，木枪对木枪，还抡着明晃晃的刀片子砍来砍去，他先是以为有强盗来打劫，与乡勇对上阵了，定下神来，认真看去，才发现是他的独生儿子土生和村里的娃们耍二杆子。猛然间，他耳畔忽然响起归元寺老和尚那关于儿子“不成官则成匪”的解签之语，这舞枪弄棍，学着打打杀杀的不就是土匪之举吗?

他怒火烧心，忘了要去给婆姨抓药，一下子冲到娃们中间，站到自己的娃前面，破口大骂起来:“让你念书你不念，吃饱了饭跑这里来耍二鍵。你大拼着倾家荡产也想让你做个知书达理的人，舞枪弄棍是耍不正经，日后能干啥?只能当打家劫舍的土匪!你大没做你当官的梦，这是归元寺老和尚在你满月时算出来的，可你大也不能看着你往匪路上走，这、这也是归元寺老和尚算出来的。走，给我滚回去!”

这次土生居然很听话，既没有和大顶嘴，也没有犟着不走，而是把木枪铁片子往沙子上一扔，转身就回家。不过走了几步后，回头向大说:“大，我回去，不过你得给我讲老和尚解签是咋回事，还有我脖子上这装黄土的袋袋是咋回事。”

土生大胸里涌出点暖流，他认为娃终于懂事了，起码知道关注自己的命了。当天晚上，从金城镇给婆姨抓药回来，让女娃伺候娘，他在院子那棵老枣树下，和儿子扯了大半夜，把

算命先生算的命和老和尚解的签都告诉了儿子。而这被后来社会认为是迷信的东西深深铭刻于土生脑海中，一直影响着他的人生。实际上，他既为过匪，也为过官，他离开土地确实给他带来了个人悲剧，他大命中无子的天命也真切地转至他身上。

经过那次谈话，土生大以为土生会变得沉稳规矩些。然而，没有几天土生便惹了祸事，打了乡长马孝贤的宝贝二儿子马方。

马方比土生小一岁，小小的就到了肤郡县城去读住宿制的新学堂，寒暑假才会回到马家沟来，因而与土生见面不多，虽是同乡人，也显得生份。又值暑天假期，他领着几个家居肤郡城内的同学，来家乡游玩，这些娃在土生眼中自然是公子、小姐，言谈举止，包括梳妆打扮都不顺土生的心，尤其看到村里别的娃以羡慕好奇之情远远地张望那几个脸蛋白白、头发光光的同龄人，他就有一股莫名的敌意产生，找碴闹事的念头在他心中萌生。

那年天旱，坡上及源上的旱地像三九天的手背皮一样裂开了口子，沟口里水田的庄稼也因缺水蔫得抬不起头，只有乡长马孝贤家的地绿油油的，因为他早早地花钱雇人在沟口里那条河上游拦了座石坝，把比尿水粗不了多少的水流蓄了起来，留做自己地用，而那水坝恰恰在他家地界中，别的人家都无可奈何。因为他大度地允许人们在水坝内取水食用，人们还格外感激他，称赞这是善举。实际也是如此，若不是他未雨绸缪事先出资修了水坝，马家沟的人确实吃水都会成问题。

土生并不这么想，他认为水是天上来，河是地上生，凭啥谁有钱拦个石坝就可以断了河，把水据为己有?他早就想砸了闸板，让水流下来，浇一下下游干得快成石板的地。这地有他家的，更多的是别人家的。刚好马方和几个城里娃耐不住燥热，捉了会儿知了后，男娃衣服一扒，“扑通扑通”下了水，女娃们在柳树荫下一边“嘻嘻”笑，一边吃用纸包着的糖块块，惹得远处张望的农村娃流涎水。

土生提着锄头走出了自家的地，地里明摆着再没水来就会颗粒无收。他想着大和邻家大人抬着龙王爷求雨就想笑，如今这龙王爷就由他来当一次了。他不紧不慢地上了石头坝，不由分说，伦起锄头就砸向那水闸的挡水板。随着他肩头开始鼓起的键子肉一抖一抖的，那寸把厚的槐木板子开始破裂，最后碎成十几块，坝里的水先是从裂缝中喷射，最后终于将碎木片冲开，汹涌而出。水坝中的蓄水慢慢变浅，正在玩水的孩子本来是可以脚不着地的，但一袋烟工夫，水面就退到他们胸口处。

马方跑上岸来，冲到土生面前，气愤地质问着:“这是我家的水坝，你凭什么砸开水闸板?”另几个娃也围过来，跃跃欲试地要教训土生。而结果是土生轻而易举地教训了他们，打破了马方的鼻子，踢拐了一个娃的腿，吓得那些女娃“呜呜”哭着逃得远远的。当然，这在土生他大心目中是惹了大祸。

“我的天大大呀，这是哪辈子造下的孽，养了你这么个逆子!早知如此，还不如由我断了霍家香火，也省得有你这么个祸根，让霍家祖先在天之灵不得安宁!”土生大从别人嘴中得知自己娃打了马家二儿子，风风火火赶到水坝边，看见坝中的水只剩下一半，先是跳着脚骂，后来又赶快跳到水闸口，用宽大的后背堵住还在往外涌流的水，直到有人搬来石块和草皮才水淋淋地爬了上来。

这时，乡长马孝贤也铁青着脸，带着两个背枪的乡勇急急忙忙来到了水坝边。土生他大

抡圆了胳膊给土生一个大耳光，然后连连向马孝贤作揖:“乡长大人，这娃是我管教不严，望您老人家开恩，我一定好好惩处这娃。”他踢了土生一脚:“蠢货，还不跪下向马大人谢罪!”

土生丝毫没有跪下的意思，但他也没有辩解，这是他做下的事，他当然要承认。他脸上没有太多的表情，既不昂首傲视，也不畏缩胆怯，只是因长久地在烈日下曝晒而汗水不断，浸湿了衣衫。

令所有在场人惊奇的是马孝贤并没有大发脾气，以往若有乡民得罪了他，大都会被乡勇五花大绑地押到乡衙去兴师问罪。而这次由于鼻子已经止住了血的马方在他身边啸濡吸喷地说了些什么之后，马孝贤居然脸色平缓了些，淡淡地说:“这娃实在缺少教化，时下水贵如油，地缺水，人更缺水，我马孝贤身为一乡之长，出资修坝，乃是考虑马家沟百姓饮水之需，非是只顾自家之田。霍家娃娃心胸偏狭，小小年纪，就行为不轨，但养不教，父之过，只好惩处霍家大人，一是即日修好水闸木门，二是加高水坝一尺，至于娃们之间的争斗，我家方娃心存慈善，宽容大度，不愿追究，我身为其父，也就只好视若不见了。”

后来，当土生和马方成为革命战友时，马方告诉了土生:“我喜欢你当时那股子天不怕、地不怕的犟性子，我不让大惩罚你，而我大一直娇惯着我，所以就听了我的话。”土生并没有因为这而感激马方，他觉得这用不着感激，因为他当时真希望马孝贤能够惩处他，这样他一定会和这个人人都畏惧的乡长拼个你死我活，而马方使他失去了这个机会。

水坝事件之后，土生他大实在无法容忍自己娃的胡作非为，断然决定给他娶亲，用婆姨的绵软来消磨他的性子，他不敢想娃能当官光宗耀祖之事，可也绝不愿有朝一日霍家闹出个黑狼那样的土匪来，他终究是个老实巴交的农民，只要娃也能是个安分守己的农民就足矣。更为关键的是，娃早点娶亲，也能早点知道霍家是否真的会在土生这代断了香火。也许多去归元寺烧烧香，佛祖能普渡众生，应该能被感化，而使霍家能传下去哩。

不管土生有啥想法，农历十月，择了个黄道吉日，土生他大把土生的婆姨桂桂用小毛驴从邻村他娘家驮来了马家沟。

土生对于庄户人家娶亲已经不陌生了，从他记事后每年都要见上这么几次，无非是毛驴上扎条红绸子，从哪里驮来个穿着红布衣裤的女娃，在村口放上挂鞭炮，到院门口再放上挂鞭炮，花生、红枣往院子里一撤，伴娘扶着新媳妇踩着花生、红枣走进窑洞，和新郎馆拜天地，拜父母，互相对拜，然后新娘进洞房里去呆坐着，新郎信则傻哈哈地在院子里陪着亲朋好友、邻里乡亲们喝酒吃肉收礼钱，酒性好的，夜深之时还能摸着新房的门，酒性不好的，就只能烂碎如泥，被人抬到炕上去呼呼大睡，或吐新媳妇一身臭烘供的东西。

土生居然对自己的终生大事既没有什么激动，也没有什么好奇，更没有不谙世事的十五岁男娃的局促不安。他穿着一身簇新的蓝布衣裤，歪扣着一顶城里人很认为时髦的粗呢礼帽，平淡地站在村口，在鞭炮和哎呐响声中，接来了注定将影响他几乎一生的那个叫桂桂的女人，将她按照马家沟的礼俗送进粉刷一新的窑洞。本来这窑洞中住着他四个姐姐，而在他娶亲时，这四个姐姐早都先后嫁了出去。

他没有想到自己天生有着喝酒的海量，以往他几乎没有喝过酒，即便逢年过节喝上一点，那也是醒糟，没什么辣，只是甜呼呼的，像是喝糖水，而这娶亲的喜宴上喝的是很醇的玉米

酒和红苕酒，乡长马孝贤的二儿子马方还背着他大送来的四瓶庄户人家罕见的山西杏花村的竹叶青。几种酒掺和着喝下去，土生尽管觉得心口窝口火烧火燎，面皮上烫烫的，像是发着高热，可他绝没有天昏地旋的感觉。

李仲海走后和他处得比较亲近的一个名声不好的寡妇的男娃马牙子，跟他一口气干了三老碗玉米酒，喷着酒气嘟峨:“生娃，你好福气哩，这就娶上了婆姨了，我长你一岁，还不知哪年哪月才能楼个婆姨睡到晌午端。生娃，你那东西露头头没有，哥教教你，别戳错了地方。婆姨吓，你别怕，告诉她，头回疼，二回麻，三回像是蜜蜂爬哩

土生转身离开马牙子，别的桌上有人叫，他大让他去陪酒。他才用不着别人教，他早知道撒尿的东西除了撒尿还能管什么用，他也知道婆姨才不会叫疼，她们稀罕着男人压到身上日她们哩，她们会叫，那不是疼，那是舒服得像成了仙。他就是从大和后娘那里看来的，看得真真切切，永世不忘。

他大先喝醉了，轰着人们快走，说是别误了生娃的好时光，洞房之夜小登科，赶快给霍家续上香火。来客们都知趣，喝干了碗里的酒，剩下一院子杯盘狼藉，打着饱隔，一个个离去了。

庭院里顿时静了下来，邻家都住得很疏散。除了吼叫，谁也不会听到邻家发出的声响，霍家四周只有秋蟋蟀在渗鸣，它们比谁都最先感到冬意正从北方渐来，一轮满月从源顶轻柔地向上飘浮，使马家沟的沟沟坎坎，坡坡梁梁都染上银色，影影绰绰的地方似乎隐藏着些生灵，鼓鼓胀胀的，却又永不出现。马牙子和两个想听房的男娃暴露于月光之下，被土生后娘操起根扁担赶狗一样赶了回去。

院门“吭当”一声关上了，而这时土生也走进了一直燃着红烛的洞房，小心翼翼地插上木门栓。站了一刻之后，他才抬头望去，只见桂桂盘坐在炕沿上，祥和，安宁，沉静，温顺得像是画上的观音，他心中有一种暖融融的感觉，想到了自己从没有见过的亲娘的形象，他断定，他亲娘一定是这个样子。于是，他凑近了些，呆呆地看着自己婆姨桂桂的脸蛋蛋。

这脸蛋蛋并没有格外出众之处，算不上漂亮，更不妖艳，但十八无丑女，那光润润的肌肤在不很明亮的烛光下让人感到庄户女子的秀美。她和大多数陕北女子一样，脸蛋蛋圆圆的颇似古书绣像上的唐朝仕女，眼睛不大，细长的，眉毛不浓，也是细长的，鼻梁不高，同样是细长的，只有嘴小小巧巧，圆圆润润，在这样的女子身边，任何男人都会有一种安全感，有一种可以信赖她定将伴你终生的自豪感。

土生从前没有见过桂桂，只知道她家是米脂的，也是庄户人家的娃，大他三岁，后来她过继给一个远亲，才到了肤郡县金城镇西面的杨树坪，经媒人牵线，嫁来了马家沟，而这父母之命包办下来的婚姻，在他见到了桂桂之后，觉得没有什么可令他不满的，于是，他脱下衣服，一口吹灭了蜡烛，倒在铺上了新被的炕上，准备睡觉了。

火光一闪，红烛又被燃着，桂桂大姐姐似的告诉土生:“娘说了，洞房花烛夜，要点长命灯，不兴黑洞洞地睡。”说完，她羞涩地转过身，在阴影处脱去了红袄红裤，只着一件红布肚兜，爬到炕上来，躺到土生身边。土生感觉到她的身子有点发抖，四肢僵硬硬的。他伸手摸了摸她，像是摸自己很喜爱的那条大黄狗。桂桂没动，如同正在狼口下的一只小羊羔。

土生拉住了桂桂的手，看到她手腕子上有一只磨得光光的银镯子，那手细腻腻的，热乎乎的，湿流滚的，他把这手放到自己已经厚实的胸膛上，握住她的手腕来回滑动，他觉得有些痴迷、惬意和暖洋洋的、亲融融的感觉。他支起身子，一点也不粗鲁地摘去了她的红肚兜，便看见了那对耸起来的肉团团。那是对胀满白嫩得像刚出笼的白面摸一样的东西。土生觉得它们那么纯净，像是早晨的露水，那么美妙，像是春天的风一股劲地往怀钻。他不眨眼地借着烛光和渗进窗户纸的月光看着这不能轻易去触动的东西，这东西因着桂桂有点急促的呼吸而不停起伏着，于是从那野兔子眼睛般嫩红的奶子尖尖上有一层淡淡的波纹一圈一圈扩散开来，直到她的肩头和平滑滑的肚皮。

桂桂在他解开红兜时就羞羞地闭上了眼睛，她想着出嫁前一天晚上娘和她在一个被窝里睡着时告诉她关于男人的一切和一个新媳妇所应该做的一切。娘说:“男人狠着哩，你疼，你就叫，你就咬，可别拦着他。你叫，你咬，就证明你是黄花女娃，你拦着他，他就不会喜欢你。你那男人要是没经过事的瓜蛋蛋娃，你还得想办法帮助他。他是个小女婿，是好事，女大三，抱金砖，你又当婆姨又当姐，哄着他，他听你话，有好日子过。”

桂桂从村口一见自己那个小女婿，就觉得自己命怪好，那是个高高大大，壮得像骡子的汉子，除了嘴上还没毛，哪都看不出还是娃娃相，一副后生气派，而且是个像模像样的好后生，她做梦都没有想到过这样眼睛有神、心里有底的好后生哩。刚才他脱衣服时她偷看了一眼，见他身子骨上全是筋筋肉，每块都像还要疯长的枣树，从里到外迸发着的全是气力。她心里喜滋滋的，嫁给这样的男人不吃亏，让他来吧，她整个交付给他，他怎么狠她也不叫，也不咬，也不拦他，让他痛快够，让他再也舍不得离开她一尺一寸、一天一时。当然，当他真的把她赤裸裸摆在他眼皮子底下溜溜看时，她还是羞得满脸通红，睁不开眼，吭不出声，心里期待着那一刻的早日到来。可是同时一种莫名其妙的恐惧又笼罩着她全身，她想把自己遮掩起来，但又希望他能欢喜自己不胖不瘦、杨树般挺拔、柳枝般柔嫩的身子。

土生是毫不理解桂桂此时此刻的心情的，他只会按照自己的意愿行事，他现在的意愿就是想俯下身去，双手楼定那结实的脖颈，张嘴含住那颗不知为什么由软绵绵、黄豆一样大小而膨胀勃立成花生米般的奶子头。在他的脑海中，从没有过叼住娘奶子头的体验，他太想有这样的经历了。于是，他做了，他觉得自己回复成初生的婴儿，本能地、无任何欲望地张开嘴，吞进了那有些凉意，有些筋筋的娇小肉体。他开始吸吮，而后吧顺，想从那里品味出什么东西。他甚至轻轻地咬着，像在咬一个枣核，既不能把它咬碎，又要把它上面的甜味品尽。他感受到了婴儿含住母亲奶子头时的柔情蜜意和轻松欢娱，他把桂桂搂得更紧，贴得更近，他的舌头也在蠕动，他觉得嘴内真的有些甜丝丝了。

而桂桂全身早已经触电般地抖动不止了，她感受到的是她欢喜的小丈夫向她发出了明确无比的信号，她悸动着，一股令人舒适无比的奇痒从胸膛向全身扩展开去，终于，她忍不住地哼哼了一声，伸出光滑滑的双臂，抱住了土生的头，把他按紧在自己心窝窝上。她本能地挺了挺身子，下决心去迎接一阵暴风骤雨。然而。土生只是依偎着她热烘烘的心口窝，毫无其他反应。于是，她疑惑万分地睁开了眼，看见土生那样迷恋着她的奶子，脸上全部神情都和被哺乳的婴儿没有什么两样，她叹了口气:“真是瓜蛋哩，真是个……娃哩。”她全身的激情也顿时消失，但一种母亲般的感觉，一种姐对弟的怜爱油然而生，她更加抱紧了他，继而发现他已经美美地睡去了。她又嘟峨了声:“我的乖娃哩……”她也慢慢进人了梦乡。

以后，很多个晚上，即便是在她最终由女娃变成女人之后，她都会怀着母亲和姐姐般的呵护心理让他含着自己的奶子头，枕在她的心窝窝处安睡，而他也像农民依恋土地般依恋着她的胸脯，他会在睡梦中喃喃自语:“娘哩，我的亲娘……”

当土生将至花甲之年，在那个盛夏的暴风雨中，他自作主张地打开了不经中央政府批准绝不能打开的粮仓，向饥饿的灾民们发放粮食时，尽管他绝不承认，但实际上支撑他全部信念的就是对母亲的依恋和爱。实际上，他从没有见过母亲，他对母亲的认识是在他的新婚之夜，是在他十五岁那年，在陕北一个叫马家沟的地方，在这地方的一孔贴着喜字的窑洞里，在这窑洞里铺着新被的炕上，在这炕上一个叫桂桂的女人的不太丰胶的奶子间开始的。

(7)

陕北汉子霍达东经商的天才在他少年时期就淋漓尽致地显示了出来。在他成功地做第一笔生意时，他绝没有想到有朝一日他会成为一个革命政府的财政厅长。但他很相信自己不用撅着屁股、狗一样地在自己家那十几亩地里爬来爬去，也会过得比他大和祖上好。他不是厌恶农民，他只是觉得农民们过得太苦，却又太老实，太认真，他要换个活法给他们看看。

在桂桂软绵绵、热烘烘的胸脯上含着她糖豆一样甜滋滋、硬邦邦的奶子头心满意足地睡了三个美觉之后，第四天一大早，他就爬了起来，发现自己的子孙根胀得翘起来，这不是因为见他起来而也赤着身子给他披衣服的桂桂的缘故，而是被尿憋的，他没有像别的新郎馆那样，一看到自己婆姨那沾着露水的花朵般一掐一股水的身体就会火烧火燎，再上去亲热一番，折腾到日上三竿，而是像娃一离开娘的怀抱就会撒起欢来一样开门站出去，双手一背，小肚子一挺，一泡黄水从他腿间喷射出去，落到一丈开外的地方，那里正是枣树根根处。桂桂怜惜地说:“外面天凉哩。”

土生后娘头发散乱，衣衫不整地从隔壁窑中出来，准备去灶房烧水煮饭，看见土生光着下半截身子，又缩回去，向土生大叨叨唠唠地抱怨什么。土生能听出是后娘对他当院子撒尿的不满，可他毫不在乎，甚至可以说是有恃无恐，因而，当他大气势汹汹地出来骂他时，他就那么站着说:“咱有婆姨了，不再是娃，不再是瓜蛋后生，咱也是一家之主哩，一家之主在自己家里想干啥就干啥!”

“那我呢?”
“你是大。”
“大是什么?”
“大就是大，我有了婆姨，你就老了，你就当老太爷享清福吧。”
“有你这么个二杆子货，我享啥清福，不让你气死就是我的福!”

土生把递过裤子来的桂桂推回去，依然下半身无遮无拦、上半身披件夹袄，胸膛迎着深秋充满寒意的晨风，大口大气地说:“我今儿就出门去贩牲口，保险让你和后娘还有桂桂过个肥年，用不着再上山去检柴禾卖小钱，咋不是享清福?”

“啥?你想牵走咱家驴去卖?我的天大大，反了你这个逆种!牵走了驴，拿啥担水、驮柴，谁去把八里路外咱家旱地里的玉米棒棒拉回来?你想得倒美，驴是咱家命根子，快别做那傻瓜瓜梦!”土生大气得开始哆嗦了，他那明显现出老相的脸上因着恼怒而拥出蜘蛛网网一样多的皱纹。

土生并没有被大的气恼吓住，他居然嘲弄地一笑:“我做梦都不会梦到去卖咱家那头又老又瘦的驴哩，去卖它，还嫌没脸面，我自己找驴来自己卖。你不愿享清福，那就是和那老驴一样的苦命，大，过了晌午我就出门。”

“出门?到金城镇，到肤郡县，到榆林府，到西安城?天下大哩，你想往哪哒走?哪哒都不是你去的地方，你的根根就在这马家沟，你叫土生，你不能离开咱这黄土坡坡，这是你的命!’，土生大见他示是说笑，满认真的样子，不敢爆发更大的火气，口吻关切起来:“给你娶婆姨干啥，就是让你踏踏实实、安安生生过日子哩，就是让个嫩生生的婆姨拴着你哩。我的爷，你甭走，你当一家之长，咱家的地都给你种，我老了，再也种不动了。”

“走我是要走的，地甭种，荒着，租给邻家种也行，娶桂桂就是伺候你们的，她不伺候我就休了她。大，你甭拦着我，我长大了，脚长在我身上，我想上哪哒就上哪哒，咱霍家凭啥祖祖辈辈就只能黄土坡坡上种庄稼，我要改改这规矩，现在这世道都在变哩，我不信我不行，不试试也不知道行不行。我脖子上吊着那装土的荷包，黄土面面贴着胸口窝窝，到哪哒都保佑着我哩。”

土生大没儿子口舌伶俐，说不过土生，长叹一声，回了自己的窑，任凭儿子去折腾。他知道挡不住拦不了，他小时候也出去闯荡过，最远到了愉林府，去卖自家的好烟叶，结果被一伙烟霸抢了个一干二净，一文钱没赚着，一路当叫花子回到马家沟，从此再没有换个活法的志向。看来儿子也得经这么一遭才认命，只要他出去不惹事，能够完完整整地回来就行，土生大从心里不情不愿地妥协了。

土生知道大已经默认了他的决定，就是大不默认他也同样要自做主张。他回到窑里，穿好衣服，居然看到婆姨桂桂已经为他准备好了换洗衣服和过冬用的羊皮袄，还放上一双这几天纳出来的黑布面千层底的鞋子，用一块包袱皮包好，心里不禁热乎乎的。他拉住她的手腕腕，把头贴在她怀中，觉得任何一家的男娃出门时，当娘的大概都会如此。桂桂揽住他的头，有母亲般的怜爱，有姐姐般的担优，也有着身为人妻的依恋。但她没有表示出一点想要劝阻他留下的意思，她奉守着妇道人家的规矩，一旦嫁到夫家，丈夫的一切所作所为，都是她命中注定要帮衬的。

果然，吃了晌午饭，土生就戴上了礼帽，准备离家远行了。这顿饭丰盛得像过年，后娘居然拿出了鸡蛋、腊肉，还亲自动手宰了只不再下蛋的老母鸡，让媳妇桂桂做了六样菜，土生大搬出了娶亲时剩下的半瓦罐红苕酒。然而，吃饭的气氛很沉闷，除了土生，谁脸上都抹着块阴云。土生大是因为儿子大了不听话，心里恼恼的，土生后娘是因为土生大不高兴而伴随着不快，桂桂则是因为刚嫁过四天就要和丈夫分离而有孤苦伶仃之感。

土生并不在意亲人们的情绪，他的年龄使他的情感远还没丰富和厚重到因关注他人而使自己也受感染的程度，他完全沉浸在自己要出门闯荡的欣喜之中，他尽管很小就显示出与众不同的性格，但因着第一次离开家乡，他也无法摆脱掉所有同龄人第一次离开家乡时都会产

生的那种激动、惶恐和不知所措。

没有人送他到村口，作为新婆姨的桂桂有些羞涩，她只是把手上的银镯子摘下来，塞到土生怀里，告诉他万一没有饭吃了就把这镯子当掉，这是她嫁过来时身上最值钱的东西了，因而，这也是她对刚认识四天，同炕睡了四个晚上而没有真正圆房的丈夫的全部痴心。他大是不会送他的，他出门时他大低着头往驴槽里添料，添得很认真，很专致，听见脚步声从身后过，只哼了声:“早点回来，混不出个人样也回来，开春还要种地。”

土生嗯了声，在这一刻，他才觉得心里有点软软的，酸酸的，他的脚重了，像骤然绑上了个石碾子，有点迈不动。可晌午的太阳热辣辣地照住他，如同一个诱人的婆姨敞开胸怀召唤他一样，他向着那太阳走去，把自己融化在金光灿烂之中。

村口，准备和土生一同出去闯荡的同村男娃马牙子早在那里等得不耐烦了，见土生大步走来，上去啧啧笑着:“又和婆姨在炕上滚了一遭吧?看你这气势，不刚从女人身上爬起来不会有哩。你那婆姨骚不骚?劲大不大?婆姨不骚男人不欢喜……”马牙子好像很有经验地夸夸其谈，这经验大概都来自于他那不想立贞节牌坊的寡妇娘。

土生不理睬马牙子说的浑话，只是问:“你娘让你走?”

马牙子无所谓地一点头:“痛快着哩，我走到阴沟里去她也不会拦着。我走了，剩她一个人，好招野汉子，有我碍她眼，偷偷摸摸，像做贼，喊不敢喊，叫不敢叫，闷声不响喘粗气，把她憋得慌，婆姨三十像狼，四十如虎，她正是条虎哩，我这当娃的给娘挣不下骡子马、大瓦房，不能让她穿金戴银、吃香喝辣，就让她舒舒坦坦地招点野男人吧。每晚没男人，她、她苦得满炕上打滚，骂天大大不长眼。”

土生理解不了马牙子对亲娘的这种感情，虽然他能听出是又恨又爱，可还是解不开这其中的缘由，他只好漫不经心地“嗯”了声，走过河滩，上了石桥，和马牙子一前一后地向飘起了乌云的远方走去。那伸进挂满了红枣的树荫中的马家沟，渐渐模糊，两座土源有如两扇厚重的大门，在两个刚刚能算上后生的少年背后关闭，门缝中，一条浅浅的流水银带子一样曲曲折折弯来弯去向另一道山沟沟里漫延而去。

马家沟的两个后生并不是漫无目的地四处飘流，只有逃荒的人才会那样去做，而他们虽然穷困，但绝还没有凄苦到背井离乡、当叫花子的份上。他们出门前就已经有了打算，要去贩驴，贩佳县的“佳米驴”，那是一种很容易出手的牲口。而陕北一带穷哈哈想赚钱的人，做梦都想有朝一日成个驴贩子，但最终大多数人只能贩几捆烟叶子、几口袋小米、几匹布而已。当驴贩子不是一般人能干的事，那得黑白道上都有靠山，或者本身就是黑白道上的人才有本事去干。马家沟的两个后生以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勇气第一次出门闯荡就要去贩驴!

整整一个下午，他们都走在源上，一条条沟沟壑壑远远近近深深浅浅地袒露出来，有如一个迟暮之年的苍凉老人赤条条、皱巴巴的肌体，若不是深秋的天空蓝得像青石板，云彩白得像挤成一堆的山羊，太阳暖得像娘的胸口，头一次出远门的人该会感到有些苍凉哩。源上也不是杳无人迹，时而能遇上汉子牵驴、婆姨骑驴的场面，那不是汉子送婆姨回娘家，就是接婆姨回自家;还能遇上放羊老汉赶着像云彩一样的羊群慢悠悠、闲哒哒地迎面而来，也能遇上深沟边的后生在嘶嚎着信天游，那保险是沟底的涝池边有女娃或年轻婆姨在洗衣服。这

时，马牙子就会扯开嗓子，斗鸡一样也吼上几句，让陌不相识的后生感到羞愧，因为马牙子是唱信天游的好手，这大概缘于他亲娘的传教，她亲娘年轻时就是用信天游迷倒了一片好后生。

傍晚时分，太阳终于被一直在天边跃动的那块乌云吞下肚去，天空一下子变得阴渗惨的，土生和马牙子走进一个点缀着几棵土槐树的小村庄，敲开了头一家人的院门，请求能在灶房里睡一晚上。开门的是个麻脸老汉，见是两个嘴上的毛毛稀溜溜的后生，便把他们迎进门来，不仅在灶房里给他们扔下了两块毡片和两块老羊皮，还给他们一人盛了一大碗小米饭，他嘟浓着:“吃吧，娃，吃好了就睡吧，娃，谁都有出远门的时候哩，我得伺候婆姨去，要生了。”

土生和马牙子都一愣，他们绝想不到那背都驼了，头发都花了，牙都不齐了的老汉还会有要生娃的婆姨，马牙子心邪，张嘴就说:“土生，这老汉能干哩，七老八十的模样还能把婆姨日得动，还能日出娃来。”

土生最不愿意说这浑话，他甚至就不愿意想这男女之间的事，小时候他看到大娶来后娘那头一夜的事给他的印象太深，他觉得那和牲口配种没什么两样，而他不想当一个牲口，也不想配种。于是，他大口地吃饭，吃完饭往羊皮子上一躺，拉块毡片蒙头就睡。马牙子耐不住好奇之心，偷偷溜出灶房，撒泡尿的时间又转回来了，也躺下去，扫兴地说:“你猜麻脸老汉的婆姨长得什么模样?俏着哩，白生生、胖墩墩、毛绒绒、长脸、细眼睛，是只羊婆姨。”说完，笑够了，又说:“那麻脸老汉一个人过日子，保险是憋不住了就去日母羊，我听说有娶不上婆姨的穷汉日狗、日牛、日驴哩，还有日老母鸡的……”

他不说了，因为土生已经发出了轻微的蔚声，马牙子只好也合上眼，哼了声:“娘乖乖，啥时才能日个嫩瓜瓜似的骚婆姨。”头一歪，也睡了过去，睡得比土生还香甜。

第二天一大早两个后生就上了路，又是擦黑时分。总算进了佳县县城，这座县城比不上他们曾去过的肤郡县城，可比金城镇要大的得多，也热闹得多。

“瞧，那里保险是妓院哩。”马牙子放肆地指着一个挂着写有“消魂庄”字样红灯笼的庭院说。那庭院门口站着几个涂脂抹粉、穿红着绿、披着雪白羊羔皮的年轻婆姨。见土生根本没往那地方看，马牙子没趣地低头走了几步，又一惊一乍地嚷开了:“瞧，那有座戏楼哩，日他娘，没钱，有钱了天天来看戏!”

土生对县城虽也觉得稀奇，可他没太在意，他觉得他日后有的是机会逛这些地方，他还要进西安城，进皇都呢，眼下他只想快些找到驴市。走了半条街，看见了酒楼、饭馆、客栈、县衙、警察局、税局、菜市、肉市，就是没看见驴市。土生挺着胸脯，绝没有初次出门的庄户人家怯生生的样子，拦住一个面善的老婆婆问:“老人家，驴市在哪哒?”

老太太一点不欺生:“娃，远道来的吧?驴市收啦，太阳一落山就收。先找个地方住下，明儿晌午去，驴贩都贪睡哩。嘿呀呀，忘了告诉你驴市了，往东走，出了城关有块平地，一满是驴粪蛋蛋，闻味就找着了。你俩要贩驴么?你们的大呢?贩驴是件艰辛事，娃娃干不了。”

土牛谢了老婆婆，拉起马牙子去寻客栈，一连找了三家都住不起，最后在城墙根下找了间骡马店住下来，不但价钱合适，而且还有些驴贩子在这里聚着，院子中有不少挂骡马车，

还有一群驴子。当然，人家驴贩子住的是上房，能把饭菜叫进房里吃，还能让小伙计去接妓女来乐一宵。而土生和马牙子只能和十几个人一同睡大炕，一把大茶壶里温温乎乎的水就算是骡马店提供的全部服务。土生和马牙子从包里取出干摸，一人吃了两个，喝了口温水，算是饱了肚子，合计了一下，分头去找驴贩扯扯行情，他们没钱，是打着赊驴的主意。

两个半大后生东钻西窜地忙活了几个时辰，垂头丧气地回到了门窗透风、有着几丈长大炕的屋内，马牙子先开了口:“土生，怕不行哩，赊驴得找保人，还得是有名望的，县太爷有名望，可咱连他嘴歪嘴正、头尖头圆都不知道，白跑哩。”

土生倒不绝望，在他整个人生中，几乎从没有绝望过，这当然得除了养男娃传宗接代的事。他说:“我出家门就打探过赊驴的事，我婆姨桂桂有个表舅妈住佳县城，本想找她担保，可她没啥名望，怕是找不成，我琢磨了个法子，咱不赊驴，咱雇下驴说是去肤郡城驮货，只要交点定金就成。到了肤郡城支开驴主人，把驴卖了，赚下钱……”

马牙子抢着说:“咱就开溜，回马家沟享清福去，我也娶个婆姨抱在怀里大觉睡到晌午，美哩!”

土生沉稳地摆摆手:“不。咱日后还要做更大的生意，不能头一遭就坏了咱的名声，弄得日后不敢见人。咱卖了驴，赚下钱，再贩上批货，雇驴驮回佳县，卖了货，再买上驴还驴主人，剩下的钱就是咱赚的，驴主人也没道理把咱告官。”

“好主意，可咱雇驴没定金哩，我身上一共才有几十个铜板，合现今好用的银洋也就是一块，怕是你比我多不了多少。对了，我见你怀里揣了个银镯子，不如当了它，保险能当出两块银洋，我看了，街上好几家当铺哩。”马牙子往土生身边凑了凑。

土生本来有些打算，何况桂桂把银镯子交给他就是为了让他有急用时换成钱。可他想起桂桂那虽说不上俏，但让人一看就欢喜的脸蛋蛋，那虽说不上纤细，但光滑滑的手腕腕，还有那脸蛋蛋上对他像娘对娃的担忧的神情，那手腕腕像娘对娃摸触的感觉，就觉得这银镯子卖不得，卖了对不起桂桂哩。

他想了想说:“不落下天灾人祸，不逼到崖边边上，这银镯子不卖。汉子第一遭出门就卖婆姨的嫁妆没出息哩。咱去卖力气，打十天半月的帮工，不信挣不来定金。明儿先问清楚雇十头驴交多少定金，完了就去找活干，反正也不急着回家去。”

马牙子从小拗不过土生，银镯子又不是他的，随土生做主，只好点头同意。

找活计干并没有让两个后生花费太多时光，一个大户人家要平整后院一块土地，以便养些花草，很自然选中了这两个不惜气力的年轻农民，管吃管住，土地平整完之后每人给两块大洋，有人嫌这活累，看着那凹凸不平的院庭长满了荒草，觉得一个月也干不完，而一个月才挣两块大洋，划不来，收人太低。自小就刨土挖地的土生和马牙子没这念头，他们当时就搬进了那大户人家后院的一间小房子内，而且一安顿下来就拿着撅头开始干活，吃完了夜饭又顶着月光干了两个时辰。本来只要十天工夫他们每人就可以痛痛快快拿到两块大洋，可第七天头上，马牙子发现从后院一个小窗子中可以看到这大户人家的小姐和姨太太洗澡，就搬了几块方砖放在墙根下，站上去看了个够，还招呼土生去看。土生也爬上了方砖，刚把头伸

向窗子，就觉得一阵凉风袭来，从窗子里捅出了一把锋利的剪刀，显然洗澡的人发现了那色迷迷的目光，幸亏土生练过武功，躲闪及时，否则非成独眼龙不可。就是这样，他还是从方砖上摔下来。马牙子见大事不好，一拉土生，一溜烟回到院角小屋里，急急忙忙脱光衣服，往破棉被里一钻，小声叮嘱:“装睡，打呼噜，说破了天也不能认帐。”这种事于他显然不是第一次了。

果然，大户人家的管家和两个仆人赶来后院，四处巡视，不见人迹，便推开小屋的门，将两个后生连吼带骂地叫起来，质问他们是否偷看女眷洗澡，土生是一声不吭，马牙子装傻充愣，虽然见他们土头土脑问不出什么，管家还是带着怀疑的目光离去了。第二天就把他们叫去结帐，一人给了一块大洋，算是打发了他们。马牙子心虚，虽觉委屈，还是认了帐，而土生却不愿接受这事实:“还有三天我们就能把地整平，凭啥只给我们一人一块大洋?就是不让我们干了，也得一人一块半大洋，不给，我们不走，在你家院门口张扬，让男女老少知道你这家人心肠黑。”管家动怒了，要叫人去警察局找警察来给他们颜色看，还是这家的少爷在外面读过书，说是欺负劳工不合新政风范，也失了大户人家的体面，安抚了几句，每人又加了一块大洋。

“还是读过书的人心善。”马牙子捧着大洋向这家少爷点头哈腰。土生也对读书人有些好感。但他觉得用不着低三下四，这钱本是他该得的，读书人无非主持了公道而已。

拿着这差点挣不到手的四块大洋，再加上他们身上原有的四块大洋，一共八块大洋，他们在驴市上交了定金，雇了八匹壮得像小马儿一样的灰驴，趁太阳没落山之前就上了路。一路上还算安宁，只是驴东家好酒，又一喝就醉，醉了就要日上三竿才起，结果到了肤郡城已是第四天傍晚，正值袁世凯宣布复辟帝制，肤郡城归顺“洪宪”，县衙惧怕陕西讨袁军进攻，早早地就关上了城门，他们只好宿于城外。驴东家又是半瓦罐酒下肚，酣然入梦，这正随了马家沟俩后生的心愿，他们第二天牵着八头灰毛闪光、滚瓜流油的佳米驴到了牲口市，没费多大工夫，就卖了好价钱。土生心里一盘算，年关还有个把月就到了，写对子、糊窗户、裱顶棚都要用纸，看来这仗早晚得打，袁世凯恢复帝制不得人心哩。一打仗，东边的货就得受阻，吃的、穿的不愁，可纸张肯定缺乏，他没有犹豫，把肤郡城一家货栈库存的纸全都盘了下来，又去牲口市上雇了二十头驴驮着货往回走。牲口市上有人见过两个后生卖了驴又雇驴，心中疑惑，可又琢磨不清是怎么个缘由，也没有人愿意多事，就随他们去了。只是佳县来的驴东家酒醒以后，一见驴、人皆空，心知上当，先是蹲在地上哭得天摇地动，骂遍了那两个后生的祖宗八辈，日遍了那两个后生的娘姨姐妹，最后才想起去报官，可一出客栈门，眼睁睁看着两个后生带着一群驮着纸品的驴迎面而来，那驴却又不是自己的，一下子发了呆。

土生大步赶上来，作了揖:“东家哥，实在对不起哩，你那驴让我们给丢了。我们早晨叫你起，你死过去一样不睁眼，货栈那边催得急，去晚了，货就盘给别人了，我们只好先斩后奏，赶着驴进城，谁知道东家哥的驴认人哩，不跟我们，赶到路上叫几声，都一路往回跑，可也没回客栈，钻了山沟沟，我们盘算还是先雇别人的驴，驮下货，再来找你东家哥的驴。找不着你也别急，我们卖了纸品一定赔上，绝不让你破财。”

驴东家明知有诈，可又没什么把柄抓在手里，只能怨自己喝酒误事，好在两个后生盘下的纸品还值几头驴钱，又见那个头高大的后生说话并不耍滑，只好认了这事，紧跟着他们上了回家的路，但再也不敢沾一滴酒，心想到了佳县如果这纸品抵不上他八头驴就揪他们见官，由衙门追究他们。

又是三天路程，总算进了佳县城，先头的驴东家盯着卸下的货，还请了两个帮手日夜不停地守在货旁，等着两个后生的货一出手，就来和他们算帐。可一连几天，不见动静，驴东家有点急了，来问土生什么时候能卖出货。土生不紧不慢地告诉他:“现在不卖哩，等开了战再卖。”又过了几日，陕北护国军北上东进，燃起了讨袁的战火，果然，开始准备年货的百姓们对纸品的需求大了起来，各货栈纸品匮乏，两个后生盘来的货卖了个好价格，按市价还清了驴东家的驴钱，还剩四十多块大洋，扣还每人的本钱，两个一人分了二十块大洋，这足足合马家沟一个庄户人家三年的收成。

土生拿着这钱上街去扯布匹，给大买了个新烟锅，而马牙子头一遭得这么多钱，心里烧得慌，在妓院门口转几圈还是一头钻了进去，被老鸭的花言巧语和青楼女子的虚情假意搞得晕晕乎乎，虽然品尝到了做男人的滋味，可早晨从那门口出来，兜里只剩下三块大洋，本想回家娶婆姨的梦破灭了，不过他倒也能自我安慰:“咱也算入了洞房，日婆姨就是那么回事，拉风箱一样出出进进，尿一出，人瘫成泥。”

回马家沟时，马牙子除了给亲娘扯了块洋布外可以说是空着手，而土生赶着头青驴，驴背上有一匹布、一捆纸，还有几件小玩物和一包花花纸包的糖块块。见他们进了沟，全村人几乎都惊讶了，稀罕得不得了，他们像议论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似的议论着这两个半大后生的举动，经马牙子那张关不住的嘴再神神乎乎自吹自擂地一煽乎，土生简直成了马家沟的奇才。土生他大脸上有了光彩，不再提当初抱怨娃出门的事，而是逢人就讲:“当初咱找归元寺老和尚算过命，抽过签哩，老和尚一摸生娃的头，就说他是大福大贵之人，就说一个小小的马家沟藏不下他哩。”后娘也把土生当成是她亲生的一样，说生娃从小就与众不同，有贵人之相。倒是乡长马孝贤冷静些，他和几个长者拉扯:“霍家这娃不可小视哩，两手空空出去闯荡个把月，赶着头驴满载而归，若不为匪为盗，必是百年未遇的神童。该派人去打探一下，若有了什么劣迹，我身为乡长，不能不管，若确实走的正道，我也不能不提携他。不过，鸡窝里断没有飞出凤凰之说，我对此娃多有怀疑，不早日端正，说不定日后成为马家沟一害。”

土生听说这话后，便对马孝贤耿耿于怀，从此水火不容，致使终有一日，马孝贤死于非命。

(8)

陕北汉子霍达东人生中第一次被官府追捕并不是因为他造了宫府的反。当然，他确实是触犯了官府的利益，这和他以后多次被官府惩处制裁在本质上没有什么区别，只不过这第一次他是为了个人谋生，而后来是为了大众谋生而已。他很不愿意提及他这段经历，但任何人都不可能使发生的事情在历史上消失，再伟大和再卑微的人在这一点上是一样的，就如同面对死亡，再高贵和再低贱的人都一样无可奈何，死亡对谁都是公平的，不公平只存在于活着的人和因着这些人所构成的社会中间。

土生在贩了几年牲口之后，家境居然大有起色，不但将三口窑翻旧成新，院门修成了青砖门楼，还置了几十亩旱地，在马家沟成为了富足人家，虽然还属小姓，但再也没有人敢冷眼相看，连马孝贤见了他也会和颜悦色。不过他认定了这马家大户是笑里藏刀，不怀好意，

因而总是提防万分，一副不卑不亢的神态，使马孝贤越发不敢小视他。

随着年龄的增长，见识的增加，他已经不满足一年有百十块大洋的进项，他想到金城镇，甚至肤郡城开货栈，他觉得那才是真正的新活法。他想做什么早就不再需要和大商量了，而他大也不再过问，他大承认自己老了，改朝换代以后对外面的世界见识太少，只有弯腰驼背地伺候家中的地的份，即使那样，他一个人还忙不过来，有时还是雇短工，而他娘更是顾不了别人的事，她那心窝窝疼的病加上常经血不断，红了裤子红了炕，使她自知活命不长，每天大半天光景躺在炕上。而结婚三年多还是个黄花闺女的桂桂对丈夫更是百依百顺，她最欣慰的就是每夜能看着丈夫孩子似的含住她奶子头，缩在她怀电睡个安稳觉。

土生有了办货栈的想法后，犯愁的就是没有本钱，开个货栈可不是几十块大洋能解决得了的，没有几百块下不来，若是去肤郡城办商号，更是要上千块大洋才开得了张。他百思千想，无论如何筹措不来这么多钱，而他的性子是想千的事就一定要去干。终于，一天晌午他仰在一棵槐树荫下抽着城里人开始时兴的纸卷烟时，看到了远处阳坡上一片红彤彤的花朵在绽放，好像黄昏的太阳摊在了黄土坡子上，也像是一匹艳艳的红绸铺了开来，更像是一汪鲜血在缓缓流淌。他心中一动，站了起来，他知道怎样才能尽快筹一笔本钱了。

陕北长期以来种植着一种每年都可以有收成的植物，这种植物能开出比山丹丹还血红的花，秋天成熟的果实采摘下来可以食用，也可以熬出汁来当药，这种药治疗拉肚子、心窝窝疼、头痛都很有效，陕北的庄户人家都在地头坡顶种上一些，秋天将果实收下来，熬成汁装在瓦罐罐里，以备不时之需。后来有人发现这东西能提神，于是身价倍增，专门贩卖这种东西的贩子也就出现了。由于有大钱赚，黑道白道便都想专营，不时传出因此而人头落地、尸横荒野的说道，因而没有黑白道背景的人不敢染指此物，虽然利润颇丰，可终究性命要紧。

土生决定冒险做一次这种生意，赚到钱后立刻洗手不干，规规矩矩去开货栈。他赶着青驴，带着二十块大洋独自上了路，这次他没有叫上马牙子，因为这事风险太大，让黑道的遇上不由分说是乱刀砍死，让白道的遇上以偷税为名，最少蹲上三年大牢，马牙子多嘴生事，又不够检点，容易被人怀疑，还是一个人独来独往安全些，万一出了事也是一个人承担，牵扯不上别人。

他进了路窄人稀的荒凉之地，那里的土货价格便宜些，花了近十天工夫，他挨家挨户收了几十斤那种干货，不但花完了二十块大洋，还把大青驴也顶了出去。但他知道他身上背着的这些干货若能到了榆林府，起码能卖上五六百大洋的好价钱，这东西是抢手货哩，这世间能治病能提神的东西并不多，物以稀为贵，不怕赔了，他怕的只是被抢了。他挨家挨户收这干货时，一个见他长得高高大大、周周正正、有点欢喜他的老婆婆就说:“娃，你得小心哩，大道上有’官府查哩，让交税，这税没个准，一交就没赚头了。那小道上有土匪拦哩，碰上贩这货的，没说头，一刀砍了脑瓜瓜，像是切南瓜，尸体往沟沟里一踢，货驮走。娃，要不你就甭走了，咱家女娃俏俏的，挺配你。”

土生当然不会留下来，他家里有婆姨哩。他上了路，到了没人迹的地方，既不走大路，也不走小路，只往没路的地方走，遇到沟沟就滚下去，碰到坡坡就爬上去，也许真有神灵护着他，出了这一地域，他没遇上官兵，也没碰上土匪。假如他要不是贪图挣大钱，在肤郡城就把这货出了手，也就不会被官府追捕了。可他不愿意在肤郡城出手，在肤郡城出手赚的钱不够开货栈，他一定要去榆林府，那里他走过好几次了，知道那里的行情，而且，在那里他

还可以会会在师范堂念书的儿时好友李仲海，听他拉扯些外面的稀罕事，也算长见识呢。他挺羡慕李仲海念书念到了榆林府，李仲海说毕了业还要去皇都念什么清华大学，按那已经老了的私塾先生老秀才的说法，那就算中了举。不过，土生绝没有什么后悔，他认定自己日后不会比李仲海活得差，他为商，他为士，都是庄户人家出身，谁也高不过谁。李仲海曾劝过他还是去念书，他不干，说是娶了婆姨的人还去念书脸上不好看。

就是想着赚钱和会李仲海，土生在肤郡城内小心翼翼地楼着干货睡了一觉，第二天一大早又上了路，两天之后的天黑时总算看到了米脂县城的轮廓。

米脂县城不大，但声名显赫，皆因李自成在这里造反起家的缘故，他闯荡十数年之久，最后灭了明朝，而在京城还没把龙椅坐热，又被满人赶出皇宫，辗转逃窜，客死他乡。在米脂他儿子曾修了座行宫，倚山而建，尽管说不是金碧辉煌，也还算得上有些气势。一道城墙形成人工屏障，官道由城门穿过，因着城门长期以来为防盗贼匪患，夜闭晨开，来晚了的行人只能宿于城外，城关处也日渐繁华，有了骡马店、饭馆、客栈、妓院，档次自然不如城内的高，但有总比没有强，赶夜路的客人省个去处了。

土生就是在城门关闭之后才到了米脂城外的，他找了间曾住过几次的客栈住下，这时他已经不用挤十几个人的大炕了，因着身上有贵重的干货，便一个人要了间房，虽不是庭院中间的正房，而是侧院依坡的一排窑洞中的一孔，比不上正房有架子床，有丫握伺候，还能叫花酒，可也洁爽清静，而且不怕有盗贼同炕，睡得安稳。他没心在外面闲逛，走了一天，腿脚也有些酸胀，让伙计送了碗羊肉泡摸吃下去，又打了桶热水泡了泡脚后就睡下去了。

睡到半夜，忽然有动静将他惊醒，自从背上了干货之后，他就不敢睡踏实，随时防备着有黑白道上的袭抢，衣服也不下身。因而，他一被惊醒，立刻翻身而起，把抱在怀里的干货往背上一送，前面系住，伏身推开窗子，向外张望。庭院里不怎么黑，薄云没有完全遮住月光，影影绰绰地可以看见屋顶上、窑顶上站着些手里端着快枪的人，定定神，看清楚端枪的人都穿着制服，扎着皮带，不用说是伙官兵。正院内传来吃喝声:“一间一间给我查，我接到密报，河东有流匪住到这里，手里有批劫来的私货要在米脂出手!给我仔细盯住，狗日的匪盗被我围住，长了翅膀也别想飞走!”随即砸门声，男人的抗议声，婆姨的尖叫声纷杂而来，土生不禁一阵紧张。

他回头看了看自己住的地方，除了一张炕外，就只有一张枣木方桌和两张方凳，而那炕是由外面烧火，窑内并没有炕洞，他身上的干货无处可藏，他骂了句:“狗日的干匪!”正觉有点束手无策之时，忽然几声枪响，屋顶上有官兵“哎哟，哎哟”地叫着，倒栽急滚了下来，其余的嚷嚷“真有匪”!齐刷刷地趴下来，向响枪的地方还击。枪声一下子响成了串，像是炒豆子，也像是过年放鞭炮，半空中划过一道又一道亮光，如同星星撒着欢地飞来飞去。

土生不及细想，一咬牙，轻轻拉开门，闪身出去，借着阴影，往后院溜，想趁乱翻墙逃走。他知道，他身上的干货一旦被查出来，不但分文无收，还可能被当成土匪一伙的拉去赴了法场。枪战之中，果然没有人注意到他，他顺利地到了后院墙，迅速回头张望了一下，见没有人跟踪而来，便纵身一跃，来了个旱地拔葱，到空中后又使了个鹌子翻身，飞过一人多高的院墙，落在院外的土路上。他刚有些暗自得意，不想一个守在后院墙下的官兵正准备燃起火把，见有人跳了出来，扔下还没烧起的火把，端起快枪就冲上来，吼了声:“狗日的，往我枪口撞，蹲下，别动，动我就赏你一颗花生米!”

土生是练过武功的，见有人拦劫，身子本能地一闪，避开枪口，不由分说，飞扑上去，手掌一握，来个“铁锤贯顶”，右脚一举，来个“流星碎碑”。那官兵也是个练家子，手指一勾，枪响了，子弹擦着土生的腰眼飞过，钻进了土墙之中，见没击中，官兵向后倒退几步，躲开土生的攻击，来不及再拉枪栓，干脆抡起枪当成棍子砸下来。土生一闪，枪托砸空了，那官兵一个趔趄，差点摔倒，土生正好来个顺手牵羊，手一拽，脚一蹬，将那官兵撂倒在地。此时此刻，不是你死，就是我活，由不得他不狠，抬起脚，冲官兵尾巴骨重重踩去，只听官兵恶嚎了一声:“日他妈，这土匪踩断我的腰……，来人呀……”

土生断定这官兵一时半会儿爬不起来，往地上啤了口唾沫，将那支快枪踢到路边，拔脚就跑。不料想，这官兵还有股子蛮劲，虽然疼得站不起来，可硬拼着向前一跃，伸出双手去抱土生的大腿，终究有伤在身，差了一点没抱住大腿，却抓住了土生背上包干货的包袱皮，全身往下一坠，那包干货被拉扯下来。土生正待回身去抢，却见几个官兵举着火把闻声赶来，几颗子弹“吱吱”响着，从他头顶飞过。他不是要钱不要命的人，知道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的古训，只好丢下干货，三十六计走为上，向黑暗之处蹿去。

然而，他还没有跑远，后面就有大群官兵举着火把追赶而来，因为他们发现了他包袱中的干货之后一阵欣喜若狂，认定他是贩私货的土匪头目，当然要穷追不舍，将他抓住邀功领赏。这下子可苦了土生，他武功再强，也没胆量赤手空拳和拿着快枪的官兵去对峙，他只能逃，像兔子被狼追赶着一样没命地逃。

他先是在土路上奔跑，幸亏他在山沟沟长大，爬上爬下地养壮了脚力，不会跑不动，也幸亏他常走夜路，知道有阴影的地方是坑洼，知道明晃晃的地方有水，灰黄的地方才是平地，他不致于被坑洼拐了脚，不致于被积水滑了跤。但是，他虽然跑得快，跑得稳，可抵不住官兵分头围追堵截，如同给他撒下了天罗地网。后来，他钻进了铺着石板的小巷，结果两头都出现了熊熊燃烧的火把，他只好再次跃过院墙，进了一户人家，那户人家早被枪声和喊杀声惊醒了，一个老太婆守在庭院中看动静，见黑影中跳下一个人来，官兵的抓拿声又渐渐逼近，连忙跪下来捣蒜似地作揖磕头，乞求着:“匪大大，不，不，好汉大大，快走吧，我家可不能收留你，搜出来全家杀头哩。好汉大大开开恩，我家有病着的媳妇，几岁的孙娃，经不起折腾，好汉大大……”老太婆居然老泪纵横了。

土生心虽硬，可那是对强人时，眼下的场面他见不得，何况他本不是来躲藏的，便冲到另一侧院墙，又翻了出去。他刚跳到地上，就听见这家院门被官兵用枪托子砸开了，他明白，逃终究不是办法，总有累的时候，他不能只像兔子，他还得像狐狸，他必须要躲，躲到一个安稳人家。于是，他想到了桂桂的娘家，那里不会不让自家女婿藏身。桂桂家他曾去过，那是桂桂知道他去榆林府时要路过米脂，让他去探望一下她的亲娘的。她虽从小过继给一个远亲，可亲娘终是亲娘，忘不了的。因而土生在桂桂娘家落过脚，也给那个病殃殃的老太婆送过山货和中药。看来，他只能到那里去了。

主意一定，土生转身向城墙根跑去，桂桂娘家就在那里，他还记得方位，天黑也跑不差路。几分钟后，他跳进了有着三间正房、两间厢房的清静小院，而后面的官兵则寻踪跟来，包围了这一带，开始逐门挨户地搜查。一支支火把映得天上明晃晃的，像是正月十五耍起了龙灯。

土生进了院子，摄手摄脚向正房走去，他记得桂桂娘睡正房，儿子和儿子婆姨睡厢房。

到了正屋窗下，他敲了敲窗权子，轻轻呼唤着:“娘哩，娘哩，我是生娃，外面有官兵抓我，让我躲躲，日后定会报你老人家大恩哩。”

屋子里一下子有了响动，传出的居然是桂桂的声音:“娘，是生娃哩，快让他进来。”话声一落，有人下地穿鞋，慌慌张张地开了屋门，让土生进了屋，烛光一亮，土生面前果然是只穿蓝花肚兜，披件上衣的桂桂，她一脸的焦虑和担忧，不安地望着土生。

土生一下子吹熄了烛火，低声问:“桂桂姐，你咋来米脂了?”长久以来，土生都叫桂桂姐。

“娘捎信说病得厉害，想见见我，你又不在屋，我只好自己雇了头驴，回来看娘。”桂桂拉着土生进了里屋。

土生朦朦胧胧看见老太婆躺在架子床上，“呼噜呼噜”喘粗气，胸口像是堵着什么东西。这是肺疥，土生第一次来这里就知道了。他有点歉意地说:“娘哩，我惹麻烦了。”

老太婆喘口气，有点犯愁:“娃，屋里没地方躲哩。”说完咳起来。

桂桂上床给娘捶背，说:“娘，躲啥哩，我是你女娃，土生是你女婿，来这里探病，官兵找不了娄子。弟，官兵没见你啥模样吧?”

土生摇摇头:“黑灯瞎火，瞧不清哩。”

桂桂又说:“娘，委屈你哩，你到灶房那闲着的门板上睡一夜，我和生娃睡这里，一会儿官兵来查，好应付哩。”

桂桂娘没主意，只有点头。

桂桂抱上被褥，示意土生抱上娘，到灶房内安置下老太婆，好在春末夏初时节，不会受什么风凉。让老太婆睡下后，桂桂急急忙忙扯下土生身上满是风尘的衣服，自己也脱下外衣，和他一同倒在了架子床上，扯过条布单，双双盖上，提心吊胆地依偎在一起。还没觉出土生身子冷热，外面的院门就被砸响了，有官兵吼着:“别睡了，开门查匪!”

桂桂一骨碌爬起来，登上裤子，穿上外衣，先跑出去到了厢房边，低声问:“弟，你可醒了!”听见里面有动静，忙叮嘱:“弟，官兵问起，就说屋里除了娘，还有姐和姐夫，千万记着，你姐夫也在哩。”说完，她才又回到正屋，合衣躺下了。躺了一下，觉得不对，忙又脱了衣服。

桂桂的弟弟去开了门，几个官兵举着火把冲进来，恶神似地喝问:“你是这院子当家的?见没见土匪跑进来?”

桂桂的弟弟个子矮小，但还算镇定，点头哈腰地说:“回大人的话，小的就是一家之长，没见有匪。”

“日他姨娘，给我搜!”为首的官兵抡着盒子炮，吼了一声。

官兵们满院满屋地搜起来，院里空荡荡的，除了口水缸和几筐炭外，再没有能藏人的地方，于是缸倒了，炭洒了，继而火把进了屋，厢房内桂桂弟媳妇搂着不满一岁的孩子抖得像筛糠，她从来没见过这阵势哩。正屋里火把映照下，老太婆不停地咳，咳得连官兵都心烦，而桂桂紧紧搂住土生的脖子，不敢抬眼看，身子也有点冰冷了。

“这他娘是啥毯人?”为首的官兵有点疑惑地盯住了土生。

“回大人的话，这是我姐和姐夫。”桂桂弟弟忙不迭地回答。

“真是你姐夫?”

桂桂弟弟做出一副委屈的样子:“我姐又不是娼，不是姐夫她怎地会这么搂着不放?我家祖祖辈辈清白，不出娼，也不出匪哩。”

官兵们一阵哈哈大笑。那为首的官兵细细想来，也觉得没什么破绽，他们缉的匪是河东来的，断不会是这种人家的女婿。便一挥手:“快去搜查别家，放跑了土匪，每人一百军棍。抓住了土匪，每人十块大洋!”

官兵们退出了屋子，院门也“吭”的一声关住了。桂桂弟弟不明就里，只认为姐夫土生是赶夜路来接姐姐的，无意中碰到官兵抓匪，因而没有生疑，也不多问，厢房里孩子在啼哭，婆姨在叫他，便赶快回自己屋去，留下还在浑身打战的姐姐和面色也有点苍白的姐夫以及依然咳得撕心裂肺的老娘在正房里。

小院里顿时安静下来，桂桂去照料娘喝水，土生坐起来抽闷烟，他心里窝了火，还有三天路程就能到偷林府了，而到了榆林府就能将干货出手，五六百大洋是可以稳稳揣进怀中的，可天晓得会和黄河东边来的土匪住进了一个店，遭官兵围捕，丢了干货不说，还差点没了命。虽说在桂桂娘家算是死里逃生，保住性命了，但这许多天来的辛苦和本钱算是竹篮子打水一场空，瞎子点灯白费蜡了。他想喊，想叫，想把堵在心口窝窝的什么东西发泄掉，他甚至想杀个生灵以卸掉身上沉甸甸的东西，他浑身躁动不安。

桂桂回来了，她习惯地脱去了上身所有的布片，她知道丈夫睡觉一的习惯。放好衣服，她躺到了土生身边。

月亮飘出了云彩，只糊着白窗纸的屋内霎那间明亮了不少，土生扔下烟头，烦恼地回过身来，想向桂桂倾诉一下，兴许能使情绪安稳些。但是，他什么也没说，他被桂桂吸引住了。

桂桂的脸由于刚才的惊吓而惨白，到现在也没有完全恢复，桂桂的身子被月光抹上了一层银，他从来没有见过桂桂这样白晢哲的，像一只还没有到黄土地上滚跑过的小羊羔。顿时，他找到了发泄的对象，找到了可以屠宰的生灵，他的眼睛闪灼出一种以往从没有过的奇特光芒，他的面孔涨得炭火一样通红，有一股热流在他全身流动，他掀掉身上的被单，翻身压到桂桂上面，双手抓住了以往他只会轻抚慢摸的奶子，狠狠地揉搓着，以致于桂桂疼得哼出了声。他根本不顾怜桂桂，她的眉头紧皱，神情惊异，全身发硬，更增加了他的快感和急于发

泄的欲望，他一把扯破了桂桂的红短裤，将这碎布片拉出来，扔到地上，然后狠狠、勇往直前地压下去。

作为一个二十岁出头的女人，桂桂也有常在梦幻中出现的欲望，更有着想开花结果的需求，她见过那没有开花就枯萎了的小草，那种不会结果的植物从来也不可能强壮。她以往对丈夫施予太多姐姐对弟弟的情感，母亲对娃的爱，她早就想品尝男女之间的甜蜜了。因而，她稍微挪动了一下身子，双手抱住了土生的宽厚脊背，猛然抬起头，亲住了他的嘴。在桂桂痛楚但又欢快无比的一声“弟，姐今夜才算是个女人哩”的压抑叫声中，他冲破了一道并不坚固的防线，全部被桂桂接纳了。也就是在这刚被全部接纳的一刻，他觉得自己爆裂了，像一团火燃烧到了顶点，像一股泉喷到了最高处，他化成了一堆泥水，变为了一摊清水，他趴在桂桂身上，奄奄一息般地抱住她，依恋地说:“姐，我日了你哩，我不能再把你当成娘……”

桂桂生理上绝无快感而言，但心理上却早已愉悦万分，她捧住像岩石、像大山一样压在她身上的土生，亲个没完，娇喘着告诉他说:“弟，你想把我当啥就当啥，我这辈子就是你的人哩，下辈子了变牛变马变驴变狗还上你家的门。”

土生平生第一次在女人身上发泄之后，心情一下子舒坦下来，他品尝到了一种从未有过的美妙感觉，他这才真正明白了男人的力量可以在女人身上淋漓尽致地体现出来，也多少懂得了为什么男人是这个世界的主宰。他很感激桂桂，他觉得长这么大以来，桂桂给他的最多、最好。刚才被官兵追浦的恼怒消失殆尽。当他第一次发现桂桂作为女人除了能给他娘和姐的感受外，还能给他另一种无法言喻的享受后，他觉得丢失了几十斤干货的沮丧根本不值一提了。

此时此刻，他如同浸泡在一池温水之中，浑身上下暖洋洋的，每一根汗毛都舒展开来，他得意地轻轻晃着脑袋，脖子上挂着的那个装有黄土的荷包摇荡着，轻轻擦蹭着桂桂光滑的胸脯，桂桂痒痒的，笑了起来，于是把他搂得更紧……

(9)

陕北汉子霍达东被称为匪是在二十岁的时候。二十年前金城镇被斩首示众的土匪黑狼在行刑前曾指着马家沟大叫:“那里二十年后准出一条好汉!”这话应验了。这绝对是一种巧合，霍达东从来不相信这种巧合，他只不过在走着自己的人生道路，他只认定自己对世事的判断，这种判断完全因他性格所致。

在米脂城根下桂桂的娘家和桂桂圆房之后，第二天他就把桂桂带回马家沟，他觉得睡在别人家床上不自在，睡不香，睡不痛快。从那一夜起，他睡觉不再是枕在桂桂胸脯子安稳地酣然入梦了，还有着许多力气活要做，而这种活不管做多少次他都不觉得累，只觉得舒坦。那一夜，若不是桂桂哀求“不来哩，要去看看娘”，他一准会把那活儿干到大天光，干这种活儿真是件不用人逼的美差哩。

他把身上留着的要到榆林府去的所有盘缠拿出来，在米脂城内给桂桂买了件丝绸的红兜

肚和一个亮闪闪的玻璃珠子头花，又雇了头小毛驴，驮桂桂上了回马家沟的路。他发现，经过这一夜，桂桂的脸变得红扑扑的，眼睛总是眯眯地露出笑意，比以前美了许多，连胸脯都显得胀鼓起来，浑浑圆圆，让他一看上去就有点心猿意马，神不守舍。那玻璃珠头花戴到她头上，更觉她俏生生的，带着这样的婆姨走在路上，得意得很哩。　　看着坐在驴背上的桂桂摇摇晃晃、一起一伏，像朵花在微风中轻摆，像片荷叶在水中飘荡，土生扬起脖子，冲着近处的黄土坡坡、远处的黄土沟沟、天上的太阳、天边的云彩唱了起来:　　　西山那个嘴嘶呀那望乡的那台哎，

撂不上那个妹格妹折格回呀那来。

有心的那个无嘶心说上句的那话哎，

哥哥我那个急格的心格乱呀那抓。

以前土生很少唱信天游，这心情骤然开朗后唱上几句，也满有滋有味，加上他嗓子本来洪亮，这歌声震得路边小草上的露珠往下滚，野鸟往外飞，小毛驴也叫了几声。

桂桂笑起来，看着丈夫高兴，她也张了嘴。她本来很能唱信天游的，嫁到霍家后，为守妇道，不敢张狂，也就收了做女娃时的心，苦守几年，昨夜如愿以偿，真正做了婆姨，她当然同样有欢快的心情，一开口那尖亮的声音就直冲云霄:

野雀雀上树啾啾喳，

扰乱我的心事你走呀。

你手手捉住那我手手，

魂魂跟上一个你走了。

跟你那个走上黄土坡，

妹妹我呀叫你声亲哥哥。

亲哥哥哎来你低下了头，

一下那个亲在我心口口。　　两个人一路上唱着，笑着，闹着，若不是有那驴东家牵着驴，土生真想抱住桂桂滚到草窝窝里去。他记得儿时看到放浪的寡妇和野汉子在麦子里地干得很快活哩，野汉子黑黑的脊背在热辣辣的太阳下泛着光亮，寡妇两条白生生的大腿像是旗杆一样高高举着，绿油油的麦苗一会儿就被压倒了一片，如同石碾子碾过一样，土生很想尽尽那滋味哩。

在肤郡城住了一晚，第二天太阳没落山土生和婆姨就到了马家沟。这次回到自己家的窑洞后，土生很长时间放弃了在外闯荡，如同接受了什么人劝说似的安稳地在黄土沟沟内伺候起自家的几十亩地来，自认为很了解他的依然打着光棍的马牙子很惊奇，上门来问他:“生

娃，你这是咋了呢?我还指望着和你出外闯荡赚钱娶婆姨哩。”

土生回答他:“嫌了钱你就逛妓院，有个婆姨你也养不起，保不准把婆姨也卖到妓院去。我外面跑累啦，要歇息些日子哩。”

土生大对娃的转变大为高兴，尤其人老了晚上睡得迟，蹲在枣树下抽旱烟时听着小两口的窑里传出哼哼叽叽、呜呜咽咽的声音，心里更是欢喜，以前他可从没有听到过小两口这般亲热，他琢磨着自己快抱孙子哩。一想到抱孙子，他心里就沉甸甸的，像是压了磨盘在胸口窝，因为他忘不了算命先生说过的话:命中无子之运将转到他男娃身上。他盼着土生能下些力气在桂桂身上耕耘，能使桂桂早日受胎养娃。　　自从土生留在了马家沟，夜夜几乎都不闲着，桂桂像是施了肥的瓜蛋蛋，长得丰丰满满、白白胖胖了。地里的活计不用她动手，只是在院子里养鸡、喂猪、做几个人的饭，不经风，不淋雨，不晒日头，自然不会黑瘦，只是她的肚子依旧平平坦坦，没有丝毫动静。村里有舌头长的婆姨说她嫁过几年来，没给霍家增口添丁，是个不会下蛋的母鸡哩。她倒没太在意，因为她自己知道几年来她一直是黄花闺女，只是几个月前才成了妇人，到现在还没怀上娃不是稀罕事，兴许哪一夜送子娘娘就托梦来了。倒是土生的后娘没福气安享晚年，在一家人开始过得和和睦睦、舒舒坦坦、不为饥寒所困扰的时候，有一天心口窝疼得打了半夜滚，吐了半盆子血，天没亮时瞪着眼睛咽了气。土生大少不了因为没了伴而唉声叹气，躲在没人处还落了几颗老泪。桂桂心软，哭得鼻涕一把，泪一把，上气不接下气，还得给婆婆洗身子，换衣服，折腾了个够。到晚间觉得小腹胀胀的，腿间有点湿乎乎，去了趟茅屋，一蹲下就有血淌下来，还伴着点血疙瘩。她心里有点慌，不知是咋回事，婆婆又过了世，当下无人询问，只好等血止了，找块布擦干净，也张不开嘴向男人讲，回屋里早早躺下了。　　土生对死了后娘没什么太多的悲伤，自打后娘嫁来那夜他想睡她怀里而被推开后，他就从没有把后娘当过亲人。不是亲人，死了当然也不会对土生有多大刺激。但终究是一块过活了十几年的人，又是大的心头肉，他不能袖手旁观，还是帮着钉了棺材，接待着来吊丧的村里人，忙活了一天。晚上回窑洞见桂桂已经躺下，也没多问什么，又像往常一样脱光了衣服，躺到桂桂身边，不管是个晦气日子，亲亲摸摸后，压了上去。在他完事之后才发现桂桂不如往日那么投人，有点应付了事，既没有欢愉的呻吟，也没有要死要活地搂紧他的脖子咬着他肩膀头的肌肉，继而，他觉得下面湿滚施的，忙点燃了油灯，借着昏黄的灯光，看见炕席上有摊血，这种情况只是在桂桂娘家那一夜发生过，那标志着桂桂还是个不折不扣的处女，而今夜……他有点惶恐地问:“来身子了?”桂桂听到这句问话，猛然想起可能是这么回事，其实算日子已经过了几日。她含含糊糊地点了点头，起身找布擦干净了，土生也擦干净了炕席。　　自打这夜起，桂桂的经血就开始不准，到后来有机会看了妇科医生，医生听了她的叙述，推断她是因疲劳而流了产，流产后没有休息料理，马上又行房事，导致输卵管因炎症而阻塞，造成她终身不孕。到那时，土生和桂桂已是后悔莫及了。土生后娘死后第三天才人土为安，土生大更为苍老，终日除了伺候家里的大青驴外，就是巴望着桂桂的肚皮赶快大起来，这大概是他的余生中唯一一件心事了。为此，他又去了十几次归元寺，那曾给他解过签的老和尚早已圆寂，别的和尚说法不一，有说他儿孙满堂的，也有说他一家不得善终的。他不知信谁为好，只有拼命烧香磕头，求佛祖保佑，后来他干脆花一块大洋请了尊巴掌大的铜佛爷，供到自己的窑洞中，每天烧上三炷香，磕上九个头，但仍无济于事，桂桂的肚子还是瘪的。

忧中也有喜事，不知是因这年风调雨顺呢还是土生特别卖力气伺候庄稼的缘故，这年秋季的收成居然格外地好。土生又动了开货栈的心思，他只留够了种子和吃到春末的粮食及驴料，其余的全卖了出去，得了百十块大洋，又找马孝贤借了一百块大洋高利贷，去金城镇租

了间铺面开起了杂货铺，他不想整日被拴在那里，就请了游手好闲的马牙子帮他看店，白日卖货，晚上守门。

土生大劝过他:“生娃，不行哩，咱是庄户人家，粮食总得留足，有好年景就有灾年景，要是碰上个饥荒年，你那纸布当不了饭吃，饿肚子愁死人哩。” 土生当然不会听他大的话，他不信他种几十亩地的春粮还能饿着他一家人，就算是春旱，每亩只收回了种子，也有一两千斤哩，何况他的杂货铺每天有现钱进，没粮吃了可以买。他只管按自己意愿行事，正值冬闲时节，他一趟一趟往肤郡城和榆林府跑，往自己的杂货铺进货，也夹带点山货到肤郡城和榆林府。不过，他再也没有贩差点要了他命的那种干货，太危险了。

在榆林府他常常一住几天，都是挤在李仲海的宿舍里，听他讲些新鲜事，李仲海又介绍他认识了刚从北京大学毕业回来当老师的马孝贤的长子马圆。土生本对马家人没有好感，可见李仲海很尊重这个一派书生气、穿长袍、戴眼镜的老师，他也不能过于冷淡，随着李仲海叫了先生。 他发现，这个先生确实有学问，那学问不是四书五经，而是以往他从没有听过的道理和新鲜事，什么有一个国家叫苏俄，那里是工人农民当家做主;什么北京的学生搞了“五?四”大游行;什么有一种主义叫共产，是一个叫马克思的人发明的。前面的事他能明白，无非是工人农民秀才们造反叹，可后面的事他觉得是马圆在为马家吹嘘哩，均田地、天下大同的说法古来就有，怎么就变成了他们马家人的一大发明。不过，他也没争辩，只是心里面不以为然。 来年春末，天不旱，地不涝，庄稼长得挺旺，本该又是好年景，不想土生大的话不幸言中，不知从哪里来的蝗虫铺天盖地，黑鸦鸦地直扑陕北，把几个县的庄稼啃了个一干二净，夏粮绝收，巴望着这粮食度日的人们一下子陷入了饥荒中。 一个月后，当野菜树皮也没得吃时，饿死人的消息不时传来。在马家沟，马牙子的寡妇娘也死于饥饿之中，土生这才明白了什么叫“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的古训，但为时已晚。他把杂货铺的东西全部卖掉，所得之钱也不过换回了几十斤粮食，就是每天喝稀饭也维持不了一个月。人们只盼望秋天能多少有点收成，哪知道虫群未散，就地繁殖，秋粮未熟，蝗灾又起，而且比夏天更为疯狂，往窗子里钻，咬食奄奄一息的山羊，还有咬死婴儿的传闻。时年正值军阀混战，无人顾及赈济灾民，灾况愈发严重。看着他大饿得皮包骨头，连旱烟袋都拿不住了，同样饿得面黄肌瘦的桂桂抱着土生说:“弟啊，活不下去哩!” 就是这句话，触发了土生砸粮仓的强烈念头，四十年后，还是桂桂的这句话，使他毅然打开了粮库，他始终不明白，为什么一个柔弱的女人有这么大的力量，使他这个娘不怕、大不怕、天不怕、地不怕、官不怕、鬼不怕的六尺大汉能够俯首听命?仅仅是因为他从她的声音中感受到了亲娘似的呼唤吗?他曾去过马孝贤家，让马家大户借粮给村民们，马孝贤没有借，但接到儿子马圆的信后，马孝贤开了粥棚，每天煮一百斤小米粥，让村民勉强糊口，不致倒毙。他跟土生说:“都是父老乡亲，我家粮食也有限，养活不了全村人，借谁不借谁呢?况且我身为一乡之长，还要供养乡勇，以防灾民哄抢闹事，这也是一笔不小的开销，借不得哩。” 土生虽心中有气，但马家粮仓他心中有数，确实有些杯水车薪，难以解救众多灾民，于是，他自然而然地想到了金城镇的政府粮库。

那是一座经常囤集着上百万斤粮食的粮库，金城镇四乡三十八村的庄户人家每年交纳的人头税、田亩税都是以米代款，解付于此，过磅人库。这些粮食除了一部分上交县里之外，剩下的就地储存，镇衙的官吏及护镇兵勇的开支都从这些粮中出，一些小型公益事业或赈济灾民的款项也计在这些粮食上。其实，近二十年来金城镇没闹过什么大的灾荒，也没有什么架桥修路的工程，相当一部分粮食被官吏倒卖，中饱了私囊，即便如此，粮库中的粮食也够几千人熬过冬日。

土生没有和任何人商量，就带着已经饿得不知日了天大大多少回的马牙子进了金城镇城墙内设于一面坡上的镇衙门，这里是座青石建筑，据说自从金朝在这里设镇后就有了它，历朝历代这里都是一镇之主办公理事的地方，虽历经数百年，已经破旧不堪，但高大门楼，倚山而立的三进大院还是余威不散，依然可以说是金城镇内最为气派的建筑。

土生来到那有着两座石狮子的门楼前时，已经有不少四乡三十八村逃荒出来的灾民聚于这里，苦苦哀求镇长开仓放粮，贩济灾民，以让灾民有条活路，但被十几个身穿黄布制服的兵勇用上了刺刀的快枪拦住，不得人内，土生冲着那些亮闪闪的刺刀走去。

“站住，不想活了!你这后生的心口窝是铁块子呀，敢往刺刀上撞?!”为首的兵勇喝斥着。

“你那心口窝装的才是石块块哩，这么多人饿得快咽了气，粮库里的粮食不放贩，放着养老鼠呀!”土生平日里虽少话，可并不畏惧在大庭广众下开口，而且一开口就是硬邦邦的。

“看不出来你这兔息子还恶狠狠的像条狼。这里二十年前宰过条黑狼，你算是什么狼?黄鼠狼吧。”为首的兵勇说完，其他兵勇一同哈哈哈地大笑起来。

土生猛地吸了口气，全身肌肉一绷，两条胳膊同时伸出，推开了两条逼到胸前的快枪，又扛开了两条，几步跃进门楼，高声大叫着:“镇长大人，百姓要见你哩。”喊罢，他又挡开两支伸过来的快枪，冲进了二道院子，镇长就在这院子中的正厅中理事办公。

几个兵勇愣了一下，一个个拉开枪栓，向内追去，但不得不出头的镇长制止了他们，他知道早晚得和这些百姓见上一面，他终究是他们的父母官，他们是他的子民哩。

镇长是个中年男人，穿着一身得体的黑色中山装，戴顶呢子礼帽，手中拄着文明棍，鼻子上架着金丝镜，一副学问人的样子，但眼镜后面那双老鼠般的豆眼又透出了他的狡猾奸诈和为人不善。他上下打量了一下土生，故作客气地问:“这位后生，你可是灾民的代表?”

土生回答:“我不是代表，我只想告诉镇长大人，再不开仓放粮，这四乡三十八村的男女老少怕是要全饿死哩!”

镇长点点头:“你这后生不是代表，敢独身闯进重兵护卫的镇衙，为民请命，勇气可嘉。无奈我身不由己，虽早已体察民情，为数万金城镇灾民忧虑，但粮库却不能打开。”

“为啥哩?”土生气哼哼地问。

镇长对土生的口气颇为不满，但皱了皱眉之后，还是解释道:“偷林府督军给所辖各县各镇发来急令，所有粮库存粮全部充为军炯，以扩展兵丁，收复榆林府失地。谁敢违抗军令，就立即枪毙!我虽有放粮贩灾之心，实无违抗军令的胆量哩。”

“人都成堆地饿死了，还打什么仗?榆林府哪有什么失地，还不是督军想扩大地盘!”土生狠狠地说。

“后生，并非如此，督军爱民如子，河东有人乘我榆林府闹灾之机，过河进犯，杀我陕北父老，淫我榆林府婆姨，督军不得不挺身而出，率兵抵御外侮，你我之辈虽有官民之分，但万不可因小失大，发生内讧，待收复失地之后，督军自会安抚灾民。”镇长讲出一番自以为是的大道理。

土生并不接受:“无非是军阀混战，哪个会管百姓死活。古人云: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希望镇长大人还是看在金城镇父老乡亲的份上，先斩后奏，开仓放粮，以救民于水火之中，全镇父老一定会感恩戴德，铭记镇长大人的恩情的。”土生为了打动镇长，也半文半白地说了起来。

镇长口气严厉了:“后生，冲你这番话，我就可以定你个反督军之罪，不过，本官见你仪表堂堂，不像个刁民，暂且放你一马，下不为例。你出去把我刚才的肺腑之言广为传布，让灾民忍过今冬，一待督军收复失地，必会放赈。督军是在为全榆林府父老雪耻哩!来人，送这后生出去!”镇长说完，扭头而归，他也实在没有更多的理由来安抚灾民了。

六个兵勇用刺刀尖顶住土生的前后左右，一步一步将他逼出了镇衙大门，轰回眼巴巴盼着他带来好消息的灾民中。土生没向灾民们解释什么，他一把拉住瘦得只剩皮包骨头的马牙子，说了声:“走，和这种只会鱼肉乡里的狗官没什么道理可讲哩。”

“他不讲理，咱们也别讲!”马牙子有点气短，说话一喘一喘的，明显是饿的。

“咱那杂货铺是不是还剩点纸品?”土生到没人地方问。

马牙子点点头:“剩不多哩。”

“为啥?’’

“这几天我饿得心慌，吃了些。”

土生从怀里摸出拳头大的半个模:“把这个吃了，长点气力，跟我把剩下的纸品裁成条条，上面写上字，当帖子往外发，听马家大娃说，北京的秀才们搞‘五四’，抗政府就这么干哩!”

“啥‘五四’?咱抗政府?吓人哩!抗政府要杀头，像二十年前的土匪黑狼。”

“杀头也比做饿死鬼强哩，饿死鬼到阴间也只有凉水喝，被杀头的好汉连阎王爷都得天天摆酒席伺候。”

“那咱就让阎王爷伺候吧!”

两个人到房东家还没收回去的杂货铺内，找出剩下的几十张麻纸，裁成条条，又碎了点炭，用水搅成汁汁，土生以指为笔，飞快地写起来:“不做饿死鬼，抢粮养大、养娘、养娃、养婆姨!明日粮仓大开，想活命的拿口袋来!”

一共写了一百多张，天黑以后，两个人分头往灾民手中发，灾民们又一传十，十传百，夜半时分，金城镇四乡三十八村的男女老少都知道了明日粮仓大开的好消息，活下去的欲望使他们连夜往金城镇赶，生怕错过了机会，分不到粮食。

曙光微露，镇长也从手下人那里见到了那字写得还不俗的所谓帖子，背上一下子冒出了冷汗，他一把推开还想搂着他睡回笼觉的姨太太，让人立即到肤郡城去报信，说金城镇灾民闹事，要砸粮库，请求火速派兵镇压，并将金城镇五十多个兵勇全部调往粮库，他亲自坐镇并下令万不得已时可以开枪。

然而，当镇长把几十个兵勇从被窝里吼起来，带着他们来到设于坡顶城墙下有着十几孔窑的粮库时，数千灾民已经将粮库围得水泄不通，四个守库的兵勇不知去向，那三寸多厚的粮库大门连同门框带门楼一同被挤倒了。昨天冲进镇衙的那个高大后生一跃上了窑顶，站在那里嘶吼着:“每人只能装一袋粮，大家都饿哩!”

镇长气急败坏，大声命令着:“擒贼先擒王，给我开枪，开枪，打下那个出头鸟!”

兵勇们纷纷拉开枪栓，举枪向土生瞄准，随即，“砰”的一声，一发子弹从土生头发梢上飞过，又有几发子弹打得土生脚下的黄土乱飞，土生灵活地向后一仰，倒在了窑顶，就在他倒下的那一刹那，十几发子弹鸟群一样尖叫着，飞过了他身体刚才占据过的空间里。土生不容兵勇们退下弹壳，推上第二发子弹，在窑顶上一翻身，悲愤地大喊着:“这些狗日的不让咱庄户人活了，先砸了他们的枪，再慢慢分粮食!”

马牙子在人群中也呼应着:“法不治众，砸狗日的枪，抢狗日的粮，回去楼着婆姨睡热炕，又养大来又养娘。”不知怎的，他在这急乱之中还信口嚷出了一串顺口溜。　　灾民们早就饿得失去了理智，一见有人阻挡他们分粮，已经怒火中烧，见又有人出头，立即一呼百应，回头向镇长和兵勇冲去。后面来的灾民怕晚了分不上粮，也向前压来，几十个兵勇立时像被两股洪水前后夹击的一堵土墙一样，顷刻间土崩瓦解，快枪被抢，人也被踩倒在地。只用了吃口摸的时间，当灾民们再向粮库里挤去时，后面坡上遗留的是断成几截的快枪和像衰蛤蟆一样哇哇叫着满地打滚的兵勇，镇长大人的礼帽飞到了枣树顶的枝条上，金丝眼镜不知去向，整个人如同被钉在了枣树杆上一样，干喘着气，动弹不得。他眼睁睁地看着灾民们扛走一袋袋的黄澄澄的小米和雪白白的面粉。到下午时分，当肤郡城赶来制止灾民闹事的马队冲到金城镇的街上满天炒豆子般放着枪时，粮库里已经空无一人，每孔本来装满了粮食的窑洞像被水洗过一样干干净净，一点粮食碴碴都没剩下，撒落于院中的粮食也让镇子上几个婆姨给扫走了，她们要回家去慢慢地筛。镇长长叹一声:“刁民猛于蝗虫矣。”说罢，他总算从枣树杆上滑落下来，瘫倒于地，原来是他的中山装后襟被挂于树杈上。

金城镇粮库一百多万斤充为军铜的粮食被灾民哄抢的消息很快就报到了榆林府最有权势的督军那里，督军勃然大怒，因为他扩充地盘急需扩充军队，而扩充军队又必须要有充足的粮晌，饿兵会不战自败，这一百多万斤粮食足够他一个旅的人马吃三个月，他当然不会善罢甘休。督军即刻命令肤郡城缉拿砸粮库的首犯，并让灾民送还抢回去的粮食，如一个月内未能复命，肤郡县县长将受军法处置。肤郡县长不敢怠慢，立即将这道死令发至金城镇，只不过将时间改为半个月。

金城镇镇长召来四乡乡长商量对策，几个乡绅都愁眉苦脸，喝闷茶的喝闷茶，抽闷烟的抽闷烟，镇长逼着拿主意，也只是唉声叹气地说:“二十年前此地斩首土匪黑狼，那劣货伏法之前曾仰天长啸，说二十年后吾镇必又出一好汉。此话不幸言中，神不欺我，这该是命中注定之事，吾辈无可奈何。” “那你们就眼睁睁看着我被县府惩处?告诉你们，收不回粮铜，抓不到首犯，你们也都没有好果子吃，我临死也要找几个垫背的!”镇长不再故作斯文状了。

马孝贤咳了一声:“诸位，我看当务之急乃是凑足百万斤粮晌，督军大人发火，无非是为此事，首犯固然要缉拿到案，但抢粮刁民近万数，要从中寻出该人，虽不能与海底捞针相比，但也不是易事，总不能将所有人悉数找来一一审问，且不说古来就法不治众，就是抓来，也没地方关押这些人呀，再说灾荒过甚，将死之人，何事不可做出?以我之见，我四乡乡长先带头拿出库存之粮，再让金城镇大户和三十八村村长相助，好歹先凑出百万之数，以平息督军火气。缉拿首犯则同时进行，派出探子，总能从抢粮灾民中问出个大概模样。周详与否，还望镇长定夺。”

镇长早就没了主意，听得马孝贤一席话，连连点头:“马兄所言极是，请诸位马上报上交粮数目，余额我定让各商号老板补足，好歹先将命赎回。”

其他几个乡长虽有刻却心头肉的感觉，但此事确实有可能危及自身性命，搞不好督军派来人马，血洗金城镇，杀光刁民，也必将殃及大户，兵勇们是不管三七二十一的，见谁抢谁。他们只好忍痛答应。

百万斤粮食总算凑齐，而砸粮库哄抢粮食的首犯土生的画像也被描了出来，马孝贤长叹一声:“此后生乃我马家沟霍家独子，据说二十年前土匪黑狼被斩后一袋烟工夫，此娃降生于世，看来转世投胎之说不谬，此娃身上果有匪气。”

镇长马上派出二十名已经全部换上新枪的兵勇，由马孝贤带领，直奔马家沟，去抓捕土生归案。

土生在那天砸完粮库后，背着几十斤粮食连夜赶回了家。他大问:“生娃，哪里弄来这么好的小米?莫不是当了贼娃子?”

土生摇摇头:“大，你娃啥时候偷过东西?这粮食是抢的，砸了狗日的金城镇的粮库!”

土生大大惊失色:“娃，你、你真当了匪?”

“大，官逼民反，民不得不反，这是古理。没饭吃出了陈胜吴广，没饭吃出了朱元璋，没饭吃出了李闯王。咱现在没饭吃，也不能等着饿死呀!”土生振振有辞。

土生大抱着脑袋蹲到了地上，他实在无话可说。娃的所作所为完全证明了老和尚解签时的预卜:这娃脑后有反骨，必成大匪。土生大鼓足勇气又问了一句:“金城镇砸粮库不是你领的头吧?”

“大，就是我，总得有人领头，我也是为了你和桂桂有饭吃。”

土生大再没有气力抱怨这个从小就桀骜不驯、与众不同的娃了，他只能忧心忡忡地催促着:“娃，你这是犯了杀头的死罪，还不赶快找地方躲起来，咱霍家就你这么根独苗苗了，你要有个好歹，霍家就断了香火哩，唉，桂桂的肚皮也不争气，嫁过来几年都没个动静。咱家以后要想还有个好日子过，一定得给你娶个小。”

也许就是土生大这句话，注定了桂桂日后与土生的离异，也注定了土生还有第二个、第三个女人进人他的个人生活。但此时此刻，站在一边的桂桂来不及为自己的命运担忧，而是为自己心爱的丈夫焦虑万分，她说:“弟啊，我看今夜你就得走，那么多双眼睛看着你，赖不掉哩。快走，走到河东去，到山西地界去，那里这督军管不到。”

土生大这时倒镇静起来，他摇摇头:“黄河边正打仗，枪弹弹不长眼哩。我看，要躲就躲进榆林府，俗话说:“老虎鼻子下面好打吨，当官的都知道你是金城镇马家沟的，都在这边盯着你哩，谁也想不到你会钻进榆林府，那里也没有人认识你，你再找找仲海那娃，他能帮你哩。”

这其实正中土生的心愿，他知道事闹大了，官府不会放过他，而他也不愿在黄土沟沟里钻来钻去，冬日将至，没个草草木木的也难遮身避影，确实不如到榆林府去，督军做梦也不会想到砸粮库的首犯会躲到他眼皮子底下来。至于躲到啥时候，那只能看情形再说了。

说走就走，土生把小米磨成面，桂桂点火蒸了些模出来，将这些模和几件冬天穿的衣服包好，又将手腕上的银镯子退下来，塞进土生的怀里。土生楼住桂桂，亲了她一口说:“姐，我这一走，不知哪年哪月才能回来，你伺候好大，也把自己身子骨保养好。我要在外面混踏实安稳了，就来接你和大出去，离开这山沟沟，我要走了，你再唱首信天游给我听吧，你嗓子好，调调也多。”

桂桂眼里有了泪，硬咽着嗓子唱起来:

山里头刮风起不了那个尘，

心痛哟嗬难去一个人。

黄铜铃铃那个双络缨，

云彩遮住了哟嗬北斗星。

哥哥你要走来妹那个送，

再亲上一口哟嗬你再行。

拉住哥哥袖子坠下了手，

说不下那个日子你不能走……

在这凄婉的民歌声中，土生上了路，他一点都还不知道，这次离开马家沟是他命运的又一次转折点。他走得很茫然，很无奈，像是初冬枯树头上的一片黄叶，无论如何也无法站住脚跟，只能任凭北风吹落下来，飘零至自己都不清楚的地方。在后来独身在外的很长一段时间里，他常后悔离走前的这个夜晚没能和桂桂再亲热一次，这不仅仅是一种生理上的需求，更是一种心理上的慰藉，他觉得，只有这样才是对一个深爱自己的女人的最大安抚。他委实走得太匆忙了。

马孝贤带着兵勇和乡丁顺山沟的小路来到霍家时，自然已是土生走了数日之后，马孝贤对因吃了几日小米面摸而能站得沉稳了些的霍厚厚说: “土生他大，土生是砸粮库的罪魁祸首，是政府缉拿的要犯，咱们虽是乡里乡亲，但现在是讲法律的新政社会，我身为一乡之长自然不能姑息养奸，你也要大义灭亲，讲出土生潜藏之处，或招他回来投案自首，兴许能从宽发落，免得人头落地。”

土生大尽管在儿子面前顿足捶胸，埋怨不休，但如有外人危及儿子时，他则一副袒护儿子的口气: “生娃为民请命，官逼民反，砸了粮库，使四乡三十八村的庄户人家死里逃生，有啥罪过?!”　　马孝贤摇摇头: “土生他大，话不能这么讲，家有家规，国也有国法，陕北闹灾，饥民多达百万之众，若都随便去砸粮库，岂不天下大乱，国将不国。金城镇百万斤粮食已由我们大户人家交足补齐，不再一一讨还，土生的罪责也可减轻些许，但绝无功臣之理。”

从金城镇来的兵勇头目不耐烦地说:“马乡长，对这种尚未开化的刁民有什么道理可讲，子罪父代，先把这老狗日的抓回去顶数，限令他儿子十日内投案换回父命，否则就拿这老东西开刀问罪。”

马孝贤劝阻住兵勇头目:“现时是新政，万不可一人有罪，株连九族，还是晓之以大义，劝土生大寻回儿子。”

然而，没等马孝贤再劝，霍厚厚喝问了一句: “是否真的子罪父代?”

兵勇头目恼羞成怒: “你这老狗日的真想尝尝赴刑场、坐大牢的滋味?好，你有种，老子就成全你，你跟我走!”

霍厚厚仰天长啸一声:“生娃，你好好活着吧，别给霍家丢脸，你大替你顶罪啦!”说罢，他腰一弓，猛地向院中间的老枣树上撞去，脑袋正正地夯在坚实的树干上，霎时鲜血外涌，白白的脑浆也淌了出来，绝不可能再有生还的可能了。

一直缩在一边的桂桂一看，凄厉地惨叫一声: “官府逼死人命啦!” 她扑上去，抱住土生大抽着倒气的身体，不住声地呼喊着: “大!大啊!你老人家怎么这么想不开啊!土生砸粮库抢粮不就是为了不让你饿死吗?你咋就这么去死哩……”

在院门外围观的人们一见土生大惨死于威逼之下，也一个个义愤填膺，尤其是从金城镇粮库扛回粮食的人更是怀着对土生的感恩戴德之情，纷纷吼叫着表示不满，兵勇头目怕又闹出事端，指挥兵勇缩进院内，子弹上膛，准备弹压。

马孝贤并不愿意出现此种结果，他一方面斥责兵勇头目的无理之举，一方面苦口婆心劝阻村民，并表示一定由乡政府出资厚葬霍厚厚。村民们的激愤才逐渐平息下来，兵勇也趁机撤走。马孝贤急急忙忙赶至金城镇，向镇长表示无力再办此案，以免引起乡里众怒。而镇长因已将百万粮食筹齐，可以向偷林府交待了，督军不再强求限日捉拿首犯，也乐得送马孝贤一个面子。于是，兵勇和乡丁们不再条条路上设卡、村村户户搜查了。当然，这并不表示土生的砸粮库之罪被赦免，只是缉拿不那么紧迫罢了。

事隔不久，当土生得知大惨死之事时，居然一声都没有吭，他只是闷头一根接一根地抽着卷烟。从这一天起，他每天都至少抽两包烟，这习惯一直保持到他死前的那一天。

(10)

陕北汉子霍达东终于在官府把他视为土匪之后将自己的名字土生改为了以后叫了五十多年的霍达东。这倒不仅仅是因为他躲避缉捕而必须改换身份、变更名字，主要是他觉得霍达东这个名字更为响亮。但是，他从来都不鄙视自己的本名土生，即便他官居一省之长之后，马家沟的乡亲登门找他，依然叫他生娃时，他也不会觉得是一种不尊重。他能从中领略到官场之外的亲切感，而后更体验到土生这两个字与自己命运的冥冥相关。假如说他到死也还有什么迷信的话，他命不能离土应该是其中之一。

土生离开了马家沟之后，混过了三道关卡才到了榆林府。第一道就在肤郡县城关外，那里军警林立，所有要通过肤郡至米脂、榆林的人，一律要被检查，以防砸粮库的首犯潜逃。土生当然不能硬闯，他就是有三头六臂，也是寡不敌众，就是有猫一样的九条命，也挡不住子弹射中他一百回，他不是来拼命的，而是逃命的，只好等天黑以后再想办法。客栈他不能去住，打着灯笼和火把查夜的兵丁从月亮一升出来就鬼魂似地游荡着，他只有在几间臭烘烘的茅房里藏身。

到了后半夜，他才摸上了路，在离灯火通明的关卡不远的地方滑下了一个大坡，坡下是穿越肤郡县城的一条河，河虽不宽但深可没人，隆冬将至，河水寒冷刺骨，岸边水流缓慢之处，已经结了薄冰，因想不到逃犯会冒着被冻僵的危险泅渡，因而此处防犯稀疏，土生发现这个漏洞，跃入河水，他的目的地榆林府刚好在东面，是顺流而下，所以游出二里多路不算费力，但确实冻得他几乎全身僵硬，险些爬不上岸来。幸亏肤郡一带他比较熟悉，上岸之后，他顶着刺骨的夜风，哆哆嗦嗦地摸进了城外的一家酒馆，向老板谎称自己是个驴贩子，被贼人打劫，扔进水中，虽死里逃生，但已身无分文。老板尚有善心，听他口音又不是外地人，亲不亲一乡人哩，就给他沽了一碗枣酒，烧了盆炭火，让他暖回了身子，烤干了衣服。土生是个知恩报恩之人，后来他寻到机会，让这酒馆老板发了一笔小财，那时他的身份已是肤郡城内一家规模不小的商号的老板。

在酒馆中熬到天明，土生告别了老板，走了出来，肤郡城虽已在身后，但他并没有放松警觉。他不是就此赶路，而是钻进了一条山沟沟，找了个放羊人避雨的土洞洞，爬了进去，整整睡了一天，黄昏时分才醒来，啃了一个干摸，绕开大路，只走沟沟坎坎，继续向米脂城走去。因走夜路，速度缓慢，他第三天后半夜才算到了米脂城下。

他本想一头扎到桂桂娘家去好好歇息一夜，这几天昼伏夜行，风餐露宿确实让他疲备不堪。但是，他远远地就看到了桂桂娘家门口有几个影影绰绰的东西在晃动，他的心缩紧了，贴在墙根，向前凑了凑，仔细看去，原来是手持快枪的士兵。他顿时明白自己已经成为了目

标明确的案犯，为了缉拿他，连他婆姨的娘家都安下了士兵，他只好转身离去，继续落荒而逃。但他知道需要改变一下面貌了，既然他的身份已经暴露，那么他的面貌自然会被描绘成图像，张贴于城门。他稍微思考了一下，便寻到一家骡马店外，越墙而入，进到院内，找到马棚，拔出护身用的匕首，从灰驴、白马、黑骡子尾巴上各割下一些毛，然后又翻墙而出，爬到土坡坡上，挖了个小坑，撒了泡尿，用刀子蘸着尿液刮光了头发，又找了棵松树，在树干上砍上几刀，用淌出的松脂把灰、黑、白的牲口尾巴丝丝枯到了下巴上，羊肚肚毛巾往头上一扎，戴了几年的礼帽扔进山沟沟，羊皮坎肩翻穿在身上，把背一弓，不存细看，真认不出他是个年轻后生，只当他是个老汉哩。凭着这身打扮，天蒙蒙亮时，趁着守城的士兵睡眼惺松，他混过了米脂城。

第三道关卡严格地说并不是防范和缉拿土生的，而是榆林府督军在大灾之年为了防止陕北不多的粮食外运而设立的。一些粮贩子想趁此机会大发一笔，将乡下一些大户人家存粮高价收购，到榆林府卖得更高价格，督军倒不是怕商家发财，而是怕河东山西省的军阀在粮食问题上给他来个釜底抽薪，将这些粮食悄悄搞走，造成榆林府更大的饥荒。因而，凡是粮队，只要不是军队押送的军粮，一律扣押。而土生不明就里，混进了一支有几十头驴的粮队中，以他贩过驴、使唤过牲口的经历，当上了脚夫以为容易过关，不想被士兵们连驴带人一同送进了一个大院内。这大院本是个大户人家的羊圈，墙不高，又因士兵是以扣押牲口和粮食为主，虽然说是缉拿河东来的奸细和粮食贩子，但对人看管并不严。土生受了一场虚惊之后，趁着月黑风高之际跃墙逃走，走时还背上了半口袋白面。他知道这大灾之年半口袋白面的价值。

过了三道关卡之后，又经过一天一夜，土生终于到达了陕北重镇榆林府。这里再没有缉拿远在几百里之外的金城镇砸粮库首犯的迹象，而对一个长着花白胡子、扛着半口袋粮食的老汉更无人关注，他轻车熟路地找到了偷林师范学校，等到下课时分，见到了已经长得周周正正、没有一点农村娃模样的李仲海。

远远地看见身穿翻皮羊毛坎肩、戴着脏乎乎的白羊肚毛巾、留着长胡子、身板却挺直的老汉，李仲海以为是他大怕他没饭吃，来送粮食。陕北闹蝗灾缺吃少喝自然波及到榆林府，榆林街头也常有灾民倒毙，但榆林师范的学生由政府供养，虽伙食明显不如以往，可还不至于饿着肚子。李仲海有点抱怨他大盲目来送粮，那半口袋粮食该留给家人吃哩。然而他走近时却发现这老汉并非他大，他有点疑惑地看着冲他眯眯笑的陌生人。

“海娃，我是土生哩!”土生扔下粮食口袋，冲上去，抓住穿着学生装的李仲海的手。

李仲海愣了一下，哈哈哈地大笑起来:“生娃，你这是演戏吗?还真像个老汉哩。”

土生放低了声音:“海娃，我犯案了，是官府通缉的土匪，想在你这里躲躲。”

见土生不像是开玩笑的样子，李仲海瘦长的脸上也严肃起来:“咋说?”

“闹蝗灾呀，咱家乡饿死人太多了，我领头砸了金城镇的粮库，那粮食被督军充了军炯，灾民们分光了，督军自然放不下，着人四处抓我，我是过了三道关卡才到了你这里。你这里要不能躲，我就得过黄河，上河东去。”

李仲海犹豫了一下，拉住土生:“走，先到我宿舍去坐，慢慢说，你这戏装先别卸，以防万一。”

两个人穿过操场，到了二层建筑的学生宿舍，进了位于一楼的李仲海的房间。这个房间内摆了四张木床、一张方桌和一个依层而放四个脸盆的木架，每张床的床头都摆着一堆书和

一包衣物，显得有点零乱。李仲海给士生倒了一碗水，说:“生娃，你喝水，我出去一下，马上就回来。”

土生点点头，有点心神不定地看着李仲海急匆匆走了出去。他倒不是怕李仲海会去官府告密，对于这个同村的伙伴，他绝对相信他不会出卖和背叛自己，否则他也不会一头扎到这里来了。他是唯恐李仲海没有能力收留自己，终究仲海还是个学生娃，尚没有自立，又怎么能够把一个官府缉拿的要犯安置下来呢?土生决定，若李仲海有为难之处，他绝不勉强，以免牵连他。他将继续东进，逃到山西境内。他摸出进了榆林府后刚买的一盒劣等卷烟，抽出一根，用火柴点燃，抽了起来，在阵阵烟雾中，他觉得无着无落，前途茫然，和这烟雾一样，虚无飘渺，不知所终。

一根烟没有抽完，脚步声传来，但明显不是一个人。土生一惊，拔出了护身用的匕首，并推开了后窗子，准备一跃而出。门开了，进来的是李仲海和马圆，李仲海看到土生一副提防着要拼命的样子，又笑了起来:“生娃，你已经成惊弓之鸟了，草木皆兵。放心，士兵和警察不经校方同意，是从不敢进来的，自古乱兵不扰学堂。”

马圆走过来，拍了拍土生的肩膀，圆胖胖的脸上浮现着亲切的神情，口气温和地说:“生娃，坐下，粮库砸得好，这是农民兄弟自发的对军阀统治的反抗，你不是什么罪犯，而是英雄哩。对英雄，我们当然敬佩，也当然要保护呀，你放心，我们能想出办法来。”

土生斜看了李仲海一眼，他显然不满意他将自己砸粮库的事告诉马圆，虽然马圆是个教书先生，看上去还算和善，可终究是马孝贤的长子，马孝贤那个乡长还是他给弄下来的哩，穷人和富人吃不了一碗饭，百姓和官府穿不了一身衣，没事闲扯扯行，可这有了事就不一定能说到一块了。土生没有吭声，他即使不是对马圆有敌意，也是明显地不信任他。

马圆并没有在意土生的态度，继续说:“仲海，你先让生娃住下，就说是个远亲逃灾到你这里，我这几天找找校方，看校工有没有缺额，让生娃顶上，校方大概会给我这个北大毕业生一点面子。”

土生挤在李仲海的宿舍里还没有住踏实，李仲海的大倒真的从马家沟来到了榆林看儿子，他确实是怕儿饿着，把土生带着砸粮库时抢来的面蒸了几十个红枣摸，带来给自己指望着有朝一日能出人头地、混个一官半职的娃，仲海他大来时土生刚好去了茅房，李仲海见他大解开包袱皮，里面有粘着红枣的白面摸，就问他大:“大，不是闹灾荒哩，哪来的白面?”

他大俯到他耳边，小声回答:“娃，莫声张哩，这是咱村生娃带头砸了金城镇粮库，四乡三十八村的灾民差不离人人有份。生娃像个江湖好汉，就是苦了他大……”

刚好土生在这时从茅厕回来，他耳朵尖，听到了仲海的大说到他大，忙问:“我大他咋的啦?”

仲海他大是个老实巴交的庄户人，不会扯谎，支吾了一下，还是叹了口气吐了实话:“生娃，想不到你躲在这里。你走了没几日，乡长马孝贤就带着城里的兵勇和乡里的乡丁来马家沟抓你，说你是砸粮库首要，是政府重犯。你不在，就要拿你大顶罪。你大性子好烈，就是干脆抵命，一头撞死在你家院子的老枣树上了。咱村的都不满哩，可赤手空拳对不过人家真刀真枪的，苦水只能往肚里咽，马乡长算是个善人，用枣木棺材厚葬了你大。”

土生听罢，本来就优郁的脸上立时更布满了一层阴云，他没有暴跳如雷，也没有哀嚎痛哭，只是蹲下来，拿出用白面模与街头小贩换的香烟，狠狠地抽起来，那模样像是只受困的

恶狼，也像只准备下山的猛虎，看得李仲海的大直吸冷气。

李仲海叮嘱了他大，千万不能把土生在此躲藏的消息透露出去，否则，不仅土生会被缉拿，连他也要担个窝藏罪哩，然后，李仲海没留他大住，就让他大上了回家的路。

李仲海送他大走后，一回到宿舍就瞪大了眼睛，他看到土生正在石板地上吐着口水磨那把匕首，他忙上去阻拦他："生娃，你这是干啥?有同学下课回来撞见了，保险说我收留了盗匪。"

土生用手摸了摸刀刃，觉得够快了，又猛蹭两下，这才把匕首收进怀里，他站起身，端坐到方桌边，一脸阴沉地问李仲海："海娃，这时代还兴不兴一人有罪，株连九族?"

李仲海摇了摇头："现在讲法律哩。"

土生又问："那马孝贤这狗日的咋让我大顶罪，逼死我大?"

李仲海解释着："新观念难实行哩，别说马孝贤，就是榆林的督军还不是想自立山头，不服新政府管辖。"

土生再问："是不是自古就有有仇报仇，有冤报冤，以血还血，以牙还牙之说?"

"有哩。"李仲海搞不清楚土生的目的是什么，只能疑惑地看着他。

土生猛地跳起来，揪住比他矮半头的李仲海问："马孝贤逼死了我大，我宰了马孝贤的大娃，这算不算相互抵了账?"

李仲海一下子大惊失色，拼命挣脱开土生的手掌，头摇得像夜风中的树叶一样："生娃，乱来不得哩!马孝贤是马孝贤，马圆是马圆，马孝贤逼死你大是罪过，可马圆在想办法保护你，是功劳呀，你咋能杀马圆呢?!"

"杀他咋啦?我要逮着机会，连金城镇镇长、肤郡县县长、榆林府督军都敢宰哩!"

"你这样清红皂白不分，不真成了土匪啦!"

"我就是个土匪。咱刚生下来就让归元寺的老和尚摸过顶，说咱命中注定就是个匪!"土生的声音大起来。

李仲海知道不能再和土生争执，否则更会激起他的火气。李仲海放缓和了口吻，拉土生重新坐下说："生娃，你先别急，我大说的不一定真切，等再有人来，咱问清了到底是不是马孝贤逼死你大的再作决断，也免得给别人留下口实。你不知道，马圆跟他大不一样，在整个榆林府都口碑很好哩，学生们没有不尊重马先生的，误杀了他，你可要犯众怒。"

土生又不吭声了，抽起了卷烟。同宿舍的其他学生从图书馆夜读回来，发现屋内像着了火一样一屋子烟气，呛得咳嗽不止，对土生顿时大为不满，还是李仲海连连道歉，才算没讲出赶土生走的话来。

第二天，马圆身着灰色厚棉袍来到了李仲海的宿舍，对独自一人仍在抽烟的土生说："生

娃，闷得慌吧，走，我带你找个去处散散心。”

土生想了想，扔下烟头，站起来，什么话也没说，面无表情地跟在了马圆身后。一出宿舍门，一股寒风直袭土生的脖领子，那风如同蛇一样钻向他的脊背和心口窝。马圆“噢”了一声，将手中拿着的一条毛线编的长围巾绕在了土生的脖子上，土生顿时觉得寒气被挡在外面，他摸着那围巾，本想摘下来扔掉，可看到马圆胖乎乎的脸上那亲近的笑容，不知为什么手就垂了下来。他想，等找到恰当的时机再向马圆发泄心中的怒火吧。

走在校园的路上，所有的学生和老师都向马圆表示出莫大的尊重，从那些人的眼神可以看出，他们绝不会认为马圆是个人世不容的坏东西，土生要杀马圆的冲动无形中被减弱了许多，终究他不是个不明是非的混种。

出了校门之后，马圆雇了一辆小驴车，这种驴车不是拉货而是拉人的，上面拱起了一个篷子，后面封住，前面有块毡帘，遮风避雨，是专为出门人服务的。两个人坐到里面，一点也不觉得拥挤，土生听说有些大户人家不学好的娃还带了女人在这车篷里干坏事。马圆和赶车的讲好价后，招呼土生上车。土生是第一次坐这种东西，不是爬上去，而是上窑顶似地一跃而上，差点把驴车踏翻，赶驴的不满地看了土生一眼嘟哝着:“土蛋蛋，没享过福!”而马圆则笑了起来，夸赞着:“好身手，真有点侠客味道。”说完，他撩起棉袍，抓住扶手爬上来。

驴车一直向北面奔去，出了榆林城，就上了土路，土路不很平坦，木轮驴车有点颠簸，两个人在车厢内摇来晃去，经常相互撞在一起，然而，两个人居然没有说话，似乎都在想着什么心事。土生伸手掀开了毡帘，向外张望了一下，只见小驴车正在向一个土坡坡上爬着，两边全是起伏的沙丘，几乎脱光了树叶的小树在呼啸而来的北风中无助地抖动着身子，时而发出如同呻吟般的细细声响，若不是迎面有十几匹驮着煤炭的骆驼慢悠悠地走来，这里简直就是一片无人之地，苍凉得令人感到死亡的气息。想到死亡，土生越发疑惑马圆带他出来的目的，难道马圆已经知道了他有杀他为父报仇之心，而想找个荒无人迹之处先下手为强?土生放下了毡帘，把手伸进怀中，摸住了匕首的牛角柄，那柄被他的心口窝暖得热乎乎的。车厢内很昏暗，但土生能觉得身边的马圆正用炯炯的目光注视着他，以他习过武的常识，此时绝非动手的好时机。

正在他心神不定之时，赶驴的吃喝了一声:“二位先生，到了。”

土生先钻出了车篷，抬眼一望，只见前面一个大土台上有一座残破不堪的城楼，城楼四周是坍塌了一大半的厚厚的城墙，而如同两支长长的手臂一样，用土堆起来的厚墙向东西两方延伸，一条蜿蜒而至到灰蒙蒙的太阳光芒之中，一条弯弯曲曲爬向了天边的云彩。

马圆也下了车，说:“生娃，这是万里长城，没见过吧?”

土生点点头，他确实没有见过，他只是知道秦始皇修万里长城，知道孟姜女千里寻夫的故事，但他真的还从没有见过万里长城，来过榆林府多次，也不知道偷林府城外这么近的地方就有万里长城。

“走，爬到城楼上去，你就能见到塞外风光了。”马圆说完，自己先走上土堆，然后踩着碎砖烂瓦，上了城楼。

当土生也上来后，马圆指着远近那如黄河波浪一样一层又一层的沙丘感慨万千:“全是沙子，到处都是沙子，当今的中国人就像这些沙子，看着是一堆堆、一片片，可随便一阵风就能吹散他们，要用什么东西凝聚起他们来，他们也可以成为泰山哩!”

土生听不太懂马圆的话，这话本身很浅白，可似乎里面又有什么深奥的东西，土生觉得这个已经是中年人的马家大户的长子确实与他大不太相同哩。

看着土生有点傻乎乎的愣愣地盯着自己，马圆神情严肃了，他转过身，背冲土生，面迎塞外狂烈的风沙说:“生娃，听说你要杀了我给你大报仇，你现在可以下手了，若是你杀了我就可以让庄户人家不挨饿，就可以让你大那样的贫苦老汉都好好活下去，就可以让我大那样的大户人家再不欺侮百姓，我死而无憾哩。生娃，你想想，你要能做到刚才我说的那些，你就拔出你怀里的刀，杀了我!”

土生顿时呆住了，他绝想不到马圆带他到这座残破的长城楼子上来不但不是对他有什么恶意，反而倒是主动授命于他。但是，他已不能不为马圆的铮言所震撼。是啊，杀了马圆能够让灾民再不挨饿吗?能够让大再活过来吗?能够让官府不再欺侮百姓吗?不能，当然不能，何况，李仲海说得不差，若要误杀了马圆，一准会惹起众怒来。他土生砸粮库是为了众人有条生路，他怎么能在事后又去干惹恼众人的事情呢?!

他一下子蹲在了地上，沮丧地抱住了脑袋，再也生不出杀马圆之心，可也一句话说不出来，他只是恼怒李仲海，咋能将自己一气之下的话告诉马圆。

马圆也蹲到他对面，残存的箭垛子挡住些凛冽的风沙，使马圆能够点燃两支香烟，自己叼上一支，递给土生一支。对抽了几口后，马圆说:“生娃，有些事你一下子想不明白，这世界太大了，不公平的事太多了，需要学些道理才行。反动官府说你是土匪，说明你正是干着对人民有好处的进步的事情。但是，你一个人势单力薄，成不了大气候。算了，今天不讲这么多，我真的是想请你游览一下长城，看看塞外风光，还要告诉你，学校已经正式雇用你为校工了。” 土生很想说谢谢二字，但他张不开口，对一个他前几天还想宰了的人现在又说谢谢确实让这个一米八十的汉子有些为难，但他会记住这恩情的，假如这不是欺骗的话。后来，在成为一省之长时，他确实尽可能地报答了马圆的恩情。

马圆一点都不需要土生的感谢，假如他以前对于受苦受难的庄户人就富有同情的话，那么他在北京成为了一个叫李大钊的先生的学生之后，就更从理念上懂得了要扶助被压迫人民就得进行有组织的抗争的道理，而这种组织李大钊正和上海以及南方的一些有识之士进行筹备，并叮嘱他在榆林也注意培养和吸引有共同志向的年轻人加人，尤其是农民子弟，因为农民子弟的抗争性最强。所以，他帮助土生是有目的的，因着这目的，他绝不需要土生感恩，因为若是如此，他反倒会内疚。

沉默了一会儿，马圆又对土生说:“生娃，在学校当工友也需要个正式的名字，而且土生这名字已经上了通缉令，不敢公开用，我看现在你就自己起个名吧，一会儿回学校我就带你登记哩。” 土生张了张嘴，感到这是件比让他扛几百斤重的粮食还艰难的事，于是，他说:“马先生，还是请你给想一个，你有学问哩。”

马圆很爽快，稍微想了一下:“我看就叫霍达东吧，通过努力，达到东方的理想社会，叫着响亮，又有意义。”

土生没有反对，从此，他就成为了霍达东，不论是他被称为红匪，还是称为省长的几十年间，他这个陕北汉子都叫霍达东。

(11)

陕北汉子霍达东在榆林师范学校当了三年校工之后，成为了中国共产邪党的一名邪党员，发展他人邪党的自然是他一直称为马先生的他的仇敌马孝贤的长子马圆。马圆算不上是中国共产邪党的创始人，但却可以说是这个后来统治了世界人口最多的国家的政邪党的早期邪党员之一。和霍达东一同加入中国共产邪党的还有他的同年伙伴李仲海，李仲海此时的身份是一所为工农扫盲的夜校的校长。

霍达东在加入共产邪党之前，曾经问过马圆:“马先生，共产邪党是不是像李闯王那样，为百姓杀贪官，百姓种地不纳粮?”

马圆点点头:“有这层意思，但还不是全部，共产邪党不仅仅要解放农民，还要解放工人，解放一切受剥削、受压迫的人民，建立一个由人民当家做主的新社会，到那时也要有政府，但这个政府是人民选出来的，是为广大人民做事情的。”

“这样的邪党，咱抢着人哩。”

马圆严峻起来:“不是想人就能人的，人了共产邪党就要为这个邪党‘做事情，更要有为共产主义流血牺牲的准备。”

霍达东身子挺得直直的:“马先生，只要是我认准了的事，一百头驴也甭想拉回过身去，我不怕死哩，怕死我也不敢去砸粮库了，只要真的是为贫苦百姓做事，砍头就当风吹帽，二十年后又是一条好汉，还是搞共产，共那些狗日的产。”他本想说共马孝贤那些狗日的产，但想起终究马圆是马孝贤的长子，还是把马孝贤这三个字吞下肚去。

在一个学生们都放了假的夜晚，马圆把霍达东和李仲海叫到了自己住的一个小院内，为他们举行了人邪党仪式。

这小院离师范学校不是很远，院墙内一座孤零零的二层小楼，楼下三间是客厅、厨房和女佣住的房间，楼上是书房、卧室和孩子住的房间。这本来应该是一个很温馨的小家，但来过此处的霍达东从没有见过马圆的婆姨和孩子，只是在客厅中见到挂在墙上的一幅全家福，上面有身穿长袍的马圆和一个清清秀秀的女子，他们中间坐着一个乖巧的女娃，他听李仲海说过，马圆的婆姨是北京一个大户人家的千金，本来关系尚好，但后来不愿意和马圆一同到陕北这块荒蛮之地来受罪，就留在了娘家，除了马圆进京去办事与她相聚，他们再没有什么机会见面。听了这些，霍达东对于自己因官府没有解除对他的通缉而长时间不能和桂桂相聚的哀伤多少减弱了些，他不是不欢喜桂桂，而是被逼无奈哩。

马圆家的女佣是个米脂女娃，长相普普通通，可细皮嫩肉的，还是有些中看之处，嘴巴甜甜的，逢人不叫哥就叫伯，做起事来也伶伶俐俐，穿戴也很整齐，不像是个女佣，倒像是个待字闺中的小家碧玉。见主人带着两个陌生的后生进门，赶快倒茶搬座，然后站在一旁，虽然脑袋微垂，可眉眼就没有低下，而是把水灵灵、亮晶晶的眼睛看着李仲海，明显地她欢喜李仲海哩。

喝了几口茶，马.圆让这个叫兰兰的女娃在楼下守着，别让外人进来，带着两个后生上了楼，在书房内站好，他从书橱后面摸出一面红旗，红旗上有用黄纸剪好贴上去的镰刀斧头的图案，他把红旗挂到墙上，郑重地说:“这是咱们中国共产邪党的邪党旗，红颜色，表示咱们的一腔热血将洒在中国大地上，让中国变成红颜色，镰刀代表农民，斧头代表工人，咱们的邪党是由工人农民组成，为全体劳动人民战斗，你们在这旗子下宣了誓，就是正式邪党员了。”

霍达东有点激动:“咱不光用嘴发誓，咱还要滴血盟誓，让自己的血抹到这旗子上去。”说着，他拔出匕首，就要割破手指。

马圆劝阻住:“达东，共产邪党不是绿林好汉，不兴来这一套。你对邪党旗表示的是赤

子之心，以后邪党需要之时，你再献出鲜血和生命!”

霍达东有点窘迫地点点头，按照马圆的姿势，和李仲海一同举起了右拳。宣誓之后，马圆拿着一本黄纸印成的小册子，封面上写着:《共产邪党宣言》。他说:“达东，这本书你要好好看看，所有的道理都写在上面了，你别急，我知道你认字还不多，我已经和校方讲好了，以后你只白天上工，晚上去仲海的夜校学习文化，一个民族没有文化要受外族欺负，一个人没有文化也干不成大事哩，你必须尽快掌握一些基本的文化知识，邪党需要你做更多的工作呢。”

从第二天起，霍达东在师范学校收工之后，匆匆吃过夜饭，就跑到二里路之外一所借用小学教室开办的夜校去上课了。这所夜校是专为工人农民开办的，学习文化知识为主，同时还宣讲一些革命道理，更关键的是马圆让李仲海在这里注意发现那些可以被邪党所吸收的积极分子，以扩大邪党的队伍，霍达东来上学也兼有此项任务。夜校分为初级班和高级班，初级班的学员全部是文盲，高级班的学员则是已经认识了一些字的人，来上夜校的人一律免费，所需费用是马圆出面从榆林的一些士绅和大户人家募捐而来的。当时教育救国的口号颇为时兴，捐钱办教育是一种很荣耀的善举，再加上马圆被认为是榆林多年来少有的才子，因而筹集一些办学经费尚不算困难。

霍达东坐进小学生的课桌后面时，颇有一种不自在的感觉，好像是一条牧羊犬被塞进了鸡窝，想挪动一下身子都会挤翻后面的桌子，想伸伸膝盖又会顶起前面的桌子，因而他只能一动不动，似乎比他上私塾时还老实，乖得像个女娃。给他这个班上课的是一个叫李秋枫的年轻女老师，看到班上新来了个大个子学生如同上刑似地被束缚在小课桌里，一下子笑起来，笑得霍达东满脸涨红，嘟嘟峨味地说:“有啥好笑哩，挤着点不怕，能学文化就行哩。”

说着，他抬起了头，于是，他觉得眼前亮了一下。教室里挂着的是电灯，这电灯比马家沟的油灯和蜡烛不知亮多少倍，有如月亮和星星，他初到榆林时，曾被电灯深深吸引过，一个玻璃蛋蛋连上根绳子就能发光，他觉得不可思议。于是他咬咬牙，花一个大洋也买了个电灯泡，拴上根绳子，吊起来，等着晚上照亮，可别人的灯泡亮，他的照样黑，他很气愤，认为商号伙计欺负庄户人，卖给他假货。后来才从李仲海那里得知那绳子是外面包着胶皮的铜钱，接到发电机上灯泡才会亮。这也是他觉得要学文化的原因，在看到将要教他文化的女教师的最初一刻，他竟然觉得这女教师比电灯还夺目，电灯要是月亮的话，那女教师就是太阳了。

霍达东不得不承认，他活到二十四岁，还从没有见到过这么俊俏的女人。这女人穿的是当时流行的学生装，白色的斜襟上衣，由于卡腰，而使得胸脯尖尖挺挺，像是要跃出衣服，下面那条黑绸裙子遮过膝盖，白色长袜裹着两条又圆又直、不粗不细的小腿，她留着齐肩的短发，黑黑亮亮的头发，衬出瓜子脸的白白嫩嫩，那双杏核眼里流淌的是清澈而又热情的光芒，不似庄户人家的女人那般羞涩，也不似城里一些常抛头露面的女人那般放肆，而是大方中透着纯真，热情中有着善良，她的眉毛不经修饰就如柳叶般细细弯弯，她的鼻子小巧而挺直，她的嘴唇嫩红得如同盛开的山丹丹花，她笑起来声音脆得好似山雀雀。严格地说，霍达东只在偷林城戏院门口贴着的画上见过这么漂亮的女子，可那画是假的，眼前这人可是真的。作为一个生理和心理都很正常的后生，他确实闪过一丝念头:这女人若是自己的婆姨那该是多好呀，是他一生一世享不完的福份哩!但这念头稍纵即逝，他有着桂桂哩，尽管几年未见，他相信桂桂会苦苦地等着他，桂桂是个好婆姨哩，人长得也不差，关键是心眼实诚，对人知冷知热。他曾想托人给桂桂带个信儿，让桂桂来榆林城相会。可李仲海坚决阻止，说万一官府还放着眼线，顺藤摸瓜，不仅霍达东会被缉拿惨遭不幸，李仲海和马先生也会被牵连人牢。因此，霍达东只能做梦时与桂桂会上一会。

沾过女人而又长期过着和尚般克忍七情六欲的日子对一个精力旺盛的汉子来说是很难

熬的。因而，当霍达东看到一个漂亮女子而产生了瞬间的想人非非并没有什么奇怪。他很快就平静下来，认真地听这个叫李秋枫的俏女子讲古代名将岳飞的词《满江红》和以前被称为老毛子而这时叫苏联的农民当家做主成立集体农庄的故事。此时，霍达东绝没有想到李秋枫在他的命运中所能产生的强烈影响，尤其是他当了省长以后。假如他要能预卜未来，他一准会远离这个女人。

夜校下课之后，李仲海走进教室，向李秋枫和霍达东相互介绍:“达东，这是李秋枫老师，榆林府商会副会长李子仁的千金，从师范毕业后回来，主动要求教你们这些‘大’学生的。秋枫，这是霍达东，我儿时的伙伴，聪明过人，你可别教着教着就捉襟见肘了。”

李秋枫大方地向霍达东伸出手来，霍达东有点拘谨，除了桂桂的手之外，他还没有摸过别的女人的手哩，但他还是把手递过去，握了一下，而这一握，立刻使李秋枫的脸上产生了痛苦的表情，咧开嘴吸着冷气。李仲海捶了霍达东一拳:“达东，这不是握锄头把子哩，走，今天晚上我请客，去城关老杨家吃羊杂碎。”

三个人说说笑笑地走出了夜校，沿着青石板铺成的街道，向城关走去。初秋的夜晚，榆林城内显出古边关的繁华，街道两边的店铺大都还灯火通明，尤其是饭馆、酒楼、小吃摊更是熙熙攘攘，人来人往，戏楼内传出秦腔的高昂唱调，妓院内在淫声浪语中居然夹杂有古筝和琵琶的弹奏，小驴车和轿子不停地把穿着长袍马褂和时髦衣裙的达官贵妇送来接去，喝醉了酒的兵痞在烟摊上拿了烟不给钱，和卖烟的老汉相互争执，瞎眼的女娃蹲在路边乞讨着，不时地唱几句信天游以引起人们的注意，有夜行的驼队招摇过市，驼铃一路响着，消失在灯火闪烁的远方。

在城门楼外，泥泞的路边全是低矮的土坯建筑，这里几乎没有电灯，但却不觉黑暗，因为每家伸出很长的屋檐下都挂着几盏亮闪闪的马灯，马灯下，是一排排炉火，有烤羊肉串的，有炒羊蹄筋的，有煮羊肉泡摸的，有炖羊杂碎的，一串串香味弥漫住城门楼下一块不小的空间。这里是普通人的天下。

李仲海把霍达东、李秋枫带进挂着一块陈旧木匾的土棚内，木匾上写着三个行书大字:老杨家。一个扎着围裙、扣顶小白帽的白脸汉子亲热地安排他们坐下，跟李仲海很熟悉地问着:“先生请客?是不是还来羊杂碎?”

李仲海挥挥手:“一人一碗羊杂碎，多放辣子，再来一盘五香酱牛肉，一小壶枣子酒。”“行哩，三位好坐，马上就来。”白脸汉子风风火火地去张罗酒菜了，半根烟工夫，三大碗热气腾腾的羊杂碎、一大盘切得薄如纸片的酱牛肉和一壶有着红枣清香的枣酒端了上来，摆到三个人面前。

李秋枫笑着问:“李校长，看来你是这里的常客了。”

李仲海眼睛眨都不眨地看着在马灯映照下显得更秀丽清纯的李秋枫，有点炫耀地回答:“常客也说不上，高兴了就来坐坐，改善一下单身汉的伙食。别看这老杨家门面破旧，名声可不小哩。据说这木匾是当年虎门烧鸦片的林则徐被贬去新疆途中路过这里吃了羊杂碎后给题写的，这煮羊杂碎的汤已经有四百年之久了。”

李秋枫不相信地摇摇头:“吹牛，一锅汤熬一天就干了。”

李仲海大笑起来:“你真是个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小姐哩，人家不会每天往里面加水吗?哪里会熬干。”

“每天加水还算什么百年老汤?”李秋枫认真起来。

李仲海说:“这只是一种说法。”

霍达东没有参与两个人娃娃似的争执，他只是大口吃羊杂碎，小口喝着枣子酒。他不善于和女人打交道，尤其是这大户人家的小姐，他总觉得她们有些盛气凌人，与他格格不人。尽管李秋枫的美丽曾使他眼睛一亮，但那只是感官上的反应罢了，他在心理上还远远不能与她接近，他之所以能坐到她身边与她同桌吃饭，一是因为李仲海请客，另一是因为她是他的老师，他可以不喜欢这个女人，但他不能不尊敬他的老师哩。

李仲海并没有在意霍达东的沉默寡言，在他的感觉中，霍达东从小就是个不爱多说话的娃，他只是不停地和李秋枫说笑着，一会儿表现自己的知识，一会儿表达着自己的宏大志向，一会儿慷慨激昂地念上一首古词，一会儿温情脉脉地为李秋枫夹上一块牛肉。倒是李秋枫觉得冷落了霍达东，不时侧头向他问上几句话，霍达东虽没有受宠若惊的感受，可觉得她不愧是教书先生，不似他想象的大户人家的千金那么傲慢冷漠，挺通情达理的。

一顿饭吃了一个多时辰，结账走出老杨家的小土棚时，夜已经凉下来，塞北的风越过苍凉的沙丘和长城，吹了过来，马灯摇曳着，人影晃动，更觉有些寒意。李仲海脱下上衣，很关切地为双手抱住胸口的李秋枫披上，李秋枫感激地看了李仲海一眼，凑得离他近了些，似乎是想从他那里获得更多的暖意。李仲海自豪地挺起胸膛，仗着酒精在血掖中流动，用不很宽大的身躯为李秋枫挡住风寒。霍达东看得出来，李仲海欢喜上这个女子哩。

霍达东是自己走回师范学校的。李仲海叫了辆小驴车去送李秋枫回家，霍达东想着他们一男一女挤在那黑洞洞的小篷子里，他的身体的某个部分就在发热，他用凉水擦拭了一下，在学校后面专为校工盖的简陋土房内的木床上躺下，准备在睡梦中与桂桂相聚。几年来，他常在梦中来到桂桂身边，和她说笑。和她亲热，亲她的眉眼，亲她的奶子，亲她软软的心口窝，亲她圆圆的肩膀头，然后和她不知疲累地干人们所说的男女间的好事，他舒服得上了天，醒来时身子乏乏的，腿间湿湿的，久久地不想起身，觉得好像还躺在桂桂那有着微微弹性的胸脯上，没有婆姨的胸脯，睡得真不安稳哩。

他的房门被推开了，一个人影印在门框上，他一下子拉开了灯，看见了满脸通红、眼睛闪动着光芒、嘴里喷着酒气的李仲海行动不稳地走了进来。

“仲海，你咋不回去睡觉?我还以为有贼娃子闯进来了呢。”霍达东抱怨地说着，翻身起了床，干脆走到外面，在阴影处去撒尿。迎着夜风站了一下，浑身打个激凌，起了片鸡皮疙瘩，他又回到屋里，看着李仲海坐在唯一的一条木凳上，奇怪他为什么不回自己在街上租的房子里去睡觉。自打他毕业后到夜校去当校长，就很少来这校工宿舍了。

“给我根烟抽。”李仲海向霍达东伸出手。

“咋哩，你平时不抽烟?”霍达东一边递给李仲海烟一边问。

“高兴哩，我一高兴就想抽根烟。”

“有啥可高兴的?”霍达东坐在床沿上，也对抽起来。

“你看不出来?”

霍达东摇摇头。

“秋枫欢喜我哩，她对我有意哩!”李仲海终于忍不住一下子跳起来，扑到霍达东的床上又翻又滚又折跟斗，直到这张并不结实的木床一下子弄坍塌下来，把他摔到地上为止，他在地上还打了两个滚，才算坐起了身子。

霍达东禁不住问:“你欢喜那女子?”

李仲海把头点得像鸡啄米:“欢喜!欢喜!按我们知识分子的话，这叫爱情，浪漫的、圣洁的、高贵的爱情。生娃，你不知道，我从一见到秋枫就爱上了她，想和她亲近，想娶她做婆姨，为了她，我睡不着觉，吃不香饭，心里总是痒痒的，就像咱们小时候看着马孝贤办的学堂想进去那么迫切。多亏了你来上夜校，以往我请她总被回绝哩，今天你算搭了个桥，我俩中间那层纸算是捅破了，我的好生娃，我的好弟哩!”

霍达东不以为然:“一搭吃顿饭就算她欢喜你了?”

李仲海不高兴了:“咋不是?你没见我给她披衣服挡寒气时她那眼神，你也不知道坐小驴车时她靠我靠得多紧，一个女娃子家不是欢喜上一个男人会这样?她又不是个交际花。”

“可你别忘了你是个土蛋蛋，人家是大户人家的千金，乌鸦和凤凰飞不进一个窝哩。”霍达东给李仲海泼着冷水。

李仲海终于发怒了:“霍达东，亏你还是个共产邪党员!咱共产邪党就是要消灭不平等的社会制度，也要打破人的等级观念，在爱情婚姻上更要破除门第思想，庄户人家咋的啦，照样有大作为哩。现在不就是我当校长，她是教员吗?她对我没一点嫌哩!”

霍达东又点上一根烟，喷了几口烟雾，悻悻地说:“这事和共产邪党咋扯到一块哩。你找婆姨是好事，我为你高兴，我只是觉得找般配点的好。”他凑到李仲海身边，放低了些声音继续说着，“仲海，我倒觉得马先生家使的那丫环兰兰对你有意哩，你要能娶上兰兰做婆姨，怕是当真能享福，娶婆姨可不是当画供着，得伺候丈夫过日子哩，共产邪党是不是也要过日子?” “唉，生娃，你这农民习气得好好改造，张口闭口过日子，咋办得成大事业，推翻一个旧制度，兴许是半辈子、一辈子的事呢。”

“那更要有个靠心的人陪伴着才行。”

“首先要志同道合，谈得拢，说得来。兰兰懂啥，秋枫可是个要求进步的青年，马先生让我积极培养她呢。”

霍达东的脸阴沉了:“马先生不是说共产邪党是劳苦大众的先锋组织吗?咋先培养大户人家的千金呢?”

“你这是左倾观念，算了，不说啦，睡觉吧。”李仲海弯腰扶起塌了的床，捣鼓半天拼不到一起，还是霍达东拉过木凳，才算把床板先支了起来，两个人挤在了一张床上。

这次争执，也许并不标志着他们就注定在今后的岁月中总是同一战壕内的敌手，更不是预示着在他们晚年之间就必然地要以决裂而告终他们的关系。性格的发展和社会的变迁相生相克，假如他们都依然将命运固守在马家沟的土地上，那可能他们终身都会是好友，即便退一步说，他们一个保持着校长的身份，一个保持着校工的身份，也会使他们永远相互尊重并维系住兄弟之谊。但是，历史可以推断，人和人之间的关系的变化却难以卜测，尤其这中间还夹杂上了女人，一个女人的一句话委实可以改变很多东西，尽管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大部分女人都是在为男人而活着。

李仲海和霍达东之间的不快很快就烟消云散了，作为霍达东，甚至根本没有觉得这是一种不快，因为他既不是出于醋意而生出嫉妒，也不是为了维护共产邪党的原则而制止李仲海与资产阶级小姐来往，他无非是对儿时朋友的一种善意规劝而已。至于李仲海，既然他认定霍达东不懂得新时代青年的爱情观，也就不会过多计较那些听起来不太舒服的劝告了，何况，很快他就陷入了失恋的痛苦中。

深秋时节一个星期天，马圆请霍达东去他家吃饭。在榆林当校工的几年时间里，霍达东

常到马先生家吃饭，已经习以为常了，因而也无需客气，换上件干净衣服，就跟着来叫他的马圆家的女佣兰兰走出了学校。马圆家离学校不远，他们没有乘坐小驴车，其实就是路远，霍达东也不会掏钱坐那东西。倒不是他舍不得花钱，只是觉得没有必要。

没走几步路，他和兰兰就到了马圆的家，马圆家院子里摆上了十几盆菊花，虽没有什么浓郁的香气，可白花、黄花开得正艳，点缀得小院一派生机勃勃的景象。兰兰告诉霍达东:“都是我养的，马先生可喜欢菊花哩。”

客厅里，马圆、李仲海和一个身穿深色学生装的后生正在品茗笑谈，一见霍达东进来，都站起身，马圆指着那后生问霍达东:“达东，这个人你应该认识吧?”

那后生笑着说:“生娃，我带几个同学在我家水库里游泳，你把闸门砸开放水浇地，搞得我们在浸不了身子的水里边爬，不会忘了吧?我大差点找你算账，还是被我给拦住了。”

其实霍达东一走进客厅的门就认出了那后生是马圆的同父异母弟弟、马家沟大户马孝贤的二子马方。马方和他哥马圆长得几乎毫无相像之处，马圆身材矮胖，面孔方中见圆，神情沉稳，不大的眼睛中总有一种对一切都在思索的目光，而马方则身材瘦高，比霍达东矮不了多少，相貌清秀，肤色比他哥白了许多，眼中闪动着青春的活力和热情的光芒。和马方相比，霍达东显得有些老气横秋了，尽管他们年龄几乎相仿，不过，霍达东并没有什么自卑，他认为这就是有钱人家孩子和贫困人家孩子的差别。有钱人家的娃心中无忧，自然活得轻松，贫苦人家的娃当家太早，肩上担子重哩。

霍达东点点头:“咋不认识方娃，听说你到西安上学去了。”

马方握住霍达东的手，亲热地说:“毕业了，听我哥的话，也回来教书，教育救国哩，咱们国家落后，就是文盲太多。”

霍达东已经不是几年前的农民娃了，但他依然看不惯马方有着似乎是天生优越感的大口大气，他不冷不热地说:“官府里的人都不是文盲，咋不见他们救国，只会欺压百姓哩。”

马方有点尴尬，马圆赶快插上话来:“今天不谈国事，只叙同乡的情谊，一会儿秋枫也来，你们都是年轻人，以后有的是争执哩。”

李仲海一听李秋枫要来，悄悄站起来，招呼兰兰走到院里，说:“兰兰，这花是你养的，我摘几朵行不行?”

兰兰眼中一下子闪出潮湿的光芒，嘴唇有点颤抖地问:“李……李先生，你欢喜我养的这些菊花?”

“欢喜哩。”李仲海能感觉到兰兰突然散发出的热气烘烤着他，他避开她那情不自禁盯住他的目光，但因有求于人，还是点头称是，实际上他也确实喜欢这些花朵。

，’b 肠我给你摘，你走时我再送你一个陶罐罐，把花枝子用水泡着，能活到降雪哩。”兰兰一边说，一边把那些开得正艳的花朵连枝折下来，一会就折了一大把，递到李仲海手中。李仲海接花时，无意中碰到了兰兰的手指，兰兰立刻脸上布满红晕，把头垂到了胸脯上。

李仲海刚刚接过菊花，一个脆生生的声音就在院门口响了起来:“哎呀，这么美的菊花，真是我花开后百花杀哩。”随着声音，白衣白裙、扎着红色头带的李秋枫走了进来。

李仲海立刻眼中生辉，满面笑容地迎了上去，温情脉脉地说:“秋枫，你喜欢菊花?给，

献给你，就怕花在你怀里被你羞得没有了颜色哩。”

李秋枫慎怒着:“仲海，你开我的玩笑!”但她还是欣喜地接过了一大把菊花。

兰兰一看李仲海把菊花献给了李秋枫，而且更看到了李仲海凝视李秋枫时那情意绵绵的目光，神情立时黯淡了，她眼中几乎涌出泪花，快步冲进了厨房，似乎是去做饭，其实是去抽泣了。

马圆、马方、霍达东一同走到客厅门口迎接李秋枫，李仲海向人们赞叹着:“秋枫今天穿上白衣白裙，就像冬日的腊梅，也像是皎洁的月亮，更如洁白雪花飘飘降临，还……”他停住了嘴，因为他看到了李秋枫异样的神态，于是他的神态也产生了剧烈的变化，如同万里晴空突然之间就乌云翻滚起来。

自打马方一出现在客厅门口，李秋枫就愣住了，继而，她怀中的菊花就纷纷落地。随着马方微笑着一步步向她走近，她不相信似的向后退着，终于，她向前一跃，一直子扑了上去，发脾气似地捶打着马方:“你怎么不给人家来封信?你回来怎么不告诉我?你真像个幽灵，一下子就现身哩!你……”李秋枫喜极而泣，居然伏在马方的肩头淌起了眼泪。谁都可以看明白，这个不速之客马方才是李秋枫的意中人，是他在牵动着这个美丽少女的心。

李仲海的心像是被针扎了一样剧疼起来，他的脸惨白了，双腿如同灌满了铅，而胸口则像压上了沉重的石块，他顿时理解了刚才他送花给李秋枫时兰兰的神态和心情，尽管那一刻他根本没在意她，而他也顿时对刚刚还在友好相待的马方产生出了深深的妒意，这妒中自然还有一丝恨。当他再看到霍达东对他投来的不能说没有几分嘲弄和几分怜悯的目光时，他几乎要冲动地喊叫起来，更几乎要扑上去拉开李秋枫，将她深深地揽于自己的怀抱之中。可是，他一动也没有动，他没有这个勇气。

有人在院外高唤马先生，马圆让他进来，原来是榆林最好的一家饭馆的伙计提着箱式大饭盒来送菜，这才使院内的空气稍微和缓了一些。在马圆的招呼下，几个人先后进了餐厅，坐下来，看着伙计将卤牛肉、酱驴肉、烤羊肉、炖野鸡、羊杂碎汤和几样时鲜蔬菜一一摆上了桌，最后又拿出一罐枣子酒和一瓶山西杏花村产的竹叶青酒。

“来，为马方接风，希望今后你们不要只把他当成我弟弟，而把他当成我们的朋友来对待，这第一杯酒干下去。”马圆示意兰兰给几个人倒酒。

兰兰眼睛微红，悄悄侧眼看李仲海时有点幸灾乐祸，但目光深处则又燃起了一些希望的火焰。而李仲海对这神情视而不见，他不但干了第一杯酒，而且闷声不响地一连干了三杯，一扫他往常见人话就特别多、特别活跃的性格。霍达东从来没有碰到过这种情况，他自然更是不知说什么好，只能喝酒、吃菜。

饭后，李仲海借口晚上夜校有活动要先去准备一下就走了。霍达东觉得和马方没有什么更多的话可说，而且他觉得要去安慰一下李仲海，他终归是自己儿时的伙伴，现在又都是共产邪党偷林支部的战友，不忍心他像遭了霜打的庄稼苗似的，于是也告辞而去。马圆保持着午饭后休息的习惯，上楼去睡，兰兰收拾完碗筷就溜出了屋，客厅里只剩下马方和李秋枫，他们在尽情地倾吐着分别后的情思。

霍达东匆匆找到了李仲海住的地方，那是离夜校不太远的一条小巷内的小院。院里有三间正房，是房东孤老太太住的，两间厢房租给了李仲海。李仲海将两间房子布置成卧室和书房，虽因没有女人拾掇而显得零乱，但也因没有女人而格外清静。霍达东走进院门，到了厢房前刚想推门而入，忽然听到了紧闭的门内有女人带着哭泣的说话声，他站住了。

那声音是兰兰发出的:“李……李先生，马先生的弟上学时就和秋枫姐好哩，他给马先生来信总问秋枫姐，还给她捎照片，秋枫姐也常来找马先生问他弟的事，我都知道哩。有一次秋枫姐的大还来找过马先生谈他们的婚事哩，李先生，秋枫姐她欢喜的是马先生的弟哩，你你.。…,，

李仲海还在懊恼之中，他问:“兰兰，你就是跑来告诉我这个?那谢谢你了。”

“我……我还有事，我……我想叫你……叫你哥哩，我想、想做你婆姨哩。”兰兰一定是鼓足了最大勇气才说出这话的，她是个胆大的女子哩。屋里什么东西摔倒了，一定是兰兰往李仲海怀里扑时碰倒了什么，或是李仲海躲闪时碰倒了什么。

“不行，不行哩，你是马先生的丫环，我是马先生的学生，不行哩!”李仲海的声音慌乱了。

“咋不行，你们不是总讲人和人平等，讲女人解放吗?我现在就解放，马先生保险同意。哥哩，你带我走，我跟你到哪哒去都行!”兰兰的口气坚定极了。

“不行，不行哩!这事要两厢情愿!”

“那秋枫姐不情愿，你咋像驴贩子追驴似的不放手。哥，我也不差哩，就是识字不多，你日后教我嘛……”

霍达东微微叹了口气，不想听下去，也不想再去安慰李仲海了，他觉得兰兰这么大胆的女子一定会最终让李仲海动心的。他要是没有桂桂，保险会要兰兰。他实在解不开，李仲海一个大男人，在女人身上花费那么多心思干什么?有个知冷知热、能传宗接代、相貌也不差的女人当婆姨就行了，邪党的事情还多着哩，一天当两天用都不够，女人千万甭看得太重。像来一样，他又悄悄去了。

李仲海最终还是打发走了哭哭啼啼的兰兰，当李秋枫一印人他脑海之后，世界上其他的女子再也不可能在他心目中占据什么位置了。不过，兰兰倒是给了他点启发，那就是走。他不能天天看着李秋枫和马方亲热，那会像刀子一样刻碎他的心，也会使他根本不可能安心于邪党交给他的工作。晚上，夜校下课后，他拦住了匆匆要走的李秋枫，问:“秋枫，马方一直是你的意中人?”

李秋枫羞涩地点点头。

“那你为啥对我也很亲热，好像很欢喜我似的。”他又问。

李秋枫一愣，随即笑了，她闪动着明亮的大眼睛，纯真地说:“我是把你当老师和兄长一样敬重哩。” “那你不会……不会爱上我?”

李秋枫摇摇头:“有马方在，我谁也不会爱上。”

李仲海变得冷静起来，他点点头:“我明白了，你走吧，马方一定在门口等你哩。”

“再见!”李秋枫小鸟一样飞向了学校门口，马方果然正站在那里，他们立刻拉着手走向黑暗笼罩的石板路，远远地还传来李秋枫天真可爱的笑声。

三天之后，李仲海向马圆提出了要到广州去的请求，刚好共产邪党的中央也指示榆林支部派一个人去广州学习，以迎接革命高潮的到来。作为榆林支部的负责人之一，马圆考虑到了几个年轻人之间的复杂关系，于是推翻了本要派霍达东去的想法，同意了李仲海的要求。李仲海走前，马圆又请几个年轻人吃了顿饭，并且请照相馆的摄影师来家里照了一张合影，这张合影他们几个人一直保存着，它留给他们的是日后无限的回忆和感慨。

(12)

陕北汉子霍达东终于和婆姨桂桂在肤郡城里见了面。他觉得这是必然的，只要自己不死，只要桂桂还活着，他们就一定会到一起哩，长期分开，叫什么夫妻，连同林鸟都不如，因而，当见到桂桂时，他既没有兴奋不已，也没有热泪盈眶。

他到肤郡城是他离开夜校、成为中共榆林支部的交通联络员之后。他在夜校整整学习了一年，毕业的时候，马圆又带他到了榆林城外面的废长城，这时他已经知道了那座残破的城楼叫镇北台。

站在镇北台上，马圆说:“达东，我们邪党现在已经度过了开创期的最艰难时期，就像小马驹已经可以站立起来撒欢了一样，我们也要开始我们的征程了。咱们邪党和孙中山先生创立的国民党已经达成了合作协议，毛润之同志和周恩来同志都进人到国民革命政府和国民革命军中，革命军准备大举北伐，消灭北方这些军伐和反动派。所以，咱们也要开展活动，以配合北伐的开始。这几年，你先是躲避督军的缉拿，加人组织后，为了提高你的文化水平和工作能力，让你进了夜校学习，现在，到了发挥你作用的时候了。”

霍达东有点急切地问:“马先生，这几年真是憋得慌哩，你说，是砸愉林府的粮库还是抢督军的枪，只要是邪党的指示，拼着命也干他个天翻地覆，让咱们黄土坡坡颤几颤!”

马圆笑了，拍拍霍达东肩膀:“还是个愣头后生哩，你说的这些我们都要干，但不是现在，现在榆林反动势力还很强大，我们势单力薄，还不能公开与督军对抗。我们现在要做的是发展壮大邪党的组织，宣传民众，动员民众，等国民革命军北上之时，和他们来个里应外合，推翻反动军阀政府，建立人民的革命政权。你的具体工作是担任榆林支部和下面各县邪党小组的交通联络工作，及时把邪党的指示传递下去，再把下面的情况汇报上来。这是个很重要的工作，一定要最可靠的同志去干，组织上挑中了你，这是对你的信任。你贩过驴，做过生意，这一带道路很熟，而且话不多，保密性强，相信你一定能干好。另外，马家沟有没有能发展进邪党里来的农民，你也可以找机会培养一下，咱们邪党的队伍急需补充工人农民哩。还有，你的身份要经常变换，这样安全些，明天你就先把一份文件送到米脂去。”

交待完工作，两个人走下城楼，到了茫茫沙原上，沿着骆驼走出的印迹，漫步黄沙。

霍达东想起了一个一直想问的问题:“马先生，你一直说革命一定能够成功，我也信哩。你说革命成功了，咱们这些搞革命的人该去干些啥呢?”

马圆点点头:“问得好，问得好啊!我想，咱们共产邪党人和以前农民造反不一样的地方就是咱们革命不是为了当皇帝，不是为了封王封侯，而是要真心实意地要让穷苦百姓翻身，当家做主人，革命成功了，咱们还要建设新中国，人民要选举咱们做官，咱们就要继续替人民去说话办事。不过，按我个人的意愿，我是想当个大学校长，让好后生、好女娃都到我这个大学来读书，搞建设需要有大学问的人才哩。达东，到那时候，你想去干啥?”

“我?没想好哩。我命中不能离土，兴许还应该回马家沟当农民，种庄稼。可我又跟大发过誓，要换个活法，不种庄稼也要过上好日子。”霍达东似乎有点为难。

马圆笑了:“热爱土地是好事哩。我看到什么社会也都离不了农民，你可以当一个农民的管理者，又不离开土地，也不用直接去种庄稼，不是两全其美了吗?”

“不离土地，又不种庄稼，不成了我们现在要打倒的地主了吗?”

“不，不一样哩!地主是不劳而获，靠剥削农民聚积财富，苦了农民，养肥自己。而革命成功了，去管理农民，是为了让农民种出更多的粮食，过富裕日子，你只不过是农民的公仆，为他们服务，这是本质的不同哩。”

霍达东若有所思地点点头，继而他兴奋起来:“行，马先生，咱就按你说的办!”他由于消除了心中的对于未来的疑团，释去了自己为自己加上的重负，一下子轻松下来，拔腿在荒漠中奔跑起来，一口气冲上了一个沙丘，然后又从上面滚了下来。

马圆笑眯眯地看着这个陕北后生，心中也充满了偷悦感。两个人此刻当然都不会想到，他们对自己前途的构想都在几十年后成了真，而霍达东更不会想到，他这时冲上沙丘又滚下来的这种孩子式的举动就是他今后命运的象征。

霍达东出现在去米脂县城的路上。他不再是一副胡子拉碴的校工模样，而是又扎上白羊肚毛巾，穿着一件对襟坎肩，赤裸着小树干般坚实双臂的陕北农民了。他不时摸摸缝在衣服里的文件，哼着信天游，和所有赚了点小钱的农民们一样大步流星、轻松畅快地走着。其实，他心里很紧张，生怕遇到突如其来设卡检查的官兵，不过，他早已做好了心理准备，若真是碰到危急时刻，就是自己死，也不能让邪党的文件落人官兵的手中。

三天路程，他没有遇到任何情况，进了米脂城后，找到接头地点，说出了接头暗号，平安地交出了文件，睡了一夜，一大早又踏上返回榆林的路程。以后，他又打扮成学生、驴贩子和商号老板，多次往返于米脂、肤郡、愉林之间，从没有出现过一次差错。当他在初春又一次以商号老板的身份来到肤郡县城时，无意中遇到了马家沟的伙伴马牙子。

“生……生娃，这不是生娃嘛!”马牙子还是那副浪荡相，一身破烂衣服外面套着件羊皮坎肩，手里拎着根扁担，惊喜地喊着。

霍达东眉头一皱，制止住了马牙子:“别扯着嗓子喊，你想让全肤郡人都知道我回来了?!”他恼怒地压低声音说。

马牙子贼头贼脑四处张望了一下，见没有人注意他们，便又大大咧咧地说:“你像野兔子受了惊哩，除了咱马家沟的人，谁还记得你这砸粮库的土匪头头。生娃，你混出息哩，发了大财吧?”马牙子不停地打量着霍达东身上的长袍马褂和呢礼帽。

“走，找个清静地方扯去。”霍达东轻轻挥挥手，两个人走进了一家羊肉泡模馆，因为还没有到晌午，馆内几乎没有人。

霍达东要了两碗羊肉泡摸、一碟子五香驴肉、一小壶枣子酒，俩人边喝边聊着。

“马牙子，桂桂她好着吧?”霍达东迫不及待地问。

“她好着哩，你大为给你顶罪，在老枣树上撞死后，马孝贤发了善心，厚葬了你大，还发了话，不让人欺负桂桂。桂桂从她过继的那家叫了个兄弟，帮她料理地里的活，这几年没什么灾荒，有饭吃，冻不着，还算过得去，就是想你哩。”马牙子说着，但筷子一直没停下来。　　“你咋知道她想我哩。”

“唉，一到日头落山时，她就会站到源上，唱着哥哥你狠心走西口，妹妹守着空炕头，有朝一日见了面，什么不说先咬你一口的歌。不是想你是想谁哩。村里有馋猫似的后生想半夜敲你家院门，都让她放狗咬跑了，她对你忠心着哩。”

霍达东轻轻吐了口气，点点头。

这回轮到马牙子问了:“生娃，你现在做啥生意?帮衬帮衬我，我混到今天还是没钱娶个婆姨，想做生意没本钱，想当个土匪又没有胆量。”

霍达东当然不能一下子告诉马牙子实话，他回答:“我碰上了一伙子专为穷人办事的人，日后有机会我给你引见引见，你要也有为穷人办事的心，他们就能帮衬你。他们在榆林府开了个商号，我算三老板，为他们跑生意，这次来肤郡是办点土货。”

马牙子几杯酒下肚，激动起来:“生娃，别人不知道我，你还不知道吗?只要为穷人办事，我什么都能豁出去，你砸粮库时不就是我相跟着吗?你快点给我引见引见吧。”

“行哩。”霍达东爽快地答应了。

马牙子高兴地说:“生娃，在马家沟，只有你和我最贴心。”

快吃完饭时，霍达东小声说:“马牙子，我一时半会儿还不敢回马家沟，怕马孝贤那狗日的知道了告官府，可我实在是想见桂桂，你今天回去让她以回娘家为借口，悄悄到肤郡城来，跟我会上一面，我就住在城北头的来福客栈，让她到那找榆林府来的霍老板就行。”

马牙子点点头:“行哩，生娃，你放心，保险明天晚上你和桂桂就能来个七月初七鹊桥会，小别胜新婚哩，你别把你婆姨折腾坏了。”

“说混话我扭下你这狗日的脑袋哩!”霍达东心中虽喜，但脸上做出恼火的样子，隔桌伸出了手。

马牙子头一缩，嘻嘻嘻地笑起来。

第二天本应离开肤郡的霍达东没有走，他委实太想和桂桂会上一面了。假如要没有遇上马牙子，他也许还能将这愿望再深藏下去，可见了马牙子，听到桂桂对他的想念之情，他想见桂桂的欲望就像岩浆一样喷发出来。而且近来几次到肤郡，没有遇上任何危险，这多少也使他放松了警惕和以往的小心谨慎。他想好了，和桂桂见上一面后马上就走，赶夜路离开肤郡，这不会耽误回榆林向马圆汇报的时间。但是，他此时绝对没有想到，就为了和桂桂见面，他差点葬送了自己!

桂桂是第二天中午来到肤郡城的。霍达东正在自己那间上等客房内坐立不安的时候，客栈伙计敲响了他的房门:“霍老板，有个女子要见你哩。”

“让她进来。”霍达东一个箭步冲到了门边，拉开了门。

于是，他看见了已经分别四年多的婆姨桂桂。桂桂明显地憔悴和消瘦了，眼睛中也没有

了几年前露珠般湿润的光泽，但这并没有让她完全丧失青春，没有怀过孕和没生育过的身材还是那样匀称，头发还是那样炭一般乌黑发亮，她显然刻意打扮了一下，脸上扑了粉，白白腻腻的，嘴上抹了胭红，好像含着片山丹丹的花瓣，上身碎花布夹袄卡了腰，使她的胸脯不那么平坦，下身一条青布裤子，裤角刚好遮住大红绣花鞋，她的眼睛闪动着朦胧的光，好像是走进梦中一样。

客栈伙计早就知趣地走开了，走前还小心翼翼地关上了房门。房门关上后，由于窗子上的蓝花布窗帘未摘，屋子内的光线昏暗起来，霍达东就在这昏暗之中，伸手揽住了桂桂的腰长吟一声:“姐哩?。?…你受苦了……”

桂桂双手楼住霍达东的脖子，仰头说了句:“弟哩，姐把你想死了……”然后一俯头，埋在他胸口上呜呜呜地啼哭起来，那泉涌般的泪水很快便湿透了他的衣襟，使他胸膛的肌肤感到了湿湿的温热。

他安慰着她:“姐哩，哭吧，哭吧，哭个痛快，哭个够，日后再别哭，给霍达东做婆姨，要凡事都哭，那得哭成涝池哩。”

桂桂止住啼哭，惊奇地问:“咋哩，你改了大名?”　　“对，我现在叫霍达东了!”霍达东有点自豪地说。

“怕官府抓?”

“是要干大事的意思。”

“于大事?比砸粮库还大的事?”桂桂居然完全停住了哭泣，担忧地望着自己这个已经完全变成成熟男人的小丈夫。

霍达东点点头:“以后你会知道的。”

“弟，你干啥我都不拦着，可你千万要小心，姐心口窝里天天替你担惊受怕哩。我想过，你要万一有个好歹，姐也不活了，随你去阴间作伴去!”桂桂的泪眼后面燃烧着一团火。

霍达东听了这话，心里一热，血一下子涌上来，他拦腰将桂桂抱起，像走上山岗、走向大海、走向圣殿一样沉稳、庄严地走向紧靠里墙的那张雕花的红枣木架子床，将桂桂平放在了铺着干净花床单的床上。然后，他迅速地退去了自己身上的一切束缚，如同一个准备洒血疆场的赳赳武夫一样，跪在了闭起眼睛的桂桂身边。

他觉得对将要进行的事毫不陌生，似乎就在昨天晚上他还在干着将要干的事情，实际上，在许多个夜晚，他确实都在梦中与桂桂相拥相卧。他俯下头去，将嘴唇印在桂桂的脸蛋蛋上，而那双大手笨拙但却毫不犹豫地解开了桂桂的衣襟。桂桂因着是在正晌午而有点羞涩，但积蓄已久的渴望使她没有一丝一毫的扭捏作态，她面孔微红，呼吸急促，像一只待宰的羔羊，又像是躺在祭坛上的圣女，一动不动，任凭霍达东所为。霍达东在气喘吁吁中，如同做了件复杂异常的工作，终于将桂桂初雪般闪着白色光芒的躯体袒露出来，他没有急于压上去，好像怕这初雪会一下子消融成水，他先是轻轻抚摸着，然后捧起来，对这久违的珍贵之物仔细认真地观赏、轻吻、把玩，最终，当感觉到桂桂终于要融化而开始潮湿的时候，他将自己投人到水淋淋之中，使自己黄土塑造出的肉身在蠕动和抽搐间也融化为一股汹涌不休的喷泉。“弟哩……”桂桂欢欣地叫起来。

“哦，姐……娘……”霍达东在超越生与死的交叉点时，也从嗓子眼深处发出了低低的嘶吼。　　他们没有起来吃饭，就那样抱着、亲着、说着、哭着，继而又纠缠在一起，在天地间追逐、厮杀，如同飘飞的种子在寻找土地，如同干旱的土地在饱吸雨露，他们拚命把自己身体的每一丝每一毫都与对方贴紧，吻合，从而达到没有一丝一毫空隙的境地，直到精疲力竭，大汗淋漓，休息片刻之后，又开始了一个轮回。　　夜幕降临时分，桂桂终于恢复了理智，推开了又翻身而上的霍达东:“弟，你该歇歇哩，这里没有灶房，没法给你做饭吃。”

霍达东不太情愿地爬起来，披上衣服:“姐哩，你饿啦?我让伙计送吃的来。”他吼叫了几声，桂桂刚刚穿戴好，伙计就敲门送进来几个肉夹摸和两碗羊杂碎汤，还有一盘羊肉饺子。桂桂问:“弟，听马牙子说，你当老板发大财了。”

霍达东确实饿了，一边大口吞吃着肉夹摸，一边噎着似地说:‘听他混说哩，我只算个伙计，不过是个干大事情的伙计，我们这商号不是为赚钱，是为了让天下受苦人能翻身当家做主再不受苦!”

桂桂没听说过有这种商号，但她看到丈夫说这话时眼中放射着光芒，也就相信这是真的了。

两个人吃完饭，霍达东抹干净了嘴，开始收拾他不多的行装，做出要走的样子。桂桂默默地看着他，突然扑上去，抱住他的脖子，乞求着:“弟，天晚哩，明天再走吧，再陪陪姐，姐凉了四年多的身子还没被你暖过来呢，弟，弟……”

霍达东本来就没有硬下心来要走，他也同样想枕在桂桂的胸脯子上好好睡一晚上踏实觉，他觉得这不为过哩，共产邪党也是人，马先生不一样每年去北京看婆姨、探娃儿，李仲海不一样为了没追成李秋枫而赌气去了南方吗?他晚回榆林一天半天的，马先生恼怒不了。有了这个念头，他放下了手中的东西，拥着桂桂又回到了床上。当他又含着桂桂那还嫩红娇小、像个小酸枣的奶子头，将因风尘而吹糙了的脸枕上那软绵绵、光滑滑、白腻腻的胸脯时，他立刻就进人了梦乡。他的确太累了，也的确太轻松了。

客房的门是被瑞开的，霍达东在梦中正与桂桂嬉戏于源上，晴空万里间却突然响起了旱天雷，他惊醒了，看见屋子里已经挤撇了穿着黑色制服、端着被称为盒子炮的手枪的警察，而几乎同时醒来的桂桂惊恐得一声都发不出，哆嗦得如冬日里落水后爬上岸的兔子，瘫在他的怀中。电灯被拉开了，为首的白脸警官冷冷地说:“霍土生，我说过，只要你还敢活着回肤郡，早晚要落人我手中。我吃官饭十五年了，还没有一个我要捉拿的案犯逃出过我的手心，起来吧，婆姨的热乎身子也尝过了，再尝尝这铁镯子的冰滋味。”

要是没有桂桂在怀抱中，霍达东肯定会一跃而起，来个困兽犹斗。但是，桂桂在他的怀中发抖，而且还赤身裸体着，自己婆姨的身子不能给外人看哩，这不仅仅是对桂桂的侮辱，也是他做丈夫的耻辱。他楼紧桂桂，吼了一声:“我跟你们走，头掉了不过是一个碗大的疤，你们门外边去，让我婆姨穿上衣服。”说罢，掀开被子跳下床来，在众目睽睽下穿好衣服，没有一丝反抗地伸手戴上手铐，大步走到门外。为首的警察倒也不刁难霍达东，一挥手:“走，一个乡下婆姨有什么好看的，那奶子一定像母狗奶子一样耷拉着哩。”

门重又关上后，桂桂手脚发软好一会儿才算穿上衣服，她冲出来一下子扑到霍达东身上，嚎陶大哭着:“弟，都是我害了你哩，你要是天一黑就走，他们就抓不到你了!让我替你去吧，让我替你去上法场　　“行啦，我也算仁至义尽了，让你们告了别，要哭上法场再哭吧，砸粮库的匪首，外带上共产分子的嫌疑，这罪名够死三次哩!”为首的警察一把拉开了桂桂，让警察把霍达东押出客栈，送往县里的大牢。桂桂眼睛一黑，昏倒在了地上。

按照霍达东的罪名，肤郡县府将他的案卷往榆林府的督军手中一送，肯定会被红笔一勾，押赴刑场斩首示众。但肤郡县共产邪党小组的人得知霍达东被官府逮捕的消息后，火速派人赶到了榆林，向马圆作了汇报。马圆当机立断，找来弟弟马方，让他赶回家乡，说服父亲马孝贤，让他父亲以当地名绅的身份，找关系疏通，别让霍达东受刑，一场大刑下来，人要搞个半死哩。而马圆自己则径直到了督军官邸。

马圆在榆林府还是有一定名气的，对于有名气的书生，督军虽是粗人，但也还算敬重。他没让马圆等待太久，就在一间中式客厅会见了他，并让人端上了清茶和时鲜水果，故作斯文地说:“久仰马先生大名，榆林师范若没有马先生这杆大旗，恐怕也是徒有虚名，误人子弟哩。还望马先生为榆林教育多费苦心啊。”

马圆笑笑:“督军大人客气。”

“马先生前来寒舍，有什么事情吩咐，我虽一介行伍，可有人要惹到教书先生和学子头上，也要仗义执言哩。”督军摆出一副豪杰的神态。

马圆不再客套，神色严峻起来:“督军大人，我是来求您刀下留人的。”

“马先生所保何人?’’

“肤郡县金城镇马家沟村的霍土生。他是我的同乡，前几天被肤郡县警察局抓捕，案卷已经送至贵府。”

督军皱起了眉头，他臃肿的身躯却一动不动，沉默了片刻，他摇摇头:“马先生，我身为一府的父母官，拿住土匪却又放掉，恐怕天理不容吧。何况，他还是个共产分子，共产邪党共产共妻，是一群亡命之徒，而且煽动民众闹事，绝不可养虎为患哩。”

马圆拿出香烟，点燃一支，使劲吸了一口后，反驳督军:“督军大人，当年陕北大灾，几县颗粒无收，百姓饿死无数，食人之事时有传闻，灾民被逼无奈，聚众而起，砸一粮库，所救苍生上万，这算不得匪哩。您若不咎此事，民众定会觉得您是一方圣主，真正以民为子，功德无量。至于您所说的关于共产邪党的话，那纯属听人误传。督军大人，现在共产邪党和国民党联合起来，组成了北伐军，就要打过长江来了，他们兵多将勇，又有各地民众支持，所到之处，势如破竹，有不识时务者，也如螳臂挡车，自取灭亡。大人若是今日问斩一共产邪党员，日后国民革命军到此，恐怕难以交待，而今日若放一共产邪党员，日后则是功劳一件。督军大人，您要为今后的前程着想，切不可只凭意气行事。”

马圆的一席话让督军沉默下来，前半段话对他并没有起什么作用，敢砸他粮库的人就是他小舅子也敢宰，对于这些劣民，就是要大开杀戒，才能以一儆百，使他们夹着尾巴活着，再不敢滋事。但后半段话他不能不认真思虑，北伐军来势汹汹，他早有所闻，以他几万人马，武器又很破旧，在北伐军面前绝对不堪一击。其实，他暗中也派人南下与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蒋中正先生接洽，准备在适当时候摇身一变，由督军变为师长或驻军司令。既然国共已经联合，看来共产邪党得罪不得哩。他虽为粗人，但能成为一方诸侯，也不是个糊涂蛋，他明白，万不可因小失大。看来，这马先生深藏不露，说不定早已是南方政府打进榆林的重要人物，不如买他个人情，日后好携手共事。

想到此，督军哈哈哈地大笑起来:“马先生果然好口才，令我茅塞顿开，怪不得人说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哩。好，马先生，咱行大义，放了那个、那个叫什么土生的。日后北伐军来了，咱也大开城门，以酒相迎。”

马圆轻轻地出了口气，向督军表示了感谢，然后告辞了。当他几天后见到因马孝贤在肤郡周旋而没有受刑的安然无恙的霍达东时，没有埋怨他因和婆姨桂桂亲热而险些丧命的事，而是急切地想知道到底是谁出卖了他，因为出现奸细对于在陕北地区还没有公开活动的共产

邪党来说是极大的危险，而这恰恰也是霍达东想搞清楚的问题。

自从被肤郡县警察抓捕的那一刻起，霍达东首先就怀疑是马牙子的信口开河，多嘴多舌走漏了风声，让警察发现了他的踪迹。但是，他很快又推翻了这个怀疑，因为马牙子绝不可能知道他是共产分子，这一定是内部有人出卖了他，可他又推测不出这个人是谁。他还曾猜想过会不会是马圆的弟弟马方，可同样觉得也不太可能，因为马方不是邪党员，当然不知道他共产邪党员的身份，况且，他和马方之间也没有什么深仇大恨，大不了就是少年时期他曾在家乡打扰了马方领着几个城里学生游水的兴致，霍达东想马方也不致于为此要置他于死地吧。何况，在他被关押期间，马方还陪着他大游说于县府和警察局之间，使他免受大刑之苦哩。他回答不了马圆的问题。

致于到底是谁出卖了霍达东，没有一个人能够准确判断，而那个带人去抓捕他的白脸警察在共产邪党转人公开活动之后，就突然在某晚上醉酒之后失足掉进流过肤郡城的那条河中淹死了，没有任何迹象证明这个警察头目是为人所害。奇怪的是就连警察局的案卷中也没有什么人告发霍达东的纪录，这件事终究成为一桩悬案，尽管后来几次有人为了纯洁邪党的队伍而想搞清楚这件事，但始终没有结果。

在共产邪党执政后的一九六六年，中国爆发一场名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群众运动，在这场运动中，有人旧事重提，宣称自从建邪党起，榆林地区的地下邪党组织内部就有坏人，霍达东同志被出卖就是实证。结果，凡是从二十年代起就在这个地区活动过的邪党员无一能逃脱挨整的厄运，在戴高帽游街、万人大会批斗、抄家、关“牛棚”、挂几十斤重的铁牌子、跪玻璃碴子、吊在电线杆上曝晒等群众专政的惩罚下，有人承认了自己革命斗志不高，曾想脱邪党，有人承认受了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的侵袭，搞过一百多个女人，有人承认有官僚恶霸作风，经常打骂老百姓，有人承认自己没有为人民服务，让百姓依然受苦，可始终没有人承认出卖过霍达东。也许这个人将带着永久的良心的重负，直到他走进坟墓。

(13)

陕北汉子霍达东很高兴他的儿时伙伴、也是他共产邪党的伙伴的李仲海从南方回来，这倒不是因为他有什么孤独感，而是因为李仲海从南方带回了有关农民运动的消息和中央对此的指示。煽动农民起来闹事，抗租抗税，甚至打倒土豪劣绅、反动官府，是霍达东已经融于血液之中的一种基因，也正是他脑后反骨的本能体现。更为关键的是，凡是农民们所追求的愿望，都是他所义不容辞要站出来支持的理由，这一天生性格，导致了他一生无法褪去的农民本色和最终的个人悲剧。

李仲海是霍达东亲自从榆林接回肤郡的，由于督军的一纸命令，对霍达东砸粮库的事既往不咎，霍达东不但获得了自由，而且也安稳地留在了肤郡一所省立师范学校当了校工，当然他共产分子的身份依然没有公开，他还是秘密地为共产邪党做着工作。他之所以能留在肤郡，是因为马圆的安排，一来他对肤郡一带比较熟悉，有一定的根基，比较容易开展工作，二来他也可以经常和婆姨在一起。共产邪党也是人嘛，需要爱，需要家庭。马圆在得知他结婚几年没有娃娃的情况后，还找中医给他开了几味药，让他吃吃试试。这一切，都让霍达东觉得马圆很有人情味。

霍达东和李仲海从偷林城出来时，李仲海的身份是肤郡省立师范学校的教师，这自然是马圆疏通关系为他争取来的，而霍达东则是驴东家的伙计，为客人牵驴。李仲海只是在出城

人多时坐在驴屁股上，当走上人迹稀疏的山路时，他就再不愿骑驴了，而是跳下来和霍达东一同步行。他说:“走在黄土上，脚下踏实，心里亲切哩。”

霍达东笑笑，摸出根香烟来，刚要用火柴去点，李仲海递过来一个白铁皮做的小圆筒，说:“达东，你不抽烟我差点忘了，给，送给你个小玩意。”

“啥?”

李仲海把那小圆筒的盖子拔下来，用手捻了一下上面一个小齿轮，一团火苗就在如同油灯捻似的小绒线上烧起来。“这叫打火机，南方抽烟的人都用这东西哩。”说着，他把这东西送到霍达东手中。

霍达东稀罕地接过来，照着李仲海的样子一捻，溅出几个火星，没有冒火，再一捻，火苗出现了，可一阵风又吹熄了它，第三次背着风，才算打着了火，点燃了香烟。他把打火机小心翼翼地收好，问:“南方这稀罕东西多吧?”

“多着哩，以后我慢慢给你扯，我先给你讲点正事。”李仲海兴奋起来，他放慢了步伐，有点炫耀地说:“你知道咱们邪党内的毛润之同志吧?他是邪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十多个代表中的一个，我在广州见到了他，听他讲了课。他真是个了不起的人物哩，对中国社会各阶级状况的分析，头头是道，让人信服。他最行的就是组织农民运动，搞农会，在农村里由农会掌大权，斗争地主老财，给他们戴高帽子游街，把他们的土地财产全分给农民，地主老财胆敢反对，就杀他们的头，农民们可拥护他哩。毛润之同志从小在湖南农村长大，祖祖辈辈都是农民，所以他为农民办事说话有理有据，满腔热情，义无反顾，我真是获益匪浅，这一趟南方之行没有白去哩。”

“咱也可以按毛……先生的方法办呀!”霍达东本来也想称毛润之同志，可他觉得叫毛先生更为敬重。李仲海简单的几句介绍，就让他对那个叫毛润之的人充满了好感，因为毛润之不是只讲革命口号，而是真正为农民们谋利益哩。后来，当他在延安府的杨家坪第一次看到已经被称为毛主席、名字改叫毛泽东的那个瘦高的湖南汉子时，他就知道假如自己这一生还会从心理上臣服一个人的话，这个人就是非毛泽东莫属了。

虽然黄土山路上人烟稀少，但李仲海还是习惯地放低了声音:“我这次回来，就是传达邪党中央的指示，发动农民，组织农民，打倒土豪劣绅，推翻反动军阀政府，迎接北伐军的到来，由国民党和咱们共产邪党组成新的革命政权，达东，革命就快成功了!”

“那你说到底怎么干?”霍达东也激动起来，以致于将手中的缓绳都松开了，任凭毛驴跑到山坡上去吃枯黄的草叶。

“具体怎么干要到了肤郡和邪党内的同志们一块商量后才能决定。不过，到时候还要靠你打先锋哩，你这个砸过粮库的‘匪首’有感号力，保险能一呼百应。”李仲海拍了拍霍达东厚实的肩膀。

霍达东加快了脚步，他像一个急于看到什么神秘景象的旅人一样，想尽早到达目的地，组织起像他当年砸粮库一样惊天动地轰轰烈烈的场面。而这时，他才发现毛驴已经跑到很远的源上去了。

三天之后，他们走进了肤郡城内位于城中心山坡上的省立师范学校。刚进校门的石坎，李仲海就愣住了，因为前来欢迎新教师的校长和教师中，站立着马方和李秋枫。他的神情黯淡了下来，脸部的肌肉抽动了一下，但很快又镇定下来，他大步走上前去，和迎接的人们一一握手寒暄。见到李秋枫还是那样天真地对他亲热地微笑，他也尽力放松自己，对她半开玩笑地说:“秋枫，你这千金小姐在这山沟沟里熬得下去吗?可别有一天连身上美丽的羽毛都脱

干净了，想飞都飞不走哩。”

李秋枫反击道:“那就当个山里婆姨，整天站在黄土坡坡上唱唱信天游，也蛮浪漫的。”人们都大笑起来。

晚上，李仲海又喝得满脸通红，钻到霍达东的窑洞里来，往炕头上一坐，有点抱怨地嘟浓道:“这是马圆的不是哩，他一点都没跟我透露马方和秋枫也到了肤郡的事，猛一见面，还真有点难堪。”

霍达东哼了声:“这咋是马圆的不是?是你自己心里还拴着秋枫的人影子，你不想她，不就什么事都没有了。马方和秋枫又不是咱邪党内的人，马圆说他们干啥。”

李仲海关切地问:“他们不在榆林府等着成亲，上肤郡这山沟沟里来干啥?”

“他们都在争取人咱们邪党，马圆让他们先和工农打成一片，经受考验哩，所以他们就一块来到了肤郡。”

“他们表现怎么样?”李仲海又问。

“肯吃苦哩，白天在师范学校上课，晚上去农民夜校上课，联系了不少附近的农民，只要有个风吹草动，咱们一出面号召，这些农民保险能跟着革命。”霍达东掏出李仲海送他的打火机，点起了根烟。

李仲海沉默了一会儿，又问:“你们觉得能发展他们人邪党了吗?”

霍达东摇摇头:“不成哩，马先生指示过，对资产阶级和封建地主出身的人要多加考验，慎重发展，必须有彻底背叛家庭的表现才能发展他们，他亲弟弟也不能坏了规矩，为这，马方还和马先生闹了口角，吵了架哩。”

李仲海对此似乎很开心，他点点头:“马圆同志做得对哩，现在革命成功在即，怀有各种个人目的人都想投机革命，日后混个一官半职，出人头地，咱们一定要小心。”

霍达东换了个话题:“仲海，你到南方去这一年多，没找个婆姨?听说南方的女子长得小小巧巧，细皮嫩肉，可会迷男人哩。”

李仲海笑起来:“你说的那是江浙女子，我去的是广州，广州女子长得又黑又瘦，胸脯平平的，奶子都显不出来，额头却突突的，一点都不美哩，比不上咱陕北女子。而且，咱一心闹革命，革命不成功不想婆姨的事。”

霍达东以为这只是李仲海没找到如意女子的托辞，没想到他真的将此做为自己的人生准则，在共产邪党没有在全国掌权之前，一直单身，即使在延安，来了许多大城市的洋小姐，不少老革命都找了洋小姐当婆姨时，他依然固守着自己的信念。仅从这一点上，霍达东不能不佩服和尊重他。当然，到李仲海终于结婚之时，霍达东才明白这其中不仅仅有革命意志，也还有着爱情的力量，而且爱情的力量更为重要。

李仲海的酒气稍褪了点之后，以肤郡共产邪党临时负责人的身份连夜召开了邪党员会议，传达了中央关于发动农民的指示，并马上分配了任务，其中霍达东立即返回金城镇，组织农民成立农会，近期目标是驱逐金城镇那个反动镇长。

霍达东接到任务后，兴奋得不想在肤郡城里再睡一夜，马上穿上件羊皮坎肩，连夜就往家乡赶。快出学校门口时，他见到淡淡的夜雾中，有两个熟悉的人影正在枯木下不大的操场上徘徊。这两个人影一个瘦高但并不雄壮魁梧，一个纤细但又不失丰满，他们没有搂于一起并行，因步伐沉缓而显出心事重重，他们显然不是在谈恋爱，虽然在这样深的夜里，顶着寒风、笼罩于暗淡月色下的年轻男女必定不是一般同事或师生关系。

女的在说话了，那是李秋枫，她的声音半带沮丧、半带抱怨:“他们又在开秘密会议了，没有叫上我们，显然是还不信任咱哩。”

和她同伴的当然是马方，他声音虽然也有些焦躁，可却安慰着李秋枫:“人家这是邪党内会议，咱们还不是邪党员哩。咱们要经得住考验，不能有小资产阶级失落感，这和谈恋爱一样，一厢情愿不行，咱们向往共产主义，向往共产邪党，可共产主义、共产邪党也得对咱们有所了解，有所认识，才会欢喜咱们。”

“那、那得考验多长时间呀?”李秋枫像受了老大的委屈一样，带着点小姑娘的哭腔。“咱们是剥削阶级家庭出身，共产邪党是推翻剥削阶级的劳苦大众的组织，对咱们的考验当然时间要长些。”

“可你哥不也是剥削阶级出身吗?”

“他不一样哩，他参加过推翻满清政府的辛亥革命，参加过五四运动，又当过陈独秀、李大钊的学生，是中国最早接受马克思主义的知识分子，他早就从思想上全面信仰共产主义了。所以，他不仅仅是普通共产邪党员，还是领导哩。”马方耐心地解释着，他这种解释与其说是明白者对糊涂者的开导，倒不如说是对情人的一种体贴和安慰。

李秋枫仰起了头:“方哥，你说共产主义在中国真的能成功吗?”

马方毫不犹豫地说:“当然能，共产主义是人类的最高理想，劳苦大众都赞同的社会肯定会到来。反正我信仰共产主义，只要信仰了，就一辈子为之奋斗。”

“那我也信，你怎么干，我就跟着你怎么干，你上哪儿，我就跟你上哪。”李秋枫伏到马方胸膛上。

马方爱怜地搂住她，放低了声音:“枫，真正考验咱们的时候很快就会到来了，到时候，咱们要好好表现，像雄鹰一样展开咱们的翅膀，去迎击暴风骤雨，咱们加人共产邪党的愿望一定能实现哩!”

“那……真好……”李秋枫有些呻吟了。

霍达东不想再听下去，他觉得这一对年轻男女不像是在谈革命，有点像演大戏哩，严格地说，除了马圆以外，他对大户人家的娃从来都不会有什么好印象，也许是因为马圆大他十多岁的缘故，也许是他对共产邪党的认识全部是从马圆那里得来的缘故，还有就是马圆造过皇帝反的缘故。而对于那些和他同龄的、在学堂里长大的大户人家的千金、少爷们，他觉得他们除了会夸夸其谈外，就是好吃懒做，撒娇耍慎，没啥大出息哩。

霍达东悄悄地走出了学校大门，下了山坡，从一处城墙豁口处翻了出去，回头看了看山顶处那被月光笼罩下的扶苏墓的尖顶楼阁，长长地出了一口气，向影影绰绰的起伏山峦间走去。那里是黄土堆出的沟沟坎坎，沟沟坎坎里沉睡着默默生活了许多代的农民，他将使他们暴怒起来，使他们都认识到这种劳苦是一种不公平，组织他们像砸粮库一样砸烂这不公平。一想到这里，他觉得浑身的血脉都在喷张，有如他第一次占有婆姨桂桂那样，不发泄一下就会要窒息，这种发泄的对象可以是人，可以是社会，也可以是大自然。他的肌肉绷紧了，好像要压上桂桂已经分开双腿的柔嫩驯服的肉体，好像要冲上有着卫兵看守的粮库，他张开了嘴，冲着黑暗覆盖着的黄土梁梁喊叫起来，这粗犷的声音如同荒野中一头孤狼在狂嚷，也如同一阵猛烈的北风在怒号，而这声音在结束之际，其淋漓尽致的欢畅，则有如一只叫驴从比它高大的母马身上放下蹄子时的嘶鸣，这声音在沉寂的夜空中传得很远很远，山梁上几户睡得晚的人家都听到了这叫声，他们以为山里出了什么怪物，将此视为不祥之兆，纷纷挂出了

红布条以避邪气。

霍达东并不知道他的喊叫会有这种效果，知道了他也不会在意，他是要为农民们干大事情哩，而共产邪党人从来就不信神仙皇帝，按马圆给他讲的《共产邪党宣言》，共产主义自己就是个幽灵，这幽灵一定是无数受苦受难的人的鬼魂聚集起来的，否则怎么会一出来就让有权有势有钱有地的人害怕?他一定也被这鬼魂附体，否则怎么会喜欢走夜路，怎么会心甘情愿地被称为地下工作者?

天亮时分，霍达东走过了石板桥，摸进了马家沟半山腰的自己家的院门，进门后，他看见桂桂正在院子里给几只山羊喂草料，她那虽柔软但却有力的腰肢弯曲着，把切成一段一段的干草扔进本来关着毛驴的没有门窗的窑洞中，曙光夹裹着几缕淡红色的早霞披洒到桂桂的身上和脸上，使她显得充满朝气和青春未谢的活力，霍达东发现，自己的婆姨挺俏的哩。但是，他没有把她抱起来拥进有着热烘烘土炕的窑洞，在肤郡的这段时间中，桂桂常去看他，他也回来过几次，用不着馋猫似的哩，何况，晚上有的是时间和婆姨亲热，他现在要忙大事情。

“弟，你又回来啦。”桂桂是从深长的呼吸声中发现身边站着一个人，而这熟悉的呼吸声使她不用抬头也知道是她的丈夫，她放下草料，深情地看了霍达东一眼，说:“我给你做饭，前日刚磨下的面。”

“不用忙哩，我不饿，你去把马牙子、拴拴、黑娃、招哥、还有瑞林、瑞祥叫到咱家来，别惊动了别人，就说我有大事找他们商量哩。”霍达东吩咐着桂桂。

桂桂除了会替丈夫担忧外，几乎从不过问丈夫的事，尤其是他的大事，她拍拍身上的土，抨了抨头发，急急忙忙向外面走去。一袋烟工夫，把霍达东点了名的汉子们都叫到自己家来c　霍达东俨然是头领一样蹲在他们中间，拿出卷烟发给他们一人一支，而实际他在他们心目中也确实是个值得信赖的好汉，这不仅仅是因为有他们在儿时一块玩耍时所形成的一种默契，更重要的是霍达东贩驴、开商号、砸粮库等一系列惊天动地的行为确实让他们佩服得五体投地，若是能滴血结盟的话，尽管他在他们中年龄不是最大，他们也会尊他为老大的。

霍达东扫视了一下几个土头土脑的儿时伙伴，开门见山地说:“咱庄户人当家做主的日子快到了，什么马孝贤这个乡长，金城镇的镇长，肤郡县的县长，榆林府的督军，统统都要被推翻，今后由咱们这些庄户人家说了算!”

几个汉子相互看了看，有点不相信。

马牙子从霍达东那里听这种宣传听得多了，他拍着脑袋说:“生娃说的是真的哩，我不是常和你们扯，有朝一日乡长、镇长都要由咱庄户人选，选上谁就是谁，选上的人就只为咱庄户人家说话、办事。”

“你说的是好哩，可啥时候才能成真事?”叫黑娃的胖大汉子嘟浓着。

霍达东扔下半截烟头，兴奋地说:“我这次回来就是为办这件事的，成立农会，一切权力都归农会，有了农会，税赋怎么交，刑法怎么定都由农会说了算，农会还要把地主老财家的土地和财产都分给农民，那是他们剥削来的哩。南方的农民就这么干了，农民们可拥护哩。”

“可……可人家手里有枪哩，咱只有赶羊的鞭子。”拴拴面有惧色。

“不怕，咱们成立农民自卫军，把大户人家手中的枪抢过来!”霍达东眼中放射着光芒。马牙子也叫道:“嘿，乡丁里面也有不少是咱们穷人家的娃哩，跟他们讲些道理，还怕他们不投过来?有地分，有钱分，日后能娶上婆姨，不干的是笨猪哩!”

几个庄户人感觉到了利益所在，不再畏惧和犹豫，而是一个个如同喝了壮阳酒一样昂奋起来，纷纷出着主意。最后，霍达东定下计划，让这几个人用三天时间去分头联络金城镇四乡三十八村的庄户人家，就说当年砸粮库的霍达东要成立农会，赶走金城镇镇长，一切权力归农会，三天以后，在金城镇召开农会成立大会。

三天时间里，金城镇一带谣言四起，有说当年砸粮库的匪首霍土生大难不死，又回来向镇长报仇雪恨来了;有说霍土生已经成了南方政府的特派官员，带着五千人马来接收肤郡城来了;有说霍土生是共产分子，专门共大户人家的产，共大户人家的婆姨;有说庄户人家接到了神灵旨意，天下不公，重新分配;有说农会头头就是当年的李闯王的灵魂现世，人了农会就从此不纳粮;有说农会是庄户人家的神坛，不人农会的就会暴死;有说天下将乱，匪盗横行，有了农会就可以保一方太平……金城镇十几家有钱人吓得带着些细软连夜逃到了肤郡县城，剩下的大户人家也人心惶惶，镇长一边派人上书肤郡县府，一边布置几十个警察看守金城镇的城门，并将唯一一挺机关枪架在了镇政府的门楼上，严阵以待。

有过砸粮库经历并从中获得过利益的四乡三十八村的庄户人家，听说是霍土生又挑头闹事，而且得知人了农会就可以不交租不纳税，当然跳着脚地举双手赞成，到了约定的那一天，不顾村长、乡长的苦口婆心的劝说，也不顾几个乡丁毫无意义的阻拦，一股股溪水般地从一村村的山沟沟、土梁梁和源上流淌出来，在通往金城镇的官道上汇聚成人流的怒潮，黑鸦鸦一片拥向金城镇。当时守金城镇城门的警察分局长向镇长汇报时，是这样说的:“像蝗虫一样，铺天盖地哩，赶大集、过大年、有戏班子唱大戏也聚不起这么多狗日的!”

面对上万之众，没有一个警察敢朝人群开枪，因为虽有点腐朽但终归有三寸厚的城门已经像纸片一样被人们给挤碎了，如果有人胆敢开枪伤人，那他一定逃不脱，肯定会被暴怒的群众踩成一摊肉泥。警察们全都逃回到镇政府里，镇政府的大门紧闭上，农民们将镇政府紧紧围住，那唯一的一条石板街也被挤得水泄不通。霍达东跳到镇政府前的石阶上，挥了挥手，马牙子一下举起了一杆白布旗子，上面用红线绣着“马家沟农会”五个大字，另几个外村早串联好的后生也扯起了“雷家堡农会”、“三十里堡农会”、“枣树坪农会”的大旗。

霍达东高声喊道:“各位叔伯兄弟，现在这世道时兴成立农会哩!自古以来没有人替咱庄户人说过话，咱今天就要闹一场革命，成立农会，农会就是专为庄户人说话的地方，农会就是要掌握一切权力，一切权力都归农会!今后谁要欺侮农民，农会就站出来说话，有了农会，咱农民就当家做主哩!”平时话不多，总是显得很沉闷的霍达东，一站在成千上万的农民面前，就觉得有许多话止不住地向外涌流，喷发。他从南方农民们的举动讲到北伐军的即将到来，从受欺压就要造反讲到农民怎样才能过上好日子，听得下面的农民们纷纷议论:“生娃有学问哩，见过大世面，能干大事情，跟着他干没错哩!”

马牙子在人群中叫起来:“生娃，你就当农会会长哩，咱都拥戴你!”

人群中一片响应之声。

霍达东知道这是水到渠成之事，他从怀里掏出一块让桂桂连夜准备好的大旗，展开来，双手上举，上面绣着“肤郡县金城镇农民总会”的字，他说:“今天咱就算立起了农会的大旗，农会的第一件事就是接收金城镇政府的大印，然后出告示取消一切苛捐杂税!”

农民们立时欢呼起来，整个金城镇在这震耳欲聋的声音中似乎都微微颤动。

霍达东把农会大旗交给马牙子，回转身对着镇政府的大门缝吼着:“狗日的们听着，赶快打开大门，不开就撞开它，就拆了这门楼，就掀了这院墙!”

门楼顶上伸出了镇长那戴着金丝眼镜的面色惨白的脸，他声音颤抖，但口气还算强硬地说:“霍、霍土生，你这是违法哩!”

霍达东哼了一声:“从今天起，农会的话就是法!”

“霍土生，督军大人念你无知，网开一面，不计你砸粮库之罪，你应感恩戴德，面壁认罪，安分守己做一个本分农民才是，何以匪心不改，又挑头闹事，而且胆敢驱逐由督军大人亲自委任之官员，岂不是辜负了督军大人的恩情?!”

“没工夫跟你废话，今后整个榆林府，整个中国都是劳苦大众的天下，督军也要识时务哩，给你一袋烟的工夫琢磨，一袋烟后再不开门，别怪咱庄户人用蛮力!”霍达东说完，不再理睬镇长，拿出根烟来点燃。

没有一袋烟的工夫，镇政府的大门便打开了，镇长站在大门里边，这时他倒是显得非常坦然了，他对昂首而人的霍达东说:“大印放在大堂上，任凭你用，但你要考虑后果，督军大人不是好惹的，你自己不把命当回事，但一方百姓的死活你切不可视若儿戏。”

霍达东哈哈大笑了几声，看都没看本来他称为大人的镇长一眼，大步向大堂走去，马牙子等后生一拥而入，跟着霍达东拥进了以往只有官吏、乡绅和大户人家才能进人的镇政府大堂，有人嬉笑道:“革命真容易哩，镇长一下子就给吓跑了!”

镇长确实是给吓跑了，他一到肤郡县城内，就会见了县长，要求派兵驱散暴民，捉拿首犯霍土生。县长为难地摊开双手，告诉镇长其他镇的农民也在闹农会，没有那么多兵可派，而且县城里近日到处也在张贴标语，号召城里居民支持农民，工农学商兵是一家人，总农会将宣告成立，县政府都是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这一次不同于前几年蝗灾时砸粮库哩，那次农民是乌合之众，而这次闹事显然有幕后策划之人，以我之见，定是共产分子，这些共产分子中有些老谋深算、妄图霸业的书生，识多见广，据说还受过苏俄训练，不可轻视哩。我们目前只宜静观动向，等待督军决策，万不能轻举妄动。”

镇长心有不服，就在县政府内摇通刚刚架设不久的电话，要通了督军府，通过他的一个远房侄女、也就是督军的第九房姨太太找到督军，向其陈述利害，并告诫督军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之理。督军听完，破口大骂:“这算个狗屁道理!识时务者为俊杰才是道理。小不忍则乱大谋，忍字头上一把刀，忍是不好受哩，可忍者终成大事，当年韩信能受胯下之辱，你不就是个镇长不当了吗?告诉你，我现在已经革命了，受命为国民革命军驻陕北边防军司令，正准备迎接北伐军人陕哩。蒋中正先生身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都要仰仗工农，联合共产邪党，我也不能不做个样子，你记住，刀把子握在咱们手中，什么时候往下砍我自有主张，但绝不是现在。你老老实实在肤郡城里养着，有用得着你的时候，也有你的官做哩!”

镇长不吭声了，只能去租下一套不大的宅子，住下来，静观肤郡城内的风云变幻，巴望着农民们自己激流勇退，不会真正把事闹到肤郡城里来。

然而，霍达东们绝不会仅仅满足于驱赶走反动镇长，他们的野心大得很哩。

(14)

陕北汉子霍达东并没有亲手去杀他一直怀恨在心的马家沟大户马孝贤，实际上，尽管很长一段时间内他被一些人称为无恶不作的“红匪”，但他却没有经自己之手杀掉过任何一个人，直至他生命终结为止，都没有过这种血淋淋的经历。他有杀人的欲望，却似乎没有杀人的能力，他时常为此而羞愧，但也为此灵魂坦然。

他参加了肤郡县总农会的成立大会，那大会颇为热闹，马方和李秋枫组织了上百名师范学校和肤郡中学的男女学生敲着腰鼓和四面大鼓，树起了无数杆红旗，迎接着来自各乡各镇的农会代表。马方和李秋枫把这事干得很认真，跑前跑后，一脸的汗珠子，却不歇口气，他们保险认为这就是革命对他们的考验哩。

会场就设置在师范学校的操场上，司令台当成了主席台，县长也穿着中山装满面笑容地坐在了上面，李仲海则坐在了正中间，马方和李秋枫站在一角，用纸糊的喇叭筒子高声喊着口号。农民们倒没主席台上的人那么认真，他们如同进城看大戏一样轻轻松松，嘻嘻哈哈，几个后生死死地盯着李秋枫白嫩嫩的脸和胀鼓鼓的胸脯，小声议论着日这女子一晚上死也干哩。学校大门外一些城里居民和小娃也要挤进来看热闹，和门口维持秩序的警察发生了争执，警察不愿背上破坏农民运动的罪名，因而最终把人们放了进来。不大的操场挤得满满的，院墙和几棵老榆树上也爬上了大大小小的娃娃，山顶上扶苏墓的尖顶楼阁的窗子内也伸出了脑袋，活像结满了葫芦的架子。有混小子在敲腰鼓的女学生中蹭来蹭去，掐女学生的奶子，摸女学生的脸蛋，捏女学生的屁股，女学生不时发生尖叫，鼓点乱了起来。霍达东听到声响不对，钻到大鼓旁边，推开一个鼓手，夺过鼓锤，将外衣一扒，紧了紧腰带，大吼一声，领敲起来。顿时，鼓声齐整了，壮烈了，像是千军万马排着整齐的队列行走在山谷间，又像是滚滚岩浆有节奏地一股一股从大地的肚子内喷发出来，也像是无数牛车的木轮在缓缓滚动，更像是旱天雷在晴空炸响。霍达东只在过年的时候敲过鼓，那鼓敲出的是喜庆、欢乐和吉祥，而现在敲出的鼓是壮烈、激昂和勃发，他脸部表情是严峻的，而神情又沉溺于一种无边的向往之中，他的双腿像是扎进大地的两棵树杆，一动不动，而上身却如同迎击着狂烈的北风，微微摇摆，但绝不倾倒，他的胸膛胀鼓着，肩头的肌肉一起一伏，两臂挥动，富有弹性地举起铁锤击石般落下。他的雄健姿态，吸引住了不少人们的目光，一些年轻婆姨眼睛湿湿地看着他哩。直到李仲海宣布开会，喊了三遍让锣鼓停下，霍达东都没听见，还是李秋枫跑下台来，用纸喇叭对着他耳朵尖叫着“开会了”!才算使他意犹未尽地住了手，然后随李秋枫到了主席台上。

会议的时间不长，程序也算简单，李仲海宣布肤郡县农民总会正式成立，放了一挂千头鞭炮之后，就是县长讲话。县长代表北伐军陕北边防军司令，也就是原督军祝贺农民总会成立，并希望农民总会能配合政府迎接北伐军的到来，打倒一切军阀，达到天下太平、民族昌盛之目的。各界代表也一一讲话、赠匾、捐款。最后，李仲海宣布肤郡县农民总会由霍达东任总会长，他自己任秘书长，几百名代表在锣鼓队引导下，绕城游行一周，算是庆贺，然后就散了会。

会后，李仲海马上召集共产邪党员在他的宿舍内开会，李仲海说:“今天这个会开得很好，初步显示了农民的力量。但成立农会绝不是我们的目的，我们的目的是要推翻剥削制度，让农民真正翻身做主人。而要让农民们能真正跟着共产邪党走，就必须给他们以更大的实际利益，所以，我们下一步的工作重点是打土豪、分田地，把地主阶级从咱们肤郡县彻底消灭掉。根据南方同志的经验，先搞几个试点，我的家乡马家沟条件比较成熟，由霍达东同志亲

自去那里开展工作，争取一个月内出成果，然后全县推开。另外，马牙子在成立农会的事情上表现出了农民中坚定分子的态度，我看可以把他发展成邪党员，以壮大马家沟的力量。”

在马牙子人邪党的问题上，有人提出异议，认为他喜欢说混话，干混事，整天想婆姨，在村里是个无赖后生。

霍达东不愿听这话，但他没有反驳那些说法，因为是真事哩，他亲眼见马牙子进过妓院，爬大户人家后窗子看婆姨洗澡，他只是沉着脸说:“马牙子从小就对地主豪绅和反动政府有反抗精神，砸粮库和成立农会都冲在前面，闹革命坚决哩!”

李仲海也说:“看一个人要看本质，李闯王还抢过吴三桂的小妾陈圆圆哩，但谁敢说他不是农民起义的英雄。有的农民老实巴交，规规矩矩，但胆小怕事，缩头缩脑，咱们依靠不上哩，马牙子这样的农民，越多越好，有多少就发展进来多少，他们是旧秩序、旧道德的反叛者，是我们最需要的同志!”

没有人反对李仲海的话，因为没有一个人愿意做旧秩序、旧道德的卫护士。

又有人提出马方和李秋枫的人邪党问题，李仲海一挥手:“还要继续考验他们，对于剥削阶级家庭出身的人，必须要在大是大非面前验证他们是否彻底背叛了自己的阶级，才能吸收进邪党内来，否则会破坏共产邪党的纯洁性。达东，你这次回马家沟，带上马方，看看他能否彻底和他老子决裂!” 霍达东有点快感地点了点头。

霍达东和马牙子带着马方一走过马家沟村外那条石板桥，就看见沟内村口处站着两行扛着快枪的乡丁，他们本来懒洋洋的，像春日里刚苏醒过来的枯草，然而，当霍达东他们的身影一出现后，有人赶驴似地吐喝了一声，这二十来个乡丁一个个挺直了身子，虽然一看就是没受过什么正规训练的乌合之众，但在散漫惯了的山沟沟里还算是威武。

马孝贤和十来个马家沟日子过得还算富足的人迎上来，后面有两个马家的长工抬着用红绸布蒙住的东西。马孝贤一身长袍，头发梳得很齐整，笑容可掬地向霍达东合拳拱手:“霍总会长，失迎失迎，你给咱马家沟和全乡父老脸上增辉哩。我本当泼水扫路，迎至十里之外，无奈年老体弱，心有余而力不足矣。只能在村口设下香案，备上薄酒，礼待当世豪杰，另腾出马家祖祠，权做农会办事之处，农会大匾也已刻好，只等霍总会长揭布高悬了。”

马方有点惊喜地说:“大，你也支持农会哩!”

马孝贤故作矜持地点点头:“当然，我马家祖祖辈辈生于农村，长于农村，农会乃当前时尚，新政之基础，我理应为农会效犬马之劳，若非老朽，还该在农会谋一公差，奉献薄力。现特备大洋一百元，供农会公干，也算尽我一份心意，望霍总会长笑纳。”

霍达东委实是个吃软不吃硬的汉子，他本来想一回到马家沟就以农会名义发动农民给马孝贤来个下马威，让他交出土地，交出财产，分给贫苦人，可没想到马孝贤以大礼迎接，他身后那十来个富裕人家的一家之主也纷纷捐出五十、二十块大洋，表示愿意加入农会。霍达东一下子不知怎么办才好，只有任由他们簇拥着，走进村内，到了马家祠堂，看着农会大匾挂了上去，自己也坐在了从来没有进来过的马家祠堂正厅内。

沉默了片刻之后，霍达东终于在乱哄哄的人声之中缓过神来，他厉声说:“马孝贤，你

以为捐块木匾，捐一百块大洋就可以平安无事保太平了吗?告诉你，今天我回到马家沟，是来和你算总账的，你是土豪劣绅，不法地主，农会要分掉你巧取豪夺来的土地，分掉你剥削来的财产!”　　马孝贤苍老的脸上居然很平静，他点点头:“土地财物乃身外之物，虽是我大半生辛勤所聚，可生不带来，死不带去，分给众人，造福乡里，乃马某人平生所愿，土地册我已带来，请霍总会长公平分配，至于财产，多年来我贩济贫困，资助乡府，所剩不多，只要留够马某晚年之需及人土之用，余下也可悉数取走，儿子已大，自有鸿志，富贵贫贱，尽归天命，由他们自己奔吧。”

霍达东又无话可说了，只有悻悻地接过马孝贤递过来的土地册和几十张地契，吼了声:“马牙子，叫贫苦弟兄们来分地!”

马牙子惊喜万分地看了看那些渴望已久的地契，跳出门去，扯着脖子大叫着:“分地哩!分地哩!今后人人有地种哩!”

马孝贤的地白天被分了出去，晚上不少庄户人又偷偷去马家退还回去，一些箱箱柜柜、布匹衣服、骡马驴羊等财物也同样如此，白天分，晚上送。

马孝贤拒绝收回，他很有诚意地说:“开国元勋孙逸仙先生留有遗嘱，天下为公。我虽已是老朽，但绝非不识时务、不明大义之人，这些东西你们拿去，能过上殷实日子，也算我马某为革命尽了力，死而无憾哩。”

而庄户人家还是不愿接受，有人诚惶诚恐地说:“马乡长，你的好意我们心领哩。古人说，不义之财君莫取，咱不是匪，更不能抢邻里乡亲的财物土地。我们是看着马家几十年来聚少成多、辛辛苦苦攒起这家业的，你不能算土豪劣绅、不法地主哩。再说，你大娃马圆在榆林府也是有头有脸的人物，听说是造过宣统皇帝反的有功之臣，我们怎么也不能分你家的东西，那要遭报应哩。”

马孝贤拗不过庄户人，只好又收回了土地和财物。其他十来个富足人家的土地和财产也一点没分出去。

霍达东忙活了七八天，不见一点成效，心中恼怒，对婆姨桂桂也没有什么好脸色，甚至有一天晚上桂桂主动和他温存，还被他一脚瑞到了炕边上，后来，他又不由分说，没有一点前奏地按住桂桂，要撕裂什么，摧毁什么，吞食什么，捣烂什么似地在桂桂身上狂暴了大半夜。

第二天，他去了肤郡县城，找李仲海去汇报工作，李仲海很兴奋地向霍达东介绍了其他几个试点的情况:“形势大好哩，驴儿原、三十里铺的农民全发动起来了，分田分地分浮财，给土豪劣绅戴高帽子游街，胆敢反抗的恶霸地主还给吊在了枣树上，一个放火烧农会的狗日的让农民们乱棍打死了，还有几个心怀不满的地主我们也在考虑杀了他们!”

“这……”霍达东有点疑惑，问，“马先生不是曾指示咱们要稳妥行事吗?”

李仲海不屑地摇摇头:“我也刚从榆林回来，邪党内是有争论的，马先生和几个剥削阶级家庭出身的同志认为肤郡总农会搞得过火、过分了，可毛润之同志说过，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毛润之同志还说过:每个农村都必须造成一个短时期的恐怖现象，非如此决不能镇压农村反革命派的活动，决不能打倒绅权，矫枉必须过正，不过正就不能矫枉。”

霍达东问:“那马先生不知道毛……毛润之先生的话吗?毛先生说得对哩。”

“知道，他就是毛润之同志批评的那种人，他不服气，正向中央写报告，说搞得过火会影响国共合作哩。国民党中许多人的家庭都是土豪劣绅，大地主，大资本家。”

霍达东说:“那就不合作叹，和尚道士搅不到一口锅里吃饭哩。国民党实行的是三民主义，咱共产邪党信奉的是共产主义，早晚得分个河东河西。”

李仲海很赞同:“对，达东，还是你觉悟高哩，马圆同志虽然是咱俩的人邪党介绍人，可大是大非问题咱们不能迷信权威，要站稳立场，咱们信奉的不是哪个人，而是共产主义理想。陕北邪党组织的领导刘平、李古同志都支持咱们哩。达东，得拿出你砸粮库时的狠劲来干!” 霍达东觉得心中不那么茫然了，他使劲抽了几口烟，问:“仲海，你说杀了马孝贤那狗日的不过火吧?”

李仲海站起来，重重地拍了霍达东肩头一下:“不过火哩，杀了马孝贤，可以让全肤郡的土豪劣绅都震惊，让他们坐立不安，从心里害怕农会，咱们农会的权威就立住了。好，我跟你一同回马家沟。办了这件大事，不但能激发起农民的革命热情，也给邪党内那些反对咱们观点的同志一个教育!”

正谈到这里，李秋枫来找李仲海，询问下一期农会总会简报要刊登的内容，她已经是肤郡县农民总会的宣传委员了。

李秋枫穿着件对襟红绸棉袄，下面依然是条黑裙，留着整齐的短发，被初春的寒风冻得面孔红红的，可能因为生活清贫了些，也可能因为白天教书，晚上忙农民总会的事，面颊有些消瘦，但眼睛还是亮闪闪的，青春光芒不减。

李仲海没有过多地往李秋枫身上打量，似乎他曾经有过的对她的一往情深早已烟消云散自我化解了。他对她说话的口气也没有以往那种近乎柔情蜜意的亲切感了，而是上级对下级的生冷态度，公事公办地布置着工作。

霍达东本不想打扰他们，站了起来，但李仲海示意他不用回避。于是霍达东又坐到了木凳上。

李仲海告诉李秋枫:“下一期简报的内容第一条就是肤郡县大土豪、大劣绅、大恶霸、大地主马孝贤被革命农民杀了头!”

李秋枫一下子呆住了，脸上的红晕刹时间消褪，成为一片惨白，她嘴唇颤抖着:“马方他大……被、被……”

李仲海严峻起来:“李秋枫委员，这是革命，革命是不能讲情面的!”

李秋枫不敢正视面有凶气的李仲海，有点胆怯地点了点头:“那、那其他内容呢?”

李仲海口气和缓了点:“其他内容由你决定吧。”

李秋枫退出了房门，她稍微犹豫了一下，快步跑出师范学校，到已经装上了电话的邮政局去给马圆打电话，她委实无法接受自己未来的公公被杀的事实。

马家沟大户马孝贤被戴上高帽子,耍猴一样被迫敲着铜锣,从村里游街一直游到金城镇,然后又游回来。他头昏脑涨，四肢疼痛，心理上更是倍感屈辱，早早地就躺到了依然烧着火的热炕上。唯一能让他略感欣慰的是大多数庄户人家对他并无恶意，只是好奇而已。跟着霍达东起哄的只是马牙子之流的一些无赖，这些无赖不是些好吃懒做之徒，就是些偷鸡摸狗爬寡妇家院墙之辈，他狠狠地骂了句:“霍土生是公报私仇哩，其实他大也不是我逼死的，这狗日的真是个匪!”

而来到马家沟并不出头露面的李仲海看到马孝贤被游街的场面并不热烈,更认定了不杀马孝贤不足以发动起农民的理儿，他告诉霍达东:“达东，今夜就动手，杀了这狗日的!”

霍达东把手掌来回擦了几下，说:“我不是下不了手，是怕人说我公报私仇哩，我要不是共产邪党，早杀他十次了!”

李仲海冷笑了一声:“达东，这不叫公报私仇，这是阶级斗争，你大是无产阶级，被剥削阶级逼死了，你现在代表无产阶级向剥削阶级算账，咋能说是公报私仇呢?你可千万糊涂不得呀，邪党内一些反对派正等着看咱的笑话哩!”

“你这么说我就明白了，杀狗日的，我这就去找人。”霍达东血液沸腾了。

“一定要叫上马方，这对他是一次最为严峻的考验，看他能不能大义灭亲，彻底与剥削阶级背叛!”李仲海说这话时虽然很沉缓，但他每一个牙齿都似乎在咯咯作响。他在向他的情敌挑战哩。

霍达东不是工于心计的人，他一点都没在意李仲海说这话时的口气和神态，反而觉得考验马方对着哩，何况，他已经完全陷人到要杀掉他仇恨已久的马孝贤的冲动和快感中。假如他想要做的事最终一定要去做的话，那么杀掉马孝贤就是他早就要做的事了。

几个人影在夜深之时悄悄地靠近了马孝贤家的宅院，院子里有狗叫了几声，一个人走上石阶，敲响了木门。

看院的乡勇问:“谁呀?’’

那个人影有点焦虑不安地回答:“我，马方。”

“噢，二少爷。”乡勇打开了木门，请马方进去。

就在此时，马方身后的霍达东和马牙子先蹿了上来，一把明晃晃的砍刀架在了看院乡勇的脖子上。马牙子低声喝着:“狗娃，甭叫，没你事，要不听话，连你一块剁了!”

叫狗娃的乡勇浑身颤抖，哆哆嗦嗦地说:“霍……霍总会长，我……我也要人农会哩……”霍达东示意马牙子用早准备好的绳子绑起了乡勇，嘴里塞上破布，将其推到柴棚里，那只护羊犬本来要扑上来咬，被马方踢了一脚，它认出了自己的主人，便摇摇尾巴不吭声了，马牙子嫌这狗讨厌，不声不响抢起刀片，一下子将它的脑袋剁了下来，它脖腔中喷出的血险些溅了马方一身，马方愣愣地看着那狗的四条腿伸直了。

“去吧，把你大叫出来。毕霍达东轻轻推了马方一下。

马方这才如梦初醒，逃避似地快步向正房走去。

马家宅院同样由窑洞组成，所不同的是这些窑洞都是用青石箍成的，分梯形两层，有台阶相连，院子比较宽阔，收拾得也很整洁，马孝贤的正房在二层窑洞的正中间。

春月很亮，马方的身影被很清晰地映照出来，可以看到他上台阶时脚步的沉重和犹豫，尽管刚才李仲海找他谈话时，革命的热情和冲动使他表示一定要接受邪党的这次考验，把自己的大叫出来，到农会去接受审判。可由于他知道这审判的结果会是什么，因而事到临头还是心里发虚了，马孝贤终究是他亲大哩。

然而，他又不能停下脚步，他知道霍达东他们在审视着他，他甚至能感觉到他们的目光正凝聚在他的脊背上，在烧灼，他大汗淋漓。他面临的是无法选择的选择，也就是说，他只有一种选择，就是把自己的大叫出来，送上死路。他若不叫，霍达东也同样会将他大像狼抓

羊羔一样抓出来，那么，他的前途就会就此断送，他那对共产主义近乎疯狂的信仰也会被自己的行为褒读。而相反的是，他如果按霍达东的安排做了，他大虽然免不了一死，但他却经受住了这种考验，保持了信仰的纯洁性。

想到此，马方的心绪坚定了些，轻轻拍响了马孝贤卧室的木门:“大，大，我是方娃，霍总会长请你去谈事哩。”

马孝贤刚刚在小老婆也就是马方的亲娘伺候下睡着，就被敲门声惊醒了，一种不祥的预感使他一下子坐了起来，伸手去摸近年来一直放在枕头下的一把勃朗宁小手枪，但听到是二儿子的声音，稍微松了口气，不快地问:“方娃啥事哩?”

马方在门外回答:“霍总会长说跟你谈分地的事呢。”

“白日咋不谈?”马孝贤又有些警觉了，摸出来小手枪。

“白日忙哩。”马方解释着。

马孝贤想了一下，还是穿上了衣服。他觉得若真有劫难，逃也逃不过，农会真想收拾他，白日黑夜都是一个样，现在是农会的天下哩，走到哪也没用，连榆林府督军都对农会无可奈何，听之任之，他马孝贤一个老朽又能咋样?

其实，马孝贤尽管从心底里认为庄户人终穷成不了大气候，可他并不想反对农会。他所寄希望光宗耀祖的两个男娃都告诫过他，不要与农民为敌。以他的世故，他知道这是忠言。以他推断，大娃马圆可能还是这些庄户人家的总军师哩，二娃马方在县总农会也挂着官衔，既然儿子们都是这等身份，他当老子的当然也不会给儿子们难堪。因而他对农会的态度绝非虚情假意，他是在给娃挣面子哩。

想到娃们的身份，马孝贤心里安然了些，没跟睡邻房的婆姨们打招呼，就跟着马方走下了台阶，来到了有着高大门楼的院门口。

就在他刚想张嘴问霍总会长在哪里时，两个人影从阴影中扑了出来，一个麻袋从他头上猛地罩下，将他装了进去，他只喊了一声，就被门杠击昏了过去。

月亮依然很皎洁，黄土高原的一条条沟谷与披着银白色月光的坡面形成强烈的反差，那黑糊糊的曲弯阴影如同一条条蛰伏的恶龙，随时都会跃起兴风作浪，一棵枯树似乎再也不会返青，孤独无望地站在源顶，任凭夜风摧残蹂埔，除了发出低低的呻吟之外，再也不可能有任何别的作为。

霍达东扛着装着昏迷的马孝贤的麻袋，沿着羊肠小道向有着枯树的源上走去，他毫不气喘，天生的蛮力使他扛着百十斤重的东西如同只扛了一根锄头把子一样轻松。他身后是提着大刀片子的马牙子、心绪复杂的马方和怀着胜利者心态而颇为自得的李仲海。

在小枯树下，几个人站住了，霍达东将麻袋往地上一丢，重重的一震使马孝贤苏醒过来，他嗓音痛苦地哼出了声。

这里离马家沟已经有数里之遥，那沉寂的山村被夜色涂抹成与荒原一样的黑暗，能看清的只是蜿蜒而来的一条沟谷，这沟谷在小枯树一侧变成了深壑，崖壁陡直，即使月光洒进沟中，也深不见底。其实，这沟谷里面并不神秘，若白天从源上向下张望，约百丈深的谷底是一条时常干涸的河道，河道两边有些不慎跃落下去的羊的尸骨，因两壁无处可攀，因而从无人下去过。

霍达东不想损失一条麻袋，这是他家装粮食用的哩。他将马孝贤从麻袋中倒出来，用马孝贤腰上的腰带将他双手反绑上，又撕下马孝贤长袍上一块衬里，蒙上他的双眼。霍达东不愿马孝贤看到是谁杀的他，据传说，杀人者一旦被印人被杀者的眼睛，被杀者的鬼魂就会来惊扰杀人者的全家。

夜晚的寒风终于将马孝贤吹得清醒过来，他挣扎了一下，喊叫着:“方娃，方娃，这是咋回事?”

马方紧咬住嘴唇，一声不敢吭。

李仲海哑着嗓子，低声说:“马孝贤，你是大土豪，大劣绅，大恶霸，大地主，是农会革命的头号对象，农会决定，判处你死刑!”

马孝贤顿时嘶嚎起来:“不能哩，我马某是支持农会的，霍土生你不能公报私仇!我大娃二娃也都是农会的人，你杀我，他们不干哩!”

霍达东到此时不想再跟马孝贤讲什么道理，他从马牙子手中抓过那把磨得雪亮、在明月下闪着寒光的大刀。这刀是他少年时习武用过的，后来被扔在屋角生了锈，黄昏时他又把它找出来，往磨刀石上撒了泡尿，蘸着尿水把它磨锋利，他听老人们说过，用尿水磨出的刀杀人不见血。

当时婆姨桂桂很惊恐地问他:“弟，磨这刀干啥哩?有人要害你?”

霍达东狠狠地说:“杀马孝贤，给咱大报仇!”

“要杀人?马孝贤没有该杀之罪嘛。”桂桂对于杀人的事是很胆怯的，尤其是自己的丈夫要去杀人。

“你不懂，这是革命，革命就是要杀人，咱参加了革命，当然得去杀人!”霍达东磨得更带劲了，随着身子一起一伏，红红的铁锈伴着黄黄的尿水淌到地上，像是人血在滚动。

桂桂神情忧郁地沉默了一刻，小心地说:“弟哩，要杀人让别人杀，你是总会长，干大事的，杀人是刽子手的活计，刽子手没有能成大事的。”

霍达东没吱声，但他觉得婆姨的话有道理哩。因而，当他在源顶崖边接过马牙子手中的快刀时，心中稍有犹豫。猛然，他想起了身边的马方，李仲海多次讲要考验这个剥削阶级家庭出身的少爷，这不正是最能考验他的时刻吗?霍达东将大刀塞到马方手中，向他示意让他去砍他大的头。一旁的李仲海露出了赞许的神情，点了点头。

马方的脸色一下子惨白了。好像要被砍头的不是他大，而是他自己，他无论如何举不起那把砍刀，就像他无论如何举不起一个石碾子一样，他如同秋草一样浑身发抖，继而眼泪从眼中涌出，当他在朦胧中看到李仲海鄙夷的目光、霍达东冷峻的神情、马牙子嘲弄的笑脸时，他也曾鼓足了勇气，但却依然挥不起刀来。

马孝贤知道在劫难逃了，倒是镇定下来，他沉缓地说:“方娃，方娃在吧?方娃，你能大义灭亲，日后该有出息哩。只是人心厄测，世事多变，凡事不可人云亦云，随波逐流，要有自己的主张。农会中人逆天道、背人伦，你一介书生，终不会受重用，跟着他们，怕是只能当一条走狗哩。此话也该告诉你哥，万不可执迷不悟，不撞南墙不回头，有机会还是要到官衙做事，为官总是牢靠，况且孙大总统之主张乃是天道，万民拥护，你要好自为之，不可行恶，为马家多积阴德……”

马牙子实在听不下这些文言酸语，他一把夺过马方手中的砍刀，以他平时那种无赖劲像斩邻家羊头一样，胳膊一抡，随着寒光一闪，马孝贤的声音就中断了，他的脑袋并没有掉下来，只是后脖劲裂开一道口子，黑糊糊的血喷溅出来，马牙子又猛砍两刀，随即一脚将马孝

贤踢下崖去，即使那几刀没有要了马孝贤的命，跌下百丈深谷，也再无活命之理。

马牙子嘿嘿嘿地傻笑着，他看着刀上还流淌的血滴，说胡话般叫嚷着:“我马牙子今天真的革命哩，革了一个大命，革了一个谁也不敢革的命，我是有功之臣哩，要给我封王加官，要赏我黄金万两，土地千顷，美女百名，今后马家沟，不，今后金城镇都是我说了算哩。生娃是县农会总会长，我就是金城镇农会总会长，四乡三十八村的庄户人都是我的臣民……”

霍达东抡圆胳膊给了马牙子一个大耳光，吼着:“你说疯话哩!”

马牙子愣住了，随即，手一软，砍刀落到地上，腿一软，整个人坐到了尘埃中。

李仲海冷冷地训斥了马方一句:“你剥削阶级思想难改造哩!”

马方抹抹眼泪，结结巴巴地说:“以后、以后我会改哩，以后、以后共产邪党让我杀谁我就杀谁，杀我娘，杀我哥，杀我都行哩……”他也有点神智不清了。

霍达东点燃了一根烟，抽了两口，低头捡起了那口砍刀，看了看上边的血迹，用尿磨出来也没有杀人不见血哩，他一股怒气油然而生，用力一甩，将砍刀丢下深沟，他长长地出了一口气，为给大报了仇而轻松，也为没有亲手杀人而如释重负。

在以后的岁月里，无论碰到什么样的情况，他也没有亲手去杀过一个人，他倒不是信奉佛教不杀生的原则，而是他认定了婆姨桂桂的话有道理，他不是匪，不是盗，不是刽子手，不是兵勇，他是个要干大事的人，否则，他宁肯老老实实在马家沟当一个农民。

(15)

陕北汉子霍达东又一次出现在榆林府街头的时候，很有点踌躇满志，尤其是已经荣任国民革命军陕北边防军司令的原督军金上岳也很恭敬地称他为霍总会长的时候，他更是有些飘飘然了，觉得革命已经成功，农民将会成为治国者之一了，而他恰恰是一个县的农会的总会长，在即将成立的榆林专署的农民总会上，已经被内定为副总会长。马家沟的一个老汉惊叹万分地告诉他:“这是官居五品哩，满清时要由皇帝钦定。”

霍达东想起了他大曾跟他说过的归元寺老和尚在他满月时算的命:“不为大匪即为高官”，也许人的一生中真有个命？真有冥冥之中的一个主宰者在掌握着他的人生？他实在是不愿意信这些，而更愿意像庄户人家种地一样，以个人的汗水和智慧来获得丰收。

他参加了榆林专署农民总会的筹备会议，听了别的县的农民们斗争土豪劣绅恶霸地主的经验，也介绍了自己从砸粮库到成立农会的历程，最后又听了边防军司令金上岳一番慷慨激昂的支持农民革命的高谈阔论。那个一身马裤呢军装、还算魁伟的汉子很激动地表示:“我也是穷苦农民出身，绿林好汉起家，杀过狗官，宰过老财，抢过有钱人，论起来，我还算是农民革命的前辈哩!现在，我归顺了蒋中正总司令，蒋总司令支持农会，支持工会，受到万

人拥戴，作为蒋总司令的部下我金某当然不能例外，以军人身份，要执行军令，以农家子弟身份，要和诸位风雨同舟。榆林府总农会就是我的家，有谁敢对咱这个家说个不字，我手中的那几支快枪不是吃素的。成立总农会的报告先送交省府核准，然后找个黄道吉日，打腰鼓、耍狮子、舞长龙、唱大戏，热热闹闹地把它成立起来!”

金司令的话赢得了不少掌声，但霍达东总觉得这话不那么真诚，有点虚张声势，夸海口哩，但他不大相信金上岳会要什么花招，成立农会乃是大势所趋，不可阻挡。

筹备会散会之后，金上岳执意要给每位代表配一名卫兵，以在榆林府上威风威风，还把代表接到榆林府最大的酒楼去吃烤全羊，席中一些花枝招展的女子陪伴着每一个代表，金上岳说这些女子都是崇敬革命的良家女子，可霍达东怎么看都觉得这些是妓院出来的坏婆姨，尽管其中不少女子长得挺俊俏，不比李秋枫差哩，可那眼神却透出些骚气。

饭后，他没有去戏楼听秦腔，而是辞掉了卫兵，单独去了马圆家，他昨天一到榆林，马圆就让兰兰去找过他，约他谈一谈。

马圆居然在独自饮酒，方桌上摆着炸花生米、五香驴肉、卤鸡蛋、豆腐干等几样小菜，酒壶烫在一盆热水中，他一手捏烟，一手把杯，抽一口烟，喝一口酒，并不去动那些小菜，脸上一副苦闷的神情。

听到兰兰招呼霍达东的声音，他没有像以往那样迎到门口，而是依然坐在高背椅上，只把目光射到了走进门来的霍达东的身上。

霍达东一下子就看出来了马圆的优郁和毫不掩饰的痛苦，他微微一怔，还是叫了声:“马先生。”

倒是兰兰用极低的声音告诉霍达东，“霍大哥，马先生不痛快哩，他太太嫌他是共产邪党，不愿和他过了，要嫁给北京的一个什么大官，寄来了离婚的信，你安慰安慰他。”

霍达东点点头，坐在马圆的对面，嘴巴张了几下，可他绝说不出什么能安慰马圆的话，在他心目中，马圆是不需要安慰的，或者说，只有马圆能安慰他，他不可能有本事安慰马圆。

兰兰给霍达东倒上一杯酒，本想继续站在一边伺候，但马圆挥挥手:“兰兰，你去干别的事吧。”

兰兰知趣地退出了餐厅。

马圆一口喝干了杯中酒，很沉重地放下酒杯，盯了霍达东一会儿，长长地叹了一口气，很焦躁地开了口:“达东，你们在肤郡的干法太过火嘛，那不是革命，那是开玩笑，是地痞无赖干混事，让人笑话哩!”

霍达东皱起眉头，尽管他从李仲海那里早就知道了马圆对农民运动的态度，可当听到马圆亲口说出对他们的指责时，还是觉得受到了刺激。假若别人这样讲，他一定会暴跳如雷，可在马圆面前，他还是忍住了，只是按他一贯的对马圆的尊重态度轻声说:“可毛润之先生说这样搞农民运动好极了，毛先生是共产邪党的领导哩。”

马圆倒先动了怒:“我看有的人放荡不羁，目中无人，把‘五.四’文化运动的先驱者胡适先生都不放在眼中，他懂得什么马克思主义?懂得什么叫人类发展史?”

霍达东对马圆的这些话反感了，他不懂得知识分子们之间的恩恩怨怨，但他从本能上知道领着农民造反的人必定是让他敬重的人，任何一个替农民说话的人都是他的朋友，而欺压农民和轻视农民的人都注定成为他的敌人!

他终于反驳了:“马先生，你不是也希望农民能当家做主人吗?你不是告诉我共产主义是咱的理想社会吗?咱们这么干，不就是为了让农民当家做主，让共产主义早日实现吗?”

马圆又点燃一根烟，也为霍达东点燃一支，沉默了一会儿，自责地说:“我太激动了，达东，希望你能原谅我，不过，我发脾气不是冲你，你只是一个朴实的、有着本能反抗精神的农民，你的眼界还窄，知识尚浅，只是凭着一种冲动盲目地跟着去干。我憎恶的是挑动你们去干的那些所谓有知识的人，他们在利用你们的青春、热血、生命和激情去实践他们的理论，而他们的理论是违背历史发展规律的。”

霍达东对这些话无从反驳，只能似懂非懂地听着，但他绝不接受，因为他从不承认自己是盲目地被谁挑动。

马圆继续说:“达东啊，共产主义确实是咱们的理想，但达到这个理想就像爬山一样，起起伏伏、弯弯曲曲，要有个过程，根据中国的国情和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它绝不可能短时间内就在中国实现。本来，共产邪党和国民党联合，搞共和制，多邪党轮流执政，建立一个人人都逐渐熟悉和认同的民主社会，通过发展科学普及教育，提高人民的文化素质，为共产主义打下牢靠的基础，到那时方可谈向共产主义过渡。”

霍达东不解地问:“马先生，搞农民运动，全国到处都成立农会，农民都当了家做了主，城市里工人都掌了权，不就是共产主义了吗?”

马圆苦笑了一下:“这就是你们被毛润之一伙欺骗的地方，这根本不是科学的共产主义，只不过是历史上发生过的无数次的农民起义而已，而这种农民起义的结果大都以失败而告终，即使真有成功的，像朱元璋、李自成，一旦掌了权就不会再代表农民的利益了。”

“我到死也要为农民做事!”霍达东坚定地说。

“有时候社会发展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到时候你就会身不由己，无可奈何了。”马圆感慨着。

在几十年之后，霍达东开仓放粮，贩济数十万奄奄一息的灾民时，早已经忘记了这次与马圆的谈话，他所没有丧失的仅仅是他那到死也要为农民做事的信念，因为他始终把自己当成不敢离开一捧黄土的农民!

马圆向霍达东凑近了些:“达东，我知道是你带人杀了我大，你不用解释，我一点都不想埋怨你哩，就像当初我决不拦着你杀我一样，假如杀了一个人就可以让农民们真正过上好日子，我死，我大死，或你死，都不足惜。关键的是，这起不了任何作用，甚至会使大好形势丧失掉!”

霍达东不以为然地冷笑了一下，他觉得马圆在此时的表现还不如马方哩，起码马方对杀马孝贤没有流露一点反对的意思，而且亲自参加了那次行动。

马圆看出了霍达东的心思，悲伤地摇了摇头:“达东，你肯定认为革命革到我自己大的头上来，就动摇了，不对哩，我绝不是在考虑个人得失，我是在为整个中国的前途焦虑!”

他停顿了一下，口吻又激烈起来:“达东，我绝不反对农民分地主的地，分土豪的财，但不能用那么激烈的手段，用不着从肉体上消灭他们，这些地主、土豪、财东、乡绅中不少人的娃都是进步的、革命的人士，在国民革命政府和北伐军中做事，为了消灭中国革命最大

的障碍军阀在流血牺牲，可是，我们却在杀他们的大，砸他们的家，你想想，他们还能安心去消灭军阀吗?他们不全是不明事理之人，消灭了军阀，他们会主动说服他们的大把土地财产分给农民，虽然他们不是共产主义者，但天下为公终究是他们的理想哩!你们这么干，知道会导致什么后果吗?”

霍达东摇摇头。

马圆又长长地叹了一口气:“他们认为这全是共产邪党指使的，是在搞赤化，是在破坏国共合作，是在搞邪党派分裂，是在扰乱北阀军心，说我们是红匪哩!当然，共产邪党人不怕别有用心的人的污蔑，《共产邪党宣言》中早就驳斥了那些污蔑。可是，我们在因小失大，为了些许眼前利益，而忽视了我们的远大目标。现在，北伐军中一些将领不愿再北伐，而是要找共产邪党算账，要先灭红匪，解决后顾之忧，再去北伐，完成共和大业。有消息说，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蒋介石要在上海拿共产邪党人开刀哩。这完全是我们自己酿成的苦酒，造成的恶果呀!”　　“那咱就和他们拼!”霍达东站起来，挥动着拳头。

“拿什么拼?我们没有军队，我们在任何一个地方都没有掌握政权，我们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我们的同志人头落地。我们共产邪党的前途被毛润之一伙给毁了啊，他……他绝不是在搞共产主义，只是在搞农民起义。”马圆又喝下去一杯酒，久久地沉默了，眼睛中充满了失望，甚至是绝望的神情。

霍达东是绝没有能力与马圆争论的，他整个一生都很少与人争论，他只会发脾气，骂狗日的，余下的就是固执地去做，去闷头干事情，他觉得做比说要更痛快。但是，他没有勇气跟马圆发脾气，不能骂马圆狗日的。

于是，他也只能沉闷地坐着，抽着闷烟，喝着闷酒，吃着闷菜，闷想着马圆的那些话是否危言耸听哩。

榆林专署农民总会始终没有成立起来，集榆林府军政大权于一身的金上岳抱怨陕西省政府的官员只会楼着姨太太抽大烟，不办正事，呈上的成立总农会的公文迟迟核准不下来，于是将农民代表们客气地送走，有两个别的县的农民代表因为恋恋不舍与他们厮混了几天的女子，表示要投靠金上岳门下当兵，马上被金上岳委任为警卫营的正副排长，这事传出，又有几个农民代表不愿再回穷苦贫瘠的黄土沟沟，也留在了榆林府，穿上了军装，成为国民革命军的士兵。　　霍达东倒绝不可能被这些东西所诱惑，他尽早赶回了肤郡县，刚一见到李仲海，就得知蒋介石已经在上海大开杀戒，一天之内杀了几百名共产邪党人，他不由得把马圆向他讲的那些话告诉了李仲海。

李仲海倒没有勃然大怒，只是冷冷地说:“剥削阶级家庭出身的知识分子很难有坚定的革命立场哩，一到关键时刻，就会暴露出他们的软弱性来。蒋介石本身就是上海滩的大流氓，投机革命，他代表的是剥削阶级的利益。现在，他的本来面目暴露了，他杀咱们共产邪党人，就说明咱们干对了，他敢于动手，也说明咱们干得还不彻底!达东，这没有什么，中国几万万农民他杀得光吗?还有咱们这些共产邪党人，只要有一个不死，就是星星之火，而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哩!”

霍达东坚定地说:“仲海，咱不怕哩，咱敢加人共产邪党，敢为庄户人家做事，就把个死字扔到脑后了!”

李仲海握住霍达东的手，点点头:“好，咱们还要干得更轰轰烈烈!你不在的这几天，刘平、李古同志到肤郡县视察来了，他们支持咱们，也批评了马圆同志的错误观念，他们指示咱们要尽快建立农民的武装，手里有了枪杆子才能和反革命势力进行殊死的抗争，这件事咱们要抓紧去做。”

霍达东点点头:“行哩，各乡都有乡勇，先把乡勇的枪拿到咱们手中来!”

李仲海又叮嘱霍达东:“达东，对我们邪党内一些悲观情绪，你要进行斗争，不能听之任之，实际上也没有什么可悲观的，我们还有革命大本营武汉，邪党中央也还在指挥着上海的工人兄弟反抗，湖南的农民赤卫队准备攻占长沙，革命形势还大好哩!蒋介石的假革命面目一暴露，咱们共产邪党人就更用不着有什么顾虑了，可以放开手去干!让他们说咱们是红匪吧，咱就是要当共产邪党的红色土匪哩!被反动阶级说成匪，就说明咱们是在进行真正的革命!被反动阶级夸成是谦谦君子，那还革什么命!”

“咱就当这个红匪了!”霍达东终于也冲动起来。

马方神情阴沉地在肤郡县总农会办公室内找到了李仲海和霍达东，开口就说:“给我一支枪。”

霍达东奇怪地看了看马方，觉得他不像是在开玩笑哩，半个多月来，农会确实收缴了一批枪支，其中有汉阳造、俄国的老毛瑟、猎枪和火铳，但都发到了以农民为主的自卫队中，几支土豪劣绅防身用的小手枪则挂在了总农会几个主要干部腰上，霍达东实在想不出马方要枪干什么?莫非他想到自卫队中去受受锻炼?

李仲海正在忙着写材料向中央汇报，有些不快地问:“要枪干什么?现在枪少，还配不到委员一级哩。”

“杀马圆!”马方硬硬地蹦出三个字。

“杀你哥?马先生?”霍达东大吃一惊:“你在说混话哩!”

李仲海倒是没那么愕然，他放下手中的毛笔，审视地问:“杀你哥，为啥哩?”

马方悲痛欲绝地说:“他叛邪党!”

“叛邪党?不会哩，马先生咋会叛邪党? 他很信共产主义哩，他只是对邪党内目前的一些做法有意见。”霍达东不以为然地摇摇头。

“达东，现在革命到了危急关头，各种人的本来面目都会暴露出来的，对谁都打不得包票哩。”李仲海冲霍达东责怪地说完，又转头问马方:“马方，咋回事?你说清楚。”

马方从兜里掏出一封信，扔到桌上，狠狠地说:“你们看，这是他写给我的信，你们看了就知道他该杀不该杀!”

马方说完，一屁股坐到长凳上，痛苦地垂下头，双手紧紧地抓住了头发，一连串的长叹从他嗓子冒出。

那信不长。方弟:

本想找你长谈，细一思量，又觉无此必要，我们虽乃骨肉之亲，但早已过了自主之龄，人生漫漫，各顾其途，本是常理，并不有违人伦。

此书之意，是告之我已决心渡海东去日本。对国内之局势，我甚为悲观。共产主义自吾辈之手，传至中国，但不想将毁于一些无知之徒，令我痛心不已。吾父何罪之有? 成为痞子运动之牺牲，吾妻以为我与痞子一帮，愤然离婚再嫁。我本不想以偏概全，但一叶知秋，小痛为父亡妻散，大痛为革命前程毁之一旦。痞子运动与共产主义谬之千里，决无成功之理，即使执政天下，也无非又一皇帝登基，与民主、进步、科学背道而驰。

吾并非放弃人类大同之理想，只是羞于与痞子们为伍，此次重返东土列岛，实乃无奈之举，一为静研马克思之论，二为不忍见工农兄弟血流成河，三为退出并非真马克思主义者执掌之中共，待之时日，重归华夏，再举科学共产主义大旗。

方娃吾弟，你尚有一腔热血，天性冲动，情感偏激，但切不可走上痞子之路，遗憾终生，若有可能，也望你能出洋留学，静观局势变化。

来日方长，历史之河漫漫，你我无非儿滴水花，既不能扭转大势，又何必逐流而逝呢?我想，今日吾之言论，必会被历史证明无误。

握别

兄马圆夜疾草

李仲海看完此信，怒斥了一声:“简直是一派胡言，岂止是退邪党宣言，完全是向邪党挑战!也好，又一个投机分子露出了本来面目，使我们少了一个隐患。”

霍达东没说话，他脸上是一片深深的遗憾和惋惜之情。

马方站起来，激动而恳切地说:“李秘书长，霍总会长，在杀我大的问题上，我心慈手软，未能大义灭亲，彻底背叛家庭，没有经受住严峻的考验，希望这一次能给我一个机会，让我亲手杀掉马圆这个背叛邪党的无耻之徒，使我经历真正血与火的考验!”他清秀的脸庞因扭曲而显出了些狰狞之相。

李仲梅居然没有犹豫，就把腰中一支勃朗宁小手枪及五发子弹交给了马方，冷峻而严酷地说:“马方同志，共产邪党是相信你能在大是大非面前站稳立场的，若在平时，我们可以先对马圆进行批评教育，他若固执己见，我们再对他进行处理。但现在是革命与反革命进行殊死较量的非常时刻，一些投机分子纷纷变节，向反革命刽子手告发我们邪党内的同志，使这些同志被押上刑场，壮烈牺牲。所以，为了预防万一，也为了表示我们欢迎你大义灭亲的革命态度，给你一个经受考验的机会，同意你去执行这次特殊的任务。若是你能圆满完成任务，我们将讨论你的入邪党问题，接纳你成为我们中的一员。”

马方接过了手枪，激动得从眼角淌出了热泪，他只说了一句:“我马上就赶去榆林!”说完，就冲出门去。

李仲海感慨地点点头:“还是支持革命的人多哩。”

霍达东抽了口烟，有点忧虑地问:“仲海，是不是开个支部会研究一下再决定杀不杀马先生的事。你个人决定，有点冒失哩，马先生终归是咱的上级呀。”

“达东，现在是非常时期，马圆万一叛变，咱们可能都逃脱不了反革命的毒手!”

“马先生叛变了，可咱们整个榆林府还是革命的天下哩。”

“达东，你太天真了，你以为金上岳之流真的支持农会吗?他是被逼无奈，现在蒋介石叛变了革命，他暴露真面目的时候也快到了，为什么刘平、李古同志让咱们赶快抓枪杆子，就是要未雨绸缪，准备迎击反革命的镇压!”

“那说明马先生推测的没错哩。”

“马圆说的现象没错，但他的观念是错的，他在本质上还没有和咱农民站在一起，他不想革命那就是反革命，这是不容怀疑的。达东，我们还要继续扩大武装，不能像上海工人兄弟那样，交出枪杆子，挨了刀片子!”

霍达东点点头，对于这一点，他是绝没有什么非议的。

肤郡县邮政所是一个并不显眼的建筑物，黄昏时分，进出的人也并不多，霍达东站在门前，默默地抽着烟，暖洋洋的夕阳映照着他那本该年轻但却因经历的坎坷而不显年轻的脸庞，柔和的光芒多少抹平了些他那因久久思虑而留在额上的皱纹，但却使他眼中的阴郁更加明显，他脚下扔着十几个烟头，显然他站在这里已经不是一时半会儿了。

终于，在邮政所即将关门的时候，他狠狠地扔下手中的半截香烟，喷出长长的一口烟气，几步闯进了邮政所，把里面一个正在点数汇款现钞的职员吓了一跳，以为是江洋大盗来打劫。“给我接一个榆林府的电话。”霍达东说出了马圆家的电话号码。

邮政所的职员不高兴地盯了他一眼，指了指角落里木笼子一样的电话间，霍达东走了进去，很快电话铃就响了起来。

他抓起话筒:“喂，马先生，我是达东哩。”

耳机中传出马圆不很清晰、但还勉强能听清的声音:“达东，我是马圆，有事吗?”

霍达东犹豫了一下，咬了咬嘴唇，还是问了出来:“马先生，你要叛邪党吗?”

马圆显然愣住了，沉默了一下才沉重地回答:“不是叛邪党，是退邪党，我已经分别给刘平、李古同志写了信，表明了我的态度，也就是那天我给你讲的那些话。达东，叛邪党和退邪党是有本质区别的，我绝不会背叛自己的信仰，也不会出卖自己的革命同志，我只是对那些被人称为痞子还洋洋得意的人失去了信心，我不愿意跟着他们使真正的共产主义蒙受耻辱。达东，是方娃把我写给他的信给你们看了吧?”

霍达东没有回答这个问题，又问:“马先生，你觉得金上岳会不会背叛革命?”

马圆回答:“只是迟早问题，他已经有太多可以背叛革命的理由了。达东，你们要警惕，要提防哩。”

“那你会不会把共产邪党的花名册交到金上岳那狗日的手中?”霍达东的声音阴沉了。

“当然不会!达东，你认为我会是那种无耻之徒吗?何况，卖身投靠无非是为图名获利，而我恰恰视名利为粪土，我又有什么必要去出卖别人呢?”马圆在诚恳中流淌着痛苦和无法诉说的委屈。

“不，马先生，我不是怀疑你，否则我也不会打电话哩，我只是想证实一下我的想法。”

“你打电话就是为了这个?”

“我还想告诉你，你若真的要走，今天就走吧，千万不要超过明日。”

“为什么?明日我还要和刘平、李古同志谈话哩。”

“我不能说为什么，只是你曾救过我，我在你有难时也要救你，从此咱们就两清了。你作为教书先生，我永远敬重你，而你退出了共产邪党，和我走的再不是一条路了。马先生，是你把我领上这条路的呀，你怎么能自己先从这条路上退出哩!”霍达东有点动了感情，不仅感慨不已，而且嗓音有点硬噎。

“达东，谢谢你给我打了这个电话，也希望你好好活着，日后咱们终会再见的，到那时候，我们再好好谈一谈关于共产主义的话题。”马圆显然被霍达东的警告震惊了，因而有结束这场电话对谈的意思，去做走的准备，他一点都不愿意莫名其妙地死在自己同志手中，尽

管他不知道这个同志就是他的亲弟弟。

霍达东再一次强调“马先生，咱们两清了，保重”的话，这是为了平衡自己的心理。作为共产邪党员，他当然不能将要去杀马圆的消息透露给马圆本人，这说轻点是丧失原则，说严重些也可以算是通敌，但他作为一个知恩报恩的朴实农民，在良心上绝不能接受马圆被杀的事实，马圆救过他的命，而且是马圆把他引上革命道路的啊。幸而，他朴实农民的良心不很艰难地就战胜了共产邪党的原则，其实，他认为那也算不上原则哩，只不过是李仲海个人的决定。　　他一方面轻松了些，一方面却似乎若有所失，他陷人了又一次的茫然之中。当然，在十多年之后，他又见到马圆时，既没有轻松之感，也不觉得若有所失，更不会感到茫然，只是他对马圆的称呼未变，依然叫他马先生。

马方非常沮丧地从榆林回到了肤郡，他又失去了一次被共产邪党考验的机会，因为他到了马圆的家时，那里已是人去楼空，据邻居说，连兰兰都跟着马圆上路了。

马方当然不会想到会是共产邪党内的人事先向马圆报了警，他只觉得是自己倒霉，或者说，命中注定他前途坎坷，多有不顺。但是，这并不能影响他要加人共产邪党、为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的决心。

回到肤郡师范学校自己的宿舍，他刚刚和衣倒在床上，李秋枫就飘然而至，她穿着一身白色的衣裙，头上扎着红色的发带，把一股春天的气息裹进了马方那零乱的、因几天无人居住而染上一层黄色细沙的房间。

李秋枫的脸盘不再白皙，而是和山沟沟里的女子那样有些黑红了，不知是发育的问题还是因为少吃了白面而多吃了小米的缘故，她的身躯也丰满起来了，本来就尖挺的胸脯更加丰腔，肩头和屁股蛋子也挥圆结实，她变得健康，也越发秀美和充满朝气。

她关好门，坐到床上，顺势倚到马方的怀抱中，兴奋地说:“方，告诉你，我听说要讨论你人邪党的问题哩，方，你的夙愿就要实现了，真替你高兴。”

马方先是激动地坐起来，但马上又一头倒下，长长地叹了口气:“讨论不成哩，我没有完成邪党交给我的任务。”

“什么任务? 咋没听你跟我说!你这几天不在就是去执行任务了?”李秋枫伏在马方身上，扳着他的脸连珠炮似地问个没完。

马方皱皱眉，张嘴就答:“去杀人!”

“杀人?”李秋枫一怔，随即笑起来，“你能杀人?你连兔子都不敢杀哩!”

马方狂怒而烦躁地推开李秋枫，一下子坐了起来:“我是不敢杀兔子，也杀不了人，你可以看不起我，我是无能鼠辈，共产邪党鄙视我，你也鄙视我，我、我……”马方说不下去了，他声音中充满了自卑感。

李秋枫一下子抱住他，用柔软的手抚摸着他的面颊，宽慰地说:“方，别难过哩，我不会鄙视你，共产邪党也不会鄙视你，革命有分工，不一定就要你去杀人，你用你的笔写文章，写诗，也是战斗的武器哩。方，把你新写的诗给我念一首　　　　　　　　　　　　。”

李秋枫的温柔很快让马方的心绪平静了许多，他仰起脸来，望着正被徐徐张开的夜幕遮掩成暗蓝色的窗户，心中一下子涌出了无数诗句，他就是以他真诚而热忱的诗句使李秋枫倾心于他的，而他又以他诗人的狂热，甚至有些偏执投身于革命的，到肤郡任教以后，他的诗大多是歌颂农民和农会的，很少再抒发个人情感，现在，他积郁已久的愤闷终于倾泻出来，他轻轻一甩头发，低吟出激荡之言:

我不再狂啸
所有的声音都化作黄土地的坟墓;
我不再悲叹，
所有的哀伤都埋进了昨日的棺米;
我不再观望，
所有的踌躇都随滚滚洪流奔向大海;
我不再等待，
所有的希望都伴着旭日蓬勃而出!
我宁愿死去，
也不放弃战斗的号角，
那是把血洒向大地的匹夫。
我忍受着折磨，
那对我绝不是屈辱，
而是炼狱之火的锻烤。
过来吧，
我心爱的姑娘，
我不放弃自由和信仰，
也不让你离开我的胸脯，
因为你将和我同乘一只舟，
因为你将和我同走一条路。
我狠一样徘徊着，
我躲瘟疫一样逃避着孤独，
革命啊，
你就是我终身的伴侣，
让我们狂烈地交合，
把精血骨肉相互凝固。
于是，
我的灵魂仰仗着太阳的光芒，
变为一颗夺目的珍珠。

马方的两只手高高扬起，好像是祭坛前的巫祝，也像是正在求符的道士，一脸虔诚，满目壮烈，久久地一动不动，如同一座雕像。他的沮丧已经完全消失，他用自己的诗又将自己重新燃烧了起来。

李秋枫也沉醉在这奔放豪迈的诗意中，她的眼睛略有点潮湿，情意绵绵地凝视着昏暗之中那朦胧的身影，终于，她扑上去，抱住了马方，长吟一声:“方，你伟大哩，你把我的心都挤满了，挤得我胸脯胀得慌。”

马方的手垂了下来，一手楼住她的腰肢，另一只手按住了她富有弹性、果然胀鼓鼓的胸脯，轻轻吻了她一下，问:“枫，你永远会陪伴着我? 无论是幸福还是痛苦，无论是快乐还是哀伤?”

李秋枫点点头:“永远，永远，没有人再会夺走我的心，我为你而生，为你而死。”　“那，那咱们……一结合吧。”马方的手搂紧了她，也抓实了她的乳峰。

“可，可咱还没结婚哩……”李秋枫慌乱而胆怯地说。

马方的眼睛中燃烧着两团火，在黑暗中放射着光芒，他的声音颤抖着:“枫，咱是革命

青年哩，咱要打碎一切旧秩序、旧观念、旧伦理，追求个性解放、社会解放、人类解放，共产主义就是要破坏家庭，消灭婚姻，咱们连结合都没有勇气，还革啥命哩!”

李秋枫已经听不清马方在说什么，他的拥抱，他的抚摸，他喷在她脸上的热气早已使她浑身软绵绵、脑袋昏沉沉的了，她只是臆语般喃喃着:“方，方，我是你的，永远是你的……”马方在热吻中将她抱上了床。

这吻一直持续着，从李秋枫的发梢、鬓角、额头、眉毛、眼睛、鼻子、脸颊、耳根、嘴唇、下巴到纤细的脖颈，然后，马方解开了她的衣扣，打开她的衣襟，褪去她的内衣，继续吻着她的高耸的乳峰和平滑的小腹，直到吻遍了她的全身的每一个部位。她在幸福、快乐、欣慰、奇妙和不知所措中沉迷了，甚至连那肉体被冲破时的痛感都没有感觉到，也许感觉到了，但却马上消失在一种更为巨大的欢欣和幸福之中，她搂紧了她，如同和他坐着牛皮筏子在黄河上飘荡般起起伏伏，直到汇入大海……

她不愿意让他停息下来，她拥着那牛皮筏子重又跑回黄河的上游，再一次顺流而下，享受着那被颠簸而浑身触电般颤抖抽搐的神奇感觉。

许多年以后，当李秋枫又嫁给一个男人时，她再也不想领略这种感觉了，她虽然刚刚四十冒头，按世俗说法，正该如狼似虎，但她却让肉体麻木起来，似乎她的身躯是一片荒漠，任凭谁来开发也不可能变为生机勃勃的良田。

她没有欺骗马方，她只属于他，为他而生，为他而死，为了他宁愿牺牲自己的纯真和善良，变得尖刻和恶毒，为了他宁愿一改温柔和驯服的性格，变成一个狂妄自负的官太太。而在肤郡一九二七年春天的这个夜晚，她显然并不能预卜未来，她只是在美好的想象中接受着马方一股又一股的热情喷发，将他深深地接纳进自己的肉体和心底。

霍达东在春天乍暖还寒的黎明看到了李秋枫虽躲躲闪闪但却掩饰不住幸福，心满意足地走出了马方的宿舍，他很有点为他们祝福地笑了笑，但随即又有点鄙视地摇了摇头，他们这是偷情哩，马家沟对于偷情的男娃和女娃要光着旋游街。

当李仲海隐隐约约地知道了马方和李秋枫同居的事之后，他脸上没有任何表情，似乎这与己无关。但到晚上他却喝得酩酊大醉，然后钻进肤郡城最有名的妓院百玉楼，点了个当红妓女小翠翠，楼着她说了许多混话，最后什么也没干，迷迷糊糊地和衣大睡过去。

(16)

陕北汉子霍达东站在马牙子家当院中，指着他的鼻子臭骂着:“马牙子，你这个狗日的没出息哩，革命还没成功，你就整日搂着婆姨睡大觉，农会的事也不管了，当初我真是瞎了眼，让你这样的投机分子加人共产邪党!”

日上三竿了，夏日的太阳照在只穿件布坎肩的霍达东身上，他裸露的肩头黑黝黝、亮闪闪的，泛着晶莹的汗珠珠，脖颈上胀鼓着青筋，脸上一股怒气，腰间别着的那支德国造噜子手枪格外显眼。

马牙子确实还在清凉的窑洞里铺着新席的火炕上光着脏眼子、显露出缺少厚实肌肉的脊背，搂着一个皮肤虽不白哲、但却结实健美的年轻女子睡觉。那女子同样赤裸着身子，两条腿羞涩地跄缩着，但一对刚出笼的蒸摸似的奶子却无遮无拦，任凭马牙子抓在手中，和面般

地揉捏着。

这个女子可不是马牙子从哪里带来的野女子，更不是守不住空炕头的寡妇，而是马牙子明媒正取的婆姨哩。

自打杀了马家沟大户马孝贤以后，马牙子就英雄般地以乡农会会长的身份再一次把马家沟几个大户人家的土地财产分配给农民，村头张贴的关于处死马孝贤的布告很起作用，农民们没有了后顾之忧，对于没有了主儿的土地财产所有人都趋之若鹜，唯恐没有了自己的那一份，甚至为了一个铜脸盆、一床绸子面棉被、一张枣木方桌也争吵不休，甚至大打出手，马牙子骂也骂不住，他在村里委实威信不高，没人瞧得起哩。

马牙子自己给自己分了十亩水浇地，那地就在水坝的下边，不管老天多旱，只要把水坝门一开，他的地就能最先浇上，而不管老天多涝，雨水也存不在他的地里，都流到下边的沟沟里去。关于这，倒没有人说闲话。“人家是闹农会的功臣哩。”农民们认同谁功大谁多占便宜的道理。

马牙子也搬出了他那塌了大半截院墙、只有两孔破窑的家，住进了马孝贤的大院，那大院被一分为八，一份本来关驴和羊的窑留给马孝贤大小三个婆姨住，其余七份一律分给了村里最穷、窑最破的农民。

马牙子住的是原来马孝贤和他三个婆姨住的五孔窑。马孝贤中年以后就喜欢一个人睡觉，因而他自己住一孔窑，三个老婆各睡一孔窑，还有一孔算作他的书房，他若想和婆姨亲热一下，就把婆姨招到自己的窑里来，完事之后，自己仰面而睡，婆姨再披衣回房。这五孔窑宽大明亮，位于他家其他窑之上，马牙子让马家长工花了三天工夫，为他新砌了道石墙，搭了个门楼，就成一个独院了。

这几孔窑中的家具和衣物他分出去了大半，但最好的则留给了自己，红枣木的八仙桌、太师椅、条案、樟木衣柜和衣箱，狐皮大衣、羔皮坎肩、丝绸马褂和呢料中山服，狗皮褥子、缎面丝绵被、新疆毛毯和花布床单，景德镇的盘碗、镶银的铜暖炉、打了气就亮得像月亮落下来的汽灯、景泰蓝水烟袋和女人用的角先生，铁犁、钢耙、灰骡子、红马驹和二十几只肥羊，都成了他的财产。

不过，马牙子最为得意的是娶上了个一掐一股嫩水的婆姨，这是他到另一个村杨树坪发动农民们分大户的土地财产时从那里一个地主家里发现的女娃。

按照农会制定的原则，土豪劣绅、地主恶霸家的长工愿意走的发给路费，不愿意走的按当地农民一样待遇，分地分窑分财产，大户人家有几个婆姨的，留下头房，其余的配给娶不上婆姨的光棍汉，当丫环的是本地人家的女娃，自然接回家去，是外地的可走可留，但留下来只能嫁人，不分土地财产。

实际情况是，不光大户人家的年轻婆姨被光棍汉抢回家去，一些成了年的女娃和丫环也都被想婆姨想疯了的年轻后生连逼带吓地当了新娘，马牙子很支持这种行为。“革命就是共产共妻哩!”他说。

在杨树坪，他看上被几个后生缠着不放而吓得缩到院角的叫黑菊的那个地主小姐，他装腔作势地轰走了那几个后生:“要地主家的女娃也要人家自愿哩，打倒封建统治就是要保护妇女不受欺负!”

结果，已经无依无靠，自觉前途无望的黑菊得知马牙子是乡农会会长，便自愿地嫁给了他，她觉得这能使自己多少有些安全感，说不定共产邪党真能成了大气候，她依然能成个享清福的太太哩。

黑菊被领回马家沟的当天晚上就被马牙子按到了炕上，他剥羊皮一样熟练地扒去了黑菊身上的衣服，在明晃晃的汽灯下，把黑菊浑身上下看了个够，嘴里止不住地夸赞着:“这脸

蛋蛋像个熟透了的大苹果哩，这奶子像是北坡坡上的坟丘子，奶上七个娃也套拉不下来哩，嘻，这白生生的大腿能气死春香楼的娼妇们哩。”

见黑菊羞答答地用手一会儿蒙住脸，一会儿遮住奶子，一会儿盖住腿缝缝，马牙子又是一番感概:“还是良家女子逗人上火哩，春香楼的娼妇全是狗日的虚情假意，只想掏干净老子兜里的大洋。”

他边咒骂着娼妇，可又用从娼妇们那里学来的花花本事搬弄着黑菊，见黑菊忍不住哼哼卿卿了，碾盘一样压上去，黑菊像挨了一刀的鸡一样撕心裂肺地叫起来，两行泪水淌出了眼窝。　　马牙子不相信似地问:“这是你头一遭?”

黑菊点点头。

马牙子欢喜了:“地主家也有不偷人的女人哩，留着那好玩意，给我来开封。”边说，他边俯下身，看了看炕单子上果真有几滴血迹，他欣喜若狂地又爬上黑菊的身。

马牙子没几天工夫就用妓院学来的那套功夫把婆姨黑菊搞得神魂颠倒，一有空就楼着马牙子“哥啊哥”地叫，搞得马牙子也再没心思去农会办公了，按他的话说:“革命成功了，有了地，有了婆姨，踏踏实实过日子吧!”

霍达东从肤郡县城到各镇各乡检查农民自卫队成立的情况，得知马牙子这般德性，闯到他的新居来找他扯扯，见太阳早冒过了源卯，马牙子的窑洞门还紧闭着，自然怒火中烧，破口大骂，对马牙子，他不会客气哩。

马牙子昨夜一直没闲着，黑菊也不让他闲着，刚顺出些男女间滋味的女子舍不得松嘴哩，若不是窗外突然传来炸雷似的吼叫，她又想再弄醒了丈夫，在铺满炕台的阳光中再好好亲热一番哩。

马牙子终于醒了，他第一个动作就是去楼婆姨，可黑菊推开他，不高兴地指指窗外，于是，马牙子听见了霍达东的痛斥，也于是，他飞快地穿上了衣服，睡眼惺松地开门到了外面院子中。

霍达东正低头点烟，点燃之后才抬起头来，他的眼睛顿时眯了起来，因为他看见马牙子穿着的是白色丝绸对襟上衣，印有金钱暗花的黑色丝绸长裤，脚上趿着一双呢面的方口鞋，他知道，这是马孝贤的衣服。

他盯住了马牙子，眼睛虽然眯得剩条缝，可那光却像刀子一样在马牙子身上割来割去，使马牙子不自在地躲闪着那目光，直到实在忍不住了才低声嘟味着:“你像狼看羊羔一样盯着我，是咋哩?”

霍达东冷冷一笑，从牙缝中挤出话来:“咋?说你不害躁哩!你以为你浑身上下包着续罗绸缎，就像个老爷啦?你就是穿金戴银也是浑身掉黄土渣渣的庄稼汉?”

马牙子有点委屈地说:“我……我没想当地主嘛，我……我只是把分来的衣服穿上了，全村人都分了，不能因为马孝贤穿过咱就一把火烧了它，可惜哩。”

霍达东气得甩下烟头，指着马牙子吼着:“我不是说你不该穿，不该吃，不该娶个婆姨搂着，我是说你是个乡农会会长，是个共产邪党员，还要继续干，继续革命哩!”

马牙子脖梗子一挺，大大咧咧地问:“还干啥? 还革啥命? 革命不是都成功了吗?’’
“咋成功啦?”

马牙子奇怪地看了霍达东一眼，见他还盯着自己，马上又避开那目光，手一指外面:“这不是明摆着嘛，土豪劣绅的地分了，窑分了，财产分了，小学堂也充了公，谁家的娃都能上学，没有剥削了，谁也不敢欺负咱农民了，这不就是成功了吗?”

“你这狗日的真糊涂!革命还没成功哩，咱农民还没有真正掌了大权，肤郡县的县长真替农民说话吗?榆林府的金上岳真替农民说话吗?陕西省的省长真替农民说话吗?国民革命政府掌实权的蒋介石已经背叛了革命，杀工人、杀农民、杀共产邪党哩!你那眼睛最远能看到金城镇，目光短浅哩!”霍达东狠狠地说，说完，又点上一根烟。

马牙子也伸手要了一根，使劲抽了一口，有点固执地反驳着:“我就是目光短浅哩，我就是只能看到金城镇，金城镇是农民掌权，就是革命成功了，我又不是中国的农会会长，我咋管得了那么多。”

“可你不是个普通农民，你是共产邪党员，你要解救全中国的农民哩!”

“我就是个普通农民，我当不了朱元璋，当不了李自成，当不了洪秀全，连你生娃我也当不了，是你让我人的共产邪党哩!”

“你真是个狗日的!”霍达东抡圆胳膊给了马牙子一个大耳光，这耳光不但马上让马牙子的脸肿起了半边，而且连两颗门牙也活动了，一缕鲜血顺着马牙子嘴角淌了下来。霍达东确实被马牙子不知好歹的无赖相惹怒了肝火，因为马牙子是他发展的共产邪党员，丢他的人黑他的脸哩。

马牙子捂着脸蹲到了地上，孩子似地嚎哭起来，如同受了天大的委屈，嘴中还抱怨着:“霍土生，你敢打我，我娘都不敢打我哩，我长这么大，只让剥削阶级打过，你打我，你也是剥削阶级哩。”

霍达东哼了一声:“我长这么大，只打剥削阶级哩，我打了你，你就是剥削阶级!”　　“我咋是剥削阶级啦? 我剥削谁来? 房子、地、婆姨，都是我革命革来的!”

“革命不是只给自己共产、共婆姨!”

“不给自己共产、共婆姨，谁还去革命，你砸粮库不也是你大、你婆姨要饿死哩!”马牙子怪有道理地喊着。

“狗日的，你再叫驴似地吼，我一个枪子废了你!”霍达东拔出腰间塞在木盒盒中的手枪，这种枪可以一口气打出二十粒铅弹弹。

马牙子并不怕霍达东的威吓，他一下子跳起来，扯开衣襟，露出粗糙而枯瘦的胸脯，那上面有着一片婆姨咬出的牙印子，他跺着脚扯着嗓子喊:“你杀了我!杀了从小跟你一块耍大了跟你一块贩驴、一块砸粮库、一块闹农会、一块干革命的兄弟，李自成、洪秀全都这么干过，你不杀我，你就是狗日的!”

一直隔着窗子偷听偷看的黑菊衣衫不整、披头散发地冲了出来，“扑嗯”一下子跪在了霍达东面前，哀嚎着:“霍总会长，你把我也杀了吧，只杀他，剩下我年轻轻的寡妇怎么活哩?我生是马牙子的人，死是马牙子的鬼，让我跟他一块去吧。”黑菊说到伤心处，也一把扯开了本来就没系牢的衣襟，露出没时间戴上兜肚的大半个胸脯，让霍达东往她那里开枪。

霍达东扭过头去，那丰硕得令他吃惊的乳房使他有点心烦意乱，而一回过头来时，他才发现院门口已经挤了不少看热闹的人，他们有的幸灾乐祸，小声说:“马牙子死了，这五孔窑归我哩。”有的面带遗憾，自言自语着:“用枪逼着人革命哩，官府收税也就这样用枪逼哩!”

霍达东叹了一口气，拿枪的手垂了下来，他本来也没有杀马牙子的意思，只不过是一时恼怒，吓吓他哩。沉默了一会儿，霍达东狠狠地瞪了马牙子一眼，沉重地说了一句:“马牙子，就算共产邪党里从来没有你这个尿!”　　说完，他转身而去。

肤郡师范学校被包围了，一群群穿着黄布军装、戴着大盖帽、手持上了刺刀的步枪的士兵倚着山势团团围住了这座顺坡而建的学府，几个穿着马靴的军官在学校门口晃来晃去。

李秋枫赶到设立在县政府隔壁的肤郡县总农会去报信，办公室里，李仲海和几个邪党员正在听霍达东怒气冲冲地汇报马牙子的情况，屋里烟气腾腾，几乎把李秋枫呛个跟斗。

李仲海示意李秋枫先等一下再说话，然后对霍达东的汇报进行总结:“达东同志说的情况各镇各乡都程度不同地存在着，用不着动怒哩，参加革命的人总有几种，一种是有坚定信念的，这是革命的核心，一种是动机不纯，投机革命的，这种人迟早要暴露本来面目，还有一种属于觉悟不高、目光短浅的，像马牙子这类，是革命的同路人，这种人还不是敌人，坏不了咱们的大事，能团结就团结他们，现在把各镇抓到的枪支数目报一下。”

几个人各自说了一下数字。　　李仲海点点头:“有五百多条枪，也算不小的武装哩，咱们马上树起肤郡县农民自卫总队的大旗，这对那些蠢蠢欲动的反革命势力是一种威慑，对于革命农民也是一种鼓舞和保护。这样吧，三天以后在县城举行大会。”这时，他才侧过头，摆出一副领导的架势慢条斯理地问李秋枫:“秋枫，有事吗?”

李秋枫一脸焦虑神情，因一直插不上嘴而急得额头冒汗，只能摸出手绢不停地擦着，见李仲海问她，马上回道:“出大事哩，大兵把肤郡师范包围了，要带走校长，关闭学校，还要校长提供共产邪党员名单，凡是共产邪党员一律不准在校任教，以免宣传赤化谬论。”

几个人一下子惊呆了，李仲海喃喃着:“没想到来得这么快。”

霍达东抓出手枪，吼着:“狗日的，咱们马上分头去集合农民自卫队，明日一早来砸狗日的县政府!”
门外传来杂乱而沉重的脚步声，一个看门的老汉神色慌张地冲进来:“霍总会长，李秘书长，大兵把门堵了，农会的匾也……也给砸成了几段……”

老汉话音未落，县长带着警察局长和一个全副武装的军官走了进来，门外，十几个黑洞洞的枪口捅破了窗户，对准了屋内的人。

“你……你们要干什么?!”李仲海镇定了一下，厉声喝问，但嗓音多少还是有些颤抖，他没经过这种场面哩。

倒是霍达东大义凛然，用宽大的身躯遮住矮他半头的李仲海，挡住了前面的枪口，手中的枪对准了县长。

警察局长面孔一沉，也拔出了枪，双眉一立，冲霍达东吼着:“你想造反?”

霍达东毫无惧色:“你大每日都想造反哩!”

“狗日的，我先毙了你这个土匪!”警察局长拨开了机头，门外也响起了一阵拉枪栓的声音。

李仲海制止住霍达东，向来者发问:“请问县长，你们大兵压境，如临大敌，到底是什么意思?”

县长轻轻地吐了一口气，正了正镶有黄铜扣子的中山装，神态严峻地宣布:“国民革命军榆林边防军司令金上岳将军传陕西省政府主席石敬亭先生的指令，农会乃鸡鸣狗盗之辈、流氓无赖之流、藏污纳垢的组织，一律视为非法，从即日起予以查封，收缴大印，解除武装，非十恶不赦之徒一律驱逐回家!”

“一派胡言，这纯粹是蒋介石之流的反革命言论!”李仲海气急败坏了。

霍达东则抡着手枪嘶叫着:“哪个狗日的敢砸农会，我先砸烂他的狗头!”

警察局长和那个一直默不作声的军官相互使了个眼色，同时一挥手，门外的士兵和警察一下子跃进屋内，农会的每个人身上都被顶住了几把刺刀。

县长洋洋得意了:“现在的新政讲法哩，法令如山，我纵有同情诸位之心，也无抗法之胆，请各位还是好自为之，交出大印和武器，回家当个良民，我乃一县父母官，绝不会滥杀无辜，也希望诸位不要挺而走险，以身试法，那绝不是我愿意看到的结果。”

李仲海看了看剑拔弩张、一个个满脸杀气的士兵和警察，率先把身上的手枪摘了下来，放到桌上，又拉开抽屉，拿出了总农会的大印，摆在手枪边上，然后面孔阴冷地向门外走去，他走得很沉重，也很沮丧，但并非一蹶不振。

霍达东叫起来:“李仲海，你这是投降哩，你狗日的怕死!”

李仲海没有回头争辩，只是低声说:“达东，这是决定，有什么事我负责。”

“好，识时务者为俊杰，李秘书长不愧是知书达理之人。”县长虚情假意地赞叹着。

“你凭什么决定，我是总会长哩!”霍达东想反抗，可几把刺刀向前一压，他的胸口和后腰立即浸出了血迹。

县长脸色一沉，厉声说:“霍达东，别不识好歹哩，看在咱们都是喝肤郡水长大的面上，我对你已经网开一面、仁至义尽了，按你的劣迹，若在其他地方，早就被先斩后奏、就地正法了，你别给脸不要脸哩!”

“狗日的，你的脸才长在裤档里，总农会成立时，你又祝贺辞，又赠大匾，把总农会当爷敬哩，现在你咋说变就变了?!”霍达东不顾刺刀扎在肉里，依然暴跳如雷。

李秋枫实在不忍看霍达东那身上正在染红衣服的血迹，一下站到了县长面前:“县长，你不是讲法吗?对霍总会长随意伤害也是违法的!”

警察局长斜着眼冷笑一声:“李老师，李委员，你可是偷林府有名的大户人家的千金，跟这帮痞子无赖混在一起，有失身份，小心有一天把你共了妻，丢你李家祖宗的人哩!”

“不用你管!”李秋枫面孔涨红，狠狠地瞪了警察局长一眼。

走到门口的李仲海终于站住了，他额头上青筋毕露，扯着脖子大叫一声:“霍达东，把枪交了，跟我走!是枪值钱，还是命值钱?!”

霍达东还从没有见过李仲海发过这么大脾气，他终于一跺脚，跟谁赌气地把枪往桌上一扔，嘟哦了句:“给，拿回家日你们的婆姨去吧，这玩意总硬着哩!”

见他丢了枪，其他几个农会的干部也心有不甘地掏出枪放到了桌上。县长冷冷一笑，挥挥手，士兵和警察们退后一步，让出了一条路，农会的人垂头丧气地鱼贯而出。

大门外，李仲海斥责着霍达东:“你懂不懂什么叫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的哩?天底下就你一个人不拍死，别人都是反。记着，这几个人是火种，是肤郡县革命的核心力量，只要咱们几个人在，终有一天咱们也会这么对付这帮狗日的哩!”

霍达东还有点不服气:“交枪丢面子哩，人家会说咱软弱、投降。”

“你投降了吗?你心里面不想革命了吗?不就是几支枪嘛，咱们还有几百支哩，以后还要有几千支、几万支!咱们马上就组织暴动，砸了县政府，成立革命政权!”李仲海眼睛中又闪出火一样的光芒。

霍达东这才算消去了委屈和恼怒，也振奋起来，眯起眼问:“行哩，咱们几时动手?”

“还是三天以后。”

这几个人那一天沉浸在武装暴动的激动中时，谁也不会想到几十年之后会在中国发生一场叫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运动，这场运动是他们都很崇拜并对之绝对忠诚的那个先叫毛润之、后叫毛泽东的人亲手发动、亲自领导的，全国数亿人民都被动员起来，其轰轰烈烈的程度远非二十年代的农民运动所能比拟，其目的主要是清理邪党内的坏人，四十多年前他们几个人交枪的事情在那场运动中被当成大案提了出来，而证明他们确实在敌人面前交了枪的人就是李秋枫。

他们几乎都没有抵赖这个事实，唯一一个矢口否认的人当时是一个地区的专员，他被挂着铁牌子在太阳下曝晒了一天，又被大雨淋了一夜，第二天有人发现他死在了街上，身边有一行大字:“叛徒的下场”。

李仲海虽然承认了事实，但对此做了辩解，说那是出于斗争策略的考虑，并将责任全部承担下来，说是他下的命令，与他人无关。这时他已经是沿海某省的省委书记，并且已经生出了准备去死的念头。

霍达东则什么也不说，既不辩护，也不认罪，让他写交待材料，他只写一行字:“没有我们，哪有你们这些狗日的今天!”说也奇怪，他的这种顽固倔犟的态度倒使一些人格外佩服，使他比一些认了罪的人少受了些折磨。

致于其他几个当事人，有的痛哭流涕说自己当时觉悟不高，受了李仲海蒙骗的;有的破口大骂李秋枫是狐狸精，使用美人计让李仲海放下了手中的武器;有的满嘴胡说八道，口口声声讲毛泽东也交过枪哩。

这件事折腾了很久，直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大规模为受冤屈的革命老干部们平反，各地才统一口径下了个红头文件，说是交枪的事完全是莫须有的，历史上这几个人从来也没有交过枪，而这时李仲海、霍达东都已经死去了。

对于最先以大字报形式揭发此事的李秋枫，也并没有人追究她的责任，她同样是受迫害的革命老干部，不但还给了她本来与李仲海共同居住、后来被收走的一幢小楼，而且将她由厅级提升为副省级，让她到省顾问委员会里去担任常委。

李秋枫听到对她的安排之后，优郁了许多年的眼睛中忽然重又闪出少女时才有的天真神情，她慢慢地笑起来，笑得纯洁无瑕，但一个满脸皱纹一头银发的干瘪女人有这样的笑容必定会使人们感到惊恐万分。

她疯了，没有住回省长楼，而是住进了精神病医院。

(17)

陕北汉子霍达东觉得革命有点像哄孩子，他挨家挨户地去动员那些身强力壮的后生参加已经像南方农村一样名为赤卫队的农民武装，告诉他们:“走，像当年砸粮库一样去砸狗日的县城哩!”

大多数人都面有难色，委婉地说:“当年砸粮库是没饭吃，饿死人哩，人逼到死路上了，啥都敢干。现在有了窑有了地有了牲口，年景又风调雨顺，砸县城干啥哩!”

霍达东解释着:“咱庄户人家不掌大权，你那窑，你那地，你那牲口，早晚有一日又归了土豪劣绅，保不住哩。金上岳让人砸了咱们农会，咱当然要以牙还牙，砸他的县政府!”

不少后生还是摇头，有人干脆说:“等狗日的抢咱窑，抢咱地，抢咱牲口时再反也不迟哩，人家手里有枪，别逼急了人家。”

“混话，你们糊涂哩!”霍达东说不服这些年轻农民，总共招拢了十几个平日里就无法无天、喜欢闹事的人。他只有生闷气，委实讲不出什么大道理来，而农民们朴实的说法又让他常常哑口无言。

倒是马牙子被霍达东骂了一顿之后，觉得对不住这位从小一块长大、一块混过的弟兄，以马家沟乡农会会长的名义把每个村跑了一趟，领回百十个扛着梭标、大刀和快枪的农民回来，冲着霍达东说:“生娃，我马牙子没一日忘了革命哩!”

霍达东兴奋地跳起来，捶了马牙子一拳，惊喜地说:“马牙子，你觉悟没降低哩，咋动员来这些人的?”

“靠觉悟叹!”马牙子有点讥讽地斜眼看着霍达东，一身丝绸衣褂在微风中飘动着，说不上是潇洒风流还是匪气十足。

霍达东使劲点着头:“对，对，不能低估农民兄弟的觉悟。”　马牙子神情更为嘲弄了，哼了声:“觉悟能当饭吃? 觉悟能当地种? 觉悟能当窑住? 觉悟能当婆姨日?”

霍达东这才有点醒悟，他疑惑地打量着马牙子，放低了声音问:“你是咋把这些后生动员来的?”

马牙子又恢复了往日的油腔滑调，嬉皮笑脸地说:“简单哩，我说你们现在只有窑、有地、有牲口还不算过上好日子，砸了肤郡城，商号的东西随大家拿，那都是剥削来的哩，大户人家的姨太太、千金小姐、妓院里的女子随大家日，那也是剥削阶级哩。听了这个，不愿砸肤郡城的是天底下头号傻蛋蛋，除非他那家伙支硬不起来!”

霍达东骂了句:“马牙子，你这尿真是狗日的哩。”骂完，他轻松地哈哈哈大笑起来，农

民觉悟不高，用这法子管用哩，他一点不气恼马牙子，反而很赞许他。不管怎么说，金城镇能凑上几百人去砸肤郡县了，李仲海也不会批评他了。李仲海说过，革命是讲不得手段的，只要达到目的就行。

想到此，霍达东笑得更厉害了，但他从此也认识到一点:对于农民，没有实际利益的事情无论如何是不会让他们动心的，在黑夜里，他们并不想捧上太阳，他们只需要有一盏油灯或一根蜡烛就满足了。谁要用太阳去煽动农民诅咒黑夜基本上是徒劳的，而给他们马上分一盏油灯或一根蜡烛，你就是让他们跟着你去把黑夜捅烂了，他们也愿意哩。

在霍达东有朝一日城为一省之长时，这个朴素的道理依然没有在他心中泯灭，他只是发现，在他成为共产邪党的高官之后，他竟然没有多少能力在做每一件事时都给农民以实际利益，他和他的同事给农民以太阳的许愿太多了，而农民们最渴望的一盏油灯或一支蜡烛却经常得不到。

油灯和蜡烛不是没有，但他却没有办法拿出来，他的心因此常常发疼，他愧得慌哩。

金城镇政府里挤满了明日要去砸肤郡县政府的农民，他们横七竖八地躺在太师椅、八仙桌和文件柜上，更多的人是在院子里和衣而睡，反正初秋的夜晚还不算冷，只是早晨有些露水会沾湿衣裳。

霍达东找大户人家硬捐了几口袋白面和几只羊，那家人见他背了把明晃晃的砍刀，一个不字都没敢说，满脸颤抖着笑容表示要支援革命，义不容辞，为了表示态度真诚，还贡献出了一罐子高粱酒。

白面被送到一家饭铺蒸了摸，羊在镇政府院子里被宰了后，把门板劈了点上火煮，火光映红了金城镇的上空，香味飘散到很远的地方，几个从甘肃逃荒来的叫花子闻到肉香，也表示愿意革命，加人到大会餐的人群中。

吃到高兴之时，一罐子酒自然不够喝，马牙子便带着几个人又去找大户人家捐，一会儿就弄回来上百斤米酒，每个人都分到了一大碗，喝了个痛快。

有人觉得这不像革命，倒像是打家劫舍的江湖侠客，霍达东点点头:“对着哩，杀富济贫就是革命，只不过以前的杀富济贫是自发组织的，咱们现在有共产邪党领导，有明确的目的，要当家做主掌大权!”

马牙子喝得半醉，又溜出去，他看上了一个长相俊俏的小寡妇，他敲开了人家的门，说是革命需要用她鼓舞士气，那小寡妇自然毫无反抗能力，镇政府院子里几百号人的闹哄哄早让她胆战心惊了，于是她淌着眼泪鼓舞了马牙子的士气。

除了马牙子之外，还有几个平时在村里就不正经的后生干脆摸到了已经停业的妓院。妓院里年轻点的姑娘表闹农会时嫁人的嫁人，回原籍的回原籍，只剩几个年老色衰的和老鸭一起守着院落过清闲日子。

几个后生满嘴酒气，两眼朦胧，进门就自称红匪赤卫队，一人搂了个徐娘半老的女人就各自钻进一间房子，不管不顾地动作起来，连那已经年近五十的老鸭也无奈地应付一个。好在以前她们也常遇上狐假虎威的兵勇、乡丁、地痞之类的人，虽不情愿，总还能周旋应酬，也不觉耻辱。

霍达东倒没在意这些混事，他顾不过来哩。几百号人的吃喝解决了，还得动员大家擦枪磨刀，然后又找来了一匹红布，用砍刀割成布条条，每人一块，绑在左手臂上，算是赤卫队的标志，另外，还要派人到肤郡县城外的一家客栈去通知李仲海，暴动临时指挥部就设在那

个地方。

到了后半夜，他才躺下，刚合上眼，一个站岗的后生就摇着他说:“霍总会长，你婆姨来了。”

霍达东一怔，跃身起来，看了看周围并没有人注意他，便急匆匆走出大院，看见桂桂站在挂在门楼上的马灯的光线中，不禁皱了皱眉，不快地低声问:“你咋来啦?办大事前沾女人霉气哩。”

霍达东以为是婆姨忍不住寂寞，来寻他亲热。这次回马家沟，他在家连口水都没喝，只给婆姨打了招呼，就转身而去，他心里装着暴动的事，要动员农民参加，负责重着哩，没工夫也没情绪搂着婆姨在炕上折腾。

桂桂对丈夫的这种口吻已习以为常，既不恼怒，也不委屈，只是向阴影里退了一步，避开扛枪站岗的后生，忧心忡忡地低声说:“弟，我白日里左眼皮跳得慌，黑日里睡下做噩梦，心想怕是你们这次要出事哩，就跑去归元寺让方丈给摇了三卦，都是下下签，说你们必有血光之灾，弟，怕人哩。”

“纯粹是混话!”霍达东训斥了一声，但他发现自己在左眼皮也在突突地跳，跳得他心烦意乱，心里也有点发虚，而且他还发现门岗在好奇地看着他们，就马上摆出一副漠然置之的神态，小声说:“革命哪有不流血的，甭怕哩，你弟命大，阎王爷都让三分，死不了!”

桂桂神情黯淡地说:“别的后生死了，也伤人心哩，他们有娘、有大、有婆姨，跟着你走时是个活蹦乱跳的汉子，回来要变成一具尸体，你交待不过去哩。”

霍达东不想再听这些丧气话，又吼了声:“回家去，这没婆姨们的事，我要睡觉去了，三更天就要出发。”

说完，霍达东扭头就往门楼里走。

桂桂张了张嘴，终于什么也没有说出来，但她也没有回十里路外的马家沟，而是找了个避风的门洞坐下来，她决定跟着丈夫一起去肤郡城，若他真有危险，就用自己的身子骨去护着他。她的命贱哩，死了就死了，丈夫是干大事的，不能年轻轻的就送了命。

在做这个决定时，桂桂没有任何悲壮感，也没有思虑万千，她觉得很坦然，觉得任何一个真爱汉子的婆姨都会这样去做哩。

两军在肤郡城内拼杀，没有枪声，没有炮声，也没有呐喊声，只见戴着红袖章的人和穿着黄布军装的抡着砍刀，挺着刺刀，相互间闷声不响地格斗，如同公鸡斗架般蹦来蹦去，街道两边的窗户都打开着，伸出许多女子俊俏的脸，嘻嘻笑着，指指点点，好似评判哪个汉子更勇猛，更值得嫁。

霍达东赤裸着上身，光秃秃的脑袋上刚刚冒出一片麻麻点点的黑头发茬子，脸色惨白，眼睛血红，胸前吊着的装有一撮黄土的荷包摇来晃去，胳膊上的红布条在滴血，他发疯似的抡着大刀片子，使出一套古时候传下来的降魔刀三十六式。

“皱龙出海”、“乱云飞渡”、“旋风裹雨”、“力断华山”、“横空出世”、“开膛见心”、“金星陨落”、“九天飘雪”……

每一刀出手，都有一杆快枪被削成两截，随即一个脑袋西瓜一样滚落在地，不一会儿工夫，满街都是横七竖八的尸体，那些观看的女人们一个个花容失色，瞠目结舌。

他感到一阵口渴，弯腰抓起一个脑袋，捧住了去喝那还流淌着的鲜血，这时他被耳边的

喊叫惊醒了，横七竖八乱躺着的是呼呼大睡的赤卫队员，捧着的脑袋长在他身边一个后生身上，这后生恼怒地挣扎着。

霍达东松开了手，知道自己在做梦，但又为这梦而振奋不已，他觉得这是个好的兆头，看来尽管要拼杀一场，但最终能拿下肤郡城，重新挂上县总农会的大匾。

实际上的情况并非如此，倒是桂桂的担优成为了现实，女人的感觉比男人更灵哩。

夜里，因着不是共产邪党员身份又是大户人家少爷小姐而没有被驱逐的马方和李秋枫，满肤郡城张贴了上百条标语，无非都是“打倒反革命”！“一切权力归农会”！“凡是镇压农民运动的都没有好下场”！“共产邪党代表受压迫阶级的根本利益”！“农民兄弟，昂起头来做人”！“居民们，你们也是被剥削和被压迫者”之类的口号。

黎明时分，这些标语让警察们一阵忙乱，警察局长亲自带人去撕标语，并不停地伸长脖子乱喊:“不要听信赤化宣传，共产邪党是红匪，红匪要共产共妻哩!”

到了中午，各镇各乡的农民赤卫队陆续云集城外，约有数千人之多，李仲海心中大喜，向霍达东等人分派了任务，决定从两个城门夹攻，他眼睛中闪烁着必胜的光芒，说:“人心所向哩，革命潮流不可阻挡，咱们只要一进攻，城里居民们就会响应，几百个士兵不堪一击，红旗都准备好了，城门一开就插上城楼，最大的那面插到县政府去，肤郡马上就是红色天下啦!”　　霍达东也压抑不住心中的激动，他大声附和着:“就是拿手捏，也捏死那几个反革命狗日的!当年我砸粮库，抬手一挥，人就像洪水一样涌上来，那些拿枪的狗日的根本举不起枪，一下子就被踩成肉饼哩!”

“好，出发!”李仲海不知从哪又弄了支手枪挂在身上，带头向已经紧闭的城门走去。他们碰到的不是打开城门的居民，居民们几乎都站在守城者一边，他们惧怕这些无法无天的农民分他们的家产，共他们的妻子哩，对于自称匪的人，他们从无好感，何况农村里发生的事情人们都耳有所闻，逃进城里来的大户人家早就把自己的遭遇哭诉过几十遍了。更为关键的是，居民们不相信一些大字不识几个的农民能成什么大事，与其跟着乱哄哄的闹事倒不如在现政权管制下过平安日子，没有人愿意天下大乱哩。

居民们不但没有揭竿而起的意思，反倒把白面摸、羊杂碎汤、大块的肉、大缸的酒送到了守城的士兵手中，几百年来，凡是闹匪乱或兵灾，有人来劫城时，居民们都是这样慰劳守城的将士的。

马方和李秋枫动员了几十个学生要上街游行，以分散守城者的注意力，但没出校门口，就被新来的校长挡住了，宣布谁上街游行，就立即开除谁的学籍，好不容易才有了上学机会的半大后生们都一个个退缩了，气得李秋枫回到宿舍里趴在马方怀里啼哭不止。

城外黑鸦鸦的农民赤卫队碰到的是站在城门楼上的县长和一声不吭的军官，另外每个墙垛子后面都伸出一支黑洞洞的枪口。

县长居然也挥动着一支手枪，大声说:“农民兄弟们，我是肤郡县县长，是政府正式委任的父母官，我以政府的名义告诫你们，千万不要受几个共产分子的赤化宣传，他们不是要让你们过好日子，他们是把你们往火坑里推哩，是要让你们都背上土匪的罪名，自古以来，凡匪必究!你们不要闹乱子，乱世吃亏的只能是你们这些百姓。你们奉公守法，政府不会亏待你们，会给你们修桥筑路、盖学堂、提供优良庄稼种子，帮你们过上好日子哩，现在悬崖

勒马退回去还不晚，本县长保证概不追究，全都视为良民百姓!”

“狗日的卖狗皮膏药哩，他们怕咱哩，上啊，砸了肤郡县城分大户!”霍达东也用起了马牙子的煽动办法。

有人领头，后面的人像赶大集一样在不宽的街道上往前拥，前面的人不冲也不行了，挤趴下了成千双脚踏上去真就成肉饼了。一阵呐喊声顿时响起，人们潮水般涌向城门，满天都是高举的红缨枪，大刀片子，猎枪，火统和不多的几十支快枪，最后面还有几面大鼓擂响着助阵，气势极其磅礴，似乎肤郡城是纸糊的，一拥便倒。

李仲海在人群中欢腾雀跃，喝醉了酒似的满面通红，兴奋不已地边冲边叫:“这才是真正的革命哩，群众的热情比火焰还高!”

他话音未落，如同过年放鞭炮一样，一阵“僻嚼啪啪”的声音响起来，冲在最前面的十几个人忽然扭秧歌一样晃来晃去，摇摇摆摆，有人转过身来，他们胸日处绽出了几朵不大不小的红花，比山丹丹花还艳，比红袖章还红，随即，那些人一个个扑倒在地。

“狗日的们真开枪哩!”

“把人当牲口宰哩!”

人们惊恐地叫起来，开始转头向回跑，而后面的人一时止不住脚步，还在向前冲，上千人一下子挤在了城关的街道上。

有一个人见跑不回去，干脆不跑了，跳着脚指着城门楼上骂:“狗日的，你们不得好死哩!我日你们所有人的亲娘、亲姨、亲姐、亲妹子　　　　　　　　　　　　　。”

他忽然闭嘴不骂了，原来头盖骨被枪子掀开了，鲜血伴着些白乎乎的东西淌出来，他居然还来得及用手摸了一把，这才直挺挺地向后仰去，躺在了离城门楼只有十几丈远的地方，胸脯猛地鼓了几下，四肢一伸，呈一个大字再也不动了。

终于，人们不再发愣，后面的人也开始逃窜，一瞬间，浩浩荡荡的上千人一哄而散，如同水渗进干枯的土地一样不见了踪迹，城关街空荡荡的了，只有十几具依然慢慢往外渗着鲜血的尸体躺在那里，一个人还没有咽气，半抬着手，想让人救他回去，但没有一个人敢冲过去抬他。

霍达东妄图阻拦人们的退却，嗓子似乎要撕裂般叫着:“别退!冲上去，冲到狗日的面前，快枪就没用了!”

但没有经过任何正规军事训练也没有见过这种血腥场面的农民们根本不再听他的嘶喊，可能也听不见，只顾往子弹打不着的地方仓皇逃跑，人流将霍达东也挟裹着，使他不由自主地又回到了出发前的小客栈。

进攻另一座城门的人与这里的遭遇几乎相同，只不过少死了几个人而已。

李仲海脸色不再通红，而是有些苍白了。他坐在临时指挥部的方桌前，从牙缝里往外挤着话:“我就不信几千革命农民砸不开肤郡县城的木头门!”

霍达东没有吭声，他刚刚大致清点了一下人数，只剩下不足一半了，大约有一千多人，他心里骂了一句:“这些尿!”

“达东，你砸过粮库，你说用什么法子往城里冲?”李仲海终究是个书生，打打杀杀的事他不在行哩。

霍达东点了根烟，他终于明白砸肤郡城和砸粮库的本质区别了:砸粮库是处于死亡线上的农民的主动要求，那时的农民有如一堆秋日的落叶，一个火星子就点燃了;而砸肤郡城仅仅是几个共产邪党员的主观愿望，农民们对此并不迫切，他们没有被逼上死路哩!

但霍达东不是个服输的人，何况他是共产邪党员，要干共产邪党的事。他眯着眼睛想了想，慢腾腾地说:“先要组织敢死队，找些不怕死的后生往上冲，带些煤油和木柴，冲上去放火，烧城门，熏狗日的们睁不开眼，放不准枪。”

“好，就依你说的办!”李仲海又缓过点神来，骤然跌人冰窖的寒栗感慢慢消失，血液在逐渐升温。

霍达东走出门去组织敢死队，不想一眼看见了靠在客栈院门口框上的桂桂，他一下子恼怒起来，冷着面孔问:“你咋跟来了? 怪不得打败仗，有阴气哩!”

桂桂闷着头不吭声，刚才的情景她都看到了。几个后生吓得尿湿了裤子，几十个农民兔子一样一下子就逃得没有了踪影。她的心到现在还突突地跳，除了担忧到极点，她实在说不出什么来。

“回家去，枪子不长眼哩，打中了你，我有个头疼脑热的，谁伺候我?”霍达东口气虽硬，其实也是为桂桂着想。

桂桂猛一下抬起头，鼓足了勇气顶了丈夫一句，以前在她身上几乎从没有发生过，但此时此刻的情景实在让她的精神要崩溃了，她尖叫着:“我不走，走了，谁给你抬尸哩!”

“我让你说混话，敢咒我死!”霍达东扬手给了桂桂脸上一巴掌，桂桂那还没有塌软松弛的面颊立时出现了几个红手印。

她怔了一下，反身扑在门板上，呜呜地啼哭起来，哭得撕心裂肺，肝碎肠断，她抽噎着说:“哪个说混话，哪个咒你哩，城楼下面不是躺着十几个死人，谁去抬了，你说的枪子不长眼，咋就打不到你身上?弟，你们打不过人家，认输吧，这跟砸粮库不一样哩，没那么多人跟着干，弟，我说的是气话，我不能眼睁睁看着你去送死……”

霍达东见不得女人哭，他心软了下来，但他绝不会临阵退缩，他是个不服输的人哩，他一跺脚:“好，姐，你等着给我抬尸，我死也要死个轰轰烈烈，不会像大那样自己撞死!” 他抛下哭得上气不接下气的桂桂，提着大刀片子去组织敢死队了。

热血青年还是有的，二百多后生集中到客栈的院子里，所有的快枪和猎枪都被发到他们手中，每人背上还背上了一把砍刀，这些人中自然有想攻进城去抢大户、砸当铺、睡千金小姐的心术不正之徒，也有因刚才死去了儿时伙伴，甚至是亲兄弟而要报血仇的人，还有一些是共产邪党员和农会的干部。

霍达东让人从一个饭铺里拿来了二百多个大老碗和一缸酒，每个碗中都倒了一口，然后捧起大碗，仰头面朝苍天说:“天大大作证，这碗壮行酒喝下去，不砸开肤郡城门绝不收兵，不把总农会大匾再树起来，我霍达东就是反，就是狗日的!”

他一饮而尽，然后把碗摔碎，以示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决心。

二百多个汉子甚感壮烈，也一个个喝光了酒，砸碎了碗，饭铺的老板在旁边心疼得捶胸顿足，但又不敢抗议，刚才搬他家的碗和酒时，他本想拦着，那几个汉子脸一沉:“为了革

命，我们连命都不要了，你还心疼几个烂碗，把你婆姨献出来都不为过哩!”这老板此时当然只能唉声叹气，他可不愿把婆姨让这些山沟沟里出来的无赖们给日了，只能心里咒骂着:“啥革命哩，跟土匪没两样!”

天将黑，二百多敢死队员提着枪，背着刀，另一只手抱着木柴、煤油桶和从客栈里硬捐来的棉被，分成两队，由李仲海和霍达东各带一队，不再呐喊，而是悄悄地向肤郡县东西两侧的城门楼摸去。

半个时辰之后，大火燃烧起来了，但那火不是在城门楼下燃的，而是在距城门楼还有十几丈远的开阔地上熊熊燃烧，火苗子蹿得比树梢还高，半边天红艳艳的，黑暗被挤向两边，城门楼清晰可见，上面在疯狂射击的士兵也看得清清楚楚。

火不是敢死队放的，而是守城的士兵发现人影晃动后立即开了枪，枪子击中了煤油桶，桶中的煤油被点燃了起来，挤在一起的那些人怀中的木柴和棉被也跟着冒出了火苗，顿时，有人在火中跳跃着、挣扎着，失去理智的扑向别人的怀抱，而其他人则扔下手中的易燃物，纷纷躲闪，那些丢在地上的易燃物碰到火星也燃烧起来，火势越来越猛，几个身上着火的人最终炭一样扑在地上，从他们身上冒出了蓝色的火焰，散发出烤肉的焦臭味。

霍达东指挥+几个人用力将手中的易燃物向城门楼扔去，但由于距离太远，依然落在了开阔地上，这十几个人随即卧倒，借着火光向城门楼上开枪还击，但机关枪子弹拨水一样洒了过来，一堆堆火星飞溅，让他们无法抬头睁眼。大火引来了夜风，而风势又向敢死队这边狂吹，那高温能把人烤糊了，有人向后一滚，紧接着，更多的人干脆爬起来，撅着屁股向黑暗中窜去。

最后，只剩下霍达东一个人还在射击，火苗子燎光了他的头发，烤糊了他的衣衫，他依然在扣动扳机。令人惊异的是，那蝗虫般飞来的子弹竟没有一颗能打在他的身上，他的袖口和裤腿上都有几个子弹打穿的洞，可他却连一根毫毛都没有伤到，就如同冥冥之中有上苍或什么神灵在保佑他，使他逃过劫难并在几十年后再干出一场轰轰烈烈的大事来。

霍达东感到了孤独，他前后左右除了几具尸体外，再没有人跟他一块战斗，对方的枪声像是无人看守的谷场上成群的麻雀欢快地“吱吱”乱叫，而他的还击只像一只离了群的大雁凄凉地哀鸣。此时，他希望在他的所剩不多的几发子弹打光之后，敌人的子弹能击中他，让他和那些先他而死去的好汉一样成为一具尸体，这样才能对得起跟他而来的他们，即使是敌人的子弹打不中他，他也要抱起一桶燃烧的煤油，化为一团烈火，冲到城门前，将那城门烧成炭渣!　　这一刻，有一个人不顾一切地跑过来，一下子扑到他的身上，用躯体遮挡住了他。他不用抬头，从那熟悉的气息、柔软的身子骨就知道是桂桂，他孩子一样地抱住她，把被火燎出水泡的脸埋进了她的胸脯内，他感到只隔着单薄衣服的一双温热热、软绵绵的奶子和硬挺挺的奶子头，他的恐惧、孤独和死亡的欲望全都消失了。

他在自己家窑洞的炕上，在桂桂娘家的床上，在客栈的铺上都这样依偎过桂桂，他还想在黄土源上、黄土沟沟里、看瓜人的草棚内、青青的如毯子一样的麦苗丛中这样贴住桂桂的胸脯，但这些都没有实现，桂桂害羞哩。但他绝没有想到，在这子弹乱飞、烈火熊熊、横七竖八躺着烧焦的尸骨的战场上，他能这样枕住桂桂的奶子沟，他几乎忘记了周围的一切，病态似地要沉沉睡去。

桂桂并不是来给丈夫温柔的，她是来挽救自己将终生依靠的汉子的生命的，她的丈夫活着，她的生活中才会有阳光。她尽量为她遮挡着子弹和火焰，急促地说:“弟，全完啦，仲海那边的人连火都没点起来，仲海身上就钻了三个血洞洞，让人抬回来了，他说暴动失败了，

让大家回家哩!”

“你又说混话!仲海一心要搞暴动，咋会认败哩!”霍达东一下子清醒过来，不相信似地喝问着。

“这是真的哩，不信你去看，人都快散光了!”桂桂优心如焚，正巴不得霍达东能赶快离开这个死亡之地。

霍达东看看城门楼，一口气打完枪膛里的几发子弹，把枪往火堆里一投，抱着桂桂滚到阴暗处，跃身而起，嫌桂桂动作太慢，一下子扛口袋一样扛起她，向小客栈跑去。

桂桂确实投有骗丈夫，小客栈中一片狼藉，几面旗子扔在地上，到处是碗的碎片，一堆红缨枪和砍刀散放着，有的上面还套着红袖章，李仲海和几个伤号躺在床上，除了李仲海咬着牙关外，其余的伤号不停地“大呀，娘呀”地哀号，如同挨了刀的猪在哼哼。

见霍达东进来，李仲海只说了一句:“达东，保存力、力量……”他昏迷了过去。

霍达东眼睛要喷出血来，可又无可奈何，他只能提着刀片子，窜到客栈的牲口棚，不由分说拉出了几匹驴来，不顾客栈老板的苦苦哀求，将他一脚踢趴下，把几个伤员和桂桂抱上驴，借着黑暗向马家沟跑去。

一路上，碰到了不少也在逃回家的农民，这些人对霍达东的态度有点冷硬，有的向他报怨着，有的说些风凉话，有的让他赔兄弟的命来，有的惧怕政府的报复。

“霍总会长，革命怕不是这种革法吧?这不叫革命，这叫送命哩!”

“霍总会长的威风出大了，总农会被砸，就想砸了肤郡县当县长哩，都说他是黑狼转世投胎，有点不怕死的味道，可我们不想当匪，想好好活哩!”

“姓霍的，我哥的命咋算?你要给他披麻戴孝，抬棺十里!”

“我弟烧成了炭渣渣，连个全尸都见不着啦!”

“生娃，咱败啦，可人家能就此罢手吗?要是株连九族、牵累老小、满门抄斩，咱可上哪躲去哩?”

“生娃，再不敢讲革命、讲共产哩，谁当官，谁当政，这是命中注定。农民辈辈都是农民，种庄稼是本分。朱元璋、李自成是农民，可做了皇帝就又不是农民了，不会给农民撑腰。国民党、共产邪党都一样哩，没得天下时让农民打头阵，得了天下就把农民踩脚底下了。生娃，你要好好想想啊!”

霍达东本来默不作声，惨败的阴影给他心头压着太重的负担，他脑子几乎空白，没有力量去想，也没有力量去说，可当桂桂去乞求那些人别再给丈夫添烦时，他却爆发了，他大吼着:“你们都是反!我告诉你们，谁也拦不住咱革命、共产，革命、共产保险能成功，共产邪党早晚要坐天下!种庄稼还有旱涝风虫的灾，革命就那么容易?造个娃都要你在婆姨身上日得喘粗气，冒大汗，革命做个梦就成功啦?你们都听着，今日给革命出了力，淌了血，送了命的，日后共产邪党必报大恩，我霍达东能活到那一日，不但给死者披麻戴孝，长跪三日，还要给他们立碑，立杨树那么高的碑!今日里若不说革命好话，还背地里拆革命台的，日后共产邪党执了政，也要一笔账一笔账地算!”

几乎没有人信他的话，人们都认为他发疯哩，连个肤郡县城都攻不下，还扯啥在中国得天下?!人们冷冷地笑着，不再理睬他。

当然，在二十二年之后共产邪党真的统治了除台湾之外的整个中国时，这些农民绝不再像今日这样冷言冷语，而是欣喜若狂，庆祝翻身得解放，他们在回想起攻打肤郡县城那一夜的事情时，大都感慨地说:“生娃有远见哩，他认定了革命保险能成功，所以他当了大官，在省府里住大宅院，坐小轿车，又娶了年轻漂亮的婆姨，我们只好还是种地。不过，话又说回来了，当初咱就是想好好种地哩。”

霍达东在做了省长时，也常会回忆肤郡惨败的情景，但更使他铭记不忘的是那些沮丧的农民们认定农民做了皇帝就不是农民，就不为农民做事了的固执之辞，他不知道住进了京城中那些人们是不是还把自己当成农民，但他始终认为自己永远只能是一个农民，这倒不仅仅是他一直在生活习惯上保持着农民的习气，而是他的骨子里见不得对农民不利的事，听不得对农民不善的话。

(18)

陕北汉子霍达东没跟婆姨桂桂有一点商量，甚至连交待一下都没有，就把家里最值钱的一头壮壮的黑驴、十几只肥肥的山羊，还有分到手没几天的五亩上好水田给卖了。他根本不会担心桂桂埋怨他，因为桂桂几乎从来不埋怨他，除了涉及生死问题的时候。

他急需要钱用，没有钱，可能就会出几条人命，这几条人命就是李仲海和另外几个受伤的共产邪党员，他们在肤郡暴动时都冲在前面，而受了伤之后又不能回到家去治伤，他们的家不是被政府查封，就是被监视起来。

肤郡暴动之后，渝林边防军司令金上岳亲自打来电话，表示再不能对暴民以宽容，尤其对共产分子，更不能养虎为患，必须加以彻底铲除，只有这样才能举三民主义大旗，保一方平安，共产邪党实乃造谣惑众、煽动暴民闹事之罪魁祸首，是中华民族之毒瘤，任其发展实乃中华民族之大不幸。

于是，留在肤郡城内尚未及疏散但已公开身份的两男一女三个共产邪党员被立即逮捕，三天之后即惨遭杀害，两个汉子的头被砍了下来，挂在城门楼上，那个女子则先被轮奸。让她尝尝被共妻的滋味，然后割去乳房，刻去阴部，曝尸街头。一天之后，尸骨和人头开始腐烂，臭气熏天，无数苍蝇遍布其上，惨不忍睹，还是马方和李秋枫趁夜晚无人看守之机，雇人将两个头和一具尸身偷走，掩埋于城外山坡一座乱葬岗上，那里前几日已经掩埋了二十多具暴动农民的尸骨。

马方和李秋枫虽然参与总农会工作，但人人都知道他们不是共产邪党员，国民党县邪党部委员曾拉拢过他们:“共产邪党专门吸收地痞无赖，像你们这样大户人家的少爷千金无论如何都只能是他们的掌中玩物。你们是有知识的青年，应该懂得共产主义是西方传来的谬论，与我中华民族数千年传统格格不人，不符合中国国情哩，只有三民主义才是积华夏文明之大成，希望你们能成为我邪党的一员!”

形势所迫，马方和李秋枫都不敢公开驳斥国民党县邪党部委员的论调，何况马方还身为肤郡师范学校的新任校长，虽算不上满腹经伦，德高望众之人，可也是留学英国剑桥的知识分子，他明白事理，知道这时争辩不但毫无意义，而且可能招来杀身之祸，他们现在需要是保存实力，以图东山再起。经过肤郡暴动之后，马方和李秋枫一下子成熟了许多。

县警察局没有抓捕这一对曾经很活跃的青年男女，这不仅仅因为他们不是共产邪党员，关键是李秋枫的大四处花钱打点的结果。他多少知道自己的女娃不安分，在跟着共产邪党胡

闹，国共分裂，蒋介石、汪精卫先生在上海和武汉宣布清除共产邪党而大开杀戒，肤郡农民暴动惹怒了一直处于宽容态度的金上岳，屠杀这些暴民在所难免，势在必行，虽然女娃从不听大的劝导而自行其事，但那终究是自己的亲生骨肉，不能见死不救。于是就以发展地方武装，维护一方平安为名向金上岳捐了一万块大洋，获取了女儿和准女婿不被牵连的许诺。

他心里很清楚，只保女儿，不保女婿是不行的，女儿之所以疯疯癫癫地跟着共产邪党摇旗呐喊，完全是痴迷地爱上了马方之故。本来他可以借金上岳之手除掉那个他说不上喜欢的准女婿，那个准女婿在他心目中除了会写几首不伦不类的歪诗淫词之外，就是自甘与地痞无赖为伍，实在不是他所希望的仕途之辈，栋梁之才，就是继承他偌大的商号也指望不上。不过，这准女婿若是有个三长两短，他那因自小娇惯而脾气固执的女儿准会去寻死觅活，为情而亡。为自己女儿计，他只好将两个人一块保下来。

屠杀共产邪党员的风潮遍布全榆林府，榆林府所辖的每座城镇里都三天两头地张贴出划着红钩的大布告，宣判共产邪党员的死刑，并列数其罪恶，以示不杀不足以平民愤。而被杀的共产邪党员大都是被先游街示众，然后绑赴刑场，一脚踢中膝盖窝，跪于地上，由刽子手用枪对着后脑勺开了一枪，顿时脑浆崩溅，死于非命。

尽管也有吓得发抖、浑身乱颤、面无血色的人，但大多数共产邪党人都是慷慨就义，知识分子们不是高唱《国际歌》就是一路宣讲共产主义，而农民们则是挺着脖子狂叫:“老子二十年后又是个红匪，杀光你们这些狗日的!”

围观者中看热闹的居多，但也止不住地议论:“那教书先生可惜哩，我们娃最喜欢听他讲课，他那秦腔唱得赛过戏班子。”

“十几年没见过这么不怕死的汉子了，枪托把膝盖骨砸碎了才跪下，还叮嘱那刽子手别把枪子打歪了，吓得那刽子手第一枪还真只打飞了一撮头发毛。”

“那女子怕还怀着个娃哩，听说她砍过三个大户人家的脑袋，像《水浒传》里的母大虫，你看她还挺俊俏的，不该杀，配给哪个光棍汉做婆姨，或到大户人家当丫环也算善举哩。”

“嘻，那后生尿裤子哩……”

共产邪党在榆林府再不能公开活动了，只有转人地下，李仲海早已.被列入通缉名单，当然只能躲在别处养伤。不过由于各镇乡残存农会势力还在，国民政府的政权尚未在基层恢复统治，住在远离县城的村中一时半会儿还没有太天危险。李仲海不回近在咫尺的家也只是预防万一罢了。

当下之急，倒不是怕官府缉拿他们，而是这几个伤号的伤势严重，经专治红伤的大夫看过之后，开出一大推西药的单子，说是没有这些药，伤号们都有性命之忧，而这些西药没有上百块大洋是抓不回来的，这才导致了霍达东二话没说，就变卖了自家的一部分财产，他再不忍心看着同志们死去哩。

金城镇药铺没有大夫开出的那些西药，只有到肤郡县城去买，村里参加过暴动的农民自然没一个敢往那血腥气未散的地方去，找别人又不放心。李仲海和几个伤号是黎明前住进霍达东家窑洞的，可以说神不知、鬼不觉，连李仲海的亲大、亲娘都不知道儿子就在身边，以为儿子即使没成鬼，也早流落异乡了，整日以泪洗面，唉声叹气，优心忡忡。

桂桂见霍达东为难，蹲在门前闷头抽烟，小声问了问:“弟，是不是要去肤郡城买药?”

霍达东点点头。

桂桂俯下身，摸了摸他因燎出些血泡和烧得长短不齐而剃去了头发的光脑袋，好像是有

什么美差似地乞求着:“弟，让我去吧!”

霍达东可知道这不是啥美差哩，他仰起头，看了看神态平静的桂桂，说:“姐，这不是进城赶大集。”

“我知道，我就是去买药。”

霍达东站起来，他已经完全明白桂桂是在为他分担忧愁与风险。说心里话，他不愿桂桂去，他心疼自己的婆姨哩，他还指望着婆姨给他生个小共产邪党员出来接他的香火哩。可眼下没有办法，他是被通缉的要犯，是领头闹事的，很多人都认识他，根本不能出门，别的人又派不出，只能让桂桂冒这个险了。他点点头，把那张药单子塞给她。他那些同志的命在他眼中比桂桂值钱，桂桂心里保险也这样认为。

桂桂很高兴地直起身子，回窑洞里换上回娘家时才穿的新衣裤，这新衣裤是从马孝贤家分来的，霍达东自己没要马孝贤家任何东西，只给桂桂拿回了春夏秋冬四身衣服，这衣服是马孝贤家三婆姨的，没怎么穿过，还簇新哩。他还为桂桂要了个银手镯，与她原来那只配上了对，他把这些东西拿回家来后，桂桂欢喜得直淌泪水，把他的头按在自己怀里，死死地搂着，几乎让他喘不过气来。

那一天回来后，他让桂桂把每一套都拿出来试试看，自己半眯着眼蹲在炕沿子上欣赏。大白天当着丈夫的面换衣服，桂桂还是羞答答的，可她不愿扫丈夫的兴，还是一一换了一遍。真的是人靠衣服马靠鞍哩，桂桂换上那些细布的、丝绸的、绞缎的、羔皮的衣服后，光彩照人，俊俏了许多。她站在一个圆镜前，上下打量，自己都有些认不出自己哩。

“弟，哪件好看?”她问霍达东。

“哪件都好看哩。”霍达东眼睛内闪动着异样的光芒。

“哪一件最好看?”桂桂见丈夫情绪好，有点撒娇地追问。

“啥都不穿最好看。”霍达东开着他生活中很少开的玩笑。

桂桂一下子扑过来，填怒地捶打着丈夫:“你说混话哩，你坏透了，真真是个痞子头!”

霍达东拦腰抱住她，胡子拉碴的嘴贴住桂桂的脸，热烘烘的大手伸进桂桂的怀里边……

如今，桂桂又穿上了那套秋装，蓝绸子带红边的宽脚裤，粉缎子绣白花的斜襟袄，手臂上戴两个银镯子，头发梳得光光的，一下年轻了好几岁，有点新媳妇的味道哩。

霍达东没工夫欣赏她，也没那份心情，而是到马牙子那里借了一头听话的小毛驴，驮上点草料，扶桂桂坐上去，叮嘱了句:“买完了药，就赶回来，我到金城镇城门口接你。”

桂桂点点头，拉住缓绳，拍拍驴屁股上了路，小毛驴迈着比教书先生还稳重的步伐向村外走去。

过了晌午桂桂就进了肤郡城。城门口有四个士兵和四个警察站岗，凶神恶煞地检查来往行人，城门楼上架着挺机关枪，似乎大敌随时都会出现在眼前，城门边贴着几张通缉令，上面画着李仲海等几个共产邪党员身份公开了的农会干部的头像，令人惊讶的是霍达东的名字和头像不在上面。后来人们才知道，这完全是榆林军头目金上岳一句话所致。

金上岳曾私下里大大咧咧地说:“共产邪党主要是些偏狂的书生，喝了点洋墨水，就不知天高地厚!霍土生这种汉子无知哩，一个庄稼人，无非是想捞几亩地，获点不义之财，不足为患。找人告诉他，我金某给他地，给他个营长当，再给他找几个姨太太，我敬他是条汉子哩!梁山好汉最后不都被招安了吗，我也招安他，让他改邪归正，为朝廷出力!”

就这样，霍达东没有上通缉令，这使得他在相当一段时间里少了些被抓捕杀头的危险，也使他有了一些活动的自由。但是，在十几年后的延安“整风”和以后一系列共产邪党内的清理异己分子的运动中，霍达东为金上岳这句话不知写了多少申辩材料，他所留下的底稿连一个著名作家都感到吃惊，说是可以出十本不薄的书哩。

桂桂走进城门倒没有受到多少盘问，她那身装饰和她一惯对丈夫之外的男人的冷漠态度使得士兵和警察一眼就认定她不是个大户人家的千金就是哪个达官显贵的姨太太，又见那毛驴上的搭子里沉甸甸的放着不少银圆，更肯定她不会是造反的暴民，挥挥手就让她过了关卡，而一些平民尤其是农民打扮的人就遭了殃，麻袋、包袱、菜筐一律翻个底朝天，不论男女，都浑身上下摸个够，连胸沟，裤档里都不放过，桂桂知道，他们是在占女人便宜哩。

沿着石板路上到半山坡，就见到肤郡城内最大的药铺的招牌:康利大药店。这个药铺相传已有一百多年的历史，原来叫达仁堂，共和以后，西药涌进中国，药铺老板见西药利润不小，便中西合璧，两种药都经营，店名也改为康利了。

桂桂下了驴，把堰绳拴到店铺外的木柱上，低头走进了敞着格子门的药铺店堂，她之所以低头是发现有人不怀好意地上下打量她，那目光火辣辣地停在她因缎袄卡腰而凸起的胸脯和屁股上，她不敢回视他人，自然有点慌乱。
药铺的伙计很热情地招呼她坐到有着大理石面的红木太师椅上，又倒好了一杯八宝茶送上，这才从她手中接过药方子，小跑着送到柜台后面的掌柜的手中。

那掌柜的看了看药方，又打量了一下桂桂，不动声色地将各种针剂、药片、药棉等东西拿齐，扎好一包，嘴皮子蠕动了几下之后，说出了药价:“九十一块大洋，拆去零头，请太太付九十块大洋。”
桂桂刚要起身，小伙计又殷勤地跑过来，替桂桂将从搭子里拿出的九十块大洋捧到了柜上。掌柜的拿起两块，轻轻敲了敲，发出清脆悦耳的声响，掌柜的点点头，收下银圆，让小伙计把一大包药送到桂桂手中，客气地说了一句:“谢谢太太惠顾本店的生意。”他当然不会说欢迎再光顾，因为这无疑是咒客人家还有病灾上门。

桂桂拿好药，刚站起身，就见一个穿中山装的后生急急忙忙闯进来，到了柜台前与掌柜的低语，她没有在意，出了门，解开驴缓绳，准备上驴而去，这样，月升之时她就可以回到马家沟了。
桂桂险些回不了家。
她刚要往小毛驴屁股上坐时，一个人按住了她的手:“太太，请留步。”

她一惊，手触到毒刺似地闪开了，毛驴的缓绳就落到了那个人手中，她回过头去，看见了正是刚才那个穿中山装的后生，脸膛白白的，长满了粉刺，鼻子很大，眼睛细长，头发梳得亮光光的，一看就给人一种专门糟踏女人的色狼的感觉。桂桂认定他就是在她进药铺门时色迷迷盯着她的那个人。

“干啥哩?”桂桂本能地喝问了一声，恼怒地瞪了他一眼。

“干啥?我要带你去警察局盘问盘问，这些红药是不是给红匪治伤的?”那疙瘩脸后生没有气势汹汹，而是阴阳怪气地说，但他却从腰里掏出了一支转轮手枪，这表明了他的身份不是平民百姓。

桂桂从来没有单独经历过这种场面，几年前在米脂她亲娘家被士兵盘查，在肤郡客栈被警察抓捕，犯事的是她丈夫，而且他护在她身边，她多少还可以安定些，而这次却是单独被官府爪牙阻截住，何况她确实是买了红药给肤郡暴动的伤号治伤，她不禁有点心惊肉跳，面色紧张得有点苍白了。

“不，不是红药……”她身子微微抖动着辩解。

疙瘩脸后生吃吃地笑了:“太太，你扯谎哩，这说明你心虚。我问过药铺掌柜的了，你买了九十块大洋的西药，专门治红伤的，够几个人用。你千万别再找你汉子和你吵架被你砍了一刀的借口。”

桂桂确实想找这种借口，见疙瘩脸后生像钻进了她的肚里蛔虫一样，她越发感到跌进冰窖一样浑身发冷，不知如何回答。她想跑，但又知道跑不掉，她双腿已经软得像棉花哩，她想哭，不是为自己的生死，而是为没有帮上丈夫的忙，可她又不能哭，她终究是个要面子的女子，不能让人看着笑哩。

疙瘩脸后生拿枪一顶她腰眼:“跟我走吧，我在这药铺门口贼似的守了五天，皇天不负有心人呀，终于抓了个女红匪，能领到十个大洋的奖赏哩。”

听到十个大洋的奖赏，桂桂心里一动，张口就说:“兄弟，我给你十个大洋，你放了我，没吃亏，还积了阴德。”她说完从搭子里拿出没用完的十个大洋。

疙瘩脸看看在下午的斜阳下光闪闪的十个大洋，眼睛内也划过了一道和大洋一样的亮光，但他马上摇了摇头:“我不吃贿赂，跟我走。”

桂桂艰难地迈动了脚步，她在开始想自己大概再见不到丈夫，也会像那些共产邪党员一样被割去乳房，曝尸街头，她不敢往下想了，只是麻木地向前走着，准备找个机会，一头撞死在一堵墙上。

“进去!”疙瘩脸后生把桂桂推进了一扇门内，随手又关上了那扇门，并且上了门栓。

在进外面的院门时，桂桂就觉得这地方不像警察局，而是像个旅店，等进了这间屋子，她更肯定了自己的判断，那丫张铺着花床单的大架子床，一个衣柜，一个梳妆台，一张方桌和两张木椅，一个脸盆架，正是典型的旅店设施，她丈夫那次被官府抓住时，她就正和他躺在这样一个房间里哩。

没等她再深想为何被带到这样一个地方，那疙瘩脸后生就凑到她身边来开了口:“女红匪，这里安静，咱们来谈谈条件吧。”

“啥条件?”桂桂本能地后退一步，碰到了床沿，跌坐下去。

疙瘩脸后生放低了声音，如同一只戏弄老母鸡的大黑狗一样嬉皮笑脸地说:“你不是想让我网开一面，放你一马吗?”

“我、我给你大洋，还给你一、一对银镯子，够你讨个婆姨了。”桂桂有点发狠地又倒出银洋，退下手腕子上那对银镯子。

疙瘩脸没有接那些东西，而是一把拉住了桂桂不很细嫩却还小巧的手，喷着股热烘烘的

气息喘着说:“小心肝哩，我不想讨婆姨，就想和你睡一觉。让我睡了，保险放你走，我可不忍心看你这花骨朵似的女红匪被那些狗日的曝尸街头。”

“你混!我不干哩!”桂桂拼命甩脱了那人的手，站立起来，惊恐万分而又气愤地盯住疙瘩脸后生，两个手本能地握成了拳头，防备着他再扑上来。

疙瘩脸后生愣了一下，反倒坐下了，摸出根烟，点燃，使劲一吸，再把烟雾猛地喷到了桂桂脸上，口气变得冷硬了:“我本来是想救你不进地狱，可你不知好歹，我也没辙了。你愿意去死，我不拦着，可那死的滋味不好受哩。几十个几年没沾过女人的大兵一人日你三次，你就是木头做的也被捅烂了，再把你的奶子一刻，往街上一扔，尸身让野狗咬个稀烂。还有，那些让你买药的人咋办，没药，那几条命也得归了西。好，走吧，跟我到警察局!”

疙瘩脸后生扔下半截烟头，让手枪在指头上转着圈，站了起来。

桂桂真的害怕了，她拼命往后退着，甚至想缩进墙缝里去，似乎门外就是疙瘩脸后生所讲的那残酷景象，她不愿意被那样糟踏，也不愿意被疯狗把尸身咬成一堆白骨。她本有机会去撞墙而死，但又怕万一撞不死，还是逃脱不了那厄运，而且，疙瘩脸后生提醒了她，那些药品关系到几个人的性命啊!她不能第一次帮丈夫做事就搞砸了，丈夫今后没脸做人哩。她也许应该忍受一次屈辱?

疙瘩脸后生看出了她眼神的变化，重又逼了过来，把枪往后腰一别，双手抱住了再也没有力量挣扎和没有勇气反抗的桂桂，柔声说:“这就对哩，跟我睡一觉，人不知鬼不晓，又能活命，又能带回家药去，不从我，几十个汉子日你，你也清白不了，药带不回去，还落个死，既不能好死，还不如歹活哩。其实也说不上歹活，我江大鼻子是有名的花丛好手，保证让你飘飘欲仙，哭死喊活，叫我大哩……”

疙瘩脸后生边说边把脸凑上去，亲住了桂桂冰凉的嘴唇，随即又把舌头伸进来，蛇一样地搅个不停，而双手却在解着她的衣扣。

桂桂死去般一样全身僵硬，任凭疙瘩脸后生放肆地搬弄着她，她把这当成噩梦，当成不会被记忆的噩梦。

她被解脱干净了，横放到床上，她紧闭双眼，听到疙瘩脸后生边脱衣服边在自言自语:“啧、啧，到底是良家女子，看这肉，多鲜亮，透着干净，我江大鼻子尝了鲜啦……”

桂桂的心里在哭泣，她默默地在呻吟诉说:“弟哩，你姐对不住你，你姐的身子让坏人弄脏啦。可你千万别记恨你姐，你姐是为了给你办事，是为了让你那几个一块干大事的兄弟好好活下来，是为了让你说的那个啥共产主义有盼头，是为了给你挣面子哩。你就当姐被疯狗咬了一口，就当姐不小心跌进了粪坑，就当姐……”

不，她绝不能接受这东西，她所接受的关于做女子的全部教育使她不能接受即将发生的现实，而这同时也激发出了她和婆姨们闲扯时别人讲的制服色狼的办法。

她不顾一切地伸出手去，抓住了疙瘩脸后生双腿间核桃般可笑晃动的卵子，疙瘩脸后生先是一笑，以为他的抚弄挑逗使桂桂忍受不住了，露出荡妇本色，但那笑容一闪即逝，随之而来的是痛苦万分的表情，最终惨嚎一声，全身紧缩着倒在闲边，因为桂桂像捏碎两个薄皮核桃一样死命地捏碎了他那两个卵子。

桂桂惊魂未定地出了肤郡县城，对于出城的人军警查得并不严格，因而桂桂没有再受到什么惊吓，但她走到没有人的地方还是滑下了驴背，呆坐了有半个时辰才缓过神来，清点了一下措子里的大洋、药品，还有她居然在失魂落魄中还给抓了来的转轮手枪。她拿这手枪当然是为了给丈夫用，她觉得这东西比大砍刀好带，也管用哩。

重又人了驴，她在月亮升到头顶上时才算到了金城镇，一路上没再碰上啥意外。虽然以前这一带也出过盗匪，但他们一般不打劫当地人，他们往往是从阴暗中窜出来，问上几句，如果听出是本地口音，就双手一拱，道声“打扰”，便放了过去。自农会被官府镇压下去后，这些盗匪也不敢再露头了，怕被当成红匪拉去砍了头，因而桂桂平安无事地走了几十里夜路。

月亮圆圆的，这一夜竟是农历八月十五，不过以往中秋节的热闹不复存在了，官府虽还没有正式派官兵重新接管金城镇，可居民们知道这只是早晚之事，还是谨慎行事，不凑热闹为好，以免被当成红匪。而农会元气大伤，剩下几个骨干都躲到村里，也不会出头露面张罗这种民间节日。于是，金城镇冷冷清清，安安静静，只有那轮皎月将清凉的光芒铺展开来，远处的沟沟壑壑，近处的房屋窑背一片银白，亮晶晶的河水不知忧伤地欢快流淌。

城门楼处，一个孤独的身影伫立在那里，一个亮点一闪一闪的，那是香烟在燃烧，见桂桂骑着毛驴走近了，这个人影走到月光映照的道路上，他自然是她的丈夫霍达东。

“这驴脚力不行哩。”霍达东没有斥责桂桂回来晚了，而是抱怨小毛驴，“狗日的跟了马牙子，也变懒了。”

桂桂从驴背上滑下来，一下子抱住了霍达东，只有在贴到他宽厚的胸膛上时，桂桂的担忧、屈辱、恐惧、哀愁才算全部消失掉，她禁不住一下子啼哭起来，那哭声惹得不远处归元寺里的狗汪汪叫了起来。

“哭啥哩，没买回药?”霍达东本来站在这里几个时辰中，心中一直发慌，一心惦念的是婆姨，甚至后悔让她去买药，而觉得该自己冒这个险。现在见了桂桂，倒表现出一心惦念的是药。

“买回来哩，还剩十个大洋。”桂桂抽抽噎噎地说。

“买回药来还哭啥哩，走，快回村，仲海他们等着用药哩。”霍达东一把抱起桂桂，把她放到驴背上，牵着驴向马家沟走去。

回到自己家的院内，霍达东抓起药包子就到了李仲海他们躺着的窑洞里，金城镇那个学过几天西医的丈夫赶快给已经处于半昏迷状态的伤号打了止痛和消炎的针，又把已经用土法子取出子弹的伤口处理了一下，这才疲惫不堪地收拾东西要回家。

霍达东把买药剩下的十块大洋全塞给了大夫，大夫推辞着:“霍总会长，你还是寒碜我哩，不能收，不能收，我家祖上的规矩，凡是治红伤，都不能收钱。”这实际上是实话，有红伤的大都非匪即兵，而匪和兵都得罪不得。

霍达东把钱硬装进他的药搭子里，虎着脸说:“大夫，我们不是匪，也不是兵，你放心哩，不过，你嘴严实点，别说这里有几个伤号就行了。”

“那绝不敢，我有一家老小哩。”大夫匆匆离去了。

霍达东看看呼吸均匀些了的几个伤号，心里轻松了些，回到自己住的窑洞内，见桂桂还

在和衣等着他，心里一阵暖意，灯也没吹，楼着桂桂躺了下去，脸蛋在她胸脯上蹭个没完，像是小猫缩在主人的怀中耍赖。

按桂桂对丈夫习性的了解，她知道他要和她亲热了，要在以往，她会迫不及待地接纳他，可这一夜，她却毫无兴致，甚至有些反感。她一想起那疙瘩脸后生留在她脸上、身上和两腿间的口水，就觉得那些地方像是生了癞疮，不能让丈夫挨，不能让丈夫看，就对发生男女间的事情产生了一种深深的厌恶。她在心理和生理上一下子都无法再容纳那东西。

她想推拒丈夫，可丈夫要做的事从来都是必须要做，不管是在炕上还是在杀场上。他不了解桂桂此时的心情，桂桂也说不出口，她将遇到疙瘩脸后生的事永久地藏于心底，埋于记忆的最深处。

霍达东感觉到了桂桂的麻木、冰冷、无动于衷和心烦意乱，他只是认为她跑了一天而疲惫了，于是他越发猛烈、癫狂、排山倒海般向着尽头撞击、冲刺，认为那样可以将男人的力量灌输给她，使她的火焰重新燃烧，但这一切其实都使她更加冷淡、生厌。

桂桂以为这种感觉只是暂时的，日后会重新恢复女性的欲望。然而，她再也没有恢复，每当丈夫要压到她身上时，那疙瘩脸后生的丑恶形态就会浮现在她面前，像一桶冰水轻而易举地浇灭了她心头那刚刚燃起的火苗。她感到羞愧，感到自卑，感到不配再做一个婆姨，当有一天她明确知道自己不可能孕育娃娃的时候，她最后的希望也破灭了，于是她自做主张与霍达东解除了婚姻。

(19)

陕北汉子霍达东一点都不愿意和李秋枫假扮成夫妻进人榆林府，他宁可扮成她的伙计，为她牵驴，可这是县委书记李仲海的决定，他只有执行。

李仲海伤势刚有点好转，就又准备搞暴动了，他觉得中国革命应该像苏联那样在大城市举行起义，占领反动政府的心脏地带，建立红色政权，这样就能一呼百应。江西省南昌市由共产邪党员周恩来策划，国民革命军的军长贺龙和公安局长朱德成功地在八月一日举行了暴动，虽然这个消息几个月后才传来，但对李仲海颇为震撼，使他激动不已。

他在邪党员会议上说:“我在广州见过周恩来同志哩，他当时是黄埔军校的政治部主任，那真是一表人材，满腹经伦，言谈举止，无可挑剔，就是最不讲理的人，听了他一番谈吐，也能臣服，连蒋介石这狗日的也敬他三分哩。他组织了南昌暴动，把大土匪贺龙、大军阀朱德都给劝到共产邪党这一边来了，真乃伟大，咱们也不能坐等革命胜利，还要暴动!对了，听说毛润之同志带着农民举行了秋收暴动，他们和南昌起义的部队会师江西井冈山，正式树起中国工农红军的大旗，今后咱们暴动，也打出陕北工农红军的旗号，配合他们。”

肤郡县残存下来的十个邪党员听了这些消息都感觉到又有了希望，正在这时，已经担任共产邪党陕西省委组织部长兼军事部长的李古派了人来，向他们传达了邪党中央关于在各地组织暴动，反击反动派的指示，而且介绍了几天前在清涧举行起义的过程，并让他们尽快采取行动。

“暴动成功了吗?”霍达东兴奋地问。

那个化装成为剃头匠的交通员摇摇头，声音有点沉痛:“没有完全成功，但拉起了一支武装，刘平同志亲自去领导，准备举行一次规模更大的暴动，一举占领陕北，成立红色政权。你们现在要积极筹备，发展革命分子，收集枪支弹药，屯集粮草药品，这都是必不可少的。

交通员走后，邪党员们商议了很久，觉得最关键的问题是没有枪支弹药和红伤药品，而这些东西必须要花钱买才行，但他们却几乎是身无分文，上级自然也不可能拨来经费。“抢狗日的大户!”马牙子对这种行动最感兴趣。

一个外乡的邪党员摇摇头:“闹农会时早把大户人家分干净了，还有毡毛给你抢?”

马牙子一歪脑袋:“城里边还有大户哩，肤郡、米脂、榆林府，上那去抢!

“你有几个脑袋，敢往油锅里跳，砸肤郡城时，第一个跑得没影子的就是你，裤档里塞个萝卜装个大哩!”外乡邪党员冷嘲热讽着。

李仲海有点烦躁，还裹着绷带的胳膊虚弱地摇了摇，不高兴地训斥着:“你们除了会说混话，还能干啥哩，骂你们是痞子，没半点错，革命成功了，先送你们去读三年书，把你们的舌头再革命一下!”

霍达东摸摸刚冒出头发茬茬的脑袋，从炕沿上蹦下来，活动活动蹲酸了的腿脚，挺认真地说:“马牙子那歪理有点门道哩，为啥不能摸进城里去砸他个狗日的大户?甭说城里面还没有天罗地网，就是有，那网眼眼总是个空吧?咱又不兴师动众、千军万马，几个人溜进溜出不难哩，说白了，就是往日土匪绑票，咱是红匪，要干革命，绑个剥削阶级的票不过分!”

大家来了兴致，想听霍达东再说下去，可他往炕沿上又一蹲，抽上烟，不吭声了，他原本就不是话多的人，说出这么一段话已经讲完了他的意思。

李仲海点了点头，当他觉得这主意可行之后，余下的事自然由他考虑。不过，他也没有考虑太久，就决定去绑李秋枫的大，她大是榆林府商会的会长，出五万元赎金应该是毫无问题的，正好马方和李秋枫出城来请示工作，李仲海就在金城镇一间小客栈内向他们传达了这个决定。

马方为了能经受一次严峻的考验，很愿意去执行绑架李秋枫她大的任务、但李仲海并不同意，他甚至很傲慢地嘲讽着:“马方同志，你干不了这样的事情，在严酷的阶级斗争中，你心慈手软哩。”

马方面孔涨得通红，虽然他能感到这种鄙夷带给他的痛苦，但他确实又有把柄在李仲海手中捏着，在杀他大时，他浑身发软，始终没有砍下能彻底改变他人生命运的那一刀。于是，他此时只能羞愧地垂着头，任凭泪水在眼中打转转。

李秋枫安慰着他:“工作多得很哩，不一定打打杀杀才是考验。”

李仲海看到李秋枫对马方无可奈何的安慰，心中涌出一股快感，但他并没有溢于言表，反而收敛了些跋瘪的态度，口气温和了些，说:“宣传工作也很重要，你想办法搞一台油印机，办一张赤色小报，宣传我们邪党的主张，可以改编些民谣，换上些革命的词句，通俗易懂，容易上口流传，也是锻炼嘛，也是革命需要嘛。”

李秋枫向李仲海投去感激一瞥，欢快地对马方说:“方，你这个诗人可以大显身手了，别整日价阴沉着个脸哩，对考验要端正态度。”

马方点点头，依然没有吭声，但其实他心中有了更多的觉得不被信任的阴影，他终于感觉到这多少有李仲海个人情感的因素在作祟，李仲海一定对没爱成李秋枫而耿耿于怀哩，因而才会找出各种借口把他拒于他所向往的共产邪党队伍之外。

他有了想躲避开李仲海的念头。

李仲海并没有看出马方神色有什么变化，他一点都不在乎马方的不满和抱怨，这更可以使他找到斥责马方对邪党的考验态度不端正的理由。马方的闷闷不乐让他有一种变态的舒畅，马方的任何一点痛苦都能使他因为没有得到李秋枫而受到的心理创伤得到一点抚慰。

他甚至产生过这样的念头，能把马方逼得走上与革命相反的路才好哩，这样，李秋枫就会鄙视马方，抛弃马方，而最终觉得他李仲海才是一个有所作为、值得委身的汉子。

他不再理睬马方，叫进了一直蹲在门外边抽烟的霍达东，指了指李秋枫说:“达东，秋枫态度很坚决哩，她表示一定要把她大从家里给诱出来，以后的事情全靠你了，见机行事，革命急需这五万大洋哩。”

霍达东不善于赌咒发誓，喷着烟“嗯”了一声。

李仲海又叮嘱了一句:“你和秋枫最好化装成一对夫妻，你是个商号老板，她是你的姨太太，这样安全些哩。”

霍达东看了李秋枫一眼，见她正嘻嘻笑着盯住他，他居然脸红了，嘟味着说:“她装千金小姐，我就给她赶驴吧?”

“不妥，不妥，赶驴的咋能住到大旅店去，千金小姐又咋能住到小客栈? 不住一起，没法相互照应哩。这事关系重大，搞革命千万不能顾面子。”李仲海严峻起来。

霍达东不吭声了，人家李秋枫一个女娃都不在意，他一个汉子还有啥可哆嗦的。

霍达东上路时桂桂才塞给了他那支从疙瘩脸后生那里夺来的转轮的手枪。霍达东有些吃惊地望着自己的婆姨，疑虑地问:“姐，这是哪弄来的?”

桂桂当然不能说实话，买药时的那段经历将永远成为她心底的秘密。自打那天深夜回到家中，她趁丈夫只顾了拿药而将手枪藏到衣箱底下时，就编好了应付的话，她说:“暴动那天街上到处扔着枪哩，我看这支小，好带，就捡了回来，想着你出门时给你带上防身。”

桂桂眼睛不敢直视霍达东，生怕他看出什么破绽来，她知道，他只要追问一句，她就会嚎陶大哭说出所受的屈辱，那她也就再也不会有勇气活下去。

霍达东还在为和李秋枫扮成夫妻的事烦躁，根本没注意桂桂忐忑不安的神情，即使注意到了，也只会认为是她为他又要于一件危险事而担惊受怕哩。他不太熟练地册开转轮，见里面弹槽内六发子弹一粒不少，骂了句:“使枪的人真是个反货，一枪未发哩!”

他撩开衣襟，把手枪塞到裤腰带上，既没有斗志昂扬，也没有心虚害怕，而是平平淡淡地上了路，他觉得办这件事算不上轰轰烈烈，用不着有“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的悲壮，更不是去杀人劫狱砸金库，也用不着有什么恐惧。这无非是一趟生意，和当初

他贩驴没什么两样，稍有不同的是这次去贩人，由他帮着李秋枫把她的大卖一次。

若说他还有点不踏实之处的话，那就是要和李秋枫朝夕相处好几日，除了和桂桂，他还没有和别的女子一同赶路住店哩，而且这女子是个大户人家的千金小姐。对大户人家的少爷小姐他从无好感，平时遇上都是冷目侧视，可对李秋枫又觉不能这样，他委实为难。

秋风萧瑟，黄土漫漫的山道上霍达东身穿从马牙子处借来的丝绸长袍，戴着呢礼帽，嘴上粘上了用头发做的假胡子，身板挺直、脚步有力地走着，丝毫不觉寒意，颇有些久经世面的富豪之气，只是神情有些幽暗沉郁，似乎心事重重。

李秋枫穿的是从桂桂那里借来的缎面夹袄和缎面夹裤，她身材比桂桂要丰满得多，那分到桂桂手中的大户人家婆姨穿的衣服都被桂桂按自己略显纤瘦单薄的身材改过，因而穿到李秋枫身上紧绷绷的，使她曲线毕露，年轻女子风韵完全突现出来。她的头发梳得光光的，在后面做了假髻多少使她变得成熟沉稳了些，但那一脸的青春朝气却无法掩饰。她明亮的眼睛中流淌的清纯使她一点不像个姨太太，倒像个卖艺不卖身的秦腔旦角。

她坐在一头骡子上，身体随骡子不急不缓的行进而有节奏地颠着，那胸脯也由此而颤动，光滑的缎面夹袄如水波般起伏荡漾。

她不停地嘻嘻笑着，觉得自己和霍达东的装束很好玩，还不时问着霍达东:“霍大哥，你真像个王公贵族哩，你那气质不像农民，你一定有王公贵族的血统，对不对?”

霍达东牵着缓绳，头也不回，尽量生冷地回答:“我就是个农民，我祖上是大将霍去病，可我不是大将哩。”

李秋枫认真地说:“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等革命成功了，你一定能出将人相哩。”

霍达东哼了一声:“就是革命成功了，我也还是个农民!我革命不是为了做官当老爷!”李秋枫觉出他口气不太友好，有点委屈地吸嗽嘴，换了个话题:“霍大哥，你看我这身打扮像不像个姨太太?”

霍达东还是头也没回地说:“咋不像?你生下来就是当小姐太太的命。

李秋枫不悦了:“霍大哥，你笑话我哩，我参加革命就是为了在中国扫除小姐太太，大家都平等。”

“那你嫁个农民做婆姨!”霍达东回头瞪了李秋枫一眼。

李秋枫并没有气恼，摆出一副小妹妹向大哥哥撒娇的口吻，扭扭身子:“嫁农民就嫁农民吸，革命成功了，我让马方也回马家沟种地，我养鸡、养鸭、养羊、养猪，带着一大堆孩子做游戏!”

霍达东嘴拙，说不过李秋枫，只好心里边哼了声:“城里女子不害羞哩，没嫁人就敢说带着一大堆娃的话。”但是，他觉得李秋枫并不像他以往见过的大户人家的千金小姐那样讨厌，倒不仅仅因为她俊俏，而是她并不傲慢，不故做矜持、清高，也不鄙视农民，她那爽朗、率直的性格有点对他脾气哩。

不过，他没再理睬她，而是径直走着，实在寂寞无聊了，脖子一扯，吼起了信天游:

九月里格太阳像个蛋黄黄，
赶脚人那个命苦呀好心伤，
眼看着哟北风北风起来呀雪花飘飘，
放下我的那个婆姨哟守空房。
九月里格太阳像个碾盘盘，
压在哥哥胸口上哟沉甸甸;
赶了这次脚来格挣下钱，
买上串银珠珠呀给妹带胸前……

“太好听了!再唱上几首。”李秋枫居然拍起了巴掌，她的欣赏是发自内心的，一点不是故作奉承。她向往地说着:“以后我就让马方当个农民诗人，专门收集陕北的民歌，让他成个民歌大王。”

霍达东心情忽然轻松了，和李秋枫这样浪漫活泼的女子在一起，他想沉重也沉重不起来，他禁不住开了个玩笑:“那你哩?你去给民歌大王当个押寨夫人。”

李秋枫一下子“咯咯咯”地大笑起来，好似天边飞来一行大雁，使清凉荒寂的黄土沟沟里一下子充满了生机。

在夕阳未落之时，霍达东和李秋枫进了肤郡城，城门口盘查的士兵虽然对他们还算客气，但因为近日陕北各地不断有共产邪党暴动的事件发生，所以并没有掉以轻心，还是浑身上下摸索了一番，幸好进城前霍达东就已经未雨绸缪，将转轮手枪吊在骡子尾巴下，才算没出什么纸漏。

不过，他还是有点紧张，进了城门，抹了一下额角的虚汗，他回过头看看李秋枫，见她坦然地坐在骡子背上，摆出一副盛气凌人、不屑一顾的神态，还真有点大户人家姨太太的样子。他不禁佩服起这年轻女子来，她胆大不慌哩。

他们没有穿过整个城，而是在坡下的肤郡大旅店栖下身。城里面认识这个常常出头露面的女教师的人不少，她没有遮挡面孔，很容易看出破绽，引起怀疑，女教师成了姨太太本身就是新闻哩，所以他们不敢去闹市晃荡。

“太太、先生，这里有上等客房，新添加了洗澡间，免去起夜的麻烦。”旅店柜台处一个账房先生满脸带笑地介绍着。

霍达东张口就说:“开两间。”

账房先生一愣，笑脸上升出了疑惑之情。

李秋枫好像不喜欢什么味道似地用手绢捂着鼻子，其实是遮住了半边脸，怒气冲冲地靠上来，瞪着霍达东说:“你又想甩了我自己睡踏实觉，不行，省下钱我还要买首饰哩，开一间房，昨日就让我一个睡空房，担惊受怕的。你要是再嫌我了就明说，我这就回娘家!怪不得我娘说男人都没良心!”

账房先生又笑起来，但不再是殷勤的笑，而是一种男人特有的坏笑，他一准认为是霍达东再经不住这位太太夜里的度战，惹不起躲得起，想开两个房间退避三舍，这位太太却初识滋味，不依不饶。

霍达东面孔一阵发红，他是真的有点难堪了，但不是账房先生想的那样，而是因为差点被人怀疑，两口子出门咋能开两个房间哩，虽然这事让李秋枫随口几句话给遮掩过去了，但另一件事却让他心里‘更发虚，他咋能和除桂桂之外的另一个年轻女子同屋而眠哩。

见他犹犹豫豫，李秋枫倒大方地往他身上一依，娇慎地催促着:“真烦人，快交了订金，我要洗澡去了，一身的土，怪痒的。”

账房先生很会办事，叫了声:“伙计，先把太太送到上房，把水烧热，龙井沏上。”

一个半大后生应声而来，提起李秋枫身边一个不大的黄皮箱，带李秋枫上了楼梯，在楼梯上，李秋枫冲霍达东调皮地一笑，刚好注视着她的霍达东更为困窘。

交了订金，胡乱写了两个假名字，霍达东也被伙计引到了二楼上顶头的一个房间，伙计拉开门，弯着腰说:“有事就招呼小的。”然后关好了门离去。

霍达东定了定神，发现这确实是间上等客房，家具全是红木的，地上还铺了张厚厚软软的波斯地毯，踩上去像踏着返青的麦苗，让人轻飘飘的，另有一个小门是通到洗澡间的，他稀罕地推门探头看了看，只见里面全是白花花的瓷砖，像是堆盘子贴满了墙，一个大澡盆也是瓷的，地面上还有一个带着拳头大小洞洞的小瓷盆，他琢磨了好一会儿才估摸着是拉屎撒尿的粪坑。

他缩回头，坐到太师椅上，又习惯地抽起烟，心里打定主意今夜就睡在那瓷澡盆里。晚饭他们是在房间里吃的，怕出去碰上认识他们的人，吃饭时，李秋枫还是有说有笑，霍达东却越来越紧张。

终于，碗盘被收拾走后，李秋枫问了句:“霍大哥，咋睡哩?”

“我、我出去到牲口棚去……”霍达东垂着头，连说去澡盆子里睡的勇气都没有了，他想起了这女子要洗澡，要起夜哩。

李秋枫又“咯咯咯”地笑起来，半开玩笑地说:“人家说我是个悍婆姨哩，把自己的丈夫赶到牲口棚去睡。”

“真的，这有啥好笑。”霍达东有点气恼。

李秋枫停住笑，也一本正经起来:“霍大哥，咱是革命哩，革命可不能有封建脑瓜子，你是共产邪党员，该比我觉悟高，革命需要咱们假扮夫妻，咱就得扮得像，不能因为害羞而出了破绽。仲海不是总讲，为革命死都不怕，咱还怕睡在一起吗?霍大哥，要真碰上警察查房，需要我和你、和你……亲热，我也不在乎哩，从仲海定了这事，我就做了这思想准备。”

霍达东听了这话很感动，知道这是李秋枫的肺腑之言，她不是个娟妇，也不是专招野男人的坏女子，她敢这么说，说明她为了革命敢做出任何牺牲。在他的概念中，女子的贞节比命还重要哩。他不吭声了，只是猛劲吸着烟。

李秋枫说完话，更觉轻松，她站起来:“霍大哥，早睡早起哩，好赶路，我先去洗澡，一会儿你洗，山沟沟里难得洗一回澡，可别错过这好机会。”她边说边走进了洗澡间。 洗澡间的门不厚，一会儿里面就传出撩水的声音，霍达东的身体开始燥热了，这种女子洗澡的撩水声不能不引起一个壮年汉子的联想，他站起来，拉开门走了出去。

外面是一道木廊，站在栏杆边，可以看到星星点点的灯火沿山势向上蔓延，与天上的星星联成一片。楼下不远处就是一个夜市，一溜小摊在卖各种小吃，在这种非常时期，肤郡城里的生意照样兴隆，这些普通百姓并不关心什么革命、暴动、造反、起义之类的事情，对于他们来说，安安生生地过日子，能填饱肚子有衣服穿就知足了。

看着这些芸芸众生，霍达东对革命的成功忽然有了一种像夜空中的流星般虚无飘渺的感觉，他甚至对革命的目的都产生了疑惑。老百姓真能有当家做主人的那一天吗?就是有朝一日把天下交给了楼下那些人们，他们能够治理得了吗?而且，新的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间就

再不会有矛盾了吗?

他苦苦地想着，但又无法得出答案。

不知过了多久，屋内李秋枫在轻声呼唤:“霍大哥，夜里凉哩，快进屋洗澡睡吧。” 霍达东这才从自己给自己挖设的深渊中爬了出来，走回确实比外面要暖和得多的屋内，但他绝不轻松，因为他觉得屋内对于他同样是一个深渊。

李秋枫已经洗完了澡，她穿着一件单薄的白上衣和白裤子，这是她的睡衣，不管在哪里睡觉都要穿上的，而这薄如蝉翼的真丝睡衣使她的肌肤半隐半露，极具或许她自己也没有在意的女性诱惑。她的头发湿漉漉的，脸庞红扑扑的，在昏黄的灯光下，整个人柔和、温顺、魅力十足。

她已经铺好床，地毯上也铺上一张床单，摊开一条被子，她坐在地毯上，见霍达东进来，不紧不慢地钻进被子。

霍达东关好门，靠在门板上，低声说:“起来，睡床上去。”

李秋枫摇摇头:“不，你是大哥哩，你睡床上。”

霍达东皱皱眉:“你要把我当大哥，就更该睡床上去，哪有大哥让小妹睡地上的。” “我喜欢睡地毯上，小时候我在家常睡哩。”李秋枫撒娇似地裹紧了被子。

霍达东低头喘了几口气，猛地跨上前来，弯腰连人带被一块抱起，将李秋枫半扔半放地撂在了床上，然后抓起另一床被，披到身上，和衣躺到了地毯上。

李秋枫不依不饶，两个脚敲打着床板，孩子似地发着脾气:“你把我摔疼哩，你真是个军阀，土匪作风，不尊重女性，大男子主义，我就要睡地上，看你再摔我一次。”

她嘟浓着，真的抱着被子爬下来，凑到了霍达东身边躺下了，一股年轻女性特有的好闻的气味立刻笼罩住了霍达东，他转过身去，不想再招惹她，他恐怕她的小姐脾气真的发作起来，会钻进他的被子来哩。他微微叹了口气，不明白大户人家的千金为啥总是那么任性，一个个都知书达理，却最容易大逆不道，反叛传统礼义。

虽然他很心疼自己的婆姨桂桂，不容得她受一点委屈和欺侮，但他真的不知道这是不是李仲海说的那种爱，或者仅仅是农民的道德观念使他把桂桂当成和自己的窑洞、牲口和土地一样的私人财产，不允许外人侵犯?他很害怕自己忽然萌生出来的一种念头，这念头就是他确实有点喜欢像李秋枫这样的天真、浪漫、任性、欢快的女子。他自己活得很沉重，而桂桂也活得很抑郁，假如他是黑夜，他更愿意身边有个亮堂堂的月亮，而不是一块乌云。

不，他不是一定就要娶李秋饵这个人，即使李秋枫现在爬进他的被窝，他也有足够的力量将她推到一边，使她如触冰石寒铁，她是另一个革命积极分子马方的人哩，他不能给自己的良心抹上狗粪。他只是希望桂桂能变成李秋枫的样子，不仅仅从相貌，而且从体态、性格都变。 他喜欢李秋枫的俊俏的脸蛋，会说话似的眼睛，喜欢李秋枫总是欢快、天真的品性，也喜欢李秋枫的体态。刚才他一回屋时，第一眼就看到了那薄薄衣衫中隐隐约约可见的浑圆大腿、丰硕奶子和那嫣红的奶子头，能躺在这样的胸脯上，夹着这样的大腿睡觉，会有当神仙的感觉吧?而且这样的体态能多生娃哩!

当然，并非完全是因为这个念头而使他后来同意了桂桂的离婚要求以及又先后结了两次婚，但这实在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他曾经为自己的这个念头而愧疚，但终于不了了之。只有到他临死的时候，他完全回归到质朴农民的心态时，他才觉得只有桂桂才算得上是好婆姨，

只有结发夫妻才谈得上心心相印。

他一动不动地睡去了，睡梦中，他搂住了李秋枫，而李秋枫一点没有拒绝他，她觉得这是兄长的体贴和关怀，在这坚实如大地、宽阔如海洋的胸膛内，她才能有安全感，才能不被任何可怕东西侵犯。她在想，假如霍达东愿意，她可以认他为亲哥哥哩。她很了解霍达东这样的人的性格，一诺千金，重义轻利，共产邪党里有霍达东这种人，她和马方跟着共产邪党就有安全感，他一定能给他们以最好的保护和扶助。

事实确是如此，在以后的几十年间，她的每一声“霍大哥”都给她带来了她所希望的呵护，甚至到她早已不天真、不浪漫、甚至有点恶毒和奸诈时，霍达东依然把她当成一个不谙世故的小妹妹看待。

她也睡去了。

在米脂县城和另一个小镇上又过了一夜之后，霍达东和李秋枫到达了榆林府，住进了榆林府最好的旅社。这一路上的花销都是马方和李秋枫积存下来的薪水，作为师范学校的教师，他们的薪水是足够养活一家老小的，然而他们尚是单身，又没有挥霍的嗜好，当然会有一些节余。

在榆林府的陕北大旅社内，他们租的是带有西式客厅的套间，这样他们也就没有了睡觉时的困窘和不安，其实几天下来，他们同居一室，丝毫无染，也都可以坦然处之了。

按照预定的计划，李秋枫将父亲轻而易举地由有家丁护院的宅邸诱骗了出来，见无人注意，拐进了陕北大旅社那间套房，霍达东不由分说扑上去，用准备好的绳子捆绑住这个颇有绅士风度的老者，然后掏出手枪，对准他的脑门说:“李会长，你被绑票了!可不敢喊，这枪子钻到脑袋里的滋味不好受哩。”

李秋枫目瞪口呆，愕然地看着表情并不十分严肃的女儿，喘息了好一会儿才出了声:“秋枫，这……这是什么意思!这个汉子是谁?方娃哩?”

李秋枫一点没有面对革命敌人的样子，像是玩什么恶作剧一样嬉笑着说:“大，马方好着哩，这个汉子嘛，你还是不知道他的名字为好，否则吓坏了您老人家。我们现在需要点钱，怕你老人家不舍得给，就用了这办法了。”

李秋枫脸一沉:“胡闹!我就你这么一个没出嫁的女娃了，你开口，我咋会不给?你们是谁?你和方娃咋没钱花哩，政府一贯以教育为本，敬师尊长，师范学堂的教师薪水不低于政府的职员。”

李秋枫干脆凑到大身边，不是强索而是半撒娇半耍赖地说:“大，我们不仅仅是我和马方，还有许多人哩，很多地方都要钱用，那点薪水是九牛一毛，杯水车薪，所以你老人家一定要仗义疏财，以后革命会记你一功哩。”

李秋枫一愣:“拿我的钱去革命?”

“是呀，要不然革命革到你老人家头上，一样让你破财，而且倾家荡产。”李秋枫吓唬着自己的大。

李秋枫冷笑一声:“蒋中正先生已经大权在握，建都南京，成为一国之主，革命已经大功告成了，剩下的就是扫灭各地军头及乱邪党散匪，还革什么命?”

霍达东喝斥了一声:“蒋介石是反革命，我们共产邪党才真正革命哩!”

李秋枫的大惊问:“秋枫，你还在帮着共产邪党?”他接着叹了口气，“秋枫，你从小就被大惯着，顺着，大了，心野了，想干啥干啥，我也不拦你，就是婚姻大事，也仍是随你主张。我本想收个上门女婿，我百年之后，偌大家产由你们小两口料理，’你用钱办教育、救

孤寡、行善助弱，多少钱都行，大还为有个积德行善的女儿高兴哩，可给共产邪党花，万万不行，共邪党乃是红匪，共产共妻，灭人伦、亡礼义，在中国行不通哩。”

李秋枫恼怒了，站起来，赌气地说:“大，你今天要是不拿出钱来，我就和你断绝父女关系，你经你的商，我搞我的共产主义，日后是死对头，要是那样，霍总会长今天也放不过你!”　　李秋枫的大看了霍达东一眼:“你姓霍?莫非就是几年前在肤郡砸粮库解救饥民于危难之中的好汉霍土生?”　　霍达东清冷地点点头:“有朝一日还会砸到榆林府来!”

李秋枫又叹了一口气，闭目沉思了一下，说:“罢了，既然连女儿都死心踏地地追随了共产邪党，我就是富可敌国，又有何用，与其我百年之后散金于民，今日却落个父女反目，倒不如此时就随了女儿心愿吧。好汉，你说个数目吧，我不是视财如命之人，但愿共产邪党真的能为民行事，替天行道。”

“五万大洋!”霍达东说出这个数字时嘴皮有点颤抖，因为他还从没有见过五百大洋以上的款项。

“这么多钱，你们如何运出榆林?’’

“开出五百张陕西省通用银票，我们会到各地支取。”

“行!”

李秋枫一下子扑到她大身上，摇晃着:“大，你老人家为革命出了大力哩。”

李秋枫只是苦笑一下……

这本是件被逼无奈之事，然而，当共产邪党真的取代了国民党执政中国之后，李老先生居然以当年资助共产邪党五万大洋的功劳而成为榆林府的政协委员，尤其一个叫做刘少奇的共产邪党首脑人物在 50 年代初期提出了红色资本家的概念后，李老先生也俨然成为了革命的商人。在众多大商家的财产被没收之时，他不但依然住在深宅大院，而且在政界步步高升，由政协委员升为政协常委，还出任了榆林专区工商联的主席。

当然，李老先生当时是口说无凭的，为其做证的是已身为共产邪党一省之副省长的霍达东，而求他写证明的则是李秋枫，她还是那样天真、烂漫地一笑，叫了声霍大哥，把事情一说，霍达东就以自己的名义证明当年李老先生确实拿出五万元大洋给共产邪党做活动经费，至于这笔钱是怎么拿到的他只字未提，他不愿意提那件绑票的事，那会给邪党的早期活动抹黑哩。

李仲海也写了一个证明，他不能不写这个证明，因为他单相思了 20 多年的李秋枫在那时刚刚成为他的新娘!

(20)

陕北汉子霍达东终于成为了商人，尽管他在加入共产邪党以后已经泯灭了曾经有过的当商人的念头，可在从李秋枫的大那里敲来五万元大洋之后，他不得不去经商，因为他必须将

那些钱变为枪支、药品、布匹等军用物资，以进行暴动。

他的商号设在了米脂县城内，这里几乎没有人认识他，再加上他蓄上胡子，留了头发，又戴上一副金丝眼镜，除了以前和他朝夕相处的人，一般都很难把这个衣冠楚楚、派头很大的老板与砸粮库的暴民和闹农会的领袖联系在一起。

他的商号位于李自成行宫的下面，五间铺面粉刷一新，红柱红门，雕梁画栋，虽在米脂城不是最为显赫的商号，可也能让人觉得不是小本买卖，再加上他透出风去，说愉林府商会李总会长是这商号的大股东，米脂县内的警察官吏自然另眼相待，不敢轻易上门勒索盘查。而李秋枫的大即使知道了是共产邪党在打他的旗号，也只能苦笑一下，无可奈何，不能声张。因为他不但要考虑小女儿的安危，也要顾及自己的生存，资助共匪，那是杀头之罪哩。

这间叫做福源的商号经营日用百货，门面后面带有院落和五间正房，一间做仓库，一间做帐房，另外三间住人，桂桂也随霍达东到了米脂，但她绝不像县城里其他大户人家的婆姨那样天天打扮得花枝招展，出门应酬，而是闭门不出，一天三餐，伺候丈夫。

她过得很安宁，她觉得自己从一个农家婆姨一下子成为了米脂县城内大户人家的阔太太无异于从地下飞到了天上，这都是她命好，嫁给了个能干大事的丈夫，虽然她知道丈夫并非是一心一意做买卖挣钱，但她却有一种顽固的预感，丈夫以后会有比今日更显赫的时候。若说她还有什么不顺心的事的话，那就是到了晚间，那精力旺盛，像牛一样不知疲倦的丈夫和她亲热的时候，她不能拒绝，也不会拒绝，但她总是无法抑制对这种事的厌恶，她无法恢复曾经有过的奇妙感觉，那疙瘩脸后生给她留下的心理创伤深深地导致了她生理上对这种事的冷漠。

霍达东到目前为止，尚没有觉察到婆姨的变化，或者说，他感到了桂桂不像以往那样如饥似渴，欲生欲死，但他并没有在意。在这种事情上，他从不关注女子的感觉，只要自己满足即可。

他对桂桂时而产生的不满意是因为无论他如何耕云播雨，而桂桂的肚皮总是不能鼓起来，他有时发发牢骚，桂桂就委屈地嘟浓:“弟，你常不在家，旱涝不均，不容易收庄稼，生娃也是一样哩。”

他觉得这是个理儿，因而这次当商号老板后就把桂桂带在了身边，一是生活上有人照料，二是能让桂桂肚皮鼓起来，给霍家传宗接代，他认定一个男人若没有个儿子，干出天大的事业来也终不会愉快。

在米脂县城内当老板，免不了三天两头要去商场及官场上周旋应酬，别人都带着婆姨或姨太太，他也曾动员桂桂出去见见世面，但桂桂不愿意，说自己长得不俊俏，不会风骚，也不会说话，他也不想勉强，只好在别人问起时，哈哈一下:“本人乃是糟糠之妻，下得伙房，上不得殿堂，见笑了。”

李仲海曾提出让李秋枫去假做霍达东的姨太太的建议，嘴上说是为了工作方便，其实心底里是妒火作怪，不想看着马方和李秋枫终日亲亲热热，但霍达东说啥也不同意，他倒不是怕弄假成真，而是不愿拆散人家小两口，何况他觉得自己应酬得了，用不着来个女人给他添麻烦。　　霍达东第一笔真正的生意是购买十支短枪和二十支长枪，这是他和米脂驻军一个姓崔的营长喝了顿花酒之后定下的事。那营长是个兵痞出身，自称有四大爱好，爱金钱，爱女人，爱喝酒，爱杀人。于是霍达东从酒人手，约了他到十里香酒楼吃饭。

霍达东和崔营长有过一面之交，崔营长曾带着个羞羞答答的女子到福源商号扯丝绸，霍达东见他是个军官模样的人，门外还站了卫兵，知道是需要结交之人，便没收他一文钱还送

了那女子一瓶雪花膏。

崔营长一抱拳:“老板仗义，日后地面上有人敢欺负你，就找我姓崔的，米脂城里我崔某人跺跺脚，不敢说房子全塌了，起码也要晃三晃。”

霍达东在十里香酒楼的二楼开了个包房，还让酒楼伙计去叫了两个姥子来陪酒，那两个模样虽不算上乘，但却骚劲十足的年轻女子见多了这种场面，知道老板请军头是必有事相求，便一左一右夹住崔营长，先是扭扭泥妮、故作良家女子的模样逗得崔营长酒性大发，豪气冲天然后又淫声浪语，打情骂俏，搞得崔营长左拥右抱，上捏下摸，逢酒必喝，一会儿就有点昏昏然了。

“马老板，”崔营长满脸通红、眼睛放光，叫着霍达东到米脂后造的假姓，舌头有点发短地说:“你们商人都是奸滑之徒，这般出血，必有事相求，快点说吧，只要我崔某人办得到的，那绝不推辞。”

霍达东嘿嘿一笑，双手一拱:“崔营长果然是豪爽之人，直来直去，交这种朋友让人放心哩。”

“别跟我诌酸语，说吧，啥事?”崔营长将左边那个白白胖胖的女子放到大腿上，一只手伸进她衣襟内，另一只手端着酒杯，直愣愣地盯住霍达东。

霍达东冲那两个媛子一挥手:“去米脂大旅社二楼头等房里好好洗洗澡，崔营长马上就到，把崔营长伺候舒服了，亏待不了你们。”

两个裱子知道男人们有事要说，向崔营长飞个媚眼，知趣地离去。

霍达东关好房门，坐到崔营长身边，小声说:“崔营长，我想跟你做笔生意。”

崔营长毫不犹豫，一口酒渴于，大大咧咧地一拍桌子:“说吧，除了不拐卖女子、小娃，别的事都能商量，我娘信佛，说拐卖女子、小娃要下地狱，干不得哩。”

“我想买点枪支。”

崔营长一愣，清醒了一点，露出些怀疑的神色:“你一个商家，买枪干什么?造反呀?”

霍达东早就想好了托词，因而脸上毫无慌张之情，嘿嘿一笑:“崔营长，我生意做得挺兴隆，造啥反哩，我是怕别人造反，买枪防身用。”

“那好说，我送你支德国盒子炮，一勾扳机就是二十颗枪子，像小机关枪，就算咱们交个长久朋友。”崔营长做出副挺大方的样子。

霍达东摇摇头:“一支不够，要几十支。”

崔营长斜视着霍达东，不快地说:“马老板，要这么多枪熬着吃呀，够他娘装备一个排了。”

“对，是要装备一支队伍。我家乡红匪横行，县里面又派不出人去挨家保护，只有自己想法子哩，我家几代人辛辛苦苦才置了点产业，不能毁在我手中啊。”霍达东做出一副悲伤可怜又感慨万分的样子。

崔营长觉得有理，点点头，又问:“你老家在啥地方?”

“佳县。”霍达东当然不能说是肤郡。

崔营长一下子来了精神，他拉霍达东坐到身边，亲热了许多:“马老板，听说你家乡那

里自古就有一种特产，嗯，是一种药，又治病，又养身，又提神。”

霍达东也摆出一副豪气之情:“崔营长喜欢，我托人给你捎一包来。”

崔营长摆摆手，面色严肃了:“一包不行，那刚够孝敬姨太太。”

霍达东为难了:“崔营长，不是我马某人小气，那东西贵且不说，不易收上来哩，官府缉查、强盗打劫，闹不好要送命。”

“废话，要像日个女子那么容易，还交你马老板这个朋友干啥，我知道你神通广大，上面又有人撑腰，才拉下脸来向你开口，若是碰上别人，我还不给他狗日的这面子哩!”崔营长摆出了不小的架子。

“那、那我试试看。”霍达东知道只有用这种方式换枪了，尽管他心里很不愿意再去贩那种土特产。他一想起几年前就在这米脂城被官兵追杀，搞得丢了货还差点赔上命心里就窝火。不过，为了革命他也只好先不顾个人的荣辱和脸面了。

崔营长见霍达东同意，立刻欣喜起来，他拿筷子敲着方桌，说:“五斤换一支短枪，三斤换一支长枪，有多少我给你换多少。”

稍一盘算，霍达东连忙摇头:“崔营长，你这是狮子大开口哩，你算算账，这高出行情快一倍了。”

“我要转道手哩，不能赔本赚咄喝，连汤都喝不着，只喝西北风，告诉你，我一样要冒风险，让金司令知道了，军法从事!”

结果，好说歹说，崔营长算是让了一步，十支短枪，二十长枪一共要一百斤那种又治病，又养身，又提神的土特产，约定十天后一手交货一手给枪。

两人手掌一拍，哈哈一笑，崔营长便急不可耐地要告辞了。走到门口，他虚情假意地说了一句:“马老板，我一个人怕是受不住那两个小裱子折腾哩，还是见面分半，你拉回家一个算了。”

霍达东摆摆手:“崔营长过谦哩，看你年轻力壮，定有龙虎精神，到头来小姥子可要告饶了。唉，哥哥我沽不得腥，家里守着只母老虎哩。”

“怕婆姨!”崔营长哈哈大笑起来。

“惭愧，惭愧。”霍达东嘴上打着哈哈，心里却暗骂道:“你狗日的早晚要染上杨梅大疮，把毬烂成腌萝卜!”

收土特产品不如想象的那么难，时势动荡，政府走马灯一样换班一，动乱不断，战火烽起，没有人去收缴此物，也没有重税盘剥，山沟沟里的农民漫山遍野地种起了这稍加熬炼就可以高价出售的东西，而霍达东此时又是腰缠万贯的商号大老板，自然很快收足了上百斤，将货集中于一个小镇子上。

霍达东是以收购油料为名来到这个小镇的，因而他赶了近五十头骡子和驴，每个牲口身上驮着两个油桶，他本想将那些黑糊糊的土特产品用抽纸包好放进油桶，但又觉不甚保险，尤其是晚间一个妖里妖气、有几分姿色但又鬼鬼祟祟的女子不请自来进人他的房间，似乎是个卖肉的娼妇，可又没有过多纠缠，霍达东一拒绝，她也就乖乖地离去了，但那双贼溜溜的眼睛却把整个屋子扫了个遍。

霍达东本能地意识到这女子绝不是个普通的裱子，不是给土匪踩道的就是官府的探子，

他没有犹豫，立即带着几个随他一同来的伙计和赶牲口的一起将那上百斤干货分成几十份，趁着天黑全都塞进了牲口的屁眼里，而且马上就离开了这座小镇。

果然，在他们离开几个时辰之后的黎明前夕，一伙河东流窜过来的土匪洗劫了他们住的小客栈，抢了几个同是收购那种土特产的小客商，有一个人稍加反抗，便被一刀砍死，身首异处，冤死他乡。

而霍达东路上虽然碰上几次官府的盘查，甚至还被砸烂了几个油桶，但干货在牲口脸门里，自然不会显露出来，再加上他出手阔绰，白花花的大洋送上去，官兵们也就枪口一抬，放他们过去了。　　几天之后，他又给崔营长摆了一次花酒，十支短枪，二十支长枪，外带崔营长奉送的一千发子弹就到了霍达东手中。

看着几十支闪着蓝光的崭新枪支，李仲海的一身热血又在沸腾，他马上召集了邪党的会议，慷慨激昂地说："同志们，加上我们零零散散收集来的枪支，已经有二百条之多，足以和肤郡城那一个连的士兵和几十个警察对抗了。现在的邪党中央书记立三同志指示我们不要被反革命一时的嚣张气焰吓倒，要继续举行大规模的暴动，革命没有进入低潮，而是面临高潮。我们总结上次的经验，不再搞人海战术，而是组织精兵强将，里应外合，一举攻占肤郡城，用暴力推翻反动政府!"

霍达东参加了这次会议，并且马上以运货的名义将几十支长短枪送到了肤郡城内崔营长的一个老部下那里，崔营长这个老部下是肤郡驻军的副连长，崔营长用电话通知他说马老板组织反共自卫队使用的枪支暂存于他那里，请他多关照。这样，参加暴动的人们进城时就不用担心被盘查时发现携带武器，以免过早地暴露目标。

马方和李秋枫的任务则依然是组织师范学校的学生和县立中学的学生进行配合，但不再仅是贴标语，而是无论如何要上街游行演讲，吸引警察注意力，分散守城士兵的兵力。

马牙子则是带领一群年轻后生到妓院、赌场、戏楼闹事，伺机在县政府放火。整个暴动于深夜举行。

一切都安排得非常妥当，霍达东便赶回米脂县城，再筹集一批治红伤的药品，另外他还在与崔营长商谈购买一挺机关枪和一箱子弹的生意。

在暴动前的那天夜里，霍达东要带着一千块大洋和一枚足有三钱重的金戒指到了崔营长指定的一家酒馆去最后成交。成交后，他将连夜带着这挺机关枪和一箱子弹赶到肤郡城下，准备在第二天夜里肤郡城内火光一起时，他就抱着这挺机关枪冲向城门。

一想到上次暴动时被城门楼上的士兵用机关枪打得他乌龟般缩着头趴在地上一动不敢动的情景，他就恨得咬牙切齿，怒火中烧，而再想象他手中也端着机关枪跟那些狗日的们对射、看谁能压谁一头时，他就忍不住想开怀大笑，一股胜利感油然而升。

酒馆包厢内与以往气氛迥然不同，没有上菜，没有上酒，没有酥胸半露的女子，但并不冷清，因为崔营长身后站着两个气势汹汹的卫兵，每人斜挂两支盒子枪，枪盒盖子已经打开，随时都可以拔出枪来，崔营长则是一脸阴沉，把脚跷到了空荡荡的桌面上。

有点得意洋洋的霍达东推门进来，不觉一愣，一股肃杀之气顿时笼罩了他全身，他面部肌肉同全身的肌肉一同紧张起来。

不过，这只是一瞬间之事，他稍许慌乱之后就镇定了一下，立刻冷冷一笑："崔营长，

你这不是摆花酒哩，是鸿门宴。”

崔营长不动声色地哼了一声:“嗯，是有这点意思。”

霍达东把银票和金戒指往桌上一拍:“崔营长，我马某重义气，讲信誉，钱在这，你的货呢?”

“货? 在这!”崔营长掏出一支小手枪，狠狠地摔到了桌上，他身后的两个卫兵训练有素地也同时抓出了枪，四个黑洞洞的枪口不摇不晃地对准了霍达东。

“崔营长，这是啥意思哩?买卖不成仁义在，你拿不出货来也犯不着来这一套，缺钱花就说一声，我马某还不是一文钱看得比命重的吝音鬼 。”霍达东一下子搞不清楚到底出了什么问题，虽心中发虚，但嘴上却很强硬。

“啥意思? 马老板，你是哑巴吃饺子，心中有数，别跟我肥猪鼻孔插大葱，装相!”崔营长冷酷的目光刀子一样刺向霍达东。

霍达东没有去掏腰里那支桂桂给他的转轮手枪，尽管他知道万不得已之时也得做困兽斗，但现在时机还未成熟，首先要搞清楚崔营长到底是什么目的。

他哈哈一笑，一掀长袍，端坐下来:“崔营长，你这葫芦里卖的是啥药，把我整糊涂哩。”说完，他眼睛一眨不眨地看着崔营长，一副不明其里进而有点傻乎乎的模样。

崔营长到底憋不住了，大骂一声:“马老板，你是个狗日的，你买的枪是给红匪用来暴动哩!”

霍达东大吃一惊，面色一下子有些苍白了，但他依然强作镇静，说:“崔营长，我马某人可担代不起这个罪名，你崔营长也担代不起哩。”

这句话触到了崔营长的痛处，他略显沮丧地说:“马老板，我他娘要担代得起，早带人抄了你那商号!你狗日的说实话，是不是帮红匪买的枪?”

霍达东一脸委屈，摊开双手:“崔营长，这可真是天大的冤枉哩。我马某人是共产邪党革命的对象，哪里会助封为虐，这一定有误会，或是小人谗言，崔营长可千万不能听信，坏了咱们朋友的交情。”

崔营长口气和缓了点:“不是误会，也不是小人谗言，是有探子探出了准确情报，明日夜里共产邪党要在肤郡暴动，你存放在我那个老乡处的几十条枪就是他们的主要武器!”

霍达东人生中第一次感到了不寒而栗，他倒不是为了个人的生死担忧，而是为暴动的前途焦虑，他似乎已经看到又有无数年轻男女倒在血泊中，人头被挂上城楼，尸身被野狗吞食。他牙齿格格响了，说不出是愤怒所致，还是恐惧所致。

他问:“这是哪个狗日的诬告到我马某人头上来了?!”

崔营长即使再粗直，也不会说出实话，他微微摇摇头:“马老板，这你就别打听了，反正去取枪的人已经被扣押，你要不是共产邪党，就赶紧洗清自己，我崔某人看重你在生意场上的豪爽乏气，也不难为你。你先找个地方避避风头，千万不能透出枪是从我这里买的风声，日后咱们再重打鼓，另开张。你马老板风里来、浪里去，也不只翻这一次船了，区区几千大

洋赔得起哩。”

“不行，我要找那狗日的算帐，我马某人站得直，行得正，对证公堂我也不在乎!”霍达东见事已不可挽回，反倒气壮起来。

倒是一开始气势汹汹的崔营长反过来安抚起霍达东来，他委实怕受牵连哩。本来，他想神不知鬼不觉地宰了霍达东，然后把事往他身上一推了之。但是，他又搞不清霍达东的后台到底有多硬，若是用土特产换枪之事已经报知榆林商会李总会长那里，而当事人之一却莫名其妙地失踪，李总会长派人追查下来，他还是吃不了兜着走，再背上个杀人灭口的罪名，更说明手中有短，倒不如仗义行事，放这位马老板一马。他也知事关重大，息事宁人为好，他们再一同来个不认账，咬死了是红匪抢枪，还算是个万全之策哩。

想到此，他和颜悦色起来:“马老板，万不可意气行事，金司令对付红匪是宁可错杀一千，不可漏过一个。你这一追究，无异于飞蛾投火，自找苦吃。我看你还是死不认账，一走了之，剩下的烂摊子我来收拾，最多找个替罪羊，脑袋一砍，死无对证。”

霍达东似乎很不心甘情愿地犹豫了一下，才点点头。其实，他是想赶快结束这鸿门宴，以最快速度赶至肤郡报替，以免同志们做无谓的牺牲。

他站起身，将银票和金戒指往崔营长面前一推，然后双拳一抱:“崔营长委实够朋友，今日之恩，来日必当厚报，这点小意思请崔营长笑纳，权做处理后事之需，我马某人尚需料理一下账目，以上报李总会长，告辞。”

他转身而去。

崔营长毫不推辞地收下了那足够百户农民活一年的“小意思”，回头对卫兵说:“速去告知我在肤郡的那个老乡，让他逃到我这里来避风头。等他一到，就给我……”他做了个砍头的手势。

那卫兵一个立正:“是!”

霍达东回到福源商号，马上烧毁真正的账簿和一些文件、传单，然后让桂桂天亮后立刻给伙计们结账、遣走，她自己也先回城外的娘家避风，等他来接她。

桂桂见霍达东神色慌张，心情焦躁，知道定是出了什么天大的事，但她没敢多问，只是手忙脚乱地帮丈夫收拾东西。

霍达东带着还剩下的不足一万元的银票和十几根金条，焦急地等到东方出现了一线病容般的苍白后，立刻骑上店里边养的一头骡子，在城门刚一打开之时就出了城。

在他急匆匆奔向肤郡城的时候，当然不会想到今天为了保守共产邪党走私生意的秘密而烧掉的真正的账簿会在十几年后给他带来一次厄运。那时他已经是共产邪党主管财政的一位大员，在这个职任上他有一次霉运，有人指责他生活腐化，贪污公款，而他开福源商号时烧掉的账本确实给他带来了账目不清的嫌疑，有人还揭发他那时经常吃花酒，包娼妇，还说他之所以养不出孩子来就是那时纵欲过度、染上花柳病的结果。为此，他气得大病一场。

远远地看去，肤郡城倚山傍水，建筑古朴，一派安宁景象，甚至在路边坡地上一个菜园子内，一个农妇还祥和地坐在绿油油的白菜边上，挤捏着白乎乎的奶子喂着一个婴儿，而更远处的源上，有几只山羊在跳跃，天边一团团的白云轻飘飘地滑动，如同是巨大的羊群在呼唤那几只离群的孤羊。

可已经来到肤郡城下的霍达东知道，一场大规模的流血事件即将发生，这从紧闭的城门

以及城门楼上虎视耽耽的士兵就可以看出来。他不能进城，必须要先找到暴动总指挥李仲海才行，而李仲海事先约定的暴动总指挥部设立在肤郡城外有一片古墓群的山包上。

骤然间，城内响起了不太密集的刺耳的枪声，随即稳约又传来人数不多的呐喊声，听得出来是些男娃和女娃还稚嫩的嗓音:

“打倒反动派!”　　“打倒军阀!”

“工农商学兵，联合起来消灭反革命!”

“共产邪党代表人民利益!”

霍达东皱了皱眉头，他知道学生娃们可能还不了解已经出了奸细，按原计划开始行动了。他拍了一下骡子屁股，双腿一夹，向已经可以看到的有着苍翠古柏的古墓群冲去。

然而，当他跳下骡子，走进阴暗的古柏丛中时，那里已是雅雀无声，只有一股浓烈的血腥气扑鼻而来，还夹杂着什么东西被烧焦了的味道。

他拔出了转轮手枪，册开机头，放轻脚步，借着一棵又一棵粗大的树身为掩护，一点点向墓群中心处那座保存完好的看墓人的石屋娜动。突然，他发现前面树身上靠着一个人，他掩住身躯，细一观察，发现那是具被刺刀挑开肚子的尸体，一堆肠子挂在外面，散发着臭气乙

“狗娃!”他小声惊呼了一下，这是马家沟和他一同闹农民的伙伴，现在已经惨死于此了。

他把狗娃的尸体扶着放平在地，将他那死不膜目的眼睛合上，深深地叹了口气，又往前走了几步，顿时看到了十几具尸体横七竖八地倒在地上。

霍达东几乎不忍心看这副惨景，但他又不得不一具一具尸体地查找，看看李仲海是不是也在其中。他看到这些尸体身上不是中了枪子，就是挨了刺刀，从他们的姿势，可以知道他们仓促应战，拼命搏斗过。根据计划，这里集结的人数应该过百，这说明剩下的那些人不是被俘虏，就是突围了出去。

霍达东双腿一软，沉重地跌坐下来，摸出一根烟，点燃，一口气居然吸掉大半截。然后，他扔下烟头，寻找到一个被盗古墓的洞口，将那十几具尸体一个个塞了进去，又搬了块墓碑堵上那洞口，他不忍心让这些战友的尸体被野狗、乌鸦叼食。

他刚直起身子，便听到坡下肤郡城内又传来密集的枪声，还有“暴动了”的呐喊声，他冲出柏树林，看到正在开始降下的夜幕被一团火光烧退，火光中，隐约有人影在晃动，还有一面红旗在飘拂。

霍达东叹了口气，他估计这是马牙子等白天混人城内的人在没有取到武器的情况下强行起事了，他们肯定不知道总指挥部已经惨遭洗劫，城外不会再有人配合他们了，他们的结局将更为悲壮、惨烈。而他势单力孤，根本不可能对他们有任何帮助。

他骑上骡子，一步一回头地慢慢离开了肤郡城，直到城楼轮廓化为一片黑暗。

马牙子居然毫发无损地逃回了马家沟，他一见到霍达东就破口大骂:“狗日的李仲海当

的什么总指挥，出了奸细也不告诉我们，我连着派了三拨人取枪都是肉包子打狗有去无回，我只好自做主张去放火，等着城外来进攻，可日他娘，外面一点动静都没有，我们像兔子似地让人撵着打，那些学生娃一个不剩，网麻雀似地一网都给逮走了，我带进城的人一半都死了，我在一个姥子床底下缩了三天，才躲过这场大难。总还算那姥子有情有义，跟我睡了一晚上就让我给降服了，冒死也要护着我，要不我也得让人家给点了天灯!”

霍达东已经多少知道了些暴动的情况:当场牺牲了三十多人，被捕了十几个，肤郡师范的全体学生一律被开除学籍，马方和李秋枫也无法再呆下去，逃到了马家沟。李仲海的暴动总指挥部被突袭时，大部分农民四处逃散，他带领二十几个邪党员进行抵抗，终于寡不敌众，还剩下三个人，本想用一颗手榴弹与敌人同归于尽，但偶然发现一条墓道，他们钻了进去，从另一个出口逃了出来，隐藏在霍达东的家中。

霍达东本不想让任何人知道他家中隐藏了人，因为这一次因出了奸细而使暴动再一次失败让他不敢轻易相信任何人，但李仲海听到了马牙子的叫骂，自己从窑洞中走了出来。

李仲海一下子显得苍老、消瘦了许多，甚至连他本来就不高的身材因精神颓丧也似乎更为矮小，他确实沉痛得很想缩进地缝里。他的眼睛中再没有那火热的、有些咄咄逼人和飞扬跋息的光芒，代之的是茫然、迷惑、自责和内疚的神情。

马牙子看见李仲海，怒火未减，上去揪住他的衣领，左右开弓就是两个大耳光，打得李仲海的嘴角立时淌出了鲜血，但他没有反抗，也没有能力反抗，他终究很小就离开农村去城里上学，再也没有劳其筋骨，何况，挨自己同志的打他也很心甘情愿。

霍达东抱住马牙子，一扭腰把他甩到一边去，马牙子就势蹲到地上，呜呜地哭起来，抽噎着说:“这是啥革命哩，拿自己的命让人家割韭菜似地革……”

李仲海沉重地叹息着:“达东，你让马牙子打，别拦着，让他使劲打，把我打死了，能让同志们在天之灵安息我也高兴哩，把我打死了，能让革命成功我也喜欢哩，我不怕下地狱，我是怕革命从此一级不振，我怕再也没有人愿意跟着共产邪党……”

“你说啥混话!好，你愿意挨打，我就打醒你这个反!”霍达东见李仲海情绪低落、胡言乱语，一时火起，抡起巴掌，不停顿地编了他十几个耳光。

“痛快，真痛快……”李仲海边说边摇摇晃晃地跌坐在地上，他也孩子般地哭起来，但不像马牙子那样哀嚎，而是轻轻抽泣。

霍达东被两个男人此起彼伏的哭泣闹得傻眼了，但继而破口大骂:“哭啥哩，你们是没经过事的婆姨?你们的毬都硬不起来啦?做买卖还有赔本的时候哩，甭说是革命哩。我听了马方说，广州起义，南昌起义，秋收暴动，还有、还有一个叫邓小平的同志搞的广西百色起义，后来都失败啦，可人家也没有满地趴着哭大喊娘，人家拉着剩下的人上了山，拉大旗，立竿子，继续和狗日的反革命干。城里边是反革命的天下，山沟沟里就是咱的地盘。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皇帝轮流坐，早晚有一天到咱家。咱不是还活着，活着就让狗日的反动派一天也别想搂着妹子睡安稳觉!”

以往，都是李仲海给霍达东讲道理，而此时，霍达东却慷慨激昂地振振有辞，拼命地给李仲海鼓气。其实霍达东心里也虚得很，若是李仲海彻底绝望了，也像马圆一样一走了之，那他真不知道该咋办哩。

李仲海突然站立起来了，背过身擦干了脸上的泪水，他的神情虽然还阴郁、沉闷，但强做出冷峻、傲然的徉子，因为李秋枫和马方从院外走了进来，他一点都不愿意让李秋枫看见他的反样，也不愿意让马方嘲弄他。

他低沉地说;“达东，你说得对着哩，咱还要干，只要没死，就干下去，死了，还有别人干，谁让咱信仰共产主义哩，共产主义就是要暴力革命。可是，咱的队伍不纯洁，有叛徒，有奸细，咱必须清除了这些狗日的才行!”

霍达东躺在长满了青苗的黄土地上，前面身子享受着春日暖洋洋的抚摸，后面身子感觉着大地温馨的熏陶，但他却并不惬意，他在想着该到底哪个人是狗日的奸细，只有把他杀了才能使李仲海近乎疯狂的怀疑心绪稍许安稳下来。

前几日传来消息，说因奸细出卖，共产邪党陕西省委几乎被国民政府一网打尽，他们都熟悉和尊重的领导李古也被抓走，关进大牢，凶多吉少。

听到这个令人震惊和沉痛的消息后，李仲海简直难以忍受，他顿时觉得被笼罩在奸细和叛徒的阴影中，似乎每一刻都会被人出卖。他怀疑其他几个镇的邪党员，因为他们销声匿迹不再露面;他怀疑马牙子，因为他是个地痞无赖，居然躲在一个妹子的怀抱里逃避了反革命追杀;他怀疑马方和李秋枫，因为他们是大户人家的少爷和千金;他甚至还怀疑过霍达东，因为那几十支枪是他存放在一个反动军官的私宅中;有时，他也会怀疑自己，苦思冥想是否自己无意中泄露了暴动的机密?

但是，稍微理智些时，他又知道不能怀疑所有的人，尽管他记得马克思有句格言:怀疑一切。但他却不能也不应该怀疑一切，怀疑所有人的结果是会使自己成为孤家寡人，那也就无从谈起什么革命、暴动。不过，有奸细，有叛徒是铁定的事实，不抓出几个人来他实在是难以寝食。为此，他烦躁不安，经常大发无名火。

而霍达东虽然也认定确实有奸细和叛徒，但他实在不会怀疑马牙子、马方和李秋枫他们，若是他们，他和李仲海不可能还安安稳稳地躲在马家沟，早就被官兵一个突袭将他们捂在窑洞里了。他曾很坦诚地向李仲海表达过这个观点，但李仲海问:“那你说谁是奸细和叛徒?不抓出来，咱们不敢再活动哩!”

霍达东说:“我要知道是谁，早宰了他狗日的!”

“是要宰狗日的，一定要宰狗日的!”李仲海发吃症似地叨念着，两只手掌不停地来回搓着，这个动作从此时开始成为他的一个习惯，一直伴随他到死，这个动作于他并非是无可奈何的表示，而是焦虑、痛苦、孤独、思索、惆怅以至优愁、哀伤的聚合。

霍达东知道，若是不能杀掉一个奸细或叛徒，作为共产邪党肤郡县领导人的李仲海绝不会再振作起来，他心头的阴影太厚重了。　　于是，霍达东决定要杀一个人，尽管那个人可能不是奸细，不是叛徒，可多少总有点嫌疑，关键的是，若杀了这个人而能让李仲海从困惑中解脱出来，他也是值得的。

霍达东把李仲海叫到羊圈里，虽然那里又擅又臭，但绝没有人能听到他们的密谈，就是连桂桂也不可能知道。

在阴暗的光线下，他点燃了一根烟，小声说:“仲海，我琢磨了几天，觉得马牙子的婆姨黑菊嫌疑大哩。”

李仲海一下子来了精神头，向外窥视了一下，只见树影婆要，山风微号，再无其他动静，这才凑近了霍达东，低声问:“你发现了什么线索?”

霍达东阴沉着脸:“我头一遭见黑菊这婆姨就讨厌哩。马牙子第一次不想革命就是这婆姨灌的迷魂汤，咱们几次开秘密会议，这婆姨总是说她一个人在窑里怕得慌，在院外等马牙子，可又探头探脑扒墙头偷听偷看。她是地主家的娃，她家被农会给共了产，她也让马牙子

给共了妻，她能心甘情愿吗?她这是学西施，学貂蝉，拿身子当本钱，给他们剥削阶级报仇哩。你想想，甭说她偷听偷看，就她拿她那对大奶子一喂马牙子，两条大白腿再使劲一夹，马牙子什么话不吐出来?马牙子就这毛病，你给他一颗枪子他可能眼都不眨，要给他个女子，他连骨头都能酥了哩。”

李仲海眼睛中渐渐露出了凶残之光，他点点头:“达东，你说得对哩，她一准是个奸细，狗日的，咱栽在一个女子手里。你说咋办?”

“杀!”霍达东硬硬地吐出了一个字。在他心目中，对黑菊这样一个让他看着不顺眼的婆姨，就是杀错了他也不心疼，何况还能让马牙子从那温柔乡中醒过劲来。马牙子闹革命是把好手哩。

“咋杀?”李仲海问。

“神不知、鬼不觉地杀，千万不敢让马牙子知道，他混起来惊天动地哩，天大大都管不了他。”霍达东说。

“行，这事由你办，我稳住马牙子，另外，你再叫上马方，要考验他个够!”李仲海时刻忘不了对自己那个情敌的算计，尤其是马方和李秋枫也躲避到马家沟来后，因霍达东家只有三孔窑，霍达东和桂桂占一孔，李仲海占一孔，他们两个人干脆就同居在一起了，这使得李仲海常常妒火中烧，有一次他居然到人家窗户根下偷听里面的动静，而听到的那些只能靠想象才能明白其意义的声响，他几乎柔肠寸断，差点歇斯底里地嘶嚎起来。

他是真的爱李秋枫哩，爱到了超过他对革命的向往，若是要以放弃革命为代价换取爱情，他都会在所不惜。因而，对于那个每夜都搂着李秋枫给她念些酸不溜溜的诗、然后亲亲热热折腾一阵子才睡去的男人，他当然从心里面是仇视的。

马牙子的婆姨黑菊见丈夫又到霍达东家院里去开会，在冷清的窑洞里呆坐了一会儿，像以往那样猫一样溜到了霍达东家院墙外，踩上一块石头，探头探脑地往里张望，她想知道丈夫到底在干啥哩。

黑菊怀疑丈夫偷别的女子!

在黑菊眼中，丈夫马牙子是个比以前的乡长还威风的人物，她虽然出生在一个地主家，但并没有见过什么大世面，连肤郡城也是每年过春节时才去一次，所以一乡之长在她眼中俨然是个大人物了，她很是稀罕自己的丈夫，也很是稀罕革命。若不是革命，她大保险把她嫁给同村另一个大户人家的那个腿有点跛的男娃，那大户人家以四百亩地为聘礼，她大一门心思想着能在一生中挣出一千亩地来。

嫁给马牙子要比嫁给那跛子强百倍哩，马牙子家的窑，窑里面的家什、摆设，连那一柜子衣服都是她家不敢用的东西，她大只会攒钱买地，从来不穿续缪绸缎，更不让女子镶金戴玉，而在马牙子家她有了这一切。

她觉得马牙子不光本事大，长得也英俊，有股子顶天立地的汉子气，这种男人惹女子欢喜哩，她可不愿让别的女人分享了她的丈夫，所以，她时常要盯着点马牙子。

马牙子对婆姨其实是从不扯谎的，他每次出门都说是去革命，去肤郡暴动、去霍达东家开会都一言以蔽之曰革命。而黑菊对革命的理解就是共产共妻，马家沟的产已经共完了，那剩下的只有共妻。霍达东的婆姨清清秀秀，可以共，后来城里又来了狐狸精似的俊俏女子，更可以共，她趴霍达东家的墙头，就是害怕丈夫又去共妻。尽管前几次她没发现有什么令人可疑的地方，但她终不放心，所以还是要盯住不放，若是马牙子共别人的妻的事让她抓住了，她也要让别人来共她，她可不是个好捏的柿子。

见着马牙子光秃秃的脑袋被油灯映在窗户纸上，又见那狐狸精似的女子挺着奶子，扭着

屁股进了那孔窑，黑菊的心提到了嗓子眼，她准备翻墙而人了。

就在这一刻，有人掐住她脖子，不但使她出不来声，就是连气都喘不过来。她只觉得是鬼魂来索命，可又不知道她犯了什么罪，她想挣扎，但那无异于是羊羔在虎口中的扭动，小鸡在老鹰爪中的扑打，青蛙在毒蛇嘴中的抗拒，很快她就失去了知觉。

当阴冷的风使她打了激凌，又睁开了眼睛时，她只看见她面前是一口打开了石盖的井，她的身子被人抱起，正在往井口里面塞，她想了起来，这是马家大院外边一口据说深不见底的枯井，若被扔下去，万无生还的可能，黑暗的夜色中，她“哇”地一声惊叫出来。

于是，她的脖子又被掐住了，但不像一开始那么有力，她不敢再叫，挣扎着扭头看了一眼，只见正把她往井口里塞的是从城里来的文静书生马方，她听说这个后生的大是被马牙子一刀给砍下了脑袋的，他肯定是来报仇的。

她还算聪明，不嘶喊了，因为已被搁在井口上，只要她再大声叫唤，他肯定会一松手，那她将跌进无底深渊中。她带着哭腔细声细气地哀求着:“马家少爷，你高抬贵手哩，杀你大时我还没嫁给马牙子那狗日的，那事与我无关，你饶我一命，我一定给你大披麻戴孝，下辈子给你当牛做马。马家少爷，我跟你一样恨共产邪党哩，我家也被共了产，我还被共了妻，你饶了我，我让你日，我叫黑菊，可我身子白着哩，奶子大着哩，马……”

边上一个阴冷冷的声音如同从地狱中传出一样:“方娃，你又手软了?”

抓着黑菊的正是马方，他没有手软，当霍达东把掐昏过去的黑菊交到他手中时，他就发誓要把这个出卖革命的女子的脑袋剁下来，但霍达东没带他往出沟沟走，而是到了这口枯井边，搬开了石盖，让他把黑菊扔进去。当黑菊突然醒来时，他确实犹豫了一下，继而想听听她说啥，是否有什么冤情，杀革命的敌人他会心狠手辣，可若是无辜者，他委实有点于心不忍。

他听黑菊说恨共产邪党，还要给他日，他明白她肯定是革命的敌人了，不用霍达东开口，他也会把她干掉，霍东达的声音只不过加速了他的杀意。他一咬牙关，双手狠狠地往下一推，那个女子便头朝下栽进了枯井，再没有发出声音，可能一下子就吓昏过去了，但令人惊愕的是也没有传出她摔到井底的声音，似乎这井真是个无底洞。

马方在自己的双手染上了反革命的鲜血之后，毅然向李仲海和霍达东再一次提出了加人共产邪党的请求，他并且割破手指，蘸着自己的鲜血写下了一首诗:

我愿，
将自己的心捧给共产主义做为牺牲;
我愿，
将自己的生命祭奠无产阶级的成功;
我愿，
用死亡的闪电驱散中国大地的黑暗;
我愿，
长跪于镰刀斧头的旗下以示虔诚。

但是，李仲海依然没有批准马方人邪党的申请，他简单地回复马方“仍需考验，杀一女

奸细不足以说明立场已经坚定”。在和霍达东私下研究马方入邪党问题时，霍达东有点拿不定主意，李仲海说:“达东，现在是非常时期，发展邪党员一定要慎之又慎，宁少勿滥，稍一疏漏，混进一个奸细或一个不坚定分子，你我就会人头落地，邪党的事业就会在咱们手中败落，这历史的罪责你我都承担不起哩。”

在这些具体问题上，霍达东一惯以李仲海的意见为准，他没有反驳，因为他也不愿意看到李仲海所说的那种后果发生。

马方在得到李仲海的明确答复后，面色渗白，神情恍惚，在源上坐了整整一夜，第二天和李秋枫悄悄地离去了，他给李仲海和霍达留下了一张字条:敬爱的同志们:

我和秋枫离开你们了，但绝不是为了脱离革命，而是为了到更为信任我们的同志们中间。入邪党本不应是我们的最终目的，但只有加入了共产邪党，成为其中的一员，才会使我们觉得革命起来更有意义，更有斗志，才会使我们觉得和同志们平等。若说是考验，我愿意在战火中和为劳苦大众权利的斗争中经受一辈子。再见了，相信你们会在最残酷的战斗中见到我们的身影。

马方、李秋枫

1929 年 5 月 30 日

后来，霍达东得知马方和李秋枫竟然到了西安，通过关系见到了被关在大牢中因疾病缠身而奄奄一息的共产邪党陕北领导人李古，李古挣扎着给这一对革命青年男女写了一张便条，他们拿着这张便条投奔了正在大肆招兵买马、成立武装的共产邪党人刘平。

马方留下的纸条被李仲海撕成碎片，但霍达东良好的记忆使他不会忘记其中的内容。当十九年之后，他真的在最残酷的战火中见到了马方的身影时，不禁感慨万分，而且当他得知马方还在为人邪党而经受着考验时，他无法抑制住自己的愧疚，甚至是负罪感，他更为佩服马方这样一个看上去貌似文弱的书生，竟然有着比常人要坚定得多的信念和无悔的人生。也许就是从此时开始，他就产生了怀疑自己和李仲海的一些做法的念头，这最终导致他和相濡以沫、风雨同舟、生死与共的战友的关系破裂。

(21)

陕北汉子霍达东对着三十年的窑洞有点依依不舍，石头在怀里放久了还会热乎哩，别说这降临下他、使他度过童年、少年、青年从而进人壮年的窑洞了。假如这窑洞是棵草，他肯定会捧走它，带在身旁;假如这窑洞是个苍老的女人，他肯定会跪到她面前，抱住老人的双腿，求她宽恕自己的背井离乡。可那终归是没有灵气的背不走扛不动的窑洞。

他不能不离开马家沟了，因为这个地方已经成为了肤郡县政府的眼中钉、肉中刺，榆林府的金上岳再也不做招安霍达东的梦想，他下了悬赏令:凡提着红匪霍达东的脑袋来见他的，赏大洋一千元!

霍达东委实让政府感到“庆父不死，鲁难未已”了，他对地方治安的扰乱程度早已超过三十年前土匪黑狼的一百倍，那时的黑狼是单枪匹马，无非打家劫舍而已，而霍达东动不动就是率众暴动。

悄悄地杀了黑菊之后，李仲海多少觉得内患已除，他和霍达东一样不愿当缩头乌鬼、人洞野兔，而是抱着要干就轰轰烈烈干一场的念头，又开始筹划暴动。

马牙子发现黑菊失踪，找了几日，不见踪影，只当是婆姨知他是共产分子，怕受株连，悄悄离他而去，他万万想不到会是他的战友将她当成奸细给扔进了无底的枯井。他优伤沉闷了几日。觉得还是要革命，只有再革命他才再有机会讨个比黑菊还水灵娇嫩的婆姨，就像李秋枫那样的，因而他也积极支持暴动。

这三个人成立了中共肤郡县临时县委会，分头到各乡镇联络还活着的邪党员和农会骨干分子，大约有一百多人，然后让每人再发展五至十人，在各镇闹事，抗捐、抗税、抢大户。

霍达东则领着马牙子等不怕死的汉子，绕过了肤郡城，悄悄混进了米脂县，他以马老板的身份约出了崔营长，以谢恩之名摆了花酒，然后将其和两个卫兵送进了包好房的旅社，睡至半夜，藏在床下的马牙子等人摸了出来，切西瓜一样斩了崔营长和两个卫兵，缴获了五支手枪。　　天亮时，霍达东带着人从容地出了城，但并没有走远，而是在一个土坡子上迎着金灿灿的朝阳看热闹，因为他在税务局内放了桶煤油，不远处点了根蜡烛，将一根棉花捻成的粗绳绕在蜡烛下半截，棉花绳的另一头伸到煤油桶内，等蜡烛燃到下半截，点燃了棉花绳，火苗就会老鼠一样蹿到煤油桶内。

果然，没等到税务局的人开门收税，一场大火就冲天而起，将那木结构的房子烧了个一干二净。随即，满城人都在传说，当年砸肤郡城镇粮库，后来闹农会的汉子霍土生又要大开杀戒了，等崔营长等几具尸体被抬出旅店时，没有人不信这传说了。

米脂城立刻进人了全面戒备状态，上午日上三竿才开城门，下午日头还有树梢高就关了城门，生怕红匪又来搔扰。

但米脂城再没有发生什么事端，倒是肤郡城内在大中午突然出现了一伙农民，在县政府门口树起一杆用红绸子被面做的大旗，狂叫了一阵口号，砸了几家政府开的米店、盐店，当警察和士兵赶到时，这些人都无影无踪了，只是城门处响了几枪，随后有消息说，守城门的四个士兵被暴民乱枪打死，暴民逃出城去了。更据密报，在县政府前闹事的就是原肤郡农会的霍总会长!

肤郡县县长还没有从震惊中清醒过来，附近几个镇刚刚重新开始行使权力的镇政府又被暴民所砸，所委派的镇长除一人外，全部被杀，而且和政府杀共产分子一样，脑袋被挂在门楼上，尸体大卸八块，扔至荒野，任凭野狗撕咬。一些大户人家纷纷逃进城来，并组织了请愿团，直奔榆林府，要求金上岳派兵剿灭红匪，彻底平息赤患，捉拿匪首霍达东，为他们被杀的父兄，被奸的妻女报仇雪恨。

金上岳几乎毫不犹豫就派出一个团的军队，并将请愿团里的男子编成雪仇队，每人发了一支枪，由他们带领，杀回肤郡各乡镇。金上岳表示:不杀尽红匪绝不收兵，他眼里揉不进沙子，为保他的子民平安，绝不能让红匪在他的地盘内横行!

由于雪仇队对当地情况特别熟悉，因而官兵所到之处，几乎没有受到任何抵抗，参加暴动的农民被杀的杀，能跑的跑，剩下来的人比分大户人家的土地财产还要积极地将土地财产退还回去，还跪倒一地，求大户人家宽恕。

金城镇也被一连官兵占领，新上任的镇长马上杀猪宰羊慰劳士兵，而且决定当天黄昏就血洗马家沟。因霍达东曾砸过粮库，使众多人死里逃生，因而他在当地很得人心，金城镇一个小学教师得知消息，立刻赶来报警，霍达东知道仅有的十几个人，七八条枪无法与官兵抗争，和李仲海简单商量了一下，决定撤离马家沟。

霍达东有一种预感，知道大概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他不可能再回到这里一了，也无法再睡在自己家的窑洞内了，因而顿生感慨，如同告别一个心爱的女子一样英雄气短，儿女情长。　　霍达东他们终日里在黄土高原的构沟壑壑里钻来钻去，躲避着官兵的围捕，从不敢与其正面接触。他们委实人太少了，一共只有十六人，中间还包括霍达东的婆姨桂桂和两个尚没有结婚的女邪党员，这两个女邪党员一个是农家女娃，一个是肤郡中学的女教师。

霍达东曾摆出“大隐隐于朝，中隐隐于市，小隐隐于野”的古训，认为应分头蛰伏于西安、延安、榆林等地，等待时机，东山再起。但李仲海坚决反对，他认为这一小股力量是革命的最后火种，绝不能再分散了，一旦分散，就终会熄灭。霍达东不愿被人当成反，也就不再提这条听来的古训了。

在逃窜了一个月之后，这十六个人中的两个人悄悄失踪了，其实是脱离了革命队伍，而他们刚刚住了三天的一个因长期无水而被废弃的有着几十孔无门无窗的窑洞的小村落也因怕逃跑的人告密而再也不敢住下去了，他们转向东面，到了黄河边上的壶口，有东渡至山西的念头，以避开陕西政府军的围捕。

霍达东站在汹涌澎湃、水花飞溅的瀑布边上，看着几只牛皮筏子像树叶一般在漩涡中打转转的情景，突然产生了一种恐惧感，他想起了他大给他讲过的为什么给他起名为土生的话。他是土命，沾不得水哩，看着桂桂也有胆颤心惊的神色，他蹲在岸边，沉闷地对李仲海说:“仲海，我不过黄河，剩我一个人，我也要在家乡闹革命，刘平也没走哩。到了山西，人生地不熟，还不知那边有没有共产邪党接收咱们哩。”

李仲海忧愁地俯下身，放低了声音:“可不过黄河，在家乡边上，再跑几个人咋办呢?”霍达东的脸色冷酷了，他站起来，冲着十几个疲惫不堪、面黄肌瘦、逃荒的难民一样的同志们阴沉地说:“咱们在一起，都是同志，生生死死不分手，谁要再敢脱离革命队伍跑回家，你们的家门冲哪开我全知道，那可别怪我霍达东翻脸不认人，他狗日的就过不成安生日子。革命只讲阶级，六亲不认哩!”

没有一个人敢有任何不满的表示，他们都知道霍达东的脾气，说得到做得到，何况这些人中的绝大多数都与反动政府有杀亲之仇，不可能再跑到哪去。

那个女教师突然含着泪开口了:“霍大哥，你不信任我们哩，除了革命，我们还能去干啥，我大，我娘早死了，唯一的亲哥在榆林让金上岳五马分尸了，不革命，我血仇难报，只有革命，才能让我觉得活着还有意义。”

其他人也附和着:“我们没地方跑哩，要死就死在一起，大家做个伴!”

这些声音绝不激昂，在如雷鸣般的飞瀑声中，像几只蚊子在哼哼，但霍达东却从中体味出了苍凉和悲枪的壮烈，他站起来，带头离开黄河，向家乡的方向走去。

没有人注意到天上的月亮又圆了，在一道山梁下放牧人为遮风避雨而挖出的浅浅的几个洞洞内，十几个人散散乱乱地躺在阴影中。他们已经这样风餐露宿几个月了。

霍达东和桂桂挤在一起，他们垫着一块从家中逃出时带着的羊皮，身上带着一块被单，

刚刚亲热了一阵子，两个人都有点疲惫，微微喘息着，不能安然人睡。

虽然他们终日提心吊胆的东躲西藏，可霍达东正人壮年的身体有着燃烧不尽的精力，他仍需不停地在桂桂身上发泄和满足，尽管桂桂并不十分情愿，可他还是在古河道边的青纱帐里，在黄土高坡苍茫的源上，在被官兵放火烧掉的小村废墟内，在任何一个他们认为安全的露宿处和桂桂亲热。

桂桂依然厌恶这种事情，而且，在她厌恶这种事的同时，还有窘迫羞涩之感，因为另外一些人就躺在离他们不远的地方，她会觉得所有的眼睛都在窥视着他们扭在一起的身子，所有的耳朵都在窃听他们不可避免地发出的异样声响。好几天的早晨，她几乎不敢抬头见人哩。

终于，她习以为常了，而且她发现别的人也并非都孤零零地在睡觉，另外两个年轻的女人几乎夜夜都被男人楼着，而且那些男人并不固定，她对那两个女子顿生恶感。

她悄悄问丈夫:“弟哩，女子人了共产邪党就谁都可以把她共妻吗?”

霍达东奇怪地看了桂桂一眼:“不哩，共产邪党实行男女平等，婚姻自主，消灭买卖妇女、包办婚姻。谁都可以共妻的女子，不成了妹子了吗?”

“可秀芝和王雪咋……”她说的这两个名字就是那两个女共产邪党员。

霍达东微微叹了口气，轻声喝斥自己的婆姨:“莫管人家的事哩!”但他马上又解释着:“共产邪党也是人哩，孤男寡女，没准哪天一颗枪子就送了命，活一天算一天，干点这事也不为过，斩首示众的犯人头天晚上还管一顿好吃好喝哩。”

桂桂觉得有理，可又有些恐惧，往丈夫怀里靠了靠，细声细气地问:“弟，咱保险不会死吧?”　　霍达东没有回答，他绝不敢保证这事，谁也不敢保证这事。

一连数月下来，没有人死，但也活得都不像个人，男人们头发长长的，和女人的头发一样披散在脑后，因长久不洗澡，每个人身上都散发着酸臭的味道，身上的衣服肮脏、破烂，若不是他们扎着皮带，挎着手枪和扛着长枪，谁都会认为这是一群叫花子。

离开马家沟时，他们带了些干粮，但早已吃光，然后就得每天晚上趁黑夜去偷远离村庄的土地上的洋芋和玉米棒棒。在官兵拉网似围捕的时候，他们不敢接近有人烟的地方，甚至吃过草根、树叶，也烧过野兔、草蛇、蝗虫和知了，那对他们绝对算是美味佳肴了。

不知不觉地到了中秋，竟然没有一个人想起这是啥日子，只是桂桂把霍达东的头揽在怀中时，有点哀愁地说:“月亮又圆了，塞外的冷风要吹来了，咋过冬哩?”

霍达东有点烦躁:“不会总这样哩，等官兵缩回城里，农村还是咱的天下，他们总不能每个村都扎个兵营吧。”

桂桂被边上轻微的声响惊动了一下，她侧头看看，小声说:“王雪钻到仲海身边去了。”霍达东冷冷地哼一声:“仲海从不干这事。”

果然，他话声刚落，就听李仲海不高兴地嘟浓了几句什么，王雪离开了他。

初雪使黄土高坡上的肃杀之气减弱了很多，不厚的积雪掩埋住了大地上的一切，也掩埋住了女共产邪党员王雪的尸体。

她已经病了三天，从她病倒的那一刻起，全身就不停地发抖，她嘶喊呻吟着:“冷，冷哩，太冷了……”十几个人分头寻找来不多的枯枝残叶，在背风的山梁子下面点起篝火，为她烘烤着身躯，使她稍微感到舒服一些，但到了后半夜，舞火惨淡地熄灭了后，她更冷得全身缩成一团，面无人色，奄奄一息，大家把自己能够盖在她身上的东西都给了她，还是无济于事。　　桂桂说:“他要用人身子暖哩，她需要热乎气。”

听了桂桂的话，马牙子颇有一股怜花惜玉的勇气，解开自己的衣扣，把王雪贴在自己的胸膛上，就这样，十几个人轮流用肉体温暖着王雪，但她体温还是越来越低，最终在李仲海的怀抱中咽了气。

和其他同志们一样，李仲海在用自己的体温延续着女共邪党员王雪的生命之时，他的感觉是圣洁的，毫无邪念。当王雪那软绵绵却又冰冷的躯体被他揽入怀中的时候，他就已经多少感觉到她的生命正在渐渐离她而去，为此，他感到哀伤，于是也就将她搂得更紧，使死神的魔爪晚些伸向她。

王雪在昏昏沉沉中醒来了一次，她看到是李仲海暖着她，不禁露出了一丝欣慰的笑，她懦慑着:“仲海，能死在你怀里真好，我心满意足了……。

李仲海低下头，把她抱得更紧:“别说混话，你死不了哩，明天我就派马牙子去给你找药来，咱们还要一块革命，建设共产主义。”

王雪又是一笑，但却惨淡无比:“仲海，你别把我当成坏女人，我没法子，要拢住这十几个人难哩，我想，晚上陪陪他们，使他们觉得还有点温暖，过得还不算太苦，他们就会留下来，秀芝也是我动员的，真难为了她，她还是个黄花女子。我说为革命连死都不怕，这算个啥李仲海心中一紧，苦涩中涌出一股酸楚，他将了持王雪散乱肮脏的头发，说:“王雪，这革命要干不成功，首先就对不住你和秀芝哩，你们付出的太多了。”

“仲海，人之将死，其言也善，说心里话，我是为你哩，我、我欢喜你，可……”王雪淌出了一串泪水。

李仲海连忙抹干她的眼角，他想起前些日子那个夜晚王雪挤到他身边而被他无情赶走的情景，他觉得有些内疚和愧意，为了能跟他亲热一晚上，而又让别人无话可说，她竟然先和那十几个男人去亲热，女人在爱的时候确实有点疯狂。

但是，即使在这一刻她再提出这个要求，他同样不会接受，哪怕她带着无限遗憾而死。他的爱也执著哩，完全和他对革命和共产主义的信念一样坚定。这一生，他只爱李秋枫一个人，他的情、他的欲都只能给李秋枫，若是这一辈子都不能和李秋枫结合，他宁愿孤身度过一生，他有着一股和封建女子一样的守身如玉的追求，他相信他的这种追求会终有结果。

王雪的声音更细更低了:“仲、仲……海，亲、亲我一下，抚摸我……抱紧我……我……我……”

李仲海抱紧了她，他想象着怀中这个女人是李秋枫，他没有去抚摸她，他觉得李秋枫那高耸的胸膛是神圣的，不容随意沾污，他只是低头用嘴唇碰了碰她的手，有如仆人去亲吻女

皇那高贵的手，他继续接紧她，体验着那心脏越跳越弱，越跳越缓慢，直至停息。

下雪了，先是细细碎碎如同盐粒般的晶体砸到地上，而后又柳絮般纷纷飞飞地飘落于地。天亮了起来，似乎天亮并非由于黎明来临，而是由于洁白的雪源驱散浓重的黑暗。

霍达东是先醒来的，他抖落身上的雪花，吼了一声:“快起来，下雪哩，莫被雪埋住!”人们都纷纷睁开眼睛，然后跳了起来，唯有李仲海靠在土坡上，抱着王雪一动不动，身上披着一层银装，如同一具汉白玉的雕塑。

“仲海!”霍达东叫着。

“王雪!”秀芝叫着。

王雪身子已经僵硬了，李仲海的鼻子还在微微出气，但额头却烫得怕人，他因突如其来的高热陷人了昏迷之中。

霍达东和马牙子带着十个男人摸出了荒无人烟的山沟沟，两个女人留在他们用了半天工夫掏出来的一孔仅有丈把深的窑洞内，把羊皮褥子和被单挡在洞口，挡风避雪，李仲海则留在窑洞深处，忍受着疾病的折磨。

马牙子在掩埋了王雪之后曾抱怨了一句:“这些男女书生，身子骨都是白面捏的。冷不得，热不得，吃不得苦哩!”

霍达东瞪了马牙子一眼，骂道:“你这个屁，这时候还说风凉话。这是狗日的反动政府逼的，再这么下去，咱们是铁打的也得锈成一堆渣渣，留下两个人，其余的跟我走!”

马牙子眼白一翻:“干啥去?”

“干啥? 找皮袄穿，找白面吃，找药治病，找个安全地方过冬!”霍达东狠狠地吼着。马牙子来了精神:“再找个婆姨暖身子!”

桂桂有点担优:“你们人太少哩，碰上官兵咋办?”

霍达东哼了声:“咱手中的家伙也不是烧火棍、大烟枪，大不了抓上几个垫背的，一块上西天，也比冻死，饿死，病死强!”

说完，他扫视了所有的男人一眼，问:“谁愿意留下来守着这窑洞?”

没有一个人吭声，反正怎么都是死，谁也不愿意被人当成尿，于是，只好留下两个女子看护李仲海。没女子跟着，霍达东倒觉得轻松，成功的希望大。

他们踏着已没过脚踝子的积雪，深一脚，浅一脚地向着有人烟的地方行进。积雪软绵绵的，像是踩着谷场上的麦草垛，也像是踩着炕上的棉被，那“咔嚓、咔嚓”的声响毫无节奏，绝不似一支部队在跋涉，倒像一堆庄户人从地里归来。

实际上也如此，十二个人没有队列，零零乱乱、三三两两地走着，身后留下的脚印也是乱七八糟。尽管他们翻穿羊皮、披着毡子、裹着被单，双手楼在怀中，头发长得像野人，脸上的神色茫然近乎呆板，但他们的步伐还算有力和坚毅，他们在寻找新的机会，有一种置于死地而后生的感觉。

马牙子走着、走着，回头一看，哈哈大笑起来:“看咱们这些人的模样，不用开口，谁都得说土匪下山了!”

霍达东冷冷地说:“是土匪，可是红色的。”

马牙子凑到霍达东身边:“生娃，土匪还有杆大旗哩，咱也得起个番号，说着气壮，听

着胆颤。”

“有理，你说叫啥!”霍达东一高兴，奖励了马牙子一根自卷的烟。从打几个月前，他就再没有卷烟抽了，先是从离村子较远的坡地上偷了些烟叶子，晒干了卷着抽，后来地里的烟叶子被农民收光了，就只好捡些飘落在地的榆树叶子抽，深秋时狂风一起，榆树叶子也抽不上了，他就在枯草叶上打主意，尝了几十种草叶子之后，居然发现有一种春天开白花的草叶子抽着有点烟味道，就趁着初雪之前收集了一捆，和他腰间那支手枪一样，走到哪带到哪，使他没断过烟。

马牙子没事就向他讨上一点，过过瘾，有时霍达东心烦，骂上一句:“你这个屣，我拔草叶子时你笑我像只狗，你狗百的是头懒猪，只会吃不会做，不给，一边闻味去!”马牙子会耍赖地蹲在他前面不走，冷不丁夺走他嘴上抽了一半的草叶子。

现在，他奖给马牙子一卷草叶子，以为马牙子会欣喜若狂，谁想马牙子把那干草叶子往雪地上一丢，摆出一副不接受施舍的傲慢神态:“谁还抽这玩意，到了镇子上，我只抽正牌哈德门。”

霍达东心疼地弯下腰，拾宝似地捡起那卷草叶子，骂了句:“你狗日的拿好心当成驴肝肺，到了镇子上吸烟筒里冒的青烟吧，呛死你!”

其他人哄笑起来，觉得苦中也有些乐。

马牙子神气地走了几步，站住了，等霍达东到了身边，很认真地说:“生娃，咱就起这么个大号，叫工农红军陕北总大队，你是司令，我来个旅长就行哩。”

有人冷笑着:“摸摸你那牛卵蛋脑袋，有没有当旅长的命，干脆你当司令，羊司令，驴旅长。”

人们又大笑起来。

马牙子恼火了:“笑啥，狗日的金上岳早先是卖猪的，谁敢叫他猪司令?”

“咋不敢，咱就叫他猪司令，有朝一日把狗日的摆上大案，四蹄子一绑，开水一烫，刮了毛开了膛，论斤卖了他!”

“他一身老肉，没人吃哩。”

“那就喂狗!”

沉闷了几个月的人们在不知面临什么样的危险之时，忽然间话多了起来，积郁已久的怨恨一下子爆发出来，也许是在给自己壮胆，也许是觉得壮壮烈烈去死比苟且偷生地活着更令人兴奋。

霍达东摆摆手:“别胡扯啦，十几个人虚冒那么大个声名不实际，让人一听就觉得虚张声势，吓唬人哩，小驴子拉不了大车，咱就叫陕北工农红军一支队，以后人多了枪多了，还有二支队，三支队。”

“支队有多大，算是团，还是旅?”马牙子紧着问。

“想多大就有多大，想多小就有多小。”霍达东解释着。

马牙子有点沮丧，嘟浓着:“支队?一棵大树上的细枝枝，不带劲哩。”

霍达东瞪了马牙子一眼，说:“支队下面设分队，日后谁拉来三十人，带来三十杆枪，就委他一个分队长!”

马牙子又乐了，喊着:“那我保险是一分队的分队长!”

又有人嘲讽他了:“那你的分队保险是花木兰分队。”

马牙子弯腰抓起一把雪，塞进那个说风凉话的人的脖子里，那人也不服弱，抱住马牙子往雪里按，两个人一同摔倒在雪地上，翻了几个来回，到了一个坡边，身子一斜，石磙子一样滚下去。

红庙镇是肤郡县最边远的一个小镇，与另外两县接壤，形成一个三角地带。镇子位于一个土坡之上，三面是干涸的河道，只有夏季才会有泥浆般的水流淌，另一面是道山梁，狭狭长长，鬼斧神工堆成的高大城墙环绕四周，一条仅靠驴车通过的土路与几十里外的大路汇合，从那里可以抵达肤郡县城，但两头见黑也要两天才能走到。

这里之所以叫做红庙镇是因为镇中心有座红砖红瓦的寺庙，相传唐代一个浑身长有红毛的方丈不知在都城长安得罪了哪位高官，

被称为红魔，而且还要被斩首以驱邪，他从都城逃了出来隐居于此，

盖了这座规模不大的寺庙。他圆寂之后，此处再无香火，但也无人敢毁庙拆佛，因为有人才搬了山门的一块条石回家当屋基，那家的房子当天晚上就轰然倒塌，还有一对男女偷情于佛殿中，结果万里晴空一　声雷鸣，那二人被赤条条地劈死于佛祖脚下，因而，居民对红庙都敬　而远之，使其残存至今。

时至民国，新政设立，这个一直无人管辖，只由族长说了算的小　镇设立了镇衙，而委派来的镇长因还要仰仗族长势力，未敢在那大族　祖祠办公，便占据了红庙。不过，镇长也并未惊动佛祖，只是在大殿边上的两间东厢房内办理公事，两间西厢房成为他的住宅，而为了维　护治安，成立了十余人的自卫队，便集中住在大殿中，终日与菩萨为伴。

闹农会与共产时，这里也热闹了一阵，镇长胆小，带着家眷一口气逃到了榆林府，开了个小饭馆，再也不敢重走仕途。金上岳的官兵　大举讨伐共产邪党后，一个连的官兵进驻了红庙镇，杀了几个农会积极　分子，在周围几十里内清剿了几个来回，抓住一对来自另一个县的因　偷情而怕家法族规惩罚的男女，因见男的身上扛了根护身的猎枪，就硬说是共产邪党，女的被轮奸致死，然后把两个人的脑袋一切，提回红　庙镇，在红庙的山门上挂了三天。

冬日一来，大雪纷飞，官兵们受不了冻，而且觉得几个红匪就是没饿死、冻死，也再掀不起风、点不起火、成不了气候了，就留下十来条快枪，委任在榆林府躲了一阵又回来的族长当镇长，撤回肤郡县城驻防去了。

那族长本来在红庙镇就是说一不二的人物，受了几个月窝囊气，、跟着官兵回到红庙镇，先收回了土地、财产，又趁势收了两个以前看上却没机会到手的庄户人家的女娃，明为丫环，实为炕上物。因有了镇长的委任状，国事、族事、家事系于一身，他颇为得意。

初雪一来，天地裹白，他早早地离开镇政府，回到自己家中烧上个火锅，和两个怎么看怎么欢喜的女娃喝着酒，吃着羊肉，不时还哼哼上几句秦腔，一副天下太平、既无远虑又无近优的样子。

两个女娃自小受的是嫁鸡随鸡，嫁狗随狗的教育，如果说未被占了身子之前还千不愿万不干，在被镇长连哄带吓，口手并用坏了贞操后，也就再不做他想，只盼着尽快生下一男半女，名正言顺当上小老婆了。因而两个人争先恐后地伺候着镇长，这个倒酒，那个夹肉，还

不时投怀送抱，做些女子本能会做的下贱动作。

隐隐约约，红庙里传出些喊叫声，镇长愣了一下，但很快笑笑:“自卫队那些狗日的又借酒发疯哩，保险老李家羊肉铺的小寡妇到他们那里赚钱去了，羊肉钱也赚，那身白胖胖的肥肉钱也赚。”

他话音刚落，窑洞门如同被铁锤敲了一下似的“吭”一下子开了，门栓被撞成了两截，随着一股强烈的冷风，几个一脸凶气、端着手枪的汉子冲了进来，为首的自然是已经自称陕北工农红军一支队队长的霍达东。

他们的模样形同野人，衣服已经看不出原来的颜色和式样，似乎是由许多被泥土和汗水浸泡过的布条条连接起来缠到身上的，头发和胡子长得几乎遮掩住脖颈，由于长时间不洗理，成为一缕一缕的，好似一撮撮草丛，他们的脸瘦得几乎是一层皮包着个骷髅，于是眼睛又显得非常之大，个个都有如铜铃，尤其是马牙子，看到火炉上的肉锅，方桌上的酒罐，椅子上酥胸半露的婆姨，那眼睛简直瞪得比嘴还大。

“土匪!”

“强盗!”

两个年轻女子尖叫一声，瘫软在椅子上，浑身抖得如同在打摆子。

“各位好汉，各位大侠，你们是要钱，还是要粮，还是要女子，还是要……”镇长双手做着揖，但眼睛却越过几个人向黑洞洞的门外窥探，似乎是盼望自卫队员能闻声赶来。

霍达东冷笑了一声:“镇长大人，别看了，你那反兵都被挂在当街那棵大愉树上喝着西北风醒酒呢。我们不是匪，也不是盗，我们是陕北工农红军第一支队，本人就是队长。”

“队……队长大人，你……你老人家有什么吩咐，小的全部照办……”镇长一听是共产邪党，裤档一阵湿热，整个人也从椅子上滑下来。

“你把自己的脑袋割下来，挂到红庙山门上去!”马牙子一甩手枪，威风凛凛地大吼着。

“共产邪党大大，饶命啊……”镇长捣蒜似地磕着头，忽然，他口气又硬了起来，一挺脖子:“你们不能杀人，杀了我你们就罪加一等，官兵来了把你们大卸八块!”

“你大现在就把你大卸八块!”霍达东一脚把镇长踢了个仰面朝天，然后抬手就开了一枪。他的枪法太没准头，飞出去的枪子打碎了离镇长三尺多远的夜壶。不过，他委实也不想亲手去杀人，他只想吓吓那狗日的哩，杀人的事还是交给马牙子去办。

袭击红庙镇所有打头的事几乎都是马牙子干的，他确实是被饿极冻坏了。以前在马家沟虽然过得潦倒、穷困，但起码还有两口破窑和寡妇娘遮风避寒，吃猪食驴料也饿不着肚子。可这一段时间，几乎夜夜露宿，深秋以后，吃了一个月树叶草根，捉只野兔子，一人摊不上一口，有一次他捡到只冻死的乌鸦，没敢带给大家分，拔拔毛就躲着给生吞了。因而，冲进红庙镇后他真是有点像野人一样近乎疯狂了。

他是先摸进红庙镇探路的，镇子不大，只有一条五十多丈长的石板街，街上的雪被扫到两边，但人夜后又飘落了一层，几十间店铺都早早地关了门，很快他就发现自卫队的人聚在红庙的大殿内，由泥菩萨陪着，在喝酒吃肉，还有个风骚的麻脸婆姨在劝酒，不时躲闪着那些自卫队员的挑逗摸弄。

他溜出镇外，叫上其他人，直奔红庙，从一个塌出一个豁口的院墙处翻了进去，没费事就缴了十支长枪，一个拿短枪的想反抗，被一个邪党员一刀砍翻在地。霍达东问清楚了反动

镇长住的地方，下令将这些自卫队员用他们自己的腰带绑住双手，都吊到镇子中间一棵大榆树上，让他们也尝尝夜里受冻的滋味，然后冲进了镇长的家。

马牙子杀了镇长，随即又砸开了小镇上唯一一家药铺，把上了年纪的医生兼药铺老板从热乎乎的炕上揪起来，让他拿着药箱准备出诊。

忽然，马牙子灵机一动，拉住霍达东，挺认真地说:“生娃，这方圆百里再没有反动军队，咱犯不着又去山沟沟里受罪哩，绿林好汉还要扎个大寨，咱何不就住这镇上，设立个分队总部，又有粮草，又可以招兵买马。”

有人点头称是，也有人问:“官兵来围剿咋办哩?”

“笨得慌哩，从肤郡城来这里只有一条路，咱五里路外设个探子，见官兵来了，放把火，像古时候的烽火台，等他们到了，咱早无影无踪了。”马牙子出着点子。

霍达东觉得这点子不错，点点头:“行哩，我带两个人去接仲海他们，睡热炕仲海的病好得快，马牙子，你和剩下的人守着这镇子。”

霍达东走了，马牙子领着剩下的人回到红庙大殿，把自卫队刚吃了一半的酒肉给吃了个一干二净，酒烧心，肉热肚，马牙子睡不着觉，想起了镇长家的那一双年轻婆姨，便大大咧咧地让别人睡，说是自己站岗，其实是奔了镇长的家。

到了镇长家，见那两个婆姨还在哭哭啼啼，他吼了一声:“别哭了，你红大大来陪你们，按罪过，你们都该骑木驴，陪了你红大大，就赦你们无罪。”

两个女子胆颤心惊地跪到地上，乞求着:“红大大，我们也是劳苦人家的娃哩。”

“呸!那你们就更要罪加一等了!穷苦人家的女娃心甘情愿让有钱人日，这叫……这叫卖……卖身求荣，让你红大大日，才能赎罪，要不连你家人也受牵连!”马牙子连唬带吓。

两个女子无可奈何，她们无论如何不能再牵连家人，也不愿去骑木驴，只好委曲求全，哆哆嗦嗦地陪马牙子上了炕，马牙子吹熄了灯，左搂右抱，破天荒大享了一次齐人之福，一直睡到大天亮后别的人满镇子找他才慌慌张张地跑出镇长的家。

(22)

陕北汉子霍达东三十多岁就当上了副省级官员，而后一直到死，他再也没有高升过一级，哪怕是半级。不过，他对此毫无怨言，他觉得若不为农民办事，即使当了皇帝也落个遗臭万年，千古罪名，而哪怕只当个乡农会会长，踏踏实实为农民谋些利益，也活得痛快、舒心哩。在红庙镇他们一扎就是两年多，有吃有穿，李仲海的病几天就好了。正好又有邪党的文件送来，说毛润之提出了武装割据，建立红色革命根据地的观点，于是他也就决定以红庙镇为大本营，而不愿意做毛润之所批评的那种流寇，他打内心深处佩服毛润之先生哩。

接受了以前天天暴动、天天失败的教训，几个邪党员骨干谁也不再是砸肤郡城，打愉林府的话题，而是认认真真地囤集粮草，发展队伍，进行革命宣传。这样做效果倒是不错，一些其他乡镇已经家破人亡的农会会员们听到风声后纷纷寻来，红庙镇周围的几十个村子的农民们也推翻了大户人家的村长，又把农会的牌子重新挂了起来，分大户人家的土地对这些农民是最有诱惑力了。

霍达东再次充当了商人角色，不时来往于其他几个县城之间，一是和刘平的大股红军进行联络，另外是倒腾山货、粮食，以换回枪支弹药、布匹、药品，同时还收揽了一些无家可归的流浪难民加人红军。

当时正值黄河一带军阀混战，金上岳将全部兵力都抽调集中，全力参加，无暇顾及几个红匪毛贼，因而肤郡县政府虽然在几个月之后得知红庙镇又闹了匪患，霍达东在那里占山为王的消息，可是派不出兵来攻打、围剿，好在红庙镇远离县城，而且这次红匪并没有任何大举攻城的迹相，县长也就放任不理了。

一年之后，女共产邪党员秀芝生下一个男娃，她无法说清这个孩子的父亲是谁，只好起个名字叫红军，这个孩子长得肥头大耳，颇有福相，人见人爱，这引得霍达东对自己结婚多年依然无儿无女而伤感、优愁，革命归革命，男人娶婆姨续香火也没错，要不谁来接革命的班哩。　　他觉得该找医生去看看了，就在一个晚上，趁着天黑，他把小镇上那位医生接到了自己和桂桂住的窑洞内，告诉医生自己结婚多年不育，请他给诊治一下。

那留有一缕山羊胡子的医生给霍达东和桂桂都把了脉，然后问了房事情况，轻轻叹了口气:“霍支队长，你虽身高体大，但脉相枯涩，应是无子，但还有生女之喜，然而令夫人大有问题，胎无居所，何以成形?体内过寒，难能有孕。我先给她开上个方子，不过鹿茸、人参等几味药因世道纷乱，我那小药铺中已久无存货，还望霍支队长日后外出时到县城的大药铺补齐方可煎熬。”

霍达东有点着急，问:“老先生是说我命中无子了?”

医生摇摇头:“老朽只看脉相，不看命相，只治病，不治命，不敢在霍支队长面前乱说，若霍支队长信不过老朽，还可另请高明，老朽无非山中一草医，难说偷林、西安那些藏龙卧虎之地有再生扁鹊、华陀，能使霍支队长一剂药人口，便喜得贵子。”

霍达东对老中医的话将信将疑，日后他确实又找了众多医生看过，但终无生子，只得一女，倒是正中了他大在算命先生和归元寺老和尚那里卜的卦。

秀芝在一次执行任务的时候不幸被国民党便衣侦察发现，将她一堵在一孔窑洞内，她只身单枪抵抗了近一个时辰，打死打伤各一人后，最终不愿被俘受辱，用枪对着太阳穴打了一发子弹，当场身亡，她那个叫红军的儿子顿时成为孤儿。

桂桂已经感觉到自己难以生育，因而她很想将红军抚养起来，一来可怜那孤儿，二来也使自己老年有人抚养。但霍达东此时还没有完全绝望，因而不愿过早收个养子，终究不是自己的精血，算不得霍家真正的香火哩。

结果，小红军被李仲海收留，他不仅仅是出于一种怜悯和善良，更有着对革命后代深深的关切，还有着想靠自身能力培养出一个理想革命家的念头。他知道，若将这男娃托付给一个庄户人家，很可能今后只是使中国庞大的农民队伍中再增加一员，而若自己一手带大，则会出现一个革命干将，对此，他颇为自信。

当然，一个从未结过婚的单身男人身边生活着一个娃儿，会给李仲海带来很多累赘和麻

烦，可这同时也会使他因此而少去孤独、寂寞和沉闷，和娃儿在一起总会使人多些欢乐、愉快。

他找了个后生当勤务员，他工作时替他照料孩子，他闲下来时就会和孩子一同逗趣，讲些故事给孩子听，在以后的许多年里，这成为他苦行僧式的单身生活中唯一的乐趣。这改姓为李的娃也还算争气，十八岁时去了苏联留学，二十四岁时回到祖国成为了工程师，再往后当上了北京某研究所的所长，最终荣任了共和国部一级的官员，总算实现了李仲海收养这娃儿的目的。

关于成立一个红色政府的提议大概是马牙子先说出来的，他平时常说混话，在酒后敲着筷子说:“咱们共产邪党也不是小老婆养的，咋的国民党就是官，咱就是匪，他们为王，咱们为贼?咱也要成立个政府，楚河汉界，一家管一半天下，起码他们管城里，咱们管乡下。”这话说了，当时无人在意，后来李仲海得知江西建立了中央苏维埃政府，他当机立断，立刻召集了邪党员会议，也决定成立陕北苏维埃政府。

霍达东问:“仲海，苏维埃是啥意思哩?”

李仲海解释道:“这是俄文，就是苏联中央和地方各级的国家权力机关的意思。”

“狗日的拗口哩，干脆叫陕北红色王府，咱是王，国民党是贼!”马牙子兴冲冲地提出建议。　　李仲海皱皱眉头:“别胡扯，咱们邪党的中央都这么叫，错不了，苏联是咱的榜样哩，样样都跟他们学，革命保险胜利。”

“这陕北不就两个政府了，老百姓今后听谁的?”有人提出疑问。

霍达东一瞪眼:“亏你还是个共产邪党员，咱干革命不就是为老百姓谋利益，老百姓当然听咱的。”

那人不服地嘟浓着:“国民党政府占的地盘大哩，他们地盘上的老百姓总不会不要命了，听咱的。”

李仲海摆摆手:“你说的这是暂时现象，咱把政府的牌子树起来，名正则言顺，早晚有一天南京政府也姓了共。”

接下来，大家研究了谁当主席，谁当副主席，谁当各部部长。马牙子什么官也没捞着，心中大为不满，他叫道:“咱当年砸粮库就跟着生娃冲锋陷阵，哪次有掉脑袋的事也没有装过反，咋现在封王加爵就没有咱了，不说给个县长，红庙镇的镇长总得给一个吧?”

霍达东也觉得不给马牙子个头衔有点说不过去哩，小声和李仲海嘀咕了几句，算是让马牙子当上了红庙镇苏维埃主席。

马牙子乐了，虽然这镇和省差着几级，但他颇为知足，喜滋滋地想:这省政府虽名声大，实则是个虚的，没一个县城能管住，而这红庙镇的镇长可是实的，下面三个乡二十一个村，我说句话谁都不敢反对，生娃委实照顾我这老兄弟哩。

他的镇苏维埃主席的头衔一被确定，立即找人写了个牌子挂到了原来的镇长家，那镇长家的九孔窑拿出五孔来办公，剩下的四孔是他的住所，镇长的两个没有明媒正娶的年轻婆姨连同所有家具都被他一并接收。当然，那两个女子名义上只是镇苏维埃的服务员，打扫卫生，烧菜倒水而已，也捎带着为还是单身的镇苏维埃主席做做饭，洗洗衣服，夜里的事大家心照不宣，谁也不提。

春节一过，红庙镇越发热闹起来，但不是赶庙会，走亲戚，而是召开陕北省工农兵代表

大会。

代表们来自已经被赤化了的周围五个镇，十六个乡，一百多个村子，每个村子最少出五名代表。所谓代表，其实就是村苏维埃主席和两个副主席再加上赤卫队队长和副队长，乡和镇里也是一样，代表即是那些红色官员，有个别苦大仇深的老头老太太是做点缀。

近千人云集红庙镇，将那不长的一条街给塞得满满的，街中心大榆树下支起几口大锅，炖着猪肉，煮着羊肉，蒸着摸，准备给千号人中午大会餐。

会场就设在红庙的山门处，门两边各挂一条幅，左面是“一切权力归人民”，右面是“人民定要做主人”，红瓦下面门框上面一条横幅，写着:陕北省工农兵代表大会。庙里大殿中的香案被抬出来，充做主席台，跟着李仲海和霍达东钻了近一年山沟沟、吃尽了苦头的十几个人都端坐在主席台后面，他们身上也不再是破衣烂衫，而是穿上了蓝布制服，戴上了八角帽，这都是模仿着刘平的红军主力部队的服饰制做出来的，脸上也不是胡子拉碴的，一个个都刮得铁青，有如大殿中的泥胎被搬了出来，挺威严的。

主席台两侧每边站着八个斜挂手枪的红军士兵，一色蓝布棉袄，扎着皮带，也很有气势。会场最前排则整齐地蹲着一百多名拄着长枪的士兵，这是已经扩展了的第一支队，加上在镇外站岗、巡逻的人马，已经有两百多人。近千名代表看大戏一样毫无秩序地蹲在后面，有些人则蹭在对面的墙头和窑顶上。

由于缺少马方、李秋枫那样的宣传人员，没有组织成锣鼓队，也没有娃儿们举着小旗子喊口号，唯一的新奇之处就是从金上岳队伍中投奔来的一个与邪党失去联系几年的任连长的地下邪党员，带着士兵们进行了操列表演，再就是霍达东领着十几个后生耍了一通刀枪棍棒，然后放了几挂鞭炮，大会就算开始了。

李仲海慷慨激昂地讲了一番革命的豪言壮语，并郑重表示，今后除红色政权之外的一切政府都是伪政府。接着，他宣布了苏维埃政府主席、副主席、各部部长的候选人名单。

下面有个人大声问:“人名中咋没有苏维埃同志哩，苏维埃政府，那主席该是苏维埃哩!”主席台上的人大笑起来，霍达东吼着:“不懂别胡扯，苏维埃不是同志，是……是红色政权的意思!”

那人在哄笑声中面红耳赤地蹲下去，不满地嘟峨着:“都是你们前面坐着的几个人捏鼓的事，咱蹲着的人咋懂哩。”

投票是往大碗里扔黄豆粒子，主席台下摆着十几个大土碗，每个碗边摆着个人名，一个装满了黄豆的口袋敞着口子，按规定每人只能往每个碗里丢一颗黄豆，不同意某人的可以不丢，但不准多丢。

结果是，一口袋黄豆粒子还没等后面的一半人来抓，就空空如也了，而十几个大碗中黄豆粒子堆成了尖尖，边上还洒了一片，丢完豆子的人急不可耐地冲到大榆树下，领一大碗肉和五个白得像婆姨屁股一样的摸。

唱票的是马牙子和他那两个女工作人员，那些豆子数得他浑身冒汗，用了一个多时辰也没有点清楚，最后，他干脆跃身而起，双臂一举，冲着吃得正香的人们大叫一声:“全部当选!”　　人们附合着:“好哩!”

“咱早知道全部当选，不选这些人，选谁哩!”

“除了他们，还能再找出几个不怕死的好汉来?这可不是当官享福，是走刀山过火海哩!”“胜者王侯败者贼，有朝一日共产邪党真的坐了江山，他们还不就成了王侯将相了。”　　“王侯将相就更不用选了，古今中外，咱从没听说过哪个官是选出来的。”

“共产邪党就是要破这个规矩哩。”

“这可难。”

半个多月之后，古城西安的报纸刊登了这样一则消息:“红匪山沟里树起省政府大牌，主席原是当年被通缉大盗。”

内文是指责陕西政府对共产邪党镇压不力，剿灭无方，致使红匪残渣余孽死灰复燃，破坏治安，骚扰百姓，若不尽早根除，必将酿成大乱，使中华民族陷人水深火热之中。

该文章还颂扬 r 蒋介石，说他不遗余力，在江西连续发动大规模围剿，最后亲自出马，挥师百万，终于将朱德、毛泽东的老根拔掉，使其成为一股流匪，到处逃窜，终将会灰飞烟灭，成为历史。

这张报纸许多年以后才摆到霍达东的案头上，那时他在西安已经有一了一间宽敞的办公室，国民党省政府会议室的牛皮面沙发由他坐着，那办公室的墙上正正地挂着那篇文章中所说的终将灰飞烟灭的毛泽东、朱德的头像，他认真看完那篇秘书整理旧政府档案时发现的文章，然后走进厕所，拉了一泡屎，在“君子勿用字纸”的告示下面，用那张报纸揩了脏。他从来就不认为自己是个君子。

霍达东正式的官衔是陕北省苏维埃政府副主席，因他名气较大，又被认为劣迹在身，易于引起民众反感，因而国民党报纸才会专门抖落出他来，其实主席另有其人，是上级邪党专门派来的，李仲海也只是当了副主席，尽管他内心深处很想当上正职。不过他的愿望并没有落空，共产邪党全国执政后，他如愿以偿，终于当上了某省的省长。这多少也得益于霍达东的谦让和举荐。

霍达东在苏维埃政府中的具体工作是负责经济，说白了就是为政府筹集钱、粮、武器、布匹、药品。他在周围三个县城内相继开了三个商号，经营日用百货，收人不薄，维持一个只有几十个人的政府和扩展至五百多人的军队还能勉强应付。

他另外的取财之道是打劫大户，这对于他似乎是轻车熟路，带人出动了几次，没费一枪一弹，都获得了成功。

他坚决反对有人提出的关于在所管辖区域内收取捐税的主张，他曾对李仲海说:“仲海，这不行哩，李闯工还提出不纳粮的口号来赢取民心哩，咱是共产邪党，绝不能再让农民交粮纳税，要纳只能让商人纳，千万不敢动农民的心思。”

李仲海很同意霍达东的想法:“是哩，不给农民实惠，咱站不住脚，闹农会是给农民分土地，现在建立政权要让农民支持，就得不纳税哩，不过，养这么多人马，可够你累的。”
“只要能让农民过好日子，我可是连命都愿意搭上的。” 霍达东摸摸又剃秃了的脑袋，淡淡地说。

“这样，以政府名义下个文件，哪个镇、乡、村若让农民交粮纳税，就把主席送到人民法庭审判!”

“好哩!”

谈话之后，第一个碰到枪口上来的是红庙镇苏维埃主席马牙子。因为马牙子就正在向各家各户征粮纳税，谁敢不交，他就说人家反对红色政权，有反革命嫌疑，动不动就绑人吊起来示众。

马牙子让各家各户交粮纳税更多的倒不是出于私心，他住的院子够大，窑也够多，地再也不用种，不需要买田，关键的是他无意中发现被他打死的前镇长藏在炕下面的一个罐罐，那罐罐里装着几百块白花花的大洋和十几根金条，还有一堆金银首饰，他对谁也没有吭声，自己换个地方又埋起一来。这足够他宽宽余余地过后半辈子，所以他派粮派税绝不是为了自

己，他贪心没那么大哩。

他征粮征税是为了成立一个像模像样的赤卫队。他曾跟着霍达东、李仲海等人去过已经是红军军长刘平占领的地盘参观学习，见到那里一个镇子上的赤卫队，三十多人，穿戴整齐，分为三个小队，小队长背着盒子枪，其余的人一律是崭新的汉阳造。镇长出门，带上这支赤卫队，威风不说，也给革命政权撑了门面。马牙子一门心思要模仿这个镇子，成立赤卫队，保护红军政权哩。

他当然不会掏自己的钱去买枪，而霍达东维持省政府和几百人的正规军队已经是捉襟见肘了，终日为钱粮奔忙，更不会给他钱，他只有用纳粮征税的办法。

他口开得并不大，有地的一亩交五十斤粮，没地的一人交一块大洋，他估算一下，若能收上八成，买三十支快枪是绰绰有余了，还能置上一冬一夏两身细布军服，这在陕北苏维埃政府中可算是独一份。

见了省苏维埃政府发的各级政权不得收缴粮税的文件，他哼了一声，扔到一边，觉得那是骗国民党政府的传单，他照样背着盒子枪，带上两个已经事先委任成分小队长的后生，不辞辛苦地下乡走村，去催粮催款。

霍达东大晌午在镇口处堵住了马牙子，马牙子赶着五匹毛驴、驴背上驮的全是粮食，手里拎着口袋，里面是哗啦啦响的银元，他哼着酸曲正走过来，见了霍达东怒气冲冲地拦在街中，不由得一愣。

“生娃，吃完啦?”他搭汕着。

吃啥?”

“吃饭呀，你要没吃，到我家去吃，还剩块羊肉锅里炖着哩。”马牙子看出霍达东神色不对，赶紧套着近乎。　　“

吃羊肉? 你这狗日的吃了狼心狗肺，吃了豹子胆，敢黑着心烂着肺去收庄户人家的粮，去收穷苦人家的税，这和国民党政府有啥两样?啊!”霍达东瞪着眼，咬着牙狠狠地吼着。

马牙子一听是这事，松了口气，他一直提心吊胆的是他发现的那罐子金银财宝被人知道了，说他私吞本该充公的财物，见不是这事，他自然放了心。

“生娃，这是大伙自愿捐粮捐钱，买快枪成立赤卫队，保护红色政权哩。”马牙子做出一副坦坦然然的样子，说出冠冕堂皇的理由。

霍达东一听更有气了，指着马牙子鼻子骂着:“你这反还敢扯谎?你收的粮和钱有几个是自愿交的?现在正青黄不接，哪有富裕粮钱捐出来买枪，别想蒙我霍达东，李家村你打了两个人，吴堡一个寡妇说和你睡一觉你就免了她的税，枣沟你吊了个后生，还牵走他的驴，马家村里你朝天开了一枪。你狗日的这是对谁哩?是对自己的兄弟姐妹，是对自己的亲大、亲娘、亲叔、亲婶!我不挡你成立赤卫队，这是好事，扩大武装，你有本事上肤郡县，上榆林府，上西安城去抢大户，我摆酒给你壮行，再有本事去端了国民党兵营，那才叫好汉，才叫共产邪党!跟农民要什么威风，我霍达东这辈子都是个农民，狗日的你冲我来!”

马牙子见霍达东真的动了怒，不敢再痞里痞气了，跟着他的那两个后生早吓得大气不敢出。霍达东对糟害农民的人的仇恨和惩罚之严是出了名的，有一次三个红军战士偷了农民一只羊，偷偷宰了吃了，让霍达东知道后，让这三个人生生在丢了羊的人家门口跪了一整天，还扣了三个月军铜赔人家，另外饿三天，让他们再偷农民家东西时先想想挨饿的滋味。

马牙子嘟浓着:“哪个政府都得靠税养着，咱在农村，不从农民身上收从哪收?”

“共产邪党就不从农民身上收，世世代代都不再让农民交粮纳税!”

“怕不成哩，现今咱人少，日后真占了整个中国，不收税，学校咋办?官员喝西北风?成千上万的军队自己种地去?”马牙子对霍达东的话不以为然。

“从别人身上收可以，就是不能从农民身上收。”霍达东固执之极。

“那……那就这一次，以后保险不收了，再收你砍我马牙子的脑袋。”

“不行，军令如山，一次也不行，你狗日的乖乖把钱、粮送回去，打了谁就让谁打你，回来再把自己吊在门框上晒半日。”霍达东一点都不给马牙子留情面。

马牙子也急了，脖子一挺，喊着:“我不送，你这是糟踏人哩，我大小也是个镇苏维埃主席，让农民打我耳光，自己吊起自己，日后我还有脸当这个官吗?人家见了我还不得笑掉大牙，不送，就不送哩，说塌下天来我这是为革命!”

霍达东的眼睛眯了起来，声音放低，但口气却阴冷严酷:“马牙子，你别说土生六亲不认，不送，不赔礼，我撤你狗日的职!”

“撤职?甭想，我是全镇人民选出来的!”马牙子胸脯一挺，自觉有恃无恐。

“哪个尿选你的!谁知道马牙子是哪个土缝里钻出来的?因为你是共产邪党，老百姓才往你那碗里扔黄豆。”

“你们不也是这么选的，别乌鸦落到猪身上不知自己黑了。哼，国民党来了，扛着枪往那一站，这些老百姓也照样往碗里扔黄豆!”

这话虽不中听，可霍达东知道还真没错，他不扯这个，坚持马牙子不送还钱粮，不赔礼道歉，绝不再让他干这个镇一级的主席。

马牙子找了李仲海，李仲海也不同情他，不仅训斥了他一顿，还提出更严厉的惩罚，要开除他的邪党籍。马牙子觉得实在丢不起人，翻来覆去想了一晚上，决定一走了之，反正他知道自己再混也就是个乡农会会长，镇苏维埃主席，没啥大奔头，不如回家去享清福，当然不能回马家沟，而是到一个人们对他陌生的镇子或县城做个买卖，国民党政府不知他的来历，不会找他麻烦，共产邪党也摸不着他的踪迹，不会去清算他。

马牙子走了，带着一包金银财宝和那两个年轻婆姨不知去向，办公桌上放着他的手枪和一张写着歪歪扭扭字迹的纸片，纸片上的字只有一行:

生娃，我丢不起人，你们只当马牙子死了。

当然，马牙子没有死，他的命不算长，也不算短。假如不是霍达东阻挡住李仲海派人去追赶他回来，也许他就真少活了十几年，李仲海要处决他哩，霍达东觉得怎么也不该把马牙子当国民党反动派来对待。

不过，马牙子多活了十几个年头之后，做梦也想不到自己居然还是死在了儿时伙伴霍达东和李仲海的手中，他死不瞑目。而霍达东在后半生的很长一段时间内，也常为此事而自责、愧疚，沉痛地反思。

(23)

陕北汉子霍达东正蹲在地上啃玉米棒子的时候听到陕北红军军长刘平被抓捕起来的消息，他一愣，嘴里的玉米粒子全都噎在了嗓子眼，下不去，也吐不出来，好一阵子没有缓过气来。　　这是他的晌午饭。自从他担任了陕北省苏维埃政府副主席之后，晌午饭就一直是在省政府办公的所在地红庙里面吃，后晌饭才回到自己住的窑洞和桂桂一起吃。

红庙的建筑没被改动，只是把大殿中的泥胎搬到了后墙根，任凭那些菩萨佛爷们风吹日晒，反正共产邪党不迷信，都自称是彻底的唯物主义者，也用不着求佛祖拜菩萨磕头烧香来保佑革命成功。

在神坛下原来信徒们跪拜之处摆了些吃饭的方桌，就成为了各部部长们的办公场所。神坛上空出来的地方摆上了十几张大条凳，正中间墙上挂上了一张请匠人画的列宁和马克思的像，一个秃脑门，一个大胡子，反正也没人见过他们，说是就是了，这里就是苏维埃领导开会的会场。

其实，若不是没地方办公，霍达东也不会指挥人抬走泥像，他当时甚至想过，日后有了钱，掏上几十孔窑，搬到窑里去办公，还把这些塑像放回神坛。不过，这确实是不太可能了，因为那些堆放在墙角的释逸牟尼、大肚弥勒佛、观音之类的塑像不知被谁开膛破肚砸开了脑袋，后来他才知道，据说这些塑像的心都是金块块做的，有人要找那些金块块发财哩。

知道这个常识后，他曾带着一个班的战士把方圆百里之内的和尚庙、尼姑庵、龙王庙、土地庙内的所有泥胎都给放倒，砸成了碎块，想从里面找出黄金来，他这个主管经济的副主席委实急着用钱哩。

虽然大多数泥胎内都塞的是一把麦秆，但他也不算绝对失望，真的找出过一块鸡蛋大小黄灿灿、圆溜溜的金子和一块绿得像潭水一样的玉石，托人到榆林府换回八百多块大洋，这些钱足够应付省苏维埃及红一支队几百号人一个月的开支。

三十一年后霍达东以一个副省级的闲差居于山东济南府时，正逢毛泽东发动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一群群穿着肥大黄军装，戴着印有“红卫兵”三个字的红袖章，脸上稚气未褪的男女娃们喊着要继承父志、彻底砸烂封资修的口号，冲上了他常去漫步的千佛山，毁庙砸佛烧经书。不过，他们比他当年要纯洁得多，没有人去开泥胎的膛破菩萨的肚去找金块块，这也和他们不愁吃不愁穿有关。

看着这不亚于他们当年造反闹革命的轰轰烈烈的情景，霍达东心中有些苦涩，因为他对壮年之时砸佛像的举动已有愧疚，对娃儿们的行为自是很不以为然了。他觉得佛都是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的神灵，与世俗社会毫无关联，革他们的命无意义哩。

陕北省苏维埃政府的食堂很简陋，就设在红庙的东厢房中，一口煮猪食的大铁锅和一个案板而已。本来也确实用不着搞那么复杂，因为伙食很简单，无非是小米饭、煮玉米棒、偶尔蒸点模，菜则是咸萝卜，最多一个月改善一次生活，炖一锅带骨羊肉。

在食堂里，霍达东与主席、其他副主席以及工作人员吃一样的东西，不过到了晚上，桂桂总会变换花样给他做些可口的饭菜，因而他倒没有营养不良的模样。

他住的是镇子外一孔原来关羊的窑洞，重新刷了一遍，垫了些土，安上门窗，盘了个土

炕，就成为了他的新家。这自然没有马家沟他那几孔老窑住得舒服，可比在山沟、山梁、坡下、源上露宿强百倍了。而且这窑外的院子很大，开春后，他把那地锄了锄，因有很多羊尿羊屎，还很肥哩，他种上些玉米和瓜菜，居然长得颇为壮实。桂桂又养了几只鸡和两只羊，这样就很像一个温馨的殷实之家。这些东西收获宰杀后，他除了自己吃之外，更多的是拿到食堂去与大家共食。

从这以后，无论是在延安窑洞里当财政厅的官员，还是在五台山的寺庙中修身养病，无论是在 A 省的黄河边住省长官邸，还是在山东济南的小别墅中赋闲，霍达东都会在房前屋后开出块田地来，每天早晚耕耘栽种、浇水施肥。他觉得很有乐趣，比跳舞打牌更能充实他的生活，更为关键的是这使他农民的天性不致于泯灭。

当他是农民的时候，他终日想的是改变自己的命运，而当他成为真的官员之后，他时刻却想着自己是个农民!

在苏维埃政府的食堂吃饭，没有桌椅，天不冷时，大家都蹲在空场上，边吃边说些扯淡的话，天太热了，就蹲在阴影中。

这一天吃的是玉米棒子，霍达东没排队就伸手抓了两棵，让脾气比他还倔的炊事员吼了一句:“显你官大呀!”他连忙向周围的人们道歉，其实他是因为惦念着带人去攻打一个反动镇政府的李仲海去了两天还没消息而忽视了排队打饭的规定。

拿着玉米棒子，他蹲下去，有点焦虑地啃起来。尽管他知道李仲海带了一百多人，收拾几十个自卫队员应该是易如反掌，会马到成功的，不过这其间要跋涉百十里路，中途也难保不出什么岔子。他不希望李仲海出啥意外，仲海是他儿时的伙伴，一块入的邪党，生生死死十多年了，比亲兄弟还亲哩。

他心里正有点忐忑不安，总觉得有什么不祥之兆，这时一个打扮成驴贩子的交通员从庙门风尘仆仆地闯了进来，四下扫视了一眼，直奔霍达东而来。

霍达东把左手那棵还没吃的玉米棒子塞给那后生:“吃哩。”

那后生没吃，低声问:“仲海书记呢?”

“执行任务去了，家里的事我负责。”霍达东看出这交通员有什么事要汇报。

“霍副主席，出大事啦!”

“轻点声，出啥大事哩?”

“刘平同志被抓起来了，他答应送给咱们红一支队的两挺机关枪，一千发子弹也没有拿到，我只好空手赶回来。”交通员又气恼又沮丧。

霍达东手中吃了一半的玉米棒子掉在了地上，他呼一下子站起来:“咋说?刘平打败仗啦?他有几千人马哩，咋就能把他抓住，保险又是奸细出卖!”

他身边一些吃玉米棒子的人闻讯也凑过来，一副副紧张而关切的神情。这个消息对他们同样震惊，因为在陕甘一带建立红色政权的刘平等人比他们力量要强大得多，甚至已经占领了几个县城，从某个角度说，刘平的大股红军是他们的靠山，使他们可进可退，也使他们能相对平稳地在肤郡一带开展工作。营以下的国民党军队基本不敢深人山沟，因为刘平的主力部队一个急行军就可以在两三天内赶到，几百个人刚好可以被从从容容地收拾掉。因而，听说刘平被捕了，没有人不焦虑万分，这关系着他们的生死存亡哩。

那交通员一跺脚，也站起来，干脆放开了声音:“刘军长不是被国民邪党打败了抓起来的，是让咱们自己人抓起来的，说他是想搞……搞独立王国，不听中央指挥，是……是右倾机会主义，是……是邪党内的坏人，说是要拉出去砍头哩!”

霍达东的眼睛一下子变得血红了，他大叫一声:“警卫排长!”

“到!”一个全副武装，背着一支盒子枪和一把手柄缠着红布的大刀片的年轻后生跑过来。　　“马上把留在家里的三分队给我集合起来，立刻跟我出发!”

“是!”警卫排长小跑着出了庙门。

霍达东狠狠地说着:“国民党反动派杀咱，那是咱的光荣!咋自己人杀起自己人来了!要杀刘平的人才是天底下最坏的人!”

黄土坡坡上，一百多穿着蓝制服扛着长枪的队伍一条长龙似地走着，也挺有股子气势。不过，霍达东没有心情回头检阅他这支人马，他只想火速赶到关押刘平的地方，据理力争，若上级不讲理，他就以武力抢人!

太阳像个鸡蛋黄似软塌塌、稀松松地往山沟沟里滑时，远处传来了嘶喊:“达东!达东同志!”

霍达东回过头去，只见一团黄土的尘雾中，两匹马飞驰而来，很快就从队伍的尾巴上冲到了前面，翻身下马的是李仲海和他的警卫员。两个人在马上颠得够呛，不停地抖着双腿，而那两匹马也喷着一股股热气，浑身都是汗水。

霍达东先开了口:“仲海，那些自卫队被解决了?”

李仲海阴沉着脸点点头。

霍达东可没在意李仲海的神情，仍旧大步流星地走着，边说:“那好哩，咱一块去救刘平同志。”

李仲海一下子跨到霍达东前面，拦住他，低吼了一句:“你还不给我站住!白分队长，命令部队停止前进!”他向紧跟在霍达东后面姓白的黑瘦汉子吩咐了一句。

“为啥?”霍达东一愣，不解地盯住了李仲海。

李仲海把霍达东拉到离战士们远一点的一个孤坟包上，恼怒地说:“你还问为啥?这是无组织、无纪律哩!你这么大的行动，找主管军事的副主席商量了吗?开了邪党委会做决定了吗?这不是你霍家军，说动就动哩!”

霍达东绝没有想到李仲海会发这么大火，他哼了一声:“你知道我带队伍去干啥?”

“我要不知道还不会屁股没坐稳就赶你来哩!”

“那你知道刘平同志被抓起来了?”

“听交通员说了。”

霍达东一下子也气愤起来:“你知道了为啥还拦着，咱不能让刘平同志屈死呀!我用我的脑袋保证刘平同志是真正的共产邪党员!”

“你有几个脑袋?你能保几个人?这一次抓起一批人来审查哩!”

“我只保刘平一个人!”

“达东，你太不像话了!说轻了，你是目无邪党的原则，说重了，你这是要分裂邪党，

制造邪党内武装冲突!”

“我分裂邪党?我制造邪党内武装冲突?这帐算不到我头上，是抓刘平的人分裂邪党，制造邪党内武装冲突!”

李仲海尽量压住点火气，低声问:“你了解情况吗?你知道为啥抓刘平他们吗?”

“不知道。你知道?”

“我也不知道，可咱们要相信上级，相信全体陕北的革命同志绝不会冤枉自己真正的革命战友。你带着这一百多号人能解决问题?只会添乱，使问题更复杂化!”

“你不心疼刘平同志哩，背上个奸细、叛徒的名声，不容你分辩就砍头，咱不是也这样干过!”霍达东想起暴动失败后杀奸细、叛徒时的情景。

“谁说我不心疼刘平同志?我是连你都心疼哩，你这么冒冒失失闯到那里，救不出刘平且不说，连你也一块搭进去，你这么干还不知有多少人跟你背黑锅!”

“怕死的人都别去，这算是我霍达东的个人行动，与苏维埃和组织无关。走，白分队长，跟我开拔!”霍达东跳下土坡，一挥手。

“霍达东!你已经不是当年砸粮库时仗义行侠的绿林好汉了!你现在是共产邪党员!”李仲海的脸一下子变得煞白，从牙缝中吐出一个一个字，他一扭头，大声命令着:“白分队长，警卫排长，我以邪党的书记的名义，命令你们把霍达东同志的枪下了，绑起来，带回红庙镇!”

霍达东不相信似地盯住了李仲海，眼睛眯了起来，暴跳如雷地说:“好你个李仲海，你敢下我的枪，你，你……”

还没等他说完下面的话，几个红军战士已经扑了上来，在他的挣扎中把他按倒在地，用绳子捆了起来，尽管他练过武功，但还是无法‘和一群人抗拒，他只能嘶嚎着:“李仲海，你这个狗日的有种就把我毙了!”

李仲海苦笑了一下，让人把霍达东的嘴用破布堵上，带着队伍返回红庙镇。

霍达东没有受到任何惩罚，在很长时间以后，他才明白李仲海是真心地为他好，尤其当他目睹了邪党内一次又一次运动的残酷和险恶之后，更觉得个人力量的微乎其微。当然，在一九五九年开仓放粮时与毛泽东和中央的对抗是他积郁多年的沉闷的总爆发，这一次爆发使他心理得到了平衡，而爆发以后的岁月他就再也没有什么作为和愤患了，或者说，他再也没有力量使自己又爆发一次了。

一个人一生中能有一次他那样的爆发已经称得上是辉煌了，若有两次，那无疑属于伟人之列，可以千古扬名了。他还不能属于伟人，他的辉煌更多的不是创造，而是毁灭，是以个人生命的步人炼狱而得到世俗社会的认同。他终究不是上苍所赋予的改变历史的伟大使命的那种一个世纪才出现几个的人物，他依然属于芸芸众生中的一员。

他的与众不同之处只在于他敢将自己的内心之火爆发一次，而不是将其抑制于体内，焚化自己的灵魂，只剩下生命的躯壳。这种爆发焚化的是中国人几百年来包裹自己灵魂的躯壳，而剩下的是我们至今还在茫然追索的、黄土高原上的人们常说的那种精、气、神!

在霍达东郁郁寡欢了一个多月之后，李仲海提着一条烟、一块猪肉和一瓶竹叶青酒，来到他住的窑洞里，兴冲冲地对桂桂说:“霍太太，把肉炖上，我和达东好好喝两杯。”

桂桂脸一红，抱怨着:“啥太太，我是你嫂子哩!”说完，她提着肉出门进灶房去忙活了，跟着李仲海来的小红军已经会跑了，他很欢喜偎在桂桂怀中听她唱信天游，也跟在桂桂后面跑了进去。

“哪来的?”霍达东冷冷地看了看放在炕沿上的烟和酒。

“抢的!偷的!打劫来的!”李仲海继续开着玩笑。

“不要!”霍达东硬硬地蹦出两个字，拿起了旱烟袋，抽起了烟叶子，已经有好长一段时间，他没抽过卷烟了。

李仲海皱了皱眉头:“不要?那可叫我做难了，我回去汇报说霍副主席不愿意跟同志们一块庆贺胜利，同志们会奇怪哩。”

霍达东听出李仲海话中有话，伸手用旱烟袋的烟嘴捅了他一下:“你这尿，有话直说，别拿我土生开心，咱是直肠子，不会跟你这书生转弯弯。”

李仲海往霍达东对面一坐，掩饰不住内心的喜悦悦:“好消息有三，你说该不该抽烟、喝酒，吃大肉来庆贺一下?这第一，毛泽东，嗯，也就是毛润之、朱德、周恩来带着中央红军到了陕北，与陕北红军主力会师了……”

霍达东一下子站了起来，惊喜地说:“朱、毛还活着?可、可国民邪党的报纸上说早把他们剿灭了!”

李仲海鄙夷地哼了声:“达东，你咋也听信国民党的谣言，那是他们自己给自己吃宽心丸哩。不但朱、毛活着，还有一大批中央领导同志也活着，而且带来了几万人马，他们一到陕北，就消灭了张学良的东北军一个骑兵团，真是鼓舞士气哩!”

“那、那他们咋会从江西跑到咱陕北来了?”霍达东急不可耐地问。

李仲海回答:“蒋介石百万大军围剿，他们寡不敌众，就撤出了江西地区，一路上被敌人围追堵戴，吃了不少亏，也没个立足之地，后来知道了咱陕北有一块根据地，有红色政权，就从四川绕道而来。”

“那就是来投奔咱们来了。”

“不敢乱说哩，人家是中央红军，是来帮咱扩大根据地的。”李仲海脸上严肃了一下。霍达东没有深究这一点，都是共产邪党，谁投奔谁都一样哩，反正汇合在一起，人多势众，不是坏事，他急着问第二个好消息。

“咱陕北红军的创始人之一刘平同志经邪党中央下命令，给放了出来，仍然担任军长!”

霍达东用烟袋锅子一敲大腿:“我就知道那些狗日的冤枉好人!”

“可你那时候要去劫狱抢人，若不成功，恐怕就不是这个结果了。”

霍达东有点惭愧地低下头，伸手抓过酒瓶子，拧开瓶盖，就要喝一口。

李仲海一把夺过酒瓶子:“急啥，听完第三个好消息再喝。”　　“第三是啥好消息?”

“邪党委研究了，一致推荐你到刚开办的中央邪党校去学习，大家都想去哩，我力主先派你去，不光是学文化，关键是提高邪党性，掌握革命理论，说不定还能听毛泽东、周恩来亲自上课哩!”李仲海眼中的光是真诚的，很显然是为霍达东获得了一个这样好机会而高兴。

霍达东也喜不自禁，能够学习是他一直所盼望的，作为共产邪党员，能够进人中央邪党校学习恐怕不是人人都能争取到的，他当然很感激李仲海，虽然被李仲海下了枪、五花大绑押回红庙镇的事让他大为丢脸，但错在自己，他也绝不会记恨李仲海。

即使在二十多年之后，他和李仲海的冲突到达了针锋相对的顶峰，并多少因此而使他被免去了一切职务、沦为平民，他也没有记恨李仲海，都是为邪党工作哩，他相信李仲海无论怎样严重地伤害他，也绝不会是受个人目的的驱使。他和他所面对的都不是个人，自从他们成为了共产邪党员之后，就一直如此，他们从来不会、也不愿去想个人因素在社会事件中所起的不容忽视的作用。

桂桂端上了黄瓜炒肉片、土豆炖肉块、摊鸡蛋，还有韭菜馅饺子，她能感觉出来，这两个男人高兴哩。

霍达东还是又问了一次烟、酒、肉的来处，李仲海笑笑:“二分队为了庆祝这几件好事，昨天伏击了国民党一个运输队，三十几匹骡子身上驮的全是这东西，省得咱去买了。”

一听是缴获来的东西，霍达东扔下旱烟袋，抓起那条哈德门烟，一下子册开，撕碎了一包烟的烟盒，任凭二十支卷烟撒落炕沿，捏起一支就抽起来，那神态如同几天没吃饭的娃见了摸一样。

李仲海开心地大笑起来

。 霍达东也愉快地笑个没完。

两个人吃光了菜，喝光了酒，意犹未尽，让勤务员牵来两匹马，骑着马钻进山沟沟里去打秋兔子。一直到太阳落山，两个人才两手空空地溜了回来，他们枪法实在太差，不是打猎的好手哩。

于是，他们在见到桂桂时，相互一看，又哈哈大笑起来。倒是小红军跟着两个一无所获的干大采回了一大把黄色的小花，趴到桂桂怀中，一朵一朵地插到她头发上，胸口上，把桂桂打扮得像个花仙子似的。

在中央邪党校学习的日子里，霍达东牢记着李仲海叮嘱他的话:“达东啊，要少说多听，能去那里学习的人，都是出类拔萃的人物哩，藏龙卧虎，不可小视。多听别人说，自己长学问，自己多说，会被别人看成是自高自大，目中无人，说错了，小则闹笑话，大则犯错误

。”

因而，在几百学员中间他总是沉默不语，甚至让人觉得他有些呆头呆脑，是个啥都不懂的农民，不配到中央邪党校来学习哩。对此种议论，他从不争辩，他觉得这改变不了他的个人经历，他承认他懂得不多，全懂了，还来学习干啥。

多少年以后，他又进过一次中央邪党校，这时进中央邪党校的是两类截然不同的人，一种是为了提升而学习理论、方针、政策，一种是犯了错误要降级而来进行思想改造，他属于第二种人。在这次学习中，他更为少言寡语，形同哑巴，难有笑脸，多是抑郁。这倒不是怕言多有失，而是他已经没什么可说的了，他要说的，在一九五九年初秋的暴风雨中已经全都说完了，而在当时他所说所做的则被人认定全是错误的!

第一次进中央邪党校学习的条件远比不上第二次，八个人住一间窑洞，无论什么职位一

律端着饭碗在食堂打小米饭吃，作息完全军事化，绝不容许迟到早退，除了星期天，谁也不准上街，更不准喝酒。

对于过惯了苦日子的霍达东来说，这种生活绝对算不上艰苦，倒是有个别从大城市来的地下邪党员日子一长，就耐不住了，他们身上又有几个钱，于是就溜出去下馆子，有一个人还包了个暗门子娼妇，结果被校方发现，立刻关了禁闭。

霍达东发现，来中央邪党校学习确实长见识哩，他和学员们一同到瓦窑堡听了毛泽东的一个政治报告“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这是他第一次见到了那个他神往已久的从湖南山沟里出来的农民加书生，也是第一次知道了一惯被称为夷人倭寇的日本人不仅占领了东北而且还想占领整个中国，共产邪党将要团结一切人，包括国民党、地主富农等剥削阶级一同去抗击日本人!

他看见毛泽东站在土台子上，穿着灰布棉袄，竟然和他一样瘦高，所不同的是毛泽东留着长发，而他则常常是剃个光头，扎着白羊肚手巾。

他觉得毛泽东确实有股子吸引力，就像源上稀稀拉拉、细细弱弱的小草中耸出一棵白杨，挺拔地迎着风霜雪雨，使小草们自惭形秽。

他听不太懂毛泽东的湖南口音，但他本能地觉得毛泽东讲的都是浅显易懂的道理，那口才绝不比马圆先生差。一想起马圆，他心里就一阵哀伤，不知这个把他引上革命道路的人现在干啥哩。

他坐在后排，没有机会上前去和毛泽东握手相识，否则，他很想请毛泽东去吃一顿羊肉泡摸，看毛泽东一根接一根抽烟的样子，酒量一定也差不了。几年后在延安的窑洞里，他请毛泽东吃羊肉泡摸的愿望终得实现，不过，那时他已经鼓不起和毛泽东称兄道弟的勇气了，而只能像一位忠臣朝拜圣明天子一样诚惶诚恐，毛泽东问啥，他就回答啥，气氛绝不亲热，更谈不上无间。

除了听毛泽东和其他一些领导人讲课使霍达东收益匪浅外，学员们之间的谈话也使他眼界开阔不少，但他依然只是听，而从不显摆自己的意见。

他听到了从江西来的同志谈到了那里杀所谓“AB”团的情况，这才知道刘平被自己人抓起来实在算不得什么耸人听闻之事，有人解释这是革命斗争的残酷所不可避免的误会。后来，他发现这种误会委实太多了，多得有时会让他做噩梦，不知道啥时这种误会会落到他的头上，他实在不愿意被误会一下，他宁肯死在国民党的屠刀下，也不愿被自己人装进麻袋，丢进黄河。

学员中还曾争论过到底是陕北救了中央，还是中央救了陕北的问题。陕北的同志当然认为中央红军无路可去，偶然得知陕北还有一块红色根据地才来落脚;而中央苏区来的同志则严词反对，说这是目无中央的地方主义情绪在作怪。很快，这种争论被制止了，但这种阴影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并未消失，好在霍达东没有发表过任何意见，在后来的岁月，他也就没有因此而受到什么牵连。严格地说，对于这种过分政治化的问题他没有判断力，也可以叫觉悟不高，他只有在面对农民问题的时候，才能显示出他本能的正义和无可抑制的热情。

霍达东在中央邪党校学习的两年期间，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革命形势也在朝着比人们预料的要好得多的方向发展。

先是红军东征，渡过黄河，在中国人民抗日先锋军的旗号下，筹款扩军，根据地发展至黄河边。而后，周恩来和东北军少帅张学良谈判，由毛泽东和张学良分别签署了“抗日救国协定”，东北军停止了向陕甘红军进攻的行动。没过多久，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爆发，周恩来亲赴西安，与蒋介石长谈数次，迫使蒋介石接受了联共抗日的条件。在这之后不到一个月，中共中央进驻了注定在二十世纪将被众多人们向往的古城延安。

这期间，唯一让霍达东感到难以接受的事件是刘平军长在山西攻打阎锡山的军队时中弹阵亡，见到讣告时，他才知道自己一直敬为兄长的刘平实际上小他三岁。

随着讣告的发布，一些小道消息也在陕北籍的学员们中间传播，说刘平军长是背后中弹，显然是被自己人打死的。这种说法以后延续了很多个年头，但始终没有被确认而始终被中央斥为谣言。

霍达东自然不愿相信这种说法，可刘平曾被无故关押甚至准备砍头的事实又使他无法相信所有的“自己人”，在以后的一系列运动发生时，他更是发现“自己人”整起自己人来更为残酷无情，因而，他只能更多地以沉痛来表达自己的心情。不管刘平是怎么死的，终归是死了，死时才三十三岁，这还是可以被称作后生的年龄哩。

霍达东曾单独到刘平的坟墓去过一次，那正是夕阳西下的时候，惨淡的光线使黄土高坡变得更黄，如同整个大地都患了黄疸症，那在背阴处的一块一块不大的庄稼地，似乎是什么人呕吐出来的疸汁，而那稀稀落落好像永远也长不大的榆树，有如瘦细如柴的人举起无力的胳膊在软弱地抗议着什么。

他跪在不大的坟丘子前边，面对着大青石刻的石碑，烧了一堆纸钱，然后硬硬地磕了三个响头。

在他的记忆中，除了儿时给从没见过的亲娘上过坟外，就再没有给任何人上过坟了，连他亲大的坟也没有上过，更别说烧纸磕头了。他知道，他之所以来到刘平坟前，是因为他对这位陕北红军的奠基人有着无限的崇敬和怀念，但更多的，他想他是在寻找一种对自己信念的依托和对过去经历的自我认同，同时还是在寻找一种悲壮感，对于像他这样不善言谈、常处于寂寞状态的汉子，悲壮感是最为贴切的精神面貌。

他慢慢从坟前站了起来，俯视四周，黄昏更为苍凉，几只乌鸦“呱呱”地叫着，飞落于远处的一片坟堆上，那些坟墓中埋着的据说也全是陕北红军战士的尸体，他们中间就一定没有被“自己人”打死的吗?

霍达东实在不愿意再想这个问题。他慢慢走下土坡，来到拴骡子的地方，准备骑着它回到中央邪党校去。可骡子不见了，被哪个贪心的农民悄悄牵走了，他大骂了一句:“狗日的!”当他用了一天多时间回到中央邪党校时，发现人们群情激愤，似乎发生了什么大事，一问，才知道日本军队在北平一个叫芦沟桥的地方向中国发动进攻，国民革命军第二十九军下属的一个团进行了抵抗，抗日战争从此全面开始了。

(24)

陕北汉子霍达东住进延安府的第二天就赶上了日本人的飞机来轰炸。假如他要是听桂桂的话，先回马家沟去看看自己的窑，给亲大、亲娘、后娘去上个坟，也就不会经历这惨烈得令他目瞪口呆的场面了。

从中央邪党校毕业以后，他本来坚决要求调人八路军去直接上前线杀日本鬼子，他虽然没有亲眼见过日本鬼子，可是那些从河东逃难过来的老百姓说那些个头不高、穿着黄军装的日本兵是见人就杀，见女子就强奸，见东西就抢，见房就烧，还说他们煮胎儿、炸人肝下酒

吃，把他们形容得像是魔鬼，气愤之余还有些胆颤心惊，心有余悸。

霍达东同情这些无家可归甚至家破人亡的难民，但内心深处却又鄙视他们，有一次一个挺粗壮的汉子到他那里去乞求给点饭吃时，像个婆姨一样哭哭啼啼地斥说:“俺新娶的媳妇让几十个鬼子生生地给奸死了，俺爹俺娘跑不动路，留在村里，被鬼子连人带房一块烧了，好好的一个家就剩俺一个人了，真没法活啦，给俺点吃食，俺还得逃路，听说鬼子马上就要过河来了。”

霍达东没给这汉子吃的，反而破口大骂:“你真是个反哩!你婆姨让人奸了，亲大亲娘让人杀了，房子让人烧了，你这个狗日的不去报仇，却兔子似地乱跑，天大大白让你长了个毬。你那两只手只会捧着碗吃饭?你不会抡着刀片子去杀鬼子，杀一个你自己够本，杀四个你全家够本，小鬼子有多少人?咱中国人十个换狗日的一条命，中国人还有多，可小日本就变成一个鬼国了!”

那汉子哭丧着脸嘟峨:“俺怕，俺赤手空拳，长着鸡巴是造人，不是杀人的，你挎着盒子枪，你有种，你咋不上前线，连政府的军队都成千上万地往回逃，俺是百姓，有啥法子?”听了这话以后，霍达东就向李仲海打了个报告，坚决要求转入已经被蒋介石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的红军，而且，他点着名要去一一五师。

起初，对于张学良在西安临撞杨贵妃洗澡的地方抓了蒋介石，他简直乐得快疯了，不顾邪党校的纪律，同宿舍的人一块跑出去喝了整整一夜的酒，还准备约上人一块去西安看公审蒋介石并将其斩首示众的场面。然而，周恩来去了西安，不但不杀蒋介石，还劝张学良把他放了，后来，竟然把红军交给了蒋介石政府，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并且接受国民政府的军铜，再也不和国民政府为敌了。霍达东百思不得其解。

邪党校的校长解释说这是为了民族大义，还让大家学习毛泽东在中国共产邪党全国代表会议上作的报告《为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以统一思想。

经过学习，使他多少明白了为啥要联合杀了成千上万共产邪党人的蒋介石，但霍达东还是想去打日本人，他实在受不了那个难民对他挎着盒子枪却不上前线的指责。

不过，李仲海没有批准他去上前线，却把他也调到了延安，让他在陕甘宁边区政府任职，在这之前，李仲海已经在陕甘宁边区政府的人事部门任了职。李仲海认为霍达东根本不会打仗，上了前线只会去送死，他可不愿他死哩，他觉得他做经济工作对邪党更有好处。

结果，霍达东只能去延安，他不是瓜蛋娃了，不能凭意气行事，多年在共产邪党内所受的教育，使他懂得了服从组织纪律的原则，当然，这必须不与他的基本信念发生冲突。

这种安排，使他再没有机会去打日本人，甚至一直到抗日战争胜‘利，他也没有见到过一个日本兵。在他的自传中，他自豪地写着参加了抗日战争的全过程，可有时他会自问，没到前线去放过一枪一炮，是否算打过日本人?他后来的那个当了厅长的婆姨宽慰他:“用不着自责哩，你组织生产、搞活经济，巩固了政权，比亲自打死几个日本鬼子对抗战的贡献更大。”

他几乎不能接受这个观点，若这么说，那么那些在后方种地的农民、做工的工人、教书的先生岂不是都可以说自己参加了伟大的抗战?而如果真是那样，这让那些在抗战前线流血负伤，甚至牺牲了生命的抗战将士如何服气。

这解不开的疑惑被他一直带进坟墓。

霍达东是带着桂桂一块进的延安城，他告诉桂桂日后还要带她进西安城，最终进南京城哩，他坚信共产邪党一定能统治全中国。

桂桂相信丈夫所说的一切。不过，她提出在进延安城之前还是先回老家肤郡、米脂去看看，那里已经归陕甘宁边区政府管辖了，是共产邪党的天下，再也用不着怕被人缉捕哩。

霍达东本来也很想回去看看，他不是为了衣锦还乡，虽然他已经担任了省政府副主席。他仅仅是想看看马家沟的父老乡亲们在共产邪党的领导下是不是比以前过得好了。

然而，他没能回成老家，因为李仲海派人送来急信，让他火速赶到延安府，说是毛泽东同志要会见一下他这个砸反动官府粮库、又很会做生意的陕北汉子，毛泽东很需要一批会敛财治家的人才哩。

听说毛泽东要见他，霍达东当然不敢怠慢，他取消了回老家的安排，自己骑着一匹骡子，让桂桂骑着一头驴，带着自己的警卫兼勤务员，踏上了奔赴延安的路程。

当远远地看到延安宝塔山上的宝塔时，尽管那里正沉甸甸地垂着一块铅佗佗似的乌云，但霍达东还是觉得眼前亮了一下，似乎那座唐代兴建的九层砖塔内有什么宝物在闪烁神光和灵气，使他觉得来到此地颇为吉祥。他不禁又扯开了嗓子，唱起已经许久不唱的信天游:

鸡娃子那个叫来哟狗娃子那个吼，
你当红军的哥哥哟来到了你门口。
没有那个太阳天也光亮亮哟，
再叫再咬那个我还要走。
走得你那个眼睛红来眼泪泪流，
苦得你那个头发白了身骨子瘦。

看看四下里没有人，桂桂也唱起来:

妹妹那个红肚兜兜的哟子贴你胸口，
任你那个亲来哟任你揉，
头发白来得儿身骨子哆瘦，
白生生的大腿哟还让你舍不得走。

两个唱着，走着，走着，唱着，直到了延河边上，看见李仲海身穿灰布棉袄站在那里迎接他们才算住了口。

初冬时节，延河水不再浑浊，而是清澈，浅缓地流淌着，岸两边已经结上了冰，亮晶晶的，在浓烈的乌云下有些暗淡的光芒，两岸的土坡上是一排排窑洞，还有些古刹夹杂其中，使霍达东感到这里委实比肤郡县和偷林府要气派一些。

李仲海拍了拍跳下骡子的霍达东，笑着说:“达东，你有福气哩，一来延安毛择东主席就点着名要见你，很多同志到了延安一两年了，还没实现这个愿望哩。”

霍达东憨憨地笑了一下，他多少能感觉出来能够被毛泽东接见必定有李仲海在其中的努力，仲海真是个好兄弟哩。

“走，我带你去安排你住的窑，明天就去见毛泽东主席，说不定还能见到朱德、周恩来、刘少奇、任弼时、高岗等领导人，到时候拿出点陕北汉子的气魄来，别跟见皇帝似的哆哆嗦嗦，话都说不出哩。”

觉睡得不太安稳，这跟住进了一间陌生的窑洞有关，窑洞在凤凰山脚下，从外面看只是一孔，但里面还掏了个没有窗户的拐窑，似乎是洞中洞，外面摆着一张用桐油刷过的带抽屉的桌子和一把椅子，另有两条长木凳，算是霍达东办公的地方了。拐窑只有一丈见宽，白天晚上都黑漆漆的，有一张木床和一个木柜，是霍达东夫妇休息的地方。

据李仲海说，凤凰山得名于古代曾有凤凰落于此处，见延安府山清水秀，便栖息下来，死后身骨化为两条陡峻的山梁，满山的山丹丹花就是它的彩冠，茂盛的草木就是它的羽毛。霍达东感觉不出这山梁和陕北别的地方的黄土高坡有什么不同，若要说真有什么不同之处的话，那就是共产邪党的中央驻扎在这里。

睡觉前，他站在窑洞门口四下里张望了一会儿，阴沉沉的暮色中，宝塔山上的宝塔模模糊糊地印在空中，而清凉山上的古庙佛寺毫无生气地蹲在半山坡上，延河水似乎也被冻结了似地不再流动，整个延安城缺少一种他本来所想象的繁华和热闹。

他回到窑洞里，早早地睡下了，骑了整整两天骡子，他有点疲劳哩。

桂桂用毛巾蘸着热水给他擦了擦身子，然后躺到他身边，习惯地把他的头放到了她的胸脯上，用一床不算太厚的被子裹住两个人的身子。近年来，桂桂越来越像是他的母亲，而不似婆姨，她宁愿为他做一切事情，而就是不大接受他在床上的亲热，开始，她还强忍住做出些欢娱之情，后来反应就日益冷淡，最近终于露出痛苦的神色。

霍达东认为她老了，一个四十多岁的农村妇女确实再没有什么青春可言，除了因尚没有生育过而使桂桂的肚皮没有出现令人作呕的皱摺而外，她全身再也找不出一处对男性还有些许诱惑的地方了，岁月像风化岩石一样，使桂桂从一个风姿绰约的少女变成了一个再也没有光彩的中年妇女。

她的头发没有了光泽，肌肤也因干枯而发皱，面色失去了红晕，还有因生活的艰辛、忧虑和流离而印染上去的黑黄，本来就不丰满的奶子萎缩了、青拉了，霍达东和她亲热时，再也感觉不到滑润的惬意，只是感到干涩得难受。

他没有嫌弃桂桂，能够枕着桂桂越来越软乎的温暖的胸脯上安静地睡去对于他已经是一种极大的满足了，他可以只靠这一点就和桂桂过一辈子。在他强悍粗犷的外表下，他的从小缺少母爱的内心是太需要母性的庇护和支撑了，在桂桂的胸脯上，他永远是个没有成熟的娃儿。

但刚到延安的这一夜，睡在桂桂的怀抱中，他破天荒地做了梦。他梦见他孤独地走进了没有阳光的地狱，那里的鬼无论男女一律赤身裸体，每个鬼的正面都和世间的人一样，有着面孔、皮肤和肌肉，他们相互谈话，和蔼亲切，他们旁若无人地在任何地方交配，如同一群牲口和禽兽，但他们的背面则是骸镂，千篇一律，千人一面，分不出生前是伟人还是凡人，也分不出生前是贵妇还是娼妓，他们都那么丑恶，但都那么平等，谁也不傲慢和高贵，谁也不卑微和低贱。

他无法知道自己是否也是如此，正面是人，背后是鬼，因为地狱里没有镜子，没有水面，任何人都看不到自己的另一面，据说凡是能看到自己另一面的就会被送回人世间。

地狱中非常平静，没有任何争斗，因为没有产生争斗的理由，鬼不需要吃，用不着占有土地去种庄稼，鬼也不需要穿，用不着占有财产去购买囤集，鬼也不需要占有女子，所有女子都归所有男子，而所有男子也归所有女子，鬼也不需要权力，没有土地、财产、妻妾、国家的占有，自然用不着享有权力。

但他感到了孤独，他天生是个造反者，无反可造的地方对于他是难以忍受的寂寞，他必须要制造事端，要为自己树立起敌人，这样他才会有冲动，才会有力量，才会爆发出创造性，才会感到自己存在的价值。但他又实在找不到如何能煽动鬼在地狱里闹事的理由，于是，他只能孤独地去挖掘地狱，妄图把地狱与人间接通，将人间的美好和丑恶都引进地狱。否则，地狱的生活就毫无意义。当谁也不需要财富、权力和女人的时候，或者说，当财富、权力、女人用之不竭的时候，生活还有什么乐趣而言呢?

他挖着，拼命地挖着，地狱和人世间那厚厚的岩石终于崩塌了，发出惊天动地、接连不断的轰响。他惊恐万分地吼叫了一声，醒了。

醒来的霍达东首先感到的是全身大汗淋漓，继而感到的是黑暗中窑洞在微微摇晃，紧接着听到了雷鸣声不断传来，桂桂抱着他的头一动不动，似乎被什么惊呆了。

“下雨打雷哩。”霍达东不太清醒地说。

“冬日里咋会下雨打雷?像是哪个山梁梁塌下来了。”桂桂松开了霍达东，忙着去抓衣服穿。

霍达东也终于感觉到绝不可能是在打雷，因为不可能无数个雷连在一起，打雷中间总会有间歇的时候，而外面的隆隆雷声此起彼伏，毫不间断。他跳下床，只披上件棉袄，掀开布帘，来到外间窑洞，一把拉开窑洞的门，到了小院里。

天已经亮了，天上依然堆积着乌云，几只和乌云颜色近似的大鸟翅膀一动不动如同苍鹰样接连俯冲下来，随后翅膀左右一抖，掉下一串黑色的蛋，那蛋排着队落到山坡上、延河边、街道里，火光一闪，雷鸣般的声音便轰然响起，地在颤动，窗户纸哗哗直抖，那大鸟又昂着头向天上飞去。

“这是啥东西?”霍达东从来没有见过会下能爆炸的蛋的大鸟，但他知道这绝不是什么好东西。他又跑回窑洞内，从挂在墙上的枪盒子里拔出盒子枪，再次来到院中。

这时，延安城内已经到处喷发着浓烟，燃烧着火光，那几只大鸟又凶神恶煞般冲了下来，因有恃无恐而飞得很低，霍达东看到了大鸟肚子上有一面日本旗，这种旗他早就从一些难民那里得知了。

“狗日的，日本鬼子连鸟都用上了!”他边骂着，边向那大鸟举枪射击，一口气打出了二十发子弹。

那大鸟早已飞过了他的头顶，将又一串黑蛋蛋丢在了宝塔山下的一排窑洞上，那排窑洞立刻成为了一堆泥土瓦砾。

邻院住的人们叫喊起来:“快躲进窑洞，这是日本鬼子的飞机哩!” 霍达东不相信那黑蛋蛋能从半空中砸到他的脑袋上，他始终没有躲进窑洞，一直看着那几只大鸟下完蛋，一石进了云端。

因为这次日本飞机的轰炸，他没能在来延安的第二天见到毛泽东，而毛泽东也就再没有急于会见他，毛泽东的事情多着哩，霍达东很理解这一点。当他终于有机会走进毛泽东的窑洞时，已经是两年之后的事情了。

“霍大哥!”一声清脆的声音在霍达东办公室的门口响了起来，这是他已经负责陕甘宁边区政府财政工作几个月后的一天黄昏。

门被推开了，随着一股暖洋洋的春风，已经十年没有见过面的李秋枫走了进来，这让霍达东颇有点惊喜，他以一种成年男人沉缓、平和但又欣赏的目光打量了一下他一直很有好感的这个美貌女子。

李秋枫绝不故作姿态，还是如十年前那样坦然、天真，还带点浪漫地嘻嘻笑着任凭她的

霍大哥端详着她，绝不羞涩。

青春似乎很钟情于李秋枫，她的面容几乎毫无改变，依然是那样年轻，她那裁剪合适的灰军装裹着的身躯也没有消瘦或臃肿，还是那样洋溢着生命的活力，一根牛皮带扎在她腰间，使她的胸脯更为高耸，皮带上挂着的小手枪增添了她的英武之气。

“秋枫，我知道你会革命下去哩!”霍达东拉过木凳，招呼李秋枫坐下，然后让勤务员倒来一杯热乎乎的茶水。

勤务员放下搪瓷缸子，忍不住说了句:“我看过她演戏，演个千金小姐参加革命。”

李秋枫笑了，问勤务员:“我演得像不像?”

勤务员摸摸脑袋:“像，演千金小姐时像极了，演女战士就不像了。”

霍达东哈哈哈地大笑起来，假装生气地冲勤务员说:“别胡扯，外面喂马去!”

还是个半大孩子的勤务员悻悻地走出去，嘴上还在嘟峨:“演女战士是不像嘛，咱八路军女战士整日里晒太阳，哪有她那么白的，说话也不像，谁整天价喊口号哩。”

“你到剧社去了?”霍达东点燃根香烟抽了起来。

李秋枫从挎包中拿出两条写着洋文的香烟，放到霍达东的办公桌上，说:“这是日本烟，部队的战利品，分给马方的，他让我带给你。”

“马方上前线了?”霍达东又问。

李秋枫点点头:“我和马方离开你们后，就到了刘平同志的红二十六军，还是搞宣传工作，后来整编成八路军，马方在一个独立团当宣传干事，我留在延安抗日剧社搞点行政工作，有时也上台客串个角色，没受过专门训练，是演不像哩。”

“你们都人了邪党?”霍达东急于想知道这个促使一对年轻人离开他们的间题是否已经得到了解决。

李秋枫脸上浮起了一块阴云，目光顿时有些黯淡了，在这一刻，她终于显出了一个成熟女子的抑郁心态，她低声说:“我人了邪党，马方还是批准不下来，说他大是共产邪党杀的，对他要多加考验。”

“已经十年了，还考验不出个结果吗?”霍达东心情一下子也有些沉重了。

李秋枫苦笑了一下:“马方说，他愿意经受一辈子考验，每次一打仗，他就兴奋得整夜睡不着觉，战斗打响后，有机会他就往前冲，他说死是最大的考验。为了人邪党，连命都不要了，这还不能说明他已经彻底信仰共产主义了吗?可有人说死容易，改造思想难哩。”

霍达东沉默了,他确实有点搞不懂像马方这样一个心眼要为共产主义奋斗的人为什么不能加人共产邪党，邪党不是需要扩大队伍吗?对此事，他多少有些内疚，若当年他态度坚决点，说服李仲海同意马方人邪党，也许马方能做更多的工作。几年后马方颇为壮烈地死去之后，这种阴影在他心中更为浓重，这种内疚造成了他日后对李秋枫毫无原则地袒护，他认为只有这样，才能使自己的惭愧多少减轻些。

李秋枫感觉到气氛过于沉闷了，她甩了一下额前的散发，爽朗地笑笑:“不说这事哩，我嫂子呢?我给她带了块花布，也是战利品。”说着，她又从挎包中掏出东西来，一块花洋布，一瓶雪花膏，一双丝袜子。

霍达东回答:“桂桂回娘家去了。这东西还是你留着吧，她都老了，用不上哩。”

“嫂子咋会老呢?怕是你进了城，做了官，看不上糟糠之妻，要弃旧迎新了吧?”李秋枫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我不是不尊重咱们邪党内的一些同志，可我死也看不上他们刚安定下来就急急忙忙换婆姨的事。”

这回轮到霍达东苦笑了，他知道这方面的情况比李秋枫要多得多，对此，他无话可说，也不能说，他是个男人，知道只要不当和尚，就需要女子，而革命又不是去当和尚，就是和尚也有还俗和守不住佛规的哩。当然，对于老家有婆姨，不接来又娶个女学生的人，不论官比他大还是比他小，他都觉得他们是个瓜，鄙视他们哩。

他微微叹口气:“老干部也是人哩。”

李秋枫点点头:“我服气朱德总司令和彭德怀副总司令，听说他们这方面就做得很好。”霍达东与朱德和彭德怀都只有一面之交，但他觉得与他们更容易亲近，后来，他被彭德怀领导过一些日子，再后来，他成为了彭德怀黑线上的人物，但他就如同从来不认为自己是坏人一样也绝不认为彭德怀是坏人。

“等桂桂回来，让她给你包饺子吃。”霍达东终于也绕开了这个不愉快的话题。

“我明天就要带抗日剧社一个演出队上前线去演出了，要是能活着回来，肯定来吃嫂子包的饺子。”李秋枫在说到死时居然也没有任何恐惧和不安。

霍达东心里有点发紧了，他难以相信像李秋枫这样俊俏的女子也会变成一具白骨，他有点冲动，抓住李秋枫柔滑的小手，使劲握着，温情地说:“秋枫，别提死，你死不了，马方也死不了，你们两人是我见过的最般配的一对哩。对了，你们正式办了婚礼没有?要没办，你霍大哥给你们办!”

李秋枫摇摇头:“马方说，等他加人共产邪党那一天再办。”

“好，到那一天我给你们办!在邪党旗下给你们办!”

李秋枫眼中涌出了辛酸的泪水，她情不自禁地伏到了霍达东怀中，深情地叫了一声:“霍大哥。”

就在这时，霍达东的一个部下走了进来，将这一幕收人眼帘。这个从上海来的大学生在霍达东面前一贯唯唯诺诺，小心翼翼，甚至有点卑躬屈膝，他永远把霍达东叫做革命前辈，要一辈子向他学习。然而，就是这个人，在几年后有人指责霍达东有贪污行为时，他站出来又为霍达东加上了一条生活腐败的罪行，证据之一就是霍达东在办公室内与有夫之妇乱搞男女关系。当然，材料中不仅仅是李秋枫伏在霍达东怀中，而是李秋枫躺在长凳上，衣衫解开，裤子半褪，霍达东压在上面……

霍达东的这个部下由于有了这个检举，不但加人了共产邪党，而且还升为处长，在很久以后，又升为主管宣传的官员，霍达东在发生那事以后每次见到他，只会说三个字:“狗日的!”不管是在小型会议上，还是在大庭广众之下，他都是这样叫，一些不是陕西籍的人以为那管宣传的高官名叫苟日地。

桂桂在娘家住了一个多月，终于又回到了延安的凤凰山脚下，但她不是一个人回来的，而是带着个清清秀秀、眼睛不大但却闪动着机灵光芒的女娃。

“凤花，叫哥哩。”桂桂见霍达东走出窑洞来迎她们，推推那女娃。

叫凤花的女娃没有诊下女子的拘谨和羞涩，大大方方、清清脆脆地叫了声:“哥。”

霍达东点点头，认为这肯定是桂桂的什么远房亲戚，想到延安府来见见世面，也就没有更多注意那女娃，而是接过桂桂手中的口袋，那口袋中是红枣和花生，大概还有核桃和柿饼子。　　天黑时，霍达东问桂桂:“咋睡哩，让那凤花睡凳子?”

桂桂垂着头，不敢看霍达东，慑慑懦懦地说:“弟哩，你和凤花睡，我在外面睡凳子。”霍达东一跺脚，板起面孔:“你说啥混话哩，我和凤花睡，那、那不成、成欺负人家乡下女娃了，犯纪律哩!”

桂桂把缩在一边不声不响的凤花打发到窑洞外面去，关好了门，郑重其事地对霍达东说:“弟哩，这事我想了好久，以前生里死里的不安定，说不出口，现在日子过踏实了，这事该抓紧办，否则霍家真的断了香火。”

“你啥意思?”霍达东把油灯捻亮些，借着火点上了根李秋枫送的日本烟。

“我、我和你离，让凤花给你做婆姨，我跟她大、她亲娘都说好了，她自己也愿意哩。”桂桂说这些话时并不艰难，也不犹犹豫豫，显然她已深思熟虑了。

“这不成哩!前几天秋枫妹子来看我，还骂那些刚安定些就不要结发婆姨，又娶年轻女娃的共产邪党的宫，我做不来这事。” 霍达东连连摇头。

“不一样哩，不是你不要我，是我要离。弟，我为啥回娘家?回娘家前我去白求恩医院检查了妇科，大夫说我这辈子再也生不出娃，说是什么地方堵上了。弟哩，我不能害你们霍家，你是独子单传，若是因为我让霍家绝了后，我担不起这个罪过哩。弟，我没求你办过啥大事情，这一次，你就遂我一次心愿吧。”桂桂早就没有了红润的枯黄脸上流淌着几颗大大的泪水，这是她对这痛苦的唯一表现。

“你说的去医院检查是真的?” 霍达东关切地问。

“咋不是真的，我肚子常疼，又总出血，每个月那时候羊拉屎似地完不了事，医生说我有妇科病哩。就是没病，我个四十岁的婆姨，根老枝枯，再开花结果也难哩。”桂桂长长地叹了一口气。

“不，不离，你生不了娃咱也不离，咱领个娃，像仲海一样，他那个小红军长得肥头大耳，可有福相哩。”霍达东说这话时有些心烦意乱，缺少真心实意，更多的倒是无可奈何和自我安慰。

桂桂沉下了脸，抹干了泪水，冷冷地说:“你不离，我就去死，你不能后半辈子都当光棍吧?”

“你，你混哩!”霍达东站起来，困狼一样贴着窑洞四壁走来走去。

桂桂瞪着眼睛望了一会儿外面的黑暗，也站起来，拦住了霍达东的去路，又恢复了往日母亲和姐姐般的温柔，她摸着他胡子拉碴的脸，细声细气地说:“弟哩，姐知道你的心思，你怕人家说你喜新厌旧，你还怕婆姨提出离婚让你丢汉子的脸面。这都不要紧哩，医院的大夫给我出了证明，说我生不了娃儿，有这证明，没人会说你哩。”

霍达东看着桂桂真诚的目光，似乎再没有力量去回绝桂桂的乞求，其实，他内心深处何尝不想有个娃，而他四十岁的身体在生理上又何尝不需要得到正常的、心满意足的欲望享受。

这一切，桂桂都不能给他了，作为女人，桂桂已经结束了她的人生。

“姐，我离不开你哩!”高大的霍达东孩子一样半曲着身子，依偎到桂桂的怀中。

“弟，姐也离不开你哩，咱离了婚，我还住这里，给你们做饭，伺候你们，日后有了娃，给你带着，你就一个心眼给百姓们办事，这我就诊了，我没啥更多的盼头哩。”

霍达东沉默了，这沉默就是他同意的表示，他知道，若是不接受桂桂的安排，那只会是对她更大的伤害。

凤花躺在了以往应该由桂桂躺着的地方，霍达东坐在床边，久久地看着这个比自己小二十多岁的女娃，一根接一根地抽着香烟。他有些犹豫，也有些不知所措。因为毕竟除了桂桂之外，他还没有再接触过任何一个女子。

霍达东是被桂桂赶到这里来的。他让勤务员找了几个农民把小院内原来比狗窝大不了多少的灶房挖深加大，装上了新门窗，里面盘上炕台，成为灶房兼桂桂的住房，桂桂躺在还有些新鲜土味的炕上时，霍达东就蹲在那炕台下，像一只恋着主人的老狗。

在延安结婚的风潮中，他的离婚和结婚手续办得异常顺利，几乎没有任何人指责他，但他还是不像其他人那样兴师动众，没有举行虽不奢华却也热闹的婚礼，他甚至都没有勇气告诉他生死与共的好友李仲海，如同他这样做是件见不得人的事情。

晚上，桂桂做了几盘子菜，不知从哪抱来一瓦罐子酒，还剪了个喜字贴在了窑洞的正中间，不仅没有辛酸，反而很欢喜地为霍达东和凤花举办结婚仪式，并把从娘家回来时带的红枣、花生、栗子撒到床上，取“早立子”、“花着生”的谐音，图个吉祥。

喝干净酒，桂桂回了自己的房，霍达东呆呆地坐了会儿，也跟到桂桂的窑洞，只求着要跟桂桂睡，说是和凤花不习惯。　　桂桂有点生气，板着脸不让他上炕，恼怒地说:“我做不成女子了，睡我边上我看你难过!快回你窑里去，凤花是黄花女娃，你温顺着点。”

“可你难过哩。”

“说混话，只要你高兴，姐就高兴了，姐这辈子就为你活着了。快去，去了姐就会睡得香。”桂桂哄孩子似地哄着霍达东。

霍达东这才重又回到了自己的窑洞，掀开拐窑蓝花花青布帘子，坐到了床沿上。

油灯捻被调到最高位置，一股淡淡的黑烟蛇一样弯弯曲曲地向上升腾，尽管屋角还是灰暗暗的，但床头却还算明亮，因而，凤花的脸和大半截身子都沐浴在这光线中。

霍达东此时才算认真地端详了这个被桂桂领来的新娘，在庄户人家的女子中，她应该算是俊俏的，头发有点自然卷曲，像是杨柳低垂的枝叶，显出不经修饰的妩媚，鹅蛋形的脸上眉眼和鼻子搭配得挺匀称，只是薄薄的嘴皮让人感到她是个口齿伶俐、不会少言寡语的女娃，她身上只剩下一件红布肚兜，那一对奶子既不似桂桂的那样柔软平滑，也不似他曾隐约见过的李秋枫的那样丰满浑圆，而是鱼背一样尖挺结实，有如宝塔山上的宝塔一样耸立，她的皮肤比起桂桂来要白得多，也有弹性得多，似乎她并不常干农活，因而少经风吹日晒。

她静静地躺着，双眼半合半闭，似乎在期待什么，又似乎要抗拒什么，但她绝没有一般女娃在此时的茫然、紧张和不知所措，显然桂桂已经详细地告知了她此时的常识。

看着她的奶子在每一次呼吸时都会半露于红布兜兜之外，霍达东终于感觉到身体的某个部位在热腾腾地勃发了，好似蒸笼里的摸，因火焰的烧烤而扩展剧胀起来。

他扔下烟头，站起身，迅速地脱去了全身的衣服，大山一样地压了下去。到此刻，他才想起已经有几个月没有过这种事情了。

凤花一定尖叫了一声，甚至还推了他一下，但他毫无感觉，只是想尽力深人到一个陌生的领域，而这领域又似曾相识，如同他爬上一座从没有到过的源，这里对他是新奇的，而这新奇之中，他又会感到这源和他上过的无数座源没有啥本质的不同。

凤花不再尖叫，也不再抗拒，而是睁大了眼睛看着他，似乎要从中看出些什么人生的奥秘，霍达东在最后爆发的一刹那间，觉得这新娶的婆姨是个不安分的女子哩。

霍达东疲惫下来，他习惯地去含住凤花高耸的奶子上那颗小得不可思议的嫣红颗粒，然后把脸枕到上面。

凤花吃吃地嬉笑，绝不像桂桂那样安详地、温柔地搂住他，让他入睡。她拿起他的手，让他去揉摸另一只奶子，要感觉那从未经历过的欢悦，而霍达东却对此并不感兴趣，他一点不觉得奶子好玩，他在婆姨的胸脯上，只是想感受母亲的宽厚和养育之恩，只是要枕在那里宁静地进人梦乡。

凤花绝不可能揣摸出这个比她大二十多岁的丈夫的心思，更不可能知道他睡觉的习惯，她青春荡漾的身体和刚刚品尝到的以往从没有过的愉悦感觉使她很想再认真地经历一次，但霍达东已不是年轻后生了，他没有了那份力气了，而且，他也已经多少懂得要爱护身体的道理了。　　他躺下身子，把手从凤花的奶子上挪开，摸着了烟和打火机，抽上了一根，然后问:“你咋愿意嫁给我哩?”

凤花也停止了嬉闹，小声说:“我不想在山沟沟里过一辈子，我想出来上学，参加革命，桂姨说你是大官，嫁给你就能上学，能参加革命，我咋会不愿意。”

霍达东一愣:“你管桂桂叫姨? 那不是乱了辈份?”

“嫁你就改叫她姐哩，叫你哥。”凤花一点不觉得有啥不好意思。

“桂桂没告诉你她是我婆姨?”

“说了，可她生不出娃，要和你散伙哩，不散也没啥，我们那里的大户人家和以前的当官的常娶几个婆姨。”

“你识字不?”

“上过三年私塾，识哩。”

“后来咋不上了?”

“我大不让上，说女娃日后嫁人，跟着丈夫过，识字没用。”

“你大干啥?”

“开店的，后来遭了火灾，败了家。”

霍达东点点头:“行哩，明日送你去八路军卫生学校去上学，日后当个大夫。”

凤花很是高兴，把头钻进霍达东怀里，身子挤来挤去地撒着欢，她这绝不是浪荡女子的挑逗，而是天真少女的兴奋，她委实还没有真正成熟哩。

霍达东睡得不香，身边有个女子，却不能舒适地枕到她奶子上去睡，他觉得很不习惯，他又翻到凤花身上，他只是想使自己尽快精疲力竭，好早些人睡，而凤花却终于从中体验到了一个女子的真正的愉快所在，她如同刚刚苏醒过来的蛇一样死死地缠住霍达东，似乎要整个吞食下他。

霍达东使她获得了满足，她带着一种欣喜头一歪就沉沉地睡去，把霍达东放在了一边。在辗转反复了一袋烟的工夫之后，霍达东终于下了床，钻到桂桂的窑洞中，不管桂桂如何拒绝，还是睡在了桂桂温温软软的胸脯上。

桂桂叹了口气:“这是最后一次，凤花是你婆姨哩。”

霍达东含混不清地嘟浓了句什么，很快就睡去了。后来，他还有过许多次睡不着的时候，这时就习惯地到桂桂这里来享受他的最后一次，尽管桂桂的奶子已经皱巴巴的像个空荡荡的布袋子，由于缺少脂肪和肌肉而使胸脯上袒露出一条条肋骨，但他枕在上面依然能感受到温馨、舒适和安宁。枕在那上面，他就久久地不愿醒来，而一旦醒来，又会觉得像被注人了无穷力量一样使他精神昂奋，精力充沛。

像故乡的树离不开那干旱的黄土地一样，他注定这一生也离不开桂桂的胸脯了。

李仲海得知霍达东与桂桂离了婚又娶了个十六岁的女娃凤花后，勃然大怒，气冲冲来到了霍达东办公兼住宿的小院子里，不顾一个戴眼镜的后生正在汇报边区财政困难，必须要加大税收的情况，指着霍达东的鼻子质问:“霍达东你的良心让狗吃啦?”

霍达东不明就里地看了李仲海一眼，冲那后生说了句:“不能加税，回去再想办法!”然后打发走了他。

凤花已经去了卫生学校，在灶房里正蒸摸的桂桂闻声赶过来，给李仲海倒水沏茶，还搬了座位，笑着说:“仲海，你现在是政府的大官哩，生娃有啥不是，也用不着打雷似地吼，他都听你的话哩。”

李仲海一怔:“你还替这个反说话?桂桂，跟我走，他不要你了，我要!我娶你，养你一辈子!咱不能让马家沟的乡亲指着咱脊梁骨骂祖宗八辈，说咱一朝为官，就学狗日的陈世美不认结发婆姨!”

霍达东知道李仲海为啥跑来骂他个狗血喷头了，可他又无言以对，他心里确实愧得慌，很不自在，尤其在至今未娶的李仲海面前，他更是觉得犯了啥罪过似的，他闷下头，使劲抽着烟。

倒是桂桂显得很坦然、大度，她擦擦额头的汗，有点抱怨地说:“仲海，你说啥混话哩?是我提出来和生娃离婚的，大夫说我再不能生娃，我不能看着霍家绝了后，那新婆姨凤花也是我给找来的，生娃没过错，这要不和政府的规矩，你就骂我是了。”

李仲海没想到会是这么一回事，他一下哑口无言了，但喘了口气后，他又说:“保险是霍达东这狗日的逼你这么做的?”

桂桂摇摇头:“仲海，你看扁了人哩，我和他过了二十年，他啥时候逼过我?”

“那就是他嫌你老了，不爱你了!”

桂桂脸居然红了一下:“啥爱不爱的，酸溜溜让人难过哩，咱和生娃就像勺子和锅，谁也离不开谁。”

“那还离啥婚?”

“仲海，你没有过婆姨，你不懂，等你找了婆姨，尝了女人的滋味你才懂哩。”

“甭管咋说，霍达东这狗日的没情义，你这后半辈子咋办?”

霍达东终于跳了起来:“咋办?跟着我，我霍达东有一口饭吃，绝不给她半口，我霍达东有一件衣服，绝不让她光着身子，我霍达东日后有了娃，也叫她亲娘!”

李仲海鄙夷地斜了霍达东一眼:“你还有脸说话，这算啥?大老婆、小老婆?咱共产邪党实行一夫一妻哩!桂桂，跟我走，去我那住，小红军天天念叨你这干娘哩，我让他认你做亲娘!” 桂桂突然泪流满面了，她抽泣着说:“仲海，你、你咋这么说我?我在政府办了手续，不再是生娃的婆姨，我当他姐，当他丫头，当他的老妈子，伺候他，照料他，我情愿!你大老婆小老婆的，不把我当人，仲海，别人说我，我不难过，你不该哩……”

霍达东见不得桂桂哭，他急了，当胸给了李仲海一拳头，打得矮他多半头的李仲海倒退几步，撞到墙上，他骂着:“李钟海，你才是个反，你敢来欺负桂桂，有种，你去找大官，去骂他们扔了大婆姨，娶二婆姨、三婆姨!你别在我这做好人，接桂桂走去伺候你，做梦去吧!我再娶几个婆姨桂桂都会在我身边，这叫相依为命，生死同舟，你懂吗?这不是你那小资产阶级的粘粘乎乎，这是、这是、这是开荒地，我开出的荒，至死也不会让别人种哩!”

李仲海居然笑了起来，笑得桂桂也止住了哭，霍达东止住了骂，有点不安地看着他，怀疑他是不是犯了疯病。

笑了一阵子，李仲海说:“好哩，好哩!离婚不离家，舍夫妻名分却不舍人，真是千载一绝，古今奇谈，你们愿意，我骂你们干啥。”但他又沉下脸，长叹一声，“可你们真能这样过下去?那新来的婆姨不吃醋?”

桂桂脸完全红了，她摇摇头:“吃醋，生娃夜夜和她睡，他们是夫妻，我老都老了，做不成那事，有啥醋好吃，日后我就做饭、带孩子，只要天天能看着生娃好好活着，就是祖上积下的阴德哩。”

李仲海再一次长叹一声，他承认，他远远不理解女人的心思和胸怀，于是，他又想起了自己始终印在心头的李秋枫，他一直盼望着有朝一日能与她生活在一起，这是他永远的梦。可是，若李秋枫也像桂桂这样，终身厮守着她所委身的第一个男人，那他还会有希望吗?

这是他人生中唯一的希望，唯一的梦，若放弃了这希望，泯灭了这梦，他将再没有什么活于世上的意义，革命、共产主义是千百万人的事业，没有他，革命、共产主义照样可以进

行，可以成功，而李秋枫则是纯粹他个人的向往，除了他自己，没有任何人能够帮助他完成与她结合的美丽理想，因而，作为个体，这才是他人生的实质。

他已经十年没有见到李秋枫了，他宁愿再等十年，而实际上，他也确实又等了十年，十年后，奇迹终于发生了。

(25)

陕北汉子霍达东第一次走进毛泽东住的窑洞时，绝没有胆颤心惊，也没有受宠若惊，他只是有一点微微的激动，更多的是好奇，或者叫做稀罕。毛泽东点着名要见他哩。

毛泽东见他的理由是让他这个管陕甘宁边区政府吃饭穿衣的人想点办法，因为有人反映吃不饱肚子，穿不上衣服了。

霍达东当然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国民革命政府，也就是蒋委员长是按照一个军的人马拨来粮铜，地方政府的经费则在地方税中解决，而实际上共产邪党手中的人马早就不只是三万人，地方政府的官员也不是百十号人，更别提云集到延安的数万名学生和中共中央机关的人，粮炯养不起军队，税收养不起政府。

为了防止共产邪党扩充人马，以免养虎为患，蒋介石对陕甘宁边区进行了经济封锁，使本来就拮据的边区经济更为捉襟见肘。个别士兵开始去偷老百姓家的鸡和地里的庄稼，有些学生嫌边区条件艰苦又跑到西安去了。

霍达东反对加重边区农民的税赋，按他的原则，共产邪党根本就不能从农民头上去收粮纳税，可他来到延安时，那些税赋已经在实行，他无法取缔，可无论谁向他建议增收税赋，他要不是冷冷拒绝，就是破口大骂:“农民是你大，你敢吸你大的血?良心让狗吃了!”

不过，下面县里和乡镇的政府并不把他的鸡毛当令箭，他们打着支援抗日前线的旗号，自行设立一些税赋，强令农民缴纳，否则就当破坏抗日处理，一些农民对边区政府产生了强烈的反感。

霍达东参加了一次在凤凰山下边区政府的大礼堂举行的县乡两级干部会议，一个乡长正在台上唾沫乱飞地介绍如何利用各种办法超额完成税收和军粮任务时，忽然外面暴雨袭来，电闪雷鸣，只见一团火球砸穿屋顶，在屋内转了半圈，直冲那乡长飞去，当场把他劈死在了讲台之上，半边身子被烧得黑乎乎的，而离他只有半尺多远的霍达东则安然无恙，他甚至没有受到惊吓，嘴里叼着的半截香烟都没有掉落下来，他没做亏心事，不怕鬼叫门，不怕天打五雷轰哩。　　这事在百姓们中间传得沸沸扬扬:

“老天报应哩，期负农民的乡长让雷给劈死了，他刚说到要再收五万斤粮，那一团火就像长了眼似地钻进他嘴巴中。”

“这是警告，压榨庄户人家准不得好死!”

“听说政府管钱、管粮、管收税的肤郡汉子当年就是砸官府粮库出身的土匪，咋不见他出来给百姓们说句公道话?”

这些流言后来一律被当成谣言，谁再说就由公安局抓去坐牢。不过，还是有个叫李鼎铭的先生站出来，向共产邪党进了一言:精兵简政。这位敢于仗义执言的乡绅立即名声大噪，成为百姓们心中的英雄。

面对这种经济局面，霍达东颇有点力不从心之感，尽管他想出了个主意，但又不知能否行得通，他曾找李仲海商量过，李仲海摇摇头，说:“怕不行哩。”于是，他也就不再深想。正好，毛泽东召见了他。

毛泽东是走出窑洞门口来迎接霍达东的，毛泽东握住霍达东的手，用一口很浓的湖南话笑着说:“他们向我介绍，说你和我一样子高，一样子瘦，果然不错嘛。我看，我们还有一点共同之处，你是陕北的匪，我是湖南的匪，都是造地主老财的反起家的。”

霍达东笑了，感觉到毛泽东和他之间的距离正在消失。

进了窑洞之后，霍达东发现毛泽东的生活条件比他强不到哪去，同样只有一张办公桌，墙上挂着幅发黄的地图,所不同的是待客用的不是长条凳,而是几张木沙发,但也陈旧不堪,抽漆脱落，大概是从哪家土财主那里搬来的，一个小门通到里边的拐窑，那肯定是毛泽东的卧室。

霍达东坐到了木沙发上，准备接受毛泽东关于边区政府财政问题的提问，他昨天夜里已经准备了不少材料，尤其是各种数字都牢牢记在了脑中。

毛泽东递给他一支香烟，然后自己先抽起来，好一会儿并没有开口问什么，霍达东借这机会，悄悄地打量了一下这个已经被一个陕北农民用信天游歌颂为人民大救星的湖南汉子。这是他第一次和这个注定有朝一日要成为一国之君的人挨得这样近，甚至能听到他的呼吸，闻到他身上烟、汗、辣椒混杂于一起的味道。

毛泽东的头发很长，一副落拓不羁的样子，眼睛虽大，却并不炯炯有神，那目光因过多地观察事物而有些像烟雾一样混浊了，最引人注目的是他下巴上那颗痞子，这痞子使他显得与众不同，他抽烟的动作很大，抽得很用力气，似乎只有这样，才能充分地品味到烟对于一个男人的魅力。

霍达东不是艺术家，他再也看不出毛泽东身上还有什么更多的人们常议论的帝王之相，就连那身灰布制服都那样普通。他倒是感到毛泽东在沉默之时也有一种与他很近似的孤独和寂寞感，这种孤独和寂寞的产生是因为内心世界的纷杂而不被人理解所致，莫非毛泽东和他一样也在某些地方有抑郁之情?准确地说，和他一样缺少母爱。

毛泽东扔下烟头，又不慌不忙地接上一支，根本不顾及霍达东在思虑什么，开口问:“达东同志，你是陕北人，你对延安有么子了解?”

没等霍达东回答，毛泽东自己就说了起来:“这里是中国人的发源地哟，咱们的祖先就在这一带茹毛饮血，中山先生诗云:中华开国五千年，神州轩辕自古传。创造指南车，平定蚩尤乱。世界文明，唯有我先。黄帝陵你去看过没有? 到那里要三叩九拜哟。黄帝这个人了不起，又能治理国家，还懂养生之道，你读过<黄帝内经》没有? 那是后人胡诌的。不过黄帝升天是真的，凡是人都要升天，让你下地狱你干不干?我看是不干。”

霍达东不知道毛泽东说这一番话是什么意思，但他不能不听，听得不着边际，从中悟不出什么来，不像马圆先生给他讲的道理那么浅显而亲近。

毛泽东终于转回头来，点上他的第三支烟，笑笑说:“你叫达东，我叫泽东，只达而不泽则东枯矣，你是农民的儿子，我也是农民的儿子，中国农民最伟大，可也最卑微，中国农

民最聪明，可也最愚蠢，任何事物都有两个方面，用其优而去其劣就能成功。我听说你不让给农民加重税赋，这好得很嘛。水可载舟，亦可覆舟，农民能让咱们登峰造极，也能让咱们万劫不复，农民得罪不得哟。你说说，你有么子办法让咱们边区几十万人马不喝西北风?”

霍达东忽然觉得他一夜没睡准备的材料全都没有用了，而这时他也才明白，毛泽东之所以海阔天空地谈论一番，就是不想听那些枯燥无味的数字，显然毛泽东是个很实际的人，他只需要结论，不大喜欢过程。

霍达东也点上了他进这窑洞的第五根香烟，尽量轻松地说:“兵太多，官也太多，就是把农民种的粮全收上来，也解决不了根本问题，精兵简政是条出路……”

毛泽东一挥手:“书生之见，其心虽诚，却无助于我，可敬可尊，不能照办，兵不能减，这是咱们的老本，没这老本，蒋介石就可以为所欲为，有这老本，蒋委员长就得敬我一声毛先生，官可以减，把他们减到华北一带，再带出更多的兵来，我是韩信点兵，多多益善。”

霍达东见毛泽东停了嘴，赶快又说:“不减兵就要增田，几十万人马练兵之余，开出些田来，也能养活些人哩。”

毛泽东的神情专注了些:“你是说学曹孟德屯垦戍边?”

霍达东听过些戏，还算知道曹孟德是何许人，他点点头:“但不是光种小米。种小米只能解决吃饱肚子的问题，可穿衣、药品、武器光靠这点小米是换不来的，我是说要种点值钱的东西。”

“好，好得很，看来找你霍达东是找对了人，你能达东嘛，达到我毛择东的心眼里来了。好，你赶快写个计划来，两天，不，明天就直接送给我，边区活得下去活不下去就看你霍达东唆。莫嫌累，这延安府曾有个知州叫范仲淹，是个大文豪，他曾说过人要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你霍达东就来个先苦后甜吧，让堂客骂你两句算了!”

“现在男女平等了，男人不欺负女人，堂客也不能骂丈夫呀!”随着话音，一个穿着利索的年轻女子推门走了进来。

霍达东知道，这保险是毛泽东的婆姨，在延安上层社会被议论得很多的上海来的女戏子江青。

不过，当霍达东第一眼看到江青时，觉得并不像人们说的那样俊俏，也不像人们说的那样风骚，她穿着很朴素的灰制服，留着短发，高挑的身材，但不瘦，有点像李秋枫，脸庞白白的，眉毛挺浓，眼睛挺大，若走在延安街上，和大城市来的女学生们没啥两样哩。

见到江青，毛泽东咄咄逼人的神情和口吻消失了一些，笑笑说:“我们家是男女平等的典范，我们是和平共处，各掌半边天下。”

“这可是主席的指示，女子也是半边天了。”江青半开着玩笑，显示出对毛泽东既尊重又亲切的神态。

霍达东站起来，他觉得该走了，再待下去会让人家夫妻讨嫌哩。他很羡慕毛泽东的家庭气氛，他和凤花可没有这种亲昵欢乐的时候，凤花在他面前总像个孩子，无忧无虑，但却丝毫不能理解他的心思和关注他的生活，一切都以她高兴了算，就是夜间在床上，也是以她的需要为准，根本不管他是否有情绪。

毛泽东见霍达东要走，没有挽留他，只是说:“宋代龙图阁大学士苏轼曾赋诗:闻说将军

取乞银，将军旗鼓捷如神，应知无定河边柳，得共江南雪絮春。我也要向你这个穷财神乞银哟。宋代沈括在延州发现了石油，你霍达东在延安也来点发明创造，日后青史留名。”

霍达东终于把进窑洞时与毛泽东消除了的距离感重又建立起来了，他觉得自己跟毛泽东根本不可能平起平坐，甚至不可能对等交流。毛泽东像大海，他只能是一条小溪，毛泽东是兽中之王，他只能是条狼，毛泽东是参天大树，他只能是棵小草，毛泽东是太阳，他只能是颗星星，假如有朝一日毛泽东执掌了天下，他只能俯首称臣。他原来想跟同样是农民出身的毛泽东称兄道弟的念头一瞬间就无影无踪了。

霍达东带着边区政府警卫团一个班的士兵，策马向黄河边疾驰，黄土路上一阵阵尘土飞扬，像是在刮着一阵旋风。他是在执行毛泽东的命令，追回准备东渡黄河的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的一支部队。

昨天晚上在毛泽东的窑洞里他吃上了由江青亲手烧的、毛泽东最喜欢吃的红烧肉，其实他也喜欢吃红烧肉，但他在昨晚绝对没有吃出什么香味来。

从他第二次走进毛泽东的窑洞之后，他就没有第一次那么自在和随意了。他把那用了一夜工夫拟好的报告呈交到毛泽东手中后，毛泽东似乎只扫了一眼，就从笔筒中抽出一根毛笔，在上面批了字。

报告其实写得极为简单，一共只有三段，第一段是说明边区政府财政困难，经济紧张;第二段是说明不能加大税赋，压榨农民;第三段是说动用军队开荒造田，种植粮食及经济作物。关于经济作物的内容附于另外一张纸上。这种经济作物就是陕北特有的那种既能治病，又能提神的中草药，霍达东儿时就和大一块种过，后来为开商号又贩卖过，还险些送了命。

毛泽东批在报告上的龙飞凤舞的字也很简单:边区政府无谁都可，不可没有霍达东，他出了个养活边区政府的好主意!

批完字后，毛泽东叫来机要秘书，说:“你去查查，张胡子的人马走了多远?”

没有抽完一根烟，机要秘书就回来报告:“主席，张达同志的部队已经抵达黄河岸边，正在筹集船只，准备东渡。”

毛择东点点头:“张胡子当过工人，又带兵打过仗，现在叫他回来种地，工农兵系于他一身，可是个全才哄。达东同志，你干脆好人做到底，捉张胡子回来的事也交给你办，我看你的胡子比他的胡子硬，你准能让他乖乖地跟在你屁股后面回来去抡锄头。日本人有的是机会打，八路军开荒种地可是妹息坐轿，头一遭，张胡子要出大名哟。”

霍达东马上站起来:“主席，我连夜出发，明天晚上就能赶到黄河边。”

“莫急，莫急，今天我要用湖南菜来招待你这个陕北汉子，你出了这么好的主意，我连客都不请一下，人家说我毛泽东小气哩。我知道张胡子，一时半会儿过不了黄河，他是个守财奴，坛坛罐罐舍不得扔，不折腾个三五天，上不了船。”毛泽东有些兴奋了。

听到请客吃饭，毛泽东的保姆把菜和酒摆了上来，菜是红烧肉、清炖鱼、肉片萝卜条、炒青菜，每个菜中都毫无例外地放着辣椒，另外毛泽东面前还专门有一小碟红得可爱的油辣椒。　　“来，喝点酒，这是恩来同志给我送来的杜康。何以解优，唯有杜康。”毛泽东端起酒杯，一饮而尽。

霍达东也连忙喝了个一干二净。

江青给霍达东又倒满了酒，可是给毛泽东只倒了半杯，毛泽东脸一沉:“你就是让陕北同志看不起我。”

江青并不惧怕毛泽东的恼怒，温和地笑笑说:“你吃辣椒行，陕北的同志比不上你这个湖南同志。”

霍达东心里哼了一声，他把四碟菜中几乎所有的辣椒都吃到自己肚子中。

远远地，黄河水的奔腾喧闹之声就像旱天雷一样滚滚而来，也有如一个巨大的碾盘在转动，使大地微微震颤。

霍达东在听到黄河之声后，经过了三道岗哨盘查，才算到了设在黄河陡岸上几间废弃庙宇中的八路军某旅的临时旅部。站在那坍塌了的山门石阶上向下一望，只见黄河泥汤般的浊流粘稠地向下倾泻，几只皮筏子搏击于惊涛孩浪之中，几十只木船集结于岸边，还有些船只正被纤夫光着半截身子从下游拉了上来。暮色之中，一团团篝火初燃，穿着灰布军装的八路军战士们正绵延几里地在岸边活动着，一块突出的土台子上，文工团正在演唱着《黄河大合唱》，那壮烈、激昂的歌声与黄河之水融于一处，在起伏的河面上回荡。

“霍同志，张旅长请你进去。”一个参谋模样的人对正看得人神的霍达东说。

霍达东收回目光，走进了庙宇，在供着一座河神的大殿中，他看见了正在训斥几个部下的旅长张达。

“五天了，你们连五十条船都没有给老子搞到手，这像是要去打小日本吗?别跟我抱怨老百姓不配合，别说是河东的国民党军队不放船，你们手里的家伙是吹火筒?打日本还有什么道理讲?再给你们两天，若还搞不到五十条船，就提着脑袋来见我!”张达怒气冲冲，大概浑身发热，解下腰间的皮带抡了一下，铜头刚好打在河神身上，弹回来碰到了他自己的手，气得他又骂了句:“日他娘，泥胎也跟我过不去，把这家伙给我扔河里去，共产邪党不搞迷信!”

霍达东想笑，但他忍住了。他认真看了一下张达的胡子，想知道它是不是比自己的胡子软，毛泽东曾这么说过，他不知道毛泽东的根据是啥。

张达端起香案上的碗，喝了一大口不知是酒还是水的液体，好像把火气压了下去，这才转过身来，冲霍达东问:“你找我? 我好像在哪见过你? 对了，我找你要五万块大洋，你只给了一万块，小气鬼!”

霍达东很记得那次张达拔出手枪来要毙了他的情景，他说毙他十次也只有一万块，张达倒收起枪来夸他是条汉子。

“是不是不好意思，又给我追加军晌来了?”张达把香案上的碗递过来，一股浓烈的酒味冲鼻而人。　　霍达东确实有些渴了，他没有推辞，一仰头，将大半碗显然是浓度很高的高粱酒一饮而尽，抹抹嘴角说:“张旅长，我是请你打道回府哩。”

张达愣了一下:“中央要开紧急会议?蒋介石又要么子花招?”

“不哩，是要你带着整个旅执行新的任务。”

“么子任务，打西安，还是攻四川?”张达很感兴趣地问。

“不打仗，去种地，到延安外面一个叫南泥湾的地方去种地，彻底解决边区财政困难的问题。”霍达东直截了当地说了出来。

张达伸手去摸了摸霍达东的脑门子:“霍同志，你发烧了吧，怎么满嘴混话，让我张胡子去种地?小日本会笑得睡不着觉!”

“这是真的。”霍达东拨开了张达的胳膊。

张达眯起了眼睛，上上下下地打量着霍达东，然后摸出手枪拍在香案上，吼了一声:“你向老子谎报军情，拉出去毙了!”

“这是毛泽东主席的命令，他点将点到你头上，说你做过工，打过仗，再种种地，就成了全才!”霍达东并不畏惧张达的威慑，不紧不慢地说。

“毛主席让我去种地，这、这搞错了吧?林彪打完了平型关，咱八路军再没啥大动作，我张胡子这次东渡，要打下居墉关，直逼北平城，我、我会去种地……”张达对毛泽东三个字显然有几分敬畏，口气不再强硬了。

沉默了片刻，张达一把抓住霍达东的衣襟，恶狠狠地说:“毛主席怎么不发密电来?”

霍达东笑笑:“毛主席怕你不信密电，强行东渡，所以让我随你一同返回延安。”

“娘的，你是管钱粮的财神爷，种地的鬼主意准是你出的。唉，你这是害我呀，日后谁还称我是打仗的将军，我成了种庄稼的将军!”张达的脸沮丧起来。

一个参谋急匆匆走进来，递给张达一份电报，小声说:“军委急电，让你率全旅随霍达东同志火速返回延安。”

张达长叹一声，一屁股坐在了神完上，无可奈何地嘟味着:“这回我张胡子的名声算完蛋哄。”

霍达东想起毛泽东说的张胡子要出大名的话，终于忍不住笑了起来。不过，此时他绝没有想到，毛泽东那半开玩笑的预言居然应验了，八路军在南泥湾开荒种地的事迹不但在中国流传了几十年，一首歌颂这事迹的《南泥湾》的歌被一个叫郭兰英的女子唱得家喻户晓。而且张达确实成了种地将军，解放后带着人到处开荒种地，他打仗的事没人知道，说起他种地来人人皆知。

霍达东浑身酸疼地躺在床上，让风花给他捶腿、捏肩、揉腰，凤花干了一会儿就不高兴了:“我是来革命的，来学习的，又不是给你当丫环的，让你的娘伺候你吧。”凤花指了指隔壁灶房，那是桂桂住的地方，然后跳下床去，真的借着油灯去看起课本来，对于学习，她确实还是很认真的。

霍达东只好自己懒洋洋地躺着，他不愿意再去劳累桂桂，桂桂纺了一整天线线，一个人完成了她自己和凤花两个人的任务，还要做饭，也够累了。

本来，他不必把自己弄得腰酸胳膊疼，作为一个农民，开荒种地是他天生就会的事，在马家沟，他一个人伺候过十几亩旱地、水田，也从没有感到累过。不过，这次不同了，没有骡子拉犁，全凭手中一把锄头去开生地，而且下达的指标是一天一亩，这样的活儿他以往从没有干过。

他不能不带头干，因为开荒种地的主意几乎可以说是他出的，当然命令是毛泽东发布的，因而他一开口就给自己定了开荒十亩的任务，据说毛泽东也定了开荒任务哩。而不能去开荒的老弱病残则每人分配了纺线线的任务，凡是完不成任务的，一律不给饭吃。

若像当农民时那样干会儿歇会儿，晌午回家睡大觉，也不可能把霍达东累得像死狗一样躺到床上就不想动弹，关键是不知谁展开了大竞赛，看谁一天开荒开得多。那些农民出身的战士、干部自不必说，一个个拿出了看家的本领，像牛一样使着全身气力去干，而大城市来的学生们居然也鸡吃食一样不停地起伏身子，似乎绝不愿落在后面，好像只要开荒开得多，就说明思想改造得好。

面对这种情况，霍达东当然不能像在马家沟种自己家的田一样不紧不慢地干了，第一天，他就开出了一亩一分荒地，成为了边区政府中的第一名，难怪他腰酸肩胀胳膊疼了。

实际上，他开出的荒地绝不止一亩一分，因为他还帮着也去参加开荒的李仲海挖出了有半亩之多。李仲海虽然也是农民的儿子，但他很小就离开农村去城里上学，早已荒疏了种田的本领，甚至连基本常识都快忘光了，若不是霍达东帮他的忙，他保险完不成任务，面子上难看哩。

霍达东嘲弄着他:“仲海，你算个毬农民，握锄头那样子像是婆姨抓着扫帚把子打娃，舍不得用劲，也没劲可用。说起种地来你真是废了!”

李仲海累得气喘吁吁，手上的血泡染红了粗糙的锄头把子，他光着已经发胖而肉乎乎的上半截身子，苦笑着说:“谁知道革命还要种地?也只有你这从里到外都是黄土捏的庄稼汉才能想出这鬼主意来。”

“不想这与意，天上能掉肉饼下来?饿都饿死，冻都冻死，还革啥命哩，先让天大大把咱的命割了。”

李仲海感激地说:“亏了你哩。”

“说这酸话干啥，我是当农民的命，日后革命成功了，还是去当农民!”

“给你一万农民管着，当个集体农庄的庄主!”

“那我不成了山大王?”

“赤色山大王!”

两个童年好友、革命战友哈哈大笑起来。

第二天，南泥湾的开荒战场的简报上登出了一首信天游:

山丹丹那个花开哟红又红，
开荒竞赛得儿中出哟英雄，
一天开出了那一亩半地来，
气得那个老牛哟嗬瞪眼睛。
这个英雄哟那个当过匪，
他个名字得儿叫霍达东，
能文能武那个是好汉得儿哟，
一心想着那个哟闹革命!

写这首信天游词的人是马方，而这时，霍达东才注意到马方所在的那个部队也回来参加大生产运动了，而且还发现马方写了不少信天游的新词流传于延安。他叹了口气，心里暗自说道:“他终究是个书生哩，咋非要去拼刺刀撞枪子?”

以霍达东练过武术的站桩根基，他就是被人猛推一掌，也不太可能挪动半步、摇晃身子，但是，从黄河岸边跃上一条不大的木船时，那拍击岸壁的浪摇晃的木船就让他前仰后翻，头昏眼花，若不是警卫连长手疾眼快地一把抱住他，他肯定会掉进黄水中。

他不怕马家沟水坝里那可以没顶的一池清水，也不怕肤郡城边上护城河里缓缓流淌的冰水，但他畏惧汹涌奔腾、粘稠如小米粥般的黄河水，他觉得只要一到黄河之中，就会被融于其中，成为一朵微不足道的浪花。他是土命，这黄河中流淌的是水，而这水中又有太多太多黄土，这是无数土命之人的尸骨汇聚成的中华大地的血肉之流。

但是，他不能不过黄河，他向毛泽东出的主意使南泥湾沉睡了千百年的土地苏醒了过来，而那苏醒过来的土地所唤发的旺盛的生命力则使播撒下的种子开出繁茂的鲜花，结出了丰硕的果实。他必须将这些经过初加工的果实运过黄河，卖到很有市场的山西、河北一带，换成布匹、药品和现金，再运回延安。

经查，河东国民党驻军是由晋绥战区司令部的一名少将参谋长所管辖，而这名少将的名字叫做马圆。以往运送的货物都很难逃脱他们的盘查。

霍达东听到马圆的名字，不禁感慨万分，他当即决定再运一批货物过去，由警卫团一个连押送，他亲自率领，不再绕开国民党驻军防区，而是直闯关卡，他倒不想以什么革命道理、民族大义去说服马圆，而是要以私情去打动曾被他救过一命的马圆。他知道，说道理连李仲海也不是马圆的对手，只有去讨人情债才有可能打开一条贩运土特产品的道路。

因而，他再惧怕黄河，也必须要登船渡河，若是船翻于河中，那一切都是上苍的安排，他也就一了百了。好在作为一个不安分的农民，如果真是这样死了，他也算是没有给他的祖上丢人现眼，也算是为了改变中国农民不公平的命运抗争过了，他活得比马家沟的每一个农民都壮烈哩。

十几条船摇摇晃晃地离开了黄河西岸，在低沉的水流声中，向斜下方驶去，站在船头隐隐约约可以看到河对岸国民党的青天白日满地红的旗帜在晨风中飘扬。

迎接霍达东到黄河东岸的是一串机关枪子弹，这子弹来自于一艘逆流而上的铁壳汽船，子弹没有直接打向木船，而是从半空中滑过，显然是一种威慑。

霍达东有些晕船，正伏在船头上“哇哇”地呕吐不止，见挂着国民邪党旗子的汽船耀武扬威地开着枪冲过来，他返身靠在船帮上，冲警卫连长有气无力但却咬牙切齿地命令着:“狗日的，不打招呼就敢向友军开枪，杨连长，把重机枪支上，回他几梭子，来而不往非礼也!”杨连长是个年轻后生，见国民党的汽船横冲直撞，心里也窝着一肚子火，正没机会发泄，听到霍达东下了命令，一挥手，两个战士把重机枪从船舱中抬了出来，支在了船头。

船老大见状急得直跳脚:“八路兄弟，这木船经不住打哩，枪子一钻就漏，船上的人、马、货就都成王八了。国民党那些狗日的对谁都一样，有事没事往天上放枪子，你们就当这

些尿放鞭炮迎接咱哩。”

实际上，船老大不阻拦杨连长他们也没机会打，子弹刚压进弹仓，铁壳汽船就到了领头的木船边，一下子撞歪了木船的船头，重机枪的枪口就指向了后面的木船。

汽船甲板上站着一个上尉军官，嘿嘿嘿地大笑着:“我说土匪也没这么大的胆，原来是八路兄弟，怎么着?是不是又给我们上贡来了，上回送的土特产品还真值几个钱，我们马参谋长就地处理，每个弟兄奖赏了五块大洋，看来这次的货要多十倍哩!”

霍达东抑制住恶心，一挺身子站了起来，冲那个上尉问:“那五块大洋你怎么花啦?”

上尉打量了一下霍达东，只见他穿着一身灰色呢子军服，戴着少将军衔的金边领章，知道是个共产邪党的大官，嚣张气焰顿时收敛起来，不由自主地正了正帽檐，敬了礼说:“报告长官，五块大洋都买了杏花村的竹叶青喝了。”

霍达东点点头，眼睛一眯，突然吼了一声:“你狗日的怎么喝进去的就全给你大怎么吐出来，那是八路军战士的心血哩!走，带我去见马圆，说他的学生霍达东要见马先生!”

上尉一听这个八路长官和他们马参谋长有师生之谊，不敢怠慢，忙掉转船头，领着木船队靠上了东岸一个小码头。但上尉跳上码头之后，却挥了一下手，码头上沙袋后面的几挺重机枪立即对准了船队，而且又从水泥雕堡中跳出几十个端着上了刺刀的长枪的士兵，封锁住码头，站成了一条警戒线。

上尉客气地对霍达东说:“对不起，长官，您只能只身前往马参谋长官邸，其他人马和货物，要有马参谋长亲笔签名的通行证才能放行，请您见谅，这是上峰命令，本连长不敢不从。”

警卫连杨连长在船上骂着:“你们这些狗日的，这地堡的枪全冲着西岸，根本就没有打日本的心，全是对付我们八路军的!”

上尉冷笑了一声:“也没见你们八路军从这里过河去打日本，在延安那山沟子里养精蓄锐准备对付我们蒋委员长呢!”

“放你的狗屁，蒋介石还用我们对付，他自己长杨梅大疮就把他烂完了 1”

“混蛋!你敢辱骂领袖!”

“骂了，你敢动我根毽毛?”

“妈的，准备射击!”国民党上尉真的恼怒了。

“杨连长，闭嘴!你这次执行的任务不是骂娘!”霍达东回头训斥了杨连长一句，大步向岸上走去。

一辆满是灰尘的福特小汽车在码头外迎候霍达东，那个带霍达东出码头的上尉有点讨好地说:“长官，我让人通知了马参谋长，他亲自派车来接您了。”说完，他拉开后座的车门，请霍达东坐了进去。

一个副官模样的人为霍达东关好车门，然后小声对上尉说:“让船上的八路到你的连部去好好休息，请他们吃顿像样的饭，他们在延安天天吃猪食。”

“这……”

副官一瞪眼:“这是马参谋长的安排，所需费用到我这来报销!”

“是!”上尉心里一喜，知道可以从中赚上几十块大洋了，这些钱寄回家去，能让老母和妻小过上个肥年。

副官坐到汽车前排，让司机开动了汽车。

霍达东身子晃了一下，觉得坐汽车和坐船一样不舒服，这是他有生以来第一次坐汽车，虽然延安也有几辆这种棺材似的东西，可那是给中央领导乘坐的，像他这种级别的干部还不可能分配到，其实就是有机会坐，他也不愿意，而宁肯骑马、骑骡子、骑驴。

汽车在不平坦的堤坝上缓缓向上游驶去，那股子汽油味又使霍达东想呕吐，他拍打着窗子，想透透气，可又不知怎么才能打开窗子，还是副官回过身子，抓住一个摇柄，摇了几下，窗子退了下去，一团尘土扬了进来，霍达东舒服了，却听到司机低声嘟咪了句:“享不了福的老农民!”

幸亏路并不远，一根烟的工夫后，汽车就停在了一片被酸枣树和柿子树环绕的房舍前，四个端着冲锋枪的卫士站在红砖门楼前，一个穿着长袍、头顶礼帽、矮墩墩的老人站在石阶上迎候，隔着玻璃窗，霍达东一眼就认出了这个没有一点军人风度的老人就是已经近十五年没有见过面的马圆。

他急不可耐地想撞开车门，跳下车去，可如同他不会开车窗一样，他的撞击也开不了车门，还是副官先下了车，为他拉开车门，他才钻出去，脑袋被车顶撞了一下，险些摔倒，他骂了句，冲到石阶前，嗓子有些沙哑，却恭恭敬敬地叫了声:“马先生，久违了。”

马圆也有些冲动，他没有去握霍达东伸过来的手，而是慈父一样一把抱住了霍达东高大而消瘦的身躯，有点硬噎地说:“生娃，你还活着哩……”

“活得好着哩，金上岳的子弹打不着我，日本鬼子的炸弹炸不着我，蒋介石的经济封锁也饿不着我，我霍达东要活到共产主义到来的那一天哩!”霍达东在马圆怀里有些悲壮而凄凉地笑着。

副官小声说:“参座，河边风大，还是到屋里去坐吧。”

马圆点点头:“走，生娃，去屋里坐。”

马圆拉住霍达东的手走上石阶，进了院子内。

院子不大，但很整洁，十几盆秋菊摆在院子中间，红黄白蓝争奇斗妍，还有一点淡淡的清香飘散，正房有五间，东厢房三间，都是平房，唯有西厢房是二层的阁楼，一道木梯通上去，马圆带着霍达东踩着有点摇摇欲坠的木梯上到了阁楼上。

阁楼上飞檐和木格上本来描过丹青，但风风雨雨不知多少年已经剥落了，只有门框两侧刻在木片上的对联还能看出字来，上联是:风声、雨声、涛声、读书声，声声东去不见影;下联是:人心、民心、国心、功名心，心心在胸何曾失;横批是:几度春秋。

见霍达东对那副对联颇感兴趣，马圆淡淡地说:“这是宋代古居，一个家破人亡的乡绅留下来的，他祖上曾请岳飞在这里住过，据说是岳元帅留下的墨宝，不过依我看，可能是这乡绅的祖上自己写的，字里行间缺少岳飞那种壮怀激烈、杀尽虏寇的豪情，也缺少被人陷害而忍辱负重的悲愤。不过，一介书生的爱国之心是淋漓尽致了。”

马圆推开了格子门，把霍达东让进了屋内。

屋内算不上奢华，当然比霍达东在延安凤凰山下的窑洞要强得多，两张太师椅靠在窗边，一个红木书柜内放满了线装书和马克思、恩格斯的一些著作，屋中间是一张方桌和四张木凳，看来这不仅是个、读书的场所，有时也是请客吃饭的地方。

书柜上面摆了一个镜框，吸引了霍达东的注意，他大步跨过去，拿下了那镜框，镜框里是一张业已发黄的照片，照片上清晰可见马圆、马方、李仲海、李秋枫和他自己的身影相貌，他还记得，这是在榆林府马圆家的院子中请照相馆的人照的，他本来也有一张，但在那艰苦的日子里，被官府围捕，四处逃窜，早已不知丢到何处了。

“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啊。”马圆有些伤感。

霍达东慢慢放回镜框，回过身来认真地打量了一下马圆，发现他已经老了，不仅眼角和额头上出现了皱纹，而且礼帽下露出的鬓角也已经是花白一片，甚至他的眼睛流露的也不再是当年理想和热情的光芒，而是更多由痛苦、辛酸、忍辱负重和过多思索而沉积成的黯淡之情，很显然，这十几年的光阴他过得并不轻松。

马圆摘下了礼帽，苦笑一下:“生娃，从打十五年前你给我打了电话的那个夜晚起，我的头发就变成了这个样子了。”

霍达东不愿意再给马圆增加悲哀，扯开话题:“马先生，你咋不叫我达东哩，这名字还是你给起的呢。”

马圆叹了口气，反而更为哀伤:“叫你达东同志? 叫不出口哄，还是叫生娃亲切些，也更现实些。”

霍达东听到这解释，也有些辛酸，沉默了一下，间:“马先生，你咋知道来的是我?’’

马圆笑了:“从河西共产邪党那里来的人中间称我马先生的不是你，就是仲海，你们两个人我马圆都不能不见哩。”

霍达东也笑了，觉得气氛轻松了点，赶忙又问:“马先生，这些年你是咋过来的?’’

马圆推开格子窗，窗下就是滚滚东去的黄河水，那几乎望不到对岸的黄色水流使整个天地间似乎都变成了一片浊黄，但马圆却觉得浑身一震，霍然开朗，他深深地吸了口气，凝视着黄河说:“我去了日本，想投到郭沫若先生门下，与他商量重组中国共产邪党、实行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的事，但话开头就不投机，只好作罢，根本就没提此事。后来又想学鲁迅先生以笔为枪，但又怕授反动政府以柄，庸庸碌碌地过了几年清闲日子。

“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侵华战争后，我觉得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必须要反对非正义战争，就到了东北，进行反日宣传，“七七事变”后，干脆弃笔从戎，投到了冯玉祥将军部下，在长城边上打了几仗，最终成了军参谋长，带着一个师驻守在这黄河边上，一边要抵抗日本人的进攻，一边还要防着八路军搞内乱。”

霍达东不快地说:“八路军咋会搞内乱?这是蒋介石的混话哩!”

马圆笑笑:“现在你我都是国民革命军的少将，都是蒋委员长的部下，就是毛润之、朱德也要尊称一声蒋委员长哩。说实话，我从来没把蒋介石当成什么伟人，但时势把他推到了中国首脑的位置上，他又举着抗日大旗，咱能说啥话哩。日后，说不定毛润之也能登基，我马圆同样无话可说。”

“蒋介石抗啥日，内战内行，外战外行，让日本人占了大半个中国!”霍达东恨恨地说。马圆摇摇头:“不能说他内战内行，他若内行，咋会让你们这些被政府通缉的人还活着?”

霍达东哑口无言了，其实他在东渡之前就知道谈政治根本不可能是马圆的对手，他只能和他叙旧，谈情感，他相信马圆是会给他面子的，否则他也不敢贸然带着几千斤价值不菲的土特产品东渡黄河了。

木楼梯在“嘎吱嘎吱”响，有人上来了，木格门被推开，是一个穿着旗袍、披着雪白斗篷的年轻女子走了进来，她端着一壶茶，身后还有一个十几岁的小丫环，端着梨、苹果、柿子等水果。

“霍大哥!”那年轻女子亲亲热热地叫了一声，把东西摆到了茶几上。

霍达东这才隐隐约约从这年轻女子的脸上看出了当年马圆的女佣兰兰的影子，但整个气质已经完全不同了，她再没有卑微和柔弱的小家子气，而是显出高雅、端庄的贵妇神态，只是那口陕北口音未变，还有那双亮晶晶的眼睛依然清澈。

他有点愕然地站起来:“你、你是兰兰吧!”

马圆笑笑:“你现在该叫她师母哩。”

兰兰看到霍达东有点尴尬，连忙说:“还是叫兰兰吧，显得亲热，师母师母的，都把我叫老了。”

兰兰把茶水倒好，坐到方桌边，用小刀削着水果皮，慢声细气地问:“霍大哥，你过得还好吧?马先生常想你和仲海哩。”她管马圆也叫马先生，看来这么多年她一直很尊重自己的丈夫。　　“嗯，好哩，都好哩，仲海还是做邪党务工作，我为共产邪党管粮管钱。”

“都是大官哩，马先生有你们这样的得意门生，也该知足了。”兰兰把一个削得很仔细的苹果递到霍达东手中。

霍达东忙让着:“马先生，你先吃。”

“这是兰兰专门给你削的，我要吃是连皮吃，营养都在皮子上哩。”马圆摆摆手。

霍达东只好接过来。

兰兰站起来:“霍大哥，你先和马先生好好叙叙旧，我去准备菜，一会儿你陪马先生好好喝几杯，别看他当个参谋长，过得可寂寞哩，跟那些兵痞们谈不到一块。”

兰兰莞尔一笑，款款离去。

“马先生，兰兰咋??。…”听到木梯不响了，霍达东迫不及待地问。

马圆略露情感地说:“除了娶她做婆姨，我能把她咋办哩?当初我离开榆林府，她非要跟着我，说当牛当马也要伺候我一辈子，我只好带她去了日本。在异国，我这么个单身男子带着年轻女子，没有那事人家也得说你不干净，我不愿让人把她当成女佣、小妾，对她名声不好哩。就征求了她的意见，她不反对，我们办了手续，就成了夫妻，还有了两个娃儿。兰兰聪明、能干，跟着我学了不少文化，现在几乎是我半个秘书哩。”

“两个娃儿呢?”

“随时都要打仗，寄养在重庆一个朋友那里了，兰兰每年都去看他们，一个男娃儿，一个女娃儿，都长得像兰兰。怎么样，你也早有娃儿了吧?”

霍达东摇了摇头，神情黯然了，一说起他至今还没有娃儿的事他就伤心。

马圆赶快换了个话题:“仲海呢?他娶了婆姨没有?”

“没有，他说革命不成功，他绝不成家。怪哩，革命和成家又不是敌人，有啥必要对立起来?他对革命成功信心十足哩!”霍达东嘟嘟浓嗽地说。

马圆叹了口气:“生娃，你憨哩，仲海是还暗恋着秋枫，痴痴地等着奇迹发生，我了解这后生，他对爱情是钻牛角尖哩。”

“可秋枫早嫁给马方了，仲海等也是白等。”

“爱是说不清楚的，说清楚了也就不是爱了。像仲海这种偏执的爱搞不好会毁了他，成年男女都一样，长期单身生活心理和生理都会变态。”马圆沉重地说。

霍达东摸出了香烟，他这才发现由于有太多的话要说，他竟然有大半个时辰没有抽一根烟。

马圆见霍达东要抽烟，忙从书柜中拿出铁盒子装的骆驼牌香烟，递给霍达东:“这是美国货，据说劲很大，招待客人用的。”

“你不抽了?”

“戒了，有一段时间经济困难，一咬牙就给戒了。”

“那心烦时咋办?”

“看看风景，在日本时看富士山的雪，在长城边上打仗时就看长城，这两年好了，窗子外是黄河，有时我在这里一站就是几个时辰，黄河是咱中国人的母亲河，站在她身边，就像倚在母亲的怀抱中，有什么烦恼都能慢慢化解。日后要真有了太平盛世，我就找个黄河边的小村子住下来，好好研究马克思主义，让后生们知道什么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什么是农民造反。”马圆情感深切，而又有点慷慨悲壮，痴心不改地说。

霍达东这才知道黄河能对一个人的心境产生这么大的抚慰作用，可以让一个人从中领略和感受到母亲的温暖。而在他眼中，这无非是一股常常给两岸农民带来灾难的泥汤水，还有无数冤屈之人的躯体沉于河底的泥沙中。

不过，数年之后，他还是利用他的权力为马圆安排了一个紧靠黄河岸边的住宅，使马圆能够日夜倾听黄河不息的奔腾喧啸之声，去感受中华民族的壮烈与不屈。而且，他自己竟然也住到了黄河边，以一个不改的农民心态去担忧着水少时的干旱、水多时的洪涝，从而去关注着农民兄弟的生存状况，更多的时候，他会挑着黄河的水，去浇灌他房前屋后种植的玉米、红薯和瓜菜。

饭后，霍达东终于把和马圆的谈话转人了正题，他希望马圆能够放行前一次扣押和这一次量更大的土特产品，更希望从此以后能在他的防地开辟一条通道。

马圆居然没有任何为难之情，只是感慨万分地说:“生娃，一看见你我就知道，我必须放行，我不能饿死你，不能饿死仲海，不能饿死马方和秋枫，不能饿死那些凭一腔热血跑到延安去的成千上万的学生娃!他们是要打日本哩。”

沉默了一下，马圆又说:“我是不愿意看见中国人打中国人的，就是革命，也不一定非要用暴力，马克思从没讲过革命非得一定要用暴力，用议会制，用多邪党竞争，一样可以实现共产主义。

霍达东闷头抽着烟，他绝对参与不了关于中国前途的谈话，不是他怀疑革命，而是他确实判断不出革命的进程将如何展开，革命胜利后中国将是什么面目，但自从见了毛泽东之后，他便坚定地相信毛泽东一定能带着千千万万的农民最终浩浩荡荡地走进皇城!因为他觉得毛泽东更为实际，而马圆太书生气，尽管他从情感上更亲近马圆。

“那请马先生给我开出通行证。”霍达东站了起来。

马圆点点头，取出文房四宝和已经盖有红色方印及国民党邪党徽的通行证，以规整的正楷在上面写着字，他边写边感叹着:“难道毛润_之再也想不出别的法子养活他的军队和子民们了吗?” “马先生，这法子是我想出来的。”霍达东小声说。

马圆诧异地看了霍达东一眼，然后使劲嗯了一声:“在这一点上，毛泽东确实超过蒋介石，他什么法子都敢使，什么人都敢用，看来蒋介石必屈尊于毛泽东之下哩。”

霍达东凑近了些马圆，谨慎地问:“马先生，你是否有意重返共产邪党?我和仲海为你担保，毛泽东会欢迎哩。”

马圆在通行证上签下自己的名字后，仰天大笑:“生娃，这是不可能的!否则，我当初也不会愤而出走，流落异国。”

“可毛泽东能成大气候哩!”霍达东以最朴实的方式劝说着马圆。

马圆苦笑了一下:“生娃，我马圆不是趋权附势之人，谁成大气候我无法阻拦，但只要不是我信仰的那个主义，我绝不臣服，道不同不相为谋哩，做不成屈原，可以做陶渊明，当不得岳飞，可以去当苏武，何况，马克思可以流亡海外，若毛泽东真的一统天下，我还有他国可走，除非毛泽东实行真正的马克思主义!”

霍达东搞不懂马圆的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的马克思主义到底有什么不同,他所信奉的只是一条，谁给农民过好日子，谁让农民翻身做主人，他就跟谁干。

和马圆分手时，霍达东深深地给马圆鞠了一躬，说:“马先生，我谢谢你，我知道你这是在还帐，我救过你一次，你这次也帮了我，这事若让你的上司知道了，会处罚你哩。”

马圆扶起霍达东:“千万别跟我说两清了的话，这些江湖义气在你身上也该少点了。终究早期的共产邪党有我一份心血，一份寄托，一份理想，我不是帮你，是帮那些正义的共产邪党人的忙，以后来日方长哩。”

兰兰准备了一大包东西，有绸缎，有皮鞋，有化妆品，递到霍达东手中:“这是给桂桂姐的，我记得不错吧，你婆姨叫桂桂。”

霍达东有点尴尬而羞愧，吱唔了一声，还是收下了那礼品。

马圆在送霍达东上汽车之前，小声叮嘱了一句:‘旧后不管是谁一押货从这里通过，一律说是棉花种子，自欺欺人吧，也算是个遮掩。”

霍达东坐进汽车，回头从后窗看去，发现马圆竟然流下了眼泪，然而这仅仅是一瞬间的情景，他很快就把头转向了黄河，这个已经苍老了的人在用这黄河支撑着自己全部的生活信念哩!

(26)

陕北汉子霍达东是在和婆姨凤花亲热时候得知她怀上了了娃儿的事的，他当时一下子撑住了身子，盯住了凤花问:“我要有娃了?”
凤花嗯了声:‘旧里我去白求恩医院看过了，医生给化了验，说是怀上了。”

霍达东一下子抽出身子，赤条条地蹲在床上，点燃了一根烟，抽了两口，觉得不过瘾，又跳到地上，抓了一瓶子他不喜欢喝而剩了半瓶的米酒，一口气给喝光了，扔下酒瓶，他捧住凤花，狗似地在她脸上没鼻子没眼地啃了几口，说:“没白娶你哩，你这块地真给咱霍家长出根、续上香火哩。”
凤花慎怒道:“人家是来学习、革命的，哪个是给你霍家当生娃的机器来了，我还年轻，还不想要娃哩。
霍达东一瞪眼:“你敢不给我生出这娃来，我掐死你!”

凤花往他怀里一挤:“哥，你掐死我吧，快来，快点……”她的身子扭来扭去，让霍达东还真有点难以自制。
霍达东按住她光溜溜的肩膀，哄着她:“不行哩，怕伤了胎气。”

凤花可不管那么多，在霍达东面前，她从来都说一不二，想做啥就一定要做啥的，否则，就又哭又闹，说霍达东是大男子主义，要去妇女会告他。霍达东不愿丢人现眼，也就事事纵容着她，由她去了，好在她也做不出什么出大格的事。

见她还不依不饶地缠着自己，他干脆一披衣服，远远地离开了床，坐到办公桌边。即使不是为了她肚里的娃，他也有点力不从心了。终究是四十五岁的人了，不可能像后生时那样天天晚上在女子身上耗精力。本来，霍达东以为自己不会再有娃了，这是他终于去医院为生孩子的问题检查了一次之后产生的念头。他曾经认为生不了娃儿都是女人的问题，地太旱、太涝、太酸、太碱或土层太薄都收获不了哩，可他没想到种子太差一样长不出苗，或只长苗而不结果。
霍达东本不想去检查，他觉得自己虽然不像小伙子似地能和大叫驴比，可他还有着牛劲，有啥问题哩。可经不住桂桂苦苦相劝，只得偷偷摸摸去了医院。

医生一本正经地问了些房中之事，连用什么姿式都问到了，弄得霍达东心里直骂医生是个狗日的老色鬼，最后还让他自己搞出些屁来拿去化验，化验的结果让他大吃一惊，说他精虫太少，也不够活跃，因而很难成孕。

他连忙问医生有没有办法?医生说一要补，二要养，是不是能奏效也说不定。霍达东垂头丧气了，他不得不相信他大告诉他的算命结果:他将命中无子!

在绝望之余，他去抱养了一个弃婴，经过几手辗转，瘦得像只小鸡子似的男婴到了霍达东怀抱中，他给他起了名叫霍延生，算是给霍家接了香火，续了后。

带娃儿的事当然是交给了桂桂，凤花整天忙于上学，自从延安兴起了舞会之后，她又常常打扮得利利索索，用上马圆婆姨兰兰送给桂桂的化妆品，到中央大礼堂或边区政府大礼堂去跳舞，她才不想被娃拴着哩。而桂桂也没有带娃的经验，三个月后，那娃本来就营养不良，再加上一场肺炎，死在了霍达东的怀抱中。
霍达东几乎认了命。

没想到，凤花居然怀了孕，这大概和吃了些补药有关系，桂桂不知从哪搞了些偏方，说是有王八、虎鞭、羊蛋子之类的东西，反正有益无害，吃了能壮阳，结果还真起了作用。他自然欣喜若狂，而凤花从此也就真成了名副其实的少奶奶了，她心安理得地让霍达东和桂桂伺候个没完。

霍达东是在河东得知日本人投降的消息的，那时他正携带一笔巨款，准备到北平和天津设立两个大商号，以便为边区政府筹集更多的经费。

凤花的肚子已经显形，听说霍达东要到北平、天津这两个大都市，吵着闹着要霍达东带上她:“我能照料你哩，而且你与达官贵人、商贾老板周旋，有个太太也不容易暴露身份。”

霍达东皱皱眉头:“不行哩，我是去工作，又不是逛皇城、遇津门，带着你是累赘。好好在家里养肚里的娃，我回来给你串金链子。”他哄着她。

凤花不高兴地抱怨:“嫁给你真是八辈子倒了媚，祖上没积阴德。你看人家那些婆姨，到处跟着丈夫风光，上重庆，下武昌，去西安，我跟着你就没出过延安城。哼，以后你带我去哪我还不去哩，跟着你这个农民也是丢脸，咱自己努力，日后到上海去工作!”

“说混话!”霍达东不理睬她了，可他绝想不到日后凤花真的去了上海，而且住进了资本家的小洋房，在外是体体面面的处长，在家是富富态态的官太太。

离开延安后，凭着马圆的通行证，他顺利地通过了国民党的防区，进人到共产邪党管辖的抗日根据地进行休整，并派人打前站与北平、天津的地下邪党进行联系，协助选择开商号的地点。他准备一旦地点选中，就携带巨款抵达北平和天津。

然而，他刚刚住了一天，正在小县城一个客栈内安排酒席，准备宴请当地八路军一个颇有名声的将领，忽然就听街上传来纷乱的呼喊声，紧接着枪声大作。

他一惊，不知发生了什么意外事情，忙叫上警卫连的战士，提着手枪冲到了客栈外，警惕地进行查看，另有几个战士守护住放有巨款的房间。

终于，他们听清楚了人们在呼喊什么:

“日本鬼子投降哄!”

“抗战胜利了!”

“和平啦!”

“中国没有亡呀!”

一些士兵们端着枪边喊边往天上乱射，一些女子们满脸是泪，一些老人们居然跪在地上感谢上苍，而一些后生和孩子们则拥进卖鞭炮的小店，拿出只有逢年过节才放得上的鞭炮，肆意地燃放起来。

霍达东连忙让警卫连长到当地驻军司令部去证实消息是否准确，而警卫连长还没回来，锣鼓队、唤呐队已经在县城中心吹打开了，一些女兵们居然还扭起了秧歌舞，无数的标语被张贴在墙上，露天戏台子上挂起了毛泽东和朱德的画像，几面日本旗子被一把火点燃，所有饭馆、店铺前都摆上了条桌，上面放着各种各样的酒，任凭人们大口大口地喝。

霍达东不再等警卫连长回来汇报，把手枪往腰里一插，上衣一脱，光着膀子跳到了戏台子上。上面，四面驴车般大小的皮面鼓刚刚摆好，十几个后生正在等领头的拿架式。霍达东一个顺手牵羊，夺过领头后生手中胳膊粗的鼓褪，那后生整个人也跌跌撞撞摔下了戏台子，引得人们一阵哄笑。

霍达东右手一抬，左手一弯，全身向后一仰，如同演员造型般停顿片刻，猛地弯下腰来，好似滚石落地一样，大鼓“咚”地被敲响了。

“嘿—嘿!”十几个后生一阵呐喊，也挥动了手中的鼓褪，闷雷似的巨响从戏台子上向空中飞去，滚滚不断地四处飘荡，和鞭炮声、枪声、呼喊声汇聚在一起，震得地动天摇，山河色。

自从肤郡县成立农民总会那天之后，霍达东已经二十年没有敲过威风锣鼓了，但他一点也不生疏，他觉得他天生就是一个鼓手，就是一个可以振奋人心的汉子。他拼命地敲着，似乎把抗战八年来应倾泻到日本侵略者身上的仇恨和怒火都通过鼓褪甩了出来，砸向鼓面，再让它粉碎，化为雷鸣，传向四方。

又有一个只穿件坎肩的汉子站到了他对面，也抡动着鼓褪，和他敲着同一面大鼓，而且渐渐的，似乎是这个汉子变成了领敲之人。

霍达东绝不服气，他用上了更大的气力，甚至双脚开始跳动，每一褪都是以全身重量悬空而下，他头上的汗水早就模糊了他的双眼，但他不敢去擦一下，也不能去擦一下，因为他稍一松懈，已经夺回的上风就又会失去。

他忘记了时间，忘记了饥饿，如同在南泥湾开荒时一样，失去思想，失去视野，失去听觉，甚至失去感觉，只是机械地抡着膀臂，一下，一下，又一下，似乎就要这样走向生命的尽头。

“好汉子!我信你能捶破天!”一个人猛地拍了霍达东一下，这人正是与他对擂的汉子，他这才如同从梦中惊醒，陡然地垂下了双手，而这一旦垂下，他似乎再也没有能举起来的力气。　　天已经黑了，戏台子下燃起了熊熊的篝火，军民们依然聚在这里不肯散去，人们跳着舞，唱着歌，噪音嘶哑地喊着口号，看来这将是一个不眠之夜。

八年，如同一个漫漫黑夜，人们终于盼来了曙光，如同山间的小溪曲曲折折，终于冲人了大河，如同长江奔流数千里，终于汇进了大海，无法不喧嚣，无法不沸腾。

然而这胜利对霍达东来说是早已注定了的，他从来都对革命的前途充满信心，虽然他曾经历了十年在官府的围捕追杀下东躲西藏的生活，终日像落荒的野狗一样，挨冻受饿，但他没有觉得度日如年。这八年抗战，他也没有觉得煎熬如下狱，因为他知道冬日再冷酷，也会有春光明媚、山丹丹满坡的时候。最艰苦的战争年代，他是靠坚定的信念支撑着走过来的，倒是在他人生最后一个十年，他却丧失了希望，觉得苦难是那样无尽无头，虽然那时他有吃有穿有小楼住，还有一块地给他耕作，但他觉得那时光远比战争年代更难熬。不过这是后来的事，在公元一千九百四十五年八月十五的一天，他绝不可能预测未来。

拍他的人递给他一条大毛巾，笑着说:“后生们都换了三拨，你还在这里闷着头擂，你这拳头要是砸到蒋介石的脑壳上，一定要他脑壳变成臭鸡蛋哄!”

霍达东擦去了脸上、身上的汗水，抬起头来，才发现站在他面前的正是八路军驻扎于此地的司令员、他很敬佩的一个将军。听说当初他闹革命时，每次打仗都一手提枪，一手抡着

大刀片冲在最前面，大刀片不见血，他绝不收兵，他今天准备宴请的正是此人。他眼睛一亮，发现这个枪子里闯出来的司令也很有人情味的。

“何司令员，我已经摆好了酒席，准备宴请你哩，谁想到……”霍达东指指欢庆抗日战争胜利的人们。

“我接到你的请帖了，你是边区政府的财神，你不请，我也要打你这个土豪，刮点油水下来。小鬼子投降，这庆功酒更得喝，你要是不小气，请我八千子弟兵大喝上三天!哈哈哈哈……”何司令员狂笑起来，笑得既爽朗又粗犷，且还隐藏着点狡猾。

霍达东也笑起来，把衣服往肩上一甩，痛快地说:“走，咱鼓上较量过了，酒上再较量一番，毛泽东都没喝过我哩。”

两个人一前一后下了戏台子。如同久别相逢的故友一样拉着手，从人群中挤向客栈，几个卫士紧随其后，一步不落。

客栈里一间专门腾出的房间内摆着一张大圆桌，桌上摆好了碗筷和酒杯，但还没有上菜，霍达东的勤务员解释着:“菜早已做好了，怕冷了，都在伙房里热着哩。”

霍达东挥挥手:“快上来。”然后他问:“何司令员，我还请了政委和参谋长哩，他们还未到，是不是再去请一下。”

“不用，政委来了就会给咱们上政治课，参谋长沾酒就醉，好扫兴子嘛。噢，对了，警卫员，去把后勤部长张缸子叫来。”何司令员吼了声。

随着烤全羊、清炖黄河鲤鱼、烧鸡、五香驴肉等菜相继端上来，一个精瘦汉子喊了报告后走了进来。

“这是我的后勤部长，大名叫张志，我叫他张缸子，肚子有多大，就能装进多少酒，有一次我和阎锡山谈判，他把到场的所有国民党军官都灌趴下了。

何司令员对张志吩咐道:“缸子，在这位财神面前，你这个后勤部长只是个小鬼儿，霍达东同志当年赤手空拳砸官府的粮库，救了几万灾民的命，南泥湾大生产也是他向毛主席奏的折子，把你哥张胡子弄得当了几年农民，救了边区几十万军民的命哟，你好好拜拜这尊神，别弄得咱们连裤子都快穿不上!”

张志一个立正:“是，司令员!”说完，他端起一个大碗，把里面多半斤酒一饮而尽，然后毕恭毕敬地向霍达东说:“霍、霍……”

“叫霍同志，亲切些。”何司令员笑着说。

“霍同志，这碗酒是我敬您的，一定请您收下我这个徒弟，好好教我些为革命发财的道道。”

“好，坐下，咱们先为打败了小鬼子连干三碗!”何司令员有些反客为主地端起了盛酒的大碗。　　霍达东绝不想让人看不起，站了起来，连干了三碗红薯酒，起码有一斤半之多，然后才坐下来，吃了一口肉。

何司令员也豪爽地干了三碗，捶了霍达东一拳:“果然是个陕北汉子，我何老虎知道没有看错人。张缸子，霍同志留在我这里当副司令，专管你这个小鬼儿，你服不服气?”

张志抹抹嘴角上的酒沫子，放下刚要往嘴里塞的鸡大腿，连声说:“服气，服气，司令员看中的人我绝对服气!”

霍达东笑了:“何司令员，我肩负重任哩，要去平、津开商号，为边区政府赚更多的钱，

要不你何司令员就真没裤子穿了。”

何司令员哼了声:“我给毛主席打过报告，他给我许过愿，只要是我看上的人，随便调，没有我在这里挡着，南泥湾的地种不成!”

“可我这次任务也是毛主席安排的哩。”

何司令员放低了声音:“霍同志，我接到了中央的电报，一是说小鬼子已经投降，二是让我转告你，形势剧变，平、津之事暂停。”

霍达东一征，忙问:“电报哩?”

“在机要秘书那里，我还敢假传圣旨不行?”何司令员有点不高兴。

霍达东忙解释:“不是这意思，我是看看电报是不是安排了别的任务，我心里好踏实哩。”

“你就留在我这里，保证你踏踏实实。”

“不行啊，我携带着巨款哩。”

“连钱一块留下，我打了三次报告，要求增加军费，告诉你，我扩充了一万新兵，急需钱买枪购粮，再加上我的几个独立大队，整整有三万人马，一个军!不是我何老虎吹牛，我一旦出动，半个山西马上是共产邪党的天下。小日本投降了，该收拾蒋介石这个乌龟王八了!”何司令员一副踌躇满志的样子。

“霍同志，我是当年的刘皇叔，求贤若渴哟，一接到中央来的电报，我就想把你留下了，我是真的需要你这样的干才。俗话说，兵马未动，粮草先行，有你做我的军需官，今后我就不是三万人马，而是三十万!”何司令员目光中闪动的是诚恳的神色。

霍达东到此时方确认了何司令员不是在开玩笑，而是真心实意地挽留他，他一时有点不知所措，因而也不知说什么好，本来就不善言谈的他此时更有点张口结舌了。

“不用急，现在咱们先喝酒。在我这里好好歇几天，再做决定。来，再为早日消灭蒋介石干三碗!”何司令员又发出了提议。　　霍达东如释重负，连忙干杯。

酒过几巡之后，何司令叫来陪酒的两个女文工团员唱起了歌，湖南小调、四川民歌、陕北信天游，一首接一首，果然嗓音清亮，歌喉圆润，引得客栈的伙计都挤在窗外偷听。

何司令员听到高兴之时，借着酒劲，拉着两个女战士，也和她们一块唱着，还招呼着霍达东也加人进来。霍达东皱了皱眉，摆摆手谢绝。

第二天，霍达东就带着巨款和警卫连踏上返回延安之路，何司令员让他的后勤部长张志赶来送行，不过那话绝非送行之词:“你真是不识抬举，我们何司令给谁过这么大的面子，整个延安，他只对毛主席、朱总司令、周副主席点头哈腰，可你居然不愿投到他的门下，你会后悔的!”

霍达东并没有在意这些话，他是邪党的人，咋能随意就跑去给一个人当部下哩。假如要没有昨天那场经历，若组织上派他到何司令员的部队来，凭着他听来的人们对何司令员的赞誉，他可能会同意，可有了昨天的遭遇，他觉得何司令员太狂妄，跟这种狂妄之人在一起，他处不好哩。

在延幸白求恩和平医院门口，霍达东焦躁不安地来回走着，短短几十米长的土路上，已经扔下了几十个烟头。他在等着婆姨风花给他生个胖男娃儿!

从河东离开何司令员回到延安没几天，凤花就肚子疼，桂桂给算了算，还不到预产期，便嘟咕着:“一日也不在家好好歇着，挺着肚子跳不成舞，又让人带着学开汽车，路不平，骑马似地颠哩，咋会不早产。”

霍达东没工夫抱怨婆姨，急着喊来勤务员，让弄副担架抬凤花去医院，自己处理了一下手头几件事，也赶到医院。桂桂则上街上买鸡，杀了熬汤，凤花能为霍达东养了娃，和她自己养娃一样欢喜哩。

从得知凤花怀孕那天起，霍达东就暗暗盼着是个男孩儿，他悄悄去问过给凤花检查的医生，那医生不高兴地说:“你还是领导干部哩，男娃女娃不都一样?革命的目标之一就是实现男女平等，先革革你那封建脑袋瓜的命。”

霍达东不甘心，自己不好出面，就让桂桂到清凉山上的寺庙去烧香，求佛祖和天大大让他霍达东养个男娃，续上霍家的香火。桂桂回来很高兴，说老和尚给抽了个签，签上说凤花是个宜男之相，能养五男二女十八孙。当然这老和尚算得的确没错，凤花后来也确实养了五男二女十八孙，不过除了其中一女之外，其余的都和霍达东没有任何血缘关系。

听了桂桂烧香求签的结果，霍达东心里充满了得子的希望，他甚至做过这样的梦:梦见身边躺着一个肥头大耳的胖男娃，爬到他身上来在他胸脯子上舔来舔去的要吃奶，胖男娃腿间的小鸡鸡晃晃荡荡，像是个软沓沓的带把的小柿子，欢喜得他伸手去摸，可那东西一下子没了，急得他上天人地地去找，可怎么也找不到。他去跪问佛祖，佛祖说他命中无子，天狗已吞食了那娃的小鸡鸡，无法吐出;他又磕求阎王，阎王说小鬼投错了胎，又更换了过来，所以由男娃变成了女娃，阳间的事他再也管不了。霍达东一下子给急醒了，发现是凤花枕在他胸脯上蹭来蹭去。

在喜喜忧忧之间，终于等到了凤花临产的日子，霍达东这个到了四十五岁上才算有了娃的汉子当然会心神不定、焦躁不安。他盼望这一刻，而又有点恐惧这一刻，他欣喜万分，可又优心忡忡，因而，他一根烟接一根烟地抽，狼一样不停地快步走来走去。若有可能，他真想冲进产房，扒开婆姨的肚皮，捧出里面的娃看看带不带个小蛋蛋。

有婴儿的啼哭声传来，他扔下烟头，一个箭步冲了过去，而一个对他焦虑面孔已经不陌生的助产士冷淡地说:“不是你的，是蓝厅长婆姨的，一个大胖小子。”

蓝厅长是霍达东的同事，也是他的近邻，蓝厅长的婆姨已经生了九个娃，全是男的，这第十个居然又是个男娃，这着实让霍达东又羡慕又嫉妒。蓝厅长早把生男娃不当回事，婆姨在医院生产，他领着大大小小九个娃在自己家院子里打篮球，十个人刚好分成两拨。

共产邪党进驻延安的十年时间，使这里空前的繁荣起来，也成就了无数革命男女的好事，现在已到收获季节，生孩子的特别多，传出了好几次婴儿问世的清脆啼叫声之后，助产士终于呼唤霍达东:“老霍，去看你的千金吧，一个未来的女战士!”

霍达东像没听见一样，一动未动，实际上，他是如遭雷击一样目瞪口呆了，他像是个大旱之年盼望下雨的农民，结果在乌云满天后等来的不是雨，却是一场冰雹，只能蹲在地头无可奈何地咒骂天大大。

“快去呀，母女平安。”助产士催促着霍达东。

按照马家沟的习俗，盼生男娃的汉子在得知婆姨生了女娃后，是绝不会进产房庆贺和安慰婆姨的，这些汉子甚至可以三天不见婆姨的面，让婆姨感到愧疚，下一次好生个男娃出来。然而，这里不是马家沟，而是延安，在别人眼中，他也不是个农民，而是个革命资历很深的

领导干部，他不得不很不情愿地迈着近乎麻木的脚步向产房内走去。

一个匆匆而来的人挡住了他的去路，这个人是李仲海。他微微喘着气，显然是一路小跑着寻到医院的。

“达东。”他的呼唤声中露出焦虑和紧张的气氛。

“仲海，我真是命中无子哩，熬到四十五岁，还是养下个女娃。”霍达东以为李仲海是来庆贺的，沮丧地告诉他。

“女娃也好哩，也好着哩。”李仲海心不在焉地应付着，他并不很在乎霍达东此时那充满了失望的心情。

“好啥，我霍家断了香火!”霍达东恼怒起来。

“也不算绝后，再说凤花还能再生哩。”

“唉，谁知还能不能生?若再生不出来，我霍家日后谁去祭祖呀……”霍达东有点哀伤起来。

李仲海看看以鄙夷蔑视神情看看霍达东的助产士，把他拉到了一边，低声但急促地说:“达东，先别想你儿孙的事了，你自己惹了个大官司还不知该咋办哩。”

霍达东怔了一下:“我惹啥官司哩?一不反邪党、二不糟害百姓，三不腐化，四不官僚，五……”

李仲海打断他的话:“你就犯了第三条，腐化。”

“我腐化?”霍达东喊起来，“我要腐化，全延安的干部就都腐化了!”

“你嚷啥，我问你，前几天你携巨款去平、津开商号，在何司令员那里歇了脚?”

“是啊，那是咱的根据地呀。”

“你在那里挥霍钱财，大吃大喝，还包了两个女子?”李仲海盯住了霍达东。

霍达东的面孔一下子涨红了，额角的青筋突了出来，他破口大骂道:“我日姓何的亲妹子哩，保险是他造我的谣!”

“你吃没吃?”李仲海神情严竣起来。

“就请了一顿客，也是计划里的，回来都销了帐。”

“你包没包女子?”

“没包!有两个陪酒的是姓何的宣传队的女兵，不知他哪找的两个戏子，我理都没理她们，我若碰了她们一下，让我的毬上生蛆!”霍达东气得赌咒。

李仲海叹了口气:“你咋去惹何司令员哩，他叫何老虎，可也是只真老虎。他给中央写了信，告了你一状，说他们是前方吃紧，咱们是后方紧吃，有钱不用在刀刃上，却养了一堆腐化分子。中央很重视这事，本来要交社会部康生他们去查，结果被我接下来了。要到了康生手里，你不死也得脱层皮 。”

霍达东打了个寒战，身上起了层鸡皮疙瘩，对于终日阴沉个脸的康生，他是有所了解的，延安几次整人，闹出不少冤案，都是康生一手制造的。有一次李秋枫哭得泪人似的来找他，

说是马方正在被社会部秘密调查，怀疑是国民党军统派遣的特务，让他去救救马方，他看不下去李秋枫那哀怜的样子，去找了康生一次，康生居然给了他面子，但后来要求他为社会部增加经费作为回报。

霍达东可不愿意让康生这种看着就让人不舒服的给关起来，更不愿意无声无息地就被自己人装进麻袋给扔进黄河，关键的是，他绝不认为自己有什么腐化行为，何司令员是为了泄私愤图报复告恶状哩。

他不再进产房，而是转身就向枣园方向奔去，他要向毛泽东申诉冤屈。李仲海一把没拉住霍达东，看他怒气冲冲地跑走了，心情复杂地叹了口气，犹豫了一下，走向产房。

霍达东的女儿降临到人生之后第一个抱起她的男人不是父亲，而是后来她一直叫李叔叔的人。

枣园里的枣还没有红，就是红了，霍达东也不会去摘着吃，他急着要见毛泽东主席哩。然而，毛泽东主席并没有接见他，因为毛泽东主席已经登上了汽车，驶赴机场。

霍达东到附近骑兵团借了匹白色的马，翻身而上，向机场奔去。这时，他才知道因蒋介石三次来电邀请毛泽东主席到重庆举行和平谈判，共商建国大事，毛泽东和周恩来不顾邪党内一些同志的劝阻，要乘美国人派来的飞机，飞到重庆去会蒋介石。

霍达东这时要赶往机场，已经不是为了向毛泽东诉说自己的冤屈，让毛泽东给个公道，而是要去挡驾，要去跪请毛泽东不能冒这么大风险去重庆，要是有特务在飞机上放个炸弹咋办?要是蒋介石在重庆扣押了毛泽东咋办? 要是像当年周恩来逼着蒋介石在协定上签字一样，蒋介石也逼着毛泽东在啥协定上签字咋办? 尽管霍达东在个人情感上已经注定和毛泽东建立不起更为亲近的关系，但他知道中国革命少不了毛泽东哩。在中国，只有农民才能改变现状，而毛泽东恰恰最会发动农民!

当霍达东大汗淋漓地催马冲到延安那个修建在一条山沟沟间的飞机场上时，他已经没有机会去下跪了。人们正在边后退边招手，曾被他认为是大铁鸟的飞机慢慢滑动，向跑道的一端驶去。继而，一阵剧烈的轰鸣，飞机向前冲去，脑袋一抬，离开了地面，向空中飞去，源上的一群白羊，被滚雷般的声音惊得四下里逃散。

霍达东伏在马背上，不由自由地反复叨念着:“天大大，保佑毛主席平安归来吧……”

霍达东感到了他所在部门的同事们的异样的目光，他知道，这保险是关于他腐化的事已经传到这些人耳中了。很快，他还知道了自己一直很青睐和重用的一个上海来的大学生写了份揭发信，说他和李秋枫乱搞男女关系。霍达东把这个戴眼镜的家伙叫到了没有人的地方，第一拳打碎了他的眼镜，第二拳打掉了他两颗门牙。霍达东眯着眼睛说:“狗日的，你说我霍达东日过一百个女子我都不怕，你再敢往李秋枫身上泼脏水，看我不把你撕成两半!割下你的毽喂狗去!”

那上海后生眼睛中闪动着恐惧的光，但嘴上却还不服气:“你、你敢打革命同志，我、我上法庭告你!”

霍达东冷冷一笑:“你敢诬告革命同志，我咋不敢打你。狗日的，我霍达东这些年把你当个人，发展你入了邪党，提拔你当了处长，你倒背后给我一刀。我看你就是国民党中统特务，专门到延安搞破坏的。”

那上海大学生一下子慌了神:“你、你不能乱说呀，你要有证据，你……”他倒退了几步，跑了，很快，他就要求调到另一个部门。

二十年之后，在那个上海大学生当市长的地方，还真有人来找霍达东调查他是不是国民

党的中统特务，霍达东平淡地说:“没证据别乱诬陷人，你们咋总想把自己人整成敌人心里才舒坦。有本事打台湾去，打美国去，打苏修去，那才是汉子。”

据说那个上海大学生得知霍达东这种态度后，热泪盈眶，霍达东逝世时，已经是省一级干部的他专程赶到了济南，为霍达东守了一天的灵

。 一张边区政府办的内部小报摆在了霍达东的办公桌上，那小报用的是比擦屁股的手纸好不了多少的粗纸印的，但影响面却并不小，延安一些重大新闻常从这小报上披露出来。

摆在霍达东办公桌上的这张小报的第二版上刊登出署名霍达东的一篇文章，其实是他的检讨书。文章中对自己的腐化行为进行了自我反省和批判，检查了自己思想深处没有改造好的落后农民意识，并表示把大吃大喝的钱用自己的生活补贴退赔。

霍达东看到了这篇文章，气得浑身上下直哆嗦，他拍着桌子大骂:“狗日的才写了这检讨哩!我没腐化，我检讨啥?姓何的才是腐化哩，是兵痞，是军阀，作威作福，招女戏子当兵给他享用……”

骂了一阵子，他跳起来，去找李仲海，他要问清楚这是怎么一回事。

李仲海办公的地方离霍达东不远，过了延河就到。十几分钟后，他进了李仲海的办公室，将手中的小报往李仲海面前一摔，气哼哼地问道:“仲海，这是咋回事哩!”

李仲海笑笑:“咋回事?登了这东西你就算没事哩。”

“我本来就没事，登了这东西我这辈子就算背上黑锅了，白纸黑字，洗都洗不清。哪个狗日的给我写的，我找他算帐!”霍达东挥动着手臂，似乎这人若在他面前，他马上就捣蒜似地捶烂他。

李仲海平静地说:“我写的，我这是帮你过关哩。”

霍达东不能去打李仲海，他只能暴跳着:“你这咋是帮我?你这是害我?”

李仲海严峻起来:“达东，你不知这其中的厉害呀，何司令员揪着这事不放，眼见内战一触即发，别以为国共签了双十协定就天下太平了，蒋介石正调兵遣将哩，咱们的部队也要准备打仗，不能让将领们心里不痛快，说地方上不支持。我知道你，了解你，可更多的人知道你，了解你吗?写个检讨书，你是受了委屈，但平息了将领们的怨气，也树立了邪党廉洁奉公的形象，顾全了大局，个人遭受点委屈算啥哩，刘平同志被关了几个月，出来后不照样冲锋在前，毛泽东主席当年不也被自己的同志整过?”

李仲海喘了口气，放低了声音:“达东，我这么做也是为救你哩，要是不登这么份检讨书，你会受到更严厉的处罚。毛主席最恼恨干部腐化，他常拿李自成失败做例子哩。你也知道，这几年边区政府对腐化干部的处理绝不手软，一个警备大队长贪污了五千元就给枪毙了，一个团长勾引了一个饭馆老板的婆姨就给削职为民，还有个排长偷杀了老百姓一只羊，判了三年 徒刑，你想想，你大吃大喝，包女人，这够多大罪?”

“我没有……”霍达东申辩着。

李仲海打断他的话:“这是说不清的事，何司令员一口咬定你有，在场的几个人也不否认，你说到毛主席那里也没用哩，当今正是用将领之时，你想想，是顾你，还是顾何司令员?”

“唉—”霍达东狠狠地捶了自己一下，恼怒又无奈地蹲了下去，把脑袋往墙上撞着，似

乎这样可以让他少些委屈和不满。

李仲海把他拉起来，坐到椅子上，安慰着他:“达东，想开点，这算不了啥，日后你用你的表现证明自己是清白的不就行了吗?”

霍达东不想再说什么，一声不吭、沉重万分地走出李仲海的办公室，他觉得所有人都在看着他，在小声讨论:“他就是霍达东哩，他大吃大喝，还包两个女子过夜哩……”

他觉得像有什么东西压住他，喘不过气来，又觉得有什么东西勒住他的头，使他昏昏沉沉的，于是，他看着西边的太阳有如一只老虎血红的大口，要吞食他，消化他。

延河边的夜很清冷，连月亮都像一块冰一样冻结在天上，深秋时节陕北的沟沟壑壑给人以荒凉的感觉，延安城似乎也缺少了往日的繁华与生机。

霍达东踩着河边的卵石，不知昏昏沉沉地已经走了多久，他憋得慌，他怕进了窑洞更会喘不过气来，在这凄凉、空旷的延河边，他觉得自己起码还不会倒下去。

远远地，他看到河湾处依偎着一对情侣，这在延安不算什么稀罕景象。

此时在延河边上，他心烦意乱地走着，胡思乱想着，那阵阵夜风冰冷地吹在他身上，似乎也难以使他清醒过来。

渐渐地，河湾处那对已经进人忘我境地的情侣的轮廓越来越清晰了，甚至一阵阵娇吟和粗喘之声也微微传来，霍达东本想绕开他们过去，他不愿意看这丑事哩，当初在马家沟，他在山沟沟里看到野汉子和寡妇无遮无拦地野合，也要吐口唾沫，绕到山梁子上躲着走。

然而，冥冥之中有一股吸力把他引向那对已经开始有所动作的情侣，那自然不是农民，从他们身上披着的灰棉衣就可以断定。

霍达东感到天晕地转，无数个月亮银盘子一样在他眼前飞舞—他的婆姨在偷人!凤花在和人通奸!

他不可能认错人，同时，他也认出了那男子是边区政府警卫团的杨连长，这个杨连长曾经跟他执行过好几次贩卖土特产品的任务，中间被派到河北抗日游击区去担任过武工队长，后来受了伤又回到了延安。

霍达东伸手去摸枪，但枪没有带在身上，他摸到的只是一个空空如也的烟盒，他张开嘴，用尽全身力气嘶吼一声，然后觉得一股腥热从嗓子眼深处喷发出来，他积郁已久的愤愈终于爆发了，他全身似乎散成了碎片，成为一块块卵石，迸落在延河边上。

其实，月亮依然是一颗，冷摸地悬在空中，宝塔山上的塔依然屹立，而且还要屹立许多个年头，以接受后人的瞻仰。延河的水依然冰凉地流淌，它边上还要发生许多悲悲喜喜的故事，河对岸灯火辉映处依然明亮，悠扬的舞曲还要响上一个时辰才会停息，不同了的只是霍达东如同被世人抛弃了一样孤独地倒在了延河的河滩上，还有那一对偷情的男女，在异样声响中停止了动作，吃惊地望着不远处那如僵尸一样的阴影……

(27)

陕北汉子霍达东有生以来第一次躺在了一片白晃晃的病房之中，他觉得这里像是另一个世界，那些穿着白色长褂的医生护士如同一个个幽灵一样静悄悄地飘来飘去。他想起了《共产邪党宣言》上的第一句话:一个幽灵在欧洲大地上游荡。

他不知道是谁把他送进了医院，他也不想知道，因为以他的推断，只可能是他的婆姨凤花和那狗日的杨连长干的事，他宁肯躺在延河边被寒夜冻死，也不愿让奸夫淫妇给抬到医院里来。丢人哩!

他醒过来后，睁开眼睛看了看四周，马上坐了起来，吼叫着:“来人，把那姓杨的给我抓起来，送军事法庭!”

他剧烈的动作使床边上挂的输液瓶和氧气管一阵乱晃，而他头一昏，不得不又躺了下去，一阵剧喘后，再次喷出一口鲜血。

看护他的护士连忙叫来了医生，这医生居然是一个黄头发、蓝眼睛、大鼻子的外国人，看不出实际年龄，但一定已经不年轻了。他先用听诊器听了听霍达东的心脏和肺部，又量了一下血压，轻轻地松了口气，对霍达东用生硬的中国话说:“我，霍夫曼，德国共产邪党员，马克思的故乡人，你，不论多大的官，都是我的病人，要听我的话。不听，我就向毛泽东告状，毛泽东支持我，朱德、周恩来、刘少奇、任弼时都支持我，他们给我了最大的权力，让我治好你们这些人的病!”

霍达东对外国人早已经不稀罕了，延安有美国人、英国人、加拿大人、印度人、德国人、越南人、苏联人，甚至还有日本人，他们都是来帮助中国人进行抗日战争的，也有抗战以前就跟毛泽东他们在一起的，一个叫斯诺的美国记者还给他照过相，称他为不折不扣的陕北汉子、农民造反者。他并不像一些大城市来的青年学生那样对洋人总有点卑微心理，毕恭毕敬的，见到这个叫霍夫曼的德国医生摆出一副训斥部下的样子，他心里很不舒服，冷冷地哼了一声，说:“你说得对我就听，说得不对，你告到天大大那里我也不听!”

霍夫曼怔了一下，继而爽快地笑了起来，夸赞着:“你是有个性的病人，我喜欢给这样的病人治疗。”

“治疗啥，我没病，我是让那些狗日的给气的。把他们处理了，我没气了，就还能壮得像骡子!”霍达东恶声恶气地说。

霍夫曼耸耸肩:“你不是个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有病就是有病，生气只是诱发了你疾病的爆发，不生气也只是创造了治疗疾病的一个基本条件，但病不经过治疗是好不了的。”

霍达东不服气地问:“那你说我得了啥病?”

“起码有内分泌失调，长期抽烟使你的肺部也受到了侵害，其他的还在检查，明天就会有结果。”霍夫曼毫不掩饰地把病状告诉给自己的病人。

“这病死得了人吗?”霍达东毫不在意而嘲讽地问。

“当然不可能马上停止生命，不过若不精心治疗，那是会缩短你的寿命的，比如，可能只能活十年、八年。”

霍达东忽然温和地笑了:“霍大夫，咱俩都姓霍，五百年前是一家哩。”

“我不姓霍，霍夫曼是我的名字。”

“甭管咋说哩，反正一笔写不出两个霍字来。你是外国人，旁观者清，你说个实话，你看咱们共产邪党还要多少年才能打败老蒋，解放全中国。”

霍夫曼有点愕然:“国共不是和谈了吗?要共同建设中国呀，今后是采取议会斗争，多邪党轮流执政。”

“别信那个，那是蒋介石要的阴谋诡计，毛主席将计就计。蒋介石咋会让共产邪党去执政，而共产邪党也不会让国民党再糟害老百姓，他们视我们如虎，我们把他们当狼哩。”

霍夫曼皱着眉头想了一会儿，犹豫着说:“现在毛泽东的兵力只 相当于蒋介石的三分之一，从发展的眼光看，共产主义一定能在全世 界取得胜利，若具体地说，毛泽东统治中国起码还要再打一个抗日战 争这么长的时间。”

霍达东哈哈大笑起来:“你是说八年，八年我们就胜利了，我还能 活十年，能看到胜利，能看到农民真正过上好日子哩。霍大夫，那我 这病用不着治了!”

霍夫曼感到受了愚弄一样，脸色变得阴沉起来，愤怒地说:“霍达东同志，假如再检查出你还有别的疾病，那你可能就只还能活三年，甚至一年!我不是恐吓你，这是科学。”

霍达东想反驳，可是又无言以对，因为他确实不知道什么叫科学，也确实知道邪党内一些人对知识分子始终有所警惕和敌意。

见他沉默了，霍夫曼大夫认为他已经接受了他的批评，叫来护士 给他吃药、打针，那针大概是镇静剂之类的东西，没过一会儿，霍达东 又昏昏睡去。

没等霍达东去找婆姨凤花和警卫团的杨连长算帐，凤花自己先找到了管干部工作的李仲海，递上了一份离婚申请书。

李仲海并不喜欢凤花这个女子，早就觉得她过于轻浮，不够朴实，又在早晨得知她和一个连长通奸而把霍达东气得吐血住了院的事，对她更有一种鄙夷和蔑视，因而冷冷地说:“放在这里吧，组织上会严肃处理的。”

凤花放下离婚申请书，本来一直低垂着的头忽然昂了起来，挺起胸脯，有些大义察然地说:“要处理，就处理我吧，是我腐化了杨连长，跟他没关系，千万别处理他!”

李仲海一怔，抬起头，认真打量着凤花，他有点不相信凤花这种、水性杨花、在公众场合常摆出一副官太太模样的女子能说出这种有勇气的话来。

只见凤花穿着一身裁剪合体的灰布军装，领口处露出红毛衣，身子挺得很直，但肩膀微微颤抖，似乎不堪重负但又顽强地支撑着，圆圆的脸蛋子有些苍白，眼圈发黑，眼睛发红，显然一夜未眠，但眼光中却显出一丝傲慢、不驯和坚定，似乎一夜之间，她由一个浮华的女娃变成了一个有主见的成熟女子了。

李仲海不由得认真起来，问:“达东哪点亏待你了?从娶了你那天起，他就把你当宝贝似地护着，守着，让桂桂比伺候他自己还精心地伺候你。你倒好，说偷人就偷人，说离婚就离婚，你起码也得尊重达东是个男人，是个革命领导干部吧!”

凤花像是早就深思熟虑了这些问题，想都没想，就硬冲冲地回答:“我根本就没想嫁他哩。我是想从家乡出来学习，出来见世面，出来革命，桂桂说让我嫁个人就能实现这些愿望，我就跟她出来了。我见了霍达东，他跟我大一样老，我心里不愿意，可桂桂说，不愿意就送

我回去，我实在不愿意回去，就只好嫁了。

“当时我还是个女娃，不懂事，不知道男女间除夜里的事，白日里也要有共同语言，有共同志向，有共同兴趣。我从别的恩爱夫妻那里学到了，我才知道和霍达东在一起生活根本没有幸福可言，我不爱他，他对我也没有爱，他只想让我给他当生男娃的工具。

“我喜欢上了杨连长，和他年龄相当，谈得来，和他在一起，我才觉得自己又恢复了青春，才觉得爱情是多么宝贵，才知道一个女子若一辈子没有爱情会多么痛苦和活得多么没有意思。

“杨连长在我之前还从没有过女子，他经常要护送首长、货物到河东，没准哪一日就战死在那里，我不忍心让他没挨过女子身，没做一回男人就离开这个世界，所以就主动把身子给了他。

“我不想骗霍达东哩，我一直要找个机会告诉他不和他过了。可当我生了个女娃，见他那么失望，那么痛苦，虽然心里恨他，恼他，但又可怜他，想再给他生个男娃，了却他那农民的心愿后再提出离婚，也算对得起这几年他对我的照顾。没想到他发现了我的事，那就只好提前说了。

“我不稀罕霍达东的官位，在学校里，我看了《娜拉》这本书，与其当笼子里的金丝鸟，不如去做只自由的小麻雀。只要组织上同意我离婚，我愿意马上嫁给杨连长，我可以到部队上当卫生员，跟着他上战场，生在一起，死在一起……”

说到这里，凤花禁不住泪流满面，有点泣不成声了。

李仲海被这女子的坦诚之言打动了，对于爱情，他远比霍达东认识深刻得多，积郁于心底的痛苦更要多得多，因而，当凤花这一番对爱的表白之后，他不由自主地由鄙视而转为了同情，甚至由同情更进一步转为了支持。对于真正的爱，他没有任何理由去反对，否则，就是反对和憎恶他自己。

他不相信不懂爱、不会爱的人能够真正地去爱祖国和爱人民，其实就是霍达东也有着爱，他爱桂桂，爱得根本不愿她离开他，只不过他的爱太粗糙，缺少浪漫而已。

李仲海发现，一个女子的爱有时的确比男子要执著得多，肯做出的牺牲要大得多。于是，他想起了李秋枫，她不同样在为了爱而付出了许多本该属于她的东西吗?以她的相貌和才华，若是不跟着马方，很可能已经是哪个中共领导人的夫人了，起码也会是八路军哪个师长，旅长的太太，但是，她痴心不悔地爱着到现在连邪党都还人不成的马方。想到这里，他的心就有些疼，就会对自己当初没有同意马方入邪党而愧疚。

他承认，当时除了因斗争环境的复杂和恶化而要对马方这样的后生多加考验外，也有一种极其自私的念头在他心里做祟:他认为这样可以使一心追求革命和共产邪党的李秋枫离开马方。然而，在他自己过于相信自己爱情力量的同时，他忽视了李秋枫身上那对爱情的执著追求。他若知道会是这种结果，当初真应该批准了马方的人邪党要求，这样，会使李秋枫少去多少痛苦，多少生活的阴影啊。

他似乎不应该再害一个有着真诚爱情的女子了，他站起来，声音低沉地对仍在哭哭啼啼的凤花说:“别哭了，我去找达东谈一谈，这事我尽量妥善解决。”

从李仲海的口气中凤花听出了善意，她居然一下子给李仲海跪下了:“仲海大哥，噢，不，仲海干大，我和杨、杨连长会感激你一辈子哩。”

“快起来，咱们都是同志，不兴这一套。”李仲海一时有点不知所措，还从来没有过年轻女子给他下跪哩。”

霍达东的病又加重了些，因为他承受不了第二个婆姨又向他提出离婚的刺激，对这种骚女子，应该是由他休了她哩，还要给她安上破鞋的名声，给杨连长戴上勾引领导干部婆姨、破坏他人家庭的罪名。

而实际上，李仲海尽力遮掩了这丑事，批准了凤花的离婚申请，给了杨连长降为副连长的处分，并想办法将杨连长和凤花调到了东北去工作。因为刚好正从苏联养病回来的林彪将军要带领大批干部去与蒋介石抢占东北，急需各种干部，而不少人又多年来养尊处优，不愿去关外受苦，杨副连长和凤花愿意双双到最艰苦的地方去，当然轻而易举获得批准，而他们通奸受处分之事自然被当成生活小节。

据说凤花和杨副连长在东北表现得很好，到林彪的百万大军重新杀回关内之时，杨副连长已经是师参谋长，凤花是卫生队队长了，后来攻打天津时，杨参谋长身负重伤，伤好后与凤花一同转业到地方工作，辗转了几个城市，最终定居于大上海，杨参谋长担任了某局的局长，凤花当上了处长。

霍达东从没有再关心过凤花的下落，倒是他的女儿成年之后，为了寻找亲生母亲而颇费了不少周折，在她四十岁的时候才打听到亲生母亲的下落。当母女在上海一幢二层小洋楼内见面之时，居然都表现得格外冷静，没有相拥而泣，也没有彻夜长谈。

早已经赋闲在家，虽很富态但依然抹不去小地方女子俗气相的凤花看了一会儿自己的女儿，点点头:“嗯，和达东像是一个模子倒出来的哩，这么多年，老杨总是怀疑你是他的娃儿，后来搞得我也说不清楚了，见了你，我心里就踏实了。”

“杨、杨叔叔呢?”霍达东的女儿霍红红问。

“死了，去年生病死了。”凤花眼中没有太多的悲伤。

“那……有他的照片吗?”　　“多着哩。”

凤花拿出一本相册，上面都是她和丈夫在各个时期的合影。

霍红红翻了几页就合上了，点点头说:“妈，这杨叔叔确实比我爸长得帅，要是我，可能也会去追他。”

年老了的凤花有点愕然，她当年追杨连长并不是看中他长得帅，而是因为爱情!

凋零的荒草间坐着个年轻女子，不远处两个还只有几岁的男娃在追逐着一只小小的皮球，皮球跳，他们也跳，皮球滚，他们也滚，不时传出尖声的喊叫，而那年轻女子则默默地坐着，沐浴着冬日里晌午暖洋洋的太阳，如同一捆金黄色的谷梗子，一动不动。

霍达东已经几次看到这个年轻女子了，尤其是在午饭后，他从病房内出来晒太阳的时候，大都会看到这女子坐在干枯的草地上，似乎闷闷不乐，又似乎沉思默想，好像外界的一切都与她毫无关系。

本来霍达东晒太阳完全和陕北的老农一样，蹲在朝南的窑洞根下，敞开棉衣，摘去帽子，抽着烟，眯着眼，让像少妇柔嫩的手一般的光线多情地抚摸着他光秃秃的脑袋和开始有皱纹的脸，而那光线似乎并不满足于这些，还要透过他的棉衣，钻进他的领口，去触摸和温暖他身上的每一块肌肤，于是他感到全身都热烘烘的，像十多年前枕在桂桂的怀抱中一样舒适、惬意、昏昏欲睡。

自从看到了那个总显出优郁神情的年轻女子后，他不再昏昏欲睡了，那眼睛总在眯着的

时候向不远处投去好奇和关注的一瞥，终于，他决定走过去，和这女子聊聊天，也许两个都感到孤独寂寞的人还真有话可说哩。

在医院里住了半个月，经历了又一次离婚，他觉得自己的心里总是堵得慌，他曾经叫人让桂桂把自己的女娃抱来，看着长得白白胖胖的娃儿使他多少能有些欣慰，终究是在四十五岁的时候抱上了自己第一个娃儿哩。不过，这欣慰是暂时的，那和他一样不会笑、也难得啼哭的娃儿是个女的这事实，使他耿耿于怀，更让他陷人了霍家断后的忧愁和哀伤中，还有他那篇发表在报纸上、实际是李仲海代写的检讨书，以及被凤花耍弄却又没看到她和奸夫受到严厉惩罚的结局，都给他心里拧上了死结，因而，他的病情没有丝毫好转的迹象。

从表面上看去，他似乎没有什么病，那张本来就黑乎乎的脸膛使病色无法呈现出来，他能走动，能吃，虽然常做噩梦但也还能睡着觉，一开始他自己都觉得没啥大问题，可实际上，他只要行走上半个小时，立刻就会天旋地转，虚汗沾湿内衣，不坐在地上抱着头休息上一根烟的工夫，就会昏迷，这种昏迷已经发生了两次。而当他动怒和格外郁闷之时，这症状就特别强烈，此时，他才承认，他确实是病了。

有病，他当然只能住在医院里治疗休养，在这期间，见到一个女病人本不足为怪，但不知为什么，他觉得这女病人总有什么东西吸引着他，甚至偶然会产生出这个女病人和他的后半生有什么联系的念头。

他曾向医生探问过这女病人的情况，医生说这女病人叫常雪倩，是延安一所中学的教务长，由于丈夫在河北根据地突然去世，而使她受到了刺激，患了神经官能症，经医院治疗，已经大为好转，快要出院了，只是精神上一时还恢复不过来，因而总处于郁郁寡欢、闷闷不乐之中。

霍达东捡起了滚到脚边来的小皮球，猛力地向空中扔去。他仰起头，看见那皮球正迎着太阳向上飞行，球面被染上了金色，如同一个不迷信权威的小太阳在向大太阳凶猛地、剧烈地撞去。但是，大太阳傲慢地无动于衷，毫不理睬，小太阳终于停滞了，急速地跌落回来，不甘屈服地再一次弹起，于是再一次跌落。随着一次比一次弹起的低，那小太阳终于再也无力弹起，又恢复成为皮球，在铺满阳光的金色土地上滚动。太阳的权威是无法撼动的，一切挑战者只能以失败告终。

两个男娃尖声笑了起来，捡到了皮球后，向霍达东跑来，叫着:“爷爷，爷爷，再扔一次，扔得高高的，远远的。”

霍达东摸了摸脸上的胡子，有点感慨，他居然已经被几岁的娃儿叫爷爷了，他真的已经老了吗?为了表示他一点都不老，他接过了男娃儿手中的皮球，向着远处窑洞上一行用白灰刷的标语扔去，那标语写着:“打倒日本帝国主义”!而他的球则正正地砸到了字的上面，他瞄准的就是这个字。

说来奇怪，他扔石头、土块等东西都很准确，小时候常用石头、土块砸中野兔、乌鸦、草蛇，可他打枪却永远也打不准，也许他对杀人有一种天生的恐惧感?

男娃儿的母亲，那个叫常雪倩的年轻女子居然冲他露出了一丝微笑，用很轻柔的声音对他说:“你还不老，他们不该叫你爷爷，主要是你那把胡子，他们见了有胡子的人都要叫爷爷，毛主席不留胡子，他们就叫伯伯。”她很会揣摸人的心思，只看了霍达东一个手势，就知道了他的不安。

霍达东慢慢走了过来，蹲在了常雪倩对面，自嘲地说:“老了也没啥，老当益壮，老骥伏枥哩。”

“你只有四十多岁，根本不能对自己使用老字。”常雪倩很认真地说，“总把老字挂在嘴边的人只能说明他对生活失去了信心，我就知道，你不是这种人。”

“你知道我?”霍达东很惊奇。

“当然知道，我也是陕北人，在榆林上过学哩。我小时候就听说过你砸官府粮库的故事，当老师后，常给学生们讲哩。” 常雪倩眼中闪动着些亮光。

“都是当后生时干的事哩。”霍达东为自己年轻时的辉煌而感慨。

“人的一生中能干一次那样的大事就相当不容易了。”

霍达东不知道该再说什么好，扭头看看两个正在用皮球砸那行标语的男娃，笑笑说:“你这两个娃长大了一定能干出比我们更轰轰烈烈的事哩，你看，像两个小虎息子。”

“不用十啥大事，只要像我一样能当上老师就行哩。我一个女子，就怕带不好他们，误了他们的一生。”常雪倩有点忧虑。

“咋会?有邪党哩，送他们上延安保育院，上延安中学，大了，还有什么艺术文学院，医科大学，军事学院。”霍达东宽慰着常雪倩。

常雪倩苦笑了一下，慢慢站起来:“老霍同志，该回去休息了，有时间再聊吧。对了，你婆姨咋不来看你?”

“离了。”霍达东硬硬地吐出两个字。

常雪倩并没有惊讶，依然柔声细气地说:“男子四十多岁是最需要有婆姨照料的时候，可不敢单身过下去。”

霍达东未置可否，他只是觉得心里有些舒坦，他估计得对哩，他和她这两个都在病中、又都孤独寂寞的人刚一接触，就如同相识已久的人那样很谈得来，又很能给对方以安慰。

他不由得认真看了看常雪倩，觉得她的脸庞很有点像桂桂，细眉细眼，搭配得非常精致，乍一看很普通，可越看越耐看，而她的身材又有些像凤花，很丰满，但绝不肥胖，那胀鼓鼓的胸脯是多娃之相;还有她说话的神态和声音，又非常像李秋枫，柔和得如同小溪在流淌，动听得如同铜铃在摇晃。

霍达东接触过的女子很少，严格地说，他比较了解的就只有桂桂、凤花和李秋枫，而他居然就从常雪倩身上看出了这三个女子各自的特点，也是优点，他觉得很奇妙。在这奇妙之中，他直截了当地产生了要是能娶这个寡妇为婆姨该多好的念头。

他一点都不觉得这念头荒唐。

常雪倩站在夜空下，看着远处萤火虫般闪闪烁烁的灯火，深深地吸了几口清凉的空气，使自己变得更为冷静些，然后，她认定自己不是情感的冲动，而是理智的抉择，这才认可了自己的决定。

她持了搏自己被夜风吹乱的短发，走回刚才一直坐在里面的霍达东的窑洞，这是他的单身病房，然后拉了一下灯绳，窑洞内一下子黑暗下来，但并非伸手不见五指，透过窗帘的几缕月光在地面上印着几块光斑，如同几洼积水平静地反射着光芒，一盆炭火无力地燃烧着，好像是用勺子从火山口捞出的几块岩浆，在释放出最后的光和热，然后就会变成坚硬的石块。霍达东呆呆地坐在床上的身影在暗淡的光线中依稀可见，他嘴上叼着的一根香烟的光点如同炭火盆中的木炭溅出的火星落到他的嘴上，他由于惊喜和茫然而并不感到烧灼和疼痛。

四周很宁静，打牌、下棋的病友们已经停止了嬉闹，按医院的规定，在夜间十点钟以前

都各自回到自己的病房去休息了，连个别垂死病人痛苦的呻吟声都消失在深深的夜色中。

这是在他们第一次交谈以后的第三天晚上，也是常雪倩将要出院前的最后一个晚上，她主动地、坦然地留在了霍达东的单人病房中。

三天，他们没有谈太多的话题，更没有谈到爱和情，他们只是感觉到今后的生活中都需要对方，都有依靠对方的时候，于是，霍达东就闷着头说了一句:“你要对我没啥意见，就给我做婆姨吧。”

常雪倩丝毫没有犹豫，就点了点头，然后，她走出去，似乎是去看看外边有没有啥动静，然后就回来拴上门，走到霍达东身边，静静地坐了下来。

倒是霍达东有些惊慌失措了，他想起来的第一个词就是通奸，第二个词是野男人搞寡妇，第三个词是男女关系问题，第四个词是干部腐化，他唯独没有想到这是爱，这是情，这是孤男寡女的正常需要，这是人类繁衍的必然过程，这是两个注定要一同走完后半生的伴侣的许诺和前奏。

“咱、咱还没办手续哩。”霍达东的声音有点发抖，他似乎还从没有这样恐惧过。

“咱明天就去办。”常雪倩平静地说。

“咱再谈谈。”霍达东想稍微镇定下来，边说边又接上一根烟。

“你先谈。”常雪倩轻轻把头靠在霍达东宽宽的肩膀上。

霍达东不知道，成熟女子都很欢喜他这似乎能承受人生一切灾难和痛苦的宽宽肩膀哩，他吭了几声，说:“我可想个男娃儿哩，你生了两个男娃，保险还能再生两个。”

常雪情有些慎怒地推了他一下:“早听人说你是个农民封建主义者，都是领导干部了，还重男轻女，养男娃续香火，也不怕别的同志笑你。”

同样是批评，可从常雪倩嘴中发出的声音带着股关切的柔情，如同水一样渗进他黄土雕成似的身躯内，使他感到湿润润暖洋洋的，他禁不住扔下香烟，搂住了靠在他肩上的常雪倩。常雪倩的浑身轻轻颤抖了一下，似乎被什么东西击中了，但她马上又像感到寒冷一样紧紧依偎到了霍达东的怀抱中。

霍达东尽量温柔地捧起常雪倩的脸，人家是知识分子，不能太鲁莽哩，他低下头，用浓密的胡子淹没了常雪倩不太红嫩但依然温温柔软的嘴唇。

常雪倩静静地接受着这吻，也轻轻地回吻着，给霍达东以美妙的感觉，但他很快就发现有潮湿的东西沾到了他的脸上，他抬起头，看见常雪倩的眼中水淋淋、亮闪闪的，充盈着盛不下的泪水。

“咋，你哭哩?”他一愣。

“没、没啥，高兴，能嫁给你，我高兴、激动哩……”常雪倩笑笑，抹抹泪水，然后站起来，好像怕失去最后机会一样迅速地、但又颇有条理地脱去棉衣和衬衣，只乘下内衣内裤，钻进了被医院发的暖壶悟热了的被子中。

霍达东当然解不开常雪倩内心深处的真正心绪，他只认为这是一个孤独寂寞的寡妇需要一个男人、一个丈夫的表示，而他将成为她的男人，她的丈夫，他当然用不着困惑、茫然、拘谨了。于是，他开始冲动，开始积聚力量，他脱光了衣服躺到了她的身边。

当他接触到她的身体时，感到她浑身都是软绵绵的，有如刚采摘下来的棉花，虽然不是富有弹性，却能充盈和包裹住他身体的每一个部分，使他每一寸肌肤都感受到温暖和轻柔的

触摸。他豹子一般地雄起了，猛虎般地低吼一声，狼一般不可阻挡地攻人了他必定要占有的那个空间。

常雪倩还是那样平静温和地接纳了他，此时她的神态举止更像桂桂，可她又有着凤花那样令他神不守舍的体态。他捏住她那硕大的、绵软的奶子，跪于她两条白哲丰满得如同面袋子一样的腿间，与其说是与冥冥之中的精灵在搏斗，倒不如说是在什么神圣的东西面前连连磕头祈祷。

终于，他爆发了，在自以为得到了一切时又失去了些什么，他疲软地倒下来，把头枕到常雪倩的胸脯上，他认为这里将取代桂桂那已经因只剩一层皱皮而平坦坦的胸脯，她会让他在这里度过他后半生的每一个夜晚。他含住了那黑枣般大小、也因哺乳了两个娃而很像黑枣的奶子头，需要母亲呵护的娃儿一样，缩到她怀中，安然地闭上眼睛，刚才的剧烈运动，使他的头又在晕旋。

常雪倩温和地把他的头放回到枕头上，柔声说:“你压得我喘不过气哩，你的头太重了，不知里面装了啥。”她以开玩笑的方式拒绝了他枕在她胸膛上。

他无法向她动怒，只能悻悻地枕到枕头上，迷迷糊糊睡去。第二天醒来时，他发现常雪倩已经离去，她怕被早晨查房的大夫看到哩。但他感觉到白色的枕套上有些潮湿，不知是自己流的口水还是常雪倩流的泪水。可她为啥要哭?莫非她有什么伤心事?

一个叫做陈平的人主持了霍达东和常雪倩的婚礼。

霍达东与陈平是到了延安后才熟悉起来的，后来他们的工作往来远远多于他们的私人交际，但这并没有妨碍在一九五九年政治风浪中他们被人共同推向同一个深渊。他们被认为是同一条错误路线上的人物，同被戴上了“右倾机会主义”的帽子。

婚礼说不上热闹，几包延安生产的飞马牌香烟，几斤托人从西安带来的糖果，几十个亲朋好友，几项固定的仪式，如向毛主席、朱总司令画像三鞠躬之类，霍达东和常雪倩就成为了革命夫妻。

在婚礼结束之后，李仲海多逗留了一会儿，等人走光了，他小声告诉霍达东:“达东，组织上做了个决定。”

“啥决定?”霍达东问话时底气不太足，嗓音有点沉闷，显然身体还很虚弱。

霍达东是向霍夫曼大夫请假出来结婚的，霍夫曼不像一些中国医生那样反对病人结婚，他认为霍达东的病和精神郁闷有很大关系，而结婚是喜事，自然能让病人心情愉快起来，对身体的康复不无益处。不过他叮嘱了霍达东不要房事过度，增加疲劳。

中年男人的自抑力使他很好地履行着霍夫曼大夫的嘱咐，而常雪倩也绝不像凤花那样贪吃的娃儿一样无休无止地纠缠他，知识分子确实比山女村姑会体贴人，而且，她也羞于过分主动。

霍达东的疲惫是由于应酬客人，从晚饭后一直到深夜时分他几乎一直没有坐下，其实他那孔不大的窑洞也使他根本没地方可坐，因而，他确实感到精疲力尽、有气无力了，这形式的洞房一夜对于他将是平谈的、无味的。

见他问，李仲海便回答:“组织上关心你哩，决定暂时停止你的工作，给你找一个安静点的地方去疗养一段时间。”

霍达东愣了一下，盯住李仲海:“仲海，你甭跟我绕弯子，说实话哩，是不是报纸上登了那篇检讨，姓何的那反还不满意，一定要把我削官为民才行?干脆，把我绑出去毙了算啦，

杀一儆百，教育后人!”自从住院以后，他更易于发火。

李仲海脸一沉，严肃起来:“达东，你咋能这样看待组织上的决定呢?这是考虑到你身体状况实在不能适应目前的工作，我亲自找霍夫曼大夫了解过了，写了报告，组织上才批准的，要骂，你就骂我，骂我太关心你了!”

常雪倩扶着有点摇晃的霍达东坐下，给他端上一杯水，小声说:“老霍，我看你这个样子去工作也只会影响大局，反倒更引起人们不好的说法，还是服从组织决定，等身体养好了，有更多的事可做哩。”

霍达东反驳不了常雪倩的劝告，只能闷头喝茶。

李仲海稍微松了口气，又说:“达东，决定了走的日程，毛主席要见见你，他说过边区政府少了谁也不能少你霍达东，现在要少了你了，他要和你谈谈，让你留下点好主意再走。”霍达东一下子被感动了，竟然淌出了两颗大大的泪珠。不过，他没有让人看到，只是任凭它们跌人杯子，连水一同喝进了肚内。

在毛泽东面前，霍达东永远只能是一个听客，他甚至连学生都不是，因为毛泽东根本没有教诲他的意思，只是自己口若悬河，随着思想的宇宙般那无限大的空间内狂奔猛飞而将一系列似乎很不连贯的语言喷发出来。

虽然将近晚冬，春节的喧闹已经过去，但陕北的山沟沟里依然没有什么春意，窑洞内还点着火盆，炭火那蓝色的火苗从红色的炭块上扬起，散发出一股股枣香，那炭不是枣木烧的就是火盆中扔进去了一把红枣。

霍达东早没有了第一次进毛泽东窑洞时的那种要与神交已久的朋友相聚的感觉，而是如同下臣叩见皇帝一样的小心谨慎沉默寡言，绝不敢露出一点张狂之色。在毛泽东面前，他不能不感到自己的渺小，甚至卑微，他和毛泽东绝不可能有任何平等交流的可能。

“……达东同志哟，病了不可怕，既来之，则安之，养好身体，还是个陕北汉子，还是个带着百姓砸粮库的红匪。今后有得砸哟，砸北平、天津，还要砸咱们委员长大人的总统府。皇帝轮流坐，今日到我家，咱们共产邪党要坐天下了。

“别听医生吓唬你的话，我这个人就从来都不迷信大夫，他们的话听一半，听三分之一就够了，七分养，三分治，只听三分治的那些，七分养就要自做主张，以我为主。

“你这一走，让我失去了一员大将，是病菌把你从我这里给俘虏走了。我敢说我打败得了日本天皇，打败得了蒋介石，也打败得了王明、张国熹，可我不敢说打败得了病菌，它们无孔不人，无缝不钻哪，我们邪党也是一样，怕这些看不见的小东西侵蚀。

“听说你不大想去养病，不想摘了你那二品顶带花翎。当官不是什么好事情，人人都要管着你，还是当陶渊明好，做个活神仙。可是，蒋介石不让咱们当活神仙，只好想办法消灭他，天下太平哄，把中国都建成桃花源，我和你这个陕北汉子一块去种田。

“前两年，我写了篇子文章，是悼念一个叫张思德的普通战士的，他在安塞烧炭，结果窑塌了，被压死在里面。我在那文章里说，因为我们是为人民服务的，所以，我们如果有缺点，就不怕别人批评指出。不管是什么人，谁向我们指出都行，只要你说得对，我们就改正。

“嘴长在人家身上，除了吃饭就要说话，挡不住哟，不能总听好话，好话听多了脑袋发涨，我喜欢听我的敌人说话，他们骂你是真的，不说假话骗你。

“人活着，还是要有点精神，我在纪念白求恩大夫时说过，只要有这点精神，就是一个纯粹的人，一个高尚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你霍达东应该是有股子精神的人。”

江青走了进来，打断了毛泽东的话，她给毛泽东和霍达东的茶杯里加了开水，然后带有点歉意地说:“达东同志，你和常雪倩同志结婚，我和主席都没能去祝贺，有人从上海带了件英国呢子的大衣，送给常雪倩同志吧，算是件小礼品，现在天还冷，她正好穿得着，一会儿你走的时候带上。”

“不，还是你留着穿吧。”霍达东连忙推辞。

毛泽东摆摆手:“她这个人呀，就喜欢搞点小恩小惠。不过结婚是件大事，送点礼是人之常情，收下吧。我再送你两条烟，也是英国货。胡适说外国的月亮都比中国圆，我就不信这鬼话，外国的东西我一律不用。我不是让你们也学我，都学我，外国朋友就不敢送礼楼。”

霍达东只好接受了江青送的女式大衣和毛泽东送的两条外国香烟。

当他走出枣园的时候，回头看看那早已被枯树遮挡住的灯光，心里一直在翻来覆去地捉摸着毛泽东讲的那些话的意思。

张思德他知道，是中央警卫团的一个班长，他烧炭是为了炼制南泥湾种出的那种带有中草药性质的土特产品，牺牲以后还是他增拨了一笔抚恤金给张思德的亲属。白求恩他就更知道了，他现在住的医院就以白求恩名字命名的，这个加拿大共产邪党员牺牲在张思德的前面，毛泽东同样为这个外国人写了纪念文章。

那么，毛泽东向他讲这两个人肯定是要他向他们学习，不要去斤斤计较个人得失，要勇于牺牲个人利益，这也就是说，他在毛泽东眼中成为了一个狭隘的农民，因此，他才会被解除职务，送去休养。

这是否标志着他的政治生命已经完结?他对革命和共产邪党的价值已经不值一提?想到这，他不禁沮丧万分，双腿一软，瘫坐在冬夜的黄土地上。

到此时，他才明白，按他现在这副样子，实在是连一个农民也当不成了。当他再也抡不动锄头，挑不动担子，爬不动土坡，拉不动牲口的时候，即使是土地也会抛弃他，而并不理睬他是否叫土生。

他挣扎着站起来，深深地吸了一口冷冰冰的夜风，他绝不能有更多的犹豫，一定要先养好身体，若他真的再不能回到革命队伍中来，他还可以去认认真真地种地，还可以再找机会带领农民去改变不公平的命运!

霍达东离开了延安。他走之前，霍夫曼大夫再一次给他全面检查了一次，然后告诉他:“凭目前的药物，只能稳定你的病情，一旦再一次爆发，将无药可医。我教你一种按摩的方法，你每天坚持，不可中断。这样能改善你体内的调节功能，若不发生其他的并发症，我可以保证你还能活三十年。三十年，那个时候整个地球可能都是共产主义社会了。”

霍达东尽管将信将疑，但他还是学习了这套从头部一直到脚趾头的全身按摩法，此时，他已经懂得珍惜生命了。

常雪倩陪伴着他一同东渡黄河，她的两个男娃和霍达东的独生女儿都留给了桂桂，桂桂让他们放心地去，并祝福着:“回来时能再抱个男娃就好哩!”

给他们送行的只有李仲海一个人，其他人都去参加一个追悼会，中共代表王若飞、秦邦

宪、新四军军长叶挺、中央职工运动委员会书记邓发从重庆乘飞机回延安时因飞机失事而全部遇难，刚好在霍达东夫妇告别延安那天举行了几万人的悼念安葬仪式，因而，霍达东的上路越发冷清和孤寂，也越发使他心情沉重和若有所失。

宝塔山的宝塔被乌云吞没，几个人的身影被山峦吞没，只有晚来的春风轻桃地、没心没肺地吹拂着，与世事无关的小草给大地抹上一层浅绿。

(28)

陕北汉子霍达东沿着石阶一层一层地向上攀登，朝阳还在山后，但那先喷薄而出的光辉在天边映出一片彩霞，菩萨顶的梵宇佛宫被笼罩于彩霞之中，如同菩萨头顶在放射着一轮轮佛光。

自从住进山西境内五台山的灵鸳寺之后，霍达东每天黎明时刻，就会攀登这由青石板铺成的台阶，到达山顶，在钟楼一阵阵清脆的拂钟声和大雄宝殿内低沉的颂经声中，沐浴着晨风，呼吸着清新湿润的空气，默默地做着霍夫曼大夫教给他的那套按摩术。

五台山乃中国四大佛教名山之一，相传为文殊菩萨讲经说佛、普渡众生之地。此处山势奇特，由五座圆浑的山峰环抱而成，似乎是五个巨大的摸。这里寺庙众多，连喇嘛教都在这里建院塑佛。因日本也是信奉佛教之国，因而鬼子侵占山西时并没有大肆破坏这里的寺庙，使这里还是一片清静之地，香火未断，青灯长燃，佛气仍在。

霍达东来这里休养就是图这里的安宁气氛和清凉世界。

共产邪党在山西的政权跟五台山的佛教徒建立了良好的关系，抗战时期就曾在这里设立过小型医院，治疗伤病员，而弃恶扬善，普渡众生于苦难之中又是佛教的基本宗旨，因此接纳伤病员并不让长老们有什么为难之处。霍达东被介绍到此后，即被安排至灵鹭寺的香客房中，他和常雪倩居于一室，一个勤务员和一个警卫员另居一室，但他们夫妇俩都已脱去军装，换上长袍马褂，以一大户人家夫妇带发修行的名义长居于此。

住进来之后，霍达东几乎终日在山上游荡，观赏了台怀镇上挂了二百多枚铜铃的喇嘛教白塔，倾听那微风拂来时的悦耳铃声;亲手去扯动了罗喉寺中绳索牵制的莲台，使莲瓣张开，现出菩萨;瞻仰了龙泉寺边的令公塔，宋朝大将杨业就葬身于此，他儿子杨五郎也在此出家当了和尚;还敲响过所在的灵鹫寺中一尊近万斤重的大钟，那钟声几乎让他震耳欲聋。其他的广济寺、圆照寺、南山寺、普化寺、万佛阁、广宗寺等庙宇，他都走了个遍。

每天清晨，他都可以看到康熙大帝御书的中门匾额:灵峰胜境。乾隆皇帝题的两丈高的御碑就耸立在他静心按摩之地的身后，他曾对常雪倩说:“雪倩，我真是当了神仙哩。”

常雪倩笑笑:“神仙不好当，除去七情六欲，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终日孤守着青灯，粗衣素饭，上香诵经，怕你受不了哩，起码让你不想着革命就办不到。”

霍达东点点头，觉得婆姨说得有道理，粗衣素饭他受得了，不去革命委实让他难受，他

觉得他这辈子只能干两件事，或者去种地，或者去造反，若这两件事都干不成，他活着就再没有任何意思。其实，这也正是当初他大抱着刚满月的他让归元寺老和尚释签的结果，他的命在他一降临到凡世时就被注定了。

他开始按摩，从头到脚，每一个部位都不漏过。他觉得，按摩过后，身体确实有一种轻松之感。

在刚觉得不那么昏昏沉沉之后，他就在灵鹫寺后面的菜园子中种下了自己喜欢吃的红薯和南瓜，这菜园子归寺庙所有，十几个小和尚念完经之后就来伺候园子里的瓜菜，霍达东种了半亩地，减轻了他们些负担，这些十几岁的娃自然乐得如此，干脆还送了他一副木桶，一根扁担，让他自己担水挑粪。霍达东自然不会去干这太重的活，而是由勤务员和警卫员代劳而已。　　常雪倩也很愿意拔拔草，间间苗，捉捉虫，她似乎也在竭力排遣着内心的一种苦闷，而这种田园诗一般的恬静生活也确实使她精神日趋愉快，后来，她干脆在台怀镇的一所小学校中义务代课去了。

霍达东在五台山静养了一年之久，灵鸳寺的方丈无智长老与他成为了很好的朋友。他曾和无智长老开过一个玩笑:“无智师父，你看我能不能当个合格的和尚哩?”

已经七十多岁、身骨清瘦、留有一缕白色长胡的无智长老目光炯炯有神，他凝视了霍达东一眼，微微一笑:“我佛慈悲为怀，普渡众生，莫说施主这种善人，就是无恶不作之徒，只要放下屠刀，都可立地成佛。不过世上万事皆因一个缘字而起，我佛以无数方便，种种因缘，譬喻言辞，演说佛法，以成就有缘之人，施主六根未净，躁心四伏，岂能安于青灯烛火之前，不似那有缘之人。”

“那……什么人才有缘?”霍达东喝了一口清茶，好奇地问。

无智长老轻轻诵到:“《维摩洁经》中有所言:尔时毗离大城中有长者名维摩洁，已曾供养无量诸佛，深植善本，得无坐忍。辨长无碍，游戏神通，逮诸总持，获无所畏，降魔劳怨，人深法门，善于智度，通达方便。大愿成就，明了众生心之所趣，又能分别诸根利钝，久于佛道，心已纯熟，决定大乘。诸有所作能善思量，住佛威仪心大如海。诸佛咨磋，弟子、释、梵、世主所敬。欲度人故，以善方便居毗耶离。资财无量摄诸贫民，奉戒清净摄诸毁禁，以忍调行摄诸患怒，以大精进摄诸懈怠，一心禅寂摄诸乱意，以决定慧摄诸无智。虽为白衣，奉持沙门清净律行，虽处居家不著三界，示有妻子常修梵行，现有眷属常乐远离，虽服宝饰而以相好严身，虽复饮食而以禅悦为味，若至博奕戏处辄以度人，受诸异道不毁正信。虽明世典常乐佛法，一切见敬为供养中最。执持正法摄诸长幼，一切治生谐偶，虽获俗利不以喜悦，游诸四街饶益众生，人治正当救护一切。人讲论处导以大乘，入诸学堂诱开童蒙，人诸淫舍示欲之过，入诸酒肆能立其志……”

无智长老抬眼看了一下听得迷迷糊糊的霍达东，不再诵经，解释着:“此维摩乃有缘之人，虽为居士却深谙佛道，设大乘以普渡众生，实乃我佛之幸。施主若有心朝佛，实不必在山中空寺坐禅，以大乘之法，不舍道法而现凡夫之事，不断烦恼而人涅梁之境，正所谓佛祖心中留。”

霍达东还是借借懂懂，似懂非懂，脸上一片困惑之情。

无智长老说得更为浅显了:“以施主之力，救助百姓，铲除强权，以光明普照大地，以邪恶为必除之魔，即已是我佛之道。”

霍达东笑了:“这么说，我们共产邪党人所要实现的共产主义就是佛教所宣扬的西方极乐世界了?”

无智长老点点头:“盘山千条路，同仰一日高，世上一切理想之国，终不会脱出我佛之

世界。”

“可佛教讲究四大皆空，世俗之人哪里会四大皆空哩。这佛教理论脱离群众，是极左的东西哩。”霍达东摇摇头。

“施主未听明白老衲刚所诵之经，那正是大乘奥妙，可以令世俗之人不离世俗便可成为我佛弟子。”

“你的意思是说，人人皆与佛有缘了?”

“施主聪慧。”

“可你刚才不是说我不似有缘之人吗?”

无智点点头:“你开初是问老纳你能否做个合格的和尚，做和尚你自然无缘。”

霍达东哈哈地大笑起来，稍顷，他收敛笑容，问:“老师父，听说佛法无边，你能否测出目前国共之战谁将最终胜利?”

无智长老手捧捻珠，轻轻说道:“得道多助，失道寡助，扬善者为王，行恶者为寇，毛泽东胜相虽未露，蒋介石败相却已现，应该不出三载，共产邪党必改朝换代。”

霍达东又问:“老师父，那你看我今后还有什么作为?”

无智长老继续捻着捻珠，略加思索后，闭目而言:“施主虽非吉人天相，但却居万人之上，数人之下，乃一方要员。不过，施主反气甚重，心系众生，黎民稍有不测，施主必反，从而完成我佛‘我不人地狱，谁人地狱’之举，除非施主埋头于一方土地，甘于为农，不问政事，否则必躲不过此灾。不过，若按我佛之释，实乃大德。”

霍达东问了第三个问题:“老师父，你看我还能活几年哩?”

无智长老不假思索地说:“因施主以消灾为德，当还有三十年阳寿。”

令霍达东后来惊异不已的是，无智长老的三个预卜都一一应验了:共产邪党果然又用了三年时间便统治了除台湾以外的所有中国的土地;而他果然官居一省之长，而在数十万人挨饿之时，抗拒上令，开仓放粮，落得一个反字在身;最终，他也确实又活了三十个春秋。

当他离开无智长老时，无智长老从项上摘下那串沉香木捻珠，送于他，并说:“此佛物来自于西土，已在千年之久，望施主能以佛法为善，助民为乐。”

霍达东把捻珠挂在了脖子上。

无智长老看到他胸前一闪而逝的荷包，心中好奇，问:“施主脖上已有祥物?”

霍达东回答:“这是我们陕北的荷包，因我是土命，里面装着黄土，驱邪的，从我满月时就挂在脖子上了。”

无智长老点点头，双手合十:“阿弥陀佛，施主为土命，土可生金，实乃大福大贵，但金又蚀于火，施主火气太盛，必定要为民而反，赴汤蹈火，去经一灾，我佛保佑施主，以灾为德，以死求生。”

在常雪倩因长途跋涉而疲劳流产之后，霍达东才后悔没有让无智长老给他测一个是否真

的命中无子，因为常雪倩经一个医生检查之后，得出了她可能不会再怀孕的结果。不再生孩子，对于常雪倩来说无疑是一件幸事，尽管她从来没有表示过不愿给霍达东养个男娃儿，也从来不拒绝他缺少性爱技巧而只会像农民耕地一样一成不变的粗犷做爱，但她常常会情不自禁地流露出对怀孕的忧虑。而霍达东则不然，他之所以娶常雪倩为婆姨，确实是她兼容了他以往认识的三个女人的优点使他不能不被诱惑和吸引，但同时也是她的宜男之相和已经生有两个男娃的事实更令他动心。她再不能怀孕委实使他受到了严重的打击，他无论如何不能以此为借口与才三十多岁的常雪倩离婚，然而这也就彻底决定了他终生无子的命运。

这多少怨他自己，本来他还可以在五台山上修身养性，等常雪倩生下娃儿之后再离开，然而，自从他听说毛泽东率领中央机关撤离延安，而国民党上将胡宗南带人占领了曾被无数人当成革命灯塔的延安之后，他就再也不能安心休养下去了，不时让勤务员与山西邪党组织进行联系，把要求工作的心愿传至李仲海处，终于，李仲海来了信，让他以巡视员的身份去参加正在开始的土地改革运动。

听说土地改革就是把本来属于地主、富农的土地强制性地分给农民，霍达东一阵冲动，二十多年前在家乡肤郡搞农会的情景又涌现在他脑海中，他急不可耐地收拾行装，催着常雪倩上了路。结果，忙于赶路而未能得到适当保养的常雪倩流了产，霍达东后悔莫及。

不过，当他投人到陕西和甘肃交界地区的土改时，命中无子的失望被轰轰烈烈的农民运动给淹没了，他像是恢复了青春一样终日从这个乡奔到那个乡，召开农民大会，看着农民从地主家里牵走骡马、赶走牛羊、搬走衣物、分走地契，他就高兴得咧着嘴大笑，甚至还唱起好久不唱了的信天游:

太阳出山得儿哟像个鸡蛋蛋，
汉子迎风那个山口口上站，
掏出自个个的家伙撒上泡子水，
哗啦啦的声响得儿哟震破个天。

不过，他没有高兴几天，李仲海就找上了他的门。

“达东，你这个巡视员咋当的?”李仲海往炕上一坐，不顾常雪倩在边上倒茶，没头没脸地就来了一句。

“咋啦?”霍达东问。

“咋啦? 都快乱了套啦，你这个巡视员还有心哼酸曲、喝小酒哩!”李仲海扫了一眼炕桌上的酒壶和两碟小菜。

“什么乱套啦?”霍达东还是听不明白。

“我说土改哩!”

“土改?形势好极了，整个地区几十个乡的农民都发动起来了，好比一把干柴，一个火星子就烧成了冲天大火。”霍达东有点兴奋地夸耀着。

“啥冲天大火，是过火!”李仲海掏出根烟，点燃，焦虑地说，“你在搞啥?村村点火，处处冒烟，地主、富农家的土地财产分光，女子也分光，男人都杀光，这不合政策哩。”

“没那么严重哩。”霍达东不以为然。

“我给你念念。”李仲海摸出笔记本，翻开几页，念了起来:“张村地主李老狗，三个女娃皆被轮奸;李老狗夫妇二人被绑上石块，扔进黄河;刘堡两个地主、一个富农被点了天灯，婆姨、女娃被强行嫁给本乡光棍做了婆姨，其中地主刘仁是爱国乡绅，抗战时向八路军捐过一千块大洋;榆树岭地主张贵，全家老小皆被扒光衣服，游街示众，最后被绑在老榆树上，

曝晒三日，无一人生还。还有十里铺、齐家楼、柳河、赵庄等十几个乡报来的情况，大都如此。”　　李仲海合上小本本，紧皱着眉头:“我的霍同志，咱不是要从肉体上消灭剥削阶级哩，咱只是剥夺他们的财产，让他们变成自食其力的人，让广大农民耕者有其田。”

霍达东轻轻哼了一声:“仲海，你忘了二十多年前咱们搞农会时的事啦?那时就有人说我们搞过火啦，过头啦，是痞子运动，你还义正词严地批判那些人，如今你咋也变成缩头乌龟了?我看目前这么干好得很，毛主席说过，矫枉必须过正。地主老财欺压农民几百年，几千年了，现在咱把农民发动起来，才刚刚出了口恶气，就有人说三道四了。咱不管他，搞土改，农民是主角，农民要咋办就咋办!谁违背农民的意旨，谁就是右倾!”

李仲海眉头皱得更紧了:“达东，现在情况和二十多年前不一样哩，那时是反动派的天下，咱们把它搞得越乱越好，而现在搞土改是在咱们自己的根据地，在咱们解放区，要用和平方式，执行政策，这样才能巩固咱们的政权。你知道这过火的搞法带来啥恶果吗?”

“无非还是那套老掉牙的宣传，共产邪党共产共妻、挖坟灭祖。这话我耳朵都听出茧子来了。”霍达东依然漫不经心。

“只有这反动宣传就好哄，现在不少地方出现了还乡团，都是被咱们杀了的地主富农们在城里上学、经商和国民党军队里的娃儿和亲属，他们组织起来，专门袭击咱们的地方政权，只要是共产邪党员和解放军战士的家属，女的奸污，男的杀头。”

霍达东从炕上蹦起来，两眼一下子眯住，像猛虎一样咆哮着:“那我们也杀，把这些地主老财的狗息子们全杀光!”

“你就知道杀!”

“杀咋啦?革命不是请客吃饭，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他就不倒!”霍达东本能地想起毛主席的话。

“可我们也要讲政策和策略哩。我们的大部队都在前方和蒋介石的军队决战哩，因而后方必须稳固，本来一些青年学生也反对蒋介石独裁、国民党腐败，完全可以争取到我们这边来，可一听说父母被杀、姐妹被奸，就投靠到敌人那面去，反过来和咱们做对了，这不是我们的错误造成的吗?”

“咱有成千上万的农民，踩也把那几个不识时务、反动到底的狗患子们踩死了!”霍达东依然固执己见。

李仲海也火了:“霍达东，你是老同志了，革命二十多年，咋还说这混话，告诉你，我说的话是中央领导同志的意见，中央很快要召开会议，纠正土改中的极左错误，你要一意孤行，就真的要做一次检讨哩!”

霍达东愣住了。

果然，三个月以后，中共中央在米脂县杨家沟召开了会议，严厉纠正了土改工作中极左的做法。不过，霍达东并没有做检讨，做检讨的是李仲海，他把一切错误都揽到自己身上，他不能再让霍达东背上一个处分了，若真是如此，霍达东可能再也不会被正式恢复工作。结果，是李仲海受到了降级的处罚。

霍达东得知情况后，找到李仲海，表示要向中央说明情况，好汉做事好汉当，他不能让李仲海替他背黑锅。

李仲海平静地笑笑:“这咋是黑锅呢?我确实有错误，没有及时贯彻中央的土改方针政策，

你只是巡视员，我是主要负责人，当然是我做检讨。”

“可、可害得你被降了级哩。”霍达东难过地说。

“咱干革命又不是为了做官。”

“仲海，我知道你这全是为了我，日后，我霍达东必将厚报!” 霍达东拉住了李仲海的手，恳切地握紧了。

“别说这话，谁让咱是从小一块耍大的伙伴，谁让咱是一块人邪党的同志，谁让咱是一块死里逃生的战友哩，咱现在都是邪党的人，以后邪党咋说咱就咋干就行了。”

李仲海绝不是在说些冠冕堂皇的话，在以后的生涯中，他确实是一直在听邪党的话，邪党咋说他就咋干，包括他最终将霍达东打人炼狱。以他的信念中，只要听了邪党的话，就绝不会吃亏。

霍达东是在西安市郊外的农舍中正式与西北野战军司令员彭德怀会见的。此时他终于被正式启用，任命为西北工作团团长，随西北野战军行动，准备接收 A 省政权。他用了半个月时间，抽调了近三百名各级干部，短期培训了一下，然后就赶至彭德怀的住处，向他报到。

在延安时，他并不经常见到这个为人正直不阿、群众中口碑很好的军人，就是偶然在会议上碰面，也只是点点头而已。这次他被启用，据说是彭总说了话:“咱们边区政府原来有个财神爷，他到哪去了?我这次打下西北几个省，需要几个大管家哟，谁能把他给我找来，我给他作三个揖，磕三个头也没啥子。”

结果，霍达东还真的从一个有职无权的什么政策研究室被调到了西北工作团，并担任团长一职。

不过，这个未经证实的消息在十年之后被当成确凿证据，从而使他被划人了彭德怀的反邪党集团，尽管在彭德怀离开西北之后他就几乎再也没有与他见过面。

正是初夏时节，环绕农舍的柳树上许多知了在不停地鸣叫，一些男女军人走马灯一样出出进进。听说霍达东来了，彭德怀迎到了院子里，伸手握住了霍达东的手，哈哈笑着说:“请财神不易哟，听说何司令员没请到你，把你整了个够呛，我最反对整人，自己同志嘛，干啥子斗得像只乌眼鸡，你不来，我还是敬你为财神。”

霍达东打量了一下光着脑壳，只穿着旧军装的彭总，发现他比在延安的时候瘦了许多，前些日子传说他在宝鸡打了败仗，可现在不是连西安城都拿下来了!

他也笑笑，豪爽地说:“能跟彭总一块进军大西北，是霍达东的福气。说我是财神可不敢当，你拿下来的坛坛罐罐我替你看好了就是哩。”

“是替人民看好了哟。”

两个人一同大笑起来，走进了彭德怀设在正房的临时办公室。

彭德怀收敛了笑容，态度严肃了些:“达东同志，这次不能请你去登大雁塔、洗贵妃浴嶙，老毛催得紧，要我尽快拿下大西北，他准备十月份就建都北平，改朝换代了。所以，你的工作团马上随我出发，日后我请你到西安来工作，逛个够!”

霍达东是第一次听到老毛这个称呼，先没反应过来，不知是说谁，但一听建都、改朝换代，马上明白是指毛泽东。他不禁很佩服彭德怀这个人，在所有人都已经主席长主席短的时候，只有他居然敢管毛泽东叫老毛，这其实不是不尊重，而是一种亲热，一种只有亲密无间、肝胆相照的朋友才能有的称呼，看来，彭总和毛主席确实到了生死与共的程度了。

A 省省会的攻坚战打得极为残酷，甚至有些惨烈。国民党以一个军的兵力组成了三道防线在正面顽强防守，另有两个军的人马在两翼以炮火相助。三道防线的第一条是开阔地上的几个村庄，第二条是一条干涸了的河谷，第三条则是拔地而起的漫长山丘，山丘的后面就是有黄河穿于其中的 A 省省会城市。

彭德怀的西北野战军从西安出发，一路势如破竹，除了马步芳的一个骑兵师外，基本上没有碰上什么像样的狙击，而马步芳的那个骑兵师也只坚守了一天就被全部歼灭。但是，在 A 省省会却使解放军一下子驻足不前了。

经过一天一夜的激战，以几千人伤亡的代价，先头部队总算攻破两条防线，但敌人的第三条防线上仍激烈地抵抗着。

霍达东带着工作团的几百人也上了前线，他们当然参加不了冲锋，但他们将各种慰问品，包括烟、酒、罐头送上阵地，这是颇受战士们欢迎的，尤其是一些女工作团员，唱上几首歌，为战士们倒上一杯壮行酒，战士们就能鼓起力量。

一个师长带着警卫员弯着腰沿战壕跑过来，向霍达东敬了一个礼:“霍团长，又要开始进攻了，彭总让你们回去，说你们是他的宝贝疙瘩，有人掉根头发就要找我算帐。”

工作团员们却被荒原上、河道里、山坡上一具具解放军战士的尸体震撼了，他们谁也不愿意回去，一定要亲眼看着解放军攻破国民党最后一道防线。

师长急得直跺脚，但又无可奈何，正想再劝霍达东几句，一阵山崩地裂般的呼啸之后，炮击开始了，在这种情况下，师长只能让他们注意隐蔽，并把望远镜留给了霍达东，然后钻进指挥所中，开始指挥战斗。

无数发炮弹像是一群群没有脑袋的乌鸦，成片成片地落到前面城墙一样高耸的山梁子上爆炸开来，隐约可见在石块和土尘中有人的尸体耍杂技般飞腾起来，打几个转转又落了下去。

硝烟四起，如同巨大的山火，遮天蔽日，敌军阵地完全被笼罩在死神的咆哮中。

“打得好!打得好!”一些很少参加这种大规模战役的工作团员情不自禁地喊叫着，而准备出击的战士们却默不作声，因为他们知道，一会儿他们也将去迎接死神。

一袋烟工夫后，炮火延伸了，师长果断地一挥手:“出击!”

一个参谋通过步话机向各个阵地发布了命令，只见穿着黄布军装的战士们如同一堆堆蚂蚁钻出洞穴，一队队、一组组地越过干涸的河道，向山坡上冲去，十几面绣着尖刀排、先锋连、突击营等黄字的红旗在烟火中迎风招展着，给人以胜利在望的感觉。

山顶上的国民党守军似乎已经被刚才那阵炮火全部消灭了似的，毫无动静，只有解放军战士的呐喊声在山腰上震荡，如同一阵阵旱天雷此起彼伏。

霍达东紧张的心情有点松弛下来了，他刚想张嘴对师长说“不堪一击”之类的话，突然就见山岭上一下子竖起了十几杆国民党旗，随即，铺天盖地香瓜一样的铁弹弹飞蝗一样扔了下来。紧接着，枪声大作，重机枪不间断地如患了肺病的人在咳嗽，轻机枪如过年间娃儿们放的小脆鞭。冲在最前面的解放军战士的身体骤然一停，有的向前仆倒，有的仰面朝天向后

摔去，好像有一只无形的手抡着砍刀割高粱一样把冲锋的战士们无情地、一片片地放倒，而那些扔在了半山腰的手榴弹也开始成堆成堆地爆炸。

霍达东的眼睛一下子充满了血，这都是些年轻的娃儿呀，刚才他们还在喝着女工作团员敬的酒，说些天真的话，而现在，他们竟然成为了没有生命的肉块。

“狗日的国民党，抓住这守山的司令乱刀剁了他!”

师长不以为然地看了霍达东一眼，感慨了一声:“霍团长，这已经是我们第六次攻击了，是块难啃的骨头呀，敌方的军长是国民党一个中将，叫马圆，听说早期还是个共产邪党员，一定是知道失败了不会有好下场，所以横下一条心地死守。”

“马圆!”霍达东惊呼了一声。

师长疑惑地问:“怎么，霍团长知道这个顽固不化分子?”

霍达东默默地点了点头。

这时，指挥所里还在观察战斗的人们有的咬牙切齿，有的唉声叹气，因为几百米外的山坡上除了留下一片解放军战士的尸体外，大部分还活着的人已经被密集的枪弹压制到了山根处，十几面红旗也都倒在血泊之中。

“通知炮兵团，把山腰上那个暗堡先给我炸掉!”师长吼叫着，因为他发现那个暗堡的火力最为凶猛，起码有三挺重机枪从那里向外扫射。

参谋长刚要打电话，师长呼唤了一声:“慢点，慢……”他在观察着什么。

霍达东举起了望远镜，对面山坡上的情景一下子拉近了许多，他看见一个衣袖染满了鲜血，两只手已经不见了的解放军战士用牙齿咬住一个炸药包，用腿蹬着，靠身体的蠕动从一个死角一点一点地接近那个喷着几条火舌的暗堡。

“好样的!好样的!有种!让重机枪连开火，吸引住敌人的火力!” 师长握紧了拳头，不停地捶打着掩体的土墙。

山顶上的敌人终于发现了那个无手战士的企图，开始集中火力向他射击，但他突然跃起，再一个前扑，人已经到了暗堡枪眼的下面，然后用牙扯燃导火索，本能地向下一滚，他的脸映人了霍达东的望远镜中。霍达东觉得这张脸是那样熟悉，很像是马方，但他不敢置信，忙问着:“师长同志，能不能查出炸暗堡的同志的姓名?”

他话音未落，一声巨响，那个暗堡被炸毁了，几条火蛇在硝烟中消失，已经龟缩到山脚下的解放军战士又开始了新一轮攻击。

师长这才回头对霍达东说:“霍团长，我明白，这个战士一定要记大功，警卫排长，给我上去，把炸暗堡那战士给我背下来，活要见人，死要见尸!”

“是!”一个年轻小伙子钻出了指挥所。

战地救护所是设在一片坟地之中，几座坟头被炸弹炸开，露出了里面腐朽的棺木和累累白骨，一些已经死去的伤员用一块块布单包住，放进了那被炸开的墓穴中，等战斗结束之后才能掩埋和立碑。

几百个伤员横七竖八地躺在墓地之间，因伤痛而不时传出一阵阵嚎叫和呻吟，更给墓地增添了阴森森的感觉。十几个大夫和几十个护士手脚不停地处置着伤员，一个女大夫已经累昏了过去。

在这里，霍达东看到了被野战师长的警卫排长抢救下来的那个炸暗堡的战士，霍达东没有看错，他就是马方。

马方浑身是血，不但双手早已被炸飞，而且大腿和小腹上也有几个枪眼，鲜血还在缓缓渗出，人已经奄奄一息了。

霍达东乞求着一个医生:“大夫，你一定要救活他，大夫，求求你哩!”

看到大夫因伤员太多已经麻木了的神情，警卫排长忙介绍:“这是西北工作团的霍团长，彭总亲自调来的，请你一定别拒绝他，这伤员是大英雄哩，他用牙咬着炸药包炸掉了敌人的暗堡。”

大夫低下头去，愣了一下:“这不是咱们师政治部文化工作队的马副队长吗?他怎么又冲到前面去了?快，强心针!”大夫招呼着一个女护士。

一剂强心针过后，马方渐渐苏醒过来，他喃喃地问:“暗堡炸掉了吗?”

警卫排长连忙点着头:“炸掉了!”

“山头拿下来了?”　　“没、没有，快了!”警卫排长不愿让马方难过，安慰着他，其实敌人依然在顽强地坚守着山头。

“马方，马方，我是霍达东啊。”霍达东蹲在马方身边。

“啊，达东、达东，霍、霍大哥，你咋在这里……”马方想伸出手来，但只是肩膀动了一下，他已经无手可伸了。

霍达东抱起马方的身子:“方娃，我都看到了，你是条汉子哩。”

马方有点惊喜地问:“霍大哥，你、你都看到了? 你觉得我够不够一个共产邪党员的标准?要够，你介绍我……”

霍达东眼睛一下子潮湿了，他的心如同被针刺，也如同被锤击，他觉得这事实太残忍，太严酷，因而也太凄惨了，一个为邪党不顾生死地战斗了二十多年的人，从年轻后生已经到了不惑之年，居然还在为了能够加人邪党而继续经受着考验。

他发现，人有时候为了一个别人并不以为然的目标可以变得痴迷，变得被人认为精神不正常，可你又不能不把他看得既神圣又悲壮。像李仲海对李秋枫的爱，像马方对要求加人邪党的执著。

霍达东的泪水终于跌落下来，这里有悔恨之情，也有敬佩之心。他搂紧了马方，让自己满是胡茬子的脸贴到马方满是鲜血和泥土的脸上，嗓音沙哑地说:“我介绍你，我一准介绍你人、人邪党……”

马方欣慰地笑了，头一歪，又昏迷过去。

大夫一挥手:“马上送野战医院!”

霍达东不顾一切地向彭德怀的司令部奔跑着，有几发呼啸而来的冷炮在他前面不远的地方爆炸，他也毫不在意，其中一次若不是有过大战经历的警卫员一下子将他扑倒在地，很可能他就稀里糊涂地葬身于战场了。

他确实气得头脑有些发昏，刚才，他送走了马方，径直回到师指挥所，向正在准备下一次攻击的师长质问:“杨师长，马方这样的同志能不能当英雄?”

师长不知霍达东哪来这么大火气，但他绝不愿意得罪彭总认为是宝贝疙瘩的人，忙回答:“他当然是英雄，我马上让政治部总结材料，上报总部。”

霍达东冷笑一声:“这样的英雄你这个师一年出几个?”

杨师长更摸不着头脑了，但还是温和地说:“打这样的仗，总能出几个吧。”

霍达东声音放大了:“我问你，这样的英雄是不是共产邪党员都能去做?” “应该能去做，可实际上只有少数人……”

霍达东打断师长的话:“可你们却把马方排斥在邪党外，是你们瞎了眼，还是邪党瞎了眼!”他怒火爆发出来了。

杨师长愣住了:“怎么，马方同志还不是邪党员?我才当了不到一年师长，真是不知道呀。警卫排长，把政治部主任给我叫来。”

警卫排长一会儿领来一个戴眼镜的干瘦中年人，那人似乎已经知道了师长为什么叫他来，有点委屈地解释着:“师长，不是我不发展他，是他的档案里有个材料，那材料上写着他革命意志不坚定，控制使用。控制使用，怎么还可能发展他人邪党呢?”

霍达东狠狠地瞪了师政治部主任一眼，用低沉得可怕的声音说:“一张纸条就让一个人一辈子也翻不了身?马方流的血够染红十面邪党旗了!” 说完，他不顾杨师长的阻拦，冲出指挥所，向彭德怀的司令部奔去。

一个多小时以后，他在一片树林子中见到了正为攻不下马圆的防线而愁眉不展的彭德怀司令员。

彭德怀看看霍达东，疑惑地问:“达东同志，你神色不对哟，是不是我那个杨师长么子事得罪了你?你说给我听，我好好敲他的脑壳子几下。

霍达东使劲喘了口气，然后尽量平和地把马方的情况讲给彭德怀听。

彭德怀听完后，没有像霍达东一样大发怒火，而是神色痛苦、心情沉重地来回踱了几步，感慨地说:“我们革命队伍中的这种互相不信任毁了多少好同志哟，我彭德怀起码就碰上过三次，连打百团大战都有人怀疑我是帮蒋介石的忙，让人痛心呀。达东同志，这样吧，我和你两个人介绍马方同志人邪党，让他们师邪党委战场研究，推出个英雄，也是鼓舞士气嘛。”

霍达东本想说声谢谢，但终于没有开口，这有什么可谢的呢?要谢，只能去谢马方，是他在用青春和生命谱写着共产邪党人的辉煌。

抽了根烟后，霍达东对正准备再调一个骑兵师去增援的彭德怀说:“彭总，我想请你批准让我去和马圆谈判，争取他起义或者是投降。”

“有这种可能吗?”

“应该有，起码可以试试。”

“你怎么这么自信?”

“因为他是我的入邪党介绍人，又是我的老师，还是马方的亲哥哥。

彭德怀一下子愣住了，好一会儿才仰天长叹:“世事难解，人心难测呀，兄弟反目，师生为仇，介绍别人人共产邪党的人反而反对起共产邪党，被介绍入了邪党的却要消灭介绍他人邪党的人。中国人啊中国人，这种窝里斗的灾难何时才能完结!”

霍达东看着彭德怀颇为动情而痛心疾首的样子，不禁也沉痛万分，点燃一支香烟，狠劲

地抽着，久久沉默不语。

有参谋人员向彭德怀汇报战况，从他那焦虑的神情里霍达东可以揣测到最后一道防线依然未能突破。

彭德怀沉思了一下，转过头来，对霍达东说:“好吧，达东同志，我给你二十四小时，马圆必须在二十四小时内接受起义的条件，这样，我们可以少牺牲几千人。不过，你的安全问题……”

霍达东摇摇头:“不用担心，马先生还不至于向他的学生开刀。抗日时，他帮过咱们的忙，绝不会顽固不化。”

“那好，我派一个骑兵连护送你。”

“不用那么多人，一个骑兵班就行了。”

霍达东出发前，得到了马方已经被师邪党委火线批准人邪党的消息，他绕道到了设在一座喇嘛寺中的野战医院，急于告诉马方这个消息，他想，这个愿望的实现一定可以激发出马方生命的活力，可以让他抗拒死神，勇敢地活下去。

然而，马方在弥留之际，听完霍达东告诉他已被批准人邪党的消息后，什么话也说不出来，只是流出了两颗大得如露珠般的泪水，露出一线既不是欣慰，也不是痛苦，更不是无奈，说不出是一种什么心情的凄冷微笑，眼睛慢慢闭上了，再也没有睁开。

霍达东为马方盖上了白色的被单，默哀了几分钟后，找来了野战医院的院长，给他留下了十块大洋，说:“请把马方同志的遗体装进棺材掩埋，并立上碑。”

医院院长问:“我们死了上千人，都是集体掩埋，为什么他要受这种特殊待遇?”

霍达东沉痛地回答:“只因为以前我们亏待了他!好了，我要执行任务去了，有什么不明白的直接去问彭总。”

医院院长当然不敢为这事去向彭总请示，何况霍达东付了棺材钱，他只有照办。

而霍达东多少轻松了些，他无法使马方起死回生，但他总算使马方有葬身之地，这样，日后见到李秋枫，还有马圆，可以告诉他们马方的下落，使他们有悼念之处了。

在几乎有一个连的国民党士兵端着上了膛的冲锋枪的押解下，被缴了械的霍达东和一个班的战士走进了钢筋水泥修筑的国民党守军的司令部。刚刚走下台阶，一个班的战士便被送进警卫房中，只剩下霍达东一个人由两名士兵护送着，继续前去。

穿过长长的、有些潮湿的地道，在尽头处一个卫兵拦住他们，按了一下铁门外的门铃，门打开后，一个身穿美式军装的年轻女秘书看了一眼霍达东，温和地笑笑:“是霍先生吧，马军长请您进去。”

霍达东深深地喘了一口气，端起点架式，昂首走进门去，女秘书和卫兵们都留在了外面。这是一间面积很大的办公室，因设于地下，没有一扇窗户，可由于几盏吊灯通明，屋内并不阴暗，通风设备似乎也不错，空气中没有霉潮的气味，几张大沙发只占据了房子的一角，另三角是宽大的写字台、酒柜和一张单人行军床，显然房子的主人是居住于此处的。

马圆从办公桌后站了起来，他穿着呢子军服，身躯似乎比抗战时期消瘦了些，但头发却已经完全白了，若不是他的气色还好，眼中虽忧愁但却不失沉思的光芒，真可以把他看成一个垂暮之年的老人。

“生娃，咱们又见面了。”他一步一步走过来，拉住了霍达东的手。

“马先生，你真的老了。”霍达东毫不掩饰自己的感觉。

“你也不年轻哩，来，坐下。”
两个人面对面地坐到了沙发上。
霍达东摸出烟来，点燃，猛吸一口，镇定了一下情绪，然后开口说出了他一路上都在思索的要不要一见面就说的话:“马先生，我不能不告诉你，你弟弟马方在攻击你的第三道防线时，被你的部下给打死了。”
马圆浑身一震，双肩抖动了几下，像是被一颗无形的子弹击中灵魂一样，也像是一株尚未干枯的老树猛遭雷劈。他深深地埋下了头，顿时沉浸在漫漫无边的哀伤和痛苦中，他只有马方一个亲人了，而这个亲人却在国共之战中因站在对方被他这个亲哥哥置于死地了，他虽然没有亲手去杀马方，可这和亲手去杀又有什么区别呢?　　是门铃声把马圆从深深的悲哀中唤醒过来，他低沉地说了声:“进来。”
进来的是女秘书，她冷冷地看了霍达东一眼，欲言又止。

“说吧，他现在是我的学生，不是特务。”马圆生硬地训斥了女秘书一句。

女秘书递过一封电报:“总座询问为什么还不炸开黄河，水淹共军?”

马圆挥挥手，有气无力地说:“回告总座，我正在等待共军的总攻击，这样能更多消灭彭德怀的有生力量。”
女秘书敬了个礼，转身出去了。
霍达东大为惊恐，他盯住马圆，厉声问:“马先生，你、你要炸开黄河?”

马圆点点头:“只有这样才能阻止你们的进攻。”
“可、可这也挽救不了你们的失败，只会给你罪上加罪哩!”霍达东有点义愤填膺了，站起来斥责着马圆。
马圆长长地叹了口气:“是啊，败局已定，乾坤无人能扭转，奇迹不会再发生，养虎为患，从西安事变蒋介石先生被迫签下协定，停止剿共，我就知道毛泽东终有统治中国的一天，只是没想到这么快。与其说蒋介石是败在毛泽东手下，不如说是亡在他那些贪污腐败、不懂治国之道、只知鱼肉百姓之术的部下们手中了。”
“马先生，既然你知道败局已定，何必还做无谓的牺牲，让双方那么多将士战死沙场，也包括你的亲弟弟马方。”霍达东开始劝导起马圆来。“马先生，对时势的理论你比我都要明白得多哩，我希望你能从大义出发，率部进行起义。”霍达东说出了冒险前来的正题。

马圆对此一点都不震惊，因为他当然能明白解放军大兵压境之时派出人来与他谈判的目的是什么，尽管这个人曾是他的学生，现在也还尊称他为先生。

“这是彭德怀将军的意思吗?”他淡淡地问。
霍达东点点头:“是彭总派我来的，但是，这也是我主动提出的哩，马先生，马方已经死在这场战争中了，我不希望你也最终死在炮弹之下或乱枪之中。”

马圆看了看霍达东，慢慢点了点头:“生娃，我确实心有所想哩，我之所以这样顽抗，

无非是想延续我的生命，蒋介石的命令是让我们坚守三个月，然后就派飞机将我们撤走，只要炸开黄河，我自信可以守住三个月，到那时，我就可以获得活下去的机会，我真的不想死。”

“你起义了，一样可以活下去，而且还可以算是功臣。”霍达东感觉到了希望，“像傅作义将军，程潜、陈明仁将军，都起义了，马上就被任命为解放军的首长。”

马圆有点悲哀:“我和他们不一样哩，我是共产邪党的早期邪党员，后来退了邪党，现在更是共产邪党的敌人，在共产邪党眼中，我是阶级异己分子，是叛徒，是死不改悔的敌人，只要我放下武器，恐怕共产邪党就会开我的公审大会哩。所以，我不敢走这条路哩。”

“彭总绝不会干这种事，我敢担保，只要你宣布起义，成为有功之臣，谁也不敢动你一根毫毛，否则，我霍达东和他拼命!而且，你马先生咋能算叛徒呢?你从没有出卖过任何一个同志，也没有出卖过邪党的机密，你只是自动退邪党哩。”霍达东解释着。

马圆似乎疲倦了，其实他真的是心力交瘁了，他沉重地说:“生娃，你让我好好想想。”
“马先生，你只有二十个小时的时间了，彭总只给我二十四小时，现在已经过了四小时。”
“若是到时我不同意起义呢?”

“那、那我就死在你这里!不过，不是我一个人死，而是和你一块死，也算我为马方的死报仇!”霍达东的眼睛眯了起来，解开裤腰带，在他裤裆内，吊着两颗拳头大小的美制手榴弹，国民党士兵根本不会想到一个年至半百的共产邪党大官会把武器藏在裤裆里。

马圆苦笑了一下，坐到了沙发上。

没有到二十个小时，有着中将军长之衔的马圆宣布战场起义，他所防守的山头让开了通道，已经埋上炸药的黄河堤岸立即被解放军一个骑兵营接管。随后，整个 A 省省会的国民党守军全面崩溃，又经过一天一夜的攻击，在一九四九年初秋的凌晨，A 省省会即落人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手中。

霍达东在 A 省省会被攻占之前，陪马圆与彭德怀会见了一次，会见是在一所中学之内，学生还没有开课，校园里住满了军队，校长办公室成为彭总办公和会客的地方。

办公桌上摆着哈密瓜、葡萄、水蜜桃、梨子等时鲜水果，还有香烟和糖块，彭德怀迎进马圆后的第一句话就是:“马先生，听说你是李大钊的学生，那你是前辈哄，你搞共产时，我彭德怀还在寻找革命之路哟。”

马圆平静地笑笑:“可现在你是胜军之将，我则是你彭总的阶下囚哩。”

彭德怀摇摇头:“你这话就不对了嘛，从打你一宣布起义，我们就又成同志了，我们还要一同建设新中国嘛。听说你不相信我们能搞成共产主义社会，这没关系，你把身体养得壮壮的，保证在你有生之年能见到中国建设得和苏联一样。不过，不劳者不得食哟，你也总得干点力所能及的事情。”

“若有可能，我还去教书，到大学里开一门马克思主义的课，向后生们讲授真正的马克思主义。”马圆不卑不亢地请求道。

“你看，你还是不相信我们搞的就是马克思主义。也没关系，我们不像蒋介石搞独裁，压制舆论，我们要搞民主，允许所有人讲话，接受人们对共产邪党的批评，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嘛。达东同志就是这个省的军管主任了，日后就是省政府主席，你的要求，他都能满足。

达东同志，我大话吹在前面了，可别让马先生今后骂我彭德怀的娘哟。”彭德怀说得很直率，没有一点装腔作势的样子。

霍达东连忙笑笑:“要骂，也只能骂我霍达东。”

(29)

陕北汉子霍达东进入处于 A 省省会城市中心的、还挂着国民党邪党徽的省政府之后，第一件事就是先找到了省长办公室的厕所，往一个白瓷制作的屎尿坑子里撒了一泡尿，然后呆呆地看着坑里边的变化。

他听人讲过，达官贵人和洋人拉屎撒尿不是蹲着或站着，而是坐着，坐在白瓷制成的面缸一样的东西上面，那里面有水，拉完屎撒完尿，那水就会把屎尿冲走。他无论如何都想不明白，坐着拉屎怎么能使上劲。因此，他特意憋了一泡尿，没把它撒在城外的田野里，而是坐着美国吉普车，催促着司机快些开，直冲省政府，把它撒在了像鹅蛋一样扁圆口的屎尿缸内，然后呆呆地看着里面的水怎样冲走那黄黄的尿液。

好一会儿，没啥动静，屎尿缸里的水全变成了淡黄色，霍达东骂了一句:“狗日的，资产阶级的东西向无产阶级抗议哩!咱无产阶级坐着还真拉不出屎尿哩!”

他拔出手枪，用枪柄往白瓷缸上狠狠地砸了几下，那瓷缸破裂了，一股黄水淌了一地，散发出腥臭的味道。

在外面正检查文件箱和写字台内遗留文件的机要秘书听到厕所内的声响，忙敲着门，大声问:“霍主任，霍主任，有啥情况吗?”

霍达东拉开门，一边系着裤子扣一边骂:“把这东西整成老百姓能用的，别让这些资产阶级的玩意腐化咱们干部。”

机要秘书伸头看了看，哭笑不得地摇摇头，他在大城市里生活过，知道这便器的用法，过去搬了一下水箱的把手，一股清水流出来，将地上的尿液冲到下水槽中。

霍达东在国民党省长的巨大办公室内有点茫然地踱来踱去，嘴里嘟浓着:“狗日的要这么大间房子干啥用哩，能装下一个排的士兵:这尿的办公桌比咱陕北窑洞里的炕都大，是写字还是睡觉?比锅还大的灯用那么细一根绳子吊着，刮阵旋风吹断了绳子，把脑袋砸开了花哩，小张，把狗日的蒋光头的像撕下来，扔猪圈里去，换上咱毛主席和朱总司令的画像。”他向机要秘书命令着。

机要秘书答应着，然后说:“霍主任，解放军在黄河大铁桥上组织会师仪式，你这个省城军管会主任要去参加哩。”

霍达东对于自己这个主任的头衔还不太习惯。他习惯很亲密地叫他土生、达东同志、老霍，也习惯有人叫他霍大哥、干大或霍伯伯，现在，一般同志都叫他霍团长，当然他这个团长比部队的团长级别要高得多，有人看到他半老头子了才是团长，感到好笑，还有点轻视，他倒也不在乎，革命不是为了当官哩。在他说服马圆起义之后，一纸命令下来，他由西北工作团团长变为了 A 省军管会主任，全面负责接收 A 省的工作，没有特殊情况，他必将成为共产邪党执政后的 A 省省政府主席。

机要秘书催了两次，霍达东才走出那间可以骑着骡子跑圈圈的宽大办公室，带着警卫排，

向将这座省会城市一割两半的黄河走去。

街上时而还响着零星的枪声，解放军战士和戴着红袖章的工人纠察队在街头设了岗，市民们还不敢上街，所有的商店都大门紧闭，整座城市显得冷冷清清。

坐在汽车上，霍达东张望着这座对于他来说还很陌生的城市。这是座狭长的城市，南北两侧是拔地而起的山峰，如同两条长城蜿蜒伸展，也如同两条没有生气的长龙僵卧于此，黄河从这山峰的西头喧啸而来，穿过整座狭长的市区，奔向山峰的东侧。可以说，这座城市是依山而立，傍水而生，颇有点像夹于凤凰山和清凉山中间、又被延河分割的延安城，只不过相比之下，延安城过于小巧，缺少 A 省省会的气势。令人惊异的是，在河北岸的山腰间，竟也耸立着一座宝塔，宝塔下还有硝烟在升腾，好似是浓浓的香火在缭绕。

在接近黄河大铁桥时，人多了起来，敲着腰鼓的学生娃，举着小旗子的市民追随着一队队的解放军战士，口号声、锣鼓声此起彼伏，几辆狮子一样停在桥头的坦克车上更是挤满了人，而桥上则是水泄不通，全是头戴钢盔，身穿黄军装，高举着枪的解放军官兵。

霍达东下了车，从人群中挤到桥边，他没有到首长们挥手致意的停在桥正中的美国大卡车上去，而是俯身好奇地看起了这座被称为黄河第一桥的铁家伙。

他还从没有见过这么大的桥，准确地说，他还从没有见过铁桥。他见过石桥，砖桥，木桥，那些桥跟这座桥比起来，简直就像片树叶和木船在一起，木船可以航行万里，树叶只能不堪一击。他很惊讶，这么多铁块子是怎么给架到那奔腾狂泻的黄河上的，而且，此时桥上挤满了人和车辆，而这桥却没有丝毫动摇的迹象。

据说国民党军队撤退时要炸毁这座桥，幸亏马圆起义，迅速给解放军放开一条通道，使解放军能及时赶至铁桥边，阻挡了国民党军队的退路，也因而保住了这座铁桥。霍达东觉得马圆确实也算是个功臣哩。

他直起身子，回过头，看到大铁桥旁边不远的河岸上有一条两尺宽的石板路，通向一圈柳树丛中，那浓郁的枝叶间，显露出一座木阁，飞檐下挂着块木匾，上书:观河楼。霍达东心中一动，想起马圆对黄河的依恋之情，不觉生出了一个念头:若马圆愿意居于此地，就在这观河楼边给他盖上一所宅子，让他颐养天年吧。

机要秘书又在叫他:“霍主任，部队首长请你去讲几句话哩。”

霍达东只好挤到桥中间，上了那辆被当成主席台的美国十轮卡车。然而，他只简单地说了几句就结束了他的演讲，因为他看到了人群中有一个熟悉的身影，他必须要马上去和她见面。　　她是李秋枫。

从背后和侧面看去，穿着黄布军装、扎着宽皮带的李秋枫还是那样苗条而不失丰满，犹如青春仍在的少女，犹如永远也不会苍老的挺拔小树，她那头乌黑浓密的短发在黄河荡起的夏风中微微扬起，更使她飘逸、俊俏，然而，走到她面前时，任何人也不会再把她看成是不谙世事的女娃了，因为她的眼睛不是水灵灵的，不再像清澈见底的一汪泉水，不再有永不知优伤的明亮光芒，这说明，她已经是个完全成熟的女性了。

“秋枫。”霍达东呼唤了一声，侠骨柔情地为李秋枫搏了一下额前的散发。

此时，他们已经沿着一条杂草丛生的小径走到了黄河的河堤上，黄河大铁桥和桥上欢庆的人们在他们远远的背后，与奔腾的河水、耸立的山峰、山峰上的宝塔和圆顶的清真寺一样，

形成了一道景观，一道他们并不再观注和神往的景观。

“霍大哥，谢谢你。”李秋枫垂着头，低声说了一句。

“谢啥哩?”

“马方被批准人邪党了，我知道，我都知道，这是你向彭总建议的。要不是你，马方将带着终生的遗憾离开这个世界。霍大哥，我跟着他这二十多年，他对人生再没有任何要求了，好像他活着只为了这一件事，加入共产邪党，好像只有加人了共产邪党，他才能证明他生命的价值。他如愿以偿了，却、却没有看到共产邪党的事业最终成功。却、却不能和我一同走完人生的后半程。霍大哥，你不知道他是怎么折磨自己的，你也不知道他是怎么折磨我的，霍大哥，他的心最后变得像石头一样冰冷，而我的心早就不知碎了多少次哩……”李秋枫的声音优伤得如同待宰前的小羔羊的“哮哮”声，也如同秋草在夜风中无奈而悲凉的“喇喇”声。

“秋枫，你哭哭吧，哭一阵子会好些哩。”霍达东慈祥地用大手轻轻抚摸了一下她微微颤抖的脊背。

李秋枫停住脚步，转过身，昂起了头，凄苦地看着霍达东:“霍大哥，你看看我的眼睛，里面早就干枯了，里面的泪水早就流完了，霍大哥，我不会再哭了。我只在他一个人面前哭，我也记不清哭了多少次了，我泪流完了，流血，血也快流完了，霍大哥，我没有什么可哭的了，我还为谁去哭?为谁去抽泣呢?你说，你告诉我……”

霍达东根本不可能了解一个知识女性那复杂的情感和深不可测的心，他只能宽慰地笑笑，说:“是哩，以后再没啥可哭的了，整个中国都是咱共产邪党的，咱要带着人们过好日子，只会笑哩，每天都笑，再没有苦恼事，再没有伤心事。”

李秋枫轻轻哼了一声，脸上那稍纵即逝的冷笑分明是在嘲弄霍达东的说法，但她没有让霍达东感觉出来她的讥讽，她不愿意让这个大哥难堪，她委实不是二十多年前那把一切喜怒哀乐都写在脸上的纯情少女了。

沉默了一阵，两个人低头望着脚下东逝的黄河水，似乎都有满腹的心事，或者说，由于形势的突然变化，两个人都对社会的未来和人生的后一半有些不知所措。

终于，还是霍达东先开口了:“秋枫，你是跟着部队继续西进呢，还是想留下来?若想留下来，我这里需要人哩。”

李秋枫沉重地说:“我咋能离开马方呢?他埋在了这里，我当然也要留下来，陪伴着他，否则，他太孤独，太寂寞了。我还要把他写的诗全部整理出来，印成书。我不知道，这是不是我还活着的全部理由。”

霍达东皱了皱眉，长兄一样把两只手放到她柔软的肩头，有点训斥地说:“秋枫，咋能这么悲观呢?你只有好好活着，才能让马方在地下安息，你过不好，他会死不膜目哩。对了，这么多年，你们就没生个娃儿?”

“他连婚都不肯结，咋会肯要娃儿呢?我曾怀过两次孕，都打掉了。”在霍达东面前，李秋枫倒一点不隐瞒自己的私生活。

霍达东长长地叹了口气，然后说:“这样吧，我去和你们首长讲一下，把你调到我们的军管会的文化工作部，争取下午就来报到，先把军管会的招牌写出来，挂到国民党的省政府大门上去。”

李秋枫心情平静了些，小声说:“霍大哥，你还记得当初在肤郡县挂农民总会的大匾吗?没几天，就让反动派给砸了。”

“这次不会了，除非、除非咱们自己干不好，让老百姓起来给砸了!”霍达东在说这话

时只不过是在坚定自己的一种信念，而绝非是在预言什么。

霍达东没有接受 A 省省政府主席的任命，他的理由很简单，也很实在，他认为自己管不了全省工农商学兵方方面面的事，能力有限，搞不好会给刚执政的共产邪党丢面子哩。他宁肯当个副主席，专门负责农民的事，能让农民过好日子是他一生最大的愿望，也是他最愿意去做的一件事。而且，这和他脖子上挂着的那装着一撮黄土的荷包的内涵相吻合，他不能离开土地，这是他的命!

为此，他向组织上推荐了李仲海来担任 A 省省政府主席，他的理由也很简单，同样很实在，他说:“仲海行，他有能力，能独挡一面，懂政策，办事心细。”

组织上同意了霍达东的建议，并让他也和李仲海通电话，动员他来西北工作，因为此时李仲海已经随毛泽东和邪党中央进人北平，参加了国务会议和全国政治协商会议，有可能成为部一级的官员。

当晚，霍达东和李仲海通上了话。

“仲海，我是达东呀。”

当时还没有直拨电话，因而李仲海已经知道是 A 省省会来的长途，他笑着说:“达东，听说你要当一省之长了，比金上岳官还大哩。”

“我找你就是谈这事哩。现在这省政府主席和当初咱闹共产时那省政府可不一样，那时咱只管造反就行了，现在啥都得管，我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要搬你这个救兵哩!”

“组织上信任你，你就干，边干边学，谁也不是一生下来就能当官，现在是人民的天下了，咱不干谁干?”

“我、我已经给组织上打了报告，请求调你来当主席，我给你当副手，别忘了，自小我就是给你当副手的。”

李仲海笑起来:“开啥玩笑哩。”

“这是真的，组织上很快会找你谈，你别想着当京官，大西北更需要人哩。”

“可……”

霍达东不容他犹豫，急促地说:“还有，秋枫她留在了这里，她现在孤身一人，挺清苦的，需要有人照应哩。”

听到李秋枫在 A 省，李仲海一下子沉默了，显然他的思绪在翻腾，很久，他才低沉地开了口:“那……若是组织上要我去，我没二话，达东，能和你在一起工作，我欢喜哩。秋枫、秋枫她?，?…我去了再说吧。”

霍达东长长地出了一口气，随即又说:“马先生也在这里，彭总让我给他安排了一个大学校长的职位，可能还要任命他当省政府副主席。咱们马家沟出来的几个人，水流千条归大海，最后还是聚到一起来了。”

“好，那咱们在一起好好干，争取在咱们活着的时候见到共产主义!” 李仲海的声音兴奋起来。

“行，你可要早点来，我等着请你观黄河，登白塔，吃羊肉串哩!”

在黄河陡峭的岸边，建起了四排平房。这里是省政府大院的后面，本来是一片树林，树林中有几处水洼，每到大雨过后，都会有许多蛤蟆在这里鸣叫，震耳欲聋，彻夜不息，而一旦水洼干涸，这些蛤蟆又像突如其来的出现一样，又一下子消失得一干二净。于是，在这种时候树林子的夜晚就只剩下了蟋蟀稀疏而低脆的叫声，令人感到夜晚的宁静。

据说，这片树林子本来是一个清朝举人的私家花园，是这个风流举人与妻妾们踏青赏秋避暑观雪之地，后来有几个女子莫名其妙死于林子中，人们传说夜晚常有女鬼游荡，便荒凉下来，又值民国开创，前面设立了省政府，清朝举人逃至海外，这里也就成为了公地，但因着鬼魂的说法，依然少有人光顾。

霍达东在省政府办公楼中看到这块紧领黄河的树林子，觉得不应荒废，共产邪党人不迷信，也不怕有什么鬼妖，就下令在这里建立省政府的宿舍，靠河边盖四幢平房，给领导居住，在里面又建了一幢二层筒子楼，给还是单身的工作人员当宿舍。

房子盖得很快，两个月后就交了工，四幢领导居住的平房毫不奢华，无非是灰砖灰瓦而已，当初霍达东甚至要求盖成陕北窑洞式的建筑，但人们说在平地上建窑洞式建筑反倒费工费料，加大成本，霍达东才算作罢。

四排平房一样大小，里面的格局也没什么两样，都是一间客厅，一间餐厅，一间办公室，一间勤务员宿舍，另有三间卧室，可以让领导及不同性别的子女分开居住。每排房子中间有五六丈的间隔，这是霍达东特意叮嘱的，为了能够有足够的闲地种植瓜菜和粮食，这是他生活中的唯一嗜好。

房子未盖时就已经做好了安排，紧挨河堤的一幢给马圆居住，第二幢是霍达东一家居住，第三幢留给尚未上任的李仲海，第四幢是给一个藏族首领准备的，这个人因稳定少数民族地区有功，已经被内定为省政府副主席。

房子盖好之后，霍达东前来观看了一下，尤其是站在黄河堤岸上端详了好一会儿，然后对办公室主任说："黄河铁桥一带要沿黄河修公路，那里有座观河楼，不大，想办法挪到这里来。马圆先生喜欢观看黄河，他是咱们的统战对象，尽量让他在生活上满意，证明咱们共产邪党人是真心实意团结他哩。"

办公室主任几天之内就让人办成了这件事，几千斤重的木结构观河楼完全靠人力搬行了几里地，被安置于马圆先生住房的边上，并且重新油漆了一遍，找画匠描了彩绘。马圆搬来居住时，确实颇为感动，还当场赋诗一首，送给了霍达东:

无意白云忽成帆，
梦中醒来便千年。
豪志虽陪岁月去，
友情却伴风烛还。
绵绵苦斗心已冷，
耿耿于怀骨未寒。
一览黄河顿觉小，
总是闲人心胸宽。

从此以后，马圆只要不离开 A 省省会，几乎每天的黎明时分都会站在观河楼上看着太阳升起，黄昏时分则看着夕阳落下，奔腾不息的黄河使他的生命也在奔腾，直到八十年代中的某一天，他以九十多岁的高龄，坐在观河楼上的一张竹椅上，平静地停止了呼吸，而他的两只眼没有闭上，依然直直地瞪着黄河。

观河楼使马圆有些冷清和孤寂的晚年得到了无限的寄托，而挪动的观河楼的举动却使霍达东在后来遭受批判时多了一项罪名，说他有资产阶级享乐主义，动用国家财力，将一幢供

封建没落王公贵族休闲用的建筑搬到自己家房后，供他修资产阶级之身，养封建主义之性，有人甚至说那是他搞女人的场所。对于这些指责，他都认了帐，他绝不愿将脏水泼到马圆身上。

到了九十年代，中国大地上兴起了旅游热潮，有人在黄河边上动用巨资兴建楼台亭阁之时，发现了这座油漆剥落、被荒草掩遮的二层木楼竟是明末时期的建筑，几经考证，说当初凡出使西域的中央大员，路过此地，必在此楼上饮酒赋诗，因而极具文物价值。于是，人们又纷纷称颂是霍达东有先见之明，保护了古迹，否则，修建黄河边公路时，这木楼必会被民工砸成木块子当柴给烧了。

霍达东的独生女儿小时候常在这楼上跳来跳去，她父亲遭受批判以后，尤其是迁移这木楼也成为他爸的一项罪名之后，她就再也没有登临过。九十年代，已经成了大企业家的她出差来到 A 省省会，得知省里要花巨款在此处以观河楼为中心修一座观河广场，并动员她也投资时，她只冷笑一声:“我要是有钱，买下这堆烂木头，一把火烧了它，别让它再糟踏活人!”

李仲海绝没有想到，在他第一次提出要娶李秋枫为婆姨的时候，她几乎没有什么犹豫，就答应了。

那是在省政府举行盛大的庆功文艺晚会，为修筑 A 省一条重要公路的劳动模范庆功之后的深夜。

修筑 A 省重要公路是由霍达东亲自出任总指挥，组织上万人马进行的，为此，他在西安工作了半年，因为这条公路是 A 省与陕西的重要通道。经过一年多时间的苦战，公路提前修通了，当时任西北军政委员会主要领导的彭德怀大大夸赞了他一番，说自己没看错人，而且兑现了诺言，亲自陪他登上了大雁塔，洗了华清池，还去看了当年蒋介石被张学良的警卫营抓住的那个石头缝缝。

回到 A 省省会，已经走马上任的省政府主席李仲海自然举行了隆重的欢迎仪式，把一朵朵用红绸被面做的大红花戴在了几十个立功受奖的人员胸前，还让他们坐在敞篷吉普车围着城绕了一圈。

霍达东捶了李仲海一拳:“你这尿，就会整这花点子，都是在延安学的。”

李仲海很认真地说:“我是造声势哩，对于热心社会主义建设并做出贡献的人就得这么大张旗鼓地宣扬。不过，这花点子可不是我想出来的，是秋枫，这二十多年，她一直在搞文艺宣传哩。”

“这我知道。”霍达东放低了声音问，“仲海，我这一段时间不在，秋枫咋样哩?” “咋样?挺好的，现在是文化局的处长，一天到晚地组织文工团慰问演出。”李仲海回答着。 “我不是问这个，我是问她对你咋样哩?有没有那个意思了?”霍达东挺关切。

李仲海叹了口气:“她对我一直挺好，可她对哪个同志都挺亲热，你也知道她那性子，天生就不会对人拉着脸。我、我实在是不敢向她张口，怕碰钉子，那以后就再没机会了。也许就这样，保持对她的圣洁感更好。”

霍达东哼了声:“这就是你们那种小资产阶级的虚荣心，说重点，是虚伪，一辈子改不了哩。这事能比攻山头难，能比咱们砸肤郡县城难?一次不行，再来二次嘛，秋枫的心又不是铁打的，铁打的心火候到了也变成铁汁汁哩。仲海，你都年过半百了，还有多少日子能熬，秋枫也已经四十出头了，她总不能靠抱着马方的牌位过后半辈子。你要没胆，我去替你说。”

“不，不，这事还是我自己去说。”李仲海连忙拒绝着，他怕霍达东这个粗鲁汉子表达

不了他的全部真实情感。

于是，在开完庆功文艺晚会之后，李仲海留了下来，等着李秋枫向文工团安排完明天的任务走下舞台时，便迎上去。他有点紧张地说:“秋枫，你饿了吧，我请你去吃夜宵。”

李秋枫笑笑:“那就让主席大人破费了。”

李仲海的紧张心情被这半真半假的玩笑一下子驱散了，似乎他又回到了二十多年前在陕西偷林夜校时的状态，坦然而自信地和李秋枫一同走进了夜色中。

五十年代初期的省长出行，既没有警车开道，也没有保卫人员将路人推搡至马路边上，更不需要戒严、李仲海甚至将唯一一个警卫员都打发回了宿舍，与李秋枫两个人迎着初秋的夜风，像所有刚进人一个新的时代的人们一样，怀着一种自豪的、欣喜的神态安然地走在马路上。他们役有什么可俱怕的，因为他们和自己的人民并不对立。

吃夜宵的小摊在市中心，那里是十字街头，十字的中央是一座快坍塌了的钟鼓楼，钟和鼓已经不知去向，而它的墙基处却灯火通明，一个小摊接着一个小摊，密密麻麻地把钟鼓楼包围起来，形成了很独特的景观。

“吃羊肉串还是吃牛肉拉面?”李仲海。

“啥都想吃。”闻到各种各样的香味，李秋枫很欢快地说。

“好，那咱们就转着圈，吃到你走不动路为止。”李仲海和李秋枫在一起，总觉得自己还远没有老，因而他说话也带着年轻后生的青春活力的潇洒。

从烤羊肉串开始，他们挨着小摊吃下去，吃到第七个小摊时，李秋枫投降了:“不行了，吃不下去了，要是霍大哥在就好哩，看着他吃一圈。”

“那咱们消消食。”

“行，看看夜黄河。”李秋枫兴致正中李仲海下怀，他本来就想提出到黄河边上走一走，在那寂静、只有河水流淌声的夜幕下，更容易让他吐露心声。

在这沿黄河而建的狭长城市里，走到黄河边并不需要多少时间，穿过两条横街，李仲海和李秋枫就看到了黄河岸堤上的柳树，柳树的叶子显然已经开始枯干，每一阵夜风都有在枝杈上站不稳的叶子飘落下来，洒进黄河中和堤岸上。

这里很安宁，与黄河平行的是一些人家的后院墙一个个后窗户内抛出一团柔和得像月光一样的昏黄灯光，在地上形成一块块光毯，偶尔有情侣相拥在柳树下，一些热烈而又压抑的呢喃细语如草叶抖动一样飒飒传出，城市的繁华在这里消失了。

“你看，你看，河里有皮筏子!”当站到没有树荫遮拦的地方，李秋枫惊奇地叫起来，用手指着黑暗的河水中的一点阴影。

“兴许是打鱼的。”李仲海漫不经心地解释着。

“畜生之皮托起生灵之魂，永不沉没地飘荡，终日去迎接死亡，却渴望着新生……”李秋枫沉吟着诗句。

“这是谁做的诗?”李仲海问。

“马方。”李秋枫说完，好像感到一丝寒意，将双手抱住了肩头。

李仲海沉缓地脱下黑呢中山装，小心翼翼地披在了李秋枫肩上。

两个人同时沉默了，似乎都在等待着一个艰难话题的开始，而谁都没有勇气首先开口，可能他们都明白，这一夜，将决定他们后半生.个人生活的命运，而谁都不愿意这命运以对方的拒绝开始。

“秋枫……”李仲海的声音有些颤抖了，他现在可以胸有成竹、毫无畏惧地号令数百万人，但面对一个已经徐娘半老的女子却无法镇定地说话。

“嗯。”李秋枫转过身来，平视着李仲海，她的眼睛内闪动着一丝忧郁，但也不乏渴望的光芒，就是这光芒，使李仲海终于喷发出已经积郁在心底二十多年的那几个字。

“秋枫，我、我爱你哩!”

李秋枫丝毫没有震惊，只是缓缓地点点头，低声说:“我知道，仲海，你默默地等了我二十多年，你过得苦哩。”

“不苦，不苦，我本来就想这样过一辈子，可、可……”他无法说出口是因为马方死了才给了他一个机会。

李秋枫凄凉地笑了笑:“我们都不是年轻人了，用不着掩饰什么，若是马方不死，你就真的再也不成个家了?”

李仲海使劲点了点头:“自从认识了你之后，就再也没有一个女子能印在我的心上了。一辈子能始终想着一个女子，也应该是一种极大的幸福吧?”

“可你没想过一个女子一辈子只会想着一个男人吗?”李秋枫有点咄咄逼人地问，但口气却并不强硬，而是一种悲哀。

李仲海的神情黯淡了，李秋枫的这句话使他已经燃起的希望之火顷刻间熄灭了，如同刚才划落于天边的那颗流星。他慢慢地吸了一口清冷潮湿的空气，沉缓地说:“秋枫，也许是我错了，也许是我应该永远只把你当成幻想，当成一个美丽的影子，当成我生命中隐而不露的、掩藏至死的纯粹属于个人的偶像。假如我伤害了你，请你原谅。”

“你是错了，你根本不了解女人，你为什么不对我说:秋枫，我要娶你哩!”李秋枫胸脯剧烈起伏着，她的眼睛更加明亮，如同有电极在放射。但若细心观察，这绝不是因爱而燃烧的激情，而是在做出牺牲时的大义凛然，是为了什么目的献出自我时因悲壮而产生的一种难以抑制的冲动。

李仲海完全被即刻到来的巨大幸福而冲昏了头脑，他根本不可能看出李秋枫眼神的真正含义，他只是后生一样慌乱地说:“我、我觉得告诉了你我爱、爱你就足够了……”

“傻蛋蛋哩，我早就知道你爱着我，可我从没听见过你说要娶我!”

“我、我娶你，秋枫，我娶你做我的婆姨!”李仲海几乎是嘶叫着喊出了这句话，这经过二十多年积郁所喷发出来的心声在滔滔黄河水中只起伏了几下就消失得无影无踪，只是有一只夜鸟被惊动了，扑了扑翅膀;抖落几片黄叶，又无声无息了。

没有什么人被惊动，一个共产邪党的省政府主席向一个自己属下的处长求婚时，和任何凡夫俗子都没有什么两样。

李秋枫轻轻抖动着身子，靠在了李仲海的开始臃肿松弛的胸膛上，仰起脸，闭上眼，微微张开了嘴唇。

李仲海吻下来，这竟然是他人生的初吻，可他毫无后悔，就是再等上十年，能迎来这个初吻，他也心满意足了。

而李秋枫的心正在因这生硬而狂热的吻而被挤压、收缩，她在马方牺牲后已经破碎得化为粉尘的心因着这挤压、收缩而聚拢回来，但却不再温热、柔软、快乐、浪漫，而是成为铸铁一样坚实、冷硬、淡然、严酷……

霍达东和常雪倩是最后一对离开李仲海家的客人，当他们也走下台阶之后，新房内就只剩下李仲海和李秋枫二人，勤务员则在开始收拾着客厅内的茶杯和糖果。

婚礼并不热烈，实际上，除了霍达东、马圆和那个藏族副主席夫妇外，就只有几个李秋枫的同事了。大家虽然对于李仲海等待二十多年终于娶到了心上人而感动不已，但也没有更多的滋美之词，因为他们都知道，若不是马方牺牲了，李仲海还将独守下去。倒是李秋枫的几个同事都是搞文艺工作的，不时唱上几支西北民歌，李秋枫推辞不过，也唱了首信天游:

想你想你实想你，

想得个眼泪珠珠常淌哎哩，

想你想你又见不着你，

捏上个泥人儿哟揣怀里。

她唱得很动情，人们鼓着掌，而知情的几个人脸上掠过一道阴影，因为他们知道这肯定是李秋枫还在思念马方哩。

马圆悄悄地在霍达东耳畔说:“生娃，这婚姻注定是悲剧哩，秋枫心里只有方娃。”

霍达东不以为然:“咋会哩?仲海会像护心肝一样捧着她，过上一段，她就不会再惦着马方了。终究还得生活下去呀。”

马圆叹了口气，不再说什么。

夜深了，人们一个个告辞，留下新郎新娘入洞房。

洞房就是李仲海的卧室，他本来让李秋枫把她的单人床抬来与自己的并在一起就行了，可霍达东知道后，无论如何不同意，忙拿出自己的生活补贴，让勤务员去集市上买了张带棕垫的双人木床，摆在了李仲海的卧室里，并告诉他:“新人睡新床哩，咱现在有这条件了，不能委屈了秋枫。”

此时，李仲海和李秋枫就站在霍达东送的那张床前，床上，铺着新床单，摆着一对绣有鸳鸯戏水图案的枕头和两床红绸被面的被子，这些东西不是马圆的婆姨兰兰送的，就是霍达东的婆姨常雪倩送的。

“睡……睡吧。”李仲海紧张得有点结巴了，年过半百之人第一次结婚，准确地说，第一次将要和女人同床共枕，确实有些激动和忐忑不安，因而出现难以自抑的状态。

“关了灯，我脱衣服。”李秋枫似乎由于经历过男欢女爱，比李仲海要平静得多，但她依然羞于在明亮的光线下，当着一个男人的面脱衣服，尽管这男人在名义上已经是她的丈夫。李仲海慌慌张张地到门边拉熄了电灯，他听到了容寨率宰脱衣服的声音，于是也手忙脚乱地脱去了自己的衣服……

窗外的北风开始号叫了，似乎像荒原上的狼群。屋子里很温暖，甚至有些燥热，省政府

领导的住宅的暖气总是烧得很足的。

李仲海像一只要去攀上树杈上掏蜜吃的熊一样笨拙地爬上了床，然后掀开被子，不敢相信似地使劲看了看，生怕那里面并没有人。多少年来，他一直是独自睡觉，孤守冷床，以令人难以置信的固执和信念期待着这一个晚上的到来。因而，他惧怕这仍是梦，唯恐这只是谁和他开的一个玩笑。

但微弱光线下那个像一捧冰雪一样白乎乎的人影使他知道他面临的是真实，他伏下身去，将自己贴住了那个人影。

那人影受惊般地抖动了一下，随即平静下来，默默地等待着李仲海进一步的动作，而自己绝无主动的任何表示。

李仲海完全没有这方面的经验，他只是按照自己的想象，开始亲吻和抚摸那个他终于渐渐看得清楚些了的面孔和躯体。

那张脸在朦胧的光线中线条那样柔和，眼角淡淡的皱纹消失了，开始干枯的发梢与黑夜融合了，看不出下巴的尖刻、鼻梁的高傲和嘴角的冷漠，只能觉出这是俊俏的图案，是早就印在心底里而从无变化的美的凝固。

那身子的轮廓也在凸现，那圆润的肩头，那丰满得如同盛开着一朵嫩艳鲜花的山包一样的乳峰，那平坦得如河滩一样的小腹，那令他心惊肉跳的一团浓密与神奇的黑影，那似乎是在闪映白光的两条坚实的大腿，这些都使他坚定地认为，这是全世界女子中最无可挑剔的身体曲线，尽管他这一生中还是第一次真正看到了一个女子赤裸的全部。

他亲吻了那面孔，那身体的每一个部分，也小心翼翼地抚摸了任何他认为有抚摸价值的地方，本能告诉他，一个男人最为销魂的时刻将到来了，这也是对他所爱的女子最完美、最强烈、最高尚、最无所保留的奉献。

他整个地压到了李秋枫身上。

然而，他困惑了，他毫无坚硬的反应，他有点恐惧了，可笑地挺着身子，低头张望了一下自己的身体，那里毫无动静。他大汗淋漓了，不知所措地呆滞着，一口一口地咽着唾液。在以往很多个夜晚，他都是在想象着李秋枫的面孔和肉体时获得了极大的满足，然而，当他真的拥住真实的李秋枫，却无能为力了。

毫无结果，他越是焦虑、越是急切，就越是疲软而颓丧，他不能指望李秋枫对他有什么帮助，他也不知道这种时候需要女子温柔的体贴和耐心的抚慰，他只能咒骂自己，只能自己去竭尽全力。

黑暗中，李秋枫一动不动，她看到了李仲海的无能，只是露出了嘲弄之情，继而产生一丝丝报复的快感。本来，她紧闭着双眼，把那即将到来的、不可避免的一刻想象成是和马方在一起亲热，对于别人来说，这当然是自欺欺人，而对于她来说，这是唯一能使她心灵保持一份尊严的方式!

她绝不可能爱上李仲海，自从她爱上了马方之后，就认定此生此世再也不可能爱上其他任何一个男人了，马方已经把她的心盛满，没有留下一丝一毫放进别人的余地，从始至终，她没有向李仲海说出一个爱字，而只是表示了可以给他当婆姨的意思。

当她得知马方终于以生命为代价而结束了长达二十多年的人邪党考验之后，一股强烈的复仇欲便在她心中萌生。本来，她想将这欲望发泄于霍达东身上，当初，霍达东也是反对马方人邪党的人之一哩，尽管后来他忏悔了、愧疚了，可他仍然应该为此付出代价，后来李仲海来了，她获得了更好的报复对象，她可以用不嫁给他而折磨他已经几尽干枯的心灵，可最终她认为嫁给他可以更好地发现他的弱点，可以去刺痛他最经不住伤害的地方，而且还可以通过他去对那些所有把马方逼上死路的人施以报复。

她一点不觉得这是心理变态，她认为自己所失去的一切用什么方法去报复都不过分。因而，当她看到李仲海因阳萎而痛不欲生、无可奈何的神情时，心中当然会产生快感。她暗暗讥讽着:“你不是个男人哩，只有马方才是我唯一的男人!”

李仲海开始像受伤的野兽一样痛苦而无助地低声嘶叫了:“秋枫、枫、我完了，我不是个男人，我、我……”

他的脸拧成一张放久的面饼，先是用手捶着床栏，继而捶打自己软弛了的胸脯，他咬着自己的手臂，大把大把揪着自己的头发，最终用头去碰撞那床头墙上贴着的一个喜字。

突然，他在几尽绝望而将头撞得更猛烈之时，如同锈蚀的管道在锤击之下锈斑脱落而终于疏通了一样，一股热流在剧痛之下由后背一下子涌了下去，他的心理疯狂终于让他的肉体获得了勃然的疯狂。顿时，他像一根朽木一样从干枯的荒原进人了大海，他湿润而澎胀地在无边的波涛中起伏，他感到了人生是那样美妙无比，而这美妙无比的代价注定是痛苦无限。但是，为了这瞬间的极至快乐时，他宁肯付出更为惨痛的代价。

他拥紧了李秋枫，怕碰坏她一样将她爱怜地楼在怀中，但身体却又不可遏制地、像勇猛的战士向山头的敌人冲锋一样地冲击着，直到他被大海淹没，粉碎于诞生了人类的深渊之中……

李仲海以自虐方式完成了和李秋枫的肉体结合，而且从那一夜以后，他每当想获得飘飘欲仙的快乐时，就必需要疯狂地摧残自己，而且李秋枫越是以平静且带有点嘲弄目光地看着他，他这种摧残就越强烈，最终获得的高潮也就越让他心满意足。

他曾鄙视过自己，咒骂过自己，因为每当他冷静下来后，他就会觉得自己那种行为完全是一个可怜虫，与一个省政府主席的身份绝不相符。可是，他无法控制自己，如同一个抽上了大烟的人一样，一旦上瘾，就很难抛弃这样病态的、从正常行为中难以得到的特殊享受。

在李秋枫面前，他无限自卑，假如以前她只是他心目中的公主，而现在则成了他心目中的女皇，他在她面前唯唯诺诺，俯首称臣，甚至任凭她颐指气使，专横跋息，他从来也不会去想，这是她对于他二十多年前不批准马方人邪党的刻意报复。

私生活上的自卑，使李仲海不得不在公众生活中用极端的自尊来掩饰，在阴暗环境中的自虐使他在大庭广众中去虐人。这样，他才能使心理获得平衡，才能让他正常地生活下去。

于是，自从与李秋枫结婚以后，他开始官气十足，专横霸道，以往他一些性格上的弱点如同被打开了魔瓶，飞散了出来。

他一点也没感到自己的这种变化，但正是这种变化在导致着他个人生活和其他一些人命运的悲剧。

马圆的推测不是没有道理的，这个既身为大学校长又担任省政府副主席之衔的花甲老人对现实常常沉默，却热衷于对未来生活的揣摸。在情感上，他很愿意自己的某些预想是错误的，仅仅是他个人的偏见所致，但在理智上，他又不能不相信自己的那些断言是有道理的，是符合逻辑规律的。他同样使自己陷人不能解脱的矛盾困扰之中。

因而，他在大学里畅所欲言，而到了官场上，则尽量保持沉默，他很明白自己的地位，在大学里他是德高望众、经历不凡的师长，而在官场上他仅仅是个人微言轻的摆设。

(30)

陕北汉子霍达东翻身下马，叉开腿跳了几下，然后背着手走进了仍然还冒着浓烟的村庄。

这是个比他的家乡马家沟大得多的村子，坐落在一块几乎是一望无际的平原之上，只是在无边的云际中，可以隐约看到山峰顶上白云般的积雪。村庄被一些树木所掩映，村庄的四周是一块块农田，不远处有一道近乎干搁的河嘈，里面淌着细细的、清澈的水流，几个巨大的水车站立在河畔，因没有水冲击而僵死似的静止不动。

霍达东所看到的村庄其实已经是一片废墟了，几乎没有一间房屋是完整的，那些土木结构的建筑中的木头由于被大火焚烧，全部成了黑炭，因而屋顶和墙壁坍塌下来，浓烟就是那些没烧透的木料所散发出来的，浓烟中还有着刺鼻的人肉焦臭的味道。

没有水去救火，只能任其在无东西可烧时自已熄灭，一群群解放军战士在清理着废墟，以抢救其中可能活着的人和牲口以及未烧黑的粮食。

村口处，已经摆了几十具尸体，有男有女，有老有少，有的是被刺刀扎破肚皮，有的是被子弹击穿胸膛，有的是被枪托砸碎头骨，有的是被大火烧成黑炭。

霍达东扫视了一眼那些尸体，叫了一声:“王县长。”

一个穿着旧军装的黑瘦汉子跑过来向霍达东习惯地敬了个礼:“霍副主席，什么事?”

霍达东命令着:“马上从县城里组织一批棺材来，按这里的风俗妥善掩埋。”

王县长有点为难:“这……恐怕一下子搞不到这么多棺材。”

霍达东一瞪眼:“别跟我讨价还价，搞不到也得搞，这些农民屈死在土匪手里，可他们还以为是让咱共产邪党给杀了呢?咱们真共产邪党来了，要让农民感到咱们是他们的亲人!我的同志娃，你是他们的父母官哩!”

“我马上去办!”王县长不敢再怠慢。

霍达东继续向村里走去。于是，他又看到了一个个死里逃生的农民们近乎呆痴地看着周围的一切，既不会哭，也不会骂，他们完全被这巨大的灾难惊傻了。

霍达东弯腰抱起了一个光着屁股的小女孩，把她楼在怀中，深深地叹了一口气。他想了自己当年被当成土匪而遭受官府围剿时的情景。

那时候他和李仲海等十几个男女在山沟沟里东躲西藏，风餐露宿，披着块羊皮遮挡着漫天大雪，抓一把榆树叶塞进嘴里就当饭吃，可他们绝不会去糟害老百姓。

“狗日的，看你们还能猖狂到啥时候!”霍达东狠狠地骂了一句，放下怀里的娃，把外衣脱下来，披到了娃儿赤条条的身子上　　　　　　　　　　　　。

霍达东来到这块距离 A 省省会五百多公里的荒凉地区已经三个月了，从春暖花开之时一直到进人了盛夏，他都周旋在白水地区的土地上，带着一个师的部队进行剿匪工作，虽然

他并不亲自参加战斗，但作为 A 省剿匪指挥部的总指挥，他几乎从没有离开过剿匪的最前线。

土匪是由一部分国民党的残兵败将组成的，他们打着共产邪党解放军的旗号，在远离城镇的草原和沙漠上活动，到处烧杀奸掠，号称是“共产共妻”，他们还放火焚烧喇嘛寺和清真寺，说是共产邪党反对一切宗教，宗教都是邪恶的。

因而，当真正的解放军进人这些地区后，开始是受到敌视甚至反抗，但霍达东很快扭转了局面。

此时，在这个刚被最后一股土匪袭击了的叫做白水湾的村庄，霍达东不仅让白水县县长运来棺材装硷农民的尸体，而且命令一个团的战士将自己身上带的炒米炒面倒出一半，约有几千斤之多，留给已经没有饭吃的农民，并且每人再留下一套干净衣裤，给农民穿，他还马上发出电报，让省政府立即组织一批物资，赶运至白水地区，救济这里被土匪抢劫一空的数万农民。　　霍达东对部队的师长感叹着:“我就看不得农民受苦受难哩。”

半个月以后，当 A 省境内的所有土匪都被消灭干净时，闹匪患最厉害的白水地区的农民们已经分到了先经汽车、而后又经驼队和马队运来的大批粮食、粮种、衣服、被褥及一些生活必须品，霍达东还和彭德怀通了电话，请求一个师的剿匪部队暂留一段时间，帮助农民们恢复家园，彭德怀理所当然地答应了。

在白水县召开的剿匪庆祝大会上，王县长向农民介绍着霍达东:“消灭土匪的总指挥，就是咱们省政府的霍副主席，他还下命令给咱们运来粮食、衣服，咱们要感谢他，不能忘了他的恩情。”

农民们欢呼着，几个亲身受到霍达东帮助的农民甚至爬上台来，跪在霍达东面前，连呼着:“大救星，你是大救星哩!”

霍达东扶起他们，心中同样激动，他再一次验证了一个道理，在中国，只有农民是最知感恩戴德的!

他大声喊着:“农民兄弟们，救你们出苦海的是共产邪党，是毛主席，消灭土匪的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大救星是毛主席，你们的恩人是共产邪党。你们要记住毛主席、共产邪党的恩情，谁要反对毛主席和共产邪党，谁就是你们不共戴天的敌人!”

王县长带头喊了起来:“共产邪党万岁!毛主席万岁!”

农民们发出震天的吼声，在他们纯朴善良的心灵间，共产邪党和毛主席开始扎下了根，因而，在几年之后，他们得知霍达东像只白眼狼一样反对共产邪党，反对毛主席时，他们才会那样愤慨，那样激怒，那样无法容忍，那样欲置他于死地而后快。

回到 A 省省会的黄河畔那个自己的家后，霍达东第一件事就是去料理自己春天种下的几垄玉米和几垄红薯，还有一片瓜菜。玉米和红薯都长得很好，瓜菜似乎已经被收了一茬，大概是婆姨常雪倩找负责警卫的小战士来帮助拾掇的。

他蹲在松松的土地上，拔了十几根完全不会影响农作物生长的小草，又打开特意接出屋子的水龙头，用皮管子往大约有三分左右的地里浇了会儿水，才欣欣然地进到了屋里。

他觉得家中有些冷清，除了勤务员在清理他带回来的行装外，几间房子内无声无息，既没有独生女儿惯有的尖叫声，也没有桂桂在厨房做饭时低吟的信天游。他看看手表，是中午十二点多，常雪倩的两个男娃也早该放回家了，但整个家中却空无一人。

“今天是星期几?” 他问了勤务员一声。若是星期天的话，有可能一家人到黄河对岸围绕着白塔而开辟出来的公园去玩了。几个月没日没夜地围剿土匪，使他不敢肯定自己能否准确地记住今天是星期几。

“首长，今天是星期五。”勤务员算了一下，大声回答。

“怪了。”霍达东思索了一下，冲勤务员说，“小鬼，别收拾了，到教育局去把常处长给我叫回来，现在打电话也找不到她，保险是在食堂里吃饭哩，告诉她，咱们还饿着肚子。”勤务员直起身子，快步跑了出去。

教育局离这里并不远，勤务员大概又到汽车队抓了辆车，几分钟后，常雪倩就提着饭盒赶回了家。

“老霍，饿了吧?也没有人通知我你们今天回来，先吃饭吧。”常雪倩说话依然那样温和、宁静，她打开了饭盒，里面是热气腾腾的白面饺子。

几年时间，常雪倩似乎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面孔还是那样年轻而白皙，神情还是在安详中略带点优郁，身材还是那样丰满而并不肥胖，她穿着一身当时颇为流行的深灰色列宁装，留着整齐的短发，给人一副既干练又有条不紊的稳重感觉。

霍达东很爱吃饺子，伸手就抓了一个，放进嘴中，勤务员连忙端来碗筷和调料，摆在他面前，他招呼勤务员一块吃。

吃了几个后，霍达东才问:“家里面的人都上哪去了?”

“送走了。”常雪倩回答。

“送哪去了?”

“桂桂年岁大了，不能总是伺候咱们，我给她找了套房子，又请了个女娃认她做干娘，自己去过。红红进了省政府的幼儿园，一个星期接一次，两个男娃也转到军区的寄宿制学校，一个月不接都行，咱们腾出时间多干点工作。”常雪倩解释着。

“你咋能把桂桂送走?她一个人孤苦哩!”霍达东一下子扔下筷子，跳了起来，他觉得送走桂桂完全是对他、也是对桂桂的伤害。自从桂桂因不能生育而和他离婚以后，他就从没有让桂桂离开过家，有时他痛苦、郁闷、烦躁、哀伤之时，还会跑到桂桂房间，枕在她虽然干瘪但却亲切的胸脯上去睡。

桂桂已经是他生命的一个组成部分了，他生活中若是看不到她的身影，就会空虚，就会失落，就会孤独，甚至还会茫然。除了他到五台山养病那段时间，他始终把桂桂带在身边，一般人以为她是个保姆，只有最熟悉他的人才知道她是他的亲人。

在外人看来，常雪倩是个相当优秀的婆姨，不仅相貌端庄、耐看，而且知书达理，待人得体，上下级关系处理得非常融洽，而且很有工作能力，近期组织上已经准备提拔她为 A 省教育厅副厅长，就霍达东而言，他也说不出对常雪倩有什么不满之处，她从不和他吵架，把家里料理得井井有条，对待她和他的娃都很公平，也很慈祥，绝不分亲疏，而且不像一些官太太那样在外面盛气凌人，惹是生非，对于他的工作，几乎从不参与意见，在夫妻生活上，更是尽量满足他，但同时也绝不主动强求。

不过，霍达东总觉得与常雪倩之间有一道无法捅破的坚实隔膜，或者说他们之间有一道隔断心灵沟通的不可逾越的深谷，他常常觉得她很陌生，似乎她从没有向他暴露过真实的自

己，哪怕是他们刚刚亲热完毕之后，她也会遮掩什么似的匆匆穿上睡衣，也许这仅仅是她个人的生活习惯，但霍达东却总是难以理解。

只有和桂桂在一起时，他才会无拘无束，想说啥就说啥，想干啥就干啥，桂桂像大海一样，能接受他抛给她的一切，哪怕是肮脏和污浊，她也可以将它们沉淀和净化。然而，常雪倩却将桂桂送走了，他当然不能不恼怒。

见到丈夫暴跳起来，常雪倩坐到他对面，不急不缓地说:“老霍，再这样下去影响不好哩。战争年代，每天生生死死，大家顾不了那么许多，现在是和平建设时期，你一个省级领导，家里养着两个女子，人们会怎样说呢?我知道你对桂桂的情感，她搬出去住，并不会中断你这种情感。而且，你真的关心桂桂，也要为她着想，当她再老些，怎么办?你也要给她一个新生活的机会，否则就太自私了。”

霍达东无言以对，对于常雪倩以一种极为关心他的口吻说出的话，他总是难以反驳，尽管他觉得她从未真正理解过他。

“她住哪了?”他闷闷不乐地问。

“解放路 18 号，三间平房，独门独院，用咱们的积蓄给买下来了，房主是桂桂。”常雪倩告诉丈夫。

霍达东突然又有点感激和敬佩常雪倩了，她做事总是这样让人无可挑剔，或者说滴水不漏。她是买的私房，而不是利用权力索取公房，她将房主登记为桂桂，而不是自己，她将桂桂送了出去，又为桂桂找了干女儿陪伴，这绝不是一般女子能做得周全的。

他不吭声了，他只能接受这现实，但他知道，他会经常去探望桂桂，有时候，他还会留在桂桂那里过夜，桂桂是绝不会拒绝他的。

在霍达东剿匪期间，李仲海接待了一个出乎他意料之外的不速之客，秘书告诉他，有一个老农民在省政府大门口蹲了整整一天一夜，口口声声要见他和霍达东。

“他说是您的乡亲，光屁股一块长大的，还一块闹过共产。警卫觉得他不正常，轰他走，他还大吵大闹，说要不是贪图一个婆姨几亩地，现在他也坐轿车带卫士了。”秘书觉得有点好笑，汇报着。

李仲海自从和李秋枫结婚以后，脾气就变得很坏，他厉声斥责着秘书:“咋能这样对待一个农民兄弟呢?咱们是人民政府，不是封建官衙门，有理无钱进不来，人民来找我们是理所应当的嘛，咋能让人在外面蹲一天一夜?晚上写份检讨，好好检查一下官僚作风。对了，门口那农民说他叫什么名字?”

秘书沮丧地说:“叫什么……什么牙子。”

“马牙子!”

“对，对，马牙子!”

“快把他请进来。”

于是，已经分手了十几年的马家沟的兄弟马牙子走进了李仲梅的 A 省省政府主席的宽大办公室。

李仲海简直有点认不出马牙子来了，只见他头发完全脱光了，背也有些驼，一身显然不合身的衣裤虽然不破旧但却沾满了灰尘，现出一块块白色的汗碱，他消瘦得可怕，肤色又黑又黄，如同发了瘟病，那浓密的皱纹像是经常剁肉的案板，组成了横横竖竖的沟痕，如若他自己不说，没有人相信他会只有五十多岁，而肯定认为他已年过古稀。只是从他那虽干涩但依然流露出些狡猾神情的眼睛和说话依然大口大气的嘴巴还依稀可以看出当年马牙子的影子。

“海娃。”马牙子扔下一个有点分量的布口袋，向李仲海伸过来如枯枝一样干巴巴的手。李仲海并不躲避，而且使劲握了那手，为的是让边上的秘书知道，共产邪党的高级干部并不讨嫌农民哩。

“马牙子，咋会想起跑这里来了。”李仲海拉马牙子坐到沙发上，秘书也把茶冲好端了上来。

“想你们哩，村里的乡亲都想你们哩。”马牙子把那口袋解开，往地上一倒，干柿饼、长了虫的干枣、蔫了的花生和个不大的核桃洒了一片。

“这……”秘书有点着急了。

李仲海一挥手:“去吧，这没你的事了。”

秘书只好快快地走出门去。

马牙子说:“听说你和生娃都当上了比金上岳还大的官，也不回去看看，乡亲们让我代表他们来看你们哩。”

“瞎，啥大官，多为人民做点事罢了。你过得咋样?还是两个婆姨?”李仲海想起马牙子赌气跑了的事就觉得好笑。

“还敢养俩婆姨，连我自己都养不起了，也好，天大大开眼，饿死了一个，饿跑了一个，我又成了光棍汉。” 马牙子抱怨着，似乎也在庆幸着。

“饿死? 饿跑 ?是解放前的事 ?” 李仲海好奇地问。

“啥解放前，就是今年的事，海娃，乡亲们过得苦哩，他们让我找你和生娃给想点办法。我知道你们是干大事的，忙，不敢来麻烦你们，可、可谁让我还当着个乡长哩，不能看着全乡老老少少都饿死吧，亲不亲，一乡人，想着咱们一块闹过共产，就搭车骑驴地来了。”马牙子确实是饿得够呛，说了这不多的话，就有些喘粗气了。

“咋的，咱肤郡闹灾了?”李仲海有点震惊。

“旱灾!大旱灾呀!去年是涝，天漏了似的下个没完，那大水淹了大半截马家沟，肤郡城的城门楼子都给冲跑了一座哩，除了源顶子上的红薯外，啥粮也没收着，忍饥挨饿地耐到今年，又碰上大旱，几个月滴雨未下，那长了半大的庄稼全跟柴一样了。咱乡里已经饿死十几口了，你一个表婶子也饿死哩。”马牙子有点哭腔了。

李仲海眉头一皱:“找政府呀，到县里去要救济粮。”

马牙子苦着脸说:“乡里的政府就是我，一颗粮都没有，到县里，县长也没粮，榆林府拨了点玉米面，优先给了城里干部居民，说农民生产自救，没法子可以外出逃荒，壮年后生可以往外跑，那老弱妇幼的路都走不动哩。”

“肤郡县政府不像话，不像话。说起来还是老区哩。咋能不关心群众疾苦，日后我见了陕西省政府的领导，要奏肤郡县一本。”李仲海恼怒地说。

“海娃，可乡亲们等不到日后哩。”马牙子愁得眉毛扭成了绳。

‘称要我咋办哩?我们这个省不能跨省去贩济灾民呀。”李仲海有些为难。

“不，不是让你开粮库。乡亲们卖了不少家当，凑出了些钱，你批准我在你这里买个几万斤玉米和麦子，红薯干也行，我雇人驮回去，救全乡上千口子人的命吧。”马牙子充满了希望地看着李仲海，从裤档中摸出一个骚乎乎的小布包，打开来，里面是一堆揉皱了的票子。

李仲海叹了口气，慢慢摇摇头:“马牙子，不行哩，粮食是国家统购统销物资，不得随

意买卖，这是原则，跨省贩卖更是违法，抓住了要枪毙哩!”

“我……我知道这政策，才来找你这个大官说情，给开个证明。海娃，求你了，我马牙子以往有啥对不住你的事，你大人不记小人过，今日我不是为我马牙子，是为了咱马家沟乡的乡亲们哩!”马牙子老泪纵横了，从沙发上滑下来，给李仲海跪下了。

李仲海居然没被感动，而是更坚定地摇摇头:“马牙子，你也跟邪党干过，知道凡事要顾全大局。现在美帝国主义已经挑起了朝鲜战争，咱们国家在抗美援朝，老蒋也喊着要反攻大陆，各种重要生产生活资料必需集中调配，先供应最需要的地方。一些不法奸商和美蒋特务故意搅乱我们物资供应渠道，我要是为自己家乡人开了证明，破坏了粮食统购统销政策，那我要犯大错误哩。”

“好，你……你李仲海六亲不认，你……你大义灭亲，你……你怕犯错误丢了你的乌纱帽，你……你见死不救，你……你忘恩负义，你……我找生娃去!他不会给我脸子看!”马牙子气得额头上青筋毕露，满地爬着收起那些干果，嘟嘟哦味地说:“这些东西能喂活几个娃娃哩，给你李仲海吃，不如给狗吃!”

李仲海有点哭笑不得，他只能义正词严地告诉马牙子:“生娃打土匪去了，不在，你找到他也没有用，他一样要坚持原则。”

“狗屁原则，人饿死了还有什么原则!”马牙子把口袋往肩上一甩，抹抹眼泪，很有骨气地走了。

霍达东始终没有见到马牙子，实际上，当他知道了马牙子从千里之外的马家沟来到 A 省的消息时，马牙子已经被关在 A 省省会的监狱里了，罪名是倒买倒卖巨额粮食。

马牙子的张狂性格委实没改，在军阀和国民党统治时期他就目无法纪，到了共产邪党执政以后，他依然挺而走险，以身试法，但他的动机却都是一个:能让日子过得像点样。要说稍有点区别的话，那就是闹共产时他更多的为了自己，现在倒卖粮食则是为了乡亲们。

A 省也是个缺粮省，除了上交国家的粮食外，一粒粮食都不准被运出省去，各条通向省外的道路都设有卡子，因而，尽管马牙子想尽办法用高于国家价格一倍的价钱收购到了上万斤粮食，但还是未能走出 A 省就被查获了，并被作为重犯押解至 A 省省会。

A 省也正在为粮食问题头痛，年初时省政府在李仲海固执己见下勉强通过了一个粮食收购计划，并作为正式文件上报给中央。李仲海不认为这是好大喜功，他相信已经成为了国家主人翁的广大农民在属于自己的土地上一定可以喜获丰收，并以积极向国家售粮的行动来表达对共产邪党和毛主席把他们救出苦海的感激之情。

然而，尽管 A 省还算风调雨顺，没什么大的灾害发生，秋收又至，新粮登场，但收购上来的粮食却离计划还有很大距离，主要原因是农民们以前被饿怕了，想尽量多留点粮食，还有一点，就是国家收购价格太低，他们认为不合算，而宁肯悄悄地把粮卖给愿意出高价的外省来的粮商。

为了能确保粮食收购计划的完成，李仲海不但组织了大量的工作队到各市县采取半强制方式收购粮食，还指示公安、检察、法院等部门严厉打击倒买倒卖粮食的违法人员，查出超过万斤的，可以处以极刑，以对这类人员进行震慑。

马牙子刚好违犯了这个规定，无论他怎样喊冤，还是被迅速地判处了死刑。因马牙子在被判决后不停地叫喊李仲海和霍达东的名字，法院院长便将死刑判决书送至李仲海和霍达东

处，请他们签个字，以免发生什么不偷快的事。

霍达东见到的判决书上已经签了李仲海的大名，而他自己却迟迟不能下笔，犹豫再三，他还是拨通了李仲海的电话。

“仲海吗? 马牙子一定要被判处死刑吗?” 霍达东有点于心不忍地向。

李仲海的口气有点生冷:“达东，这是原则问题，严厉打击破坏国家统购统销政策的犯罪分子是咱们省委开会决定的，省政府也专门发了文件，你这主管农业的副书记和副主席都是支持的，不能因为是老乡而心慈手软哩。”

“我是说，马牙子事出有因，我听说咱家乡大灾，颗粒无收……”

李仲海打断霍达东的话:“现在不能考虑倒卖粮食是出于什么动机，只要他的行为触犯了法律法规，就必须严肃处理。达东，封建时代还有挥泪斩马傻的事，咱共产邪党不能连封建士大夫都不如。而且，咱们要让人知道，对于胆敢和政府对抗的人，咱们就是六亲不认，这样才能树立政府的威信。”

“可……”

李仲海不耐烦了:“达东，你怎么变得婆婆妈妈的了，咱们还有多少工作要做，咋能为个马牙子在这里纠缠不清，咱犯不上哩。当初马牙子就是投机革命，娶了两个婆姨就跑回了老家。今日，他又成了落后农民的代表，往新中国和共产邪党脸上抹黑哩，到处讲饿死了人，以此为借口私自贩运粮食，这是向共产邪党挑战，要造共产邪党的反哩。你可要站稳立场，别为这点小事栽个大跟斗。东北的高岗被定性为反邪党集团的首领，这时候更要小心谨慎哩。好了，就这样吧，我今夜还要赶写一份报告。”他挂了电话。

霍达东拿着话筒，陷人了久久的沉思之中，但最终，想着李仲海的那些话，想着他一直认为仲海比他政策性强，识大局，懂政策，想着李仲海几次在他感情冲动时及时阻止了他而未使他滑人深渊，他还是颤抖着在法院呈上来的马牙子的死刑判决书上签下了自己的名字。

黄昏时分。夕阳像被宰杀的母鸡肚里尚没结出硬壳的蛋黄一样瘫软而又让人感到凄惨地半吊在黄河的尽头，似乎那无尽的黄水是从蛋黄中涌流出来的，粘稠地流淌着，河水本身就是黄色，又染上夕阳的余晖，便更为黄灿灿的，但并不辉煌，而有如巨大的苦胆破裂了，胆汁灌满了沟谷。

霍达东沉闷不乐地收获着后院地里种的红薯，那红薯因精心管理，个头长得很大，堆在地头，如一堆长满了锈的宝藏。

准备登上观河楼去观赏秋水落日的马圆见霍达东正在收获，便改变了主意，也脱下外衣，挽起袖子，帮他捡拾着从土里刨出的红薯，令人奇怪的是，他竟然也有着优郁之情而没有夸赞霍达东的丰收。

当红薯收完之后，霍达东才说了句:“马先生，累了吧?我陪你到木楼上吹吹风。”

马圆点点头，两人一先一后登上了脚下就是滚滚黄水的观河楼，楼上有两张常摆在那里的藤椅和一张茶几，两个人坐下来，深知马圆习惯的勤务员端上来茶水，而深知霍达东习惯的勤务员则送上来香烟。

马圆长长地出了口气:“生娃，那红薯怕是有几百斤吧?够一家子人活几个月了。”

霍达东嗯了一声，点点头，然后点燃了一支香烟。

马圆仰在藤椅上，沉思了一下，说:“我和仲海吵了架哩。”

“为啥?”霍达东忙问。

“为马家沟一个老乡马牙子的事。这人我不熟，当年闹农运时见过他几次，没啥太深印象了，算不上维护亲朋好友。他咋能就给枪毙了呢?要是有饭吃，他不会跑上千里路来这里高价买粮食哩。政府赈济不了他们，高价买粮又不许，这是要官逼民反呀。生娃，你当年砸金城镇粮库不就是这么一回事吗?民以食为天，不管谁当政，不让百姓吃饱肚子就不是好政府，人民就不会拥护。”马圆感叹着。

“你跟仲海讲了这些?”

“讲了。”

“他咋说?”

马圆苦笑了一下:“他让我好好改造思想，作为民主人士要给共产邪党补台，不要拆台。可他李仲海不明白，你们这种做法才是自己拆自己的台哩。仲海在变，生娃，你可能也在变，变得站在人民的对立面上去了。”

霍达东驳斥着:“马先生，我们是站在全局，为大多数人的利益着想，为国家利益着想，不能仅照顾少数人。”

马圆冷冷地哼一声:“混话!什么叫大多数人? 一个人一个人的组合起来才叫大多数人，今天没饭吃的你说是少数人，明天没衣穿的你还说是少数人，后天没工作的你仍说是少数人，再以后没学上的又是少数人，这些许多少数人加在一起就成了多数哩。什么国家? 没有家能有国吗?老百姓一家一家地都饿死冻死了，家破人亡了，这个国还能存在吗?”

霍达东在这些理论问题上是永远无法与马圆争论的，他只能沉默，何况，在处理马牙子的问题上他本身也在矛盾着哩。

马圆叹了口气:“生娃，我的话在你们心中无足轻重，这不要紧，我老了，我活着本身就仅仅是为了冷眼旁观，仅仅是为了能看着你们的社会主义到底搞成什么样子。而你们的一言一行关系到成千上万的百姓们的死活，凡事要三思而行啊。最重要的是不能不听人民的声音，水可载舟，也可覆舟，人民的心愿才是你唯一的准则。”

“马先生，我懂哩。”

“日后，你还会碰上农民没饭吃的时候。几千年来，中国最大的问题就是吃饭问题，而每次农民造反的起因也大都是因为挨饿，活不下去。现在，这种危险依然存在，马牙子们在陕北，你可以视而不见，将此事推给别人，而当有一天，你的子民们也没饭吃了，你还会这样吗?”

霍达东不知道，数年之后他真的碰上了他的子民们挨饿的现实，当他那时毅然决然地站到国家利益的对立面开仓放粮时，他是否受到了马圆先生这番话的潜移默化的影响?也许，这仅仅是出于他农民的本能?出于他不愿意看到他的兄弟们在痛苦中挣扎?

马牙子被枪毙了，在万人公判大会上和另外几个也是从陕北灾区跑到 A 省来高价购粮的农民一同被宣判了死刑，又一同被拉到黄河边上执行了枪决。

霍达东没有去参加公判大会，虽然以他分管农业和粮食工作的副主席身份是应该去出席这个大会的，但他实在不愿意再看到一个自己熟悉的人死在他面前，所以，他以迎接归国的

志愿军伤员为借口，躲避了这个公判大会。而没有人敢说抗击美国侵略者的英雄们回来不是件重要的事。

几天之后，霍达东将他一个月的薪水寄到了老家马家沟，这是刚刚变供给制为薪金制后他第一次领到的几百元钱，他注明将这钱交给马牙子的子女，使他们能度过灾年。

几乎在同时，马家沟乡政府还收到了马圆的一笔超过霍达东百倍的汇款，注明是给乡里购买粮种的。

乡里有人得知马圆是当年乡长马孝贤的长娃儿时，悄悄地给马孝贤堆了个坟，立了块碑，坟里埋了马家大院的一块砖头，碑上刻着:A 省马副主席讳圆先生之父。

这个为反动地主立碑的事居然一直无人追究，也许是省政府副主席的官衔使镇上的官员们有点畏惧。到了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始后，金城镇中学的“红卫兵”们在“破四旧”时才算砸了这块石碑。

(31)

陕北汉子霍达东身边出现了一个年轻貌美的女秘书，这是他原来的秘书调任某县当县长去搞农村合作化运动试点后，他的婆姨常雪倩为他推荐的，他没有拒绝。因为常雪倩很少向他提出要求，因而她把一个在她的教育局工作了一年、据说很有能力的大学生介绍给他做秘书时，他也就不会有什么犹豫了。既然他接受了，组织上经过简单考查，没发现有什么不合适之处，当然就正式批准了。

这个新来的女秘书叫杜娟，相貌美而不艳，身材小小巧巧，虽然只有二十五岁，但却显得很老练沉稳，从档案上得知，是个革命烈士的女儿，在大学里就是学生邪党支部的书记。

为了方便工作，常雪倩让杜娟从省政府的单身宿舍搬到了家里来，和霍达东的独生女儿霍红红住在一间房里。已经上了小学的霍红红管杜娟叫姐姐，其实她的小心眼里不太欢喜这个姐姐，因为这个姐姐太死板，不仅不准她逃学和总逼着她写作业，而且还不准霍达东随意给她零花钱。

霍达东倒是觉得杜娟比原来那个男秘书强得多，来了之后，就把他几年来搞得乱七八糟的文件分类整理得有条有理，所有会议记录都会在当天誊写清楚，交到他手中，起草个文件、报告、讲话稿也比原来那个男秘书更能抓住要点。也难怪哩，原来那个男秘书只是初中毕业，在战争年代没机会学习，进人 A 省省会后，终日跟着霍达东东奔西跑，整天忙得头昏脑涨，还是没机会进修一下。

除了工作，生活上杜娟因是个女子，对霍达东照料得也细致得多，开会过了吃饭时间，她肯定已经打电话通知食堂留了饭菜，晚上出席什么活动，她也会提醒霍达东多带件衣服，每到星期天时，她还常亲自下厨房炒上几个可口的菜，让全家人吃得津津有味。

霍达东很满意这个女秘书，他跟常雪倩说:“嗯，你有眼光哩。”

“那你欢喜她吗?”常雪情话中有话地说。

“你这是啥意思?”霍达东对欢喜二字的使用和理解是非常单纯的，那就是男女之爱。

常雪倩微笑了一下:“老霍，你感觉不出来什么吗?”

霍达东疑惑地摇摇头，但猛然想起了一点常雪倩的异常之处，那就是自从杜娟住到家里来以后，她再也没有让他亲热过，她总是有意避开这事，不是早早睡下，就是晚晚归来，尽量避免与他一同躺到床上。作为五十多岁的男人，霍达东尽管已经不可能像后生时那样一天和婆姨亲热一次而第二天依然精力充沛，但十天八天他总是需要一次的。

而常雪倩刚刚过了三十八岁生日，怎么会就开始厌恶男女之间的事了呢?莫非她得了啥病?不行了?可这跟杜娟来了又有啥关系呢?

霍达东无法推断他根本就推断不了的常雪倩的心理，点了根烟，沉缓地摇了摇头，表示感觉不出什么。

常雪倩轻轻叹息了一声:“你真是憨哩。老霍，事到如今，我不想再向你隐瞒什么，你别打断我的话，听我一口气讲完，否则，我可能没勇气讲下去哩。”

霍达东愕然地看着从没有像此时这样神情严峻过的常雪倩，心中一下子感到了强烈的不安，即使他再憨，也不会不从常雪倩的话中听出将有什么严酷的事实对他发生。

他点了点头:“我听，不打断你的话。”

“那好，真谢谢你哩。”

“谢啥，老夫老妻的了。”霍达东努力使心情轻松下来。

听到霍达东说老夫老妻，常雪倩浑身抖了一下，本来就优郁的神情中更增添了一份苦涩和无奈，她使劲喘了口气，像准备赴难去牺牲一样昂起了她略显高贵的傲慢的头。

房间里的空气很沉闷，让人有窒息的感觉，而常雪倩的声音更为抑郁:

“老霍，应该说是我欺骗了你，这是一种无可奈何的欺骗，一种既伤害了你也伤害着我自己的欺骗，一种特殊时期又往往不可避免的欺骗，一种善良人常常为了保护自己而使用的欺骗。

“我不是个寡妇，不，不，你别站起来，你就坐着听我说，千万别走来走去。我的丈夫还活着，一直活着，我们甚至都没有离婚，我们之间的感情使我们绝不可能离婚，我爱他到地老天荒，他爱我到至死不渝。

“我丈夫是个官吏的男娃，当然是国民党的官，我们在北平上大学时认识并结了婚，又一块加入了共产邪党。抗日战争爆发后，我们和大批的青年学生一样来到了延安，我被留下来搞教育，他受了一段时间训，又回到北平从事地下工作。

“延安整风时，他回来参加了，正好此时他所在的地下邪党组织被日伪破获了，于是他被怀疑是特务，否则为什么单单他不在时发生了这种情况呢?他被关了一年多，突然间失踪了，有人说他是趁看守不注意潜逃了，有人说是被社会部给悄悄处决了，只有我知道他是被人给放走了。因为经调查，他确实不是特务，可社会部又不愿意承认自己抓错了人，准备一直把他关押下去。那个人，噢，原谅我实在不能说出他的名字，那个人就自做主张把他给放了，条件是他再也不能在延安露面，到别的地方也不准和邪党组织发生联系。

“他走了，先是到了上海，托人给我捎过信，然后再无音讯。为了我们爱情的结晶，那

两个男娃，也为了我个人的政治生命不从此结束，我必须找一个可靠的、在政治风云中不会有风险的人当依托。正巧，在住院时，你走进了我的生活，我得知你的情况后，便果断地选择了你。

“快十年了，你对我很好，娃们也上了中学。本来，我以为一辈子就这样过下去了，虽然说不上爱，可感情还是有的。可谁想到最近他托人辗转找到了我，带了一封信，说他在香港经商，已经取得了英国国籍，若我允许，他将来看我，若我已经另有家庭，他就来看两个男娃儿，还要接两个男娃到英国去读书。

“我是个共产邪党员，大小也算个部门领导干部，我绝不稀罕什么英国美国的，可我不能否认我对他的爱。本来已经死水一片的心灵重又掀起了波澜。对他，我是无愧的，他消失了这么多年，我为了两个男娃而牺牲了自己。而对你，我总是充满了羞愧和内疚，因为我从没有把自己全部的给你，我做了很多保留，在和你的关系上，我确实是自私的。

“在我得知他的存在之后，我无论如何再也不能接受你的亲热，我觉得那是亵读我认为的人类间最神圣的感情。但是，我也不能从生理上折磨你，于是，我选择了杜娟来取代我。

“杜娟在爱情上是个遭受过打击的姑娘，因而，她不再相信与她同辈的男人们，而更愿意和一个有着丰富生活经历的长者在一起，她崇拜和敬仰从革命战争中活过来的兄长，把他们当成自己的偶像和理想的对象。只要你同意，她是会接受你的，而这种接受是可以不拘泥于任何形式的。

“至于我个人今后的生活，我确实还没有想好，我一下子也不可能为自己做出决断，这太难以让人决断了……”常雪倩终于结束了她的叙说，她如释重负，倍感轻松，但她的神情却更加忧伤和焦虑。

霍达东并没有暴跳如雷，更没有像年轻时那样动不动就指着别人鼻子骂狗日的，他只是冷冷地说:“你把我霍达东看成啥人哩?杜娟是我的秘书，是我的同志，是、是我的女娃，我咋能去动她的心思。好了，我累了，我要睡了，我真的累了。”

他一头倒在床上，衣服都没有脱。

常雪倩知道他根本不可能睡着，坐在他身边，耐心地说:“老霍，杜娟确实是很欢喜你这样的老同志的，你不了解有些女娃的心。”

“别在我这里说混话!”霍达东开始有点烦躁了。

“不是混话哩。”常雪倩觉得有点委屈。后来，生活的真实的确验证了她的话不是混话。杜娟不仅仅在给霍达东当秘书期间过着单身生活，而且在霍达东削官为民后依然一直没有结婚，直到一九七六年那个多雪的冬天，她参加完霍达东的葬礼之后，才以四十六岁的老处女的身份匆匆嫁给了一个比她大二十岁的老将军。

但是，霍达东的在天之灵可以问心无愧地告诉任何人:他对杜娟从无邪恶之念，他给她的只有父亲般的关切，从她那里领略到的只是女儿般的情感。尽管从他五十六岁起就再没有过男欢女爱，可他中国农民那种本能的忍耐性格虽使他生理痛苦但却心理平静地度过了晚年，这也许和他在五台山的寺院中生活了一年多不无关系，那里的长老们给他灌输了太多的清心寡欲的佛教观念。

至于杜娟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心理状态则无人知晓，后来霍达东的女儿霍红红曾经问过杜娟其中的原由，杜娟没有详说，只是微微笑了笑:“红妹，你永远不会懂，那是一种精神的无限需求，对于我这个人来说，精神上的享受可以取代一切，尽管有许多东西纯粹是我自己的想象，但我依然充实、满足，或者叫做幸福。红妹，只有在精神的空间里，你才能体验到世界是多么宽广和丰富。”

霍红红似懂非懂地点点头，拼命回忆着她所记忆得起来的杜娟和父亲在一起时的情景，但她委实判断不出有啥异常之处，包括父亲在北京中央邪党校被改造思想时杜娟去探望他，包括父亲的追悼会上杜娟默默地站立时，她都看不出杜娟有什么与众不同的表示。于是，她只能感觉杜娟与她原本就不是一代人，而是她的上一代人，所以她才会无论如何洞穿不了杜娟的内心世界。

霍达东又站到了他曾剿过匪的白水地区那个叫白水湾的村庄旁，这里被一片白雪遮盖住，远近一片银色，若不是有一群乌鸦在雪地间跳来跳去，人们肯定会认为这世界只有白这一种颜色。

霍达东不知如何形容这洁白的天地，他只能感觉到这里很干净，很安宁，而且他想得更多的是这场大雪将会使明年的小麦长得很旺，保险是个丰收年。如果真是这样，那他这个主管农业的副省长日子也会过得安稳点。

他到白水湾是来抓成立高级合作社的试点的，常雪倩向他袒露了掩藏很久的隐秘后，他心绪烦乱，不想回家，正好中国大地上掀起的农村社会主义改造运动进人高潮，省里决定加快农民全面进人社会主义的步伐，以免成为毛主席所说的“小脚女人”，落在农民积极愿望的后面，他就带着一个工作组深人到白水地区，准备用几个月的时间将这里的初级农业合作社全部建为高级社，若有可能，再搞出几个苏联那样的集体农庄，把一切生产资料都变为国有。

这种能亲眼看着农民们一跃而进入社会主义幸福生活的美好念头多少冲淡了他个人生活中的烦恼。社会生活的欣欣向荣也给他创造了逃避个人生活不幸的机遇。

他心旷神怡了，踏着没过脚面的积雪，在原来是王县长，现在是王专员的瘦小汉子的陪同下，一步一步走进了村内，苏联越野吉普车慢慢地跟在后面。

村子里早就盖起了新房，被土匪烧杀过的痕迹一点都看不出来了，很少见到汽车的男女老少们听见马达声，纷纷拥出门来，一群娃儿们把住汽车的门把手，挂在汽车的后保险杠上，享受着不用步行而前进的欢悦。

村长是个老汉，见来了群坐汽车的官，又依稀认出了霍达东是几年前带着部队来剿匪的省里的大员，有点不知所措，他惶恐不安地把他们让进了村公所的院子，费了好一会儿工夫才打开办公室门上的锁，又张罗着抱柴、搬炭，点上火，冷冷清清的房子内才算有了点热气。

“冬日里没啥事，都在自己家里暖和着，这村公所就锁了门。”村长解释着。

王专员喝了几口砖茶，间:“你叫啥?”

“我叫白柱子，村里人都叫我憨柱。”村长忙不迭地答道。

“你这村里有几个合作社了?”霍达东很关心这个问题。

白村长想了一下:“仁，不，应该是俩，有一个合作社几户人家合不来，社长偷人家媳妇，副社长自己多分了五百斤玉米，闹意见，前几天散伙了，剩下那俩也……”

王专员偷偷瞪了白村长一眼，吓得白村长闭上了嘴。

“剩下那俩咋的了?” 霍达东追问。

“剩下那俩，那俩……”白村长垂着头，可眼角却不时瞥向王专员，似乎想从他那里求

得怎么回答的意思。

霍达东发现了这情况，站起来，指着王专员吼了声:“王专员，你要不让农民给我说实话，你就给我滚!”

王专员脸一红，一声没敢吭。

“憨柱兄弟，说吧，甭怕，不会扯谎就别扯。”霍达东拍了拍白村长的肩膀，见他拿起旱烟袋，忙掏出香烟，递给了他一支。

白村长见霍达东这么客气，安心了点，很稀罕地双手捧着那支卷烟，闻了闻，没抽，开口说:“剩下那俩合作社好着哩，大家的牲口一起用，水渠一块挖，一块下种，一块收割，互相都沾了光。单干的时候，人口少的，不是忙不赢下种，就是来不及收割，用起水来也是为了你先我后地闹起来没完，成立了合作社，没这些事了。其实解放前我们也搞过这事，那时叫、叫帮耕会。都是一样，收了粮，哪家牲口多、劳力多、就多分，牲口、劳力少的就少分。咱农民也没更多的心眼，不会坑人哩。”

王专员松了口气，也凑过来，问:“白村长，把几个合作社合起来，全村成为一个高级社，都交给你管，咋样?”

“怕是管不了，有几户人家不听我的哩，他们牲口多，劳力多，地也多，在村里充老大，除非让他们当社长。”白村长确实憨厚，实实在在地回答。

霍达东点了点头:“这样吧，白村长，我就住在你们村，啥时候搞起高级社来我啥时候再走。”

白村长傻眼了:“这，这……你是省里的大员，咱村里没法睡觉，也没啥东西给你吃哩。”霍达东大笑起来:“你真是个憨柱哩。没法睡觉，你们睡哪里?没啥东西吃，你们饿肚子了吗?兄弟，我也是当过农民的哩，你们能睡的地方我就能睡，你们能吃的东西我就能吃，跟我来的几个人，谁受不了谁走，反正我是留在这里了。”

跟着霍达东来的有王专员、一个姓张的副县长、一个司机兼警卫员，还有秘书杜娟，自然没有一个敢走。

“霍爷爷，霍爷爷，起床去捡粪，去晚了就没有哩!”小女孩清脆的嗓音在霍达东住的房子窗户根下响着，将霍达东惊醒过来。

霍达东没有住在村公所里，而是住进了一家农户，这农户只有一个娜夫和一个女娃，因而几间房子都空着。鲜夫叫石锁，妻子被土匪抢走后再无音讯，据说是被土匪带着跑到了千里之外的边境线一带，他还痴痴地等着老婆回来，所以未再娶，家里穷，也再娶不起。他那个叫妞妞的女孩子就是剿匪时霍达东抱起的那个光屁股娃儿，霍达东脱下来披在她身上的那件黄呢军装现在还穿在石锁身上。

就是冲这件黄呢军装，霍达东住到了他的家里，他说:“石锁，咱们有点缘分哩，就住你家，吃了多少东西，烧了多少柴，都记下帐，走时一块算，做饭的事你别管，我那秘书小杜全包了。还有，每天早晨捡粪时叫我一声，我喜欢种地，冬日里没地种，就捡捡粪吧，庄稼一支花，全靠粪当家哩。”

第二天一大早，石锁可不敢轰副省长起床，在多少辈子的白水湾人的历史记忆里，霍达东是来到这里最大的官哩，而且就居然睡在了一个普通农户家里。

而听到霍达东要去捡粪的小女娃儿妞妞可当了真，她早早地醒来去喊霍达东，生怕他起晚了吃亏，捡不到粪哩。石锁吓得脸色苍白，冲出来抡圆了胳膊在妞妞屁股上打了一巴掌，低声吼着:“滚回屋里去，人家是二品大员，说说笑话罢了，捡啥粪。”

霍达东很利索地穿好衣服，走出屋来，伸平胳膊，扩了扩胸，嘴里喷着一个哈欠说:“锁娃，你咋说我说笑话哩?走，妞妞，给霍爷爷拿粪筐和粪铲，一块去捡粪!”

妞妞瞪了他爸一眼，跑到猪圈里拿出粪筐和粪铲子，笑着说:“霍爷爷，我知道哪儿粪多，跟着我准吃不了亏。”

霍达东摸摸妞妞冻得红扑扑的小脸蛋，想起了自己的独生女儿霍红红。他想，有时间要带她到农村来住段时间，不吃点苦，不了解中国农民的日子，成不了才，出息不了哩。

杜娟也走出了侧屋，她捧了一把堆在屋角的雪在脸上搓了几下，算是洗了脸，也去找粪筐。　　霍达东摆摆手:“小杜，算了，你就留在家里煮点稀饭，等一下咱们吃了还要挨家挨户去了解情况，少不了你的事干。”

说完，他和妞妞一块走出了土墙院子，很快来到旷野上，黎明使皑皑白雪泛起一道灿烂的光芒，那光芒中一朵朵绽开的花朵般的灰黄斑块就是刨开积雪寻找草根根吃的牲畜们拉出的粪便。

几个不贪睡的老汉已经慢悠悠地溜达在雪原之中，看到穿着件军大衣的霍达东也在捡粪，露出了惊奇的神情，霍达东向他们打着招呼，他们也慌慌张张地回应着。

霍达东问妞妞:“你几岁了?”

妞妞回答:“十岁。”

“上几年级了?”

“啥几年级?”

“就是上几年学了?”

“没上学，我们这里女孩子不兴上学。”妞妞毫不觉得委屈地说着。

霍达东当然知道西北地区农村里面的这个习俗，他弯下腰问:“妞妞，你想不想上学哩?”妞妞使劲点点头，明亮的大眼睛中闪动着渴望的光芒:“霍爷爷，我想上学，还想去城里上学哩，可家里穷，没钱。我们村不少男娃也上不起学。”

霍达东直起腰，很有信心地说:“妞妞，我来你们村就是为了解决你们不再受穷的问题，成立高级社，小农经济变成社会主义大农业经济，就会走向富裕，以后你们白水湾也会成为一座小城市，楼上楼下，电灯电话。”他不管小女孩听得懂听不懂，激动地大谈了一通。

妞妞愣愣地看着他，认真地说:“霍爷爷，那就快成立高级社吧，我先人社。”

霍达东大笑起来，扔下粪铲，抱起妞妞，用胡茬子扎着她的小脸，惹得妞妞拼命挣扎。在广阔的田野里，霍达东感到了无比轻松，无限欢乐，他毕竟是农民的儿子，和土地有着无法解脱的血脉关系。

霍达东一点都不想离开白水地区，他很自然地就与这里建立起了一种和谐的亲情关系，他在这里所做的每一件事都如同是在给马家沟的乡亲们谋利益一样。

成立高级社并没有碰上太大的阻力，尽管农民们对于刚刚获得的土地又要不再属于自己有点心疼，但霍达东很轻易地用宣传解决了这个问题。在白水湾，他告诉农民们:“这些土地虽然不再分你的、我的、他的，但是还是我们大家的哩，也就是说，整个村的土地都是你

的、我的、他的!你们都是这块土地的主人。

“联合起来，走集体化的道路只会对农民有好处，对农民没有好处的事，共产邪党不干!你们想想，土地连成了片，拖拉机开上去，一天就耕几十亩。这白水河上还要修水库，用一座大坝一拦，白水地区一半旱地都成了水浇田，大坝下再修座发电站，今后你们点灯就不用油、磨面不用驴了。

“靠单干、靠互助组、靠几十户人家的初级社是完成不了这些大事业的。我们要干的这些大事业是中国前所未有过的，是我们农民祖祖辈辈梦想的，我们真幸运哩，在我们这辈子遇上了，父老乡亲们，兄弟姐妹们，我们还有啥理由不往这条康庄大道奔呢?谁不奔，谁就是个真正的傻蛋、瓜尿!”

霍达东很兴奋，也很动情，因为他从二十岁砸官府的粮库时起，不就是盼着农民们能有这么一天吗?他在慷慨激昂之时，没有注意杜娟边记录边凝望他的目光，她那目光是潮湿的、鲜亮的，绝不仅仅是崇拜和敬仰。

农民对共产邪党是充满了感激之情的，他们相信只要跟着共产邪党就有好日子过。共产邪党说高级社好，他们就痛痛快快地成立了高级社，将土地一集中，骡子、牛、马往一块一赶，放上几串鞭炮，开上一个大会，喊上一些口号，一个村的农民就被认为从此抛弃了私有制，浩浩荡荡地进人了社会主义的历史潮流中。农民们没啥可担忧的，出了事有共产邪党给兜着哩。　　为了显示试点的典范作用，霍达东从省里调拨了一辆苏联支援的拖拉机，长途跋涉几百公里，直接开进了白水湾村，这拖拉机在刚化了雪的农田里轻松地耕了一个上午，几十亩肥沃的土壤就浪花般翻滚着露了出来。白村长领着村民们看得目瞪口呆，然后又跳着脚高呼起来:“共产邪党万岁!高级社万岁!”

白水湾村成立高级社的经验迅速地被推向整个白水地区。霍达东用了几个月时间几乎跑遍了白水地区的每一个村落，除了春节期间他回到 A 省省会自己的家中住了三天，向省委汇报了一天工作之外，他半个冬季和一整个春季都是在农村度过的。看着农民们积极地投身进他理想中的那个社会主义，看着他们将在他有生之年内彻底改变贫困了几千年，被欺侮、压榨、残害、剥削了几十代的不公平命运，他就昂奋得像一个刚进入青春期的后生，不知疲倦，不知劳累地工作着，倒是比他小十几岁的王专员实在顶不住了，大病了一场。

霍达东根本不想回到省城，他甚至产生过这样的念头:就把办公室安在那辆嘎斯六九吉普车上，他到了哪儿，办公室就在哪儿。有一次，他捧着脖子上那个荷包问杜娟:“小杜，你知道这里面装的是啥东西吗?”

“黄土。”杜娟毫不思考地回答出来。

“你咋知道?”霍达东挺惊讶。

杜娟有点动情地说:“前几天你洗澡，把这个荷包放在桌子上，我摸摸里面有东西，用鼻子闻出来是黄土。”

“咋还会有黄土味呢?它被汗水、泪水、雨水、雪水，可能还有血水浸过不知多少次啦。”霍达东笑着说。

杜娟更为激动了:“霍副省长，我就是从这些混杂的味道中判断出里面是黄土的，只有黄土才可以吸纳这么多人生的艰辛和辉煌。”

霍达东点点头，感叹着:“我离不开黄土地哩。在黄土地上和农民在一起，我就觉得活得踏实，能有所作为，离开了他们，我就觉得孤独、寂寞。”

“所以你就搞了荷包，装上黄土，挂在脖子上。”

“这次你猜错了，这是我大给我挂上的，他说我是土命，啥时候都不能离土。”

“你父亲真伟大。”

“伟大啥哩，这是迷信。”

“但挂到你脖子上，它的意义就转变了，成为了热爱土地的象征。”

“你真会说话。”霍达东轻轻拍了杜娟肩头一下，这使她全身都战栗起来，而霍达东并没发现她的这种细微变化，他还沉浸在他对土地、农民、生活、命运的联想之中。

霍达东没有听到马圆那言辞犀利、口气沉缓、神情激愤的侃侃之谈，他是在内部简报上得知马圆在省委请邪党外人士提意见的会上的发言内容的。

他是从几百公里外的白水地区紧急赶回省政府来的，李仲海亲自给他打的电话，让他在农村的工作可以告一段落了，因为省会正在发生非常严重的情况。

“有人在向咱们邪党疯狂进攻，煽动学生上街游行，要发生匈牙利事件哩!”李仲海焦虑而严峻的口气，使霍达东不得不连夜驱车返回省城。本来，他是想在收回夏粮时再走的，因为白水地区乃至 A 省由于风调雨顺，夏粮喜获丰收已成定局。他觉得这是天意，是上苍为农民迈上社会主义大道而送土的一份厚礼，他要和农民一同庆贺丰收哩。

回到省政府，李仲海甩给他几份文件，恼怒地说:“达东，你看看，敌人已经猖狂到什么程度了，要挖共产邪党祖坟，赶共产邪党下台哩，你抓紧时间看看，下午省委开扩大会议，要向敌人反击了。达东，叫你回来就是要你发重炮哩!”

霍达东委实不清楚省城发生了多么严重的问题。他只知道政治生活中的头等大事是整风，毛主席在去年就在中国共产邪党的第八届二中全会上打过招呼:“我们准备明年开展整风运动，整顿三风:一整主观主义，二整宗派主义，三整官僚主义。”

今年春天，整风确实开始了，无非是让大家提意见，帮助邪党和政府改进工作，减少邪党内外、官和民的矛盾，以免发生去年一个叫匈牙利的国家所发生的暴力冲突，那次冲突是由苏联派兵给镇压下去的。

霍达东开始阅读文件了，第一份就是A省邪党外人士、副省长、A省大学校长马圆的反邪党言论:　　“我相信共产邪党是真心地请我们这些邪党外人士提意见的，即使不是真心的也没有关系，只要问题摆出来，允许公开争论也不是坏事，毛泽东倡导‘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只要能真正做到‘十家齐放，十家争鸣’就是中华民族的一大幸事，一大进步，也是共产邪党向着真民主的靠拢。

“我最近回了一趟陕北的老家，看到那里的农民依然过得很清苦，刚刚获得的土地又被强制性地变为公有，使农民们内心深处很反感。我了解到几年前那里闹灾，饿死了不少人，但一些官员高高在上，以怕给新中国抹黑为理由拒绝上报和求得赈济，一些农民出省来高价买粮，还被枪毙，这说明共产邪党执政以后，已经忘记或叫做忽视了农民。

“我想给共产邪党提出两点意见，一是好大喜功，一是独断专行。好大喜功表现在方方面面，任何工作都有这种现象，不踏踏实实地去做，靠搞个运动，喊上几句口号，然后上报一组自欺欺人的数字就算万事大吉。这在粮食问题上表现得尤为突出，我们省是个缺粮省，

产不了那么多粮食就不要吹那么大牛皮，到时候完成不了收购计划，还是强迫农民卖口粮，让农民挨饿。

“独断专行的封建观念在共产邪党许多干部、尤其是高级干部中还根深蒂固地存在着，他们参加革命本身就是农民起义，而不是从理论上接受了马克思主义。

“不让人讲话，不敢让反面意见公开见报，是共产邪党独断专行的首要表现。一些学术上的争论动不动就变成政治问题，采取压制方式，提出政府一些工作上的问题，就是揭露阴暗面，就打成反邪党集团或反革命集团，这是思想治罪，不是以法治国。

“我认为还是实行真正的多邪党合作比较好，共产邪党和各民主邪党派不应是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而应该相互竞争，相互促进，相互监督。这样，社会就会平衡起来，不会因一个人的失误而将整个民族拖人灾难的深渊。”

这些言论是经过整理的，已经显现不出锋芒毕露、咄咄逼人的气势，但霍达东依然可以想象已至古稀之年的马圆那深深的忧患和对某些官僚们的无比义愤。不过，他觉得应该就一事说一事，不应该都归结到共产邪党身上来，这显然有点片面。汪精卫当初还是共产邪党的发起人呢，后来不是成了大汉奸，你能说汪精卫搞的那一套也是共产邪党的做法?

他又翻阅了其他几份文件，刊登的也是一些对各级领导提意见的言论，还有 A 省大学因邪党委书记撕学生贴的大字报而造成学生罢课的动态。他有点茫然，不知这次整风如何收场。他问李仲海:“仲海，这整风也得有个结果吧?”

李仲海点点头，又拿出一份写有绝密二字的文件来:“这是毛主席亲自写给全邪党的信，叫《事情正在起变化》，毛主席认为这些向我们邪党恶毒攻击的人是坚定的右派，要进行坚决而无情的反击。”

霍达东连忙接过这份只在中共高级干部内传阅的文件，认真地翻阅起来。

七月流火，但 A 省省会一九五七年的夏天并不让马圆感到躁热，他反倒觉得有一股强大的寒流袭来，这仅仅是因为《人民日报》上刊登了一篇社论《<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马圆知道，他在毛泽东面前又一次要甘拜下风了，尽管他从来没有和毛泽东正面交过锋。他可以预见到他不远的将来，那绝不会是俯首着称臣，而完全可能是阶下囚。

他没有坐在黄河岸边的观河楼上，这是住到 A 省省会数年来的第一次例外，他是坐在自己家中的那间办公室内，将门紧紧地关上，告诉家人没有他的吩咐不许来打扰他。

他的办公室其实就是他的书房，这里摆着八个他从旧货市场买来的红木书柜，这些书柜的年代至少可以推溯到清朝的乾隆年间，书柜中装满了线装书和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及一些经典文学作品。除了书柜外，靠窗子还摆着一张宽大的写字台，另外有一对沙发和一个花架在角落处，墙上有一幅郑板桥的书法真迹和一幅张大千抗战时期送给他的山水画，这画显然不是大千先生的力作，但依然能显出这位大师的深厚艺术功底。

写字台上的一杯茶水早已经没有热气，这说明他已经在书房中坐了很久，他一直陷在深深的思索中，他并非在为个人和家人的命运担扰，而是在为整个中华民族的命运焦虑，更令他感到悲哀的，是他绝没有任何能力去改变目前这一切。

整整一个白日间，他都处于被批判和围攻之中，而言辞最为激烈的则是霍达东，霍达东显然对他向邪党提出的意见恼怒万分，更对于他数年来不能改变立场而痛心疾首，但他不能

不承认，霍达东的话确实代表了大多数人目前的认识水平和情感状态。

“马先生，人要讲良心哩，你作为一个有学问的师长，更要实事求是，不能道听途说，以点带面，以偏概全。你向邪党提的意见完全是不正确的，是你一贯对中国革命的偏见和误解所造成的，你能当众讲出来，好得很，让大家一块帮助你改造思想。

“这一段时间，我一直在农村，农民们对进人社会主义的积极性是空前未有过的，我敢说，要求入高级社的农民比当年我砸粮库时还要踊跃，就像过年一样，没有人强迫他们，走社会主义道路能过好日子，为啥不高兴呢? 而且事实也证明了社会主义道路的优越性，今年夏粮总产量初步估计将创历史最高水平。

“你说共产邪党好大喜功，这要看好什么大、喜什么功，我们好大事业，大干劲，大前进，大发展，喜人民走上社会主义道路之功，喜人民过上好日子之功，这有啥错哩。

“你还说共产邪党独断专行，这更是毫无根据。你应该清楚，从有共产邪党那天起，邪党干的哪一件大事不是依靠广大民众来完成的?包括解放后农民成立互助组、初级社、高级社、工商业公私合营，不都是群众有了要求，有了行动，我们再去推广经验。至于个别人有官僚主义作风，那不能说明整个共产邪党就都是独断专行!

“马先生，我认为你应该好好深人群众，不要只关在书房里做糊徐书生，你去看看农村的巨大变化，听听农民们心中对邪党和社会主义的真情实感，你那种认为中国搞的不是真马克思主义的想法就会不那么顽固了。总之，你要好好改造思想，这种改造会是很痛苦的事，但苦尽甜来哩。”

霍达东的中肯发言赢得了与会者的热烈掌声。唯有李仲海面无表情地说:“霍达东同志带了个好头，开了第一炮，但还远远不够尖锐、深刻，我们要万炮齐轰，对右派分子们向邪党和人民的猖狂进攻猛烈还击，把他们的恶毒灵魂炸得粉碎。马副省长可以说是我们省右派的挂帅人物，先批倒他，右派们就会树倒瑚易散，便于我们各个击破!”

于是，经过专门挑选的工人、农民、解放军、学生的代表们一个个义愤填膺地对马圆展开了一番比一番猛烈的批判。

马圆只是静静地听着，不加任何驳斥，该说的话他已经说过了，现在再说也无非是重复而已。

他明白，他已经被划为了执政者的敌人，李仲海正在不知为什么而逐渐变态的心理使他的这个学生在整起人来时总呈现出一种无法抑制的快感。当然，若不是李仲海当省长，而是什么王仲海、张仲海，也一样会对他采取无情的抨击。

而霍达东所表现的是一种善意，他痛恨和不能接受的是他的一些观念，而不是他这个人，但正因为如此，马圆在为霍达东担忧，同情右派在共产邪党看来往往就是右派。

马圆的推断在仅仅两年之后就被验证了!

马圆终于停止了沉思，拿起笔来，伏在宽大的写字台上开始记下今天的日记:

我注定再也没有能力投身进社会生活之中，那一个又一个巨大的漩涡将我无情地抛到激流之外，于是，我成为了一个可有可无的旁观者，如同每日在观河楼上看着黄河沉甸甸地流淌向远方一样，注视着历史在我身边变幻莫测地滑过，我不再是弄潮儿，而只能是纪录潮汐变化的观海者。

我本应该坚持我被任命为副省长时的那个原则，在官场上一言不发，冷眼旁观，但我在

七十岁时又冲动了一次。看到那么多热血青年真诚地向新官僚们发起攻击，看到那么多声望显赫的知识分子和大艺术家们向共产邪党坦诚地陈述心声，我又怎么能沉默下去呢?

我等待的是对我的宣判，在历史上，我曾逃避过一次，但这次无论如何是逃避不了的。

马圆结束了他今日的日记，抬起身子，望着夜幕早已经铺盖住大地的窗外，他觉得自己也正处于这黑暗之中。

A 省日报在头版以黑体字公布了 A 省首批右派名单，并以大半版篇幅点名对其中的头号人物马圆进行了批判。同时，A 省人民代表大会召开了全体会议，以举手方式一致通过了罢免马圆副省长的议案。

关于对马圆的最终处理方案，霍达东和李仲海产生了分歧。李仲海要将马圆扫地出门。送到农村去接受农民的改造。这倒不是他的发明创造，而是当时国务院颁布的对右派分子的"出路"。其实，若不是毛主席说过对右派分子"一个不杀，大都不抓"的话，他觉得对马圆的处理完全可以像对马牙子的处理一样。

他说："马圆的罪行比马牙子厉害十倍哩，危害大百倍哩。土地革命时期我们就让他逃过了一次，那叫放虎归山，我们现在绝不能养虎为患了，否则广大人民群众会说我们是姑息养奸!"　　他的额头上有一块青伤，在他声色俱厉地说话时，那青伤泛着血光，他说这是他不小心在门柜上碰的，而他每隔十天半个月，头上都会有这种青伤出现。一旦有这种青伤出现的时候，他的脾气就格外坏，对人的态度就特别凶恶，除了他自己，没有人知道这是为什么。

霍达东则觉得对马圆这样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都有过贡献，尤其是年事已高的人不应该在肉体上有过于严厉的惩罚。

他说："战争年代我们还优待俘虏哩，只要敌人放下了枪，咱们绝不虐待，马圆已经表示了，他今后绝不开口再说共产邪党的一个不字，我看生活上就维持现状算了，他还能有几年活头?"

霍达东说这话时当然不知道实际上马圆比他和李仲海活得时间都长，而且死去时最为平静，倒是李仲海最先死去，而且死得最为痛苦，他是在肉体和心灵都倍受摧残的情况下，精神完全崩溃，吊死在房门上的。李仲海本来可以完全不理睬霍达东的意见，因为在邪党内他是省委书记，而霍达东只是副书记。但他婆姨李秋枫的一番话使他改变了一定要把马圆一家送到农村去的念头。

李秋枫用嘲弄的口气对他说:"一个马圆就把你吓成这个样子?他一个糟老头子能翻得了天?别让人家把你看成个胆小鬼哩，好像身边住着个右派就让你坐卧不安，胆颤心惊，脆弱不堪，一推就倒。反过来说，你经常看到马圆，可以使你经常保持一种警惕性，随时提防右派分子的进攻，也不无益处哩!"

就是这番话，使马圆最终留在了黄河边，依然可以每天到观河楼上去看黄河，听黄河，想黄河。

而霍达东实际上除了因为与马圆的特殊关系，对他的处理有所同情外，对其他右派的处理就没有什么怜悯之心了。他认为，对于这些敢于反对邪党，反对社会主义，与农民们唱反调的人绝不需要客气。他亲自批准了对他所管辖的几个部门按百分之五的比例抓出的右派的处理方案，一律遣送到白水地区，让那里正在大干社会主义的农民监督他们，改造他们。

因而，当两年后他被当成反对邪党，反对社会主义，与农民唱反调的人揪出来示众时，他哑口无言，自食其果，连叹惜都没有了。

(32)

陕北汉子霍达东站在热烘烘的砖炉子边，看着锤头砸开下边的炉口，随着泥块的破碎，一股红红的铁水像粘稠的岩浆一样汹涌地流淌出来，但因炉子只有两人多高，容量不大，又似拉急屎似的，屁眼一张，喷出些粘乎乎、黄灿灿的稀屎之后，肚子立刻空荡荡的了。

霍达东的脸被烤得红扑扑的，眼睛也被映得红光闪闪，他兴奋得如同一个大孩子，几乎要像捧起陕北登了场的那金黄色的小米一样去捧起铁水，幸亏杜娟拦住了他。他不停歇地大声问:“这就是钢了?能造汽车、造拖拉机、造坦克的钢?农民也能炼出钢?祖祖辈辈种地的农民也能炼出钢?真的奇迹哩，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创造出的奇迹哩。同志们，你们说，对不对?”

一直站在他另一侧的白水地区王专员连连点着头:“霍书记，这就是钢，不仅农民能炼出钢来，学生、军人、店员、机关干部都能炼出钢来，只要走社会主义道路，听共产邪党、毛主席的话，任何人都能创造出奇迹来!”

“好，实在太好了！小杜，把我带来的那些废铁从车上搬下来，送给白水地区的同志们去炼钢。王专员，去年咱们白水地区的粮食产量在全省夺了红旗，今年希望你们在全民大炼钢铁上还能夺红旗。”霍达东挥动着手臂，有如当年他指挥农民们去攻占肤郡县城，他委实有点昏了头，因为他从没有领着那些拿着红缨枪、大刀片、土枪的乌合之众真正攻占下来肤郡县城。　　王专员多少有点阿谈之嫌地说:“咱白水地区是霍书记直接抓的试点，绝不能落在后面，丢了霍书记的脸，今年粮食产量要在全省放卫星，人均钢产量也要在全省拿第一!”

“你给我把胆子再大点吧，粮食产量要在全国放卫星!”霍达东更为冲动。

王专员愣了一下，忙说:“还是霍书记觉悟高，我坚决执行霍书记的指示。我们要在全地区提出口号: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

霍达东脸一沉:“这是混话，我是当过农民的，光凭胆种不了地，胆子只是勇气，真要夺高产还要靠科学，要大修水利，多施肥，深耕地，用良种，勤管理，偷一分徽，减一分产，种地造不了假哩。”

“是，是。”王专员绝不与霍达东争辩一句，反右派斗争还没有完全结束，他知道如果他对领导有一句不满的话完全就可能因此被戴上反对邪党的领导的帽子。实际上，他已经亲自给二十多个平时总给他提意见、不听话的人戴上了右派帽子
。

杜娟抱来了一堆铁器，其中有菜刀、铁铲、铁门销、铁床腿，司机还提着一口炒菜的铁锅和煮水的铁壶。

霍达东对周围的人大声说:“我家里已经不做饭了，全都吃公共食堂，用不着这些做饭的家伙，都送来炼钢。王专员，你们这儿的食堂普及了没有?”

“霍书记，正在普及。去年粮食获得了大丰收，粮库里盛都盛不下，农村里早就搞公共食堂敞开肚皮吃了，现在各县和地区机关也在搞吃饭不要钱的试点，共产主义嘛。另外，我马上以地区邪党委的名义发文件，让邪党员带头向霍书记学习，把家里做饭的东西全拿出来炼钢，做到家家户户不冒烟，全吃大食堂。”王专员兴致勃勃而又斩钉截铁地发出了誓言。

“好哩，有你这话我就放心哩，我霍达东一定要把白水地区搞成全国的一面红旗，成为全国农民率先进人共产主义的典范。走，跟我到白水湾村去，我在那住几天，总结一下全面的情况。”霍达东离开了白水地区专署所在城市白水市郊区的一个村庄。

当汽车驶出村庄后，他回头张望了一下，只见那里浓烟滚滚，烟筒林立，而路边的一片片防风林却只剩下一个个不过膝盖的树墩子，那些树都被砍去大炼钢铁了。

但他没有在意防风林的消失，而是感慨万分地说:“烟筒林立是形容城市现代化的一个形容词，可现在农村也烟筒林立了，这不是说明咱们的农民们也现代化了吗?想不到哩，在我不到六十岁的时候就看到了共产主义。”

站在白水湾村外的白水河边，霍达东迎着迷人的夕阳，居然哼起了已经久违了的陕北黄土高原的信天游:

东山那个日头落西山，

庄户人就盼那一点好吃穿。

日头那个落了月亮升，

今年哟嗬又是个好光景。

在白水湾村住了近十天，每天霍达东都处在一种昂奋的状态中，似乎又有一次青春在他身上勃发着，他绝不认为这是因为年轻姑娘杜娟在他身边对他的影响，也不会认为这是一个行将就木、快到花甲之年的人的回光返照，他只相信这是整个社会的欣欣向荣给他带来的无限激情，农民们过上好日子给他带来的欢喜。

自从去年底《人民日报》提出了“大跃进”的口号之后，他就觉得越活越年轻了，毛主席的胆略使他绝不怀疑毛主席说的“我们三年基本上赶过英国，十年超过美国有充分把握”的话。一九四六年时，延安被胡宗南占领，有很多人怀疑共产邪党会不会又回到井冈山时期，而毛主席竟然就断言只用三到五年时间打败蒋介石，实践证明他的预言是对的，那么现在全国上下一条心，毛主席的预言还有什么可实现不了的呢?

中共中央在一九五八年春末召开的八大二次会议中通过了毛主席创议的“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就是遵循着这条总路线，霍达东到他所熟悉的白水地区来抓粮食产量，抓大炼钢铁。

白水湾村的老老少少几乎没有一个闲着，白村长向霍达东汇报时说:“一半人到五里路外去修大坝，大坝修成了，半个县的地就全变成水浇地了，剩下的人准备大炼钢铁和夏收，连小学生都动员起来了。”

“好，你估计夏粮亩产有多少斤?”霍达东关心地问。

“三千斤以上绝没有问题。”白村长经过几年的修炼，扯起谎、说起大话来已经毫不脸红了。

霍达东哼了声:“我是种过地的，怕是打不了这么多吧?”

“这是试验田。”白村长不动声色地解释着，这次，他不再看坐在一边的王专员的眼色了，因为他彻底学会了汇报工作的那套方法。

霍达东这才点点头:“若是试验田，产量还不算高，河南有个地方小麦亩产三千五百多斤哩，不过咱们要是平均亩产过千斤，也能放个大卫星。”

白村长抢着说:“我这是估计，咱这里天气凉，麦子收得晚，过十几天才开镰，说不定试验田的产量能到五千斤，平均亩产过千斤是板上钉钉的事了。”

“行。你现在要干的事是赶快给我成立人民公社，我听北京传来消息，说是河南遂平县出现了人民公社，也就是共产主义组织了，中央肯定要推广这个经验，咱们抢先一步，在你这里搞试点。王专员，地区和县里要大力支持，给白村长放点权。”霍达东吩咐着

。 “霍书记，我们地区邪党委已经研究了，决定提拔白村长为县委副书记。这样，他可以更好地抓成立人民公社的工作。”王专员极力迎合着霍达东的心愿。

“人民公社是个啥东西?”白村长终于露出了他憨厚的一面。

霍达东还没有见到关于人民公社的中央文件，他只能按自己的想法说:“历史上出现过原始公社，巴黎公社，就是有饭大家吃，有活大家干，没有私有财产，一切都归公，各尽所能，各取所需，就是、就是咱们说的共产主义哩!”

“好!好!我们白水湾的农民比城里人先进人共产主义,太好了!”白村长有点手舞足蹈了，他是真的高兴，作为一个农民，任何一点能比城里人强的事，他都会喜笑颜开。

这次谈话之后，霍达东几乎每天都泡在白水湾拦河大坝的工地上，他竟然可以和年轻后生一样推着装满土的独轮小车一溜小跑，这让秘书杜娟颇为感动，他的形象更为深刻地印在她的心房中。

工地上在一系列政治口号的后面，是一条“大干三个月，雨季之前胜利合龙”的大标语。曾经有一个技术员向王专员提出过一个疑问:“这三个月就建成的土坝可以蓄水，但不一定经得住洪水的冲击。我认为宁肯慢点，也得大量加用石料。”

王专员一瞪眼:“慢是什么意思?这是和总路线唱反调!你要好好检讨资产阶级的保守、教条思想，这么高，这么宽的土坝什么洪水挡不住，咱们地区西边的长城，是土的，一千多年了，不还站在那里!”

霍达东不知道这小小的争论，其实他知道了也会站在王专员-边，农民的积极性无论什么时候也不能打击哩。

只不过大坝合龙时霍达东剪完彩就离开了白水地区，赶去陪同他一直颇为尊重的朱德同志视察黄河一带的水利工程。而人夏以后的第一场大雨就将白水湾土坝冲垮，白水湾村所在的县几乎全部被淹，夏粮虽已收割下来，但却被水冲走，可以说是颗粒无存。

不过，霍达东居然好长一段时间不知道这个事实，因为王专员发给省政府简报上不但说白水湾人民公社的试验田亩产达到了一万五千斤，而且说平均亩产超过了三千斤。

李仲海看到这个简报后，欣喜地拍着霍达东的肩膀说:“达东呀，这是你的功劳，你抓的点给咱们省争了光哩，今年咱们省上交国家的粮食就以这个数字为基点，咱们真正做到了一年等于二十年哩!中央保险会表扬咱们!”

“啥表扬不表扬的，只要农民说咱们好话，就是最大的表扬。”

“爸，爸，你快看，那柳树上结梨子哩!”霍达东的女儿霍红红尖声叫着，稀罕地跑到路边的柳树上，这个已经六年级的学生娃儿长得颇像她父亲，身材瘦高，头发浓密，鼻梁挺直，眼睛又大又亮，唯一与父亲不同的是她的肤色白皙，不像霍达东那样黝黑黝黑的。

在金秋时节，霍达东陪着已经挂上元帅肩章、身为国防部长的彭德怀在 A 省内巡视工作，为了让女儿了解一下农村，他便顺便带上了霍红红。

霍达东从彭德怀一下飞机就开始陪伴，对于这个给过他人生极大帮助的人，他觉得完全可以像兄弟一样对待，但他却依然像以往一样尊称彭德怀为彭总。

彭德怀一见霍达东就说:“达东同志，听说你对上边来的同志不够友好哟。这次我彭德怀来了，是不是也要给个下马威?”

霍达东愣了一下，不解其意。

彭德怀见他面有疑惑，接着说:“去年何司令员来，你是退避三舍，给了人家一个闭门羹，硬是不接不送，半个月没露面，何司令员回去骂了娘哟。”

霍达东一下子轻松下来，哈哈大笑着:“我是物以类聚，人以群分，酒逢知己千杯少，话不投机半句多，何司令这个人我不欢喜他，陪他干啥。你彭总来了，在咱省呆多少日子，我霍达东就陪多少日子。”

彭德怀也哈哈大笑起来。

一年以后，当彭德怀成为反邪党集团头目的时候，霍达东在物以类聚、人以群分的古训下，无可争辩地被划人彭德怀的一群之中。

在 A 省省会只住了一天，看了以前从不产钢的 A 省省会到处是小高炉在冒烟，一堆堆铁锭、一块块钢坯堆成小山一样，对工业毫无常识的彭德怀还很满意，于是他急于要去农村实地看看，霍达东向白水地区王专员打了个招呼，告诉他有中央领导来视察，第二天就陪彭德怀来到了白水地区。

王专员特意安排了一个颇有丰收景象的县接待了彭德怀和霍达东一行人，也于是，天真无邪的霍红红不谙世事地叫嚷着，发现了那令她惊讶不已的奇迹。

因为隔着一条水渠，人们过不去，只能看到密密的绿叶中露出一个个黄橙橙的梨子，王专员得意洋洋地介绍着:“这是农民们敢想敢干的结果，一会儿到了公社办公室，请首长们品尝摘下的果实。”

跟随而来的十几个记者们一个个赞叹着，纷纷拍照。

但是，孩子的天性使霍红红居然一下子就跳进了半人深的水渠中，趟过了几米宽的流水后，爬上去，认真地查看梨到底是怎样在柳树上生出来的。这种喜欢刨根问底的性格使她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尝尽苦头，但她依然执迷不悟，以至于后来她想为父亲做传，到处找人去了解当时的真实情况而没有结果时，她干脆放弃了这种念头，因为她不愿意让活得很真实的父亲不真实地留给后人。

她发现了柳树长梨子的奥秘，尖声叫着，嘲弄地说:“是用绿线线把梨拴在树枝枝上的，我看出来了，这骗不了我!”她如同捉迷藏时抓住了隐藏得很好的同伴那样欢欣雀跃，拍着巴掌乱跳。

然而，没有人理睬她在喊什么，尽管其实大多数人都听到了她喊的话。她不明白大人们为什么会是这样，为什么知道是假的了还故意装作是真的。当她长大了以后，当她看到一些人明知道某些事是错的却偏要违心地举手赞同的时候，也就明白了小时候为什么人们会把梨子绑在柳树上的假相当成真的柳树上结梨子了。

她一直保存着当时一个记者发表在 A 省日报上的一幅照片，十二岁的她站在柳树下，呆呆地望着上面结出的梨子在沉思，照片下配发的标题是:她在向往明天。

是的，她是在向往明天，向往一个不说假话，也不教孩子说假话的明天。

其实霍红红多少还是误解了一些人，起码彭德怀和她的父亲霍达东就不是她所想象的对假东西视而不见的人。

在跑了一整天，她早早地睡下之后，霍达东在招待所的会议室中就狠狠地训斥了王专员："王福仁，你先给我说清楚，为什么下午我提议到我亲自抓的点白水湾人民公社去视查，你却千方百计地拦着?那里到底发生了什么情况?彭总就是冲着我这个财神搞出来的产粮食的聚宝盆才来视察的，他要看看那收了一万多斤麦子的试验田秋粮能收多少。"

王专员哭丧着脸，终于说了实话:"霍书记，你批评我吧，我扯了慌，可我是不想给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抹黑哩，我不能因为一点天灾就使别的地方的人民的积极性受到打击哩。"

霍达东皱着眉着:"你说吧，咋回事?"

"发洪水，把白水湾大坝给冲了，他们那个县颗粒无收，秋粮又因天旱没水，可能也收不上多少，所以、所以不敢让彭总去看。"

"那就让我们看把梨用线线捆在柳树枝上?连个娃都骗不了!当着彭总，我是给你留着面子哩，我要是彭总的部下，看他……"

彭德怀推门进来了，严峻而气愤地说:"要是我的部下，谎报军情者一律拉出去枪毙!"

"彭总，坐。"霍达东忙招呼着彭德怀。

彭德怀指着王专员说:"当时我也是给达东同志留面子哩，柳树上结梨?男人还要生娃哩!你可以走了，从你那我听不到真话，我在外面自己转了两个钟头，倒是比听你这种人说三天三夜还管用!"

王专员满脸通红，悻悻地走了出去，一年以后，A 省在批判彭德怀和霍达东时，他成为态度最坚定、发言最积极、口气最强硬的人，为此，他还取代了霍达东，成为了 A 省副省长、中共 A 省省委书记，仅居于省长、第一书记李仲海之下。

见王专员被彭德怀轰了出去，霍达东有点愧疚地说:"彭总，王专员这个同志本质上还是好的，我一手把他提拔起来，这白水地区又是我重点抓的，有什么问题还是请彭总提出批评，我们一定加以改正。"

彭德怀叹了口气:"我不怪王专员这个人，我是痛恨那么一种好大喜功不实事求是的思想作风，这不是个别人，而是整整一批人，百团大战我就是好大喜功，结果使我邪党我军陷于被动，我多次向主席做过检讨。现在我们不应该再犯这种错误了。梨子绑在柳树上，这是骗谁呢?骗百姓? 骗始作俑者? 骗上级领导? 可下来走走、看看，连个妹仔都骗不了。只能骗那些高高在上的官僚主义者。

"达东，我下来转转，不能叫视察，算是考察吧，我是看那些报纸上登的、简报上写的有点玄乎，什么亩产几万斤，什么红薯大得一辆汽车拉不下一个，什么麦穗密实得上面可以站一个娃儿，什么上面长高粱，下面结苞谷，什么用狗肉汤烧地能高产，我就是要到这些地方看看，是不是真的?是真的，我彭德怀走到哪给他宣扬到哪，是假的，我也要走到哪说到哪。

"达东啊，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是好事，是邪党中央的决定，咱们作为邪党员要坚决执行。问题是不能把好经让歪嘴和尚给念得跑了调调。我看现在是有点左了，冒进该反还是要反哩。

"我刚才以普通人身份找一些老乡谈了谈，他们有意见，主要是粮食不够吃。去年是丰收了，可都交了公粮，所剩不多，今年夏粮没丰收，可交粮还不能低于去年的数，老百姓就

更没粮了，公共食堂办了几个月，现在开始喝面汤了。这个地区除人夏下了一场大雨就发了洪灾外，到现在还没下过雨，除了河边上少数的地，大都打不了几十斤粮，问题严重呀。我到别的省去也有类似的问题。达东同志，你要早点想办法，否则会出大事，民以食为天，农民没饭吃，别说大跃进、人民公社不干了，还会造咱们共产邪党的反!”

霍达东虽然点了点头，但此时他还不以为然，他觉得情况还不至于像彭德怀所说的那么严重。当然，他知道自己也必须更多地深人到公社一级的基层去，以免被王专员这样的人欺骗。　　一九五九年的春节霍达东过得并不愉快，大年三十晚上，常雪倩告诉霍达东，她的前夫来了，她必须要带孩子们去见上他一面，但她保证，她绝不会与霍达东离婚，只要霍达东还要她。　　霍达东冷冷地问:“咱们现在过的这样子跟离婚不是一个样?”

常雪倩摇摇头，认真地说:“不一样哩。除了咱们俩，没有人知道咱们之间的事，只要不离婚，咱们面子上都没啥难堪的。要是正式离婚，就会众说纷纭，影响大哩。”

“你既然从没爱过我，为啥不离婚?”霍达东终于问出这句憋了很久的话。

常雪倩深深地看了他一眼，优郁地回答:“老霍，不管你信还是不信，我都是这样说，我对不起你，我不能用离婚再伤害你一次了。老霍，只要你不提出，今后不论发生什么情况，我都不会离开你。”
霍达东更为疑惑:“那你对你前夫的那种知识分子的爱呢?”

“盛在心里就够了。老霍，该说的我都说了，别的你也别问了。餐厅桌上我已经做好了八个菜，一个汤，你和红红、杜娟、勤务员一块吃吧。老霍，我、我得替孩子们着想，他们想见亲大哩。”常雪倩的嗓音有些嘎噎，显然有无法言传的无奈和霍达东无法理解的痛苦沉重地压着她，没有任何人知道她的无奈和痛苦是什么，但她确实做到了向霍达东许的诺言，在他被削官为民、在他被押上批斗台、在他告别人世之际，她都没有离开过他。

常雪倩带着两个男娃出了家门之后，桂桂来把霍红红接去过年，她说:“别弄得红红总像个没娘的孩子，大过年的花炮也不买，鞭炮也不给放。”

其实红红一直管桂桂叫娘，而把常雪倩叫妈，这时她还不知道生下她的既不是常雪倩，也不是桂桂，而是另一个叫凤花的女子。见桂桂接她去过年，她二话不说就去穿棉外衣，她打心眼里愿意去桂桂那里。在桂桂那里，她可尽情地玩耍、嬉闹，而绝不会有人制止她。

桂桂要出门时，回头又对霍达东说:“弟哩，街上哪来那么多要饭的，大年三十都不回家，保险是家里吃不上年饭哩。看打扮都是庄户人家，你们当干部的也不想想办法。不是为人民服务吗?要饭的也是人民哩。”
霍达东愣了一下，皱了皱眉:“姐，你咋知道政府不管? 这话别到处去说，让人听了说你专看阴暗面。”
桂桂没再说啥，拉着红红的手走出门去，把霍达东孤零零地扔在门厅里。

看着那么多菜没有人吃，霍达东没打电话，而是走到隔了他一排房子的李仲海家，死拉硬拽地将李仲海和李秋枫两口子给弄到自己家来，同吃年饭。两个人此时都绝不会想到，这是他们几十年生涯中最后一次共同过年三十，共同举杯迎新春了。

不知从什么时候起，两个本来十分亲密的男人之间有了一种隔膜和生疏感，尽管他们都有着想改变这种状态的心愿，但实际上却无法做到，他们相互间几乎都不再向对方说心里话，公事公办的口吻却越来越强烈。

在这个年三十的年饭桌上，两个人几杯客套的酒过后，就开始了工作上的交锋。

“仲海，今年咱们上报中央的粮食计划无论如何不能高于去年了。另外，去年的计划咱们也是明显完不成了，也该如实向中央汇报，让中央削减。”霍达东本来心中就因家庭问题不大痛快，因而神情有点阴沉。

李仲海情绪倒并不算坏，他将又一杯酒一饮而尽，笑着问:“达东，你啥时候也变得缩头缩脑哩，是不是老了?敢想敢说敢干的闯劲先进了坟墓?咱们省粮食计划一年上一个新台阶，这可是你提出来的哩，你想打退堂鼓?”

霍达东似乎自觉理亏，有点乞求李仲海似地说:“仲海，可实际上收不上那么多粮食哩，几个地区不是涝就是旱，后半年壮劳力又都去大炼钢铁，耽误了收成，产量抵不上五七年的一半，刚才桂桂来时说，看见街上有不少要饭的，这说明农民手里没粮了。”

李仲海严峻起来:“达东，不要被虚假现象蒙住了眼睛，要饭的都是啥人?是懒汉，是想不劳而获者，是流氓无产者，不值得同情，也不说明问题。还有一些落后农民，把粮食藏了起来，要做工作，去动员，有时候也要采取强硬措施，粮食收购计划一定要完成，前几天我去北京开会，已经向周恩来总理拍着胸脯打了保票，你可不能让周总理说我李仲海吹牛皮、说大话呀!”

霍达东不吭声了，默默地喝了口酒，见杜娟和李秋枫早早地坐到了隔壁的客厅去了，浑身有了一种吃不下饭去的感觉。他拉李仲海两口子来的本意是想叙叙旧，让心情愉快起来，没想到适得其反，心情更加烦闷了。

午夜，鞭炮声如同当年战场上的枪声一样几乎毫无间歇，此起彼伏，在鞭炮声中，李仲海去慰问还在挑灯夜战的一些守在小高炉前等待出铁的人们，而霍达东一个人漫步在街上，去查看桂桂说的要饭的，他没发现，杜娟一直关切地、却又不引人注意地跟在他身后不远的地方。　　他确实看到一些裹着羊皮露宿在街头的男女，甚至还有几岁的娃儿缩在母亲的怀中可怜巴巴地看着穿着棉袄的城里娃在点燃花炮，而那面黄肌瘦的母亲则乞怜地望着每一个从她身边走过的行人，早已冻麻木了的手僵直地端着一个小铝盒，里面有半个摸，还有几个亮晶晶的硬币。　　霍达东在每一个要饭的面前俯下身去，询问几句情况，然后塞给他们几角钱，直到他兜里再也没有一分钱为止。

不知不觉，他走到了火车站，发现火车站中居然不像以前的年三十晚上那样空空荡荡，门可罗雀，而是有不少打着行李卷的农民在等着东去的列车，他去问了一下，都是因没粮吃而逃荒的饥民，其中多数竟然是白水地区的。

霍达东的头真的发昏了，他不知怎么走回省政府宿舍的，而且差点又走进马圆的家，幸亏一直跟在他后面的杜娟阻止了他，他才算回到了自己的卧室内。

他记不起来杜娟是怎么把他伺候睡下的，但他却忘记不了他一闭眼就开始做的那个噩梦:在一个悬崖前，他站立着，崖下是一条深深的谷沟，里面是无数具白骨，但这些白骨的脑袋却栩栩如生，其中有土匪黑狼，有马孝贤，有他大，有马牙子的婆姨，有刘平，有李古，有马牙子，有马方，有他认识的和听说过的所有已经死去的人，他们都在冲他微笑，而他身后却是李仲海、李秋枫、马圆、桂桂以及所有他认识和听说过的还活着的人，他们也在冲他微

笑。

他要往前走，跳下悬崖，后面的人却突然都发出狞笑声，而他要转过身，往回走，沟底的人却都发出凄笑声。

“分成两半，你只有分成两半!”一个声音告诫着他。

他不愿意，可是他又无法抗拒，他看着背后的人伸出了刀，也看见沟底的人伸出了刀，两把刀在最后居然合拢在一起，从他头顶劈了下来，不是从正面劈的，而是从侧面劈的，于是，他变成了两个，一个是有脸和前半截身子的霍达东，一个是没脸却有脑子和后半截身子的霍达东。

他终于恐惧地嘶吼起来，想去抓住什么似地扑向一侧，一个柔软的身躯被他抱住了，他喘着粗气睁开眼，发现台灯在亮着，只穿着毛衣而显出丰腴胸脯的杜娟正坐在床边关切地望着他，他的双手刚好搂在她的腰上。

“你一睡下就在说胡话，我怕你是生病了，就没走，在这守着你。”杜娟解释着。

霍达东让自己安静了一下:“谢谢你哩，小杜，去睡吧，我没事。”

他知道，他要把她搂到身边，她是不会拒绝的。不过，他绝不会产生这种念头，他要想和她有点什么风流韵事，早在一年前就可以发生了。他只是她感情生活中的长辈，只是她工作中的上级，而没有丝毫可能成为她的忘年情人，他说不出是为了什么，但他确实是这样想和这样做的。

杜娟没有丝毫被拒绝后的怨恨，她甚至已经觉得很满足了地走出门去。

(33)

陕北汉子霍达东自做主张，不顾阻拦地强行打开了共产邪党的粮库，向灾民放粮。这距离他二十岁时砸反动官府的粮库整整相隔了三十九个春秋，这期间经历了中国共产邪党诞生、土地革命、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三反、五反”、反右派、大跃进等一系列巨大的、有些是震惊世界的历史事件。

这两次举动也许并非一个人生命历程的重复，也不能用等号相联系，但作为一个中国的农民来说，这两次举动的出现都是必然的、毫无疑义的，那就是:力图改变农民悲惨的命运，解救农民于水深火热之中!　　霍达东是怀着一种极为矛盾的心理状态与李仲海等人乘坐火车到北京参加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的。

北京已经遍布春天的气息，杨柳返绿，燕子飞舞，为共和国建立十周年献礼而建设的十大建筑有的已经完工，有的正在紧张施工，古老肃穆的古城因着这些建筑而平添了些异样的情调，只是那灰色的高大城墙依然使人感到一种传统的束缚。

刚刚住下，和霍达东与李仲海在延安时就熟识的老朋友习仲勋同志拿着个小册子来找他们了，此时习仲勋已经身为国务院副总理。

“仲海，达东同志，这是近期各地农村情况汇编，你们省春荒出现了八十万灾民，我可替你们担着心哩。怎么样，要不要我向周总理打个招呼，先发点救济粮过去，再把你们五九年的征购粮数字减一点?” 习仲勋对这两个陕北老战友还是很关切的。

李仲海如同受了侮辱似地顿时涨红了面孔，已经发福的身体抖动了一下，他急着问:“谁说我们省有八十万灾民，这是造谣哩!”

霍达东垂下头，低声说:“中央要数字，是我派人去统计的，不十分精确，可也八九不离十。”

李仲海勃然大怒，他那因受伤而留下一块疤的额头闪出晦暗的光:“霍达东同志，这么大的事你怎么能不经过省委讨论呢?这简直是目无组织纪律，回去省委常委要讨论这件事，要、要处分……”

霍达东有些愧疚和不安，他慑嚅着:“中央要数字要得急，所以我就没向省委汇报，谁知道中央会出情况汇编哩，我……”

习仲勋不好参与一个省内的争执，他笑笑说:“这都是参考，准确情况以这次大会你们的发言为准。达东是好意，想给省里减轻点压力，仲海也是好意，不愿让省里的形象受到损害，没啥可争的。好了，我就是先来看看你们，生活上有啥不方便的只管提，我这半个管家一定尽力解决。”

习仲勋走了，李仲海还是不依不饶地又训了霍达东好一会儿

。

霍达东没有反驳，因为这个问题正是他心理矛盾所在。

春节过后，他跑了 A 省省会周围的一些农村，发现春荒已经很严重，不少村子已经缺粮断炊，有人还悄悄地告诉他有饿死人的情况发生，不过他没见到，也就没有当真，生病也会死人哩，咋一定就是饿死的，不过，粮食问题确实已经十分严重。

他在一个人民公社已经冷冷落落地食堂里吃了一顿饭，已经是特殊照顾他了，只有一个摸和一碗玉米面稀饭，其他陪同人员则只有稀饭喝。

他问社长:“你给我说实话，粮库里还有多少粮?不说实话我撤你的职!”

社长哭丧着脸说:“还有几千斤玉米种子，你们喝的稀饭就是用种子磨的面，你吃的那摸是花十块钱高价买来的。”

“那社员吃啥?”

“有一半人逃荒去了，剩下的吃刚冒芽的榆树叶子和去年留下来的沤肥的红薯蔓。不过，请霍书记放心，只要抗过这三个月，麦子收下来就没问题了，咱绝不会拖大跃进的后腿，绝不会给人民公社抹黑。”那社长激动地表示。

“好同志哩!”霍达东拍了他肩膀一下。

回到省城之后，他就准备参加北京的人民代表大会，没有时间往更偏远的地方去了解情况了。

从感情上讲，他一点也不愿意 A 省出现灾民，出现粮荒，出现任何不好的现象，作为 A 省的领导之一，他也不愿被人家看笑话哩，尤其是不能给那些反对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这三面红旗的人授以口实，他是坚决拥护这三面红旗的，因为他认为这三面红旗可以让农民走人天堂。

然而，从理智上讲，他又不得不承认现实，这现实还很严峻哩，几十万人没有饭吃，这对任何一个主管农业的副省长来说都不是件光彩的事，也不是件容易解决的事。若视而不见，假装没有，只会是自欺欺人，到时问题更为严重了，负责任的仍旧是他。

说实话，给脸上抹黑;不说实话，又昧良心，他左右为难。于是，他只能借那个公社社长的话来安慰自己，“抗过三个月，麦子收下来就没问题了。”他把全部希望寄托在一九五九

年的收成上，但愿千万不要发生任何天灾。在这个时候，他绝不可能、也根本不敢去考虑人祸。

在中央的汇报会上，当着周恩来总理的面，霍达东根据 A 省临时定的调子，将农业形势描绘得一派大好，并说灾民只是个别县里的情况，主要是领导不力，请中央放心，A 省还没有到需要救济的程度。不过，他还是为自己的工作留下了一个余地，没有上报一九五九年 A 省粮食收购要比去年还增加多少亿斤的数字。

霍红红在闹浮肿，本来清瘦的她一下子变得虚胖起来，常常头晕眼花，身上一按一个坑，有一次还昏倒在教室里。老师打电话让霍达东去了趟医院，医生小心翼翼地告诉他说:“霍书记，您的女儿是严重的营养不良，她正在发育时期，营养一定要跟上。”

霍达东皱了皱眉头，将女儿接回了家。他不能不承认，A 省严重缺粮的灾难已经像瘟疫一样袭进了他这个 A 省主要领导的家。

从打人春以来，省会就已经实施了严格的粮票制度，而肉、蛋、油更是每人每月以两计。有人曾提议给局以上干部每月特供一些肉、蛋、油，但在省委常委会上被李仲海坚决否定掉了。

他义正词严地说:“让我们搞特殊化吗?让我们与广大人民产生隔阂吗? 这不是照顾我们，这是在害我们!延安时困难不困难? 可我们军民一致，上下一致，同甘共苦，不是照样度过了难关吗? 今天这点困难算啥，连延安的一半都顶不上哩，那时我们除了饿肚子，还要打仗，现在，我们紧一紧裤腰带，和全省人民一同战胜困难，夺得今年粮食大丰收。我提议，不但不要特殊照顾，每个人再从定量中减去两斤粮，以显示领导吃苦在前的作风。另外，对于那些搞特殊化的干部必须严肃处理，发现一个撤职一个。还有搞宣传工作的，要讲大好形势，要煽风点火，不准泼凉水，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来之不易啊!”

粮食少，又没有油水，大人们还可以忍受一段时间，但像霍红红这样的孩子就顶不住了。霍达东只能搂着女儿给她讲革命战争时期艰苦奋斗的故事，而常雪情则悄悄地给她的前夫写了封信，希望他能寄些营养品来，她的两个男娃也同样出现了浮肿哩。

让霍达东更为心急如焚的是夏粮并没有喜获丰收，五八年就出现的一系列问题使冬小麦播种时就埋下了祸根，撒种不及时，出苗稀疏，管理跟不上，加上开春以后，又逢大旱，有的地方继续颗粒无收，有的地方亩产不上百斤。

但令霍达东惊讶的是，各地区上报到省政府的简报中似乎灾民的问题并不严重，他知道，这肯定是李仲海对宣传口的人做出的宣传大好形势的指示在起作用。

他决定还是要亲自去看一看。

霍达东接到了白水湾村的女孩子妞妞写来的一封信:

霍爷爷:

您好。

我是妞妞，我快要俄死了，我们公社已经俄死了几十个人了。您快来救救我们吧，几年前，您从土匪手中救了我们，现在，粮荒和土匪一样要夺走我们的生命。

霍爷爷，您就是共产邪党，共产邪党不会让我们饿死，对吗? 共产邪党万岁!

妞妞

1959 年 6 月 22 日

霍达东被妞妞的这封来信震撼了，他知道妞妞是不会欺骗他的。他马上给省政府车队打电话，让他们派一辆吉普车来，他要立即赶到白水地区去。

正要出门，一个面黄肌瘦、衣衫褴楼、一头散乱长发的男子拦住了他的去路，而且“哪哑”一下子跪了下去，连连在水泥台阶上磕着头，不停地乞求着:“霍书记，你饶了我吧，我对不起你，对不起邪党，你饶了我吧，不，不，你毙了我吧……”

勤务员一把拉起了他，霍达东这才认出他是白水湾人民公社的社长憨柱。

“憨柱，你这是咋啦?”霍达东虽然心中已有几分明白，但还是问了一句。

白社长无力地瘫坐在地上，喘了几口气，说:“霍书记，饿死人啦，社员们围着县政府要粮吃，可县政府哪有粮哩。霍书记，总路线好，大跃进好，人民公社好，都是我憨柱不好，都是老天爷不好，你给我们那里的乡亲们拨点粮吧，你毙了我都行，几千老老少少啊，吃了大半年草叶子、树叶子了，再吃，就要吃人了…… 霍书记，你毙了我吧，也省得给咱们邪党脸上抹黑，是我憨柱一个人坏的事……”

霍达东眉头紧皱，挥了下手:“走，带我去看，你要说了假话再毙你也不迟!”

吉普车在一段坑洼不平的路上刹住了车，霍达东开门走了下来，眼睛盯住了车前面不远处横在路边的一个人，站住了一动不动，他是在提起自己的勇气，假如那是一具尸体，千万不要露出惊慌之情。

他已经见过很多尸体了，但是，他还没见过共产邪党领导下被饿死的尸体。他不能接受的不是死亡，而是他的子民被饿死的这个事实!

由于喝了些水，吃了两个模，又在车上休息了大半天的白社长此刻有了些精神，他率先窜过去，踢了那人一脚，见没动静，转回头喊着:“饿死啦!”

霍达东问:“你能肯定是饿死的?”

白社长使劲点着头:“我见得多了，没错，走吧，前面还能碰上。”他如同报功似地说，因为这证明了他没说假话。

听到白社长肯定的答复，霍达东走了过去，看到那倒毙路边的是一个老妇，她身上的衣服不知已经被什么人扒走了，近乎全裸地僵硬在尘土中，从那只剩一层黑黄皮肤而绝再看不出什么肉的身体来看，她已经被饿了很多日子了，那对如同两个空荡荡的纸口袋一样的塌瘪乳房和两个因哺乳过孩子而特别硕大的乳头使霍达东竟然想起了桂桂的形象。他浑身一阵发冷，觉得这念头确实让他不寒而栗，难道桂桂和这老妇有什么近似之处吗?他不敢再想下去。

“霍书记，上车吧，还要赶路，否则天黑前到不了白水市。” 杜娟心情沉重地劝说着霍达东。

霍达东上了车，但天黑前还是没有赶到白水市，因为他们一路上受到了三次阻截。

第一次阻截他们的是一群约有几十人的男女老少，他们要不就是全身浮肿，要不就是骨瘦如柴，一个个都面带菜色，走起路来摇摇晃晃的，看见汽车也不知躲避，司机不得不让汽车停住。

霍达东下了车，拉住一个驼背的老汉问:“兄弟，你们这是干啥去?”

“逃荒。”老汉有气无力地说。

“没饭吃了?”

“早没了，连树皮都吃不上了，树都砍去炼钢了。你是省里来的官吧!你给我们说说，啥地方大跃进搞得好，啥地方的人民公社还随便吃，我们到那去。”老汉反问起霍达东来。

霍达东苦笑了一下，这是个没法回答的问题，他当然不能说哪里大跃进都没有搞好，哪里都没有随便吃饭的人民公社，可他也说不出这些灾民应该去的地方，他只能劝导着:“先找找你们县里面的领导，他们没啥法子吗?”

“县里面? 毁就毁在县里面的领导身上了，不让我们种地，说是粮食够吃了，都去炼钢，炼出一堆铁渣子来，结果是没有钢，也没有粮，只剩下一群灾民去逃荒，他们让我们想上哪就上哪。”老汉愤怒地控诉着。

霍达东一时也没有什么好办法，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他们从车边走过，看样子，这些人走不到 A 省省会，就会有一半人倒毙路边，他让司机打开后车箱盖，把装在一个面袋子里的半袋子烧饼都送给了那些难民，这半袋子烧饼是他带的几天的口粮。

那老汉颤颤巍巍地接过半袋子烧饼，一下子跪在了地上，一边磕头一边说:“你是共产邪党里的好官，你的大恩大德我们永世不忘，我们要能活下去，一定好好搞大跃进，好好搞人民公社……”

霍达东不忍心再听下去，坐上了汽车。

在车上，白社长问:“霍书记，干粮送人了，到时候你们吃啥?”

“饿着，农民们能饿着，我咋就不能饿着。我也吃过草根、树叶子哩。”

白社长嘟嚟了句:“半口袋干粮只能救几个人，可下面有几十万人等着救啊。”

第二次被一群人将车堵住是黄昏时分的事。那是一群拿着扁担、木棍、甚至还有大刀片子的年轻后生，虽然一个个也都是面黄肌瘦，但却显出凶恶之相。

“站住，站住!”

“停车，把东西都搬下来!”

这显然是一群拦截过往车辆、试图抢劫粮食的灾民。勤务员掏出了出差时不离身的五一式手枪。

霍达东瞪了勤务员一眼，让他把枪塞回去，训斥着说:“这不是地富反坏右，他们是饿的，人饿极了啥事都干，几十万人，你这一支枪打得完吗?”

霍达东又下了车。白社长赶快跟在后面，边走边吼:“干啥，你们干啥?还有点王法没有?这是咱们省的霍书记，霍副省长!”

“嗬，是个大官，保险带着吃的，上去抢!”一个为首的吃喝了一声。

几十个年轻后生不由分说，一拥而上，把汽车里的东西全部抓了出来。然而，除了几件衣服和公文外，只有一包饼干能吃，这饼干是杜娟听霍达东讲了妞妞的来信后，想方设法搞来带给妞妞的。

为首者打开了那包饼干，几十个人咽着口水，都盯住那淡黄色的，不够一人分一块的面

粉烘烤制品，为首者使劲喘了口气:“一人半块，人人有份!”

“不能吃!”杜娟突然站了起来，声色俱厉地阻止着。

为首者凶狠地狞笑了一下:“你给我靠边，我们只有一条命，反正饿死也是死，抢点东西吃还能活。你们这些当官的不管我们农民的死活，惹急了我们，先吃了你!”

霍达东从这个为首者的话中不知咋的听出了自己三十九年前煽动农民砸粮库的声音。他的心收紧了，莫非共产邪党也到了要被农民砸粮库的地步了吗?

杜娟的神情黯淡了，她难过的说:“我叫你一声农民兄弟，这饼十真的不能吃，这是带给一个奄奄一息的农民的女孩子的，有了这包饼干，她可能就活下来，没有，可能就会死，而你们少吃半块饼干，并不会有太严重的后果。我求你们了。”

为首者的神色缓和了，问:“那女孩子是你的亲戚?”

“不是。”

“那你为啥要救她?”

“因为她给霍副省长写了一封信，让霍副省长救救挨饿的农民们!”杜娟的声音悲壮起来。　　为首者愣了一下，举着饼干的手慢慢下垂，终于，他把饼干递回到杜娟手中，然后自己一抱头，蹲在地上，嘟浓着:“我心软，我、我心太软，你们再找个头吧，我干不了……”

霍达东想，若还有机会碰上这为首的后生，他一定要认识他，而且想办法培养他当公社社长，县长，他觉得这后生和他年轻时有相像之处哩。

汽车再一次被人群挡住是快到白水市时，这一次的人约有数百之众，抬着十几具尸体，在月光下有如一片幽灵。他们正在步履沉重地向白水市走着，见到后面来了汽车，不知是否有人指挥，一下子全回过身后，然后齐唰唰地跪在了地上，无数双眼睛迎着灯光，每一双眼睛中都映出两个黄色的光斑，让人感觉到好像是鬼火。

霍达东再次下了车，白社长又跟在后面，他看见跪在最前面的那个人，很惊奇地叫起来:“你不是红星社的马社长吗?你这是干啥?省里霍书记来查看灾荒情况来了!”

那个被称作马社长的抬头看了一眼，但没有站起来，依然跪着，大声说:“霍书记来了更好，求霍书记给我们评理!豁出我这个社长不干了，我这个邪党员不要了，也要争个理字出来。”

霍达东阴沉了脸:“马社长，你不站起来，我不听你说话，你这是干啥哩，咱是社会主义，不是封建王朝，见官要下跪。起来，全都起来!”

马社长站了起来，但他不说话，那数百人都不起来，看来马社长是他们心目中的首领。马社长冷峻地说:“霍书记，我们是找王专员说理的。你来了，更好，我们找你说理!”

“啥事情?”

马社长咽了口唾沫，由冷峻转而悲愤地大声说:“去年秋粮就没收多少，今年夏粮基本绝收，可王专员非逼我们交够计划中的公粮，去年，我挨家挨户磕头作揖，除了粮种，每家再没剩下一粒粮，全交了，勉强完成了任务，换回来一张奖状，可全社人吃草根、树叶子过了半年光景，过年时有大多数人家连饺子都没吃上。今年夏粮绝收，我跟王专员汇报，说是杀了我也收不上粮了，他不信，说是社员们私分了粮，埋在地下，还要派别的公社的民兵营

来挖地三尺，我要有粮，我能让人饿死吗?那是我娘，全社第一个饿死的。我要让王专员看看这些饿死的人，我要和他评理，没有粮，拿啥交?我们这几百号人都送上来了，要粮没有，要命有一条，我就不信共产邪党里没有信真话的!”

白社长小声说:“马社长，讲话要有原则。”

马社长更愤怒了:“啥原则?现在最大的原则是不能再饿死人了!否则共产邪党还有啥脸领导农民!”

霍达东的脸已经像铅块一样灰暗，心情沉重得如同被压上了磨盘，他咬了咬牙，低声说:“马社长，你要相信我霍达东，给我三天时间，我一定给你个结果。若不相信，你就抬着尸体继续前进，去地区，去省里都行，我绝不拦着，憨柱!上车，走!”

马社长愣了一下，终于一挥手，跪着的人们都站了起来，为汽车让开了路。马社长没有带人继续前进，他相信了霍达东，但霍达东没能给他彻底解决问题。霍达东只是个人同意了减免红星社的征购粮，他甚至减免了整个白水地区的征购粮。然而，A 省省委没有同意，在霍达东成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之后，他的一切指示均告作废。马社长及整个白水地区所欠的公粮在秋粮中补交，秋粮补交不齐，来年夏粮再补交。整整三年，马社长及白水地区的农民都是在饥饿和补交所欠公粮中艰难地度过的。

白水地区王专员是天亮时才知道霍达东一行人来到了自己的辖区，这是白社长通知他的，毕竟白社长是他的属下哩，县官不如现管，白社长绝不敢惹恼王专员。于是，王专员也知道了霍达东一路上遇到的情况。

他一见到霍达东，立即就表示态度:“霍书记，我工作没做好，我承担全部责任，我现在已经进行了周密的安排，到秋收时，眼前的这些困难就会不复存在了。我马上安排农业处、水利处、物资处、公安处的同志向您汇报工作，我……”

霍达东不耐烦地一挥手:“我现在要自己去看，我不想听别人骗我的话了。”

他带着杜娟、白社长和勤务员上了汽车，扔下王专员，直奔白水湾村而去，王专员愣了一下，恨恨地嘟浓了句什么，但也赶快叫了车，尾随而去。

几个小时以后，霍达东在白水湾村的村口下了汽车，他抬眼望去，村落依旧，土地依旧，河流依旧，但是稀疏的树木在盛夏之季却是光秃秃的，地里几乎没有人在干活，几个在阳光下似乎变小了的人影蹲在光秃秃的土里不知在寻找和挖掘着什么，村里没有鸡鸣，没有狗吠，也不见牲口跑来蹿去，死气沉沉的，好像当年被土匪侵袭后一样，不同的只是没有硝烟和火光。　　霍达东叹了口气，马上走进村去，轻车熟路地到了妞妞家，他上前去敲门，大声说:“妞妞，你霍爷爷看你来了，给你带了书和本子，还有花铅笔。”

没有动静，死一样的沉寂。

白社长一把推开了门，吼叫着:“石锁，石锁，霍书记来看妞妞了，给她带了饼干。”

还是没有人回答，一种不祥的感觉充斥了几个走进院子的人的心，他们犹豫着，到底走不走进那被太阳照射着的房间。

白社长没那么多想法，他走上去几步，推开了正房的门，然后愣了一下，冲进去，随即传出他的声音:“石锁，你还活着不，活着就说句话!”

听到白社长问话的口气，霍达东急忙也跟进了正房，他看到了石锁几乎不成人形地躺在炕上，一动不动，头发和胡子都长长的，几乎遮掩了整张只剩下皮和骨头的脸，透过窗子的阳光照射在他头顶处，好像在那里聚起了一圈光环，他的眼睛睁得大大的，胸脯还在微微起

伏，但是已经没有力气说话了。

“妞妞呢？妞妞?”霍达东一边让勤务员赶快找水来，一边焦虑不安地间。

石锁的眼珠动了一下，向一边斜斜，那意思是明确的，妞妞在边上那间房内。

霍达东冲白社长说了句:“憨柱，无论如何给石锁找点吃的。”然后和杜娟急步转到了边上那间房内。

那间房内同样洒进了夏日的阳光，妞妞就笼罩在这阳光中，但她一点都不美丽，她的身躯肿得撑满了打着补钉的花衣裤，脸上的肌肉开始腐烂。一群苍蝇和头发连成了一片，如同一块黑色的布片遮盖她的头上，见到有人凑近，苍蝇“嗡”的一声飞了起来，露出了妞妞那开始长蛆的脸和正在脱落的头发。妞妞的枕头被嘶咬开了，里面的荞麦皮流淌在她的头边。

杜娟一下子捂住嘴，一阵恶心过后，眼泪喇喇地流淌下来。她手中的饼干掉在了地上，摔散开来。

霍达东闭上了眼睛，久久地沉默着，突然，他不顾一切地抱起了妞妞，走出房间，走出院子，走出村落，走向田野，来到了白水河边。他蹲下去，脱去妞妞的衣服，用清凉的河水洗去妞妞身上的蛆虫和腐肉，然后，又抱起她，漫无目的地沿河畔向前走着，走着。

追出来的杜娟只听到远远地方传来一声野兽般的嘶吼:“霍达东，你是个尿，你算啥共产邪党员啊!”

开仓放粮!

打开粮库的大门，向白水地区和全省的灾民放粮!

在返回 A 省省会的一路上，霍达东的脑海中只翻腾着这一个念头，他已经饿了三天了，但他却丝毫没有饥饿感，他的痛苦早已经使他没有任何食欲了。

回到省会，他径直到了办公室，拨通了庐山的电话，省委第一书记、省长李仲海正在那里参加一个据说叫“神仙会”的中央会议。

“仲海，我要开仓放粮了，再不放粮，农民要造反哩!”电话一通，霍达东直截了当地表示了自己的态度，他认为李仲海会支持他，因为据他所知，这次中央会议的中心就是反左倾，反浮夸，反冒进，要进行调整。

然而，李仲海却声音冷漠:“啥农民造反，我看是你要造反！开啥仓？放啥粮？那些粮食是按国家计划收购的，要动用必须经中央批准，谁给你权力开仓放粮?”

“周总理在庐山，你向他请示一下吧，咱们省确实困难，我刚从白水地区回来，那里已经饿死上千人了!”

李仲海一定怔了一下，但马上又说:“达东，那只是局部，你要看大局，现在庐山上正在展开一场严肃的斗争，一股攻击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的邪风由彭德怀刮起来了，他和一些人就是抓住局部问题试图否定三面红旗，否定毛主席的领导，你开仓放粮，不正是给这些人提供了炮弹吗?告诉你，绝不能开仓放粮!”

“可……”

“不要说了，达东，这几年你已经在右倾的路上走得够远了，你再不悬崖勒马，就滑到马圆那些右派一边去了！好了，不能再多说了，马上要去开会，和彭德怀一伙进行面对面的针锋相对的斗争了。达东，我警告你一句，你要是固执己见，这次我也救不了你哩!”李仲

海挂断了电话。

霍达东沉重地放下了电话，他搞不清楚庐山上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也不会知道彭德怀在这次会议上不仅给毛主席上了提出批评的万言书，还在西北小组会议上作了毫不掩饰、格外坦率的反冒进发言，他说:“反右以来，政治、经济一连串的胜利，邪党的威信高了，得意忘形—说得意忘形可能重了一点，总之是脑子热了……毛主席与邪党中央在中国人民心目中的威信之高，是全世界找不到的，但滥用这种威信是不行的，问题不少……要找经验教训，不要埋怨，不要追究责任，人人有责任，人人有一份，包括毛泽东在内。总的责任在中央，不在下面。”　　他也不知道，去年他陪彭德怀视察了省里的一些地方后，彭德怀又去了湖南，然后说出了这样的话:“这不是朝主席脸上贴金，而是抹黑，要是主席晓得了这里面掺有假，他是笑呢，还是哭? 我看他哭笑不得!”

假如霍达东此时知道了这一切，他是否还有勇气开仓放粮? 后来并没有人问过他，连他的女儿霍红红都没有问过，而且，历史不能假设，一个伟人和一个凡人一样，他的举动都不能假设。

发生了的事才能评说，而没有发生的事评说也毫无意义。

霍达东还是开仓放粮了!

他和李仲海通完电话后，郁闷地向家中走去，此时天上布满了乌云，一场雷雨即将到来。他先见到了已经下班回家的常雪倩，常雪倩告诉他:“老霍，我把两个男娃送走了，送到了他们的父亲那里，这样我可以有更多的精力去工作。而且，不知道这吃不饱饭的日子还得拖多久，他们的父亲怕毁了娃儿的身体。”

霍达东第一次冲常雪倩发火了:“你咋不把全中国的娃儿都送走，就你的娃儿稀罕?中国人的事要靠中国人自己解决，我就不信天底下有共产邪党解决不了的问题，都不替农民说话了，还有我霍达东一个人替农民说话，天塌下来，我顶一分钟，顶半分钟也要顶!”他的火气正在凝聚为一股豪气。

常雪倩凄婉地笑了笑，她没有反驳霍达东，她内疚，觉得对不起他，是她让他在生活上太孤独，太苦闷，因而，也就太抑郁，太沉重，他愿意发泄就让他发泄一下吧，发泄了兴许就舒服一些。

然而，由于常雪倩的不反驳，使霍达东并没有得到充分的发泄，他依然积郁着太多的东西，在内心滚动、沸腾，却不能喷发。

桂桂来了，她浑身上下水淋淋的，头发和衣服都贴在越来越单薄的身体上，那肋条骨、那扁平的胸脯清晰可见，显然雷雨的前锋已经抵达 A 省省会了。

她不顾常雪倩在场，一下子扑到了霍达东的怀抱中，泣不成声地嘶叫了一句:“弟，活不下去哩!”

“咋啦?”霍达东扶住她消瘦得只剩骨头架子的肩头。

“我那养女一家人、一家人全、全给饿死了，她家乡来、来了个人，让她想办法给搞点粮，要不全村人都要饿死……”桂桂喘了口气，又接着说:“还有、还有红红……”

“红红咋啦?”霍达东和常雪倩立即吃惊地问。

“红红不吃饭，她说要省下粮，给一个、一个叫妞妞的女娃吃，妞妞是谁?叫她来吧，叫她和红红一起吃……”

霍达东的泪水一下子淌了出来，他想不到自己年近六十时还会流泪，他的头一下子本能

地靠在桂桂的胸脯上，以往多少年，每当他的头枕在这并不丰满的胸脯上时就会感到安宁、祥和，就会睡得安稳。而现在，他的头靠在这再不柔软的温暖的胸脯上时，却感到了一种壮烈，一种责任，一种要拯救什么的强烈冲动，他在这胸脯上得到的太多，他应该为这胸脯付出了！　　于是，他想起了那个倒毙路边的老妇，当时，他竟然会将那老妇与桂桂重叠，现在他明白了，他把她们都当成了母亲，当成了他从没有谋过面的母亲。正由于他从没有在作为个体的母亲的怀抱中生活过，于是，他对母亲的爱才会如此广泛而博大。

他站了起来，大声叫着:“小杜!”

一直在门外站着的杜娟走了进来，同样心情凝重地问:“霍书记，什么事?”

“给我通知省政府所有在家的干部和粮食局贾局长，运输局洪局长，全部赶到一号粮库，开仓放粮!”霍达东断然发出指示。

杜娟没有犹豫，立即开始拨电话。

而常雪倩也没有任何阻止的意思，尽管她作为局级干部多少知道国家粮库的粮绝不能一个人说放就放，如同银行的钱绝不能一个人说拨就拨一样，但她还是没有表示态度。她只是在想，假如这样能让她从来没有爱过却又共同生活了十几年的善良男人获得心理上的安慰，她愿意和他共担哪怕是最严厉的处罚。她送走了两个男娃之后，再也没有什么可以担忧的了。

闪电划破了浓重厚实的乌云，如同一支倚天利剑劈开了被荒凉遮掩了太久的沉重土地，雷声滚滚，好似一架古老的木轮牛车拉着超载的历史行走在永不平坦的沧桑之路上，大雨傍沱，有如巨人苍凉而悲壮的泪水天洪般向人世间倾泻。A 省省会一九五九年盛夏最狂暴的雷雨在夜晚降临了。

A 省一号粮库坐落在郊区的黄河边上，有铁路和公路直接伸入库区，平时戒备森严，粮荒开始以后又加了双岗的大门被打开了，近百辆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生产的解放牌汽车、苏联生产的嘎斯牌汽车、老式日本丰田牌汽车、陈旧的美国十轮卡车排成长队从粮库门口长龙一样排列到浓郁的黑暗之中，粮库站台边上，飞起的宽大屋檐下几十辆火车货车车厢也停靠在那里，几支巨大的探照灯在雨帘中明晃晃地来回扫动，上百个穿着雨衣的人们在探照灯的照射下似乎是一群蚂蚁在魔鬼眼睛的注视下可笑地爬动。

“装车!”霍达东站在第一辆卡车的车斗上，声嘶力竭地喊了一声。

省政府的干部、粮库的装卸工、甚至还有附近闻讯赶来的居民，冒着倾盆大雨，把一袋袋的白面、玉米面、小米装上了已经支起帆布篷的卡车车厢和货车车厢。

省政府办公厅主任已经是第三次附到霍达东耳边小声劝阻了:“霍书记，这是要犯错误的呀!”

霍达东的热血早已经沸腾，他不愿再讲什么道理，只是冷冷地哼了一声:“你这尿要怕犯错误，你就给我滚!再跟我哆嗦一句，我就把你从车上扔下去!”

办公厅主任不敢再说什么了，但他马上去找电话，准备向依然在庐山的李仲海汇报，来粮库之前，他已经打过一次，线路不通。

一连扛了十几袋百斤重粮袋的霍达东直起腰来，杜娟不失时机地递给了他一块毛巾，他擦擦脸上的汗水和雨水，看着那些在紧张搬粮的人们，一阵感慨，似乎整个人生的历程一下子浮现在他的眼前:

他灵巧地躲避着子弹，指挥着成千的灾民潮水一样拥进金城镇的粮库，将那里的粮食抢

劫一空，上万名灾民活了下来;

他在官兵对他搜捕盘查之后，一股突如其来的冲动使他将嫁给他数年还依然是处女之身的婆姨桂桂按倒于床上，使自己成为了真正的男人，也使桂桂成为了真正的女人;

他和李仲海一同在马圆家二楼的书房内，站在中国共产邪党邪党旗下，庄严地、虔诚地向邪党宣誓，要为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终生;

他率领着农会会员，在离官府不远的地方挂上了农会的大匾;

他冒着枪林弹雨，熊熊烈火，向肤郡县县城疯狂地冲锋;

他被官府称为红匪，和十几个死里逃生的战友们躲在山沟沟里，过着野人般的生活;

他在毛泽东住的窑洞里，听着毛泽东言语激昂、又城府颇深的谈话，然后向他提出了解决边区经济困难的办法;

他娶了桂桂给他带来的年轻女子凤花;

他以私人情感打动了已经是国民党抗日将领的马圆，打通了贩运边区土特产品的安全通道;　　他被何司令员恶人告状，险些整得一蹶不振;

他第三次、也是最后一次结婚，娶了一直欺骗他感情但又对他很好的常雪倩;

他亲眼看着马方仅仅为了经受已经经受了二十年的考验，用嘴叼着炸药包去炸毁他亲哥哥设置的坚固防线上的碉堡，而马方经受这考验的唯一目的就是为了人邪党;

他只身进人马圆的军部，说服他战场起义，使黄河大堤未被炸开，数十万人免遭不幸;他亲自带领参加剿匪，使 A 省边远地区的人民终获解放;

他在马牙子的判决书上签了字，将自己的老战友送上死亡之路;

他再也不能容忍马圆对邪党和毛主席的攻击，和李仲海一同将他们的人邪党介绍人打成 A 省头号大右派;

他深入农村，动员组织了 A 省第一个高级合作社，第一个人民公社;

他?

不，他眼前浮动的根本不是这些，此时此刻，他眼中只有那一幕幕让他撕心裂肺的惨景:

倒毙路边的老妇;

有气无力地走向远方的一群群灾民;

风雪中露宿街头的乞讨者;

因营养不良而昏倒的女儿红红;

几百人向他下跪申请免交公粮的人民公社社员;

因饥饿而死身上长了蛆却无人掩埋的女孩子妞妞……

农民，他们大都是农民啊，还有什么比农民正在受苦受难而更让霍达东痛苦、愧疚和难以忍受的呢?

他也是农民,他始终改变不了他农民的性格,他脖子上始终挂着那盛着一撮黄土的荷包。他不懂马克思主义,他参加革命的唯一目的就是因为革命才能改变中国农民祖祖辈辈的受人欺侮的低贱命运，而这目的也是他唯一所信奉的真理。

现在，农民又在受苦受难，他不愿意深思农民们为什么还会受苦受难的原因，他只想尽快使这些农民从苦难中解脱出来!

他只有这一个想法，只有这一个念头!

雨更大了，地上的积水哗哗流淌。

天更黑暗了，装满了粮食的汽车向那无边无际的黑暗中驶去……

(34)

陕北汉子霍达东在李仲海下了庐山，回到 A 省对他开仓放粮的错误进行揭发批判时，拒不认错。

“饿死了人谁负责,我开仓放粮是为了邪党和社会主义的形象,是为了农民不骂娘!”他粗着嗓门在省委扩大会议上喊着。

李仲海一拍桌子，厉声说:“霍达东同志，你这话和彭德怀如出一辙，你们把自己打扮成救世主、梁山好汉，口口声声为了农民，可更多的农民的积极性被你们给打击下去了，这对邪党和社会主义的危害比饿死几个人严重得多,我们从来都是先算政治账,后算经济账的。霍达东同志，你必须深刻检查你对灵魂深处的资产阶级的丑恶、反动思想，彭德怀比你官大哩，比你口气硬得多，最后他不是也要检讨。”

“我没错，我检讨啥哩。我从来不否定三面红旗，从来不反对邪党和毛主席，咱们省的第一个人民公社是我抓出来的，第一颗高产卫星是我放的，我就是见不得农民饿死，你们在场的哪个人愿意看着农民饿死?有种的站出来说!”霍达东的额头上青筋毕露，眼睛喷着狼一样不屈不挠的光。

“别给自己脸上贴金……”

“要谈问题的实质……”

“反右时你立场就不坚定……”

跟霍达东共事多年的人们纷纷叫喊着，他们都极力表示着自己的邪党性原则。

白水地区王专员站了起来:“我请求省委批准将霍达东同志送到我们白水地区参加一次批判右倾机会主义的群众大会，他总是表白他代表了农民，这次让他看看农民们是如何仇恨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他会从中受到深刻教育的。”

李仲海沉思了一下，当场同意了。

霍达东的精神支柱轻而易举地崩溃了。

在白水地区有着几千人参加的批判右倾机会主义、捍卫三面红旗的群众大会上，那些曾经在接到霍达东开仓放的粮后而一个个热泪盈眶、感激涕零的农民们纷纷上了台，以发自内心的愤怒斥骂着霍达东:

“你是条披着人皮的狼，你和那个叫、叫彭德怀的穿一条裤子，想反对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想推翻共产邪党的领导，让我们广大贫下中农吃二遍苦，受二茬罪，这是痴心妄想!”这是马社长的发言。

“你想用小恩小惠来破坏我们农民和共产邪党的血肉关系，没门!告诉你，我们贫下中农就是饿死，也不会反对共产邪党和三面红旗，谁反对共产邪党和三面红旗，我们就坚决打倒谁!”这是石锁的发言。

“霍达东，你是想着法子给邪党的脸上抹黑，给我们贫下中农脸上抹黑，我们以前被你的虚假面貌欺骗了，现在总算看出了你是有狼子野心的家伙，不管你用啥花言巧语，也别想让我们贫下中农走回头路，我曾吃过你两个模，现在还给你!”这是白社长的发言，他用两口浓痰还回了霍达东给他吃的两个摸。

“还给你玉米，呸!”
“还给白面，呸!”
“还给你豆子，呸!”
“还给你小米，呸!”
“还……呸!”
“还……呸!”

口水、浓痰、鼻涕，一股脑地甩到了霍达东的身上。本来，他认为农民们不会真正对他霍达东有啥反感，他们只不过是来应付了事，可他没想到这些农民们全都是认真的，毫无虚情假意，他们从心眼里仇恨他，因为他的行为是在反对共产邪党。

他真的反对共产邪党吗?

假如开仓放粮挽救数十万灾民的生命就是反对共产邪党的话，那他就承认!就无所推脱地承认!就只能承认!

“我，我有错……”从不认错的他低下了他并不高贵但却不易屈服的头。

李仲海在主席台正中间第一排座位上冷冷地、有一种病态快感地笑了，他低声向身边的王专员说:“农民是支持我们邪党的，因而也就是伟大的!”

在他说了这句话七年之后，也是在盛夏季节，还是这些斥责霍达东反对共产邪党的愤怒农民们，每人掏出仅能掏出的几分钱，凑出了几百元钱，组成了一个东进战斗队，乘坐不要钱的火车抵达了李仲海那时任省委书记兼省长的沿海某省的省会，静坐二十四小时，绝食四十八小时，后来在当地“红卫兵”的协助下，终于将李仲海揪上了批判台，给他的脖子上挂上了反对共产邪党、反对毛主席、反对社会主义的三反分子的大铁牌。在所控诉的他的罪行中间，有一条是由于他的官僚主义和恶霸作风，导致 A 省饿死了数万人。

而王专员那时则是被揪回白水地区，与白社长、马社长等一批已进人地区行署的官员一同被批斗，结果王专员当场心脏病发作，死于批斗台上，白社长被打成了终身残废，马社长一头撞死在自己母亲的墓碑下。

霍达东终于做出了检讨，在 A 省省委扩大会上，他面无表情、两眼呆痴地说:

“我有错，我对不起邪党，对不起毛主席，我罪该万死，我……”

到最后，霍达东已经完全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了，但他依然在不停地说着，不停地批判着自己。

两年后当他被送到中央邪党校学习时，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始后“造反派”对他这个落水狗进行批斗时，他都是这样咒骂和批判自己的…… 在他心灵末梢最敏感处只有一点，那就是绝不敢和毛泽东唱对台戏。

一九七六年九月的一天，也就是在他辞世前不久的一天，他的女儿霍红红兴高采烈地告诉他一个消息:“老毛死了!”

他听到这个消息后一愣，随即抡圆了胳膊给了已经有了娃儿的女儿一个大耳光，这是他第一次打女儿，也是最后一次打女儿。打完这个耳光之后，他就躺倒了，一直躺到他死。

一九五九年九月底，中共 A 省省委下发了两个正式文件，一是《省委关于以霍达东同志为首的右倾机会主义反邪党集团的错误的决议》，一是《右倾机会主义反邪党分子霍达东同志的反邪党言行》。

这两份文件使霍达东的人生实际上在社会生活中完结了，作为一个红匪，支撑着他无所作为甚至无所事事地继续活了十七个年头的是那装有黄土的荷包和五台山老和尚送给他的那串沉香木捻珠。

二十世纪末的一天，霍达东的女儿带着两个作家到了 A 省，想收集点当年霍达东的情况，看看可不可以写一本报告文学以祭奠自己的父亲。然而，没有人知道霍达东是谁，活得有滋有味的人们只知道帝王将相和流行歌星，还有美国总统和日本首相。

霍红红失望了，然而两个作家却正是由此，才发誓一定要使霍达东从历史的尘埃中露出本来面貌，他们唯一担忧的是：这种既不赚钱又不为某些官僚看好的书是否能够出版?

初稿于一九九六年六月二十六日

海南一间陋室中

修改于一九九七年三月一日

北京城乡交界处

后记

任何一个曾绎拯救了几十万条人类生命的人都值得我们跪拜，无论其被所处时代认为是高贵者还是卑贱者，也无论其人生际遇是辉煌的还是悲惨的。

我就是为了一个曾经拯救过几十万条人类生命的人而产生了创作冲动，继而一气呵成了几近四十万字的长篇小说。

这部充满热烈而沉重情感和文字的书将奉献给那个我从未谋面、也再不可能谋面的、而

却永远令我缅怀和敬仰的老人及这位老人唯一的女儿—我称为大姐的州立端庄而刚强的中年女性。

我写的是一段历史。

历史在我眼中不是镜子，不是长河，不是一件件发黄的纸，而是一个个活生生的人。或是他们的尸骨，或是他们的灵魂，或是他们惊天动地的举动，或是他们平淡无奇的人生，只有在描绘人物时，我才会觉得生命的价值所在，也才会觉得艺术的价值所在。

我不想媚俗，迎合芸芸众生的某种趣味自然是文学和艺术的堕落，但我同样也不想媚雅，迎合几个自以为是的、只会孤芳自赏的所谓浑身透着文化味的学者同样是一种无聊和沉沦。我只是以我的热血去铸就我所认识的真实，通过一个个独特的人物去展示过去，并告诉末来，这将高居于俗和雅的问题之上。

当我行走在被称为陕甘宁边区的黄土高坡之时，当我从一个窑洞出来又钻入另一个窑洞之时，当我站在被炎黄子孙赞赏了几千年的黄水堤岸之时，当我遥望着巨龙般伸向天际的长城之时，那个老沐点点滴滴的经历在我脑海中汇聚成为一个以往文学作品中从未塑造过的形象，他不再是他，他成为了中国农民的命运，而他永远只能是他—陕北山沟沟里的一个朴实的农民。

当我最终因着听来太多的关于这个老人的故事而要将某种思绪在蒙蒙细雨中喷发出来之时，我这样想:假如我们还相信有良心存在的话，这位老人无疑可以被称为中国农民的良心!　　感谢韩少功、蒋子丹、和谷、邢增仪、患患等海南文坛的朋友在我这部作品还是提纲之时就真诚地提出了极其宝贵的修改意见，使思想更为凝炼，使人物更为鲜活，使文化底韵更为丰厚，使艺术风格更为个性化;当然，更要感谢的是陕西籍作家、教授张浩文，他不但陪同我在他的家乡感受以往生活的厚重、苍凉，而且还对作品本身的文化、风情、民俗的谬误进行了指正，并且亲自校阅了一遍。我必须承认，这部作品中有他们的心血所在!

窗外又是蒙蒙细雨，正应了“清明时节雨纷纷”　的千古绝句，在这种欲断魂的阴郁日子里，很适合人思考些沉重的，所谓忧患的问题，尽管海南被不少经院学者认为是没有文化，只有欲望的旗帜在飘扬的浮噪之地，但并非在这里生活的所有人都整天骚动不安，否则，我对面房子中的韩少功何以会写出《马桥辞典》?

不过，在写完一部长篇之后，我实在不愿意再把自己抛入某种深沉状中，也不愿“细数窗前的雨滴，细数门前的落叶”，以作忧思状，我觉得对生活、历史、自然、社会的那些激情和反思都已经融进作品之中，或深刻，或肤浅，或震撼，或平淡，自有读者评说，无需用后记赘述。

读者永远是我的上帝。

1997 年 4 月 5 日于府城